

中苏论战文选

1956 - 1964

萧峰 编

全部文章均选自人民日报

目 录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1
列宁主义万岁·····	28
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	54
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	68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78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86
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	105
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113
分歧从何而来? ·····	121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135
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213
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220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235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263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295
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318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329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350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366
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383
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402
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428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453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总结了国际关系和国内建设的新经验，作出了关于坚定地执行列宁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可以和平共处的政策、发展苏维埃的民主制度、贯彻遵守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批判党内的缺点、规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等等一系列的重大决定。

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二十次代表大会非常尖锐地揭露了个人崇拜的流行，这种现象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的苏联生活中，造成了许多工作上的错误和不良的后果。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

在过去历史上，在现在一切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当权政党或者政治集团敢于在自己的党员群众面前，在人民群众面前，认真地揭露自己的严重错误。工人阶级的政党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政党，对于它们说来，实行自我批评，除了失掉错误以外，什么都不会失掉，而所得到的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在最近一个多月以来，兴高采烈地谈论苏联共产党关于个人崇拜的自我批评。他们说：好！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共产党居然犯了严重的错误，而且还是一个有很大声名和荣誉的领导人物斯大林犯了这样的错误。反动派以为他们现在是抓住了一个能够用来中伤苏联和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把柄了。可是，反动派毕竟是“心劳日拙”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什么著作中曾经说过我们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或者曾经说过某一个共产党人是绝对不会犯错误的呢？我们共产党人的党内生活所以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制度，难道不是因为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就否认有什么不会犯或大或小的错误的“神人”吗？何况一个在世界上史无前例的首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能够设想它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呢？

一九二一年十月间，列宁说过：

“让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着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走狗和瘟猪们，用

层出不穷的诅咒、谩骂、嘲笑来攻击我们，责难我们所建设的我国苏维埃制度中的失利和错误吧。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我们工作中的失利和错误，无论过去或现在，确实是很多的。在这样的全世界历史上的新奇事业，即创立空前未见的新式国家制度中，难道能够没有失利和错误吗！我们将百折不回地来为纠正我们的失利和错误而奋斗，力求改善我们实际运用苏维埃原则这方面还远未完善的方法。”

也不可能设想：初期有过某些错误，就将命定地永远不会再犯某些其他的错误，而且命定地不会或多或少地再犯原来有过的错误。自从人类社会分裂为几个利害不同的阶级以来，经历过奴隶主的专政，封建主的专政，资产阶级的专政，这些专政继续了几千年；而从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人类才开始经历无产阶级的专政。前三个专政都是剥削阶级的专政，但是封建主的专政比奴隶主的专政要进步些，资产阶级的专政又比封建主的专政要进步些。这些在社会发展史上曾经起过一定进步作用的剥削阶级，总是在很长的时期中犯过无数历史性的错误，而且是反复地一犯再犯，才能积累他们的统治经验。但是随着他们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他们仍然不可避免地要犯更大更多的错误，激起被压迫阶级的大规模反抗和他们自己内部的分崩离析，以至促进了自己的灭亡。无产阶级的专政和以前任何剥削阶级的专政，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它是被剥削阶级的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是为着创造没有剥削、没有贫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也是最后一次的专政。这样的专政，担负着历史上最伟大、最困难的任務，面对着历史上情况最复杂和道路最曲折的斗争，因而它的工作——正如列宁所说的——也不能不犯很多的错误。如果有些共产党人发生骄傲自满和思想硬化的情形，那么，他们甚至也会重犯过去自己犯过的或者别人犯过的错误。这一点，我们共产党人是必须充分地估计到的。为着战胜强大的敌人，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这个高度集中的权力，是必须和高度的民主相结合的。当着集中制被片面地强调了的时候，就会出现许多错误。这一点，也是人们所完全能够理解的。可是，无论有怎样的错误，对于人民群众说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比起一切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比起资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总是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列宁说得很对：“如果我们的敌人责难我们说：看，列宁自己也承认，布尔什维克做了大量的蠢事；那我就想这样来回答他们：对的，但是你们是否知道，我们的蠢处较之你们说来，终究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剥削阶级为了掠夺的目的，总是希望使他们的专政能够永远保持下去，由一世传到万世，因而用尽千方百计来折磨人民，他们的错误是无法克服的。但是无产阶级为了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解放人民的目的，却是要利用自己的专政条件，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类大同，让自己的专政逐步地消逝下去，因而就要尽量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和积极作用。而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和积极作用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的无限发挥的可能性，也就包含着克服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所犯各种错误的可能性。

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领导人物的责任是要尽量减少错误，尽量避免某些严重的错误，注意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取得教训，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而要达到这种目的，就要求每个领导者都十分谨慎和谦逊，密切地联系群众，遇事和群众商量，反复地调查研究实际的情况，经常进行适合情况的、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在他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中所以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就是因为他没有这样做。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由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在列宁的领导之下，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首先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苏联迅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实现了农业的集体化，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科学和文化，在苏维埃联盟的形式下形成了国内多民族的巩固的联盟，苏联国内原来落后的民族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成为打败法西斯的主力，挽救了欧洲的文明，并且帮助东方人民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这一切灿烂的成就，给全人类指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大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的统治，使苏联在全世界争取持久和平的斗争中成为第一个坚强的堡垒。苏联鼓舞和支持了所有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鼓舞了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反殖民主义运动和一切争取人类进步的运动。这些都是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在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伟大业绩。给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指出创造这种伟大业绩的道路的，是列宁。在为实现列宁的方针而进行的斗争中，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有力的领导的功劳，其中就有斯大林的不可磨灭的功劳。

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上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但是，当着斯大林正确地运用列宁主义的路线而在国内外人民中获得很高的荣誉的时候，他却错误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位，把他个人的权力放在和集体领导相对立的地位，结果也就使自己的某些行动和自己原来所宣传的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处于相对立的地位。一方面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承认党必须永远地联系群众，必须发展党内民主，发展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另一方面却又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这就使得斯大林后一时期在这个问题上陷于理论和实践相

脱节的矛盾。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领导人物在历史上有很大的作用。人民和人民的政党需要有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站在历史斗争的前列,而领导人民群众的先进人物。否认个人的作用,否认先进人物和领导人物的作用,这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当他不是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中,而是相反地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上的时候,当他脱离了群众的时候,他对于国家的事务就会失去全面的洞察力。只要是这样,即使像斯大林这样杰出的人物,对于某些重大的事务,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实际的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某些问题上没有能够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引出教训,而使这些错误不致变为全国范围的和长时期的严重错误。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

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个人崇拜不只在剥削阶级中间有它的基础,也在小生产者中间有它的基础。大家知道,家长制就是小生产经济的产物。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即使剥削阶级消灭了,小生产经济已经由集体经济所代替了,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了,但是旧社会的腐朽的、带有毒素的某些思想残余,还会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保存下来。“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列宁)。个人崇拜也就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这种习惯势力既然在社会中还存在着,也就有可能给予许多国家工作人员以影响,甚至像斯大林这样的领导人物也受了这种影响。个人崇拜是社会现象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而当像斯大林这样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也接受这种落后思想的影响的时候,就会反转过来再影响给社会,造成事业的损失,有害于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发展着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党的生活,日益和个人崇拜这类精神状态互相矛盾着,互相冲突着。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展开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正是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扫清思想障碍物的一个伟大的、勇敢的斗争。

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会再有矛盾存在了。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但是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技术革新和社会制度革新的现象,都将是必然要继续发生的,否则,社会的发展就将停止下来,社会就不可能再前进了。人类现在还是在青年时代。人类将来要走的路,将比过去走过的路,不知道要长远得多少倍。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

都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一切都还将是这样：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有些人认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矛盾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中消除掉，这个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只要还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还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矛盾，还存在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那末，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也就会还将存在，还将经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是在社会中生活着的，也就会在各种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程度上，反映各个社会中的矛盾。所以，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是每个人都是完满无缺的。那个时候，人们本身也还将有自己的矛盾，还将有好人和坏人，还将有思想比较正确的人和思想比较不正确的人。因此，人们之间也还将有斗争，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罢了。这样看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个人和集体的矛盾现象，并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而任何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如果脱离集体领导，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实际生活，他们就必然会使自己的思想硬化起来，以致做出严重的错误。对于我们必须警惕的，就是：有些人当他们因为党和国家有了很多工作成绩，取得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的时候，便有可能利用这种群众的信任去滥用权威，做出一些错事来。

中国共产党庆祝苏联共产党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中国革命的经验同样证明：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依靠民主集中制，依靠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才使我们党不论在革命时期或者在国家建设时期都能够取得伟大的胜利和成就。中国共产党过去在革命队伍中曾经不断地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毫无疑问，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这一类现象还是会长期存在的。一次克服了，下次还会再出现。有时由这一些人表现出来，有时又由另一些人表现出来。人们在注意到个人作用的时候，常常会看不见群众和集体的作用。所以，有些人就很容易犯出狂妄自大、迷信自己、或者盲目崇拜别人的错误。因此，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

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领导方法，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四三年六月间，曾经作出了一个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在现在说到有关党的集体领导问题的时候，提一下这个决定，对于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它的一切领导人员说来，将仍然是有好处的。这个决定写道：“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长时期以来，在我们党内，对于这样的领导方法，曾经给它起了一个通俗的名称，叫做“群众路线”。我们工作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凡是遵守这条路线的，工作总是好的或者较好的，即使犯了错误，也易于改正；

凡是违背这条路线的，工作总是遇到挫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方法，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路线。当革命胜利之后，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阶级和政党的时候，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由于受到官僚主义的多方面的袭击，就面临到有可能利用国家机关独断独行、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实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很大的危险性。因此，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我们也还必须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中吸取教训，继续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

工人阶级和其他人民群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之下赢得革命，赢得国家政权，而革命的胜利和革命政权的建立又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开拓无限广阔的道路。但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胜利以后被公认为全国的指导思想，这就使得我们有不少宣传工作者常常只是依靠行政权力和党的威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教条灌输给群众，而不是辛勤努力，掌握大量材料，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用人民的语言，很有说服力地去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若干年来，我们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和文艺批评的研究领域中有了一些成绩，但是一般说来，还有许多不健康的状态存在着。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对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这里必须指出，斯大林的著作仍然和过去一样是必须认真研究的，凡是他的著作中有益的东西，特别是他关于保卫列宁主义和正确地总结苏联建设经验的许多著作，我们都需要当做一项重要的历史遗产接受过来。不这样做，就是错误的。但是，可以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方法。有些人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去看待斯大林的著作，结果是不能分析其中的正确方面和不正确方面，就是对于其中的正确内容，也是当作万应灵药，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例如斯大林曾经有过这样的公式：在各种不同的革命时期，基本的打击方向是使那个时候的中间的社会政治力量陷于孤立。对于斯大林这个公式，就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观点有分别地看待它。在某种条件下，孤立中间势力可以是正确的。但是并不是在一切条件下，孤立中间势力都是正确的。按照我们的经验，革命的主要打击方向应该放在最主要的敌人身上，使它孤立，而对于中间势力，则应该采用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至少使它中立，并且应该力求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它从中立的地位转变过来，使它和我们成立联盟，以便有利于革命的发展。可是，曾经有一个时期（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十年内战时期），我们的一些同志简单地搬用斯大林的这个公式到中国革命中来，把主要的打击方向对着中间势力，把它说成是最危

险的敌人，结果没有孤立真正的敌人，反而使自己陷于孤立，使自己吃了亏，而有利于真正的敌人。鉴于这种教条主义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这里所指的进步势力，就是共产党所领导和可能影响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力量。这里所指的中间势力，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这里所指的顽固势力，就是那些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买办封建势力。实践的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方针是适合于中国革命的情况的，是正确的。

事实总是这样：教条主义只是思想懒汉才会加以欣赏的东西，它对于革命，对于人民，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从提高人民群众的自觉、鼓舞人民群众的生气勃勃的首创精神、促进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迅速发展等方面说来，破除教条主义的迷信，现在仍然是必要的。

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现在已经在地球上九亿人口的范围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无论在苏联，在中国，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都有自己的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我们应该继续地总结这些经验。必须有这样的警惕：以后我们还是可能犯错误的。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应该使错误限制在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范围内，而不应该让个别的、局部的和初步出现的错误变为全国性的或者长时期的错误。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过几次犯严重错误的经验。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时期，我们党内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革命时期，我们党内出现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其中特别严重的是李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前者是在一九三〇年发生的，后者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发生的，而以王明路线对于革命的损害最为严重。在这个时期内，在一个重要的革命根据地里还发生了同党的中央相对抗的反党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这条错误路线严重地损害了一部分重要的革命力量。上述两个时期内所犯的错误，除了张国焘路线是属于一个重要革命根据地的错误以外，都是全国性的错误。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内又出现了以王明同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但是由于我们党吸取了以前两个革命时期的教训，没有让这条错误路线发展下去，这条错误路线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被我们党的中央所纠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一九五三年，我们党内又出现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这个反党联盟代表国内外的反动势力，而以危害革命事业为目的。如果不是党中央发觉得早，及时地击破了这个反党联盟的话，党和革命事业的损失将会是不堪设想的。

由此可见，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也是在自己同各种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使自己获得了锻炼，因此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和建设胜利的。至于局部的和个别的错误，则在工作中时常发生，仅仅是依赖党的集体智慧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及时地

加以揭露和克服，才使它们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没有成为全国性的和长期性的错误，没有成为危害人民的大错误。

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多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和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一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列宁说：“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执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苏联共产党遵循列宁的遗教，现在正在认真地对待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某些性质严重的错误及其所遗留的后果。由于其后果的严重性，所以苏联共产党有必要在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的同时，又尖锐地揭露斯大林所犯的错误的实质，号召全党以此为戒，坚决地消除这种错误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深信，经过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这一次尖锐的批判之后，过去被某些错误政策所严重地压抑了的一切积极因素，必将普遍地活跃起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将比较过去更好地团结一致，为了建设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和争取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奋斗。

世界上一切反动势力正在讥笑这件事，他们在讥笑我们阵营中克服自己的错误。这种讥笑会有什么结果呢？毫无疑问，结果将是在他们面前站着一个比较过去更加强大和永远不可战胜的以苏联为首的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伟大阵营，而讥笑者们的吃人事业却是很不美妙的。

事实总是这样：教条主义只是思想懒汉才会加以欣赏的东西，它对于革命，对于人民，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从提高人民群众的自觉、鼓舞人民群众的生气勃勃的首创精神、促进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迅速发展等方面说来，破除教条主义的迷信，现在仍然是必要的。

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现在已经在地球上九亿人口的范围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无论在苏联，在中国，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都有自己的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我们应该继续地总结这些经验。必须有这样的警惕：以后我们还是可能犯错误的。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应该使

错误限制在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范围内，而不应该让个别的、局部的和初步出现的错误变为全国性的或者长时期的错误。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过几次犯严重错误的经验。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时期，我们党内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革命时期，我们党内出现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其中特别严重的是李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前者是在一九三〇年发生的，后者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发生的，而以王明路线对于革命的损害最为严重。在这个时期内，在一个重要的革命根据地里还发生了同党的中央相对抗的反党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这条错误路线严重地损害了一部分重要的革命力量。上述两个时期内所犯的错误，除了张国焘路线是属于一个重要革命根据地的错误以外，都是全国性的错误。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内又出现了以王明同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但是由于我们党吸取了以前两个革命时期的教训，没有让这条错误路线发展下去，这条错误路线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被我们党的中央所纠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一九五三年，我们党内又出现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这个反党联盟代表国内外的反动势力，而以危害革命事业为目的。如果不是党中央发觉得早，及时地击破了这个反党联盟的话，党和革命事业的损失将会是不堪设想的。

由此可见，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也是在自己同各种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使自己获得了锻炼，因此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和建设胜利的。至于局部的和个别的错误，则在工作中时常发生，仅仅是依赖党的集体智慧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及时地加以揭露和克服，才使它们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没有成为全国性的和长期性的错误，没有成为危害人民的大错误。

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多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和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一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列宁说：“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执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苏联共产党遵循列宁

的遗教，现在正在认真地对待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某些性质严重的错误及其所遗留的后果。由于其后果的严重性，所以苏联共产党有必要在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的同时，又尖锐地揭露斯大林所犯的错误的实质，号召全党以此为戒，坚决地消除这种错误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深信，经过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这一次尖锐的批判之后，过去被某些错误政策所严重地压抑了的一切积极因素，必将普遍地活跃起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将比较过去更好地团结一致，为了建设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和争取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奋斗。

世界上一切反动势力正在讥笑这件事，他们在讥笑我们阵营中克服自己的错误。这种讥笑会有什么结果呢？毫无疑问，结果将是在他们面前站着一个比较过去更加强大和永远不可战胜的以苏联为首的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伟大阵营，而讥笑者们的吃人事业却是很不美妙的。

原载人民日报 1956-04-05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在一九五六年四月间，我们曾经就斯大林问题讨论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从那个时候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继续发生了一系列引起我国人民关切的事件。铁托同志在十一月十一日的演说和各国共产党对于这篇演说的评论，在我国报纸发表以后，再一次使人们提出了许多需要加以答复的问题。我们现在这篇文章将着重地讨论以下一些问题，就是：第一，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的估计；第二，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第三，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第四，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在观察现代国际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从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出发，就是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同全世界人民力量之间的对立。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痛苦的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帝国主义从来就反对各国人民的解放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独立，从来就把最坚决地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主义运动看作眼中钉。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出世以来，帝国主义就用尽一切手段来危害苏联。在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以后，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它对于社会主义阵营所进行的明目张胆的破坏活动，更成为世界政治中异常显著的现象。帝国主义阵营的首脑美国，在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方面，作得特别凶恶无耻。它多年来阻挠着我国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多年来公开地把颠覆东欧各国作为政府的政策。

帝国主义在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正如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决议所说，匈牙利事件是由内部和外部的几方面原因造成的，任何片面的解释都是不正确的，而在这些原因中，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在匈牙利的反革命复辟阴谋被击退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一方面操纵联合国通过反对苏联和干涉匈牙利内政的决议，一方面在整个西方世界煽起疯狂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浪潮。美帝国主义尽管利用英法侵埃战争的失败，竭力企图夺取英法在中东北非的利益，但是还是声明保证同英法消除“误会”，取得“更密切、更亲密的谅解”，以便重整共同反对共产主义、反对亚非人民和反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统一战线。为了反共、反人民、反和平的目的，帝国主义国家应该团结起来——这

就是杜勒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会议上所说的“在世界历史的这一紧要关头，必须有一套生活和行动的哲学”的主要含义。杜勒斯多少带着醉意地断言：“苏联共产党结构正处于恶化状态(?)，而统治者的权力正在崩溃(?)……面对着这种形势，自由国家必须保持道义的压力，这种压力有助于破坏苏联—中国共产主义体系，有助于保持军事实力和决心。”他号召北大西洋公约国家“搞垮以军国主义(?)和无神论观念为基础的苏联强有力的专制政治(?)”，并且认为，“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在现在看来似乎是可能的事情”！

我们从来认为敌人是我们最好的教师。现在杜勒斯又在给我们上课了。他尽可以污蔑我们一千次，诅咒我们一万次，这毫无什么新奇之处。但是他从“哲学”上要求帝国主义世界把对于共产主义的矛盾放在其他一切矛盾之上，一切都为了“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破坏”和“搞垮”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体系，这对于他们虽然肯定是徒劳的，对于我们却给了十分有益的教训。尽管我们一贯主张而且继续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应该和平共处，实行和平竞赛，帝国主义者还是时时刻刻都想消灭我们。因此，我们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敌人同我们之间的严重斗争，这就是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互相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否认阶级斗争、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在开始谈到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之前，我们认为必须首先解决这个根本立场问题。否则，我们就必然会迷失方向，就不可能对于国际现象作出正确的解释。

帝国主义者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攻击，长期以来，主要地集中于苏联。而最近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争论，也大都同对于苏联的认识有关。因此，正确地估计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之一。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工人运动经验的科学总结。但是，除了只存在了七十二天的巴黎公社以外，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亲自看到过他们所毕生努力争取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一九一七年胜利地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接着又胜利地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的社会主义从此由理论和理想变为活生生的现实。这样，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就不但在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而且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苏联在革命以后的三十九年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随着剥削制度的消灭，苏联消灭了经济生活中的无政府状态、危机和失业。苏联的经济和文化，以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着。它的工业总产量，在一九五六年已经达到革命以前最高年份一九一三年的三十倍。革命以前工业落后、文盲众多的国家，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强国，拥有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力量和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苏联劳动人民由革命前的被压迫者变成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翁，他们在革命斗争和建设劳动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状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本来是国内各民族的牢狱，而在十月革命以后，这些民族却得到了平等的地位，迅速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进民族。

苏联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苏联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零年，受到了十四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攻。早期的苏联，经历过内战、饥荒、经济困难、党内宗派分裂活动的严重的折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的时间内，在西方国家开辟第二战场以前，苏联曾经独力承受了并且击败了希特勒和他的伙伴们的几百万军队的进攻。这些严酷的考验没有压倒苏联，没有阻止它的前进。

苏联的存在，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的统治，而给予一切革命的工人运动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以无限的希望、信心和勇气。各国劳动人民援助了苏联，苏联也援助了各国劳动人民。苏联执行了维护世界和平、承认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外交政策。苏联是在世界范围内战胜法西斯侵略的主力。英勇的苏联军队同有关各国的人民力量合作，解放了东欧各国和中欧的一部、中国的东北部和朝鲜的北部。苏联同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援助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建设，并且同它们在一起组成了世界和平的强大堡垒——社会主义阵营。对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运动，对于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运动，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新产生的亚非地区的许多和平国家，苏联也给予了重大的支持。

以上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不可争辩的事实，而且是人们早已知道了的。为什么现在还要再一次提起这些事情呢？这是因为，共产主义的敌人固然一贯地抹煞这一切，而现在有些共产主义者在探讨苏联经验的时候，也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到事情的次要方面，而忽视了事情的主要方面。

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就它们的国际意义说来，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在苏联的成功的经验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质，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这是苏联经验中的首要和基本的方面。另一部分不具有这种普遍意义。此外，苏联还有一些错误的、失败的经验。错误和失败，尽管在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上各有不同，却是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都不能完全避免的。而苏联由于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它的一些错误和失败更加难于避免。这些错误和失败，对于所有共产主义者都是极其有益的教训。因此，苏联的全部经验，包括某些错误和失败的经验在内，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而它的成功的基本经验尤其重要。苏联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是一个伟大的成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什么是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呢？据我们看来，至少以下这一些经验具有基本的性质：

(1) 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这个政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密切地联系群众，力求成为劳动群众的核心，并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

(2) 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

(3) 在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

(4) 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

(5) 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我们平常所说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撇开它在当时当地所表现的具体形式来说，就是指的这些基本的东西。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每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的过程，除了有共同的方面，还有不同的方面。在这个

意义上说，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具体的发展道路。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去讨论。但是从基本原理上说来，十月革命的道路却反映了人类社会发 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这不但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而且是各国无产阶级为了取得胜利都必须走的共同的康庄大道。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尽管我国的革命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可是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所干的事业看成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

保卫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帝国主义者声言要“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他们所要改变的正是这条革命道路。几十年来，一切修正主义者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修正意见，所传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也正是想避开无产阶级解放的这一条必由之路。一切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团结无产阶级，团结人民群众，坚决地击退帝国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世界的猖狂进攻，坚决地沿着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前进。

二

人们问道：既然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是正确的，为什么又发生斯大林的错误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四月间的文章中已经讨论过了。但是由于最近时期东欧形势以及其他有关情况的发展，正确地认识和正确地对待斯大林错误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内部发展和各国共产党相互团结的重大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全世界共产主义队伍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的重大问题。因此，需要把我们的观点作一些进一步的申述。

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说过：“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

但是斯大林在苏联的内外政策方面都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斯大林的个人专断的工作方法，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苏联党的生活中和国家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原

则，破坏了一部分社会主义法制。由于斯大林在许多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个人专断地决定许多重大政策，因而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肃清反革命的问题上和对某些外国的关系问题上。斯大林在肃反工作中，在一方面，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完成了这条战线上的任务；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冤枉了许多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斯大林在对待兄弟国家和兄弟党方面，总的来说，是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援助了各国人民的斗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的。但是，在处理某些具体问题的时候，他却表现了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缺乏平等的精神，更谈不到教育广大干部采取谦虚的态度；有时他甚至错误地干涉某些兄弟国家和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因而引起了许多严重的后果。

对于斯大林的这些严重的错误应该怎样解释呢？这些错误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科学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生产关系以及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都有它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的生产关系基本上不能再同它相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的上层建筑基本上不能再同它相适应。在这样的时候，就必然要引起根本性质的变革。谁要抵抗这种变革，谁就会被历史所抛弃。这一规律，以不同的形态适用于一切社会。这就是说，也适用于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斯大林的错误，是不是由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已经过时，而不能再适应苏联发展的需要了呢？当然不是如此。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年轻的，它所走过的时间还不到四十年。苏联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的，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的。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想用斯大林的错误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另外有些人想用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对于经济事业的管理来解释斯大林的错误，认为政府管理了经济事业就必然成为妨害社会主义力量发展的“官僚主义机构”，这也无法令人信服。谁也不能否认，苏联经济的巨大高涨正是劳动人民的国家政权有计划地管理经济事业的结果，而斯大林所犯的主要错误，却很少同管理经济的国家机关的缺点有关。

但是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

有了适合需要的基本制度，也调整了制度中的日常性质的矛盾（按照辩证法，就是处在“数量变化”阶段的矛盾），是否就可以保证不发生错误的呢？问题没有这样简单。制度是有决定性的，但是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无论怎样好的制度，都

不能保证工作中不会发生严重的错误。有了正确的制度以后，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能否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就在于是否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没有这些，人们仍然可以在正确的制度下犯严重的错误，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国家机关做出并不良好的事情。

为了解决以上所说的这些问题，必须依靠经验的积累和实践的考验，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情况是不断变化的，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任何一劳永逸的解决也是不会有的。从这种观点看来，就是在已经建立了巩固的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它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也还有缺陷，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还有这样那样的偏差，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党和国家的任务，就在于依靠群众和集体的力量，及时地调整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各个环节，及时地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当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的主观认识，总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符合于客观实际。因此，在他们的工作中，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只要严格遵守并且努力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只要彻底遵守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只要认真地依靠群众，全国性的、长时期的、严重的错误，却是可以避免的。

斯大林后期的一些错误之所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长期性的、严重的错误，而不能得到及时的纠正，正是因为他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群众和集体，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之所以会受到某种破坏，有一定的社会历史的条件。这就是：党在领导国家方面还缺乏经验；新的制度还没有巩固到足以抵抗一切旧时代影响的侵袭（新制度的巩固过程和旧影响的消失过程，都不是直线的，它们的某种波浪式的起伏现象，在历史的转变时期是屡见不鲜的）；国内外的紧张斗争对于某些民主发展所起的限制作用；等等。但是仅仅这些客观条件并不足以使犯错误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在比斯大林所处环境更加复杂得多和困难得多的条件下，列宁却没有犯斯大林那样的错误。在这里，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斯大林后期被一连串的胜利和歌颂冲昏了头脑，他的思想方法部分地但是严重地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而陷入了主观主义。他开始迷信个人的智慧和权威，不肯认真地调查和研究各种复杂的实际情况，不肯认真地倾听同志们的意见和群众的呼声，以致使自己所决定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往往违反客观实际情况。而且，他往往在一个长时间内固执地要推行这些错误的东西，而不能及时地改正自己的错误。

为了纠正斯大林的错误，消除这些错误的后果，苏联共产党已经采取了步骤，并且已经开始取得了成就。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破除关于斯大林的迷信、揭露斯大林错误的严重性、消除斯大林错误的后果方面，表现了巨大的决心和勇气。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同情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们，都支持苏联共产党纠正错误的努力，希望苏联同志的努力得到完满的成功。很明显，由于斯大林的错误不是一个短时间的错误，这个错误的纠正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得到完全胜利。它需要一

个相当长的时间的努力，需要细致的思想工作。我们相信，曾经克服过无数困难的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必将克服这些困难，达到自己的目的。

苏联共产党的这样一个纠正错误的斗争，当然不会从西方资产阶级和右翼社会民主党方面得到支持。他们为了乘机抹煞斯大林的正确方面，抹煞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过去时期的巨大成就，为了乘机在共产主义队伍中制造混乱和分裂，硬把对于斯大林错误的纠正叫作所谓反对“斯大林主义”，叫作所谓“反斯大林分子”对于“斯大林分子”的斗争。他们的恶意本来是显而易见的。不幸，在某些共产主义者中间，也在那里传播着类似的说法。我们以为，共产主义者采取这种说法是极端有害的。

大家知道，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他的一生乃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的一生。斯大林在青年时代为反对沙皇制度和传布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斗争，在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机关以后为准备一九一七年革命而斗争，在十月革命以后为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而斗争，在列宁逝世以后的近三十年中为建成社会主义、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发展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而斗争。从整个说来，斯大林始终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指导斗争的，他是帝国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甚至在他犯错误的时候，他的悲剧也在于，他相信那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不受敌人侵害所必需的。无论如何，斯大林的错误虽然对苏联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但是在斯大林领导时期，社会主义的苏联还是大大地向前发展了。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不但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而且也说明了斯大林毕竟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因此，我们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活动的时候，必须同时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他的功绩和错误。只要我们是全面地观察问题，那么，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尽管在某些时候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而对这些错误加以强调是必要的，但是为了作出正确的估价，不使人们发生误解起见，将这些错误放在适当的地位也是必要的。我们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

只有采取客观的分析的态度，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对待斯大林以及一切在他的影响下犯了类似错误的同志，才能够正确地对待他们的错误。他们的错误既然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是非问题，而不是阶级斗争中的敌我问题。我们就需要用对待同志的态度而不应该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就需要在批评他们的错误方面的同时，保护他们的正确方面，而不应该否定他们的一切。他们的错误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尤其有思想认识的根源。这种错误既可以在他们身上发生，也可以在某些别的同志身上发生。因此，在认识和纠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就需要把这种错误看作严重的教训，看作一项可以利用的财产，用来提高一切共产主义者的觉悟，从而防止重犯这种错误，并且推进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否则，如果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把他们叫作这种分子那种分

子，而加以歧视和敌视，就不但不能使自己的同志得到应有的教训，而且由于混淆了是非和敌我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势必在客观上帮助敌人反对共产主义的队伍，瓦解共产主义的阵地。

铁托同志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其他领导同志在最近的言论中，对于斯大林的错误和其他有关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据我们看来，不能够认为是全面的和客观的。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对于斯大林的错误抱有特殊的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过去时期内，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困难条件下，作了坚持社会主义的可贵的努力。他们在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中实行民主管理的试验，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中国人民欢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南斯拉夫取得和解，欢迎中南两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并且同南斯拉夫人民一样希望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日益繁荣和强盛。我们也同意铁托同志这次演说中的一些论点，例如对于匈牙利反革命分子的谴责，对于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支持，对于英法以三国侵略埃及的谴责，对于法国社会党采取侵略政策的谴责。但是使我们惊异的是，他在演说中对于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共产党都进行了攻击。铁托同志断定，“顽固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在各国党内设法继续保持他们的职位，他们再一次希望巩固他们的统治，把这种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强加在他们的人民的头上，甚至别国人民的头上”。因此，他宣称：“我们必须同波兰同志们一起来反对其他国家的——无论东方国家的或西方国家的——党内出现的那种倾向。”我们没有看到过波兰党的领导同志认为必须对于兄弟党采取这种敌对态度的言论。对于铁托同志的这些意见，我们觉得必须说，他把所谓“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分子”等等作为攻击的对象，并且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在南斯拉夫开始的”路线和所谓“斯大林主义路线”哪一个得胜的问题，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这只能把共产主义运动引向分裂。

铁托同志正确地指出：“从将来是社会主义还是反革命这样的角度来看匈牙利目前的发展，我们必须保卫卡达尔的现政府，我们必须帮助它。”但是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卡德尔同志在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上关于匈牙利问题的长篇演说，却很难说是对于匈牙利政府的保卫和帮助。他的演说不但对于匈牙利事件作了一种完全不分敌我的解释，而且要求匈牙利的同志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要求他们把全部政权交给布达佩斯和其他区域性的工人委员会，“不管工人委员会成了什么样子”；要求他们“不必在恢复共产党方面枉费心机”，“因为对群众来说，这样的党是官僚专制的化身”。这就是卡德尔同志给兄弟国家所设计的“非斯大林主义路线”的一个标本。匈牙利的同志们拒绝了卡德尔同志的这个建议。他们解散了被反革命分子所操纵的布达佩斯和其他区域性的工人委员会，坚持地发展了社会主义工人党。我们认为，匈牙利的同志们是作得完全正确的，否则匈牙利的将来就不会是社会主义，而是反革命。

南斯拉夫的同志们显然是作得太过分了。即令他们对于兄弟党的批评有某些合理的部分，但是他们所采取的基本立场和方法都违背了同志式的讨论的原则。我们

不愿意干预南斯拉夫的内部事务，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内部事务。为了巩固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为了不给敌人在我们队伍中制造混乱和分裂的条件，我们不能不向南斯拉夫的同志们提出兄弟般的劝告。

三

斯大林的错误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教条主义的发展。各国共产党的队伍在批判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展开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由于对斯大林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由于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因而帮助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这种修正主义的思潮无疑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的，而事实上，帝国主义也正在积极地利用这种思潮。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因此，每个民族都经历着阶级斗争，并且最后都将沿着在一些基本点上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只有善于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各国无产阶级的事业才能得到成功。而且只要他们这样做，他们就会创造出自己的新的经验，从而给别的民族和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作出一定的贡献。教条主义者不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通过一定的民族特点，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地表现出来和发生作用。他们不肯认真地研究本国、本民族的社会历史特点，不肯根据这些特点具体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指导无产阶级的事业达到胜利。

马克思列宁主义既然是各国工人运动经验的科学总结，当然不能不重视运用先进国家经验的问题。列宁在“做什么？”一书中说过：“社会民主主义的运动，根本上就是国际的。这不仅是说我们应当反对本国沙文主义，而且是说在年轻国家内刚刚开始的运动，只有在它运用别国经验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列宁在这里是说俄国刚刚开始的工作运动必须运用西欧工人运动的经验。在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运用苏联经验的问题上，他的这个观点也是适用的。

但是学习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苏联的一切经验，包括基本的经验，都是同一定的民族特点结合在一起的，都是别的国家所不应该原样照抄的。如前所说，苏联的经验中还有错误的、失败的部分。所有这些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对于善于学习的人都是无价之宝。因为它们都可以帮助我们少走弯路，少受损失。反之，如果不加分析地原样照抄，那么，在苏联成功了的经验也可以在别的国家造成失败，更不要说失败的经验了。列宁在我们上文所引用的话下面紧接着说：“但是，要真能运用别国经验，单单认识这种经验或单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为此就必须善

于用批评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独立地检查它。谁只要想一想现代工人运动已发展和散播到了如何广大的地步，就会懂得，为了履行这个任务，该要有多少丰富的理论力量和政治经验（以及革命经验）。显然，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国家，问题比列宁在这里所说的更要复杂许多倍。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间，教条主义者否认中国的特点，照抄苏联的某些经验，曾经使我国的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的失败。这个失败深刻地教训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党在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五年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曾经彻底地清算了这条为害严重的教条主义路线，团结了全党同志，包括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内，发展了人民的力量，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如果不是这样做，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克服了教条主义路线，我们的党现在在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的时候，才有可能比较地少犯一些错误。也由于这样，我们能够充分了解目前波兰和匈牙利的同志们纠正过去时期教条主义错误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教条主义的错误在什么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必须纠正的。我们将继续努力纠正和防止在我们工作中的这类错误。但是反对教条主义同容忍修正主义毫无共同之点。马克思列宁主义承认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然有它的民族特点，但是这决不是说，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可以没有基本的共同点，可以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目前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潮流中间，在我们国内和国外，都有人借口反对照抄苏联经验，而否认苏联的基本经验的国际意义，借口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意义。

由于斯大林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过去时期的领导者犯了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严重错误，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一些不坚定的分子，就借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企图削弱或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削弱或者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削弱或者否定党的领导作用。

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把对于反革命力量的专政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亦即社会主义民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不能有任何怀疑的。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强有力，所以能够战胜国内外的强大敌人而负起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正因为它是劳动群众对剥削者的专政、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正因为它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实现了任何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实现的民主。离开了对于广大劳动人民的密切联系，离开了他们的积极支持，就不可能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至少不可能有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愈是紧张，无产阶级愈是需要采取最坚决最彻底的态度，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动员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来战胜反革命力量。苏联十月革命时期和紧接着的国内战争时期“热火朝天”的群众斗争的经验，充分地证明了这个真理。我们党所常说的“群众路线”，也就是从苏联当时的经验学来的。苏联当时的紧张斗争，基本上依靠着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当然不可能具备完善的民主程序。到了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反革命力量已经基本上肃清以后，无产阶级专政虽然对于国内的反革

命残余（这种残余在帝国主义存在期间不可能完全肃清）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它的主要锋芒就应该转向防御国外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这种条件下，当然应该在国内外政治生活中逐步地发展和健全各种民主的程序，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人民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发展国家管理工作和企业管理工作中的民主方法，密切国家机关和企业管理机关同广大群众之间的联系，撤除损害这种联系的障碍，进一步克服官僚主义的倾向，而不应该像斯大林那样，在阶级消灭以后仍然强调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因而妨害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健全的发展。苏联共产党坚决地纠正了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这是完全正确的。

社会主义民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允许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都不允许同资产阶级民主混淆起来。无论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和文化方面，社会主义民主的唯一目的，都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为了发展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了发展他们同一切反社会主义势力作斗争的积极性。因此，如果有一种民主可以被利用来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可以被利用来削弱社会主义事业，那么，这种所谓“民主”就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但是有些人并不是这样认识问题的。对于匈牙利事件的反应，最显著地暴露了这一点。在过去时期的匈牙利，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破坏，而反革命分子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以致反革命分子在一九五六年十月间能够很容易地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组织武装叛乱。这就说明了过去时期的匈牙利还没有认真地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当匈牙利处在革命和反革命、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和平和战争的紧急关头的时候，一些国家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他们不但没有提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反而出来反对苏联援助匈牙利社会主义力量的正义行动，出来宣称匈牙利的反革命是“革命”，出来向工农革命政府要求给予反革命分子以“民主”！个别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报纸，至今还在放肆地诋毁在艰苦条件下英勇奋斗的匈牙利共产主义者所采取的革命措施，但是对于全世界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和平的浪潮，却几乎默不作声。这些奇异的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这些事实说明，那些离开无产阶级专政而高谈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而反对无产阶级，实际上是要求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虽然他们中间许多人或者并没有自觉到这一点。列宁曾经再三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之点；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乃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对于一九一九年的匈牙利无产阶级政权，列宁曾经要求他们“采取严酷无情和迅速坚决的强力手段”来镇压反革命分子，并且说：“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革命者，谁就没有资格当无产阶级的领袖或顾问。”由此可见，人们如果因为看到了斯大林后期所犯的错误，看到了过去时期匈牙利领导者所犯的错误，就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把这个基本原理污蔑为什么“斯大林主义”和“教条主义”，那就会走上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离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道路。

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也否认社会主义民主需要集中，否认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导作用。这些议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来，当然不是什么新东西。恩格斯在同无政府主义者斗争的时候早已指出，在任何社会组织中，只要有联合活动存在，就必须有一定的权威和一定的服从。权威和自治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它们的应用范围是因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而有所改变的。恩格斯说：“把权威原则描写成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描写成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他并且说，谁要是坚持这种荒谬观念，谁就是在实际上“为反动派效劳”。列宁在反对孟什维克派的斗争中，透彻地指出了党的有组织的领导对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决定意义。在一九二零年批评德国共产主义“左派”的时候，列宁着重地指出：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否认领导者的作用，否认纪律，“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以帮助资产阶级。这也就恰恰是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忍、不能团结、不能整齐动作等等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如果任其横行，必使任何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都会一败涂地。”这些原理是否过时了呢？是否不适用于某些国家的特殊情况呢？运用了这些原理，是否就会产生斯大林的错误呢？事实显然不是如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原理，经历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考验，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过一种可以称为例外的情况。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由于实行了国家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实行了党的领导，恰恰是由于他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破坏了党的领导。正确地贯彻国家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正确地加强党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乃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人民、战胜敌人、克服困难而获得强大发展的基本保证。正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为要打击我们的事业，总是向我们要求“自由化”，总是集中力量来破坏我们事业中的领导机构，来破坏无产阶级的核心共产党。他们对于目前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党和国家机关的纪律受到损害而产生的“不稳定状态”，表示了极大的满意，并且正在利用这种状况来加紧他们的破坏活动。这个事实说明，维护民主集中制的权威，维护党的领导的作用，对于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具有多么严重的意义。毫无疑问，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必须建立在广泛的民主的基础上，党的领导必须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些方面如果发生了缺点，就必须坚决地加以批判和克服。但是对于这些缺点的批判，只能是为着巩固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领导，而绝对不能是像敌人所企求的那样，造成无产阶级队伍的涣散和混乱。

在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们中间，有些人索性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界限。在他们看来，用不着经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用不着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国家，某些资产阶级国家就可以建设社会主义，它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就已经是社会主义，甚至全人类社会都已经在“长入”社会主义了。但是，正在他们进行这种宣传的时候，帝国主义对于已经建立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却正在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军事、经济、

外交、特务和“道义”的力量，积极准备把它们“破坏”和“搞垮”。这些国家的潜伏的和逃亡到外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也还在力求复辟。修正主义的思潮虽然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但是帝国主义者的行动，却并不有利于修正主义，而是证明了修正主义的破产。

四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攻，各国无产阶级的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是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为了达到他们的毁灭共产主义事业的目的，正在利用各国人民中狭隘的民族感情和某些民族隔阂，来千方百计地破坏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坚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坚决地维护这个团结，把这个团结看成各国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动摇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动摇不定，没有明确的立场。

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运动，因为只有各国无产阶级共同努力，才能战胜各国资产阶级的共同压迫，而实现自己的共同利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种国际团结，大大地帮助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新发展以巨大的推动力量。在十月革命以来的三十九年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就，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渴望解放的人们，都把关于人类的光明前途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个运动的胜利上面。

在过去的三十九年中，苏联由于是第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以后，又是这一阵营中最强大和经验最丰富的国家，对于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的各国人民能够给予最重大的援助，所以它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这种情况不是任何人人人为地决定的，而是历史条件所自然形成的。为了各国无产阶级共同事业的利益，为了共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攻，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各国经济文化的共同高涨，我们必须继续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之间的国际团结，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完全新式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发展过程当然不会没有困难。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必须联合，同时必须保持各自的独立。历史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把这两个方面正确地统一起来，而忽视任何一个方面，就不能不犯错误。当各国共产党相互间保持平等的关系，经过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上的协商而达到意见和行动的一致，它们的团结就会增进。反之，如果在相互关系中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别人，或者用互相干涉内部事务的办法代替同志式的建议和批评，它们的团结就会受到损害。在社会主义各国中，由于共产党已经对于国家生活担负领导责任，由于党同党之间的关系往往直接涉及国家间的关系和民族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正确处理就成为一个更加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各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相结合。

一方面，各国共产党必须用国际主义的精神教育党员和人民，因为各国人民的真正的民族利益要求各民族的友好合作。另一方面，各国共产党又必须成为本国人民的正当的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代表者。共产党人从来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而且他们了解，只有在正确地代表了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时候，他们才能受到本国广大人民真正的信任和爱戴，才能有效地在人民群众中间进行国际主义的教育，有效地协调各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民族利益。

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各国的国际主义团结，社会主义各国的共产党必须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的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在较大国家的党对待较小国家的党的关系中，这一点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不致引起较小国家方面的反感，较大国家的党需要经常注意采取平等的态度。列宁说得对：“各国觉悟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对于遭受压迫极久的国家和民族内的民族心理残余，要特别慎重，特别注意。”

如前所说，斯大林在对待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中，曾经表现过某些大国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实质，就是忽视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联合中的独立平等地位。这种倾向有一定的历史原因。旧时代大国对待小国的积习固然还会留下某些影响，而一个党或者一个国家在革命事业中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也难免不使人们产生一种优越感。

正是因为这样，为了克服大国主义的倾向，需要作有系统的努力。大国主义并不是某一国家特有的现象。乙国比甲国小和落后，但是比丙国大和先进，这样，乙国尽管埋怨甲国的大国主义，却往往同时对于丙国摆出大国的架子。我们中国人特别需要记住的是：我国在汉唐明清四代也是大帝国。虽然我国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百年间成了被侵略的半殖民地，虽然我国现在还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但是在条件变化以后，大国主义倾向如果不竭力防止，就一定会成为严重的危险。而且应该指出，目前这种危险在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中已经开始露出了苗头。因此，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十一月一日的声明，都向自己的工作人提出了反对大国主义倾向的任务。

但是妨碍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不仅有大国主义。大国在历史上不尊重甚至压迫小国，小国在历史上不信任甚至仇视大国。这两种倾向在各国人民中以至各国无产阶级队伍中都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因此，为了巩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除了首先要在较大国家中克服大国主义的倾向以外，还必须在较小国家中克服民族主义的倾向。无论是在大国或是小国，共产党人如果把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同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总利益对立起来，借口前者而反对后者，在实际行动中不认真维护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反而损害这种团结，这就是一种违反国际主义、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严重错误。

斯大林的错误曾经引起了某些东欧国家人民的严重不满。但是，在这些国家中，某些人对于苏联的态度也不是公正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竭力夸大苏联的缺点，而抹煞苏联的贡献。他们企图使人们不想到这一点：如果没有苏联存在，帝国主义

将怎样对待这些国家和这些国家的人民。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高兴地看到，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主义政党现在已经在认真地制止那些制造反苏谣言、在各个兄弟国家的关系中煽动民族对立的坏分子的活动，并且着手破除在一部分群众中以至一部分党员中的民族主义偏见。这显然是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关系的迫切需要的措施之一。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苏联过去时期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是符合于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符合于被压迫民族利益、符合于世界人民利益的。苏联人民在过去的三十九年中，在援助各国人民的事业方面作了巨大的努力和英勇的牺牲。斯大林所犯的一些错误，决不能使伟大的苏联人民的这种历史功绩减色。

苏联政府在改善苏南关系方面所作的努力，苏联政府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的宣言，以及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间同波兰的会谈，表示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彻底消除过去对外关系中的错误的决心。苏联所采取的这些步骤，对于加强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很明显，当帝国主义者向各国共产主义队伍进行疯狂进攻的今天，各国无产阶级需要努力加强相互间的团结。大敌当前，那些妨害国际共产主义队伍团结的言论和行动，无论用了什么名义，都难于指望获得各国共产主义者和各国劳动人民的同情。

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不但符合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也符合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独立运动和全世界和平事业的利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人民，从切身的经验出发，很容易了解谁是他们的敌人，谁是他们的朋友。因此，帝国主义所煽动的反共、反人民、反和平的浪潮，在这些洲的十几亿人口中只能找到极少数人的冷落的响应。事实证明，苏联、中国、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是埃及反侵略斗争的忠实支持者，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独立事业的忠实支持者。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这三种力量，具有共同的利害，它们的相互支援对于人类前途和世界和平具有最伟大的意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最近时期重新造成了国际形势的一定程度的紧张。但是依靠上述三种力量的联合斗争，加上全世界其他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的共同努力，这种紧张状况是可以重新转向和缓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但没有从对埃及的侵略中得到什么东西，反而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由于苏联军队对于匈牙利人民的援助，帝国主义在东欧制造战争前哨阵地和破裂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计划，也已经归于失败。社会主义各国坚持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坚持发展相互间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坚持以和平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坚持反对准备新的世界战争，坚持在全世界扩大和平地区、扩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应用范围。所有这些努力，必将在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爱好和平的人民中获得愈来愈广泛的同情。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加强，更将使帝国主义好战分子不敢轻于冒险。因此，尽管帝国主义还在抵抗这些努力，但是和平的力量终将战胜战争的力量。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如果从一八六四年第一国际成立的时候算起，到现在还只有九十二年。在这九十二年中，虽然有许多迂回曲折，但是整个运动的进展是十分迅速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占世界土地六分之一的苏联；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出现了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犯了一些这样那样的错误，敌人就高兴起来了，有些同志和朋友就难过起来了，其中有一些人甚至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前途发生了动摇。但是无论敌人的高兴、同志和朋友的难过或者动摇，都是没有充足理由的。无产阶级初次担负国家的管理，迟的只有几年，早的也只有几十年，要求他们不遭到任何失败是不可能的。短时间的、局部范围的失败，不但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但是任何有远见的人决不会为此而感觉失望和悲观。失败是成功之母。目前的短时间的局部性的失败，正是增加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政治经验，从而为无限的将来岁月的伟大成功准备条件。如果拿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来比较，我们事业中的这些失败就简直算不得什么。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于一六四零年。但是在战胜了国王以后，接着就出现了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接着又出现了一六六零年的旧王朝的复辟。直到一六八八年，资产阶级政党以政变的方式从荷兰迎来了一个带着荷兰海陆军进入英国的国王，这才使英国的资产阶级专政稳定下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从一七八九年爆发到一八七五年第三次共和国成立，经过了八十六年，中间交织着进步和反动，共和和帝制，革命的恐怖和反革命的恐怖，内战和外战，征服外国和投降外国，尤其动荡不宁。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受着全世界反动派的联合压迫，它的整个道路却顺利和稳定得多。这正是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空前强大的生命力。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虽然遭到了一些挫折，但是我们却从此得到了许多有益的教训。我们纠正了或者正在纠正我们队伍中必须纠正的一些错误。在错误纠正以后，我们就会更加强大起来，就会团结得更好。同敌人的预料相反，无产阶级的事业将更好地前进而不是后退。

但是帝国主义的命运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在那里，帝国主义跟被压迫的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帝国主义政府跟人民之间，存在着根本利害的冲突，这种冲突愈来愈尖锐，没有一个医生能够找出医治的药方。

当然，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系，目前在许多方面还有许多困难，还有许多弱点。但是比之以前苏联孤军奋斗的情况，我们现在是好得多了。而且，哪一种新生的事物没有困难和弱点呢？问题是在于未来。我们前面的道路无论还有多少曲折，人类最后总是要走到光明的目的地——共产主义，这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

原载人民日报 1956-12-29

列宁主义万岁

——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

红旗杂志编辑部

—

今年4月22日，是列宁诞生的九十周年。

在列宁诞生后的第二年，即1871年，出现了英勇的巴黎公社起义。巴黎公社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企图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具有全世界意义的第一次演习。当公社因凡尔赛的反革命进攻而临近失败的时候，马克思说：“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1]

什么是公社的最主要的原则呢？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那就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握取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换句话说，无产阶级应当采取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粉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熟悉无产阶级斗争历史的人们都知道，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分水岭，而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正是列宁，他为了保卫公社的原则，对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进行了完全不调和的斗争。

巴黎公社没有得到成就的事业，经过了四十六年，终于在列宁直接领导下的伟大十月革命中赢得了胜利。俄国苏维埃的经验是巴黎公社经验的继续和发展。为马克思恩格斯不断阐明、而为列宁根据俄国革命的新经验加以充实的公社原则，首先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变成为活生生的事实。马克思说得完全正确：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

帝国主义的豺狼们企图绞杀新生的苏维埃国家，联合当时俄国的反革命势力，进行了武装干涉。但是，英勇的俄国工人阶级和苏联各族人民打走了这些外来的强盗，消灭了国内的反革命叛乱，从而巩固了世界上的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在列宁的旗帜下，在十月革命的旗帜下，以无产阶级革命为主导的新的世界革命开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开始了。

[1] “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一次演说”

通过十月革命，列宁的声音迅速地传播到全世界。1919年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2]。

列宁的号召所以强有力，就是因为它是正确的。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揭示了一系列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可辩驳的真理。

列宁指出，少数资本主义强国的财政资本寡头，即帝国主义者，不仅在本国剥削人民群众，而且压迫和掠夺全世界，把世界大多数国家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世界大战就是由于帝国主义者贪婪无厌，为争夺世界的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为重新瓜分世界，而发动起来的。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资本帝国主义，就还存在着战争的根源，还存在着战争的可能性。无产阶级应当引导人民群众认识战争的根源，为争取和平、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

列宁断言，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或腐化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因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无产阶级解放的实现，决不能经过改良主义的道路，而只能是经过革命的道路。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应该同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成联盟，这个联盟能够粉碎帝国主义者同殖民地、附属国的封建买办反动势力的联盟，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在全世界最终地结束帝国主义制度。

根据资本主义经济上、政治上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列宁得出结论：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内是极不平衡的，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不能在一切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因此，即使社会主义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取得胜利，但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还存在，这就不仅会引起磨擦，而且会引起帝国主义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活动。所以，斗争将是持久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将包括一个整个的历史时代。社会主义国家随时都应当警惕帝国主义侵袭的危险，竭尽全力来防止这种危险。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国家政权问题。列宁详尽地透彻地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通过革命手段粉碎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而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同农民和其他一切劳动者的特殊的联盟，是阶级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另一形式的继续，是为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和抵抗外来的侵略，是为反对旧社会势力及其传统而进行的坚持的斗争，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些战线上充分发动劳动人民，顽强地和持续地进行这些不可避免的斗争，那就不可能有什么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有什么社会主义的胜利。

列宁认为，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要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头等重要的是无产阶级要建立自己的一个真正革命的、同机会主义完全决裂的政党，即共产党。这个政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武装起来的。这个

[2] “新民主主义论”

政党的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进行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经过社会主义而达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这个政党要同群众打成一片，重视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在进行革命的时候，党要紧紧地依靠群众，在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时候，党同样地要紧紧依靠群众。

这些真理，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不断揭示的。当时，世界反动派和庸夫俗子们都把列宁揭示的这些真理，视为骇人听闻的东西。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真理正在世界的实际生活中节节胜利。

从十月革命到现在，这四十多年中，世界上已经发生了新的巨大的变化。

由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苏联把一个原来在帝俄时代是经济技术很落后的国家，变成成为具有世界第一流最先进技术的国家了。苏联在经济上技术上的飞跃，把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而且在技术上也把美国抛到后面去了。

以苏联为主力军的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在中东欧的锁链。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的锁链。一批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以苏联为首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有全地球四分之一的土地，而人口已经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现在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形成一个独立的世界经济体系，而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相对立。社会主义各国的工业总产值，现在已经占全世界工业总产值的将近 40%，不用很久，就会超过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业总产值。

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体系瓦解了，并且还在进一步瓦解中。斗争当然是曲折的，但是总的说来，民族解放运动的风暴正在日益广阔地席卷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事物的发展走向它的反面：帝国主义者在那些地方正在一步一步地由强者变为弱者，而那里的人民却一步一步地由弱者变为强者。

第一次大战后一度存在过的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局面早已结束。第二次大战后由于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比过去大大缩小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比过去更加尖锐化了。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已经不是从前那样在每十年左右发生一次，而是几乎每三、四年发生一次。最近美国资产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承认了美国在十年内遭遇过三次“经济衰退”，而且在刚渡过 1957—1958 年的“经济衰退”之后，现在感觉新的“经济衰退”要再来临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的缩短，是一种新的现象，它进一步地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越来越接近于它的不可避免的灭亡。

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比以前更加厉害了。帝国主义的地盘越来越窄，狭路相逢，美帝国主义正在不断地从英国、法国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手里，夺取它们原有的市场和势力范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在十几年来一直在扩军备战，而在第二次大战中被战败的西德日本两国军国主义，在它们原来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下又再起了。这两个帝国主义跑出来参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争夺，现在

重新在大谈特谈它们的“传统友谊”，正在进行所谓“以华盛顿为起点的波恩—东京轴心”的新活动。西德帝国主义已经肆无忌惮地在海外找寻军事基地。这样就加剧了帝国主义内部的激烈的冲突，同时，增加了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威胁。现在情况很像第一次大战后美英帝国主义者扶助德国军国主义再起一样，而结果也将依然是他们“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美帝国主义者在第二次大战后制造世界紧张局势，并不是表明它的强大，而是表明它的虚弱，并且恰恰是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空前未有的不稳定性。

美帝国主义者，为了实现它的独霸世界的野心，不但处心积虑地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各种破坏和颠覆活动，而且借口反对“共产主义威胁”，以镇压各国革命的世界宪兵自居，在世界上到处布置军事基地，夺取中间地带，进行军事挑战。像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一样，美帝国主义者到处都碰得皮破血流，到处都在相反地激起人民革命斗争的新高涨。现在连他们自己也感觉到，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世界的欣欣向荣的景象比较起来，“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影响，正在衰落。”在他们那里，“只看到一个古罗马的衰亡时期”。

四十多年来的世界变化，正是：帝国主义一天一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一天好起来。我们现在面临着的是一个伟大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的主要特点，就是社会主义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世界各国人民觉醒的力量超过了反动的力量。

现在的世界形势，显然已经比列宁在世时期有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一切变化，不是证明列宁主义已经过时，而是恰恰相反，越来越鲜明地证实列宁所揭示的真理，越来越鲜明地证实列宁在保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所提出的全部学说。

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为一切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指明了一条真正能够摆脱资本帝国主义奴役和摆脱贫困的道路。

这四十年，是列宁主义在世界上取得胜利的四十年，是列宁主义在世界上日益深入人心的四十年。列宁主义不但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各国中取得了并将继续取得伟大的胜利，而且在一切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列宁主义的胜利，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欢呼，同时也就不能不引起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的仇视。帝国主义者，为了削弱列宁主义的影响，为了麻痹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对列宁主义进行了最野蛮的、最卑鄙的攻击和污蔑，并且从工人运动内部收买、利用动摇分子和叛徒，指使他们对列宁的学说进行歪曲和阉割。在十九世纪末年，当马克思主义击溃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在工人运动中广泛传播，并获得统治地位的时候，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提出对于马克思学说的修正；现在，当列宁主义引导世界工人阶级、一切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和各种反动派进军而获得伟大胜利的时候，以铁托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适应帝国主义者的需要，提出对于列宁学说（即现代的马克

思学说)的修正。正如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所说:“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老的修正主义当时企图证明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而现代修正主义则企图证明列宁主义已经过时。莫斯科会议宣言说:“现代修正主义企图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学说,说它是‘过了时的’,似乎目前对于社会发展已经丧失了意义。修正主义者力图腐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破坏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宣言中这一段话,说得很正确,情形正是这样。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到现在是否“过时”?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全部完整的学说,是否还保持着自己的充沛的生命力?如果它还有效,还有充沛的生命力,是指它的一部分,还是指它的整体?我们平常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说法是否还保持它的正确性?能不能说列宁原来的结论和我们平常关于列宁主义的概念已经无效,已经不正确,因而我们应该回头去接受那些早已被列宁驳斥得体无完肤、早已在实际生活中无耻地破产了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结论?这些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必须回答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彻底揭穿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这些问题上的谬论,清除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使一些暂时受他们蒙蔽的人们清醒过来,并且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

二

美帝国主义者,许多国家资产阶级的公开代表人、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右翼,他们为了把世界人民引入歧途,竭力对于现代世界形势进行完全歪曲的描绘,企图以此来证明他们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列宁主义也过时了”这类呓语。

铁托去年年底的一次讲话,反复地说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所谓“新时代”。铁托说:“今天世界已进入了各国可以松一口气并平静地致力于它们国内建设任务的新时代”。他又说,“我们已经进入了议事日程上出现了新问题的时代,这些问题不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而是合作、经济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就经济合作而论,也还有经济竞赛的问题。”^[3]这个叛徒完全抹杀了世界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企图勾销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关于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的时代的解释。

但是,世界上真实的情况是什么一回事呢?

帝国主义本国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可以松一口气”了吗?还在帝国主义压迫

[3] 铁托1959年12月12日在萨格勒布的讲话

下的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可以松一口气”了吗？

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以美帝国主义者为首的武装干涉“平静”了吗？在美帝国主义者还在占领我国台湾的时候，我们的台湾海峡“平静”了吗？在阿尔及利亚和非洲的许多地区的人民遭受法、英等帝国主义的武装镇压的时候，非洲大陆“平静”了吗？在美帝国主义采取轰炸、暗害、颠覆活动来破坏古巴的人民革命的时候，拉丁美洲“平静”了吗？

所谓“致力于它们国内建设任务”，是“建设”些什么呢？大家知道，现在世界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国家，而主要的是有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一类属于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国家，一类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国家。铁托所说的，是帝国主义为压迫本国人民、压迫全世界、进行扩充军备的“国内建设”呢？还是社会主义为增进人民幸福、谋求世界持久和平的“国内建设”呢？

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不能算成问题了吗？是帝国主义已经不存在，剥削制度已经不存在，因而也就不再存在战争的问题呢？还是让帝国主义和剥削制度永久存在下去，也不会有战争的问题呢？事实上，在第二次大战后，战争一直绵延不断。难道帝国主义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战争，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各国革命的战争，不算是战争吗？虽然这些战争还没有变成世界大战，但是，难道这类局部的战争不算是战争吗？虽然这些战争不是用核武器进行的，但是，难道用所谓常备武器进行的战争，不算是战争吗？是否美帝国主义者把1960年的将近60%的财政预算用于扩军备战，也不算是美帝国主义的好战政策呢？是否西德和日本的军国主义的复活，并不会给人类带来新的大战的危险呢？

是什么“合作”呢？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保护资本主义吗？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同帝国主义“合作”保护殖民主义吗？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合作”保护帝国主义制度去压迫本国人民、镇压民族解放战争吗？

总之，按照现代修正主义者对于所谓“时代”的说法，就是在上述等等问题上，对列宁主义进行了挑战。他们的目的就是在于抹杀帝国主义国家本国人民群众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抹杀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矛盾，抹杀社会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制度的矛盾，抹杀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和帝国主义好战集团的矛盾。

对于“时代”的区别，本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大体上说来，一种是胡吹瞎说，臆造和玩弄一些模模糊糊的、令人捉摸不定的辞句，从而掩盖时代的本质，这是帝国主义者、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修正主义者惯用的伎俩。一种是对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全局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提出严格的科学规定，从而彻底揭露时代的本质，这是每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的工作。

列宁这样提出区分时代的标志：“……这里谈的是历史上的大时代，无论过去或将来，每个时代都有个别的、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都有脱离一般运动和运动的一般速度的各种倾向。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时代的某些历史运动的发展

会有多末快，有多末顺利。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那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即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4]。列宁这里说的，所谓时代，是那一个阶级成为时代中心的问题，是那一个阶级决定着时代主要内容、决定着时代发展主要方向的问题。

忠实于马克思辩证法的列宁，时时刻刻都没有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立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根据日常生活千百万事实上所表现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来判断‘利益’的。”^[5]他认为，“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中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在这个具体环境里，那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6]列宁总是要我们根据阶级的分析，考察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不是去笼统地谈什么“一般的社会”，什么“一般的进步”。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够单单根据某些眼前事变，某种细小的政治变动，来规定无产阶级的政策，而是应该从整个历史时代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全局，来规定无产阶级的政策。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理论阵地。列宁正是牢牢地占领了这个阵地，而在阶级变化的新时期，在历史的新时期，得出了关于人类的希望全在于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必须准备在这个大革命的搏战中赢得胜利，从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结论。在十月革命后，1918年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说过：“我们应当从商品生产的发展、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个总的基础出发。这样，我们从理论上来占领和巩固阵地，任何一个没有背叛社会主义的人都不会把我们赶出这个阵地。同时，也可以从这里得出同样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这就是列宁的结论，而且一直到现在，还是需要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深思的结论。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时代的提法，是不可能推翻的，因为这种提法完全正确地把握了我们现在这个大时代的基本特征。关于列宁主义是革命马克思主义在这样大时代中的继续和发展的提法，关于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政策的提法，也是不可能推翻的，因为正是列宁主义揭露了我们这个大时代中工人阶级与垄断资本的矛盾，帝国主义各国相互间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此，列宁主义也就成了我们胜利的旗帜。但是，同革命马克思主义这一系列的提法相反，在铁托们那种所谓“新时代”里面，实际上是，帝国主义不见了，无产阶级革命不见了，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政策当然也不见了。总之，在他们那

[4] “打着别人的旗帜”

[5] “第二国际的破产”

[6] “打着别人的旗帜”

里,看不见我们时代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根本焦点,找不到列宁主义的根本问题,找不到列宁主义。

现代修正主义者硬说,在他们的所谓“新时代”里,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马克思、列宁所提出的“旧概念”已经不适用了。铁托提出了这样的说法:

“我们不是教条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和列宁没有预言月球火箭、原子弹和巨大的技术进步”^[7]。

很好,不是教条主义者。谁要他们当教条主义者呢?但是,可以是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反对教条主义,也可以是反教条主义其名,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铁托们就是属于后面这一类。在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社会发展起什么影响的问题上,有一种人,他们因为不能够用唯物史观来看待它,就产生了不正确的看法,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却故意在这个问题上制造混乱,利用科学技术的进步,妄图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

近几年来,苏联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站在世界的最前列。苏联的这些成就,是伟大十月革命的产物。这些突出的成就,标志着人类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同时对于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起了很重大的作用。但是,在现代技术发展的新条件下,是不是像铁托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业已被马克思列宁所“没有预言”的“月球火箭、原子弹和巨大的技术进步”所动摇了呢?能不能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社会历史观、道德观等等基本观念,业已因此变成了所谓陈腐的“教条”,阶级斗争的规律已经从此再不存在呢?

马克思和列宁没有活到现在,当然没有可能看见现代世界上技术进步的一些具体情况。但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说来,究竟是预兆着什么?他们认为,这只是预兆着新的社会革命,决不是预兆着社会革命会消失下去。

我们知道,马克思和列宁都是为自然科学和技术征服自然界的新发现和进步而欢欣鼓舞。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曾说过:

“科学在马克思看来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虽然任何理论科学中的每个新的甚至尚无从预见其实际应用的发现都使他感到异常喜悦,但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起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所感到的喜悦更是完全不同了”。

恩格斯在说这段话之后,接着又说“须知,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说得很对啊!马克思总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观点,而不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消失论者的观点,去看待一切征服自然界的新发现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回忆马克思”一文里说:

“马克思嘲笑欧洲得胜的反动势力,它们幻想革命已被窒息,而没有想到自然科学正在准备一次新的革命。蒸汽大王在前一世纪中翻转了整个世界;现在它的统治已到末日;另外一种更大得无比的革命力量——电力的火花将取而代之”。

[7] 铁托 1959 年 12 月 12 日在萨格勒布的讲话

之。

……这件事的后果是不可估计的。经济革命之后，一定要跟着政治革命，因为后者只是前者的表现而已。

在马克思谈到科学与力学的这种进步时，他的世界观，尤其是现在所谓的唯物史观，表现得如此清晰，使我前此依旧保持着的某些疑点，像春天阳光下的积雪一样地融化了。”

马克思就是这样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那里，感到革命的气息的。他认为，科学技术的新进步将会引起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革命。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是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整个世界观的阵地，加强唯物史观的阵地，而绝不是在动摇它。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是进一步地加强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阵地，而决不是在削弱它。

同马克思一样，列宁也是把技术的进步同社会制度的革命问题联系起来观察的。列宁就是这样地认为：“蒸汽时代是资产阶级的时代，电气时代是社会主义的时代”^[8]。

请把马克思、列宁的这种革命精神同现代修正主义者背叛革命的可耻态度比较一下吧！在阶级社会，在帝国主义时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只能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看待技术的发展和使用的問題。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是进步的，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要利用原子能和火箭等类新技术来服务于国内和平建设，来征服自然界。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类新技术掌握得越多，发展得越快，就将进一步达到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满足人民需要的目的，同时，就将进一步增强制止帝国主义战争的力量，增加保卫世界和平的可能性。所以，为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福利，为全世界人民的和平利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有可能，都应当越来越多地掌握这类为人民谋福利的新技术。现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对于新技术的发展已经显著地占着优势。人们知道，打中月球的火箭正是苏联发射的，而不是由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发射的。这一点说明：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有大量发展新技术的无限前途。

相反，由于帝国主义制度是反动的、反人民的制度，所以，帝国主义国家要把这类新技术用于侵略外国和威胁本国人民的军事目的，用于制造杀人的武器。对于帝国主义国家来说，这类新技术的出现，只是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推进到一个更新的阶段，它所带来的，决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要永远生存下去，而将只能是进一步激发它本国人民的革命，将只能是资本主义这个吃人的罪恶的旧制度的毁灭。

美帝国主义者和它的伙伴，利用原子弹这类武器对全世界进行战争威胁，进行讹诈。他们说，谁不服从美帝国主义的统治，谁就要遭到毁灭。铁托集团也随声附和，为美帝国主义帮腔，在人民群众中散播原子战争的恐怖。美帝国主义的讹诈和铁托集团的帮腔，只能暂时迷惑不明真相的人，但是吓不倒觉悟了的人民；就是暂时不

[8] “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

明真相的人，也会在先进分子的帮助下逐步明白过来。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认定，在世界历史上，决定人类命运的，并不是技术，而是人，是人民群众。在中国抗日战争前和抗日战争期间，在有些人中曾经一度流行所谓“唯武器论”，说什么日本武器新，技术高，什么中国武器旧，技术低，所以，他们的结论是所谓“中国必亡”。毛泽东同志当时发表的“论持久战”，驳斥了这类胡说。他作了如下的分析：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华战争必败，因为它是反动的，不义的，是失道寡助的；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必胜，因为它是进步的，正义的，是得道多助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而由人民群众觉悟起来、团结起来所组织的人民军队，将无敌于天下。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结果如何呢？结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胜利了，而那些什么“亡国论”终于失败了。第二次大战后，在朝鲜战争中，朝中人民打败了在武器装备上比自己高得多的美国侵略者，又一次证明了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

觉悟的人民总会找出新的办法去抵制反动派的武装优势，从而取得自己的胜利。过去历史是这样，现在和将来也还是这样。由于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军事技术上已经占了优势，使美帝国主义者失去了原子武器和核武器的垄断地位，同时，由于世界人民的觉悟，美国本国人民的觉悟，在现在世界上就存在着成立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协定的可能性。我们是力求能够成立这类协定的。同好战的帝国主义者相反，社会主义各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是积极地、坚决地主张禁止和销毁原子武器和核武器。我们总是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斗争，总是为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而斗争，总是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这种斗争进行得越广泛，越深入，把美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好战成性的残暴面貌揭露得越全面，越彻底，那末，也就越能够把美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在世界人民面前孤立起来，就越有可能束缚美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手足，就越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事业。反之，如果我们对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危险丧失了警惕性，不努力发动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把人民的手足束缚起来，那么，帝国主义就可以为所欲为地进行战争的准备，其结果就必然增加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危险，而在战争爆发时，人民就可能因为毫无准备或准备不足，而不能够迅速地采取正确的态度对待战争，从而不能够有力地制止战争。当然，帝国主义者究竟打不打，不是由我们决定的，我们终究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参谋长。只要各国人民提高了觉悟，有了充分的准备，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已掌握了现代武器的条件下，可以肯定，如果美帝国主义者或其他帝国主义者拒绝达成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的协议，而且一旦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用原子武器和核武器进行战争，结果将只是这些在世界人民包围中的野兽自身很迅速地被毁灭，而决不会是什么人类的毁灭。帝国主义发动罪恶的战争，始终是我们所反对的，因为帝国主义战争会给各国人民（包括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牺牲。但是，如果帝国主义者把这种牺牲硬加在各国人民头上，我们相信，正如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一样，这种牺牲是会得到代价的。胜利的人民，他

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

结论只能是：不论从那一方面来看，原子能、火箭等等，这些新的技术，都没有像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已经改变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基本特征。资本帝国主义制度，是绝对不会自己倒下去的，它将被本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所推倒。当代技术的进步，不能挽救资本帝国主义制度灭亡的命运，而只是给资本帝国主义制度敲了一次新的丧钟。

三

现代修正主义者，从他们对现代世界形势的荒谬论断出发，从他们的那种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过时的荒谬论断出发，企图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等一系列问题上，根本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此外，还有些人，他们并不是修正主义者，他们是好心善意的人，真诚愿望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是面对着某些历史的新现象，感到迷惑，有了一些不正确的想法，例如他们中有人说，美帝国主义的原子讹诈政策的失败，就是暴力的终结。在我们彻底驳斥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谬论的同时，也应当帮助这些好心善意的人改正自己的不正确的想法。

什么叫暴力？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本书里说得很多了。国家的出现和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列宁介绍了恩格斯以下的说明：“……构成这个权力的，不仅有武装队伍，而且还有实体的附属物，如监狱以及其他种种强迫机关……”。列宁告诉我们，必须区别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区别反革命的暴力和革命的暴力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暴力，有反革命的暴力，就必然会有革命的暴力来反对它。没有革命的暴力，就不可能消灭反革命的暴力。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就是一种反革命的暴力，就是代表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实行镇压的特别力量。在帝国主义者没有原子弹或火箭武器以前，和有了这类新武器以后，帝国主义的国家始终是镇压本国无产阶级和国外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特殊力量，始终是这样的暴力机关；即使帝国主义者被迫不能使用这类新武器，帝国主义国家只要还没有被推翻，而代之以人民的国家，代之以本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当然依旧是帝国主义的暴力机关。

从有史以来，还没有过像现在资本帝国主义者形成了的这样大规模的极端凶残的暴力。十多年来，美帝国主义者一直肆无忌惮地采取比以前野蛮百倍的折磨手段，蹂躏本国工人阶级的杰出的儿子，蹂躏黑人，蹂躏一切进步人士，而且一直肆无忌惮地公开宣称要把全世界放在它的暴力统治之下。它继续不断地在扩张自己的暴力，同时其他帝国主义者也在从事加强暴力的竞赛。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的军事膨胀，是在空前沉重的资本主义总危机下出

现的。帝国主义越是疯狂地把它的军事力量发展到最高点，就越是意味它们本身接近于灭亡。现在连有些美帝国主义者的代表人，也预感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必然性。但是，是不是因为帝国主义已经接近于灭亡，帝国主义就会自己终结自己的暴力，帝国主义国家的当权者就会自行放弃原来建立起来的暴力呢？

能不能说，帝国主义者比起过去的时期说来，已经不成为暴力的爱好者，或者对于暴力的爱好程度已经下降了呢？

对于像这类的问题，列宁早已给了多次的回答。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他是这样指出的：“……帝国主义在政治方面总是力图施用暴力和实行反动的”。十月革命后，他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还特别叙述了历史，把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差别，作了一番比较。他说：“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它的全盛时期也正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这种特点在英美表现得特别典型），比较地说，最爱和平，最爱自由。但是帝国主义，即在二十世纪才完全形成的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则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到处发展军国主义”。当然，列宁这些话，是在十月革命初期说的，那时无产阶级的国家才新生，它的经济力量还很幼弱，而经过了四十多年，如我们前面所叙述的，苏维埃国家本身和全世界都已经大大改变了面貌。那么，是不是因为苏联力量的强大，社会主义力量的强大，和平力量的强大，帝国主义的本性就已经改变，因而列宁的上述论断已经过时？或者说，帝国主义的本性虽然没有改变，但是它将再不使用暴力？这种看法是否合乎真实的情况呢？

在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斗争中，社会主义体系已经很明显地占了优势。这一个伟大的历史事实削弱了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所拥有的暴力的地位。但是，这个事实会不会使帝国主义者从此不再压迫本国人民，不再向外扩张，进行侵略活动呢？会不会使帝国主义者的好战集团从此就“放下屠刀”、“卖刀买牛”呢？会不会使帝国主义国家的军火商集团从此就改营和平的行业呢？

所有这些问题，都放在当前一切严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面前，而必须加以深思熟虑。显然，对这些问题看待得正确不正确，处理得正确不正确，是同无产阶级事业的成败和全世界人类的命运密切相关的。

战争是暴力所表现的最尖锐的形式。一种是国内战争，一种是国外战争。暴力并不是经常都用战争这样尖锐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战争是资产阶级平时政策的继续，资产阶级的和平是资产阶级战时政策的继续。资产阶级总是互相交替地采取战争与和平这两种形式去实行对人民统治和对外斗争。在所谓平时时期，帝国主义者依靠武装力量，用逮捕、监禁、苦役、屠杀等等这类暴力的形式去对付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同时又准备使用战争这类暴力的最尖锐的形式去镇压国内人民的革命，去进行对外的掠夺，去压倒外国的竞争者，去扑灭外国的革命；或者是，国内和平和国外战争同时存在。

在十月革命初期，各帝国主义者采取战争形式的暴力对付苏联，这是各帝国主

义政策的继续；在第二次大战中，德帝国主义者采用大规模战争形式的暴力向苏联进攻，这是德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但是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者在各个不同时期又同苏联建立和平共处的外交关系，这当然也是帝国主义政策在一定条件下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

的确，现在出现了有关和平共处的一些新问题。帝国主义者站在强大的苏联的面前，站在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面前，他们终究要考虑考虑，他们如果向苏联进攻，向社会主义国家进攻，会不会像希特勒一样反而加速自己的灭亡，会不会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反而带来最严重的后果。

“和平共处”，这是十月革命后世界上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后才产生的一个新概念，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所预见的关于“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切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国家在某些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前期的国家”^[9]这一种情况中所形成的新概念，是列宁在伟大的苏联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之后所提出的新概念。如上所述，起初，帝国主义者并不愿意同苏联和平共处。只是在干涉苏联的战争遭到失败之后，只是经过了几年的实际较量之后，只是在苏维埃国家业已站住了脚之后，只是在苏维埃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业已形成某种均势之后，帝国主义者才被迫得同苏联“共处”。1920年，列宁说，“我们已经争得能够同资本主义列强共处的条件，这些强国现在已经不得不同我们建立贸易关系了”^[10]。可见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同帝国主义实行一定时期的和平共处，完全是斗争得来的。在第二次大战之前，从1920年到1940年德国进攻苏联之前，是帝国主义和苏联和平共处的时期。在这二十年间，苏联一直遵守和平共处的信义。但是，到1941年，希特勒就不愿同苏联和平共处了，德帝国主义者背信弃义地向苏联举行了野蛮的进攻。由于以伟大苏联为主力军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世界上重新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局面。可是，帝国主义者是并没有死心的。美帝国主义在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周围到处建立军事基地和导弹基地网。美帝国主义一直到现在，还占领着我们的台湾，在台湾海峡随时向我们进行军事挑衅。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朝鲜，曾经在朝鲜土地上同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进行过规模很大的战争，而结果是由于美帝国主义的失败才缔结了停战协定，但是直到现在，它还在干涉朝鲜人民的统一。美帝国主义用武器援助了法帝国主义占领军反对越南人民的战争，直到现在，也还在干涉越南人民的统一。美帝国主义曾经在匈牙利制造反革命的叛乱，一直到现在，还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地企图利用各种方法，进行颠覆活动。事实还是如列宁在1920年2月间对美国记者所说的，在和平问题上，“我们这方面没有什么障碍。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资本家方面的帝国主义才是障碍”^[11]。

[9]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

[10] “我国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

[11] “答美国‘纽约晚报’记者问”

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只能是和平政策。社会主义制度决定我们不需要战争，决不会去发动战争，决不允许、决不应该、也决不能够侵占邻国的一寸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从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我国同印度和缅甸这两个邻邦共同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我国还在 1955 年的万隆会议上和亚非各国共同通过了和平共处的十项原则。几年以来，我国共产党和我国政府一贯支持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为争取和平所进行的活动，认为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所进行的争取和平的活动，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进一步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坚定性，也进一步地证明了各国人民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新世界大战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必要性。

1957 年的莫斯科会议宣言说：“维护着和平事业的是当代的这些强大的力量：不可摧毁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站在反帝立场上并且同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构成广大和平地区的亚非爱好和平的国家；国际工人阶级，首先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群众运动。坚决反抗新战争的策划的，还有欧洲宣布中立各国的人民，拉丁美洲的人民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这些强大力量的联合可以阻止战争的爆发。”只要继续发展这些强大力量，和平共处的局面就有可能继续保持，甚至可以正式取得某种和平共处的协定，以至有可能达成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的协定。这是完全符合于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的好事。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帝国主义制度还存在，作为暴力最尖锐化的形式，即战争，也并没有在世界上结束。事情并不是像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列宁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时候所反复说明、反复坚持的“战争是政策的继续”的定义，已经过时。^[12]

我们相信列宁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战争是剥削制度的必然产物，现代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制度。在帝国主义制度和剥削阶级死亡以前，这样性质或那样性质的战争，总还是会出现的。可能是帝国主义为重新瓜分世界而发生的相互间的战争，可能是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可能是帝国主义国家内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国内战争，当然也还可能是帝国主义进攻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国家被迫进行防御的战争。所有这一切战争，都是一定阶级的政策的继续。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不能陷入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泥坑，对于这一切战争的问题，只能采用具体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加以理解，并由此得出无产阶级在政策上的结论。正如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所说：“如果忘记任何战争都不过是政策用别种手段的继续，那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

帝国主义为着达到它的掠夺、压迫的目的，总是有它的两手，一手是战争，一手是“和平”；因此，各国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一定也要有两手来对付帝国主义，一手是揭穿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竭力争取真正的世界和平，一手是准备在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时候，用正义战争来结束帝国主义的不义战争。

[12] 见南斯拉夫“人民军报”1958 年 11 月 28 日“积极共处和社会主义”一文

总之，为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这些问题上，都必须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谬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否认暴力所固有的阶级性，因而抹杀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的根本区别；否认战争所固有的阶级性，因而抹杀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根本区别；他们否认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否认帝国主义重新发动大战的危险性，否认只有在剥削阶级消灭之后才有消灭战争的可能性，以至于无耻地把美帝国主义的头子艾森豪威尔叫做是“消除冷战和建立持久和平及不同政治制度间和平竞赛的奠基人”^[13]；他们否认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还存在复杂的、激烈的，包括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各方面的斗争；等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这些论点，都是为了毒害各国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思想，而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

四

现代修正主义者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和平政策和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对内政策混为一谈，因而认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就是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就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各国无产阶级可以抛弃阶级斗争，可以和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实行“和平合作”，就是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阶级应该忘记他们是在阶级社会中生活着，等等——这些论点也都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对立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保护帝国主义的统治，企图使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群众永远接受资本主义的奴役。

各国和平共处，和各国人民革命，本来是两件事，而不是一件事；是两个概念，而不是一个概念；是两类问题，而不是一类问题。

和平共处，说的是国家与国家相互关系的问题；革命，说的是本国被压迫人民推翻压迫阶级的问题，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说来，首先是推翻国外压迫者即帝国主义者问题。在十月革命以前，世界上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问题，因为那时还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可是，世界上却存在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的问题，因为各国人民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早已把这类革命或那类革命摆在决定自己国家命运的议事日程上。

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一直认为，革命是每一个民族自己的事情。我们一直认为，工人阶级只能自己解放自己，而某一个国家人民的解放，要依靠自己国内人民的觉悟，自己国内革命成熟的条件。革命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谁也不能不许别国人民进行革命，也不能用“揠苗助长”的方法去制造别国的革命。在1918年6月间，列宁说得好：“有人以为，革命可以在别的国家里按照定单和协议来进行。这些人不是疯子，就是挑拨者。近十二年来，我们经历了两次革命。我们知道，革命是不能按照定单和协议进行的，只有当千千万万的人认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

[13] 见南斯拉夫“战斗报”1959年12月4日“艾森豪威尔到达罗马”一文

的时候，革命才会爆发”^[14]。除了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外，中国革命的经验不也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吗？我们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也经历了几次革命。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也是像疯子一样，总说我们的革命是按照什么外来的定单和协议进行的。但是，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我们的革命并不是由国外输入的，而是因为我国人民群众不能够在旧中国继续生活下去，因为我国人民要求创造自己的新生活。

当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帝国主义进攻而被迫进行防御战争并举行反攻的时候，像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那样，为着追击和消灭这种从国外来的敌人因而越出国境，这应该不应该呢？毫无疑问，这是完全应该的，完全必需的，完全正义的。根据共产主义者的严格的原则，必须是绝对地限制在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这样做。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许可、决不应该、也决不能够在不是受到国外敌人侵略的情况下，使自己的军队越出国境。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军队是正义的军队，在他们因为反击国外敌人而不得不越出国境的时候，当然会在他们所到的地方，发生影响，发生作用，但是，即使这样，在那些地方，在那些国家，也还只能根据人民群众的意志，才能够出现人民的革命，才能够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革命思想的传播，从来没有国家的界限。但是它只有在具体国家的具体条件下，经过人民群众的手，才会获得革命的果实。不仅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这样，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也完全是这样。处在革命时代的各国资产阶级曾经把卢梭的“民约论”当作福音，而革命的各国无产阶级则把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等当作福音。时代不同，阶级不同，意识不同，革命性质不同，而只要那个国家有那种革命的要求，并且在革命危机成熟的时候，就谁也阻止不了革命的爆发。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人类有史以来一切社会的更迭，都是这样。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这些也都是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而所有这些更迭，也都是通过革命。

臭名远扬的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曾经说过以下一段话：“你们回想一下古罗马吧，那里也曾有过一个统治阶级，它不从事劳动而只是生活得很好，结果这个阶级变弱了。这样一种阶级必须逐渐地交出它的统治。”^[15]所谓奴隶主“这个阶级变弱了”，这是伯恩斯坦不能掩盖的历史事实，正如现在美帝国主义者也不能掩盖自己日益变弱这个现实的事实一样。但是，这一个无耻的、以历史家自命的伯恩斯坦，他偏偏想掩盖古代罗马史如下的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奴隶主并不是自己“交出它的统治”，它的统治是被长期的、反复的、绵延不断的奴隶革命所打垮的。

[14] “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

[15] 见伯恩斯坦的“经济生活的各种形式”一文

所谓革命，就是意味着被压迫阶级使用革命的暴力，意味着革命战争。奴隶革命是这样，资产阶级革命也是这样。列宁说得对：“历史证明，从来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不经过专政时期，即夺取政权并用暴力镇压剥削者的最猛烈最疯狂的反抗，就取得了统治，就能够取得统治。……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也是经过一系列起义、内战，用暴力镇压国王、封建主、奴隶主及其复辟企图才取得政权的。”^[16]

为什么事情会是这样的？

我们在这里还得用列宁的话来回答问题。

第一，正如列宁所说的：“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不经过斗争就自动下台的统治阶级。”^[17]

第二，正如列宁所说的：“反动阶级总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到日程上来’。”^[18]

因此，我们怎样去设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呢？

我们还得再用列宁以下两段话来回答问题。

我们读一读列宁以下的一段话吧：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并且也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不经过国内战争就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19]

列宁这一段话是把问题说得很清楚的。

我们再读一读列宁以下的又一段话吧：

“假使社会主义以和平方式产生，资本家先生们也是不愿意让它这样产生的。这样说还有点不够。假使连战争也没有，所有的资本家先生也会采取种种办法制止这种和平发展。伟大的革命即使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以和平方式开始，也是以反革命资产阶级所发动的疯狂战争而告终。”^[20]

问题又被列宁说得很清楚了。

伟大的十月革命就是列宁这些论断的最好的事实的见证者。我们中国革命同样地也是列宁这些论断的最好的事实的见证者。人们不会忘记：中国人民，中国无产阶级，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了二十二年的残酷的国内战争，才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取得政权的。第一次大战以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即使资本家先生们不是直接地、公开地掌握政权，而是经过它们的仆役——社会民主党那些叛徒们代理政权的时候，那些卑鄙的叛徒也当然会随时按照资产阶级的意旨，掩护资产阶级的白卫军暴力，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们投入血泊里。当时的德国就是如此。战败了的德国大资产阶级把自己的政权交给社会民主党人掌管。刚上台的社会民主党的政府立即在1919年1月向德国工人阶级实行了血腥的镇压。请大

[16]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

[17] “在勃列斯尼亚区工人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18]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19] “预言”

[20] “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

家回忆回忆被列宁所称为“世界无产阶级国际的优秀人物”、“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永垂不朽的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是怎样地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暴力下面流了他们的鲜血吧！请大家回忆回忆列宁所说的，那些叛徒们——所谓“社会主义者”是怎样地为了保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利益，“所干的这种杀人勾当的卑鄙无耻”^[21]吧！请大家根据历史上和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一切血淋淋的事实，想想老修正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谓“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那一连篇的鬼话吧！

照上所说，是否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有和平发展的可能条件下，也拒绝采用和平过渡的方针呢？不。绝不是这样的。

大家知道，科学共产主义的伟大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这个有名的著作中曾经回答过“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来废除私有制”的问题。恩格斯答：“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很少想反对这样办的。共产主义者知道得很清楚：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他们知道得很清楚：革命既不能随心所欲地制造，也不能定做，它们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全不以个别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同时，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大受压制，并且也看到共产主义者的反对者这样做，无异是想尽方法引起革命……”。

恩格斯这一段文字，是在一百多年前写的，但直到现在，我们读起来还是多末新鲜呵！

大家更知道，在俄国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当时的特殊条件，列宁采取过革命和平发展的方针。列宁认为这是“革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机会”^[22]。他紧紧地抓住这个机会。但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白卫军破坏了这种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而在7月间群众和平性质的示威中，使彼得格勒的街道流遍了工人和士兵的鲜血。因此，列宁指出：“和平发展的道路已成为不可能的了。开始了非和平的、最痛苦的道路。”^[23]

大家也知道，在中国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当全国人民普遍热望和平的时候，我们党曾经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试图经过和平的道路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并且在1946年同国民党达成了一个实行国内和平的协议。但是，国民党反动派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撕毁了这个协议，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全国的大内战。这就迫使中国人民不能不进行革命的战争。由于我们在争取和平改革的时候，没有放松警惕，没有放弃人民武装，而且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战争并没有吓倒人民，反而使战争的发动者自食其果。

如果无产阶级能够用和平方式取得政权，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对于人民最有利益的；有这种可能而不利用这种可能，是不对的。共产党人一旦在遇有“革命和

[21] “给欧美工人的信”

[22] “革命的任务”

[23] “论口号”

平发展”这类机会的时候,必须像列宁那样紧紧抓住它,去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但是,这类机会,总是如列宁所说的,是“革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机会”。如果在一国范围内,某一个地方政权已经处于革命力量包围之中,在全世界范围内,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处于社会主义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形下,或许有较多的可能出现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也绝不能认为革命和平发展是唯一的可能性,而应当同时准备革命非和平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例如,在中国大陆解放以后,某些由奴隶主和农奴主统治的局部地区,虽然已经处于绝对优势的人民革命力量包围之中,但是,正如中国一句老话,“困兽犹斗”,那里一小撮最反动的奴隶主和农奴主还是要最后挣扎,拒绝和平改革,举行了武装叛乱,而只有在这些叛乱平定之后,才能实行社会制度的改革。

能不能说,在现在帝国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者为了保护它们的野蛮的吃人的制度,从来都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一直武装到牙齿的时候,事情会如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帝国主义已经对本国无产阶级、本国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变得非常“和平”,因而列宁在二月革命后所说的那种“革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机会”,就将是今后世界上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遇到的经常状态呢?因而列宁所说的那种“罕见的机会”,就将是今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俯拾即是的机会呢?我们认为,这种种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不能忘记这个真理:一切统治阶级的武装首先就是为的压迫本国的人民。帝国主义者只有在压迫本国人民的基础上才可能压迫其他国家,才可能发动侵略,才可能进行不义的战争。他们要压迫本国人民,就需要维持和加强反动的武装力量。列宁在1905年的俄国革命中,曾经写道:“常备军的作用,与其说是反对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反对内部敌人”^[24]。对于一切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说来,对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说来,这个论点对不对呢?能否说在当时是对的,而到现在已经是错了的?在我们看来,这个真理到现在仍然是驳不倒的,并且事实越来越证明它的正确性。认真地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没有看清这一点,就不能找到解放自己的道路。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的著作中,把革命问题集中到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这一点上。他摘录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最重要的几段话,其中写道:“在1848年至1849年革命以后,国家政权就成为‘资本用以进行反劳动战争的全国武器’。”资产阶级政权进行反劳动战争的主要机器,就是它的常备军。因此,“公社所颁布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

所以,我们的问题,结果还是要回到巴黎公社的原则;而正如马克思所说,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

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经把英国和美国看成例外,认为这两个国家有经过“和平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因为那时候这两个国家的军国主义和

[24] “军队与革命”

官僚制度还不大发展。但是，到了帝国主义时代，照列宁的说法，“马克思所说的这个例外已经失去时效”，因为这两个国家“已经完全落入一般欧洲式的，号令一切，压制一切的官僚军阀机关的污浊血腥泥潭中了”^[25]。这是列宁同当时机会主义者论战的一个焦点。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歪曲马克思那个“已经失去时效”的说法，企图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即反对无产阶级为着争得解放，必需有革命的武力和武力的革命。列宁给考茨基以如下的回答：

“革命无产阶级的专政，是用暴力手段对付资产阶级；这个暴力手段之所以特别必要，是因为存在有军阀机关与官僚制度，关于这点，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极详尽地说明过……。但是，正是在马克思发表这个意见时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恰恰是在英美两国没有存在这些机关（而现在，这样的机关在英美也有了）”^[26]。

可见，无产阶级采用武力革命的手段，是出于被迫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愿意经过和平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只要有和平的道路可寻，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不会放弃这条道路。但是，当资产阶级拥有强大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的压迫机器的时候，资产阶级的目的就是在堵塞这样的道路。

上面引述的话，是列宁在1918年11月间写的。而现在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是不是像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列宁那些话只在历史上是可以算数的，而在现在情况下已经不能算数呢？大家都看到，现在的情况是差不多没有例外的，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几个帝国主义大国，都在拼命地加强它们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的压迫机器，尤其是它们的军事机器。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上说：

“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这样，阶级斗争的剧烈程度和所采取的形式，与其说是决定于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决定于反动集团对于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抵抗到什么程度，决定于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这一或那一阶段上这些集团是不是采取暴力。”

这是列宁逝世后几十年间，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经验的新总结。

问题并不是无产阶级愿意不愿意进行和平的变革，而是资产阶级接受不接受这种和平的变革。作为列宁的学生，对于这个问题就只能这样地看待。

所以，同那些用和平过渡的空谈来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只有根据每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的具体条件，才能够提出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问题。无产阶级决不能片面地、没有根据地把自已的思想、方针和全部工作建筑在资产阶级愿意接受和平变革的估计上面，而必须同时准备两手，就是准备革命的和平发展，又准备革命的非和平发展。如何过渡，是武装起义过渡，还是和平过渡，这是同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平共处

[25] “国家与革命”

[26]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根本不同的另一个问题，是每个国家内政的问题，是只能由每个国家每个时期的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去决定的问题，是只能由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自己作出决策的问题。

五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 1919 年，说过第二国际的历史教训。他说，第二国际时期的无产阶级运动是“向横广方向发展，以致革命水准不免暂时降低，机会主义不免暂时加强，而终于使第二国际遭到了可耻的破产”^[27]。

什么叫做机会主义？根据列宁的说法：“机会主义是牺牲根本的利益，贪图暂时的局部的利益”^[28]。

什么叫做降低革命水准？这就是机会主义者力图使群众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日常的、暂时的、局部的利益上面，而忘记长远的、根本的、全局的利益。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应当从长远的、根本的、全局的利益着眼来看待议会斗争的问题。

列宁告诉了我们关于议会斗争的局限性，但是，他也警告共产主义者必需避免犯偏狭的宗派主义的错误。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一本名著中，说明了俄国革命的经验：在什么条件下抵制议会是正确的，而在什么条件下抵制议会则是错误的。列宁认为，每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都应当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参加必要的议会斗争。如果共产党员只会讲革命的空话，不愿意做不屈不挠的耐心的工作，回避必要的议会的斗争，这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对于革命无产阶级的事业只有害处。当时列宁批评了欧洲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员拒绝参加议会的错误。他说：“‘拒绝’参加国会的幼稚气，就在于他们想用这样‘简单的’、‘轻易的’、似乎是革命的方法，来‘解决’与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民主影响作斗争这一种困难任务，而事实上他们只是掩耳盗铃，只是闭起眼睛不看困难，只是用空话来回避这种困难罢了。”

为什么要参加议会的斗争？列宁认为，其目的就在于同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影响作斗争，或者如他在另一处所说的，“其目的正是在于教育本阶级的落后阶层，正是在于唤醒和启发乡村中不开通的、被压抑的和愚昧无知的群众”。

这就是说，目的在于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把议会的斗争同革命的斗争统一起来，而不是相反地要使我们降低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使议会的斗争脱离了革命的斗争。

又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又不要降低革命水平，这就是列宁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斗争中必须坚持的一个根本原则。

[27] “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

[28] “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说”

又要参加议会的斗争，又不要迷信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为什么？因为，即使工人政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或者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但是，只要资产阶级的军阀和官僚的国家机器原封不动，那末，议会也还只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装饰品，并且，只要资产阶级的军阀和官僚的国家机器原封不动，资产阶级完全可以随时根据自己利益的需要，除了在必要时采取解散议会的办法以外，还能够采取公开或幕后的各种把戏，使议会中原来第一大党的工人阶级政党变成少数派，或者使工人阶级政党纵使能够在选举中得到比以前更多的选票，而却减少了议会的席位。因此，很难设想，资产阶级专政本身会因议会的选票而发生变化；也很难设想，无产阶级会因为获得多少议会选票，而就有可能在那里采取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措施。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老早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第二次大战后欧洲和亚洲各国的经验又对这一点再作了新的证明。

列宁说：“无产阶级要是不把大多数居民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就不能取得胜利。但是，如果把这种争取工作局限于或者受制于设法在资产阶级统治下获得大多数选票，那就是极端愚蠢或欺骗工人”^[29]。现代修正主义者认为列宁这个说法是陈旧了的。但是，摆在我们眼前的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了列宁这个说法，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却依然是苦口良药。

降低革命水准，就是降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准，就是把政治斗争降低到经济斗争，把革命的斗争降低到仅仅局限于议会的斗争，就是为了暂时的利益，而拿原则去做交易。

在二十世纪初年，列宁在他的“做什么”？一书中就已经提出要注意“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而发生了理论水平的某种程度的降低”的问题。列宁引述了马克思论“哥达纲领”一封信内所提的意见：为达到运动的实际目的起见，可以缔结条约，但决不要拿原则来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接着，列宁写了以下一段话，这一段话到了现在几乎已经为一切共产党人所熟知了。列宁是这样写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当醉心于最狭隘实际活动的偏向与机会主义的时髦宣传打成一片的时候，我们必须始终极力坚持这一思想”。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是多末重要的启示呵！整个的俄国革命运动，就是在以伟大的列宁为首的布尔塞维克党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思想的指引下，而在1917年10月取得胜利的。在上述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也有过两次的经验。第一次是在1927年革命时期。当时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对于我们党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所采取的政策，就是失掉了共产党应有的原则立场，主张在原则上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结果使革命失败。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揭开了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认为共产党决不能在抗日主张的原则上对国民党让步，而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则重复了十年前陈独秀的错误，要在原则上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因此，我们全党同右倾机会主义者展

[29] “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

开了一场很大的论战。毛泽东同志说：“……如果共产党员忘记了这个原则性，他们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他们就将无力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性，就把共产主义者降低到无原则的地位，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他们就是对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任务犯了罪过”^[30]。正是由于我们党中央在原则上毫不让步，对于我们党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因而巩固了和扩大了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阵地，因而也巩固了和扩大了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结果就在抗日战争中壮大了人民力量，并且使我们能够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粉碎了蒋介石反动派的大规模进攻，而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伟大的人民革命的胜利。

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看来，当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合作的时候，在我们党内就容易发生右倾的错误，而当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决裂的时候，在我们党内就容易发生“左”倾的错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曾经多次地进行了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左”倾冒险主义者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来正确处理中国的复杂的阶级关系，不懂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的阶级，采取不同的正确政策，而简单地实行了只斗争、不联合的错误政策。不克服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中国的革命也是不能够胜利的。

根据列宁主义的观点，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有一个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这个党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各个时期正确地确定革命的对象，解决组织主力军和同盟军的问题，解决依靠谁和团结谁的问题。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紧紧地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必须紧紧地依靠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即广大贫农群众，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然后才可能在这个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社会力量，并且，也才有可能按照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建立劳动人民和可以团结的非劳动人民的统一战线。如果不这样，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在各个阶段达到革命胜利的目的。

现代修正主义者和某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企图使人相信，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上述一系列的正确政策，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这是荒谬绝伦的说法，这完全是欺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曾经指出，当时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封建的“社会主义”，等等。现在，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世界各国中，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向往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的剥削阶级中，也就更多地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所谓“社会主义”。正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这些所谓“社会主义者”也“想用各种万应药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弭社会灾难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他们“站在工人运动以外，宁愿向‘士大夫’阶级请求援助”^[31]。他们不过是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资本主义的实际。在这样的情形下，

[30]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31] “‘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同一切降低革命水准的倾向，特别是同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目前保卫世界和平的问题上，也有人说，什么意识的争论已经不需要了。或者说，什么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已经没有方针的分歧了。这就等于要把共产党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降低到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水平。这种说法就是受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影响，而使自己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

争取和平的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这是两种不同的斗争。如果没有把这两种不同的斗争适当地加以区别，就是错误的。参加和平运动的社会成份，当然要复杂得多，其中还包括了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我们共产党人站在保卫世界和平的最前线，站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主张和平共处、反对核武器的最前线。在这样的运动中，我们要同许多复杂的社会成份在一起，为争取和平而成立必要的协定；但是，我们又必须同时保持工人阶级政党的原则性，不要降低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不要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把自己降低到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的水平。这就存在着又联合又批评的问题。

现代修正主义者嘴里的“和平”，是在于给帝国主义的战争准备作粉饰工作，是在重弹那些老早被列宁驳斥过的老机会主义者所谓“超帝国主义”的论调，是把我们的共产党人关于两种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曲解为消灭各国内部的人民革命。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有句可耻的有名的话，叫做“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也有类似的说法，就是：和平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因此，他们所谈的“和平”，完全局限于为帝国主义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能接受的“和平”，是企图降低各国人民的革命水准，使各国人民失却革命的斗志。

我们共产党人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为争取实现和平共处的政策而斗争。同时，我们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我们支持被压迫人民争取自己解放、争取社会进步的革命战争，因为这些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当然，我们还必须继续向群众说明列宁关于资本帝国主义制度是现代战争根源的论点，还必须继续向群众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我们斗争的最后目的就是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代替资本帝国主义的论点。在群众面前，我们必须不掩盖我们自己的原则。

六

我们现在正处在帝国主义制度进一步地加速崩溃、全世界人民的胜利和觉醒不断地向前发展的伟大新时代。

现在全世界各国人民比过去要幸运得多了，因为在十月革命之后四十多年间，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类摆脱了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成立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内，真正地建立着国内持久和平的生活，他们在影响着全人类的命运，而将大大加速全世界的普遍的持久的和平日子的到来。

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站在最前列的，是伟大的苏联，是列宁和苏联共产党领导工人农民首创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已经实现了列宁的理想，早已建成了社会主义，而且现在正在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下，开始着一个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时期。苏联的英勇的、具有巨大智慧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为建成共产主义这一个伟大目标的斗争中，掀起了伟大的劳动的新高涨。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列宁主义的故乡——苏联的每一个新成就而欢呼。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全国人民，赢得了伟大的人民革命的胜利，并且沿着列宁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大道，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已经开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列宁的原则，在我国条件下，创造性地给我国人民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正确方针，鼓舞了全国群众的首创的革命精神，因而正在日新月异地改变着我国的面貌。

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亚洲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地在我们的共同的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飞跃的成就。

列宁主义是战无不胜的旗帜。世界劳动人民紧紧地掌握着这个伟大的旗帜，就是掌握着真理，就是为着自己开辟不断胜利的道路。

我们永远地纪念着列宁。而当现代修正主义者企图沾污列宁主义这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旗帜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保卫列宁主义。

大家都会记得：列宁在他的名著“国家与革命”里，说过历史上各被压迫阶级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的遭遇。列宁说，在他们逝世后，就会出现曲解，“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其革命锋芒，而使之庸俗化。”列宁接着说：“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有这样‘修琢’马克思主义的事情上正趋于一致了。他们把这学说的革命方面和革命精神加以割裂、曲解和遗忘，而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觉得可以接受的东西，提在第一位，加以颂扬。”是呵，现在我们正是又遇到了美帝国主义的一些代表人，他们又以神甫的脸孔出现，甚至称说马克思是“十九世纪的伟大思想家”，甚至承认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关于资本主义寿命不长的预言是“有根据的”，是“正确的”，但是，这些神甫们说，到了二十世纪，特别是最近几十年，马克思主义就不正确了，因为资本主义业已过时，业已停止存在，至少在美国是这样。我们听到帝国主义神甫们这些鬼话，就会感觉到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语言，是同他们趋于一致的。但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并不限于曲解马克思的学说，而且还进一步地曲解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继承者和发展者——列宁的学说。

莫斯科会议宣言指出：“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有人说，莫斯科会议的这个判断已经不适合于今天的情况。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种说法会使人忽视对修正主义这个主要危险进行斗争的重要性，

很有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正如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曾经有一段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在那个时期产生了伯恩斯坦的老修正主义一样，在现在帝国主义被迫接受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还处于某种“国内和平”的情况下，修正主义的思潮最容易滋长和泛滥。因此，我们对于工人运动中的这种主要危险，不能不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

作为列宁的学生，作为列宁主义者，我们必须完全粉碎现代修正主义者曲解和割裂列宁学说的企图。

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完整的革命学说，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继续表达了无产阶级思想的完整的革命世界观。这个完整的革命学说，完整的革命世界观，不能加以曲解和割裂。我们认为，现代修正主义者曲解和割裂列宁主义的企图，不过是帝国主义末日垂死挣扎的一种表现而已。在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节节胜利的面前，在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节节胜利的面前，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日益巩固的面前，在全世界人民日益觉醒为摆脱资本帝国主义枷锁而不断地进行英勇的斗争的面前，铁托们的修正主义者的企图，完全是徒劳的。

伟大的列宁主义万岁！

原载人民日报 1960-04-20

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

人民日报编辑部

全世界觉悟的劳动人民，今天都在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诞生的九十周年。

列宁是苏联共产党的创立者，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缔造者，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领袖。列宁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方面，都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在列宁指导下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世界上六分之一的土地脱离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在差不多三十年以后，欧洲和亚洲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阵营已经拥有世界土地四分之一以上，人口三分之一以上。世界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变得大大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

中国人民对于列宁的理论和事业感到十分亲切，中国人民正是从列宁主义找到了自己解放的道路。还在中国很少人知道列宁的时候，列宁就在自己的著作中一再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伟大意义和伟大前途。早在1913年，列宁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就提出了亚洲是“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的著名论断。随后，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革命就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前夜，帝国主义必然在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斗争中灭亡；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器，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的暴力推翻反革命的暴力，打碎资产阶级的军阀和官僚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国家；无产阶级必须努力巩固同农民的联盟，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努力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权，在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时候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按照中国的通俗说法，就是既要有联合又要有斗争）；必须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必须反对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和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冒险主义，必须坚决信任群众和依靠群众。列宁的这些学说，武装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也武装了中国的无产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所以能够迅速地为中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所接受，主要地是由于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除了进行坚决的斗争求

得解放以外，再无任何别的出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极端残酷和极端野蛮的统治下的旧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怎么能够幻想帝国主义有什么“好心善意”呢？怎么能够幻想反动统治阶级会自动让出政权给人民呢？

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和它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使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地推进了中国的革命斗争。当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叛变革命，把人民投入血海的时候，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就不能不以革命的暴力去抵抗反革命的暴力，经过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世界和中国取得的许多胜利，越来越显著地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是颠扑不破的，是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取得解放的行动指南，是全世界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行动指南。

在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的时候，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主要的有三个方面的任务，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争取世界和平的任务，团结国际友人的任务。

中国人民当前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不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完成这个任务，不但对于中国人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于世界人民的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也有显著的巨大的意义。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是我国人民能够胜利地实现这个伟大任务的最重要的保证。

为了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国人民第一步要争取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基本上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要争取提前实现 1956—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和相当程度的电气化；要努力进行文化革命，基本上普及中小学教育和业余教育，争取提前完成 1956—1967 年的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与此同时，要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使社会主义在一切领域内彻底战胜资本主义，并且大大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目前我国人民正在为完成和超额完成 1960 年国民经济计划而展开一个轰轰烈烈的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争取在今年内使生铁产量达到二千七百万吨、钢产量达到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煤产量达到四亿二千五百万吨、发电量达到五百五十五亿度以上、粮食和棉花各增产 10% 左右，从而使今年工农业总产值比去年增长 23%。

对于中国人民能否高速度地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帝国主义者亟尽

诽谤嘲笑之能事。远者如过去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 1958 年 11 月就说什么“很难相信这种努力会成功或持久”。近者如现任美国助理国务卿帕森斯在今年 2 月又说什么中国加速工业化运动“可能造成这个政权从内部的崩溃”。可是奇怪，帝国主义者们的诽谤愈是恶毒，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愈高，建设干劲愈大。中国的经济形势，中国人民的政治团结，一年比一年更好。现在在广大群众中没有人怀疑，我们一定能够提前和超额完成我们的伟大的建设计划。

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贯地指出，在社会主义下，社会生产力能够得到伟大的解放，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能够得到伟大的解放。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是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多数居民甚至全体居民都参加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他认为，群众的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因素，而这种创造的才干在工人和农民中是无穷无尽的。列宁这样描写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最深奥同时也是最简单明了”的原理：“富有历史意义的行动的规模愈大，范围愈广，参加这种行动的人数便愈多，反过来说，我们所要实行的改造愈深刻，就愈要唤起人们对这种改造的兴趣和采取自觉的态度，使千千万万的人相信这种改造的必要性。我们的革命所以远远超过其他一切革命，归根到底是因为它通过苏维埃政权发动了那些以前对国家建设漠不关心的千百万人来积极参加这一建设。”（“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我们确信我国的发展速度，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将要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所曾有过的的发展速度，按照中国共产党人的说法，就是能够用跃进的速度前进。这是因为，我们党所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我们正在实行的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等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国目前正在蓬勃展开的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的巩固、发展，目前城市人民公社的普遍建立，正是如列宁所指出的，最广泛地发动了千百万人民用最高度的积极性、创造性来参加我国的建设事业。中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地按照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发展着自己的经济建设，而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方针正是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少见多怪的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过去曾经对于苏联的高速度的社会主义建设吵闹不休，现在又在对于我们的高速度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于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吵闹不休了。伟大的列宁在他逝世前一年所写的一篇著名论文“论我国革命”中，早就给了这伙蠢才以一个致命的痛击。列宁指出，“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次战争（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完全拖进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或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而且应该表现出某些特点，这些特点固然并不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但是使俄国革命显得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在转向东方国家时这些特点又会带有某些局部的东西。”列宁反问道：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那又怎样呢？”列宁并且预言，“我们的欧洲庸人们作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来更多的特色。”

事实难道不正是如此吗？苏联用了与一切西方国家不同的方法，不是已经用飞快的速度，在很短的时间内，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超过了西欧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并且正在追上和在某些方面已经开始超过美国吗？同样，在中国，“一穷二白”、毫无出路的处境，几十年斗争的锻炼和经验的积累，加上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帮助和对苏联四十年建设经验的借鉴，不是也十倍地增强了中国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一切西方国家不同的方法，用飞快的速度向着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猛进吗？西方资产阶级咒骂我们要失败，而我们队伍中居然也有那么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应声虫，说什么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产物，而不认识它们恰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性的产物。让他们等着看吧，等个十年，他们总可以见个分晓。总之，无论外国和中国的那些一脑子形而上学的庸人，正如列宁所说，只知道把资产阶级关系的“常态”看作不准有一点变动的金科玉律，“对于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一窍不通”，所以他们如同过去没有能力理解苏联的伟大变化那样，现在也没有能力理解在中国发生的一切生动活泼的事物。

中国人民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的第二个伟大任务，就是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在一起，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在一起，同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的力量在一起，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就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和战争期间，列宁和其他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工人阶级左派领袖所提出的革命口号，就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以便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实现和平。十月革命的主要口号之一就是和平。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立即颁布了和平法令，主张正义的和平。其后，列宁又再三提出了苏维埃国家同各国和平共处的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以后的苏联，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实行集体安全、实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作了世所周知的巨大的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之日起，就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积极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从1950年到1953年，中国人民派出了自己的志愿军到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一道，为制止美国的侵略作了英勇的斗争，迫使侵朝美军接受了停战协定，从而维护了远东的和平。1954年，中国政府积极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达成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同年，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先后同印度政府、缅甸政府的领导人，共同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一直是中国对一切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基石。1955年，中国政府积极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亚非国家的万隆会议，这个会议宣布了以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亚非各

国相互关系中的十项原则。1958年，中国从朝鲜撤退了全部人民志愿军。中国人民一贯积极参加世界和平运动和亚洲和平运动，并且再三倡议实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集体安全，成立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无原子地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用和平的方法而不用战争的方法解决同别国（包括美国）的争端，并且至今还在就这个问题同侵占着中国领土的美国举行着谈判。

社会主义各国和全世界各国共产党，都为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进行了坚定不移的斗争。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所通过的莫斯科宣言，和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所通过的和平宣言，都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行动起来保卫和平，指出这一斗争是当前全世界最重要的斗争。莫斯科的两个宣言都指出，现在世界上存在着强大的维护和平的力量，这些强大力量的联合已经有实际的可能阻止战争的爆发。在莫斯科会议以后，和平的力量有了进一步的增强。这首先是因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更强大，苏联在军事方面和最重要的科学技术方面更显著地走到了美国的前面，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志对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和平访问，苏联政府在裁减军备、停止试验核武器等问题上进行了新的重大的努力，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努力正在日益深入人心。同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和资本主义各国人民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也有了新的重大的发展。帝国主义阵营的内部矛盾继续扩大，美国本国广大人民对政府的反和平的外交政策纷纷表示不满和不安，美帝国主义的处境日见困难和孤立了。这种种情况，迫使新战争的主要策划者美帝国主义不能不接受东西方最高级会谈的建议，并且在一些场合改变腔调，说他们也有“和平愿望”。事实证明，世界和平力量正在胜过战争力量，这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东风压倒西风”的一种表现。

东风压倒西风，这是目前世界的新形势。这种新形势同列宁在世时候根本不同，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形势，也根本不同。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新战争计划的斗争中，估计到这种新形势，是完全必要的。这种新形势使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的力量，得到了空前的信心和勇气。但是决不能说，力量对比的这种变化，已经改变了帝国主义的本性，因而已经从现代社会生活中根本消灭了任何战争的可能性，已经使人类进入永久和平的时代。

列宁主义从来认定，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列宁说：“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决议草案”）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本质产生的。”（“在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纲报告的结论”）列宁的这些具有根本原则意义的论断，是从对于帝国主义的深刻的科学分析得来的，并且已经被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为不可动摇的真理。在两年多以前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还以最新的事实论证了列宁的这个原理。莫斯科会议的宣言说：

“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在战后的年代里，美

英法等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在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朝鲜、马来亚、怯尼亚、危地马拉、埃及、阿尔及利亚、阿曼和也门等地进行了或者还在进行着战争。同时，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顽固地拒绝裁减军备，拒绝禁止使用和生产原子武器和氢武器，拒绝就立刻停止试验这种武器达成协议。他们继续所谓‘冷战’，进行军备竞赛，建立越来越多的军事基地，实行破坏和平的侵略政策，造成新战争的危險。而如果在未能缔结禁用核武器的协定的情况下发生世界战争，那么，它就必将是一场破坏力空前巨大的核武器战争。

“在西德，在美国的扶植下，军国主义正在复活，从而在欧洲的中心造成了严重战争危险的策源地。……

“同时，帝国主义者企图强迫中东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接受臭名远扬的‘杜勒斯—艾森豪威尔主义’，从而对于这个地区的和平造成了威胁。……

“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这一侵略集团，在东南亚造成了战争危险。”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和平宣言说：

“和平力量是巨大的，这种力量能够阻止战争，维护和平。但是我们共产党人认为自己有责任提醒全世界的一切人们：可怕的、杀人的战争的危險并没有过去。

“对和平事业的威胁，对各国人民安全的威胁是来自何处呢？热中于战争的和幻想战争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在目前的军备竞赛中大发横财的垄断资本集团。军备竞赛给垄断资本家带来了巨额利润，而把越来越沉重的负担压在劳动人民的肩上，使许多国家的经济状况严重恶化起来。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在垄断资本、尤其是美国垄断资本的压力下拒绝关于裁军、禁止核武器及其他防止新战争的措施等建议。……

“只有一切珍视和平的人们一致努力，提高对战争挑拨者的阴谋的警惕，并彻底了解到要更加努力保卫还处在威胁之下的和平是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平才能够保持住。”

由此可见，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根源的原理，决没有也决不会“过时”。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条件下，对于战争危险的警惕决不能放松。中国人民就是根据这个基本立场来进行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的。我们欢迎国际局势的每一步缓和，欢迎任何国家（包括美国）的真诚的和平努力，同时把帝国主义继续策划新战争的凶恶活动及时地告诉全国和全世界的公众，唤起他们的注意，并且指出，只要全世界一切和平力量联合一致，就一定能够压倒战争力量，我们斗争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过去这样做了，今后也将继续这样做。

美帝国主义痛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所作的一切和平努力。它公开宣布自己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明目张胆地攻击中国人民的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正义立场。中国人民对于以艾森豪威尔为首的美国政府从去年9月赫鲁晓夫同志和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以来还继续在积极扩军备战和扩大侵略

的事实，作了及时的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就污蔑中国人民似乎不热心于国际局势的和缓。这个漫天大谎简直是太无耻了。美国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本人既然实际上是在从事扩军备战和扩大侵略，那么，这就跟和缓国际局势的要求背道而驰；如果加以隐瞒，甚至加以粉饰、美化和歌颂，对于国际局势有什么好处呢？相反，那只能使制造紧张局势的人们益发肆无忌惮。

事实胜于雄辩。试看美国政府和艾森豪威尔自从去年9月戴维营会谈以来反和平言行的一个最简单的摘要：

1959年10月16日，美国助理国务卿伯丁发表演说，认为美国不能接受和平共处，因为这等于承认社会主义阵营的现状。

10月21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所谓“西藏问题”的非法决议，干涉中国内政，诽谤中国政府平定西藏地方农奴主反动集团的叛乱。

10月22日，美国国务院就匈牙利反革命叛乱事件三周年发表声明，诬蔑匈牙利政府和苏联政府，并且“赞扬”发动这次叛乱的反革命分子。

11月3日，由于巴拿马运河区人民举行示威，要求收回巴拿马对运河区的主权，美国占领军实行镇压，打伤一百二十多名巴拿马人。

11月13日，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说，“西方国家不能接受苏联人所谓的和平共处。”

11月22日，美国国务卿赫脱在美国“行列”杂志上发表文章，诬蔑苏联有“侵略意图”和推行“扩张主义运动”。

11月27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诽谤阿尔巴尼亚“受苏联的统治”。

12月1日，美国国防部长麦克耳罗伊说：“到1963年时，美国将能够掌握型式更多的投递氢弹头的手段来对付苏联。”

12月4日至22日，艾森豪威尔以扩大冷战为目的访问了欧亚非十一国。他在访问中竭力鼓吹加强西方军事集团，说“北大西洋联盟仍然是我们外交政策的基石”，说美国不能放弃中央条约组织，并积极活动扩展美国在国外的导弹基地网。

12月9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朝鲜问题的提案，不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在10月27日发出的呼吁，拒绝从朝鲜南部撤退美国军队和实现朝鲜和平统一，并且坚持在朝鲜进行在作为交战一方的联合国“监督”下的所谓“自由选举”。

同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干涉匈牙利内政的所谓“匈牙利问题”的提案。

12月15日，赫脱在北大西洋集团理事会上提出一个“十年计划”，要求这个集团具有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威慑力量”和进行局部战争的“充分灵活性”。

12月24日，美国指使老挝少数极端亲美分子发动军事政变，进一步扩大老挝内战。

12月29日，艾森豪威尔宣布，美国自1960年1月1日开始，“有恢复核武器试验的自由”。

1960年1月7日和18日，艾森豪威尔提出国情咨文和预算咨文，要求美国“奉

献出我们的任何一点力量”，来提供“威慑力量”，规定 1961 财政年度的军事开支为四百五十五亿多美元，占总预算的 57.1%。他在国情咨文中诬蔑社会主义国家是“警察国家”，诬蔑苏联是“帝国主义的共产主义”，诬蔑社会主义阵营是“阴郁的卫星国体系”。

1 月 15 日，尼克松说，“在任何情况下，美国和它的盟国都不可减少他们的兵力”。

1 月 19 日，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在华盛顿签字，这个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直接针对中国、苏联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且威胁亚洲各国的和平和安全。

2 月 3 日，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我不知道任何戴维营精神”。他并且表示，美国将把核武器的秘密资料交给它的同盟国。

2 月 5 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再次拒绝华沙条约缔约国会议关于华沙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集团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

2 月 15 日，赫脱发表声明，竟然要求苏联的三个加盟共和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重新享有国家的独立”。

2 月 16 日，艾森豪威尔在“共同安全”咨文中说，“苏联削减军事人力的事实——如果这是一个事实的话——并不改变我们保持集体防御的必要性。”“放弃或削弱我们的共同威慑力量地位将是极为愚蠢的。”他说，美国要“坚定不移地、不事声张地、耐心地坚持为保持我们的共同防务而努力”。他宣布新财政年度的对外军事援助拨款为二十亿美元，比上一年度多七亿美元。

2 月 17 日，艾森豪威尔在关于中东局势的报告中说，美国将继续执行美国国会在 1957 年通过的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即所谓“艾森豪威尔主义”）。

2 月 19 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帕森斯发表演说，表示美国要继续侵占中国领土台湾，仍然“期望”新中国“崩溃”，并且说美国要执行“一项谋求抵消（中国）这种力量增长的政策”，“坚持旨在对付这种力量的措施”。

2 月 22 日至 3 月 3 日，艾森豪威尔访问南美，鼓吹加强“泛美制度”，赞扬美洲国家组织为干涉古巴而在去年 8 月在圣地亚哥举行的外长会议，并且表示要继续坚持把美洲当作美国人的美洲的所谓门罗主义。

2 月 26 日，美国在违反朝鲜停战协定不断地把导弹武器运入南朝鲜之后，公然在南朝鲜乌山发射“斗牛士”式导弹。

2 月 29 日，美国复照古巴政府，拒绝古巴政府提出的恢复美古谈判的必要条件，即美国不要采取可能损害古巴人民的措施。并且威胁说：美国始终可以自由采取它认为有必要采取的“任何步骤”。在这之前和以后，美国飞机连续轰炸古巴。据古巴总理卡斯特罗 3 月 14 日说，美国飞机对古巴的空袭已达四十多次。

3 月 9 日，美国负责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萨脱斯威特说，美国在北非“有着特殊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利益”。“美国保持使用它在非洲的某些重要基地的权利，美国和它的盟国继续在非洲取得广泛的重要物资，主要是矿藏，这也是十分重要的”。他

并且说，“有必要把（非洲）民族主义的高涨和有条不紊地从过去过渡到未来的方法加以协调”。

3月16日，美国和蒋介石集团开始在台湾海峡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美军五万人参加。

同一天，即艾森豪威尔和阿登纳发表联合公报的第二天，艾森豪威尔说，“我们一致认为，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改变政策”。“我们不放弃我们在柏林的权利”。

3月21日，美国军舰又一次侵犯中国领海。中国政府向美国提出第九十三次严重警告。从1959年10月到现在，美国侵犯中国领海、领空共达二十一次。

3月30日，艾森豪威尔表示，即使美国现在同意签订关于暂时停止核试验的协定，下届美国总统仍然可以不受约束。他说，“任何继任者都将有权对这个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赫脱4月8日进一步说，从法律观点来看，艾森豪威尔“使美国承担较长一段时期的义务的能力”，“仍然限于他自己的任期内”。

4月4日，赫脱发表演说，拒绝苏联关于全面裁军的建议，攻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关于德国问题的谈话，说他“使局面复杂化”。赫脱说，“如果任何人期望在最高级会议上获得引人注目的成就，他可能会失望”。他对西德的加快重新武装表示“满意”，并且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陆海空部队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

4月6日，艾森豪威尔正式批准加速发展洲际导弹和发射“北极星”式导弹的核潜艇的计划。据报道，美国政府准备把原定三年内制造的洲际导弹的数目从二百七十个增加到三百一十二个，核潜艇从七艘增加到四十艘。

4月9日，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潜艇舰队司令本逊叫嚷说，美国将用三十艘发射“北极星”式导弹的核潜艇来包围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

4月14日，美国代表伊顿在十国裁军委员会会议上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关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的建议，并且再一次表示美国不能接受苏联关于全面彻底裁军的建议。

这里所列举的当然极不完全，而且也只限于美国政府和美国报刊所公开宣布了的材料。但是请问，这一切究竟是不是事实呢？这一切究竟是不是美国当前政策中的主要事实呢？难道能够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捏造？难道能够说，这只是美国政策中的一些次要的、不值一提的旧时代的遗迹？事实当然不是如此。事实是，尽管在戴维营会谈以后，尽管在东西方最高级会谈的前夜，我们看不出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有任何实质的改变，看不出美国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本人所执行的政策有任何实质的改变。美帝国主义不但正在竭力扩大自己的侵略性的军事力量，而且正在迫不及待地扶植西德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使它们成为新战争的策源地。要知道，这一切事实影响着全人类的命运。反对西德军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和其他为美国所扶植的军国主义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现在对这一切起决定作用的首先是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离开这一点也就离开了事实的核心，事实的本质。因此，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如果不集中力量对美国当局的这种战争政策继续进行坚决的揭露和严

肃的斗争，就必然会招来惨重的灾难！

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一起站在为和平而斗争的最前线的中国人民，有什么权利对这一切事实保持沉默呢？有什么权利只让美国人作这一切，说这一切，知道这一切，而不让中国人和别国人知道事实的真相呢？难道向中国和世界的公众说明事实的真相，就不利于和平，就会加剧紧张局势，而隐瞒真相才能有利于和平与和缓局势吗？难道按照美帝国主义的逻辑，和平就是这样“保持”的吗？或者这就是艾森豪威尔之流所说的“自由中的和平”吗？

积极策划新战争的美帝国主义者，确实希望我们隐瞒事实的真相，希望我们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希望我们相信帝国主义的本性可以改变甚至已经改变，希望我们完全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那样，在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不去动员和依靠最广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群众，希望我们竭力夸大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被迫作出的和平表现，使人民群众丧失警惕，或者希望我们竭力夸大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战争威力，使人民群众惊惶失措。总之，新战争的策划者希望我们同他们一样地假要和平，要假和平，以便他们可以把战争突然强加于各国人民，仍然跟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

但是，新战争的策划者听着吧，你们的希望是永远不会实现的！我们既然是真要和平，要真和平，我们就永远不会堕入你们的陷阱。我们必须继续揭露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一切危害和平的阴谋诡计，用最大的努力去动员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广大群众起来同新战争的策划者进行顽强的斗争，并且使他们在斗争中既保持充分的警惕，又保持充分的信心，为阻止新战争而斗争到底。只有这样，才是真要和平，才能得到真和平，否则就是假要和平，或者只能得到假和平。

尽管如前所说，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是我们完全确信，只要进行团结一致的再接再厉的斗争，强大的维护和平的力量就一定有可能设置重重障碍，迫使帝国主义不能按其本性为所欲为。并且，在万一的情况下，如莫斯科宣言所说，“如果帝国主义的战争狂人硬要不顾一切发动战争，那么帝国主义就注定死亡，因为人民绝不会再继续容忍那个给他们带来如此惨重的痛苦和牺牲的制度”。莫斯科宣言指出这一点是绝对必要的，这不是为了减弱而恰恰是为了加强和平的前景。因为只有这样，各国人民才不致在精神上解除武装，才不致屈服在战争狂人的恫吓和讹诈之下，并且才不致在战争竟然不幸爆发的时候惊惶失措。

为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和平共处，需要灵活和耐心，需要达成一定的谅解和妥协。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过去不曾拒绝过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妥协，今后也不会拒绝这种妥协。中国人民热烈支持赫鲁晓夫同志和苏联政府关于东西方最高级会谈问题上的努力，并且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改变它迄今采取的顽固态度，从而使这一会谈能够为裁减军备问题、停止试验核武器问题、西柏林和德国问题以及和缓国际局势问题达成各国人民所期待的协议。

但是，争取世界和平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帝国主义不会轻易接受有利于和平的协议。而且，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帝国主义所同意的协议，帝国主义也可以随时推翻。因此，无论为了取得有利于和平的协议，或是为了保持这些协议，都必须通过斗争。列宁说得对：“现在争取和平的斗争展开了。这个斗争是困难的。谁以为和平轻易获致，谁以为只要一提和平，资产阶级就会用盘子把和平给我们端过来，谁就是一个十分天真的人。谁把这种观点妄加在布尔什维克身上，谁就是在骗人。资本家拚命厮杀，是为了分赃。很明显，粉碎战争，就是战胜资本，而苏维埃政权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开始进行斗争的。”（“在全俄海军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正因为现代战争是帝国主义本性的产物，而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所以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不能不是一个持久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因此，反复地宣传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揭露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它的一切欺骗手腕，就成为目前和平事业中的一项迫切任务。

既然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在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必须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力量。莫斯科宣言说：“维护着和平事业的是当代的这些强大的力量：不可摧毁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站在反帝立场上并且同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构成广大和平地区的亚非爱好和平的国家；国际工人阶级，首先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群众运动。坚决反抗新战争的策划的，还有欧洲宣布中立各国的人民，拉丁美洲的人民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这些强大力量的联合可以阻止战争的爆发。”

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千方百计地力图破坏这个联合斗争。他们梦想把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以及各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对立起来。他们说：既然要和平，被压迫的民族就不应该反抗侵略，被剥削的人民就不应该起来革命。他们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似乎有不准其他国家的人民进行革命的义务。这些都是胡说八道。大家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认为，无论对于被压迫民族或者被剥削人民说来，革命总是不能输出的。同样，革命是谁也无法和无权禁止的。现代的革命基本上起源于帝国主义对于落后民族和本国劳动群众的侵略、压迫和掠夺。因此，除非帝国主义者放弃这种侵略、压迫和掠夺，除非帝国主义不成其为帝国主义，各国被压迫的人民也就不会放弃他们的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

帝国主义国家至今没有停止干涉别国的内政，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却造谣说社会主义国家在干涉别国的内政。当然，社会主义国家决不干涉任何别国包括帝国主义国家的内政。但是帝国主义国家现在却想强迫或引诱社会主义国家帮助它们干涉别国的内政，这难道不是绝顶的荒谬吗？

在帝国主义继续存在，继续用暴力推行侵略政策、压迫政策和掠夺政策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对被压迫民族和被剥削人民的反抗斗争，总是采取同情和支持的

态度的。因为他们的斗争代表人民的愿望，是削弱帝国主义势力而有利于世界和平的。认为这种斗争的发展和对这种斗争的支持不利于和平事业，这难道不是绝顶荒谬吗？

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各国反对帝国主义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在努力制止战争。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愈强大，各国反对帝国主义和爱好和平的力量愈强大，制止战争的可能性就愈增长。因此，壮大社会主义各国的力量，壮大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壮大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力量，壮大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力量，就能够更有效地制止帝国主义战争，维护世界和平。

在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的时候，中国人民的第三个伟大任务，就是要巩固和加强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团结，首先是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友好团结。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它一开始就是一种国际的现象。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对这种支持的感谢，也永远不能忘记用自己的努力去支持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义务。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夜就着重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也正因为这样，大家知道，在北京天安门两侧的大标语，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另一个就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国人民在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坚持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团结。中国人民感觉欣慰的是，我们同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兄弟团结正在日益发展，我们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个爱好和平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各国人民的友谊正在日益扩大，我们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友好联系也正在日益增进。中国人民将在这个基础上不倦地加强我们同所有各国人民的友好团结，以便为争取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共同奋斗。

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为了破坏世界人民的团结，在一些国家里疯狂地煽动着反对中国的运动。但是这种运动没有得到也永远不会得到各国人民的支持，因为这种运动是毫无道理的。中国人民在自己家里勤劳地建设着和平的新生活，努力同自己的邻人友好相处，并没有跑到那个外国和外洋去建立军事基地和导弹基地，为什么要加以反对呢？我们知道，列宁所缔造的苏联，从来就是一个和平的国家，也在长时期中受到一些大小国家（包括一些它所援助的国家，例如国民党时期的中国）的一些为着某种国内目的而反苏的人们的诽谤和攻击。但是这既没有能够丝毫损害于苏联，也没有能够阻碍各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的友好的发展，而只是暴露了那些反苏分子的反和平、反人民的真面目。帝国主义和一些国家的反动派所煽动的反华运动，也只能得到同样的结局。

帝国主义者及其帮凶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各国一小撮反动派，现在特别疯狂地使用各种卑鄙的方法企图挑拨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团结。这些挑拨

者恶毒已极，而又愚蠢已极。他们永远不可能了解，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是在伟大的不可动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莫斯科宣言说：“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在统一的大家庭里，是由于它们走上了共同的社会主义道路，由于它们的社会经济制度和国家政权有共同的阶级实质，由于它们需要互相支持和援助，由于它们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中有共同的利益和目的，由于它们有共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各国一小撮反动派进行这种疯狂的挑拨，不是他们地位巩固的表现，而是他们接近死亡的表现。列宁主义在半个世纪中的迅速胜利，特别是世界第二次大战以来十五年中的迅速胜利，使他们魂梦不安。在这种得到极广大群众支持的惊天动地的胜利面前，妄想称霸世界的帝国主义，不过是如同列宁在“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所说的“泥塑巨人”而已。他们仇视在列宁旗帜下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的猛烈发展和坚强团结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们愈是咒骂，就愈是证明列宁主义的必然胜利。列宁在被革命敌人攻击的时候就高兴，因为这正好证明他是正确的。他不止一次地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俄国大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句：

人们对他造谣诽谤，
但是他要听到的赞扬，
不是他们甜蜜的夸奖，
正是他们的怒骂如狂。

列宁主义的正确，难道不是靠敌人的怒骂，而是靠敌人的夸奖来证明的吗？

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努力中，在保卫和平、反对战争的努力中，在加强对国际革命力量的团结的努力中，都曾经遇到革命敌人的疯狂攻击。但是这一切正好证明，中国人民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中国人民将永远沿着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向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向着世界和平事业的胜利和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勇敢地前进！

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但在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全世界一切其他国家，必将获得更加伟大的胜利，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当然，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长途中某些曲折和停滞，毕竟不过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

我们在本文开头曾经提到列宁在1913年的论文“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在那篇论文里特别提到亚洲是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因为当时欧洲的革命发展曾经比较停滞。列宁当时就断言这种停滞不过是暂时的、表面的现象，断言行将到来的历史时代，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列宁说：

“当机会主义者还在拼命赞美‘社会和平’，拼命鼓吹在‘民主制度’下可以避免风暴的时候，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经在亚洲涌现出来了。……

“欧洲也跟着亚洲——不过不是按照亚洲方式——动作起来了。……狂热的

军备竞赛和帝国主义的政策，使得现代欧洲的‘社会和平’活像一桶火药。一切资产阶级解体和无产阶级成熟的过程，是在一往直前地进展着。”

列宁的这个科学的预见在 1917 年的俄国证实了，接着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了证实。现在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经不止在亚洲，而且在非洲、拉丁美洲涌现出来了。天涯地角，再没有一处是帝国主义的安全的后方。西欧和北美现在还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和平”。但是由于这些国家的狂热的军备竞赛和帝国主义的政策，由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和民族独立运动、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由于和平运动的深入人心，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和平”实际上也越来越像列宁所说的一桶火药。

让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人民一致努力，使列宁主义这个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行将到来的历史时代获得更大的胜利吧！

原载人民日报 1960-04-22

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

陆定一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四月二十二日，是伟大的列宁诞生九十周年。

列宁是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全世界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烈火中，坚决地保卫了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学说。（鼓掌）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的名字，在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心目中，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象征，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象征。（热烈鼓掌）

九十年前，当列宁诞生的时候，人类还处在资本主义的黑暗统治之下。列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冲破了世界帝国主义的锁链，用革命的暴力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暴力统治，取得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鼓掌）十月革命实现了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梦想，破天荒第一次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帝国主义妄想扼杀这个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十四个资本主义国家，勾结当时俄国国内的反革命势力，进行了武装干涉。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领导英勇的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消灭了国内的反革命叛乱。列宁指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指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在列宁逝世之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和苏联政府，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列宁的指示，使苏联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内，迅速地从一个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成为打败法西斯侵略的主力，帮助东欧各国的人民赢得了自己的解放，帮助亚洲各国的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大大地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对世界和平作出了非常伟大的贡献。（热烈鼓掌）现在，苏联进入了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在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下，苏联的经济建设获得了辉煌的成就，科学技术有了飞跃的发展。苏联发射了世界第一批人造地球卫星和宇宙火箭，开辟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新纪元。这些伟大的成就，大大鼓舞了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

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斗争。(热烈鼓掌)

列宁的一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是在同帝国主义、各种反动派和机会主义者的激烈斗争中度过的。列宁主义是在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在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列宁主义的特性，列宁主义的精华，就在于它的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性。(鼓掌)列宁主义不但全部地复活了被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所阉割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所磨灭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锋芒，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锋芒。(鼓掌)

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也就是帝国主义阶段。到了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更进一步地、更充分地、更全面地暴露出来了。这就给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新的任务，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这个新阶段作出新的分析。不是别人，正是伟大的列宁，他执行了这个任务。(鼓掌)

列宁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彻底地驳斥了工人阶级的叛徒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对帝国主义的粉饰和辩护。列宁科学地论证了，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同本国无产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宗主国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这些矛盾，都发展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只有革命才能解决这些矛盾。帝国主义企图用帝国主义相互间的战争，用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战争，用镇压国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战争，把千百万人投入血海中，来消除上述这一系列的矛盾。但是，同帝国主义的愿望相反，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战争并不能消除帝国主义的矛盾，恰恰更加剧了这些矛盾，更促成了革命的爆发。

大家晓得，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后，在他著名的那封《远方来信》里，曾经就俄国的革命问题指出，当时，全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成为这样一个“万能的导演”：它大大加速全世界的历史进程，产生空前严重的全世界经济的、政治的、民族的和国际的危机，并且使得遍体血污的俄国沙皇制度的车子，碰到这样一次世界历史中的特别急剧的转折，就一下子颠覆下去。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任何场合，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制度，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资本帝国主义制度本身的矛盾，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被帝国主义“强大”的外表吓破了胆，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收买，为帝国主义服务。他们按照帝国主义的利益，在工人群众和人民群众中，散布改良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影响，反对革命的道路。他们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的时候，堕落到拥护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耻的立场。同机会主义者相反，列宁一向站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上，站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最前线。列宁拆穿了机会主义者的帝国主义帮凶的面目，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当帝国主义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就主张用革命战争来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列宁指出：

“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人类摆脱战争”。(鼓掌)

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突出地表现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中。为了粉碎考茨基之流粉饰资产阶级民主制和麻痹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修正主义“理论”，列宁反复地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他说：“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是不能经过‘自行消亡’来实现的，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实现。”“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列宁还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是为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和抵抗外来的侵略，为反对旧势力及其传统而进行的坚持的斗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比之资产阶级专政，是民主得百万倍的政治制度。(鼓掌)

列宁光辉地运用了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思想，把它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根本指导方针。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应当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权，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原理。列宁又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最后目的，还必须继续前进，向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过渡。列宁说：“我们开始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应当给自己清楚地提出这些改造归根到底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目的”。

列宁根据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绝对规律，得到了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从社会主义在一个或几个国家胜利，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各国取得胜利，将包括一整个的历史时代。列宁对世界革命的前途满怀信心，他在最后的一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说：“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问题的最终解决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鼓掌)

资本主义制度一定要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必然要取而代之。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进一步地阐明了这个规律，并且高度地赞扬了人民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列宁领导的伟大十月革命的胜利，向全人类指出了彻底解放的道路，指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鼓掌)

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中国革命就有了正确的方向，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热烈鼓掌)

毛泽东同志充分地发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在我们的条件下，保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革命道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不断地由一个胜利进到另一个胜利。(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的胜利，是经过二十多年的长期的革命战争才取得的。（鼓掌）

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帝国主义是站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最大的敌人。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前，中国曾遭受到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压迫和统治。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美帝国主义又武装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威胁我国的安全，武装占领我国的领土台湾，并且采取封锁禁运的办法，和企图利用所谓“民主个人主义”，来消灭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的革命精神，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清除了帝国主义及其奴仆所散布的亲美、崇美、恐美的心理，坚决地同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作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和统治，并且巩固地保卫着我们的革命果实。（热烈鼓掌）

我们的党，曾经同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两次合作，两次分裂，所以在同资产阶级联合和斗争的问题上，有极其丰富的经验。我们的党，不仅有武装斗争的丰富经验，也有和平斗争的丰富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正确地具体地只用了列宁所阐明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的思想，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群众彻底进行民主革命的只想，民主主义革命是农民战争和土地革命的思想，和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革命的思想。这些思想，对我们革命的不断胜利起着指导作用。（鼓掌）

列宁告诉我们，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没有在斗争中百炼成钢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不行的。这个党，应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思想基础，应当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应当同广大劳动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我们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我们的党是在反对国内外强大敌人的斗争中，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成熟起来的。经过了多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我们的党才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热烈鼓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领导，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才能够巩固地取得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使民主革命得到彻底的胜利，并且使民主革命的胜利迅速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我们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著作，是我们极重要的思想武器。

我们的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学说，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来，正确地具体地解决了我国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系列的问题。列宁在说到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时指出，“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斗争，只有斗争，才能决定后一革命能够超过前一革命到什么程度。”又说：

“民主革命实现得愈完全，这个新的斗争（指社会主义革命）就会开展得愈早，愈广泛，愈纯粹，愈坚决。”我国的情况完全证明了：民主革命愈彻底，社会主义革命就开展得愈迅速、愈顺利；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愈彻底，社会主义建设也进行得愈迅速、愈顺利；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又必将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说，我们不但在经济战线上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还要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不断地清除资产阶级在政治、思想上的影响，不断地解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样，就能够充分发动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如列宁所说的“有大多数居民甚至全体居民参加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因而大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跃进。（鼓掌）

有一种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只有敌我矛盾，没有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只有互相适应的一面，没有互相矛盾的一面；社会主义建设，只要依靠技术，不需要依靠群众；社会主义制度，只要巩固，无须发展，即使还要发展，还要前进到共产主义，也无须经过斗争，无须经过质的飞跃；所以，人类社会的不断革命的过程，就到此为止了。这在哲学思想上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鼓掌）

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应用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了划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的问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的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同上述形而上学的观点根本不相同的。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和其他著作中，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它还不是完全的、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它只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还要向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向完全的、成熟的共产主义过渡。列宁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既然是共产主义者，就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原理，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积极地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中共中央指出了我国将来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这就是：“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时代。”（鼓掌）

我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切胜利，都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

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我们得到伟大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援助，（鼓掌）得到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鼓掌）得到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援助。（鼓掌）这种伟大的国际主义的精神，中国人民是永志不忘的。（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我们现在正处在帝国主义制度进一步加速崩溃、全世界人民的胜利和觉醒不断地向前发展的伟大的新时代。（鼓掌）

对于这种形势，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从根本不同的立场、观点出发，得出了根本不同的结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这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空前有利的新时代，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空前有利的新时代。和平的力量已经大大成长，已经有实际可能来防止战争。全世界人民必须进一步地加强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促进革命的发展，保卫世界的和平。（鼓掌）现代修正主义者却认为，这是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已经从世界议事日程上消失的“新时代”。他们认为，不要经过革命，帝国主义就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不要进行反帝斗争，持久和平就会自然到来。这样，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就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根本分歧。（热烈鼓掌）

现代修正主义者篡改、阉割和背叛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论据，是所谓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已经过时了”，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了”，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已经放弃了”。他们借口所谓“应当历史地、非教条主义地”对待列宁的理论遗产，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内容和革命精神。

在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与和平力量对于帝国主义战争力量占了优势的条件下，帝国主义内部困难重重，它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帝国主义者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千方百计地进行挣扎。最近时期，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为了推行他们的侵略和掠夺政策，麻痹世界人民，力图采取某些更加狡猾的、更具有欺骗性的策略。连美帝国主义者，有时也并不隐讳他们要采取所谓更“灵活”的策略。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交替使用战争手法和平和手法。他们一方面加紧扩军备战，进行核战争讹诈，另一方面，散布“和平”的烟幕，使用糖衣炮弹，企图造成帝国主义主张和平的假象。他们一方面对革命运动采取残酷镇压的手段，另一方面，进行欺骗和收买，企图软化和分裂革命运动。帝国主义者采取这些欺骗的办法，无非是为了掩盖他们的掠夺和侵略的本质，掩盖他们准备战争的步骤，以图达到瓦解各国革命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瓦解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奴役各国人民，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针对着帝国主义反对人民的各种手法，全世界各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也必须运用各种各样的革命斗争的手段和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在革命斗争中，应当有原则的严肃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各种各样的革命手段和斗争形式，包括非法的和“合法”的，议会外的和议会内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济

的和政治的，军事的和思想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充分地揭露帝国主义，拆穿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不断地提高人民的革命觉悟，更广泛地动员人民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发展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准备和取得人民革命和民族革命的胜利。（热烈鼓掌）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从来认为，无产阶级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应该联合自己的后备军。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的广大人民是无产阶级的基本同盟军，无产阶级除了应当同他们结成巩固的同盟以外，还应当在各个不同时期团结各种可以团结的人。当然，无产阶级也应当为了人民的利益，充分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哪怕这些矛盾只是一时的、部分的矛盾。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鼓掌）

在同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斗争中，只要有可能，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和平谈判和相互访问，争取用和平方法而不是用战争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争取订立和平共处的协定或互不侵犯条约，这是完全允许的，必要的，是对各国人民有利的。

苏联政府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作了巨大的努力。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积极支持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政府所提出的关于召开东西方首脑会议、关于全面裁军、关于禁止核武器等和平倡议。（热烈鼓掌）

现代修正主义者完全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背叛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向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屈服投降。他们认为，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已经自动放弃，因此，反帝斗争不需要了，革命也不需要了。他们极力掩盖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为帝国主义，为美帝国主义的头子艾森豪威尔涂脂抹粉。在他们的口中，艾森豪威尔成了“和平使者”，美帝国主义已经不是和平的敌人，已经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敌人，已经不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总而言之，照现代修正主义者看来，帝国主义似乎同社会主义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如果谁还要坚持同帝国主义斗争，还要坚持革命，那就是妨碍和平，妨碍和平共处，就是“僵硬的教条主义”。（笑声）

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很懂得什么叫做教条主义，并且不断地同教条主义作斗争。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同教条主义斗争的问题上，就具有丰富的经验。教条主义者是要革命的，但是他们不懂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们不懂得利用敌人的具体矛盾，不懂得集中力量去反对最主要的敌人，不懂得去同各种中间力量进行适当的联合，不懂得灵活运用斗争的策略和方法，结果是使无产阶级陷于孤军作战。这种教条主义，对革命不利，所以我们要反对它。我们反对教条主义，是为着推进革命，为着打倒敌人。（鼓掌）这些人恰恰同我们相反，他们是借口反对“教条主义”来反对革命，企图取消革命，曲解和糟蹋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他们遗忘、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和革命精神，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

革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魂。马克思、恩格斯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提出了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唤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的人民，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产生，并且是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得到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有些个别问题的提法，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和情况的变化，有所改变。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是绝对不能改变的。（鼓掌）列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曾经改变过马克思、恩格斯对个别问题的提法，并且提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所不可能提出的问题。但是这种改变，不但丝毫没有减弱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而且更加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战斗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在阶级社会里是这样，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是这样，只是那时的革命，在性质上和方法上不同罢了。

我们知道，美帝国主义，是各国人民革命、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和平的最凶恶最狡猾的敌人，而艾森豪威尔是现在美帝国主义的首脑。列宁早就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扮演着宪兵的角色。现在，美帝国主义更以世界宪兵自居，到处绞杀革命，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破坏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运动。美帝国主义不仅时刻企图颠覆和消灭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幌子下，极力向中间地带扩张，妄图独霸世界。帝国主义的这种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直到现在并没有改变。美帝国主义是国际帝国主义的最后支柱。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要争取民族解放，全世界人民要维护世界和平，都必须把斗争锋芒指向美帝国主义。（热烈鼓掌）敢不敢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敢不敢同他们作斗争，是要不要进行人民革命，要不要争取被压迫民族的彻底解放、要不要争取真正的世界和平的试金石。（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就必须联合全世界一切革命的力量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只有把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结合在一起，组成强大的反帝国主义战线，坚决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才能够进一步地有效地保卫世界的和平。（鼓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保卫世界和平的主力。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同样地是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力量。离开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就会大大削弱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而有利于帝国主义。

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要起来革命，打碎压在他们身上的枷锁，这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束缚不了的。他们的革命斗争起着根本上动摇帝国主义制度的作用。一切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毫无保留地、坚决地支持这种正义斗争。（鼓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起来革命，推翻垄断资本的反动统治，同样

是任何力量阻挡不住、束缚不了的。他们的革命斗争可以束缚住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手足。一切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样应当毫无保留地、坚决地支持这种正义的革命斗争。（鼓掌）坚决支持这两种斗争，也就是有力地加强了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鼓掌）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必须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援助下，保卫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获得的胜利成果，同时必须支持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断地向前发展，不断地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直到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灭亡，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作为列宁主义者，必须经常记住列宁的这些基本论点。

现代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现代修正主义者被帝国主义核战争讹诈政策吓破了胆。他们由害怕战争进而害怕革命；由自己不想革命进而反对人家革命。（笑声、全场活跃）他们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企图阻碍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帝国主义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资本主义国家，现代修正主义者就是适应了帝国主义的这种需要。

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所以重要，是因为现代修正主义者在工人群众和劳动人民中，能够起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右翼所不能起的作用。他们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是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敌人。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指出了在当前形势下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要性。

宣言指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竭力从思想上腐蚀群众，歪曲社会主义和诬蔑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群众中制造迷惑和混乱。因此，加强对于群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揭穿帝国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造谣诬蔑，通过生动的和有说服力的形式广泛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各国人民间的和平友好，具有首要的意义。”

宣言又说，“现代修正主义企图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学说，说它是‘过了时的’，似乎目前对于社会发展已经丧失了意义。修正主义者力图腐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破坏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他们否认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要性，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作用，否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要求放弃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首先是放弃民主集中制，要求把共产党从一个战斗的革命组织变成某种争论不休的俱乐部。”

现代修正主义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高度发扬列宁的革命精神，彻底揭露帝国主义代理人裹现代修正主义的真面目，是我们神圣的责任。（热烈鼓掌）

莫斯科会议宣言，是各国共产党、工人党所公认的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我们中国共产党，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一起，忠实地遵守和执行这个伟大的纲领。（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运动。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是世界各国人民革命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是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是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胜利的根本保证。为了社会主义各国的利益，为了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我们都必须时时刻刻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鼓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维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鼓掌）维护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鼓掌）维护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团结，（鼓掌）维护全世界人民的团结。（热烈鼓掌）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的指导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要在全世界赢得彻底胜利，也一定能够在全世界赢得彻底胜利。持久的和平一定会来到人间。（连续不断地热烈鼓掌）

让我们在伟大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奋勇前进吧！（长时间热烈鼓掌）

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暴风雨般地长时间热烈鼓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最近，正当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千方百计地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镇压各国人民革命斗争，而各国共产党人迫切 need 加强团结，共同对敌的时候，令人痛心的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里，出现了一股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逆流。

在过去的一个多月中，在欧洲先后举行了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意大利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不幸的是，这些党的代表大会的讲台，竟被利用为攻击兄弟党的场所。这一股破坏团结、制造分裂的逆流，在意共和捷共的代表大会上，达到了新的高峰。有些兄弟党的同志不仅继续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并且公开指名地攻击中国共产党，还指责不同意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朝鲜劳动党。这是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协议的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的极其粗暴的违反。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其严重的事件。

应邀参加捷共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十二月八日发表声明，严肃地指出：“这种做法，不符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不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不利于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也是不符合于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这种错误做法，只能加深分歧，制造分裂，只能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不渝地维护和加强这个国际主义的团结，是一切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由于各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问题极其复杂，各兄弟党的处境很不相同，而客观形势又经常变化，各兄弟党之间发生不同的意见常常是难免的。而且发生不同的意见，并不一定是坏事。重要的是，必须从维护和加强国际主义团结、共同对敌的立场出发，遵循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经过协商达到一致，使团结得到可靠的保证。

一年以前，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出现了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对另一个兄弟党发动攻击的错误做法。当时，中国共产党就坚决反对这种错误做法。在那次大会上及其以后，中国共产党曾经多次恳切呼吁，有争执和分歧的兄弟党，特别是首先发动攻击的党应当采取主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

在相互尊重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这种真诚努力，没有能够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某些兄弟党的领导人，不但没有考虑改变这种错误做法，反而变本加厉，沿着分裂主义的道路，愈走愈远，以至这种错误做法最近接连出现在欧洲四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

在这里，我们要说一说捷共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

在捷共的代表大会上，一些捷共同志和某些兄弟党同志，任意地诬蔑和攻击中国共产党是“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民族主义”和“教条主义”。中共代表团在自己的声明中坚决反对这种制造分裂的做法。声明指出：“这种错误做法，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如果继续下去，势必还要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然而，中国共产党这种以团结为重的态度，仍然没有能够使那些坚持这种错误做法的人回心转意。捷共某些领导人表示“不能同意”中共代表团的意见，坚持要“进一步加深”这种做法，竟然要中国共产党“重新审查”自己对重要国际问题的立场，并且把对中国的这些诬蔑和攻击公开在全世界面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不作必要的答复。

捷共一些同志和某些兄弟党的同志，攻击中国共产党犯了所谓“冒险主义”的错误。他们指责中国在古巴问题上反对“明智的妥协”，要把全世界“拖入热核战争”。事情果真是像他们所指责的那样吗？

中国人民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一样，是爱好和平的。中国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我们始终不渝地为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保卫世界和平而积极斗争。中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创者，我们一贯主张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而反对诉诸武力。

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要维护世界和平，要实现和平共处，要和缓国际紧张局势，首先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必须发动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相信，正如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力量、民族解放力量、民主力量以及一切和平力量的联合斗争，能够挫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计划，阻止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在战略上要藐视它，在战术上要重视它。这就是说，一方面，从战略上看，从长远的整体的观点来看，归根到底，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一定要失败的，人民群众是一定要胜利的。没有这样的认识，就不能鼓励人民群众信心百倍地向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另一方面，从战术上看，在当前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上，又必须认真对待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必须严肃谨慎，讲究斗争艺术。没有这种认识，就不能进行胜利的革命斗争，就有遭受挫折和失败的危险，也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观点，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观点，这完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我们既反对投降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一切要革命和要胜利的人，对待敌人只能采取这种态度，而不能采取别种态度。因为，

如果在战略上不敢藐视敌人，那就必然会犯投降主义的错误。如果在战术上，在具体斗争中轻率、鲁莽，那就必然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如果在战略上不敢藐视敌人，而在战术上又轻率、鲁莽，那就既会在战略上犯投降主义的错误，又会在战术上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在对待核武器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核武器，一贯反对帝国主义的罪恶的核战争政策，并且一贯认为，在社会主义阵营拥有强大优势的条件下，通过谈判，通过对美帝国主义的不断揭露和斗争，达成禁止核武器的协议，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各国革命人民，从来没有被帝国主义手里的核武器所吓倒，而放弃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是唯武器论者，也不是唯核武器论者。我们从来不认为核武器能够决定人类命运。我们深信，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只有人民群众才能够决定人类历史的命运。我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我们也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需要拿核武器作赌注，也不需要拿它来吓唬人。如果那样做，就会真正地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如果迷信核武器，看不到也不信任人民群众的力量，在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仓皇失措，那就有可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就可能犯投降主义的错误。

我们认为，英勇的古巴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中，既没有犯投降主义的错误，也没有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古巴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一样热爱和平，努力争取和平。但是，正如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所说的，“和平的道路并不是牺牲各国人民权利、侵犯各国人民权利的道路，因为这恰恰是导致战争的道路。”古巴统一革命组织全国领导委员会和古巴革命政府十一月二十五日联合声明庄严宣告：“和平途径和政府之间的讨论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但是我们同时重申，在帝国主义面前我们决不变节。我们将用我们的坚定来反击帝国主义的实力地位。我们将用我们的尊严来反击帝国主义要使我们卑躬屈膝的图谋。我们将以战斗到最后一个战士的决心来反击帝国主义的侵略。”

古巴人民在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统一革命组织和古巴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情况中，团结一致地对美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坚持五项正义要求，而没有被美国的核讹诈吓倒，并且在全世界人民的正义支援下，取得了反对美国侵略的又一次伟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古巴统一革命组织和古巴政府的正确路线，支持古巴人民的五项正义要求和他们的英勇斗争。这是中国履行自己的不容推卸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如果说中国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正义斗争就是什么“冒险主义”，那么，我们要问，是不是要中国人民不尽自己的可能支持古巴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才不叫做冒险主义呢？是不是硬要古巴放弃主权、放弃独立、放弃五项正义要求，才不叫做冒险主义，也不叫做投降主义呢？全世界都看到，我们既没有要求把核武器运进古巴，也没有阻挠把所谓“进攻性”武

器撤出古巴，所以对我们来说，根本说不上什么“冒险主义”，更说不上什么要把全世界“拖入热核战争”。

有人还指责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正确立场，好像中国闯了什么大祸。但是，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中国始终不渝地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同邻国的边界问题，并且先后同缅甸、尼泊尔等国，在五项原则基础上，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圆满解决了边界问题。长期以来，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究竟谁拒绝和平谈判，谁侵占了谁的领土，谁进行武装挑衅，谁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已经有目共睹的了。对于印度反动集团妄图用武力改变中印边界状况，得寸进尺地侵占中国边境领土，中国人民忍让了多年，一而再、再而三地争取通过和平谈判寻求公平合理的解决。可是，尼赫鲁政府却完全拒绝谈判。他们把中国的忍让看作软弱可欺。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十月十二日明目张胆地下令发动对中国的进攻，要把中国边防部队从中国领土上“清除掉”。这才迫使中国边防部队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中国是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我们绝不能让别人任意欺侮。中国在印度军队大规模进攻面前进行自卫反击，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最起码的正当措施。中国在反击了印度军队的进攻之后，立即就建议停止冲突、脱离接触和重开谈判，并且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事实已经证明，正是因为中国人民对印度反动民族主义者的扩张野心，进行了必要的斗争，才使中印边界的局势开始和缓下来，实现了事实上的停火。

中国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的真诚努力，是举世公认的。奇怪的倒是有些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竟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忘记得一干二净，他们根本没有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出发，来分析一下尼赫鲁政府挑起中印边界冲突、一直不肯和解的反动政策。他们既不愿意看到这种政策是出于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反对印度人民、反对印度进步运动的需要，也不愿意看到这种政策正是适应了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需要，并且得到他们的支持。事实上，近些年来，尼赫鲁政府越来越残暴地镇压国内人民，越来越投靠美帝国主义，在许多重大国际事件中，例如刚果事件中，充当了美帝国主义的帮凶。尼赫鲁政府坚持反华，正是它的对内对外政策越来越反动的结果。那些攻击中国把尼赫鲁政府推向西方的人，恰恰是倒因为果了。他们在中印边界争端中，自始至终，不分是非，装作“中立”的样子，嘴里说中国是“兄弟”，实际上把印度反动集团当作亲人。这些人难道不应该抚心自问，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丢到哪里去了？他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丢到哪里去了？

在捷共的代表大会上，有一些人又一次大肆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说什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反对苏联”，破坏团结，是“分裂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他们并且谴责中国共产党反对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维护兄弟党关系准则的正确立场，也给中国共产党加上“分裂主义”、“宗派主义”、“民族主义”的罪名。但是，这种颠倒黑白的诬蔑和攻击，完全是徒劳的。

判断谁是维护团结，谁是分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标准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一致通过的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这些准则是：完全平等的原则，既是互相联合又是独立自主的原则，经过同志式的平等协商来达到一致的原则。经验证明，只要按照这些正确的原则办事，兄弟党的团结和兄弟国家的团结就能够得到巩固，即使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分歧，也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反之，如果违反这些原则，在兄弟党、兄弟国家的相互关系中，使用压力，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别人，或者用诬蔑和攻击的做法代替协商一致，那必然要损害团结，那就要犯分裂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

一年以前，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共代表团就曾经说过：“我们认为，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如果不幸发生了争执和分歧，应该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耐心地加以解决。对任何一个兄弟党进行公开的片面的指责，是有助于团结，有助于问题的解决的。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所以坚持反对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一个兄弟党，正是为了维护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维护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团结。我们采取这种立场，有什么过错呢？难道我们全力维护团结，反对不利于团结的做法，倒是成了“分裂主义”和“宗派主义”；而首先发动攻击，破坏团结的人，反而不是分裂主义和宗派主义吗？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在捷共代表大会上，不同意某些人攻击中国共产党，竟然受到了指责。难道朝鲜劳动党维护团结的立场，竟然是一种罪过吗？难道维护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人，倒是犯了错误；而违背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人，反而算是正确的吗？

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关于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规定，根本没有给任何一个党（不论是大党或者小党）一种权利，它可以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对另一个兄弟党发动攻击。如果承认这种错误的做法，那末，这个党可以攻击那个党，今天攻击这个党，明天就可以攻击另一个党，这样发展下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

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的相互关系的准则，正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在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的具体化。如果违背这些准则，就势必陷入大国沙文主义或者其他形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泥坑。可是，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犯了所谓“民族主义”错误的人，就没有自己想一想，究竟他们把自己同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放在什么地位？明明是自己违反了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的准则，对另一个兄弟党、兄弟国家发动攻击，实行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做法，却硬要别人都跟着那样做，如果谁不听从指挥，那就是什么“民族主义”。这难道是合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吗？难道这种错误的做法不正是分裂主义、宗派主义，不正是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最恶劣的表现吗？

那些指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反对苏联”、破坏团结的人们，应该问一问自己，

到底是谁首先挑起事端，是谁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首先攻击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为什么只允许自己有权利肆意攻击别的兄弟党，而别的兄弟党就连答辩的权利都没有呢？如果阿尔巴尼亚的同志回答别人对他们的攻击，就叫做“反对苏联”，那么那些首先发动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人，又应该叫做什么呢？那些肆意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又应该叫做什么呢？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一个起码的要求应该是分清敌我，应该是对敌狠，对己和。可是，有一些人恰恰颠倒过来了。他们同帝国主义就那样“迎合”、“彼此让步”；而对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却是这样誓不两立。他们对张牙舞爪的敌人可以采取“明智的妥协”、“克制”的态度；而对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却不愿意采取和解的态度。对敌人是那样“和”，对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却是这样“狠”，这显然完全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应该采取的立场。

莫斯科声明确认，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莫斯科声明指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莫斯科声明还号召各国共产党人必须为反对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反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积极斗争。但是，却有一些共产党人把共产主义叛徒铁托捧上了天，同铁托集团搞得那么亲热。在捷共的这次代表大会上，有人竟然反对中国共产党对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的揭露。总之，这些人要团结的人，正是应该反对的人；他们反对的人，正是应该团结的人。请问，这难道不是对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公开的粗暴的违反吗？沿着这样的路线，将会走到哪里去呢？

所有事实都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一样，一贯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硬要给我们扣上“教条主义”的帽子，这只能证明他们所反对的“教条主义”不是别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所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阵地以及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这些人自以为只要打起“反对教条主义”的招牌，叫喊所谓“创造性”，就可以任意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可以任意篡改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要质问这些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两个历史性的文件，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通过的并且在上面签了字的，现在是不是仍然有效呢，是不是还需要遵守呢？

有人说：我们是多数，你们是少数，因此，我们是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们是教条主义者；我们是正确的，你们是错误的。可是，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谁是谁非，谁代表真理，并不是可以按照一时的多数或少数来判断的。真理是客观的存在。一时的多数，终究不能把错误变成真理；一时的少数，也终究不会使真理变成错误。历史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在某些时候，在某些场合，真理并不在多数人方面，倒是在少数人方面。在第二国际时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曾经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少数；但是，真理却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一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当德国国会表决战争预算的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多数议员都投赞成票，只有李卜克内西一个人投反对票；但是，真理却在李卜克内西的一边。一切敢于坚持真理的人，绝对不会害怕自己暂时处于少数地位。反之，一切坚持错误的人，即使暂时处于多数地位，也终究不能避免自己的破产。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世界上唯一的最可靠的多数，那就是决定历史命运的占全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那些违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人们，尽管在某个地方，某个会场上，可以吵吵嚷嚷，喧嚣一时，但是他们决不代表真正的多数。他们的“多数”，只是一种虚假的、表面的现象，实质上恰恰是少数。他们所攻击的“少数”，实质上恰恰是多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是透过现象而从本质上看问题的。我们只服从真理，服从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决不服从任何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挥棒。不论帝国主义者、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怎样骂我们，反对我们，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真理的立场，是绝对动摇不了的。

我们愿意提醒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无理谩骂是没有任何用处的。不管怎样大骂特骂，都无损于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光辉。自从世界上有了共产党的那一天起，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真正的共产党是不挨骂的，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真正的共产党是被人骂倒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帝国主义者、反动派、修正主义者和各种机会主义者的咒骂声中成长起来，得到锻炼，并且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他们的咒骂都没有损害我们的一根毫毛。相反地，这恰恰证明我们做得对，证明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证明我们维护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们还愿意提醒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目前美帝国主义正在导演一场反华大合唱，甚至肯尼迪也亲自出马说，西方世界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对付“共产党中国的政权”。在这样的時候，难道你们就不觉得应该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划清界线吗？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制造分裂的错误做法，只能有利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请看，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不是正在拍手叫好，幸灾乐祸，期待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吗？腊斯克最近就公开说：“共产党的分歧非常严重，影响非常深远”。“在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内部造成的混乱，对自由世界是有帮助的”。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人们，都应该想一想，敌人在赞扬这种做法给“自由世界”帮了大忙，这难道是光彩的吗？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前进的道路上，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曲折，丝毫也没有什么奇怪。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都是在战胜各种各样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发展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来都是在战胜各种各样的困难中不断前进的。所有帝国主义者、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只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洪流中，在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的洪流中，成为历史的渣滓。

各国共产党人有着共同的伟大理想，有着共同的庄严事业，而且面临着共同的敌人，我们有着千条万条理由要团结起来，而没有丝毫理由制造分裂。那些制造分

裂的同志们清醒起来吧！中国共产党人诚恳地希望，各国共产党应该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为重，以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的对敌斗争的利益为重，以我们所担负的光荣历史任务为重，以全世界革命人民对我们的殷切期望为重，遵循着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的相互关系的准则，采取正确的方法来消除分歧，维护团结。

只要大家都有解决问题的愿望，那么，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是不难找到的。参加捷共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的声明说：“为了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若干重大原则问题的分歧，中国共产党和一些兄弟党曾经提议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弄清是非，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我们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中国共产党愿意同各国兄弟党一起，竭尽一切努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加强团结，反对分裂，为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让我们联合起来，为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团结，保卫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团结，保卫全世界革命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团结，而不遗余力地坚持奋斗吧！让我们再一次高呼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口号：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原载人民日报 1962-12-15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意大利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具有光荣的斗争历史的党。意大利共产党人和意大利无产阶级，在墨索里尼黑暗统治的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艰苦岁月以及在战后时期，都有过令人钦佩的英勇斗争业绩。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意共的同志们和意大利人民，向来怀着深切的敬意。

中国共产党本着增强兄弟党友谊的一贯立场，应邀派遣代表参加了十二月初举行的意大利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我们本来希望看到，这次代表大会能够有助于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有助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同我们的愿望相反，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陶里亚蒂同志和意共某些领导人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不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对敌的利益，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粗暴地攻击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

出席意共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不能不在致词中严正地声明，我们不同意陶里亚蒂和意共某些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和诬蔑。但是，陶里亚蒂和意共某些领导人表示“坚决拒绝”中国共产党代表提出的意见，并且继续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坚持要进行“公开的辩论”。

这样，意共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就成了最近出现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逆流的一个突出的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陶里亚蒂等同志对我们的攻击，对他们发表的一些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违背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革命原则的观点，不能保持沉默，不能不进行公开的答辨。我们愿意坦率地说，陶里亚蒂同志和意共某些领导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同我们存在着原则的分歧。

看了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总报告和他的总结发言，看了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提纲，人们不能不感到，陶里亚蒂和意共某些领导人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越来越远了。尽管陶里亚蒂等同志惯于用那种晦涩的、暧昧的、使人们不容易看懂的语言，来掩饰他们的真正观点，但是，如果揭开这一层薄薄的面纱，人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的观点的实质。他们对帝国主义抱着极大的幻想，否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世界体系的根本对立，否认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根本对立，主张用国际范围内的阶级合作代替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建立一种所谓“新的国际秩序”。他们对本国垄断资产阶级抱着极大的幻想，混淆资

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阶级专政，主张用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也就是所谓“结构改革”，代替无产阶级革命。他们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已经“过时”，篡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学说、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们抛弃了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否认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规律，也就是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并且把所谓“意大利道路”，也就是不要革命的道路，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归根到底，陶里亚蒂和意共某些领导人的主张，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各国人民不要革命，被压迫民族不要进行争取解放的斗争，全世界人民不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所有这些，实际上恰恰是适应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需要。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不准讨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同我们的所有分歧，只就其中的几个重大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

(一)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首先表现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陶里亚蒂在意共这次代表大会上的总报告中说：“一九六〇年秋，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当时中国同志们提出了某些观点，大会拒绝了这些观点。”陶里亚蒂故意含糊其词，没有说出中国同志们究竟提出了哪些观点，但是他接着提出战争不可避免是整个争论的起点，这显然是指责中国共产党人不相信新的世界战争可以避免，指责中国“好战”。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指责，是毫无根据的，是捏造的。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防止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立场。我们一贯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并没有过去。但是，在国际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新变化的情况下，只要全世界和平力量联合起来，组成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统一战线，进行坚决的斗争，就能够防止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战争。如果帝国主义胆敢冒险把新的世界战争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那末战争的结局必将是帝国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我们都申述了这些观点。两次莫斯科会议通过的共同文件，包含了我们的这些观点，而不是像陶里亚蒂所说的那样拒绝了这些观点。

陶里亚蒂和某些同志明明知道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立场，却一味地加以歪曲和攻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他们同我们之间的真正分歧究竟在哪里呢？

这主要表现在下面的三个问题上。

第一，中国共产党认为，现代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是侵略和战

争的主要力量，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就必须不断地彻底地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使全世界人民保持高度的警惕。社会主义力量、民族解放力量、人民革命力量和世界和平力量超过帝国主义力量和战争力量，这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正在疯狂地扩军备战，威胁着世界和平。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把我们不倦地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计划，诬蔑为我们不相信世界战争可以避免，他们实际上是反对揭露帝国主义。他们在许多场合公开地反对揭露帝国主义。他们虽然在口头上也承认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但实际上千方百计地美化帝国主义，在人民群众中散布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

人们记得，三年前，在“戴维营会谈”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有人就曾经大肆宣传艾森豪威尔真诚希望和平，说这个美帝国主义头子也像我们一样在为和平操心。人们也记得，当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艾森豪威尔访问欧洲，到达意大利的时候，意共某些同志竟然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组织盛大欢迎，要求意大利所有政党和各阶层人士一致向艾森豪威尔“致敬”。在欢迎标语中有这样的话：“罗马共产党人欢迎艾森豪威尔并代表首都的二十五万选民表示相信和希望：美国总统和苏联总理的会见在各国人民心中引起的伟大和平希望不致泯灭。”（见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团结报》。）

现在，我们又听到有人宣传肯尼迪比艾森豪威尔更加关心世界和平，说肯尼迪在加勒比海危机中表现出对维护和平的关怀。

请问，这种替美帝国主义涂脂抹粉的做法，难道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正确方针吗？艾森豪威尔政府派遣间谍飞机侵犯苏联，肯尼迪政府侵略古巴，以及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到处进行侵略、威胁世界和平的种种事实，难道不是反复证明美帝国主义头子并不是什么和平的天使，而是好战的恶魔吗？那些一而再、再而三地美化帝国主义的人，难道不是在存心欺骗全世界人民吗？

非常明显，如果按照这些人的说法，美帝国主义已经不是世界和平的敌人，因此也就无需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了。这种公然违背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错误观点，只会使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迷失方向，有害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有利于美帝国主义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第二，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不断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不断加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运动，不断加强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不断加强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使世界和平得到可靠的保障。世界和平的取得，应该主要依靠全世界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斗争。在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同帝国主义国家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进行旨在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谈判，在不损害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取得某种妥协，达成一定的协议，是必要的。但是，在任何时候，世界和平的取得，决不能仅仅依靠谈判，决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身上，决不能离开人民群众的斗争。那

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把我们这种正确的主张歪曲为不相信世界战争可以避免，他们实际上是不相信并且反对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来防止世界战争。他们要全世界人民相信帝国主义的“明智”、“保证”和“善良愿望”，把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同帝国主义的“互相迁就”、“互相退让”、“互相迎合”和“明智的妥协”上面。他们不惜损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抛弃革命的原则，甚至要求别人也牺牲革命的原则，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

无数历史事实证明，损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抛弃革命的原则，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是绝对得不到真正的和平的。相反，只能助长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气焰。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说得好：“和平的道路，并不是牺牲各国人民权利、侵犯各国人民权利的道路，因为这恰恰是导致战争的道路。”

第三，中国共产党认为，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不可分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削弱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力量。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越发展，就越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人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应该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

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指责我们的这种正确的主张是“好战”，他们实际上把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对立起来，同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对立起来。在他们看来，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只能接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恩赐”，而不能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否则就是妨碍世界和平。他们认为，当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面临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武装镇压的时候，如果用革命的战争来反对反革命的战争，就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他们的这种错误的主张，只能被认为是反对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起来革命，要求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放弃自己的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永远忍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奴役。

事实证明，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的每一个胜利，都打击和削弱了帝国主义战争势力，都加强和壮大了世界和平力量。如果采取害怕革命、反对革命的立场，导致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事业遭受挫折和失败，那只会损害和平力量，增加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

总之，在如何防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坚决揭露帝国主义，主张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主张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主张最广泛地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士，同时一贯主张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利用谈判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所有这一切，正是为了有效地防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这种主张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符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这是防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正确方针。我们坚持这个正确的方针，正是深信依靠上述各种力量的联合斗争，能够防止世界

战争，怎么能说这是不相信世界战争可以避免，怎么能说这是“好战”呢？如果按照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的主张，美化帝国主义，把和平的希望寄托于帝国主义，对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采取消极和反对的态度，向帝国主义屈服和投降，那只会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假的和平，或者带来真的战争。这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一切爱好和平人民不能不坚决反对的错误方针。

(二)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陶里亚蒂和某些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还突出地表现在对于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方面。

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如果爆发核战争，人类将遭受空前的灾难。正因为这样，我们一向主张全面禁止核武器，即完全禁止试验、制造、储存和使用核武器。我国政府曾多次建议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所有国家的无原子武器区。我们也一向积极支持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为禁止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而进行的一切正义斗争。那些关于中国共产党低估核武器的破坏力和要把世界拖进核战争的种种说法，都是荒诞无稽的诬蔑。

在核武器和核战争问题上，我们同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的第一个分歧是：核武器出现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是否已经“过时”。

陶里亚蒂和某些人认为，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对于战争的正义性质的定义应当另作其他考虑”。他们实际上认为，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战争已没有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区别。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我们认为，核武器的出现，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事实上，在核武器出现以后，世界上发生的许多战争，仍然是政治的继续，仍然有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那些认为战争已没有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区别的人，实际上是反对进行或者拒绝支持正义的战争，堕入反对一切战争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立场。

在核武器和核战争的问题上，我们同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的第二个分歧是：究竟对于人类的前途应该抱悲观主义的态度，还是应该抱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

陶里亚蒂和某些人大谈什么“人类自杀”、“人类毁灭”，认为“甚至连谈论这一部分残存的人类在社会制度问题上可能倾向于什么，也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悲观绝望的论调。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阵营拥有强大的核优势的情况下，在各国人民反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斗争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进一步丧失核优势、被迫认识到它的核讹诈政策已经不起作用、认识到如果它发动核战争只会加速自己的灭亡的情况下，全面禁止核武器是可能的。历史上已经有过禁止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武器的先例。一九二五年，各国在日内瓦达成了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就是一个证明。

在我们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防止核战争的步骤以后，如果帝国主义仍然不顾一切地发动核战争，那也只会是帝国主义的灭亡，而绝不是人类的灭亡。莫斯科声明指出，“如果帝国主义狂人发动战争，世界人民将清除和埋葬资本主义。”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深信，历史的发展只能是人类毁灭核武器，而决不会是核武器毁灭人类。那些“人类毁灭”论者违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文件的论断，只能表明他们对人类的前途、对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完全丧失了信心，堕入了失败主义的泥坑。

在核武器和核战争的问题上，我们同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的第三个分歧是：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才能够有效地达到禁止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的目的。

陶里亚蒂和某些人热衷于宣传核恐怖，并且公然说，在美帝国主义玩弄核讹诈面前“害怕得发抖”，是“有道理的”。陶里亚蒂还说，“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避免战争”。按照陶里亚蒂和某些人的这种说法，对于美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和核讹诈政策，岂不是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无条件屈服，就是把一切革命理想、一切革命原则，一古脑儿抛弃吗？难道这是共产党人应有的立场吗？按照这样的做法，难道就真的能够防止核战争吗？

人们不能设想，自己“害怕得发抖”，就能够感动美帝国主义大发善心，放弃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放弃它的核讹诈政策。事实恰恰相反，自己越是“害怕得发抖”，美帝国主义就越是猖狂，它的胃口就越大，它就越要以核战争相威胁，提出得寸进尺的要求。难道这样的教训还算少吗？

我们认为，为了动员人民群众反对核战争和核武器，有必要让他们知道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低估这种破坏力显然是不对的。但是，美帝国主义正在竭力散布核恐怖来推行他们的核讹诈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应该在指出核武器的破坏力的同时，针对美帝国主义的核恐怖宣传，着重指出禁止核武器和制止核战争的可能性，应该使人民群众的和平愿望，化为对帝国主义核威胁政策的义愤，把人民群众引导到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的斗争中去。共产党人绝对不应该充当美帝国主义核讹诈政策的义务宣传员。我们认为，对于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必须加以彻底的揭露，必须最广泛地动员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针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计划的每一步骤，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深信，依靠各种维护和平的力量的联合斗争，能够挫败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这是争取实现禁止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的有效正确的方针。

我们愿意奉劝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还是丢掉你们的悲观的错误的论调，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振作起来，积极参加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核讹诈政策、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斗争吧！

（三）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竭力反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

都是纸老虎”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陶里亚蒂在意共这次代表大会上的总报告中说，“肯定说帝国主义是一只简单的纸老虎，用肩膀一推就倒”，“是错误的”。还有的人说，现在帝国主义是有核牙齿的，怎么会是纸老虎呢？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如果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不是无知，那就是故意歪曲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论点。

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人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比喻作纸老虎，这是从长远的整体的观点看问题，是从本质看问题。就是说，归根到底，真正有力量的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

一九四六年八月间，毛泽东同志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时候，第一次提出了这个论点。当时，中国人民正处在困难的情况中。美帝国主义大力支持的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拥有兵员上和装备上的巨大优势，开始发动了全面内战。在敌人的疯狂进攻面前，在美帝国主义无敌的神话面前，敢不敢斗争，敢不敢革命，敢不敢胜利，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命运的最重大的问题。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同志用“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思想。毛泽东同志说得很清楚：“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提起美国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阐述了这个论点。他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科学论断早已为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所证实，并且鼓舞了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请问陶里亚蒂同志和那些攻击这个论点的人，毛泽东同志的论点究竟有哪一点不对呢？

毛泽东同志关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分析，同列宁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列宁在一九一九年曾经把当时“称霸世界的”英法帝国主义比喻做“泥足巨人”。他在当时说过，“人们以为，世界帝国主义是一种巨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一个落后国家的工人要起来反对这种力量，简直是发了狂。现在……我们看到：像一个制服不了的巨人似的帝国主义，在大家眼中已成为‘泥足巨人’”。“所有这些似乎是强大的和不

可战胜的国际帝国主义力量是不可靠的，是可怕的，它们已在腐烂”。（《列宁全集》三十卷，第一〇七至一〇八页。）列宁所说的“泥足巨人”，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纸老虎”，不是同样的道理吗？请问，列宁的这个论点又有哪一点不对呢？是不是列宁的这个论点“过时”了呢？

历史上有过无数的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前，机会主义者跑出来说，沙皇和资产阶级政府的力量是了不起的，人民群众如果拿起武器，那就是发疯。可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坚决反对了机会主义思想，毅然领导工农兵群众推翻了沙皇和资产阶级政府。历史证明，沙皇和资产阶级政府不过是纸老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和大战期间，绥靖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曾经跑出来说，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战胜的。但是，各国人民坚决反对绥靖主义和投降主义，他们终于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历史同样证明，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国主义也不过是纸老虎。

我们认为，是不是在战略上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看作是纸老虎，这是一个如何认识革命力量和反动力量的大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一切革命人民敢不敢于斗争、敢不敢于革命、敢不敢于胜利的大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全世界人民斗争前途和历史命运的大问题。在任何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家，都不应该害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帝国主义横行霸道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的今天，应该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害怕革命力量，而不是革命力量害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首先应该有战胜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革命信心、革命雄心、革命气概，否则，任何革命是永远没有希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家，只有坚决反对一切投降主义和软弱无能的思想，用“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思想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灭敌人的威风，长自己的志气，使广大人民群众具有革命的决心和信心，具有革命的远见和坚定性，才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

帝国主义有了核武器以后，丝毫没有改变它的腐朽、没落和外强中干的本质，也丝毫没有改变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同志在同斯特朗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时候，正是在帝国主义有了原子武器之后。毛泽东同志在那次谈话中就指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历史证明，帝国主义有了核武器，并没有吓倒一切敢于斗争的革命人民。中国革命的胜利，朝鲜、越南、古巴、阿尔及利亚和其他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都是在美帝国主义有了核武器的情况下取得的。帝国主义从来都是武装到牙齿的，从来都是要吃人的。不论它有大炮牙齿，有坦克牙齿，有火箭牙齿，有核牙齿，还是有现代科学技术所可能装备的任何牙齿，都改变不了它的腐朽、没落、纸老虎的本质。归根到底，核牙齿和任何牙齿，都不能挽救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帝国主义的核牙齿和任何牙齿，最后终将同帝国主义一起，被世界人民送进历史博物馆里去。

那些攻击“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论点的人，显然完全丧失了一切革命者应有的革命气质，变成了鼠目寸光、胆小如鼠的人。我们奉劝这些人，还是不要把自己的命运同帝国主义的命运连在一起吧！

(四)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还表现在和平共处问题上。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中国是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同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并且先后同也门、缅甸、尼泊尔、阿富汗、几内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加纳签订了友好条约或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同缅甸、尼泊尔等国圆满地解决了边界问题。这些事实，是任何人都抹煞不了的。

可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竟然有人大肆诬蔑和攻击中国反对和平共处。他们这样做，不过是为了掩饰他们自己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

在和平共处问题上，我们同那些攻击我们的人的分歧在于：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努力争取在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建立正常的国际关系。从社会主义国家方面来说，这样做是没有任何困难的。障碍是来自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绝不能设想，实行和平共处，可以不经过斗争。更不能设想，和平共处关系的建立，就可以消除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消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的对立，消除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对立。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指出：“各国间的和平共处，并不像修正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间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但是，陶里亚蒂同志和那些攻击中国的人却认为，通过“和平共处”，可以“革新全世界的结构”，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在全世界“建设一个能满足人和各国人民对于自由、福利、独立、个人的全面发展、尊重人格、各国之间的和平合作等愿望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创立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这就是说，通过“和平共处”，可以改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对立、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对立的“世界结构”，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存在的条件下，就可以消灭一切战争，实现“没有战争的世界”。

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这种主张，完全篡改了列宁关于和平共处的原则，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实际上是在国际范围内以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鼓吹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溶合。现在美帝国主义正在叫嚷建立所谓“自由世界大家庭”，妄想通过所谓“和平演变”，把社会主义国家合并到所谓“自由世界”中去。铁托集团正在为美帝国主义帮腔，鼓吹世界的“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那些主张在和平共处中“革新全世界的结构”的人，难道不应该同美帝国主义

划清界线吗？难道不应该同铁托集团划清界线吗？

至于所谓通过和平共处，可以达到“没有战争的世界”，更是绝顶荒谬的。在目前形势下，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结成广泛的国际反帝统一战线，共同斗争，能够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战争。但是，防止世界大战是一回事，消灭一切战争又是一回事。战争的根源来自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存在的条件下，这样的或那样的战争都是可能发生的。战后十七年的历史表明，各式各样的局部战争就一直没有间断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总是要起来革命的。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用武力来镇压这种革命的情况下，发生国内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就认为，要消灭一切战争，达到“没有战争的世界”，这只能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制度，消灭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制度之后，而不可能在这之前。

在和平共处问题上，我们同那些攻击我们的人的分歧还在于：我们认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同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是两类问题，不是一类问题。和平共处的原则只能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相互关系方面，而不能适用于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的关系方面，也不能适用于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的关系方面。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问题，是要进行革命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统治，而不是也不可能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和平共处。

但是，陶里亚蒂和那些攻击中国的人却把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的观点，引申到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同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的关系方面。他们说，关于“仍然折磨着十亿人口的饥饿问题”，“不发达地区生产力和民主的发展问题”，只“应当通过谈判、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以及避免采取使局势恶化、从而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的行动，来加以解决”。他们不高兴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火星。他们说，星星之火可以引起世界大战。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要被压迫民族同殖民统治者“和平共处”，要被压迫民族容忍殖民统治，而不要进行反抗，不要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更不要进行民族解放战争。如果按照这种说法，中国人民，朝鲜人民，越南人民，古巴人民，阿尔及利亚人民和其他国家的人民起来革命，岂不是都违反“和平共处”的原则，都犯了错误吗？我们很难理解，这种论调同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说教究竟有什么差别？

特别令人惊异的是，陶里亚蒂和某些人还把国际范围内的阶级合作的观点，引申到“共同干预”不发达地区方面。他们说，“不同社会结构国家”的合作，能够为了促使不发达地区的进步而进行“共同干预”。这种说法显然是替新殖民主义散布幻想。帝国主义对不发达地区的政策，不管采取什么形式、什么花样，都只能是殖民主义的掠夺政策，而绝不会是关心不发达地区的进步。至于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应该支援不发达地区的人民，首先是支持他们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在他们独立以后，还要支援他们发展民族经济。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绝对不能附和帝国主义对不发达国家的殖民主义政策，更不能跟他们一起“共同干预”不发达地区。如果谁这样做，

那就是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那就是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利益服务。

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同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究竟能不能“和平共处”？所谓对不发达地区进行“共同干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刚果事件就是最好的回答。当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对刚果进行国际干涉的时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曾经有人认为这是实行国际合作的范例，认为通过联合国的干预，就可以消灭殖民主义，使刚果人民获得独立自由。然而，结果究竟是怎样呢？刚果民族英雄卢蒙巴被杀害了，卢蒙巴的继承人基赞加被拘禁了，许多爱国志士也被杀害或者被拘禁了，蓬蓬勃勃的刚果民族独立斗争遭到了严重挫折。刚果不仅继续遭受老牌殖民主义者的奴役，而且沦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陷于更大的苦难之中。请问那些现在仍然在鼓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同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和平共处”，鼓吹对不发达地区进行“共同干预”的人们，难道你们忘掉了刚果事件的惨痛教训吗？

那些诬蔑中国反对和平共处的人，攻击中国在同印度的关系方面犯了什么错误。他们不问事实真相，不分是非，一味指责中国不应该同印度发生冲突。在这个问题上，陶里亚蒂说，“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要求中所包含的一切合理的和正确的东西。我们也知道武装行动是从印度方面的一次进攻开始的”。这种态度，比起一味诬蔑中国方面挑起边境冲突的那些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要公正一些。但是，另一方面，陶里亚蒂仍然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中印武装冲突是“没有道理的、荒唐的”。请问陶里亚蒂同志，中国面对着印度反动集团的狂妄的领土要求和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到底应当怎样做才是有“道理”的和不“荒唐”的呢？难道中国只有在印度反动集团的无理要求和军事进攻面前屈服，才是有“道理”的和不“荒唐”的吗？难道社会主义的中国只有把自己的大片领土拱手让人，才是有“道理”的和不“荒唐”的吗？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反映了他们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观点是：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只能一味迁就，甚至在遭到武装进攻的时候也不应该自卫，而应该放弃自己的领土主权。试问，这种观点，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原则又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那些诬蔑中国反对和平共处的人，还攻击中国人民支持古巴人民反美斗争的正义立场。当英雄的古巴人民和他们的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坚决拒绝侵犯古巴主权的国际视察，提出五项正义要求的时候，中国人民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贯立场，在全国举行了巨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坚决支持古巴人民维护独立、主权和尊严，这有什么过错呢？但是，有人一再攻击中国为加勒比海局势制造困难，要把世界推入热核战争。这是对中国的最恶毒、最卑鄙的诬蔑。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古巴人民反对国际视察、维护主权的斗争，怎么说得上反对和平共处呢？怎么说得上是我们要把别人推入热核战争呢？难道要中国也去向古巴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接受国际视察，才符合所谓“和平共处”吗？如果有些人口头

上也表示支持古巴五项要求，而实际上却又反对中国人民支持古巴，那末，这岂不正是暴露了他们自己支持古巴五项要求的虚伪性吗？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来认为，决定历史命运的，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而不是任何武器。我们多次说过，我们从来没有主张过在古巴设立导弹基地，也没有阻挠过从古巴撤出所谓进攻性武器。我们从来不认为，玩弄核武器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我们也从来不认为，在加勒比海危机中避免热核战争就是“慕尼黑”。但是，我们过去坚决反对、现在坚决反对、将来也坚决反对用牺牲别国主权的办法，去换取同帝国主义的妥协。这种妥协，只能被认为是不折不扣的绥靖主义，不折不扣的“慕尼黑”。这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毫无共同之点。

(五)

陶里亚蒂同志和意共的某些同志，不仅实际上主张在国际范围内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而且把他们的这种“和平共处”的概念，引申到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被压迫阶级与压迫阶级的关系上来。陶里亚蒂说：“我们在我国国内形势下所采取的整个行动，无非是把争取革新全世界的结构的伟大斗争转化到意大利国内。”这个“整个行动”，就是所谓“在民主与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也就是所谓通过“结构改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意大利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当前所采取的路线，尽管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但是，这终究是由意大利同志自己决定的事情，我们从不试图干预。现在，既然陶里亚蒂同志把他们的“结构改革”论说成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并且片面地说和平过渡已经“成为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战略原则”，而这个问题又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涉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人民争取解放的根本问题，我们，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员，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不能不表示我们的意见。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工人革命中的第一步是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这个思想贯穿在列宁的全部著作中。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强调要打碎和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和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说过：“除了政权，一切都是幻影”。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在论述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规律的时候，首先指出，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毫无疑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莫斯科宣言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当然也是适用于意大利的。

但是，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却认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作的分析已经“不够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已经改变。按照他们所提出的“结构改革”论，在现今的意大利，不要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不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也不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只要在意大利宪法范围内，经过“一系列的改革”，通过实行大企业部门国有化、经济计划化和扩大民主，就能够“循序渐进地”、“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他们实际上是把国家看成是某种超阶级的工具，认为资产阶级国家也能实行社会主义政策；把资产阶级民主看成是超阶级的民主，认为无产阶级依靠这种民主也能上升为国家的“领导阶级”。这种所谓“结构改革”论，完全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现今的意大利，是一个由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着的资本主义国家。意大利的宪法，尽管包含着意大利工人阶级和意大利人民多年来英勇斗争得来的某些果实，但是，它仍然是一个以保障资本主义所有制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宪法。在意大利实行的民主，正像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民主一样，是资产阶级民主，也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在意大利实行的国有化，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只能为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维持它的剥削和统治，有时也可能采取一些改良办法。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进行日常的经济斗争和争取民主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进行这种斗争，是为了部分改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为了教育和组织群众、提高群众觉悟和积聚革命力量，以便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进而夺取政权。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赞成争取改良的斗争的同时，坚决地反对改良主义。事实证明，一旦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超出了垄断资产阶级所能允许的范围，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意大利政府，就实行镇压。这种阶级斗争的不可改变的规律，难道不是已经为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了吗？怎么能够设想，垄断资产阶级会自动放弃它的利益和统治，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呢？

关于这一点，陶里亚蒂自己也不是完全不知道的。他虽然竭力鼓吹在资产阶级宪法范围内，可以“粉碎大垄断资本统治集团的权力”，但是，到底怎样才能粉碎这个权力呢？他回答说：“我们不知道”。可见陶里亚蒂和意共的某些领导人的“结构改革”论，并不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和对客观实际的科学研究出发的，而是从唯心主义和幻想出发的。但是，他们竟然把这种连自己都知道不可靠的东西竭力加以宣扬，并且把它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他们这样做，实际上只能起腐蚀和软化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维护资本主义统治、从根本上取消社会主义革命的作用。这不正是一种新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吗？

近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些共产党的蜕化分子和一些社会民主党的右翼分子，纷纷鼓吹所谓“结构改革”论，并且以此攻击共产党。这些事实本身就足以

说明，所谓“结构改革”论同社会民主主义是多么相似，而距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多么遥远！

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或者非和平的方式来实现。有人企图借此为“结构改革”论辩解，这是徒劳的。片面地把和平过渡说成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战略原则”，也是错误的。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如果能够实现和平过渡，当然是对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有利的。某一个国家如果出现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时候，共产党人应该争取这种可能性的实现。但是，可能与现实，愿望与能否实现愿望，究竟是两回事。事实上，迄今为止，历史上还未有过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共产党人不应该把革命胜利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和平过渡上面。资产阶级从来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共产党人决不能丝毫放松对于革命的准备，必须准备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当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革命的时候，用武力去打倒它。这就是说，共产党人应该准备两手，即在准备革命的和平发展的同时，必须具有革命的非和平发展的充分准备，这样才能在革命形势到来的时候，在资产阶级使用暴力镇压革命的时候，不致陷于措手不及的境地。而且，即使能够用和平的方式取得政权，也还要准备立刻应付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共产党人应该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艰苦地积聚革命力量上，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迎击资产阶级的武力进攻方面，而不应该片面地强调和平过渡，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上面，否则就必然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装，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陷于完全无准备的被动的局面，以至葬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陶里亚蒂同志和意共某些领导人所谓“在民主与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论点，使人想起老牌修正主义考茨基的某些言论。考茨基在四十多年前说过：“我推测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在所有已经建立民主的地方，可能使用和平的经济、法律以及道德手段，而不是用暴力来实现。”（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一九一八年出版。）难道共产党人不应该同考茨基之流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划清界线吗？

（六）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有多么远，从他们最近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打得火热的种种事实上更加暴露出来。

意共这次代表大会，邀请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铁托集团的代表参加，并且给他们提供了反华的讲台。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公然为铁托集团辩护，吹嘘铁托集团的“经验的价值”。

我们愿意提醒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你们究竟还承认不承认莫斯科声明对你们的约束力呢？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写得清清楚楚：“各国共产党一致谴责国际

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难道莫斯科声明对铁托集团的谴责是错误的吗？难道各国共产党一致通过的决议，可以任凭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些人的主观意愿而丢到九霄云外去吗？

无论如何，事实毕竟是事实，共产主义叛徒总归是共产主义叛徒。莫斯科声明的论断是任何人也推翻不了的。

铁托集团并没有抛弃他们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而且在不久前公布的南斯拉夫宪法草案中坚持了这个修正主义的纲领。

铁托集团并没有改变投靠帝国主义建设所谓“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而是更加卖力气地替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效劳。最近，美帝国主义又赏给了铁托集团一笔一亿多美元的“援助”。铁托集团继续披着“超集团”、“积极共处”的外衣，千方百计地破坏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破坏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团结。

随着铁托集团修正主义路线的发展，随着铁托集团对美帝国主义依赖的加深，南斯拉夫早已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早就一步一步地在南斯拉夫复辟。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不是通过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变或帝国主义的入侵，而是通过铁托集团的蜕化而逐步实现的。在这里，正如列宁早就指出的，“任何一个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列宁全集》二十五卷，第三五七页。）一个国家的性质，是由哪个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和它执行怎样的政策来决定的。现在的南斯拉夫，国家政权掌握在铁托集团手里，这个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背叛了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和南斯拉夫人民的根本利益，实行一整套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路线。在南斯拉夫农村中，富农和资本主义势力迅速增长，阶级分化正在加剧。在南斯拉夫整个经济领域中，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和利润法则起着支配作用，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正在泛滥。

听听帝国主义对铁托集团的评价，不是没有益处的。美帝国主义把铁托集团比作“带头羊”，就是说要通过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影响，企图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从社会主义阵营中带出去，带到肯尼迪的“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南斯拉夫的实例，向人们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国家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蜕化变质现象的出现，新的资产阶级的产生，这并不是难以理解的。列宁曾经说过，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变质，在一定条件下，从苏维埃职员中能够产生很少一部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是列宁所指出的这种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已经在南斯拉夫占了统治地位。

陶里亚蒂同志在总结发言中说：“当你说资本主义已经在南斯拉夫复辟时——大家都知道这不是真的——就没有人信你说的其余一切了，因为大家都认为其余一切也都不过是夸大其词而已。”他似乎以为，这么一来，就可以全部驳倒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可是，诡辩改变不了真理。他们一口咬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唯一的理由，是在南斯拉夫没有看到一个资本家。当人们戴着有色眼镜观察事物的时候，总是难以洞察真相的。既然陶里亚蒂等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理解，同铁托集团有许多共同之点，当然也就难怪他们对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视而不见，对南斯拉夫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视而不见。

尤其令人诧异的是，有些人在竭力吹嘘他们同铁托叛徒集团的亲密关系的同时，却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说我们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是“不能允许的”。这些人不择手段地想把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排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同时又处心积虑地想把莫斯科声明所确认的叛徒铁托集团硬塞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里来，他们这样做，究竟目的何在呢？中国有句俗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铁托集团那样亲如手足、而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又这样深恶痛绝的人，难道不应该想一想，自己已经站到什么地方去了吗？

（七）

陶里亚蒂同志以及同他抱有相同观点的同志，在一系列问题上同我们的分歧，归根到底，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已经过时，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是否已经过时这样根本性质的问题。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借口时代的变化、民族的特点等等，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莫斯科宣言中指出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规律不适用于意大利。意共的一位领导人贾·巴叶塔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说：“马克思主义是多么的不同于列宁主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又多么不同于列宁的列宁主义”。他们正是在这样的借口下，修改了和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和推销他们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谓“意大利道路”。

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奠定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总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历史的发展，不但没有使马克思主义“过时”，而是恰恰相反，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在全世界无产阶级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不断地得到了新的发展。列宁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列宁逝世以后的年代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又在各自的革命斗争中，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但是，这一切新的发展，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而绝对不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

列宁所开辟的十月革命的道路，以后为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所总结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是世界各国人民消灭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共同道路。尽管从十月革命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十月革命的道路所体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越来越显示出夺目的光辉。

陶里亚蒂为了替自己的错误观点辩护，竟然说中国共产党执行的路线“同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月的革命过程中所遵循的战略和策略路线丝毫不相符合”。这完全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历史实际。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尽管中国革命同其他国家的革命一样，具有许多特点，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一向把中国革命看成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中国革命，正是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而取得胜利的。陶里亚蒂对中国革命的歪曲，只能表明他企图为他自己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社会主义革命共同规律的独特路线制造借口。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按照各国的具体条件，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规律。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一定时间和一定条件下提出的某些个别论点，在另一时间和另一条件下，由于情况变化，就必须代之以新的论点。不这样做，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就会给共产主义事业带来损失。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借口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新现象，根本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以修正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弃共产主义事业。

某一个共产党在某一个发展阶段上，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可能成为主要的危险。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指出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正如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指出的，就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现代修正主义。现代修正主义“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反映资产阶级思想，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在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剥削者的压迫的斗争中，在争取和平、民主、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在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中，使工人和劳动群众解除武装，使他们涣散。”目前，现代修正主义者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借口反对“左”倾冒险主义而取消革命，借口策略的灵活性而鼓吹无原则的妥协，实行投降主义。如果不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最近出现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逆流，再一次证明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论断的正确性。关于修正主义的主要特点，列宁说过，“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

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列宁全集》十五卷，第十九页。）

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人民总是要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出的正确的道路前进。虽然这条道路是艰难的、曲折的，但这是达到胜利的唯一道路。社会历史的发展不会顺从帝国主义的“理论”，也不会顺从修正主义的“理论”。不管是什么人、什么政党和什么集团，不论在工人运动中曾做过多少工作，只要一旦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并且顺着这条道路滑下去，那就只会变成资产阶级的奴仆，受到无产阶级的唾弃。

× × ×

我们不得不在这里公开讨论了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同我们之间的主要分歧。这本来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如果不是他们首先公开挑战并且坚持要公开辩论的话。但是，即使在我们被迫公开讨论的时候，我们仍然诚挚地希望，通过同志式的讨论，能够消除这种分歧。尽管令人惋惜地看到陶里亚蒂和同他抱有同样观点的同志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越来越远，我们仍然热烈地期待着他们不要越陷越深，能够迷途知返，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回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上来。我们愿意向前看。我们多次提出，应该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来解决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问题。我们认为，各国共产党人应该以对敌斗争的共同利益为重，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重，遵循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加强团结。这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期望。

一百多年来各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是充满着马克思主义同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激烈斗争的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来就是在战胜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前进的。今天，各式各样的修正主义者尽管可以喧嚣一时，但是，这并不表现他们的强大，相反，恰恰暴露他们的虚弱。目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修正主义思潮、新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适应着垄断资产阶级和美帝国主义的需要，实质上是垄断资产阶级和美帝国主义的政策的产物。但是，各式各样的修正主义，既不能阻挡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的胜利发展，也不能挽救帝国主义的最后灭亡。

一九一三年，列宁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论述到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的时候指出，马克思主义虽然遭到机会主义者的歪曲，但是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发展不断地使它获得了新的证实和新的胜利。列宁当时正确地预言：“即将来临的历史时代，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列宁全集》十八卷，第五八四页。）现在，我们感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处在一个新的重大的历史关

头。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斗争，正重新尖锐地提到各国共产党人的议事日程上来。我们深信，不论经过怎样复杂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终归是要取得胜利的。

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全世界发出了勇敢而豪迈的召唤：“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颈上的一条锁链。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这个伟大的召唤，鼓舞着一切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者，鼓舞着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使他们充满对未来的信心，坚毅地冲破一切障碍，奋勇向前。现在，国际无产阶级队伍越来越壮大，各国人民觉悟越来越高，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思想越来越多地吸引着受苦受难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让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全世界工人阶级以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的革命潮流面前发抖吧！马克思列宁主义终将取得最后胜利，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终将取得最后胜利！

原载人民日报 1962-12-31

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

一九六三年第一期《红旗》杂志社论

被伟大的列宁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革命原理，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目前空前厉害地遭受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攻击、歪曲和糟蹋。

列宁主义的主要点，就在于继续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各种加剧了的矛盾，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伟大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继续十月革命的事业，又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这是列宁主义的胜利。

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32]。同样，列宁主义也是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列宁主义的每一次新证实和新胜利，也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连续不断的战斗——反对政治上的各种愚蠢思想和庸俗见解，反对机会主义等等”^[33]。

第二国际的老修正主义者往往借口所谓“经济发展中的新材料”来迷惑群众，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却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历史又在不同的条件下，用不同的形式重复着。现代修正主义者打着“列宁主义”的旗号，口口声声说“忠于列宁”，其实，他们恰恰也是在那里借口历史发展的某些“新材料”来迷惑人们，毁坏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攻击列宁主义的主要点，即攻击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

现代修正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一样，竭力掩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寿命不长的资本主义，并且简直把现代帝国主义描写成“和平的”“民主的”“超帝国主义”。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特别美化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他们把帝国主义国家和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国有化政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等，说成是什么“社会主义因素的生长”、什么“计划经济的实现”、什么“社会主义改造过程的开始”，等等。他们大谈其“逐渐的变化”、“革命与改良的统一”、“深深地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等等，但是，却绝口不谈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实现打碎和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革命，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

[32]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十五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十三页。

[33] 《给印涅萨·阿尔曼德》。《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第二四八页。

大家知道，列宁所努力阐明的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正是这个关于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革命、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因为没有这种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只能是一些空话，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依然只能是资本主义。列宁说得好，垄断资本主义，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只是证明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已经成熟，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和不可避免，“而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的言论”^[34]。

这里包含着关于我们时代的看法的根本分歧。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是由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35]的时候，是立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之上的，立足于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的基础之上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却像远避瘟疫一样地远避这个观点，歪曲十月革命的经验，讳言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人类解放的共同道路，他们实际上把我们的时代看成是“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时代。

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重视争取民主的斗争。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胜利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必须发动群众，全力领导和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在存在着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无产阶级应当运用那里已有的民主权利，争取更多的民主权利，来教育、发动和组织群众，展开反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和暴力制度的斗争。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应当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应当在高度集中的指导下实行广泛的民主，也就是说，要对敌人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实行人民民主，以保证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民主总是有阶级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是历史地对待民主问题的，从来不谈什么“抽象民主”，或者说什么“一般民主”。

列宁着重地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只有使自己的争取民主的斗争服从于自己的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总目标，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36]。他又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是民主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扩大，是使假民主变为真民主，是剥夺少数剥削者的民主权利而使绝大多数劳动者享受民主。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会排斥民主，这不过是一种忘记了阶级斗争的腐朽的“自由主义的错误论断”^[37]。现代修正主义者和老修正主义者一样，用一切借口抹煞民主的阶级性，抹煞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区别。他们宣扬所谓“一般民主”或“全民民主”，实际上只是崇拜资产阶级民主，也就是崇拜资产阶级专政。由此出发，他们尽量把革命和改良混为一谈，把自己的全部工作都限制在、约束在资产阶级专政所许可的范围之内。列宁早已批判过这种极端错误的观点，他说：“如果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世界上政权第一次由少数剥削者手里转到多数被剥削者手里的现象，能够在旧式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旧范围内发生，不需要最急剧的转变，不需要建

[34]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三〇页。

[35] 《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

[36] 参看《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四三页。

[37] 参看《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一七、二二四—二三一等页。

立新的民主形式和体现运用民主的新条件的新机关等等，那就荒谬绝伦了。”^[38] 列宁的这个论点，不但对十月革命说来是正确的，而且对后来世界上一系列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样是完全正确的。可是现代修正主义者所坚持的，却正是列宁所批判过的这种谬论。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现代修正主义者同样借口所谓“一般民主”，否认民主的阶级性，企图一步一步地达到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便于资本主义在某种形式下一步一步地复辟。

现代修正主义者在争取世界和平、争取和平共处的问题上，同样是把列宁主义庸俗化到了极点，完全糟蹋了列宁主义。

自从世界上有了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列宁本人起，都把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重大任务。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一直认为，应当经过和平的方法，不应当用武力的方法，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主张，不但经常见之于我们的言论，而且坚定地表现在我们的政策和行动中。全世界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和坚定的执行者。帝国主义者、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妄图抹煞这些事实，是枉费心机的。

当然，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政策，并没有取消世界上各种客观存在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各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内部各垄断集团之间的矛盾。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无论过去、现在或今后，要争得世界和平，要争得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都不能无视或者掩盖这些矛盾，像现代修正主义者这些政治庸人们所企图做的那样。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在内，一直认为，只要社会主义国家坚持自己的和平政策，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大家团结起来，一致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进行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从各方面束缚住帝国主义者的手足，缩小帝国主义者活动的地盘，那末，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是能够争得的，帝国主义者企图发动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加以制止的。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一直认为，争取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这同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阶级斗争、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是两件事，是两类问题，前者不能代替后者、不能否定后者。

资本主义国家内被压迫人民所进行的斗争，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斗争，有利于争取世界和平，有利于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现代修正主义者虚伪地以要求“和平”、要求“和平共处”为名，企图限制、削弱以至否定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是完全适合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愿望，而对于争取和平的斗争、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是极为有害的。

像老修正主义者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伎俩一样，现代修正主义者也以反对教条主

[38]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四四一页。

义为借口，攻击列宁主义。远在二十世纪初年，列宁就这样写过：各国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39]列宁在六十年前所描绘的这种景象，不是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出现了么？不同的，只是现代修正主义者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加不择手段。例如，有人无中生有地说，“教条主义者”主张“用战争来表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这不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极端无聊的诽谤，不是对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卑鄙的献媚，又是什么呢？

现代修正主义者还无中生有地胡说什么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叫做“教条主义者”）“否认”某种必要的妥协。我们愿意告诉现代修正主义者这些人，没有任何一个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会笼统地否认妥协。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同国内外的敌人进行过多次的妥协。我们同蒋介石反动派妥协过，我们在抗美援朝的斗争中还同美帝国主义者妥协过，如此等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来，问题是什么样的妥协，是什么性质的妥协，如何实现妥协。列宁说得非常对：“‘原则上’反对妥协，不论什么妥协都一概加以反对，这简直是难于当真看待的孩子气。”^[40]也正如列宁告诉我们的，作一个有利于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就应当善于辨别那一种妥协是允许的，有利于人民事业的；那一种妥协是不允许的，是叛卖性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按照列宁这样的指示，来辨别不同的妥协，赞成有利于人民事业的妥协，赞成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妥协，而反对叛卖性的妥协。事情很清楚，只有那些时而犯冒险主义、时而犯投降主义的人，他们的思想才真是托洛茨基主义，或者是变形的托洛茨基主义。

一九四六年四月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中曾经说过，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可能在若干问题上，包括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经过和平协商达成协议，实行必要的妥协。毛泽东同志认为：“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接着，毛泽东同志说：“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41]毛泽东同志这个分析是科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列宁主义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政策，一直就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点制订的。

但是，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总是企图用各种诽谤的办法，来中伤我们。应当知道，历史上没有任何革命党派不遭受敌人和他们的代理人的诽谤的。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就遭受过敌人的无数诽谤。“他们攻击布尔什维克，一直把布尔什维克说成是‘宗派主义者，教条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等等’”^[42]。现在，国际上一切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正在遭受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攻

[39] 《怎么办？》。《列宁全集》第五卷，第三一八页。

[40]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一九页。

[41]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一一八一页。

[42]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选举运动时期的策略》。《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一三五页。

击。很可惜，陶里亚蒂同志竟然也参加了这种攻击。

中国共产党被现代修正主义者加上了许多罪名。为什么？难道不就是因为 we 坚决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难道不就是因为 we 决不拿原则来讲交易，决不作理论上的让步？难道不就是因为 we 既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又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既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坚决反对“左”倾机会主义；既坚决反对投降主义，又坚决反对冒险主义；既坚决反对无原则的迁就主义，又坚决反对脱离群众的宗派主义；既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又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反动民族主义？

有些人努力找一切可能的机会，用可耻的歪曲，来攻击中国共产党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中国共产党的这一论点，是根据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这一个科学的论断而形成的，是根据中国长期的革命经验和历史上的一切革命经验而形成的。这一论点，同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是“泥足巨人”、“稻草人”、“外强中干的敌人”、“没有力量奈何我们的资本主义野兽”等等说法，是完全一致的。这些人经常吹嘘要按照列宁的准则办事，实际上，他们总是离开列宁的准则，离开列宁主义的精华，即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如何看待帝国主义的本质这个问题上，不是很清楚地暴露出他们远远地离开列宁主义的真面目么？那些肆意攻击“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论点的人，归根到底，不过是在替帝国主义帮腔，竭力向要求革命的人民宣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是反抗不得的，帝国主义制度是推翻不了的，任何革命都是要不得的，没有希望的。

美帝国主义和它的伙伴多年来向全世界人民进行这样的核讹诈：谁不服从我的统治，谁就要遭到毁灭。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在群众中关于核武器问题的各种煽动，完全是根据美帝国主义这种核讹诈的腔调进行的。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在内，一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坚决主张禁止和销毁核武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曾经多次建议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的无原子武器区；一向认为，世界各国人民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不能被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所吓倒；同时还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依靠的，是人民的正义的力量，自己的正义的政策，它根本不当在世界上玩弄核武器的赌博。现代修正主义者明明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这些正确主张，但是他们却硬要制造谎言，欺骗群众，说所谓“教条主义者”希望“把人类推到核战争的边缘”。现代修正主义者经常在讲什么“道德”。他们在制造这种谎言的时候，他们的“道德”又到那里去了呢？是不是连普通做人的道德也完全忘记了呢？

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歪曲和攻击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论点和主张，而故意散布一系列的谎言，其目的就在于不许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进行革命，进行解放斗争。在现代修正主义者看来，在存在着原子武器、核武器等军事技术的条件下，任何革命，以及任何支持革命的行为，都是违背“活命的逻辑”的。他们的所谓“活命的逻辑”，实际上是奴隶的逻辑，就是要各国人民磨灭掉革命的意志，捆绑住自己

的手足，驯服地当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奴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决反对这种奴隶的逻辑，主张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建设独立自主幸福的新生活。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任何人抵抗不了的。

现代修正主义者认为，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只要能够浑浑噩噩、糊里糊涂地活下去就行了，还要区分什么阶级，区分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区分什么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区分什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区分什么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区分什么革命和反革命等等呢？在他们看来，所有这些区分，都失去“时代”的意义了，都是“教条主义”的了。总之，他们在实际上把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全部列宁主义的学说，都抛弃得干干净净，并且认为，谁如果不同意他们的这种观点和做法，不按照他们的指挥棒去说话和行动，谁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谁就是“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谁就是“攻击”和平共处政策，谁就是“假革命”、“左倾冒险主义”，谁就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民族主义”，等等。

列宁曾经指斥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说他们“站在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似乎是全民的立场上提问题，就是公然嘲弄社会主义基本学说——阶级斗争学说”^[43]。现代修正主义者在他们的一系列的说教和政策中，这种表现更为突出。他们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认为，国际局势的变化和人类历史的命运，是由几个大国的“首脑人物”所主宰，由他们的明智或不明智所主宰，而不是决定于全世界各国人民群众的联合力量和联合斗争。有些人甚至一心想同帝国主义国家的首脑人物坐在一条船上，并且以此为“最大的光荣”，却不愿意同各国人民群众“风雨同舟”。这样的人竟然出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队伍中，岂不是一件怪事么？

列宁说过：“不相信群众，怕他们发挥创造性，怕他们发挥主动性，在他们的革命毅力面前发抖，而不能全心全意从各方面去支持他们，这就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最严重的罪过”^[44]。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罪过也正是这样。

列宁说：“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45]当修正主义者这样做的时候，总是夸耀自己的“聪明”，夸耀自己的“创造性”，夸耀自己的观点是“最新的理论”。其实，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所谓“最新理论”，不过是伯恩斯坦、考茨基等老修正主义的谬论在现代条件下的变种罢了！不过是资产阶级反动派愚弄人民的滥调的翻版罢了！

修正主义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是安慰奴隶的靡靡之音。修正主义的派别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社会支柱，是帝国主义的一

[43]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四三五页。

[44] 《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六一页。

[45]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十九页。

个重要社会支柱。世界上只要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帝国主义制度，修正主义的思潮总会在不同的时候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当第二国际在事实上理论上都宣告破产的时候，在一九一七年一月，列宁曾经预言：“我们相信几十年以后，在‘统一的’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一定会成长起来新的普列汉诺夫、谢德曼和新的和善的调和派考茨基之流……”^[46]。历史证实了列宁的预见。事实上，在列宁逝世以后不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发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次严重的斗争。这就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列宁主义者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左”倾冒险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同这个斗争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左”倾冒险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当前我们面临到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即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又一次严重的斗争。

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指出：“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中，列宁分析过的那些引起修正主义的一般原因今天依然存在。列宁说过：“享有特权的工人阶层的比较安定和文明的生活，使这些工人‘资产阶级化了’，他们从本国民族资本的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他们摆脱了破产的贫困的大众所遭受的灾难和痛苦，但也丧失了破产的贫困的大众所具有的革命情绪。”^[47]这种情形我们在目前不仅依然看到，而且显然还比过去更加触目。

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按照他们的需要，他们对付人民群众的策略，有时候用直接的暴力，有时候用某种改良的方法；有时候施用断然的威胁，有时候仿佛稍作表面上的让步。这两种方法或者互相交替使用，或者错综复杂地结合使用。一般情况下，无产阶级的力量愈强大，资产阶级也就往往会采取更狡猾的政策，以便在工人运动内部引起某种幻想，引起机会主义的反应。列宁说：“资产阶级策略上的转折，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间猖狂起来，往往把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弄成公开的分裂。”^[48]列宁这句话，对于国际工人运动永远有着警戒作用。

现在，在国际工人运动上空蒙罩着一片修正主义的乌云。现代修正主义者公然在进行分裂的活动。出现了现代修正主义，这当然是件坏事。但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出现既然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它已经客观存在着，那末，它公开地表现出来，使人们看到，认识清楚，懂得其害处，坏事就会变成好事。现代修正主义者因为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似乎在洋洋得意。但是，真理终将战胜谬误，马克思列宁主义终将战胜现代修正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者尽管喧嚣一时，胡说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了，但是最后取得胜利并且得到发展的，必将是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相符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现代修正主义。这是有过去的历史为证的。

[46] 《世界政治的转变》。《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七五页。

[47]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一九页。

[48] 《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三五〇页。

现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境况比过去好多了。有十亿人口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有强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国际队伍。有更加觉醒的世界人民。有蓬勃发展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帝国主义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了。社会主义革命有了欧亚两洲的丰富经验以后，又在拉丁美洲取得了极其重要极其辉煌的经验。这些经验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在思想上武装了世界各国革命的人民。这些经验都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对立方面。它们是客观历史事实，现代修正主义者企图加以篡改、歪曲，是完全徒劳的。

革命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在十九世纪末叶进行的国际性的思想斗争，是无产阶级伟大革命搏斗的序幕。今天以列宁主义为伟大旗帜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国际性的思想斗争，更会是无产阶级伟大革命运动和一切人民革命运动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发展的标志和信号。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洪流，是不可阻挡的。列宁在一九一三年《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即将来临的历史时代，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49] 在我们目前这个革命的伟大新时代，在这个社会主义各国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伟大大新时代，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解放运动汹涌澎湃的伟大新时代，在欧美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出现新觉醒的伟大新时代，可以预卜，也定会使列宁主义得到更大的胜利。

在伟大的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让我们高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旗帜，高举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的旗帜，高举中国和苏联的伟大友谊和团结的旗帜，高举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团结的旗帜，高举世界各国人民团结的旗帜，高举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旗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为保卫世界和平，为推进人类进步、正义的解放事业，而共同奋斗吧！

原载人民日报 1963-01-05

[49] 《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五八四页。

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德国统一社会党，从一月十五日到二十一日，举行了第六次代表大会。

现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千方百计地破坏全世界人民的团结，特别是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企图阻止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胜利发展。各国共产党人和全世界进步人类，对于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所受到的日益严重的损害，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迫切要求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

我们本来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举行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代表大会，能够遵循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作出自己的贡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处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西方前线，面对着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西德军国主义的威胁，理应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我们的共同敌人，而没有任何理由在那里重演亲痛仇快的事件。

不幸的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同我们愿望相反的情况。

德国统一社会党这次代表大会的显著特点是：一方面说了不少在兄弟党之间停止攻击、加强团结的话，另一方面却极其粗暴地继续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进一步扩大分歧，损害团结；一方面说了不少拥护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话，另一方面却明目张胆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铁托集团翻案，公然破坏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当应邀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在致词中引证和阐述莫斯科声明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判的时候，大会的执行主席一再阻止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继续致词。在这样的导演下，会场上发出一片喊叫声、吹口哨声和跺脚声。这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怪现象。中共代表致词以后，大会的执行主席居然提出抗议。他表示“最坚决地拒绝”中共代表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判，并且认为这是“违反各共产党和革命工人政党之间一切普遍的准则”的。接着，苏联《消息报》就攻击中共代表对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判，说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德国统一社会党的这次代表大会，在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提出了这样严重的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究竟要不要团结？究竟是要真团结，还是要假团结？究竟是要在什么基础上的团结，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还是在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纲领的基础上或者别的什么基础上“团结”？这就是说，究竟

是要消除分歧，增强团结，还是扩大分歧，制造分裂？

中国共产党人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全世界进步人类共同一致的愿望是：维护团结，反对分裂；要求真团结，反对假团结；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共同基础，反对破坏这个基础；要求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各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可靠保证，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胜利的可靠保证，是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可靠保证，是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这种团结的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这两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协议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只有严格遵守这两个文件，才能加强团结，才能有真正的团结；违背这两个文件，就只能损害团结，只能是假的团结。坚决维护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和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共同准则，同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言论和行动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是各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

中国共产党一贯为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努力。一九五六年，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在全世界掀起了一个反苏、反共的浪潮，并且在匈牙利策动了反革命暴乱。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一起，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了社会主义阵营。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共同努力，经过充分协商，制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确立了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共同准则。在这两次会议上，我们对某些不正确的、不利于团结的倾向进行了必要的斗争，也在某些问题上作了必要的妥协，对于会议达成一致的协议，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一九六一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出现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指名攻击另一个兄弟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严重事件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就表示了坚决的反对，并且提出了真诚的劝告。我们当时就指出，这种做法“是无助于团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的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中国共产党真诚地希望，有争执和分歧的兄弟党，将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互相尊重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遗憾的是，我们的这种努力，没有能够阻止苏阿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我们的好意，竟然遭到某些人一连串的责难。

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国共产党本着维护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准则和加强团结的愿望，积极支持一些兄弟党关于缓和关系、改善气氛的建议，并且写信给有关的兄弟党，正式提出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主张，以便通过同志式

的讨论和协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我们还指出，在召开会议之前，各兄弟党应当进行许多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在广播电台上和报刊上停止对另一个兄弟党的攻击，以便为上述会议的召开和它的成功创造有利的条件。

我们感到十分痛心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兄弟党所作的这种积极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有关兄弟党的相应的响应。相反地，那种违反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做法，特别是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指名攻击其他兄弟党的恶劣做法，却愈演愈烈。在最近一个时期召开的几个兄弟党代表大会上，都继续攻击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都攻击了中国共产党，在有的党的代表大会上还攻击了朝鲜劳动党。

这股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逆流，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达到新的高峰。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受到了多方面的庇护，而根据莫斯科声明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兄弟党代表，却受到完全非同志式的、粗野的对待。这种做法，是极其庸俗的，也是毫无用处的。在某些同志看来，坚持兄弟党一致协议的莫斯科声明的原则，是不能容许的，是非法的；而受到莫斯科声明谴责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反而是应当欢迎的，是合法的。他们一方面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大肆攻击，另一方面同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大讲团结；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剥夺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兄弟党代表发言的机会，另一方面向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喝采叫好。这种十分恶劣的情况，是在精心策划下进行的，这就更加增加了它的严重性。

我们在这里不能不严肃地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一个严重的关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的共同基础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正面临着被公开撕毁的严重的危险。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正遭受到严重的威胁。

在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如何对待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大问题；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同流合污。这个问题，关系到是要以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作为团结的基础，还是以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纲领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作为“团结”的基础。这个问题，关系到是要真正加强团结，还是口头上讲团结，实际上制造分裂。归根到底，这个问题关系到究竟是要严格遵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还是要撕毁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讲得十分清楚：“各国共产党一致谴责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使自己的国家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使它依赖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们的所谓‘援助’，从而使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斗争所取得的革命成果有失去的危险。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

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他们以非集团政策为借口，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积极斗争，仍然是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项必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对待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立场，正是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当采取和必须采取的立场。这个立场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立场是根本对立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根本反对莫斯科宣言，也根本反对莫斯科声明，并且拿自己的修正主义的纲领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共同纲领相对抗。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纲领中，铁托集团否定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对立，主张采取所谓“超集团”的立场；他们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他们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全民所有制说成是“国家资本主义”；他们还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所有这一切，都是同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水火不相容的。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以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的公报说：“全体会议认为，代表团执行了南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没有参加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没有签署这个会议的宣言是正确的。因为，这个宣言包含一些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观点相矛盾并为南共认为不正确的观点和估计。”

至于说到莫斯科声明，铁托集团对它的攻击就更加猖狂了。就是那个在德国统一社会党这次代表大会上受到有些人狂热欢迎的铁托集团代表弗拉霍维奇，在一九六一年二月南共联盟中央执委扩大会议上就说过：“莫斯科会议走了在各种观点和倾向间谋求妥协的路线，走了‘斗争策略规律千篇一律、死板划定、彼此雷同’的路线；这样，在统一的声明范围内，反映了世界上当代社会的客观发展的立场和观点，同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的看法（其最明显的例子是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立场），混在一起了。”南共联盟中央一九六一年二月会议通过的关于莫斯科声明的决议中说：“莫斯科声明不仅对社会主义事业，而且对巩固世界和平的努力，都只会引起有害的后果。”

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不是应当进行批判呢？这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本来是不成问题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原则性立场，也是得到其他兄弟党的赞同的。大家记得，一九五八年六月，赫鲁晓夫同志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曾经说过：“中国同志和其他兄弟党一样，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修正主义原则的批评，都是十分正确和十分深刻的”。

大家还记得，正是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上一次代表大会上，也就是一九五八年七月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应该不应该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分歧。赫鲁晓夫同志当时曾经说过：“南斯拉夫人士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所有其

他兄弟党的深刻的原则性的批评。各党在领导机构的决议中和党报的文章中，都采取了谴责这些观点的明确立场，十分注意于批判地分析这些观点。这是很对的。”

他还说：“南斯拉夫人士口头上说他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实际上只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做一件外衣，来迷惑轻信的人，使他们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革命的阶级斗争的道路；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想从工人阶级手中夺取最锐利的阶级武器。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他们是在帮助劳动人民的阶级敌人以换取贷款，帝国主义者因此夸奖他们那种‘独立的、超集团’的政策，反动势力在利用这种政策以图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阵营。”

他还说：“南斯拉夫领导人在他们的言论和正式文件中，赤裸裸地提出了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实质的修正主义观点。他们公然采取了分裂的、修正主义的路线，从而帮助了工人阶级的敌人反对共产主义和帮助了帝国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团结的勾当。”

他还说：“南斯拉夫领导集团的纲领，实际上不过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许许多多修正主义纲领的并不高明的翻版。因此，南斯拉夫领导人不是走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道路，而是走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和其他叛徒所开辟的道路。现在，他们实际上已经同卡尔·考茨基的后代——他的儿子本尼迪特合流了。”

我们不能理解，有些同志过去对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采取了正确的立场，为什么在现在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

有人说，这是因为“南斯拉夫领导人勾销了非常多的错误”。很可惜，铁托集团自己从来不承认他们有什么错误，更谈不上什么勾销错误。如果硬要说铁托集团“勾销了”错误，那才是真正的主观主义。我们愿意请那些为铁托集团辩护的人，听听铁托集团自己是怎么讲的吧！

早在一九五八年四月，铁托在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就说过：“如果任何方面有人期待我们放弃我们在国际问题和内部问题上的原则性的立场的话，这只是浪费时间”。

一九五九年，铁托集团的另一位领导人卡德尔，在他写的一本小册子里，说得更加露骨。他说：“现在看来，批评家们不断地向我们建议的，正是他们开始放弃的东西；而批评我们的，正是他们开始接受的东西。”

直到最近，一九六二年十二月，铁托从苏联回到贝尔格莱德的时候，一下火车就说：“讨论南斯拉夫现在将如何改变自己的政策，这纯粹是多余而可笑的事情。我们没有必要改变自己的政策。”过了几天之后，铁托又说：“我们在那里（指在苏联）还谈到，南斯拉夫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对外政策。”

铁托和卡德尔的话表明，铁托集团坚决否认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有任何改变。事实上，他们确实没有任何改变。那些故意要说什么铁托集团“勾销了非常多的错误”的人，在这里不是说谎又是什么呢？

近来，某些人大谈他们同铁托集团之间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是相吻合的、日益接近的。我们要问：既然铁托集团的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没有任何改变，那末，是不是说这些话的人自己，向铁托集团的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日益接近了呢？

特别令人惊异的是，某些人公然宣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是“死板的公式”。他们不允许任何一个兄弟党揭露和谴责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谁如果坚持谴责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谁就是“使用资本主义世界的野兽的法律”，就是“坚持野兽的道德”。请问，把八十一个兄弟党一致协议的莫斯科声明，说成是什么“死板的公式”，说成是什么“资本主义世界的野兽的法律”，究竟目的何在呢？是不是要撕毁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呢？如果根据莫斯科声明谴责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竟然成为“野兽的道德”，那末，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恨不得“咬死”一个兄弟党、兄弟国家，又算是什么道德呢？

我们还听到陶里亚蒂同志竟然这样说：“我们和其他一些人对南斯拉夫同志们所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从而纠正了一九六〇年的决议（按：这是指八十一个兄弟党一致协议的莫斯科声明），因为它在这一点上是不正确的。”我们要问，对于各国兄弟党一致协议的莫斯科声明，陶里亚蒂同志究竟有什么权利宣布它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是不正确的呢？究竟有什么权利来随便“纠正”、随便撕毁庄严的国际协议呢？如果一个党或一些党可以随便“纠正”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达成的协议，那末，还有什么应该共同遵守的原则呢？

很明显，某些人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致通过的庄严的文件，采取这样轻蔑的态度，对于自己签了字的文件，自己不遵守，还要辱骂那些遵守的人，这完全是背信弃义。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指出，那些热中于给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企图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打开缺口，进而全部撕毁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如果他们的这种企图得逞，那就等于说，过去几年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判，都是错误的，而叛徒铁托集团反而是正确的；那就等于说，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是错误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纲领反而是正确的；那就等于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已经过时，现代修正主义已经不能反对，更说不上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那就等于说，大家都应当跟在铁托集团的后面，“同卡尔·考茨基的后代——他的儿子本尼迪特合流了”。

如果这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就要全部改变，就要以修正主义的投降路线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如果这样，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还有什么团结的共同基础呢？这不是存心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分裂吗？

现在，摆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面前的迫切任务，就是保卫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就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我们坚决拥护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基础上的团结，坚决反对在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纲领或者别的什么东西的基础上的“团结”。我

们中国共产党，将同所有的兄弟党一起，为此进行不懈的努力。

无产阶级的事业从来都是国际性的。各国共产党人为了争取这个共同事业的胜利，必须联合起来，进行共同的斗争。没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联合和团结，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事业，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和巩固胜利的。

维护和加强这种团结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只能是遵循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

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关于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实行联合的原则，互相支持、互相援助的原则，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则，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

是不是认真遵守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是考验每一个共产党人是否真正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首要标志。

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这两个由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协议的国际文件，对于各国兄弟党都具有约束力。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只有遵守的义务，而绝对没有破坏的权利。任何一个党或一些党，都没有权利去改变它，都没有权利宣布它无效。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任何一个兄弟党，不论它的地位多么重要，它的作用多么大，它的决议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只能对它自己一个党具有约束力。按照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准则，不能容许把一个党的纲领、决议、方针、政策，强加于其他兄弟党；也不能容许把一个党的领导人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讲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自相矛盾的话，当做圣旨，要其他兄弟党必须服从；更不能容许根据一个党或一些党的意志，任意地把这个或那个兄弟党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一脚踢出去，或者任意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硬拉进来。

由于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和变化迅速，由于各个兄弟党所处的情况很不相同，在各兄弟党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或那个问题上发生不同的意见，是难以避免的。问题在于，当兄弟党之间发生分歧的时候，应当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关于兄弟党关系的准则，通过内部的平等的协商，消除分歧，达成一致；而绝对不应当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也不应当利用报刊和其他宣传工具对兄弟党进行公开的攻击，更不应当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其他兄弟党。很明显，如果今天公开攻击这个兄弟党，明天又公开攻击另一个兄弟党，那还有什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可言呢？

我们认为，一方面讲要停止攻击，另一方面又在继续进行攻击，这绝不是一个诚实的共产党人应当采取的态度。正如出席德国统一社会党这次代表大会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团长所指出的：“在这个并非兄弟党国际会议的代表大会上，一方面谈论停止对意见分歧的公开争论和加强团结，而另一方面却又提出了兄弟党之间意见分歧的问题，特别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片面的批评。我们认为，这不能看作是友好的同志式的态度，这种态度无助于我们所一致主张的团结一致。”

说一千句团结的空话，不如做一件有利于团结的好事。现在是悬崖勒马的时候

了！晚做总比不做好。我们诚挚地期望，首先发起攻击的兄弟党言行一致，采取主动，回到内部平等协商的轨道上来，回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的轨道上来。

中国共产党深刻地理解自己在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方面所应当担负的责任。我们将一如既往，不遗余力地在这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共产党曾经多次主张、现在仍然主张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大家心平气和地坐下来，经过充分的同志式的讨论，协调彼此的观点，消除分歧，在新的基础上加强团结。我们愿意同所有兄弟党一起，采取一切有利于和缓关系、加强团结的步骤，以便改善气氛，为召开兄弟党会议准备必要的条件。

今天，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正在疯狂地进行挣扎，妄想阻挡和扭转时代的潮流，妄想阻止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妄想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大敌当前，我们共产党人应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更加坚定地进行共同的战斗。任何不利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的言论和行动，任何不利于世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言论和行动，任何不利于共产党人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在全世界共产党人中间是通不过的，在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中间是通不过的，在所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中间是通不过的，在一切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的人们中间是通不过的。

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希望。我们越是团结，全世界人民就越是高兴，越是受到鼓舞。我们越是团结，就越是能够增强一切革命人民的胜利信心，越是能够有力地打击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

我们不应该辜负全世界人民的期待。我们一定要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我们一定要真团结，反对假团结。让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原载人民日报 1963-01-27

分歧从何而来？

——答多列士等同志

在当前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逆流中，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同志和某些法共同志，扮演着突出的角色。

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下旬起，多列士等同志集中地发表了大量的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言论，还公布了大批有关的内部文件。其中主要的有：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多列士在法共中央全会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居约在法共中央全会关于国际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团结问题的情况报告；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共中央全会关于国际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团结问题的决议；

一九六三年一月九日，居约为法共中央机关报《人道报》写的社论；

同日，法共中央机关刊物《新法兰西》周刊发表的题为《战争、和平和教条主义》的文章；

一九六三年一月五日——十六日，《人道报》接连刊载的十篇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文章；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新法兰西》周刊刊登的题为《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的文章；

一九六三年一月，法共中央出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收集了三年来法共某些领导人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十五个文件，其中包括多列士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兄弟党莫斯科会议上的发言和他后来向法共中央全会所作的关于这次兄弟党会议的报告）；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五日，《人道报》刊载的居约写的文章。

这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言论的主要内容，本报已经在二月二十四日发表。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到，多列士等同志在最近的反华大合唱中，在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竞赛中，特别卖劲，超过了许多攻击我们的其他兄弟党同志。

多列士等同志除了攻击中国共产党以外，还恶毒地攻击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指责了朝鲜、缅甸、马来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日本等兄弟党，甚至还攻击了正在英勇地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诬蔑说，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什么“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立场，“已经在特别是亚洲的某些共产

党内和在有些民族主义运动内得到了一些响应”，“滋长了这些党和运动中有时存在的‘左倾’主义”，等等。某些法共同志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事业所采取的这种态度，实在是令人吃惊的；他们在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方面，实在是走得太远了。

中国共产党早就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必须而且应当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原则，在自己队伍的内部，通过平等的同志式的充分讨论和协商，求得解决。我们没有首先发动对任何兄弟党的公开批评，也没有首先挑起公开的争论。但是，谁要是利用我们这种以团结对敌的利益为重的正确立场，任意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以为不会受到应有的回击，那就打错了主意。

我们愿意告诉那些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同志们：兄弟党的关系是平等的，既然你们公开地大肆攻击了中国共产党，那么你们就没有权利要求我们不作公开的答复。同样的道理，既然你们公开地恶毒攻击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那么阿尔巴尼亚同志就完全有平等的权利公开地答复你们。现在，有些兄弟党同志，一面讲要停止公开论战，一面却在继续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进行攻击。这种两面态度，实际上是只许你们攻击别人，而不许别人回答你们的攻击。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中国古语说：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觉得，现在有必要郑重地提醒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注意这一点。

多列士等同志在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时候，讲到关于我们时代的性质、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等问题。但是，任何人只要仔细看一看，就会发现，他们只是重复别人早已讲过的论点。对于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论点，在本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以及红旗杂志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这四篇文章中，已经作了回答，没有必要在这里再来重复地讨论。

值得指出的是，多列士等同志在他们的讲话、报告和文章中，用了大量篇幅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混淆视听，企图把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制造分裂的责任，强加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他们喋喋不休地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特别是中国同志们造成的”，分歧的由来是因为中国同志“实质上还没有接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论点”。他们还说什么离开第一次和第二次兄弟党莫斯科会议越远，中国同志的立场“离开他们自己赞同并投票同意的论点也就越远”。

既然多列士等同志提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歧的责任问题，那么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吧。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歧究竟从何而来呢？

多列士等同志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没有接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论点而产生的。多列士等同志这种说法的本身，是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的。根据这两个共同文件，兄弟党的相互关系是平等的、独立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所有兄弟党接受某一个党的论点。

任何一个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不能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对别的兄弟党都没有约束力。多列士等同志甘心情愿接受另一个党的论点和决议，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至于中国共产党，我们一贯认为，对我们和所有兄弟党具有约束力的共同行动准则，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能是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共同文件，而不是任何一个兄弟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或者任何别的什么东西。

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有它的积极方面，也有它的消极方面。对于它的积极方面，我们表示过支持。对于它的消极方面，即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某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我们历来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们在中苏两党会谈中，在兄弟党会议上，都没有隐蔽自己的观点，曾经多次明确地讲过我们的意见。但是，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从来没有公开地讨论这个问题，在这篇文章里也不准备讨论这个问题。

事实很清楚，近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的产生，完全是由于某些兄弟党同志违反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协议的莫斯科宣言。

大家知道，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经过同志式的协商和集体努力，消除了兄弟党之间的某些分歧，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前的重大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制定了莫斯科宣言。这个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所有的兄弟党都宣布接受这个纲领。

只要所有的兄弟党在实践中严格遵守而不违反这个宣言，那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就会得到加强，我们的共同斗争就会得到发展。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以后，在一段时间里，在反对共同敌人、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斗争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战斗是比较顺利的，也是有成效的。

但是，由于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屡次企图把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置于各国兄弟党的共同纲领莫斯科宣言之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特别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戴维营会谈前后，某些兄弟党同志，在关于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重大问题上，发表了一系列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违反莫斯科宣言的错误观点。

他们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的科学论断，不断宣扬在帝国主义制度和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还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存在的条件下，就“已经有现实可能最后地、永远地把战争从社会生活中排除出去”，就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他们当时还预言，一九六〇年“将会作为开始实现人类关于没有武器和军队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的宏愿的一年而载入史册。”

他们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依靠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运动、国际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群众运动的联合斗争来防止世界战争的论点，把维护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大国首脑人物的“明智”上，认为目前时代的历史命运实际上是由个

别“大人物”和这些大人物的“明智”决定的，认为大国首脑人物的会晤能够决定和改变历史的进程。他们说：“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只有掌握大权的各国政府首脑才有能力解决最复杂的国际问题。”他们把戴维营会谈说成是什么国际关系中的“新阶段”、“新纪元”，甚至说成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

他们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美帝国主义“成为全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成为人民群众的最凶恶的敌人”的论断，特别热中于颂扬美帝国主义的首脑人物艾森豪威尔，说他“真诚希望和平”，“真正希望消除‘冷战’状态”，“也像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

他们违反莫斯科宣言所指出的关于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把和平共处仅仅解释为意识形态的斗争和经济竞赛。他们说：“必须努力使两种制度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变成只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变成和平竞赛——或者用资本家更容易理解的语言说——竞争。”他们甚至把两种社会制度不同国家的和平共处，引伸到压迫阶级同被压迫阶级、压迫民族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方面去，说什么和平共处是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完全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实际上借口和平共处而抹煞反对帝国主义和支持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政治斗争，抹煞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

他们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美帝国主义力图“以新的形式给已经解放了的人民重新套上殖民枷锁”的论点，鼓吹帝国主义能够帮助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达到空前的高涨，实际上否定掠夺不发达国家是帝国主义的本性。他们说：“全面彻底裁军还会创造崭新的条件，以援助一些目前在经济上还不发达、而需要比较发达的国家给予援助的国家。即使把由于大国停止军事开支而抽出来的资金一小部分用来帮助这些国家，也就能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开创一个崭新的纪元。”

他们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和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是当代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的论点，把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对立起来。他们虽然有的时候也说应该支持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但是又反复强调“在现今条件下爆发的战争必然会成为世界大战”，“一个小小的火星也能够引起世界大战”，反复强调要“反对一切种类的战争”。这实际上是对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不加区别，借口防止世界大战，反对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反对一切正义战争。

他们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存在着和平的和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的论点，关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论点，而片面地强调和平过渡的“越来越大的现实可能性”，说什么和平过渡“对于一系列国家来说，已经是现实的前景”。

从上述这一系列的错误论点中，人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帝国主义所固有的各种不可克服的矛盾已经不复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莫斯科宣言应该废除了。

散布这些错误论点的兄弟党同志，不论用什么样的借口，什么“外交辞令”呀，什么“灵活性”呀，都不能掩饰他们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的原则，都不能推卸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分歧的责任。

近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就是这样引起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又是怎样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的呢？

多列士等同志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公开化的起点，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六〇年夏天以各种文字出版《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兄弟党内部分歧的公开化，并不是在一九六〇年夏天，而是早在一九五九年九月戴维营会谈前夕，具体地说，在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就开始了。在这一天，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顾中国方面多次说明真相和劝告，迫不及待地通过自己的国家通讯社对中印边界事件发表了一项声明。这个声明不问是非曲直，对中印边境冲突表示“遗憾”，实际上指责中国的正确立场。他们还说什么这是“可悲的”、“愚蠢的”。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到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挑衅的时候，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但不指责发动武装挑衅的反动派，反而指责自己的兄弟国家，这在历史上倒真是第一次。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立刻觉察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的分歧，并且利用了那个错误的声明进行恶毒的挑拨离间。资产阶级的宣传机器当时大肆宣传说，这个声明是“飞往中国的外交火箭”，声明的“口气有点像一个严峻的父亲冷酷地教训孩子放规矩点”。

在戴维营会谈以后，有些同志竟然冲昏了头脑，越来越放肆地对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公开攻击。他们公然诬蔑中国共产党企图“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像公鸡好打架那样热中于战争”。他们还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诬蔑中国共产党在国家领导方面实行“冒险主义”的政策。

这些同志在长时间内，热中于宣传他们的错误观点，攻击中国共产党，把莫斯科宣言完全置诸脑后。这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造成了混乱，使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有迷失方向的危险。多列士同志想必记得，当时法共机关报《人道报》竟然大肆宣扬“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找到了共同语言，和平共处的语言”、“美国发生了转折”。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莫斯科宣言，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使全世界人民了解我们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在纪念列宁九十诞辰的时候，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在那个时候，虽然我们已经被别人攻击了半年多，虽然我们在文章中讨论到那些违背莫斯科宣言的错误论点，但是，我们还是以团结为重，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

多列士等同志把我们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分歧公开化的起点，是把事实完全弄颠倒了。

一九六〇年五月，美国 U—2 间谍飞机侵犯苏联，四国首脑巴黎会议流产，我们本来希望那些曾经大肆宣扬所谓戴维营精神的同志，能够从中吸取教训，加强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但是，同我们的希望相反，在一九六〇年六月初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北京会议上，有些兄弟党同志竟然不赞成谴责艾森豪威尔，并且散布了许多错误观点，还反对中国同志的正确观点。特别严重的是一九六〇年六月下旬，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兄弟党会谈中，有人竟然挥舞指挥棒，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大举围攻中国共产党。这种做法，粗暴地破坏了兄弟党协商解决共同问题的原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

多列士等同志说，在布加勒斯特会谈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对苏共进行攻击”。但是，参加这次会谈的同志们都很清楚，在这次会谈中，阿尔巴尼亚同志并没有攻击什么人，只是坚持了自己的见解，没有服从指挥棒，不同意对中国的攻击。在那些把兄弟党关系看成是“父子党”关系的人的眼里，一个小小的阿尔巴尼亚竟敢违抗他们的指挥棒，真是胆大妄为，大逆不道。他们从此对阿尔巴尼亚同志怀恨在心，采取种种恶劣手段，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布加勒斯特会谈以后，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迫不及待地采取了一系列的严重步骤，施加经济的和政治的压力，以至不顾国际惯例，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兄弟国家间的协定和合同。这种协定和合同不是几个，或者几十个，而是几百个。他们这种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的恶劣做法，完全背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完全背弃了莫斯科宣言规定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这些同志对自己的这种大国沙文主义错误不但不进行自我批评，反而责备中国共产党犯了什么“单干”、“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民族共产主义”等等错误，这难道是合乎共产主义道德的吗？多列士等同志是明白事情的真相的，但是他们不敢批评那些真正犯了把政治、思想争论发展到破坏国家关系的错误的人，反而指责中国同志“将国家问题与政治、思想问题混淆在一起”，这种不分是非、颠倒黑白的态度，才是真正可悲的。

从上述的这些事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加剧，完全是某些兄弟党同志在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上越来越严重地违反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共同路线、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准则的结果。

多列士等同志不顾事实、颠倒是非的做法，还突出地表现在他歪曲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的真实情况，攻击中国共产党“不赞同国际工人运动的路线”，给会议“造成困难的局面”。

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不愿意在这里谈到这次兄弟党内部会议的详细情况，我们准备在适当时机和适当场合说明真相，弄清是非。但是，必须指出，中国共产党恰恰是一九六〇年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创议者。我们努力促成这次兄弟党会议的召开。在会议期间，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反对了某些兄弟党同志的错误观点，同时在某些问题上作了必要的妥协。我们同其他兄弟党共同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使会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达成了一致的协议，发表了莫斯科声明。仅仅这些事实，就足以拆穿多列士等同志的谎言。

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以后，各国兄弟党应根据一致协议的声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集中力量，共同对敌。一九六一年一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将如维护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一样，维护这次会议的声明，并且坚决地为实现这个文件所规定的共同任务而努力奋斗。”两年多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忠实地执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协议，并且为维护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但是，多列士等同志竟然攻击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以后，“继续就各党共同拟定的政策的主要方面表示不同意见”，并且说中国同志的“立场对整个运动的利益有害”。

在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以后，究竟是谁在一系列问题上越来越严重地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呢？

在莫斯科会议以后不久，苏阿关系进一步恶化了。多列士同志企图把苏阿关系恶化的责任，推到中国共产党方面。他竟然指责中国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来引导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人比较正确地了解他们的义务”。

事实是，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独立、平等、协商一致的准则，来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对于苏阿关系也一直坚持这种主张。我们曾经恳切地希望苏阿关系能够得到改善，并且为此尽了自己的国际主义责任。我们曾经多次劝告苏联同志，在改善苏阿关系方面，大党大国应该采取主动，应该通过内部平等协商来消除分歧，即使某些分歧一时解决不了，也应该耐心等待，而不应该采取可能使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任何步骤。中共中央曾经为此写信给苏共中央，希望通过协商途径解决苏阿关系问题。

但是，我们的这些真诚努力，并没有受到重视。从发罗那海军基地撤退舰队，从阿尔巴尼亚撤退专家，断绝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干涉阿尔巴尼亚内政等等一系列的事件发生了。

对于这些粗暴违反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行为，中国共产党感到痛心。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又一次向苏联同志提出改善苏阿关系的同志式的忠告。但是，出乎我们的意料，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公开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严重事件，开创了在一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攻击另一个兄弟党的恶劣先例。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为了维护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为了共同对敌的利益，明确地表示不

同意这种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做法。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这种严正态度，竟然受到指责。有的同志甚至说，“如果中国同志们愿意出力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各兄弟党的关系正常化，那么，未必有谁会比中国共产党更好地促进这一问题的解决”。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是说，中国同志要对苏阿关系的恶化负责，那是故意推卸责任，诿过于人。如果这是希望中国同志促进苏阿关系的改善，那么，我们愿意指出，那些同志完全不顾我们的多次劝告，坚持恶化苏阿关系，甚至公开号召改变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领导，这就在实际上剥夺了其他兄弟党对苏阿关系的改善进行有效努力的可能性。这次大会以后，这些同志悍然断绝了苏联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这难道不是有力地证明，他们根本没有改善苏阿关系的愿望吗？

多列士等同志责备中国报纸“散布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错误论点”。必须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来是反对把我们内部的分歧公开的，但是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却坚持要把分歧公开，并且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就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在苏阿分歧已经公开化的情况下，我们把争论双方的某些材料，同时加以发表，以便中国人民能够了解事情的真相。难道可以这样认为，似乎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可以任意地一而再、再而三地指责另一个兄弟党，说它的领导是反列宁主义，是要博得享受帝国主义施舍三十枚银币的权利，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等等，却不容许这个兄弟党为自己辩护，也不容许其他兄弟党同时发表争论双方的有关材料吗？那些自命为“完全正确”的人，自己连篇累牍地发表了攻击阿尔巴尼亚的文章，但是，对阿尔巴尼亚同志答复他们的文章，却害怕得要死，自己不敢发表，也害怕别人发表，这只能暴露他们的理亏心虚。

多列士等同志还指责中国共产党“把共产党人之间可能存在或出现的分歧拿到群众运动中去”，特别是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上，“把争取民族解放斗争同争取裁军及和平的斗争对立起来”。

事实恰恰相反，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国际民主组织中去的不是中国同志，而是某些兄弟党同志。他们屡次企图把自己的同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相对立的错误路线强加于国际民主组织。他们把民族解放斗争同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对立起来，不顾这些国际民主组织所代表的广大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广泛要求，硬要把“一切为了裁军”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并且大肆贩卖在帝国主义和剥削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就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的错误思想。这就在这些组织中不断地引起了尖锐的争论。同样的争论也出现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有人要求生活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刺刀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等待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接受全面彻底裁军，等待他们放弃使用武力来镇压民族独立运动，等待他们用裁军节省下来的钱，援助不发达国家。这些人实际上是要求在这一切实现之前，一切被压迫民族不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不要对殖民统

治者的武装镇压进行反抗，否则据说就要引起世界大战，造成亿万人的死亡。正是根据这种荒谬的“理论”，他们竟然辱骂民族独立运动是“死尸运动”。正是这些人，而不是中国同志，违反了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境冲突，是最近国际局势中的两大事件。中国共产党在这两个事件中采取的立场，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完全符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但是，多列士等同志竟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恶毒的攻击。

在加勒比海危机问题上，多列士等同志指责中国要“促使苏美之间发生战争，从而把世界推入热核灾难”。事实是不是像多列士等同志所说的那样呢？在加勒比海危机中，中国人民究竟做了些什么呢？中国人民坚决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古巴人民维护独立和主权的五项要求，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为了无原则的妥协而把“国际视察”强加在古巴身上。我们这样做，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呢？法国共产党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公报，不也是号召“有力地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好战挑衅行动”吗？同日的《人道报》不也是谴责美国“对古巴长期以来准备的赤裸裸的侵略”，呼吁各国人民“加强他们同古巴的团结，加强他们的斗争”吗？请问多列士同志，你们这样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是不是也是要把世界推入热核灾难中去呢？为什么你们过去这样做是对的，而中国坚持这样做就犯了罪呢？说穿了，那是因为你们跟着指挥棒转，后来突然改变了立场，大讲对美国的侵略行为必须作“理智的让步”、“明智的妥协”了。正是因为这样，你们就掉转枪口，把斗争的锋芒，从美国强盗转向坚持正确立场的兄弟党了。

更恶劣的是，某些法共同志竟然诬蔑所有坚决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人们，辱骂他们是所谓“革命词句的英雄”，说他们“说空话”，说他们“对各国人民对于古巴人的英勇正当感到的敬佩进行投机”。某些法共同志还说什么“在对付氢弹方面，单单英勇是不够的”；说什么“不要把古巴人的胸膛作为牺牲品放到革命词句的祭坛上去”。这是什么话？！这是在指责谁呢？如果是指责英勇的古巴人民，那简直是可耻。如果是指责反对美国强盗、支持古巴的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那岂不暴露你们自己的所谓支持古巴人民是完全骗人的吗？在多列士和某些法共同志看来，没有氢弹的人支持古巴，都是“说空话”、“投机”；而没有氢弹的古巴人民，只能屈从有氢弹的国家，出卖国家主权，接受“国际视察”，被放到帝国主义的侵略祭坛上去。这是十足的强权政治论，这是十足的核武器拜物教，这绝不是共产党人应该说的话。

我们愿意告诉多列士等同志，全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在加勒比海危机问题上犯了错误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因为你们替挑起加勒比海危机的肯尼迪政府解脱，硬要人们相信连肯尼迪政府也否认的所谓美国不入侵古巴的保证；因为你们替那些既犯冒险主义、又犯投降主义错误的同志辩护，替那种侵犯一个兄弟国家的主权的行为辩护；因为你们不是把反对帝国主义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放在第一位。

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多列士等同志说中国对解决中印边界纠纷缺乏“最少的诚

意”。这种指责是荒谬的。

中国政府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和多年来所作的努力，我们已经说过很多。目前中印边境局势，由于印度军队发动的大规模进攻受到严重挫败，由于中国军队在自卫反击胜利之后主动停火、主动后撤，已经开始缓和下来。三年多来，中印边界纠纷的过程有力地证明，中国对印度尼赫鲁政府的反动政策进行必要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

令人惊异的是，有些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在尼赫鲁政府向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挑衅和进攻的时候，竟然背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采取所谓“中立”的立场，实际上不但在政治上支持尼赫鲁政府的反华政策，而且以军事物资供应尼赫鲁政府。多列士等同志对于这种错误的做法，不但不予谴责，反而称之为“明智的政策”。你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究竟丢到哪里去了呢？

多列士同志一再指责中国对印度的政策有利于帝国主义。他早在一九六〇年就说，中国共产党“给艾森豪威尔提供机会，使他在印度得到在其他情况下所未能得到的欢迎”。直到现在，某些法共同志还不断地重复这种指责。

在这里，我们无需多说，稍有政治眼光的人都看到，尼赫鲁政府挑起中印边境冲突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为了取得更多的美援。我们只愿意提醒多列士同志和某些法共同志，难道你们忘记了，艾森豪威尔当时不仅在印度受到欢迎，并且在法国也受到热烈欢迎吗？由于一九五九年九月间艾森豪威尔访问巴黎的时候，巴黎地区法共的一部分市议员和省议员没有出席欢迎艾森豪威尔的招待会，多列士同志就在法共中央全会上提出严厉的批评。他说：“我们认为没有全部出席在市府大厦举行的欢迎艾森豪威尔的招待会是一个错误，虽然政治局曾作出决定，要求巴黎地区的市议员和省议员都去出席。这是一种错误的态度。我一回来（按：当时多列士同志刚从外国回来）就曾提出了批评。我要重说一下，政治局曾作出正确的决定，但它没有保证执行。”（见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人道报》）请问多列士同志，如果说尼赫鲁欢迎艾森豪威尔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过错，那么多列士同志要巴黎地区法共的全体市议员和省议员都去欢迎艾森豪威尔，又是由于谁的过错呢？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看，艾森豪威尔受到尼赫鲁的欢迎，一点也值得大惊小怪；而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这样热中于欢迎美帝国主义头子，又这样严厉批评那些不去欢迎的同志，倒是不能不使人感到十分惊异的。

在加勒比海危机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上，又一次大大地暴露了那些自称“完全正确”的人所执行的路线和政策，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可是，他们仍然没有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痛改前非，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回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轨道上来。相反的，他们更加老羞成怒，沿着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掀起了又一次规模更大的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逆流，来转移人们的视线，掩饰自己的错误。

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到一九六三年一月，欧洲几个兄弟党先后举行了自己的代

表大会。在这些大会上，经过精心策划，出现了大规模的、系统的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恶劣情况。特别是到了最近举行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这股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逆流达到了新的高峰。在这次大会上，有些同志一方面说要停止攻击，另一方面又继续粗暴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并且公然为叛徒铁托集团翻案。这些同志采取的两面手法，能够骗得了人吗？显然不能。这种两面手法，只能被认为，他们对于停止争论、恢复团结，并不是真心诚意的。

特别应当指出，如何对待铁托集团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原则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是怎样解释莫斯科声明的问题，而是保卫还是撕毁莫斯科声明的问题；并不是对待一个兄弟党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而是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并不是如何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的问题，而是揭露和批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莫斯科声明，决不容许任意篡改和撕毁各国兄弟党的共同协议，决不容许把叛徒拉进我们的队伍中来，决不会同意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做交易，决不会同意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做买卖。

从上面所说的种种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不是我们，而是某些兄弟党同志，在一系列问题上越来越严重地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不是我们，而是某些兄弟党同志，没有根据这两个共同文件来消除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反而加剧这种分歧。不是我们，而是某些兄弟党同志，进一步地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对兄弟党进行越来越粗暴的公开指名的攻击。不是我们，而是某些兄弟党同志，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相对抗，使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越来越严重的分裂的危险。

从上面所说的种种事实，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多列士和某些法共同志，对待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严肃的辩论，采取了惊人的不负责任的态度。他们采取欺骗手段，实行封锁政策，隐瞒真相，歪曲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以便于肆无忌惮地攻击中国共产党。这决不是进行辩论的正当做法，也不是对法共党员和法国工人阶级负责的态度。如果多列士等同志敢于面对事实，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他们就应当公布中国共产党阐述自己观点的材料，包括我们最近发表的有关文章，让全体法国共产党员和法国工人阶级知道真相，让他们自己来判断是非。多列士等同志，我们已经把你们指责我们的言论公布了。你们也能这样做吗？你们有这样的政治家风度吗？你们有这样的胆量吗？

多列士同志和某些法共同志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程度，的确是十分惊人的。但是，他们自己却一贯自命为什么“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好吧，我们就来看一看这种“创造性”吧。

我们看到，多列士等同志在一九五九年以前，曾经正确地指出过美帝国主义是侵略势力的魁首，谴责过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可是，在戴维营会谈前夕，

有人说艾森豪威尔希望“消除国与国关系中的紧张局势”；于是，多列士等同志就争先恐后地为艾森豪威尔叫好，决定要法共议员欢迎这位“和平使者”。这是跟着指挥棒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我们还看到，一九五九年九月，当戴高乐发表一个根本否认阿尔及利亚独立和主权的所谓“自决”的声明之后，法共中央政治局曾发表声明，正确地揭露这“纯粹是骗人的阴谋”。多列士同志自己当时也说这“只是一个政治伎俩”。可是，一个多月以后，一个外国同志说，戴高乐的声明有“重要作用”，多列士同志就马上严厉地批评法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错误的估计”，说原来的声明发表得“太匆促、急忙”。这又是跟着指挥棒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我们还看到，多列士等同志曾经正确地谴责南斯拉夫铁托集团的修正主义纲领，说铁托集团“接受了美国资本家的津贴”，这些“资本家给他们津贴，显然不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最近，有人说要“帮助”铁托集团“在一切兄弟党的大家庭中占有应有的地位”；于是，多列士等同志也就大讲“帮助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重新回到共产主义大家庭”。这又是跟着指挥棒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我们还看到，一年多以前，当中国共产党反对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攻击另一个兄弟党的时候，有人指责我们的这种立场说，这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多列士同志就跟着说，中国同志采取这种态度是“没有道理的”，是“不正确的”。最近，有人一面说应该停止公开争论，一面又继续进行攻击；于是，某些法共同志也跟着这样做，并且说这是“明智的、列宁主义的”。这还是跟着指挥棒转。

类似的事例，举不胜举。这样无条件地跟着指挥棒转，绝不能认为是兄弟党之间应有的独立的、平等的正常关系，而是封建家长制度的极不正常的关系。看来某些同志似乎认为，可以完全不顾本国无产阶级和本国人民的利益，也可以完全不顾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只要跟着别人走就行了。究竟向东对，还是向西对，究竟朝前对，还是往后对，一切一切，可以一概不管，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在这里，多的是鹦鹉学舌的本领，少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这样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

多列士和某些法共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恶毒攻击和诽谤，不管怎样连篇累牍，丝毫无损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他们的这些做法，是同各国共产党人要求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愿望背道而驰的，也是同法国工人阶级和法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不相符合的。

法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有着悠久的历史的光荣的革命传统。法国工人阶级以巴黎公社的英勇尝试，给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光辉的榜样。法国工人阶级的杰出战士和天才歌手创作的无产阶级的不朽战歌《国际歌》，是鼓舞全世界人民争取解放和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嘹亮号角。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法国共产党，集合了法国人民中众多的优秀儿女，他们同法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一起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中，法国人民在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发扬了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传统，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战后时期，在保卫世界和平、维护民主权利、改善劳动人民生活条件和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中，法国共产党人起了重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法国共产党和法国工人阶级，从来就抱着极大的尊敬。

多列士等同志一再强调要中国同志改正错误。但是，真正需要改正错误的不是我们，而是多列士等同志。尽管我们在这篇文章里不得不同多列士同志和某些法共同志进行辩论，我们仍然诚恳地希望他们能够尊重法国共产党的历史，珍惜自己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历史。我们希望他们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利益为重，改变那种同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不相称的错误，改变那种同法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不相称的错误，改变那种同自己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誓言不相称的错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来，回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上来。

中国共产党始终一贯地坚持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团结，反对损害这种团结的任何言论和行动。我们始终一贯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反对背离这些革命原则的任何言论和行动。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分歧，本来是难以避免的。当发生分歧的时候，尤其是发生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的分歧的时候，只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严肃的辩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消除分歧，才能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问题不在于是否要进行辩论，而在于通过怎样的途径和方法进行辩论。我们一贯主张，应当在各兄弟党内部进行辩论，而不应当公开进行辩论。我们的这一主张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却受到某些兄弟党同志的攻击。现在，这些同志在对我們和其他兄弟党进行了一年多的公开攻击之后，又改口说要停止公开辩论了。我们要问：现在，你们是不是认为，你们过去公开攻击兄弟党是错误的呢？你们是不是准备承认这种错误，向被你们攻击的兄弟党道歉呢？你们是不是真心诚意地准备回到内部平等协商的轨道上来呢？

为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中国共产党曾经多次提出、现在仍然主张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且愿意同所有的兄弟党一起，采取必要的步骤，为召开兄弟党会议准备条件。

作为准备兄弟党会议的步骤之一，是停止目前仍在继续进行的公开争论。这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的主张。我们认为，停止公开争论必须是言行一致的、相互的、全面的。有人一面说要停止争论，一面又继续攻击。他们实际上是要在把你打了一顿之后，不准你还手。这是不行的。不仅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应当停止，而且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兄弟党的攻击也应当停止。同时，借口停止争论，不准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进行揭露和批判，这是违反莫斯科声明规定的关于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领导人的任务的，因而也是绝对不能容许的。现在，有人一面要把兄弟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排除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一面又要把叛徒铁托集团

拉进来。我们愿意老实告诉他们，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举行双边的或多边的兄弟党会谈，是准备兄弟党会议的必要步骤。这是中国共产党早在十个月以前就提出的主张。我们一贯愿意同所有抱有同样愿望的兄弟党，举行旨在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会谈。事实上，我们已经同好些兄弟党举行了这样的会谈。我们从来没有拒绝过同任何兄弟党举行双边会谈。英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一月十二日的声明说，中国共产党没有接受苏联共产党“进行共同讨论”的要求。据说，这是另一个党告诉他们的。但是，我们必须郑重指出，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捏造。我们愿意重申，我们准备同任何一个兄弟党或几个兄弟党举行会谈，交换意见，以促进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召开。

目前，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正在加紧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疯狂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阵营，野蛮地镇压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在这样的时刻，为了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各国共产党、全世界无产阶级、全世界人民，都迫切地要求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加强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加强全世界人民的团结。让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吧！让我们为了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为了促进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共同奋斗吧！

原载人民日报 1963-02-27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

红旗杂志编辑部

一、引言

陶里亚蒂同志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公开的攻击，挑起了公开的争论。多年以来，陶里亚蒂同志和其他某些意共同志在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发表了许多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原理的错误言论。对这些错误言论，我们一直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是，过去我们没有、也并不准备同陶里亚蒂等同志进行公开的争论。我们从来主张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我们从来主张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规定的独立的、平等的、协商一致的原则来处理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我们从来主张在兄弟党之间发生的分歧应当通过内部协商的途径来解决，通过双边的、多边的会谈或者兄弟党会议的办法来解决。我们从来认为，任何一个党不能够对任何另一个兄弟党进行公开的、片面的指责，更不用说，对任何另一个兄弟党进行诬蔑和攻击了。我们就是这样坚定不移地主张团结的。我们没有料到，陶里亚蒂等同志这次竟然利用自己的党的代表大会向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公开的攻击。他们既然这样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他们迫得我们没有别的路走，我们只好公开回答他们。为此，我们的《人民日报》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了《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社论。

陶里亚蒂同志和其他某些意共同志对这篇社论很不满意，他们又接连地发表了几篇文章攻击我们。他们说我们的文章“往往缺乏明白的明确性”、“十分抽象和公式化”、“缺乏实际感”；说我们对意大利的情况和意共的工作“没有确切的了解”；说我们对意共的观点是“明显的捏造”；说我们是“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用过激的革命词藻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等等。陶里亚蒂等同志执意地要把公开的争论继续下去。那末，好吧，就继续争论下去吧。

现在这篇文章准备就陶里亚蒂等同志多年来发表的错误言论，更详细地进行一次分析和批判，作为我们对他们连续不断的攻击的回答。待陶里亚蒂等同志看了我

们这个回答以后，看一看他们表示什么态度——还要说我们“往往缺乏明白的明确性”吗？还要说我们“十分抽象和公式化”、“缺乏实际感”吗？还要说我们对意大利的情况和意共的工作“没有确切的了解”，对意共的观点是“明显的捏造”吗？还要说我们是“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用过激的革命词藻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吗？待我们看一看再说吧！

总之，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不行的。从古以来也没有这样一条被公众承认的不公平的道理。何况，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断不能采取主人对待仆人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平等协商、有来有往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如果只许主人向仆人挥舞指挥棒，口中念念有词，说是“团结，团结”，那其实说的是“分裂，分裂”。国际无产阶级是不能接受这种分裂主义的。我们要的是团结，坚决不允许一小撮人闹分裂。

二、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

由于现代修正主义者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进行挑战，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在理论问题、根本路线问题和政策问题上展开一场大规模的论战。这场论战将关系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整个事业的胜利和失败，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

论战中的思潮，归根到底，一种是真正无产阶级思潮，即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一种是混在工人队伍内的资产阶级思潮，即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从世界上有工人运动以来，资产阶级总是力求在思想上侵蚀工人阶级，企图使工人运动服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削弱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把各国人民引入歧途。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资产阶级思潮有时候用这种形式表现出来，有时候用那种形式表现出来；有时候用右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候用“左”的形式表现出来。一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同这种从右方面来的、或者从“左”方面来的资产阶级思潮进行斗争的历史。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任务，就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做的那样，不回避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潮的挑战，随时在理论问题、根本路线问题和政策问题上粉碎他们的进攻，正确地给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指出争取胜利的斗争道路。

从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已经经过了多次的斗争，其中最有历史意义的大论战有两次，目前正在进行第三次大论战。第一次是列宁同第二国际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论战，这次论战把马克思主义推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马克思主义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发展新阶段——列宁主义阶段。第二次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人和国际共产党人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左”倾冒险主义者和

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大论战,这次论战保卫了列宁主义,阐明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被压迫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策略。同这次论战交织在一起,我们中国共产党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毛泽东同志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同“左”倾冒险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论战。

现在出现的第三次大论战,首先是由南斯拉夫铁托集团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挑起的。

铁托集团老早就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一九五六年冬天,铁托集团利用帝国主义发动的反苏反共浪潮,一方面进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一方面配合帝国主义的阴谋,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进行颠覆活动。他们的这类宣传和破坏活动,在匈牙利反革命叛乱事变中达到了高峰。当时铁托在普拉发表了一篇臭名昭著的演说。铁托集团竭力丑化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匈牙利“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认为匈牙利的同志们“不必在恢复共产党方面枉费心机”。各国共产党人对铁托集团这种叛变性的进攻,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在一九五六年四月间,我们发表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篇论文。针对着铁托集团这次进攻,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底,又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九五七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了有名的莫斯科宣言。这个宣言明确地指出了修正主义是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谴责现代修正主义者“企图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学说,说它是‘过了时的’,似乎目前对于社会发展已经丧失了意义”。铁托集团拒绝在这个宣言上签字,并且在一九五八年发表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纲领,来同莫斯科宣言相对抗。这个纲领受到国际共产党人一致的批判。但是,随后,特别是从一九五九年起,某些共产党的领导人竟然违背自己签字同意的共同协议,讲了一些接近铁托式的语言,后来,这些人就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了,他们的语言越来越同铁托一样了,并且尽量美化美帝国主义者。他们把斗争的锋芒,转移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莫斯科宣言的革命原则的一些兄弟党身上,对这些兄弟党进行了放肆的攻击。一九六〇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对兄弟党之间发生的许多分歧的问题,经过平等协商,达成了协议。这次会议发表的莫斯科声明,严厉地谴责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对于这次会议上兄弟党所达成的协议是很高兴的,并且在我们自己的行动中严格地遵守这些协议,保卫这些协议。可是不久,某些兄弟党的领导人竟然又违背自己签字同意的共同协议,在自己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攻击别的兄弟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他们一面攻击兄弟党,一面大捧特捧铁托集团,硬要与铁托集团同流合污。

事变的发展,说明了现代修正主义思潮,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在新条件下的产物。因此,现代修正主义思潮必然是带国际性的,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论战像过去一样,也必然发展成为国际规模的论战。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第一次大论战，赢得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无产阶级新型的革命政党。第二次大论战，赢得了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的胜利和以伟大的苏联为主力军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赢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在欧亚一系列国家的胜利，赢得了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目前这一次大论战，是处在帝国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的时代，是处在社会主义力量发展和壮大的时代，是处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伟大革命运动汹涌澎湃的时代，是处在欧美伟大工人阶级新觉醒的时代。现代修正主义者发动这次论战，是妄图一笔勾销马克思列宁主义，妄图取消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妄图挽救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灭亡的命运。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勾销不了的，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是取消不了的，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必然灭亡的命运是挽救不了的，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愿望相反，他们的可耻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

现在世界工人运动向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出的任务，就是要回答现代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进行的全面的修正。他们的这种修正，是适应现在国际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或本国资产阶级的需要，企图剥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最起码的阶级斗争的原则抛弃得一干二净，他们所要保留的仅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空名义。

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谈论国际问题和各种社会问题的时候，用资产阶级的纯粹虚伪的“超阶级”观点，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观点。他们制造一大套毫无事实根据的、完全属于主观主义的臆想和“假设”，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实际情况的科学探索。他们用资产阶级实用主义代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句话，他们用了许多连自己也难于懂得、难于相信的呓语，去愚弄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几年来，国际上的许多事变不断地证明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和他们的政策的破产。但是，当他们的“理论”和政策每一次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出丑的时候，他们总是像列宁所说的，“却把自己的耻辱拿来吹嘘”，并且不择手段，不计各种后果，把他们斗争的锋芒集中到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身上，集中到事先劝告他们不要那样幻想、不要那样盲动的国际兄弟的身上。他们想用向内部出气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胜利”，妄图孤立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妄图孤立一切保卫革命原则的国际兄弟。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切真正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什么办法能够不去对付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挑战呢？对原则问题上发生的分歧，发生的争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任分清是非，弄清问题。为了团结对敌的共同利益，我们历来主张经过内部协商来解决，反对把分歧在敌人面前公开。但是，既然有些人硬要把争论公开化，那末，我们又有什么办法能够不公开地回答他们的这种挑战呢？

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遭到了荒唐的攻击。那些攻击者大喊大叫，不顾事实，

捏造了许多罪名,加在我们身上。人们并不难懂得,这些攻击是怎样来的,怎样发生的。策划和进行这种攻击的人,究竟把自己置于何地,究竟是和谁在一起,这也是了然如画的。

凡是读过近几年来陶里亚蒂同志和其他某些意共同志的言论的,都会了解,陶里亚蒂等同志在意共这次代表大会上附和对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攻击,并不是偶然的。意共这次代表大会的提纲、陶里亚蒂同志在大会上作的报告和总结发言中,贯串着一条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思想线索。按照这条线索,不论在国际问题上,或者在意大利国内问题上,他们都同社会民主党、现代修正主义者有着共同的语言。人们如果仔细地看看意共的提纲和意共的其他文件,就会发现,那里面的许多提法、许多观点,都不怎么新鲜,而基本上是老修正主义者有过的东西,也是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修正主义者一直宣扬的东西。

现在我们就来分析意共的提纲及其他有关文件,从而看清楚陶里亚蒂等同志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多么辽远。

三、当代世界的矛盾

陶里亚蒂同志的新概念

陶里亚蒂同志和意共其他一些同志把他们对于国际形势的估计,作为提出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根据他们的估计,陶里亚蒂等同志在国际问题上,也在意大利问题上,形成了自己一些颇为得意的新概念。

一、“应当在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的世界斗争范围内,为实现这样一个国际经济合作政策而斗争,这个政策要能够克服今天阻挠更加迅速的经济转变为社会进步的那些矛盾。”

二、“特别在欧洲,有必要主动采取统一的措施,来为欧洲经济合作,甚至不同社会结构国家间的合作打下基础,这种合作要能够在联合国的经济政治机构范围内,促进贸易,消除或者减少关税障碍,为了促使不发达地区进步而进行共同的干预。”

三、“应当要求开展旨在克服欧洲和世界分成若干集团这一状态的有步骤的行动,打破维持这种分裂状态的政治性的和军事性的障碍”。“重新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

四、“在现代军事技术的条件下,“战争变成在质上同以前有区别的东西。在战争性质的这种改变面前,我们的学说本身需要作一些新的考虑”。

五、“在为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中,我们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的首要特征将是没有战争的世界”。

六、“殖民主义制度几乎完全崩溃”,“在世界上不再有为帝国主义保留的势力范

围了”。

七、“今天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推动力，朝向结构改革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这一种推动力是与经济进步、生产力新的扩张相联系的。”

八、“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术语的含义，可以不同于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国家中进行内战和第一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苦岁月里的那种含义。”

九、资本主义国家在“实现现有政治经济结构的深刻改革”这方面，“议会机构可以承担起首要的职能”。

十、在意大利这个资本主义国家中，能够做到“全体人民进入对国家的领导”。在意大利，民主力量“能够在完全接受和维护宪法的情况下反对国家的阶级本质和阶级目的”。

十一、“国有化”、“规划化”和“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能够成为“反对大资本权力以打击、限制和粉碎大垄断集团统治的斗争工具”。

十二、资产阶级领导集团现在能够接受“曾一度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计划化和规划化的概念”，“这不失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成熟的一个标志”。

总之，陶里亚蒂等同志提出的这些新概念，向我们描绘了一幅他们脑海里所构成的当代世界的图画。尽管陶里亚蒂等同志在他们的提纲和文章里，也用了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来作掩饰，用了不少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提法来作掩饰，但是，总掩盖不了他们这些新概念所表达的实质。这就是，他们企图用阶级合作来代替阶级斗争，用“结构改革”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用所谓“共同干预”来代替民族解放运动。

陶里亚蒂等同志提出的这些新概念所要表明的意思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各种对抗性的社会矛盾正在消失，各种互相冲突的社会力量正在合而为一。例如，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各个垄断资本集团等等互相冲突的力量，这些都正在合而为一，或者将要合而为一。

我们很难看出，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这些新概念，同铁托集团在他们获得可耻大名的纲领中一系列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荒谬观点，究竟有多少差别。

毫无疑问，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这些新概念，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一种最严重的挑战，是企图根本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在这里，使我们想起了一件事，就是恩格斯把他同杜林论战的一书，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现在陶里亚蒂同志是不是想步杜林的后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又要实行一次新的“变革”呢？

连自己也很难相信的一付改造世界的药方

怎样才“能够克服今天阻挠更加迅速的经济发展转变为社会进步的那些矛盾”呢？或者说，怎样才能够使国际国内对抗性的社会力量合而为一呢？陶里亚蒂等同志的下面一段话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段话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向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提出和平竞赛的挑战，来建设一个能满足人们和各国人民对于自由、福利、独立、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充分尊重人格、各国之间的和平合作等一切愿望的经济和社会秩序。”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这段话难道不就是说，只要经过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竞赛，不需要经过人民的革命，就可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建立同社会主义国家一样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如果是这样，那岂不是资本主义就可能不再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就可能不再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就可能不再为追逐利润或者超额利润而在国内外进行你死我活的争夺，他们都能够为满足人们的一切愿望，同一切人“和平合作”，同一切国家“和平合作”？

这是陶里亚蒂同志设想出来的改造世界的药方。但是，这种包治百病的药方连在意大利的实际运动中还没有证明它是灵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怎么能够轻信这样的药方呢？

人们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更应当记得，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经济上的竞赛。社会主义苏联成立以来四十多年，大部分时间基本上处在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状态。我们认为，列宁和斯大林所实行的和平共处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这种和平共处的政策是表示社会主义国家不愿意、不需要用武力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制度所显示的优越性，正在给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以极大的鼓舞。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曾经多次说过，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将在全世界树立榜样。他说，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能够建立共产主义制度，“这项任务具有全世界的意义”。在一九二一年，当国内战争基本结束、苏维埃国家开始过渡到和平建设轨道的时候，列宁就把国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为苏维埃国家的主要任务。列宁说：“现在，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经济政策去影响国际革命。”列宁的意见是正确的。正是这样，社会主义的力量给予国际局势以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列宁并没有说苏维埃国家的建设可以代替世界各国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苏联四十多年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任何国家的革命和制度的改革，都是本国人民自己的事情，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政策，并不能够改变其他国家的社会制度。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政策，就有可能改变整个世界各国社会制度的面貌，建设一个能够满足人们的一切愿望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究竟有什么根据呢？

不错，陶里亚蒂等同志也并不那么相信自己的药方，所以，他们在提纲里接着说：

“可是帝国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并不愿意放弃对全世界的统治”。

但是，陶里亚蒂等同志没有从社会发展规律去了解帝国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为什么“不愿意放弃对全世界的统治”。他们只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对世界形势的认识错误，或者“理解”错误；并且认为，正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领导集团有这种认识错误，这种“理解”错误，“便产生了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怎么可以把帝国主义力求保持自己的统治，国际形势不稳定性这类的问题，归结为帝国主义国家领导集团的认识问题，而不看作为资本帝国主义规律起作用的问题呢？怎么可以假定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集团一旦“认识正确”，帝国主义国家统治人物一旦变成“明智派”，而不要经过各国人民的阶级斗争，不要经过各国人民的革命，世界各国社会制度就能够根本改变呢？

对世界矛盾的两种根本不同看法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分析当前国际形势的时候，必须掌握全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材料的总和，必须认识以下一些主要的矛盾：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一个垄断集团和另一个垄断集团的矛盾，还有资本主义国家内垄断资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的矛盾，等等。显然，只有认识这些矛盾，分析这些矛盾和它们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指出当前具体矛盾的焦点是什么，各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才能正确地估计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而使自己的政策放在可靠的理论阵地上。可惜，陶里亚蒂等同志在他们的提纲上恰恰没有严肃地正视这些矛盾，因而必然使他们的纲领根本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

当然，陶里亚蒂等同志在他们的提纲里也提到许多矛盾，但是奇怪的是，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陶里亚蒂同志，恰恰回避这些主要的矛盾。

意共十大提纲在讲到欧洲共同市场的时候，对国际形势罗列了这样一些矛盾：

“在各大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加强的同时，这样一种趋向也加强了，即不仅在各大垄断资本之间达成国际协定，并且在国家集团之间建立经济贸易的有机联盟。其中的一个联盟（即欧洲共同市场）促成了西欧市场的扩大，这就刺激了若干国家（意大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经济发展。然而，大垄断资本集团领导下的、与北大西洋集团的扩军备战政策相结合的经济一体化，在国际和一国范围内下列各方面引起了新的矛盾，即某些工业发达地区的进展与其他地区的持久的、甚至相对加剧的落后和衰落之间的矛盾；工业生产上升的速度与到处陷入严重困难和危机的农业发展速度之间的矛盾；消费水平高的较广的富裕地区与工资水平和消费水平极低的最广大的贫困地区之间的矛盾；大量财富消耗于扩军、非生产性开支和无止境的奢侈与人民群众生活和进步所

必需的各种问题（住宅、学校、社会保险等等）无法得到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

这里列了一大堆的所谓矛盾，或者所谓“新矛盾”，但是，偏偏没有提到阶级的矛盾，没有提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和全世界人民的矛盾，等等。他们把“在国际和一国范围内”的矛盾，说成是工业发达地区和工业不发达地区的矛盾，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的矛盾。

承认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承认有大垄断资本集团，还承认有国家集团，但是，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是非阶级的、超阶级的矛盾。他们认为，经过“各大垄断资本之间达成国际协定”，以及“在国家集团之间建立经济贸易的有机联盟”，就能够调和甚至消除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这种观点在实际上是从老修正主义者的“超帝国主义的理论”那里抄袭来的，是列宁所认为的“超等废话”。

大家知道，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提出了“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的重要论点。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不平衡发展，是跳跃式的，原来走在后面的国家跳到前面去了，而原来走在前面的国家落到后面去了。资本主义这种发展不平衡的绝对规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依然在起作用。尽管美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一直宣扬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处在这个绝对规律之外，但是，第二次大战以后，日本、西德、意大利、法国和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多年来的发展速度，都超过了美国。美国经济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了。一九四八年美国工业生产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百分之五十三点四，到一九六〇年降为百分之四十四点一，一九六一年又降为百分之四十三。

尽管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速度落在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它仍然没有完全失掉它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垄断地位。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美国力求保持和扩展它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垄断地位和支配地位；另一方面，是其他一些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力求摆脱美帝国主义的控制。这是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突出的并且日益尖锐化的现实的矛盾。除了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这种矛盾以外，在某些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必然而且在事实上已经引起它们争夺市场、争夺投资场所、争夺原料产地的斗争的尖锐化。这里交错着新老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也交错着帝国主义战败国和战胜国的斗争。刚果事件，最近围绕欧洲共同市场问题的争吵，美国限制日本商品进口引起的争吵，就是这类斗争的突出的例子。

意共十大提纲虽然指出了，“由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所固有的不平衡和跳跃的发展过程，美国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绝对优势开始消失”，但是，陶里亚蒂等同志并没有从这种新现象，看出资本主义世界本身矛盾的扩大，矛盾的加深；没有看出这种新现象会引起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你死我活的紧张斗争的新局面，会引起帝国主义国家内部不同垄断集团之间的紧张斗争的新局面，会引起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紧张斗争的新局面。特别是由于一系列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帝国主义控制的世界市场在地区上大大缩小了；此外，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民族独立国家的成立，动摇了帝国主义在这些地方的经济垄断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世界的紧张斗争，不是比过去缓和了，而是比过去更加激烈了。

现在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世界经济体系，即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世界阵营，即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形势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力量超过帝国主义的力量。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加上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力量，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和平运动的力量，这种联合的力量，无疑地大大超过帝国主义者和它们的走狗的力量。这就是说，整个世界力量的对比，优势是在社会主义和革命人民的方面，而不是在帝国主义方面；优势是在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方面，而不是在帝国主义战争力量方面。用中国共产党人的话来说，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不估量到第二次大战后世界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是完全错误的。但是，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各种矛盾，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的规律，也并没有排斥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自己的利益，分裂成不同集团，而进行各种冲突的可能性。

怎么能够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界限，会因为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而自行消失呢？

怎么能够说，资本主义世界内在的各种矛盾，会因为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而自行消失呢？

怎么能够说，资本主义各国的统治力量，会因为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呢？

可是，陶里亚蒂等同志的纲领恰恰是有着这类的看法。

第二次大战后世界矛盾的焦点

陶里亚蒂等同志身在资本主义世界，而心却放在虚无缥缈的幻梦之中。

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共产党人，应当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观点，从世界全局出发，分析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并且着重分析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以便为本国无产阶级、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指出正确的出路。但是，使我们感到遗憾的是，陶里亚蒂等同志没有这样做。他们只是不着边际地、无关痛痒地说些关于这类矛盾的空话，而在实际上掩盖这些矛盾，企图把本国无产阶级、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引向迷途。

陶里亚蒂同志和铁托一样，都把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矛盾，说成是什么“两大军事集团的存在和对立”，并且认为只要“改变这一局势”，就能够建立一个“没有战争的”、“和平合作的”新世界。这样，世界两大社会体系的矛盾就会

随之消失。

陶里亚蒂同志这类想法未免太天真了。尽管他天天在希望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人物“明智”起来，但是，帝国主义者绝不会按照陶里亚蒂同志的希望，自己解除武装，自己改变社会制度。这种想法，在实质上，只能是要社会主义国家放弃或者取消自己的防御力量，是要使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帝国主义者从来所希望的所谓向资本主义自由化的“和平演变”，或者“自行演变”。

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矛盾，是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是世界上的一种基本矛盾，这种矛盾毫无疑问是尖锐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怎么能够把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矛盾，看成是两个军事集团的矛盾，而不是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呢？

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不能把世界范围内的矛盾，简单地看成只是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矛盾。

必须知道，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它的社会性质来说，它们不需要、不可能、不应当、也不允许对外实行扩张主义。它们有自己的国内市场，特别是中苏两国最有广阔的国内市场。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也进行国际贸易，但是，它们用不着同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市场，争夺势力范围，社会主义国家根本没有必要因为这些而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冲突，特别是武装冲突。

但是，帝国主义国家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只要资本帝国主义制度还存在，在那里，资本帝国主义的规律就会继续起作用。帝国主义者在国内总是要压迫和剥削人民，对外总是要侵略、压迫和剥削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帝国主义者总是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各种势力范围，当作它们发财致富的源泉。这些帝国主义的“文明”豺狼，一向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当作“肥肉”而去争夺、去吞噬。它们采取各种手段，不断地镇压殖民地和各种势力范围的人民斗争和起义。不论资本帝国主义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采取老殖民主义政策，还是采取新殖民主义政策，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是必然存在的。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是极其激烈的，也是无法掩盖的。

同时，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争夺市场、争夺原料产地、争夺势力范围、争夺军火利润的斗争，也总是经常地进行着。这种斗争，虽然有时稍为缓和，有时达成某种妥协，有时甚至形成什么“国家集团的联盟”，但是，这种缓和，这种妥协，这种联盟，总是孕育着它们相互之间的更尖锐、更激烈、更大范围的矛盾和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者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一直在全世界推行扩张的政策。在反苏的名义下，它首先向着英、法、德、日、意等国原来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实行侵略、吞并或控制；同时，还在反苏的名义下，利用第二次大战后的条件，把英国、法国、西德、日本、意大利、比利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一大批资本主义国家都放在美国垄断资本的直接控制下面。这种控制，包括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

就是说，美帝国主义者企图在资本主义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它所追求的这个大帝国，不但直接奴役西德、意大利、日本这些战败国和它们原来的殖民地、势力范围，而且要直接奴役英国、法国、比利时等这些战时的同盟国和它们原来的殖民地、势力范围。

就是说，美帝国主义者所企图建立的这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它的实际行动，首先是在夺取美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同时也采用各种手段，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破坏和侵略活动。

这里，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六年八月的一次著名谈话。他揭穿了当时美帝国主义者反苏叫嚣的烟幕，对于世界形势作了如下的概括说明：

“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现在美国在太平洋控制了比英国过去的全部势力范围还要多的地方，它控制着日本、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半个朝鲜和南太平洋；它早已控制着中南美；它还想控制整个大英帝国和西欧。美国在各种借口之下，在许多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布置，建立军事基地。美国反动派说，他们在世界各地已经建立和准备建立的一切军事基地，都是为着反对苏联的。不错，这些军事基地是指向苏联。但是，在现时，首先受到美国侵略的不是苏联，而是这些被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我相信，不要很久，这些国家将会认识到真正压迫它们的是谁，是苏联还是美国。美国反动派终有一天将会发现他们自己是处在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中。

“当然，我不是说，美国反动派不想进攻苏联。苏联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是阻碍美国反动派建立世界霸权的强大的因素，有了苏联，美国和世界反动派的野心就根本不能实现。因此，美国反动派非常痛恨苏联，确实梦想消灭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时候，美国反动派如此大吹大擂地强调美苏战争，闹得乌烟瘴气，就使人不能不来看看他们的实际目的。原来他们是在反苏的口号下面，疯狂地进攻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我以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

十六年前，毛泽东同志就这样用最清楚的语言，揭露了美帝国主义者如何设法建立它的世界大帝国；同时用最清楚的语言，告诉人们应当怎样去打败美帝国主义者奴役世界的狂妄计划，应当怎样力求人类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说明，美帝国主义者为一方，社会主义国家为另一方，在两方之间，是一个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所包括的范围，是除了美国以外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美帝国主义者所进行的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争叫嚣，

一方面，表明它确实在准备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略战争，梦想消灭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者这种叫嚣，又是一种烟幕，用以掩盖它对中间地带进行侵略和奴役的现实目的。

美帝国主义者这种野心勃勃地企图建立世界霸权的侵略和奴役政策，首先要遇到中间地带特别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反抗。美帝国主义者的这种反动政策，实际上成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引火物，燃起了这些地区十几年来连绵不断的革命烈火。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烈火进一步地动摇帝国主义统治的基础，这种烈火正在蔓延，而且必将在更广阔的范围内继续蔓延。

同时，美帝国主义者建立世界霸权的政策，也必然加剧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间对于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争夺，加剧美帝国主义者同其他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这种斗争关系到帝国主义的切身利益，在这种斗争中，帝国主义的一方对帝国主义的另一方是毫不留情的，它们之中的一方总想扼死竞争的另一方。

美帝国主义者和它的伙伴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采取极端反动的镇压和欺骗政策。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义不容辞地、理所当然地采取同情和支持的政策。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政策。这两种政策的矛盾不能不在这些地区明显地表现出来。现代修正主义者对这些地区的政策，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政策服务的。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策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政策之间的矛盾，也不能不在这些地区明显地表现出来。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地区的人口占资本主义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这些地区革命浪潮不断高涨的事实，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间争夺这些地区的事实，突出地反映了这些地区是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矛盾的焦点，也可以说，是世界矛盾的焦点。这些地区是帝国主义链条中的最薄弱的环节，是目前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源泉。

十六年来的经验，证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第二次大战后世界矛盾的焦点在哪里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

世界矛盾的焦点，现在改变了没有？

十六年来世界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

第一，欧洲和亚洲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这些国家同苏联一起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这个社会主义阵营包括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十二个国家，共拥有十亿人口。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

第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世界的力量大大地加强了，影响大大地扩大了。

第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人民革命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势，在广大地区摧毁了并且在继续摧毁着美帝国主义者和它的伙伴们的阵地。英勇的古

巴人民推翻了美帝国主义走狗的反动统治，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并且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四，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争取民主权利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有了新的活跃和新的发展。

第五，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衡发展更加加剧。法国的资本主义势力有了新的发展，已经开始敢于同美国分庭抗礼；英国同美国的矛盾也进一步加深。第二次大战中的战败国西德、意大利、日本，在美国的扶植下，已经重新起来，正在不同程度上图谋摆脱美国的统治。西德和日本的军国主义正在复活，它们又重新成为战争危险的策源地。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大战前，是美帝国主义者的主要竞争者。现在，西德又以主要竞争者的姿态，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同美帝国主义者狭路相逢了。日本和美国的竞争也日益激化。

第六，在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更加加剧的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内各个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竞争也更加加剧了。

这些变化告诉我们，只要各国人民觉悟起来，团结起来，美帝国主义者和它的走狗是能够被打败的，各国人民一定能够争得自己的自由和解放。

这些变化同时又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愈发展，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愈加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愈广泛，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愈开展，那末，就愈有可能束缚帝国主义者的手脚，使他们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就愈有可能制止新的世界大战，保卫住世界和平。

这些变化同时还告诉我们，美帝国主义者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愈来愈深刻、愈尖锐，在它们相互之间正在发展着新的斗争。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各国的建设的胜利，许多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古巴人民革命的胜利，使美帝国主义者奴役世界的狂妄计划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打击。美帝国主义者为了推行侵略政策，除了宣传反苏以外，近年来特别大肆宣传反华。美帝国主义者进行反华宣传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企图长期霸占我国领土台湾，为了进行各种破坏我国、威胁我国的罪恶活动。同时，人们还很明显地可以看到，美帝国主义者是企图利用反华宣传去达到它的另一个重要的实际目的，这就是要控制和奴役日本、南朝鲜和整个东南亚。所谓“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所谓“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等等，都是美国控制和奴役这些地带一系列国家的手段。

多年来，美帝国主义者或明或暗地支持印度反动派，支持尼赫鲁政府，它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用偷梁换柱的手段，把从前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现在还是英联邦成员之一的印度，变为美国所控制的势力范围，把原来大英帝国王冠上的宝石，变为美元帝国王冠上的宝石。美帝国主义者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它首先需要在印度人民和世界人民面前，制造一种口实，制造一种烟幕，这就是“反华”，反对所谓“中国的侵略”，虽然它们自己也并不相信有什么“中国的侵略”。美帝国主义者把尼赫鲁政府这次反华军事行动，看作是它控制印度的大好机会。在尼赫鲁挑起中印边境

冲突以后，美帝国主义者就利用“反华”的名义，大摇大摆地窜进印度，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扩大它在印度的势力。

美帝国主义者这次大规模地窜进印度，这是美国反动派在印度实行新殖民主义计划的重大步骤，是目前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为攫取市场和势力范围、为重新瓜分世界而明争暗斗的一个重大事件。美帝国主义者这个行动，将不可避免地促进印度人民的新觉醒，同时也必然促使英美两个帝国主义在印度的矛盾的发展。

由于旧殖民地的丧失，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缩小，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争夺，除了继续出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澳洲的许多地区之外，还出现在资本主义老发源地的西欧。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和平时期的角逐，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广泛地触及到西欧的各个角落，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激烈地争夺西欧这类工业发达的地区。由西德、法国、意大利等六国组成的欧洲共同市场，以英国为首的由七国组成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以及美国积极策动的“大西洋共同体”，表明了帝国主义国家对西欧市场争夺的尖锐化越来越显著了。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谓的“向四面八方开展意大利的贸易”，实际上就是反映了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争夺市场的要求。

除了在西欧以外，最近美国限制日本棉制品进口引起的公开争吵，表明美国和日本相互争夺市场的斗争日趋表面化了。

陶里亚蒂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说，“殖民主义制度几乎完全崩溃”，“在世界上不再有为帝国主义保留的势力范围了”。还有人说，“地球上还有五千万人在殖民主义统治下呻吟”，殖民制度只有残余了。在他们看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已经不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严重任务了。他们的这种说法毫无事实根据。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仍然遭受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仍然处在新老殖民主义的奴役下。这些年来，一系列的国家独立了，可是它们的经济仍然受着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在有些国家中，老殖民主义者被赶走了；但是，更大的、更危险的新殖民主义者又闯进来了，严重地威胁着这些地区很多民族的生存。这些地区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甚至像我们中国这样已经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并且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也还有反对美帝国主义者侵略的斗争任务。我们的神圣领土台湾还被美帝国主义者侵占着，许多帝国主义国家至今还不承认地球上存在着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至今还被无理剥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依然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第一位的、最迫切的任务。

十六年来世界的变化，继续证明：美帝国主义的奴役政策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美帝国主义者向全世界的扩张政策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第二次大战后世界矛盾的焦点。这种矛盾，特别表现为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间争夺这些地区的矛盾。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长时期以来，一直受欧洲和美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掠夺和压迫。欧美的殖民主义者从这些广大地区掠夺了大量的财富，喂肥了自己。他们拿这些地区人民的血和汗作为“资本主义文化和文明的肥料”，使这些地区的人民极端贫困化，并且使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陷于非常落后的状态。但是，物极必反。这些外来的压迫者，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他们长期进行的奴役政策，不可避免地引起这些地区的人民对他们的仇恨，把这些地区的人民从沉眠不醒的状态中唤醒过来，逼得他们起来，为争取自己的生存，为保存自己的民族，而不断地进行斗争，直到进行武装反抗和武装起义。这些地区不愿意受奴役的人们是极其广泛的，不仅有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包括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对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反抗，不断地遭受过残酷的镇压，遭受过多少次的失败。但是，失败了，他们又总是再起来进行斗争。毛泽东同志曾经概括地说明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及这种侵略如何走向它的反面。在一九四九年，伟大中国人民革命取得基本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所有这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

中国人民斗争的经验，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解放斗争具有现实的意义。伟大的十月革命把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联结起来，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开辟了新道路。中国人民革命的成功，为被压迫民族提供了一个胜利的伟大范例。

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继中国革命之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的规模是空前宏大的。经验反复证明，这些地区的斗争即使可能遇到某些挫折，但是，无论如何，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是抵挡不了这种斗争洪流的。

现在欧美帝国主义国家正处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包围之中。这种斗争对于西欧和北美工人阶级的斗争是一种极其伟大的支援。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从来把资本主义国家本国的农民斗争和殖民地、附属国的人民斗争，看作是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两支伟大的直接同盟军。

人们知道，马克思在一八五六年曾经提出这样的希望：“德国的全部事情，都将以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农民战争来协助无产阶级革命为转移。”列宁曾经痛斥第

二国际的英雄们回避了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列宁痛斥他们说：“记得马克思在一八五六年的通信中曾谈到德国的农民战争能够造成一种革命的局面，他希望这次农民战争能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没有注意到，而是躲躲闪闪，就像猫儿围着热饭兜圈子一样。”列宁在谈到农民同盟军问题对无产阶级解放的重要性的时候，说：“只有巩固工农联盟，人类才能普遍摆脱像不久以前那样的帝国主义屠杀，才能普遍摆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野蛮的矛盾”。斯大林也说过：“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夜漠视农民问题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无疑是表明直接背叛马克思主义”。

人们还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句名言：“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不可能是自由的”。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曾经针对着当时的情况，这样设想过：“在爱尔兰问题上进行了多年的工作之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是在英国，而只有在爱尔兰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马克思在一八五三年正当中国太平天国革命的时候，写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这篇著名论文，其中说过：“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列宁继续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论点，强调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他认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个口号在我们的时代是正确的。他曾经指出：“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资本压迫的千百万‘殖民地’奴隶充分地最紧密地联合起来，那末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

斯大林继续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发展了列宁关于民族问题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的论点。他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指出：

列宁主义“拆毁了横在白种人和黑种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帝国主义的‘文明’奴隶和‘不文明’奴隶之间的墙壁，因而把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联结起来了。于是民族问题就由局部的和国内的问题变成了一般的和国际的问题，变成了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世界问题”。

在《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这一篇论文中，斯大林论述到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的时候，这样说过，十月革命“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建成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就是这样明确地指出了欧美无产阶级争取解放、争取胜利的两个基本的条件。就外部条件来说，他们认为，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将是对于资本主义宗主国统治阶级的决定性打击。

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大力地阐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在争取解放斗争中的两支伟大同盟军的问题，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具体

地、成功地解决了农民问题和民族解放问题，保证了伟大的中国革命的胜利。

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生存的斗争，总是引起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热烈同情和歌颂。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甚至列宁本人，都没有亲眼看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像现在这样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革命斗争，没有亲眼看到一连串的胜利，但是，他们根据当时民族解放斗争经验所揭示的规律，却愈来愈被生活所证实。第二次大战以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绝不像有些人所说的，上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互关系的原理已经过时，而是恰恰相反，更加证明这种原理具有伟大的生命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实践，更加丰富了这种原理。

这样的形势，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当代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支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因为这种斗争，对于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斗争结果如何为转移，要以能否取得这些地区的革命斗争的支援为转移。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革命斗争是不可压制的，斗争是必然要爆发的，在这些地区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不去领导它，就必然脱离人民，无从取得人民的信任。在这些地区的反帝斗争，无产阶级有着极其广泛的同盟者。因此，这些地区的各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都必须站在斗争的最前线，高举反帝和民族独立的旗帜，善于组织自己的同盟者，组织反帝反封建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揭穿帝国主义者、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各种欺骗，把斗争引向正确的方向，使斗争逐步地得到胜利，使各种斗争的胜利能够得到可靠的保证。如果不是这样，革命斗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也是不巩固的，胜利的果实就有可能落到反动派的手里，而使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重新受帝国主义的奴役。人民在革命斗争中被出卖的事例，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是不少的，中国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败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也必须站在支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的最前线。这种支援，在实际上，同时就是帮助欧美各国无产阶级自己的解放事业。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想摆脱资本压迫的灾难，想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灾难，如果不取得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对自己的支援，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帝国主义宗主国内的无产阶级政党，有倾听这些地区革命人民的呼声、研究他们的经验、尊重他们的革命感情、配合他们的革命斗争的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在他们的面前倚老卖老，摆老资格，摆老爷架子，指手画脚，像法国多列士同志那样傲慢自大地轻视他们，说他们“年轻、缺乏经验”；更没有权利以社会沙文主义的态度，诽谤、咒骂、恐吓、阻挠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应当了解，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帝国主义宗主国内的工人政党，如果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采取不正确的立场、方针和政策，那末，它们对

于本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斗争事业的立场、方针和政策，也不可能是正确的。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力支援，是保障社会主义国家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一支极重要的力量。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些地区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应当热烈同情、积极支援，而绝不能采取敷衍的态度，民族自私的态度，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更不能容许采取制止、阻挠、欺骗和拆台的态度。获得了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必须把支援各国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革命斗争，当作自己神圣的国际主义义务。有人认为，这种支援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只是一种单方面的“负担”。这是很错误的观点，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必须了解，支援是双方面的，是相互的：社会主义国家支援了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反过来，各国人民革命斗争也支援和保卫了社会主义国家。关于这一点，斯大林说得很对：“获得胜利的国家所给予的这种帮助的特点，不仅在于它加速其他国家无产者的胜利，而且还在于它促进这个胜利，从而保证社会主义在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国家内的最后胜利。”

有人认为，目前反对帝国主义最主要的现实手段，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经济竞赛。什么民族解放斗争，什么人民革命斗争，什么揭露帝国主义，等等，都不过是“最廉价的斗争方法”，“是巫师庸医的做法”。他们像富有的慈善家老爷一样地对这些地区的人民说：你们不要“逞强”，不要激起“火星”，不要去追求“壮丽地死”。你们不要“对在和平经济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没有信心”，等着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方面把资本主义彻底比输了，到那时候，你们自然什么都会有了，帝国主义也自然倒下去了。很奇怪，这些人总是像害怕瘟疫一样害怕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这种态度完全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完全违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利益，完全违背本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也完全违背社会主义国家本身的利益。

总之，现在世界各国人民面临着一个大好形势。这个形势，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对于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都是非常有利的，只有对于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对于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是不利的。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区别革命和不革命的重要标志，是区别国际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重要标志，是区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区别谁是真正保卫世界和平谁是助长侵略势力、战争势力的重要标志。

几点简要的结论

在这里，可以把以上关于国际形势的论点，再总述一下：

第一，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是镇压各国人民正义斗争的

国际宪兵，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在战后，美帝国主义肆意夺取美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广阔中间地带，不但奴役战败国和它们原来的殖民地、势力范围；而且控制战时的同盟国，采取各种手段，力图把这些国家原来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但是，美帝国主义处在全世界人民的包围之中，它的狂妄野心也使它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日益陷于孤立，它的力量实际上正在不断削弱，世界各国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正在不断扩大。美国人民、世界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是能够在斗争中把美帝国主义打败的。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情况是不妙的，各国人民的力量在上升中。

第二，帝国主义各国之间，正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至西欧，为争夺市场，争夺势力范围，而发生新的分化和新的结合。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客观存在的，是由帝国主义制度的本性所决定的。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这种矛盾和冲突，对它们的实际利益说来，比较它们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更为迫切，更为直接，更为现实。看不到这点，就等于否认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的不平衡发展所引起的矛盾的尖锐化，就不能了解帝国主义的具体政策；这样，共产党人也就不能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正确的方针和政策。

第三，社会主义阵营是维护世界和平、维护正义事业的最坚强的堡垒。这个堡垒的继续巩固、继续强大，将使帝国主义者更加不敢轻易触犯它。因为它们知道，触犯这个堡垒，对它们来说，是极大的冒险，不仅要尝到很大的苦头，而且直接关系到它们本身的生死存亡。

第四，有人把当代世界的矛盾简单地只看成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而没有看到，或者实际上掩盖帝国主义者、新老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没有看到，或者实际上掩盖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没有看到，或者实际上掩盖当代世界矛盾的焦点。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观点。

第五，有人承认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是，认为只要取消他们所说的“两大军事集团的存在和对立”，或者认为只要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提出和平竞赛的挑战”，这种矛盾就可以在实际上消失，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就可以融合为一。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观点。

第六，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力求加强自己在本国的统治地位和对外的竞争地位，而不是为了削弱它们的这种地位。同时，帝国主义者穷凶极恶地加强军事机器，不仅是为了掠夺其他民族，排斥它们的国外竞争者，而且是为了在国内加紧压迫人民。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已经更加赤裸裸地表现为少数垄断寡头对雇佣奴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暴虐专政。认为那里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正在逐渐过渡为社会主义，那里的劳动人民能够或者正在参加国家领导，因此认为“今天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推动力，朝向结构改革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这不是十足的主观主义的呓语，又是什么呢？

历史并不属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而是属于世界各国人民。帝国主义者企图在绝望中寻找出路。他们异想天开地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所谓“中苏冲突”上面。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评论家老早就说出了他们的这个想法。现代修正主义者和他们的追随者最近对中国共产党的荒唐攻击和诬蔑，更加助长了他们的这种想法。他们兴高采烈，他们起劲地耍弄挑拨离间的把戏。但是，这些反动的幻想家，未免过低估计了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伟大力量，未免过低估计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的伟大力量，未免过高估计了现代修正主义者和他们的追随者所能起的作用。历史事实终归要使他们的幻想完全破灭，倒霉的总是这些反动的幻想家。

陶里亚蒂等同志的错误，就是他们的提纲、报告和总结发言在国际形势问题上根本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析，根本离开了阶级分析。

列宁曾经嘲笑民粹派说：“他们的全部哲学不外乎长吁短叹地说，斗争和剥削是有的，但剥削是‘可能’没有的，假如……假如没有剥削者的话。”列宁说他们“一辈子都满足于这种‘假如’和‘假若’”。

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不能像民粹派那样吧！

可是，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提纲和报告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恰恰是放在这类“假如”或“假若”的设计上面。因此，他们得出的新概念只能是一堆非常糊涂的概念。

四、战争与和平

问题不在于主观设想，而在于社会规律本身

几年来，有些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喃喃不休地作了多少演说，盈篇累牍地写了多少文章，在市场上抛出了多少大书小书，但是，却不愿意认真地研究一下战争的根源在哪里，有什么不同性质的战争，什么是消灭战争的道路。

无政府主义者曾经要求在一天早晨废除国家。现在有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在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在剥削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要求在一天早晨出现一个“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他们自负地认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发现”，是“人类意识的革命性的变化”，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贡献”，而“教条主义者”的罪恶之一，就是不懂得接受他们的这个科学礼物。

看来，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正在大力推销这种礼物。他们说，要创造一个“没有战争”的新世界，唯一的战略是他们自己所解释的“和平共处战略”，而他们的这种所谓“和平共处战略”的内容，同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提出的、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拥护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根本不同的。

在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意大利，在目前和平时期，就拥有四十多万人的压迫

人民的常备军队，有约十万人的警察和近八万人的宪兵这类武装队伍，还有美国的拥有导弹的军事基地。在这样的国家中，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要求的“和平与和平共处”，究竟包含一些什么意思呢？如果是要求意大利政府实行和平中立政策、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那当然是对的。除此以外，你们是否还要求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压迫群众同垄断资产阶级实行“和平与和平共处”呢？你们所说的这种“和平与和平共处”，是否意味着美帝国主义者会自动撤除在意大利的军事基地，是否意味着意大利的垄断资产阶级会自动放下武器、解散军队呢？如果做不到这些，那末，在意大利怎样实现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和平与和平共处”呢？推而广之，又怎样能创造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呢？

当然，如果能够出现一个“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不是很好么？我们为什么不举手赞成呢？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问题显然不在于主观设想，而在于社会规律本身。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六年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说过：“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

在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书中，又一次说明了这个理想。他说：“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要把战争延长到无尽期，我们则要把战争在一个不很久远的将来给以结束。”

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说过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战争，是为永久和平而战；说过“我们的抗日战争包含着为争取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

毛泽东同志在这本书上说，战争是“由于阶级的出现”产生的。同时，他说：“人类一经消灭了资本主义，便到达永久和平的时代，那时候便再也不要战争了。那时将不要军队，也不要兵船，不要军用飞机，也不要毒气。从此以后，人类将亿万斯年看不见战争。”

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论点，是完全符合列宁反复说过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论点的。在一九〇五年，那正是俄国第一次革命的一年，列宁写道：

“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和现在从未用伤感的观点来看待战争。社会民主党人坚决谴责战争，认为它是解决人类争端的野蛮办法，同时社会民主党人也知道，只要社会还分成阶级，只要人剥削人的现象还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要想消灭这种剥削，我们是逃脱不了战争的。战争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由剥削者、统治者和压迫者阶级自己挑起的。”

在一九一五年，正是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时候，列宁写道：

马克思主义者，“一向斥责各民族之间的战争，认为这是一种野蛮的和残酷的行为。但是我们对战争的态度，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平的拥护者和鼓吹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有原则的区别。我们跟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不同，我们懂得战争和国内阶级斗争有必然的联系，懂得不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就不能消灭战争，完全承认国内战争即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阶级的战争，奴隶反对

奴隶主、农奴反对地主、雇佣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的合理性、进步性和必要性。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既不同于和平主义者也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我们认为必须历史地（根据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各个战争。”

列宁，他作为一个高度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用最大的力量研究了战争的问题，做了大量的严密的科学分析。他痛斥考茨基那一类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许多谬论，给人类指出了消灭战争的正确道路。

可是，现在有些人，自命为“列宁主义者”，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信口开河，却一点也不愿意考虑列宁是用怎样的方法去研究战争问题的，不愿意考虑列宁所得出的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任何科学结论。尽管如此，他们还口口声声说别人背弃了列宁，只有他们才是“列宁的化身”。

“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原理过时了吗？

也许有些人会说，无须你们饶舌，我们也很熟悉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论点；但是，现在的条件不同了，列宁这些论点已经成为过时的东西。

把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当成过时的东西，这是铁托集团首先公开提出的。他们认为，自从原子武器出现以后，列宁所强调的“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个用以考察各种战争、判断不同战争性质的理论基础，已经不适用了。照他们看来，战争从此已经不是这一个阶级或者那一个阶级的政策的继续，战争已经没有什么阶级的内容，已经没有什么正义的和非正义的区别。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谓在现代军事技术条件下战争性质已经改变的说法，实际上是铁托集团早已有过的说法。

显然，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不会因为现代修正主义者否认“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个原理，而解除自己的武装，放弃对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镇压，不会因此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略和破坏活动，也不会因此放弃他们相互间为争夺超额利润而引起的冲突。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这种说法在实际上是力求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施加影响，要使他们发生错觉，仿佛帝国主义者镇压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战争行动，帝国主义者的扩军备战，帝国主义者为了争夺市场和势力范围而进行的直接或间接的武装冲突，这些都不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比如，美帝国主义者镇压南越人民的战争，新老殖民主义者在刚果策动的战争，这些也都不是什么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

究竟美帝国主义者在南越所进行的战争，新老殖民主义者在刚果的武装冲突，算不算战争？如果这不算是战争，那又算什么？如果算是战争，那它们同帝国主义的制度和它的政策有没有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

陶里亚蒂和某些意共同志认为，“能够避免地方性的小战争”；又认为，“即使社

会主义尚未在各处得到胜利，在人类社会，战争也会成为不可能。”这大概就是陶里亚蒂等同志对“我们的学说本身”“作一些新的考虑”之后所得出来的结论。陶里亚蒂等同志这些话，是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间说的。我们姑且把一九六〇年以前发生的事件搁起不说吧。在一九六〇年这一年，世界各地就发生了下面这些不同类型的军事冲突和武装干涉，其中多数是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谓的“地方性的小战争”：

这一年是法国殖民军镇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战争的第六年。

这一年，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吴庭艳继续残酷压迫南越人民，激起南越人民更大的武装反抗。

一月至二月，在美国支持下的以色列同叙利亚发生了武装冲突。

二月五日，美国四千名海军陆战队在拉丁美洲多米尼加登陆，武装干涉该国内政。

五月一日，美国 U—2 飞机侵入苏联上空，被苏联火箭部队击落。

七月十日，比利时武装干涉刚果；十三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派“联合国军”到刚果，镇压刚果民族解放运动。

八月，美国支持老挝沙湾拿吉集团挑起内战。

或许一九六〇年发生的事件不在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说的范围之内，那末，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的世界事件是否就能够证实陶里亚蒂等同志的预言呢？

可以考察一下事实：法国殖民军镇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罪恶战争继续进行，一直到一九六二年三月间才被迫实现停火。这个战争到这个时候，已经持续七年多之久了。美帝国主义者在南越进行的反人民的“特种战争”，一直到现在还在继续进行着。

为美国新殖民主义服务的“联合国军”（其中主要是印度的军队）还在镇压刚果人民。一九六一年初，刚果民族英雄卢蒙巴被美、比帝国主义者唆使其走狗杀害。从一九六一年九月到一九六二年底，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军”向英、法、比等老殖民主义者控制下的加丹加省进行了三次武装进攻。

一九六一年三月，葡萄牙殖民者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调集军队，对要求民族独立的安哥拉人民发动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杀。这一血腥罪行，仍在继续进行中。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七日，美国雇佣军武装入侵古巴，在七十二小时内，在吉隆滩被英勇的古巴军民全部消灭。

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英国军队在科威特登陆。十九日，法国军队袭击突尼斯的比塞大港。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九、二十日，美国出动军舰、飞机，再次武装干涉多米尼加。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五日，荷兰殖民者的海军在西伊里安附近海面袭击印度尼西亚的海军。

一九六二年四月间，印度尼西亚人民在西伊里安展开了抗击荷兰殖民者的游击斗争。

一九六二年五月，美国阴谋扩大老挝内战，并企图直接出兵干涉。十七日，美

国军队进驻泰国；二十四日，英国宣布派遣一中队空军进入泰国。美英这些军事行动，直接威胁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经过老挝人民的坚决斗争，经过社会主义国家和中立国家的共同努力，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签订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及其“议定书”。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美国武装船只轰击古巴首都哈瓦那滨海住宅区。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也门发生军事政变的时候，美国指使沙特阿拉伯出兵干涉。

一九六二年，印度尼赫鲁政府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继续不断地武装入侵中国地区；十月二十日，尼赫鲁政府在中印边境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美国采取海盗行为，对古巴进行震动世界的军事封锁和战争挑衅。

在社会主义各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古巴人民保卫自己祖国主权的斗争，赢得了伟大的胜利。

这两年，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残酷剥削、横暴镇压和武装干涉，继续激起了许多国家的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武装反抗，其中包括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八日的文莱人民的反英武装起义。

事实反复地证明了列宁所说的“战争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由剥削者、统治者和压迫者阶级自己挑起的”这个真理，“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个真理。现在和将来的事实依然会证实列宁所说的这些真理。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既然按照他们政策的需要，不断地在各种地区挑起战争，那末，谁也不可能阻止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反抗压迫的战争。

或许，那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认为我们前面列举的许多战争都不算是战争。他们仅仅承认，只有在那些“高度发达的文明地区”所发生的战争才算是战争。实际上，他们的这种观点也说不上是什么新观点。

列宁老早就批评过认为“在欧洲以外的战争不算是战争”的这类荒谬观点。一九一七年，列宁在一篇演讲中这样嘲笑地说：“我们欧洲人不认为这些战争是战争，因为它们根本不像什么战争，而是对手无寸铁的民族实行最残酷的摧残和屠杀。”

现在，实际上就有列宁所批评的这样的人。他们认为，只要在他们那个地方、那个圈子没有战争，就是天下太平了。至于在其他地方，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是否在摧残和屠杀人民，是否在进行军事干涉和武装冲突，是否在挑起战争，都不算什么一回事。他们所担心的，只是这些地方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反抗的“星星之火”，会闯下大祸，使他们不得安宁。他们认为根本不需要去研究这些地方的战争是怎样发生的，是由哪些阶级进行的，它们具有什么性质，而笼统地武断

斥责这些战争。能够说这种观点是列宁主义的吗？

还有一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一说到战争，就认为这只是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个阵营之间的战争，仿佛除了两个阵营之间的战争以外，就没有其他战争可言了。这个说法也是铁托集团首先发明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人竟然也同铁托集团唱一个调子。这些人根本不愿意看一看现实生活，也不愿意想一想历史。

如果这些人的脑子还不那么健忘的话，就会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时候，世界上并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更没有什么社会主义阵营，可是居然发生了世界大战。

当然，如果这些人的脑子不那么健忘的话，也还可以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一九三九年九月到一九四一年六月德苏战争发生以前，这次大战将近两年时间是在资本主义世界进行的，是在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进行的。这两年的大战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在希特勒进攻苏联以后，苏联成为这次大战中反法西斯强盗的主力军，但是，也不能把一九四一年六月以后的大战看成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参加这次反法西斯阵线的，除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以外，还有英、美、法等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还有许多被压迫被侵略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

可见，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矛盾所引起的，是由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利害冲突所引起的，都是由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

大战的发生并不是来自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没有资本主义国家所存在的那种特殊的对抗性的社会矛盾，根本不需要、也不允许进行向外扩张的战争，世界大战绝不会由社会主义国家挑起。

由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胜利，许多国家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胜利，世界形势继续不断地发生了新的很大的变化。陶里亚蒂等同志说，由于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帝国主义已经不能为所欲为了。这话并没有说错。实际上，这是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不久就指出了的。列宁根据对当时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估计，这样说过：“现在国际资产阶级已经不能为所欲为了。”但是，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当世界力量对比愈来愈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各国人民的时候，当我们说帝国主义者已经不能为所欲为的时候，是不是说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固有矛盾所引起的各种冲突的可能性已经自行消失了呢？是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不再梦想和准备侵犯社会主义国家了呢？是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已经不再侵略和压迫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了呢？是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已经不会再为争夺市场和势力范围而进行生死的斗争了呢？是不是说垄断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残暴地折磨、镇压本国的人民了呢？当然不能这样说。

不从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规律，去观察战争与和平问题，就永远不能了解这些问题。

老机会主义者考茨基认为，“战争是军备竞赛的产物”，“如果自愿就裁军问题达

成协议”，这就“消除了最严重的战争原因之一”。列宁对考茨基和其他老机会主义者这类不从社会制度、剥削制度去观察战争根源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曾经给以尖锐的批判。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去销毁一切武器。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是这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社会发展的规律只能是这样。

现代修正主义者不能用历史的、阶级的眼光去说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所以，他们总是笼统地谈和平，笼统地谈战争，不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有人企图使人相信，实现了全面彻底裁军，压迫者手里没有武器，人民的解放就会“无比地容易”。我们认为这是乱说一通，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本末倒置的。正如列宁所说的，他们是“要用一个把截然不同的东西‘统一起来’的字眼来调和两个敌对的阶级和两种敌对的政策”。

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所谓“和平”，所谓“和平共处战略”，实际上是把争取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统治人物的“明智”上面，而不是依靠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和斗争。他们用各种办法束缚各国人民斗争的手脚，企图麻痹各国人民的革命意志，企图使各国人民放弃革命行动，从而削弱反对帝国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助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的反动气焰，增加世界战争的危险性。

历史唯物论，还是唯武器论？

现代修正主义者认为在原子武器出现以后，社会规律已经不起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理论已经过时。陶里亚蒂同志的看法也是这样。关于在核武器和核战争问题上，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主要分歧，我们的《人民日报》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社论中，已经作了论述。下面，我们准备进一步来探讨这个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适当地、也足够地估计到新武器、新军事技术对军队组织和战争的作用。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有一段很著名的话：“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都不是唯武器论者。

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说过，“谁的后备多，谁的人力多，谁在人民群众中更能支持得住，谁就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又说，“所有这些东西我们都比白卫分子多，都比‘称霸世界的’英法帝国主义这个泥足巨人多”。

为着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再引列宁的一段话。他说：“在任何战争中，胜利属于

谁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情绪决定的。……群众对战争的目的和原因的认识具有巨大的意义，这种认识是取得胜利的保证。”

充分估计人在战争中的作用，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战争问题上提出的一个根本原理。可是有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却常常忘记了这个原理。当原子武器在第二次大战末期出现的时候，有些人的头脑就开始糊涂起来了，认为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毛泽东同志在那时说过：“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我们这些同志比蒙巴顿还落后”。当时担任东南亚盟军最高指挥官的英国贵族蒙巴顿，他发表过谈话说，“认为原子弹会停止远东战争是一个最大的错误”。

当然，毛泽东同志对原子武器的破坏力，是充分估计到的。他说：“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如果爆发核战争，人类将遭受空前的灾难。正因为这样，我们一向主张全面禁止核武器，即完全禁止试验、制造、储存和使用核武器，并且主张销毁核武器。同时，我们也一贯认为，无论如何，原子武器终究不能改变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不能最后解决战争的胜负，不能挽救帝国主义的灭亡，不能阻止各国无产阶级、各国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胜利。

在一九四六年九月间，斯大林这样说过：“我不认为原子弹像某些政治家所想像的那样厉害。原子弹能用来吓唬神经衰弱的人，但它不能决定战争的命运，因为对决定战争的命运来说，原子弹是完全不够的。当然，垄断原子弹秘密会造成威胁，但是对付这点至少有两种办法：（一）对原子弹的垄断不会继续很久；（二）原子弹的使用将被禁止。”斯大林的这段话，是很有预见性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曾经喧嚷一种所谓军事理论，认为空军优势、突然袭击，就可以速战速决，取得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际情况，证明了这种理论的破产。核武器出现以后，一些帝国主义者又在喧嚷这种理论，进行核讹诈，认为使用核武器，就可以迅速解决战争胜负。可以肯定，他们的这种理论，也一定要遭到破产。可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像铁托集团那样，却替美帝国主义者及其他帝国主义者效劳，大肆吹嘘这种理论，用以恐吓各国人民。

美帝国主义者的核讹诈政策表现了它奴役世界的恶毒野心，同时表现了它自己的恐惧。

必须知道，首先动用核武器，对帝国主义者是有致命的后果的。

一、帝国主义者如果首先使用核武器，进攻其他国家，必然使它们自己在全世界陷于极端的孤立。因为这种进攻是对人类正义的最大罪行，是同全人类为敌。

二、用核武器威胁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者，首先是使本国人民受到威胁，使本国人民处在对核武器的恐惧之中。帝国主义者坚持核讹诈政策，必将逐步地激起本国人民的觉悟，使本国人民起来反对他们。参加美国向日本第一次投掷原子弹的一个空军人员，由于战后全世界人民谴责原子轰炸，曾企图自杀，多次被送进“精神病院”。这件事本身说明了美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是如何不得人心。

三、帝国主义者进行战争的目的,在于争夺地盘,扩大市场,抢劫其他国家的财富,奴役其他国家的劳动者。但是,核武器的破坏力不能不使帝国主义者考虑,使用核武器所造成的结果,同他们追求的实际利益是相矛盾、相抵触的。

四、核武器的秘密早已不能垄断。你有核武器,不能禁止其他国家也有核武器。你有导弹,不能禁止其他国家也有导弹。帝国主义者妄图用核武器毁灭对方,实际上也就是把自己放在被毁灭的地位。

前面所说的,是帝国主义者使用核武器进行战争,必然引起的后果的一些问题。我们历来认为签订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协议是可能的,其重要根据之一,也在这里。

同时,还必须知道,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疯狂地扩充核军备的政策,也增加了资本帝国主义制度本身的危机。这就是:

一、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被迫承受空前沉重的军事开支的负担,本国国民经济越来越走向畸形的军事化,使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和它的扩军备战政策,越来越遭到人民的反对。

二、帝国主义者进行军备竞赛,特别是进行核军备竞赛,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各垄断集团之间的斗争。

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所写的《反杜林论》一书中曾说:“军国主义支配着欧洲并吞噬着欧洲。可是这种军国主义本身包含着自已毁灭的萌芽。”

现在更可以这样说,美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扩充核军备的政策,正在支配着并且吞噬着北美和西欧,可是这种政策,这种新的军国主义,本身包含着帝国主义制度自己毁灭的萌芽。

可见,美帝国主义者和它的伙伴们实行扩充核军备政策,结果只能使它们自己反对自己。如果它们敢于使用核武器进行战争,结果必将是使它们自己毁灭自己。

结论是什么呢?同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谓“人类毁灭”的说法相反,结论只能是:

第一,将是人类消灭核武器,而不是核武器消灭人类;

第二,将是吃人的帝国主义制度被人类所消灭,而不是人类被帝国主义制度所消灭。

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由于核武器的产生,“人类的命运今天是不确定的”。他们认为,在核武器存在的条件下,在核战争的威胁下,谈论选择什么社会制度的问题已经没有意义了。按照这种说法,那末,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所代替的社会发展规律,到哪里去了呢?列宁所阐述的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个真理,又到哪里去了呢?这种说法难道不是真正的“宿命论”、“怀疑论”和“悲观论”吗?

我们在《列宁主义万岁》一文中这样说过:

“只要各国人民提高了觉悟,有了充分的准备,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已掌握了现代武器的条件下,可以肯定,如果美帝国主义者或其他帝国主义者拒绝达成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的协议,而且一旦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用原子武器

和核武器进行战争，结果将只是这些在世界人民包围中的野兽自身很迅速地被毁灭，而决不会是什么人类的毁灭。帝国主义发动罪恶的战争，始终是我们所反对的，因为帝国主义战争会给各国人民（包括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牺牲。但是，如果帝国主义者把这种牺牲硬加在各国人民头上，我们相信，正如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一样，这种牺牲是会得到代价的。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

真理难道不就是这样吗？

但是，这几年来，有一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他们大肆歪曲、谴责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硬把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说成是“人类的废墟”，把帝国主义制度和人类的命运等同起来。这种论调，实际上是维护帝国主义制度的论调。如果这些人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就会知道，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新制度，这本来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提法。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过：“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难道恩格斯所说的封建制度的废墟就是“人类的废墟”吗？

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写的《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一文中也说过，无产阶级要“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组织社会主义制度。”难道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废墟就是“人类的废墟”吗？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说的旧制度的废墟，说成是“人类的废墟”，这是用无理取闹的手段代替严肃的争论。能够说，这就是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说的“和谐的调子”吗？能够说，这就是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要求的“用能容许的语气进行论争”吗？其实，陶里亚蒂同志本人在意大利法西斯制度复灭的时候，就说过这样的话：“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伟大的任务：我们应当在法西斯主义的废墟上，在反动暴政的废墟上，建立起新的意大利”。

每一个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不能不考虑到帝国主义者可能采用罪恶滔天的手段，使各国人民遭受重大的牺牲，经历重大的苦难。但是，这种考虑是为着唤起人民的觉悟，更好地动员和组织人民，找出正确的解放斗争的道路，找出人类在帝国主义威胁下摆脱苦难、获得和平的道路，找出有效地制止核战争的道路。

谁都知道，甚至连美帝国主义者也知道，一切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都知道，社会主义国家绝对不会发动对外侵略的战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防是为了保卫自己不受侵犯，而绝不是为了侵犯别的国家。如果侵略者把战争强加于社会主义国家身上，那末，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首先是为了自卫而进行的防御战争。

社会主义国家掌握核武器，也完全是为着防御的目的，为着制止帝国主义者发动核战争。社会主义国家有了核优势，也根本不会、不允许、不需要利用核武器去进攻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坚决反对核讹诈政策，主张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对核武器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方针、政策，就是这样。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方针、政策。现代修正主义者在核武器问题上，故意歪曲我们的态度、方针、政策，制造一些卑鄙无聊的诽谤和谎言，实际上是为了掩盖帝国主义的核讹诈，为了掩盖他们自己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冒险主义和投降主义。应当指出，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冒险主义和投降主义，是很危险的，是一种最不负责任的表现。

离奇的提法

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它的社会制度性质，同情和支持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绝对不会用发动对外战争的办法，来代替别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各国人民的解放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这是从马克思以来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包括执政的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论点。这个论点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所说的“革命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论点。

在任何国家中，如果那里的人民自己没有革命的要求，谁也不能够从外面把革命强加给他们；如果那里没有革命危机、没有成熟的革命条件，谁也不能够在那里制造革命。当然，如果那里的人民自己要求革命、自己起来革命，那末，谁也不能够阻止他们革命，像谁也不能够阻止古巴的革命、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南越的革命一样。

陶里亚蒂等同志说，实行和平共处，就意味着“排除外国为了‘输出’反革命或革命来进行干涉的可能性”。请问：所谓“外国输出革命”，这是不是说社会主义国家要输出革命呢？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从来就是这么说的。难道一个共产党人可以这样说吗？至于说帝国主义国家，它们从来都是对外输出反革命的。谁能够说，哪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没有输出过反革命呢？人们能够忘记帝国主义者直接干涉过伟大的十月革命吗？人们能够忘记帝国主义者直接干涉过中国革命吗？谁能够否认直到现在美帝国主义者还霸占着我国的领土台湾呢？谁能够否认美帝国主义者一直在干涉古巴的革命呢？美帝国主义者作为国际宪兵，现在不正是在世界各地大力输出反革命吗？不正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力图干涉各国内政吗？

陶里亚蒂等同志不区别社会制度性质不同的国家，不了解“革命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论点，而在谈论和平共处的时候，避开帝国主义者一直输出反革命这样的事实，笼统地把所谓“输出反革命”和“输出革命”相提并论，这种离奇的提法，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基本论点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坚持列宁的观点。

我们在前面引述过，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坚决谴责战争”，“一向斥责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但是，列宁从来都是认为必须反对非正义的战争，而拥护正义的战争，没有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现在有人竟然不知羞耻地把自己比做列宁，说列宁、

以至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都是同他们一样反对战争的。他们阉割了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理论和政策。谁都知道，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他主张，一旦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本国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就应当把帝国主义的战争转变为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即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反对本国帝国主义者的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十月革命爆发以后的第二天，在列宁的主持下，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有名的《和平法令》。这个法令向国际无产阶级，特别向英、法、德三国觉悟的工人们呼吁，“了解他们现在所担负的使人类摆脱战祸及其恶果的任务，定会以多方面无比坚决果敢的行动，帮助我们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这个法令指出，苏维埃政府认为，“各富强国家为了如何瓜分它们所侵占的弱小民族而继续进行战争，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并郑重声明，决心根据上述对一切民族都公正的条件，立即签订和约，终止这场战争”。列宁提出的这个法令是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文件。可是，现在有人竟然敢于歪曲这个文件，割裂这个文件，把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国家为瓜分世界、压迫弱小民族而进行的战争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故意地篡改为“战争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这些人把列宁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描写成为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他们这样明目张胆地歪曲列宁，歪曲列宁主义，歪曲历史，还要振振有词地说别人“不理解马克思主义革命斗争学说的实质”，这不是一种奇谈与怪论吗？

中国共产党人所以受到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咒骂，就是因为我们反对一切曲解列宁主义的奇谈与怪论，坚持恢复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理论的原来面貌。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力量的团结和发展，依靠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依靠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依靠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斗争，来保卫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这是世界各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的正确路线，这条路线是完全符合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的。有人恶意地把这条路线说成是：“按照这种‘理论’，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是要通过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通过破坏、通过千百万人的流血和死亡。”这些人把保卫世界和平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对立起来，并且认为，要和平就是要各国人民向帝国主义者屈膝，要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取消自己的解放斗争。他们只是乞求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恩赐”世界和平，而不是依靠世界上各种爱好和平的力量的联合斗争去争取世界和平。他们的这种“理论”，这条路线，是完全错误的，是反列宁主义的。

中国共产党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以及陶里亚蒂等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同我们的分歧究竟在哪里，我们在《人民日报》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社论中，已经作了说明。在那篇文章中，我们有以下一段话：

“在如何防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坚决揭

露帝国主义，主张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主张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主张最广泛地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士，同时一贯主张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利用谈判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所有这一切，正是为了有效地防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这种主张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符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这是防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正确方针。我们坚持这个正确的方针，正是深信依靠上述各种力量的联合斗争，能够防止世界战争，怎么能说这是不相信世界战争可以避免，怎么能说这是‘好战’呢？如果按照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的主张，美化帝国主义，把和平的希望寄托于帝国主义，对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采取消极和反对的态度，向帝国主义屈服和投降，那只会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假的和平，或者带来真的战争。这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一切爱好和平人民不能不坚决反对的错误方针。”

现在，在这里，把我们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基本论点，再简要地重说一下：

第一，我们一直认为，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势力和侵略势力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十几年来，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更有利于社会主义，更有利于民族解放斗争，更有利于人民民主的斗争，更有利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人民是决定的因素。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是孤立的。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政策，依靠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政策，那末，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避免核战争是可能的，签订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协议是可能的。

第二，世界各国人民要保卫住世界和平，制止新的世界大战，制止核战争，必须互相支持，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美国人民在内，反对以美国反动派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

第三，社会主义国家主张和坚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进行平等贸易。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反对用武力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不干涉其他任何国家的内政。有人认为，和平共处将使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跟着变革，和平共处是“世界范围内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有人认为，和平共处政策是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各国人民解放的最先进的斗争形式”。他们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问題，同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斗争的问题、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问题，混淆在一起，根本歪曲了列宁所说的和平共处政策。

第四，我们一向认为，对于帝国主义者侵略社会主义国家的危险性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同时，我们从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可能在若干问题上，包括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经过和平协商达成协议，实行必要的妥协。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

第五，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尖锐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是不可调和的。在帝国主义各国之间，帝国主义国家集团之间，必然发生或大或小的、或直接或间接的、或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冲突。这是帝国主义的实际利害所驱使的，是它们固有的本性所决定的。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帝国主义各国之间因为实际利益而彼此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已经消失，这种说法等于说帝国主义已经脱胎换骨，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涂脂抹粉。

第六，既然资本帝国主义和剥削制度的存在是战争的根源，那末，谁也不可能保证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不会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进行侵略的战争，进行反人民的战争；另一方面，谁也不可能制止已经觉悟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起来进行反抗的革命战争。

第七，列宁所肯定和强调的“战争是政策的继续”这个原理现在依然有效。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也根本不同。这种情况决定了，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有着根本不同的立场。从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方面说来，它们进行战争或者要求和平，都是为了追求或者保持帝国主义的利益。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和平政策的继续，帝国主义和平是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继续。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从来否认这一点，正如列宁所说的，“‘战争是和平时期政策的继续，和平是战争时期政策的继续’的这一思想始终是这两种色彩的和平主义者所不能理解的”。

第八，人类永久和平的时代将要到来，消灭一切战争的时代将要到来。我们正在为此而斗争。但是，这个伟大时代的到来，只能是在人类消灭资本帝国主义制度以后，而不可能是在这个制度消灭以前。正如莫斯科声明所说的：“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将最终消除产生任何战争的社会原因和民族原因。”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我们基本的论点就是这样。

我们的论点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世界上客观存在的大量现象进行分析，对世界各国相互间极端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进行分析，对伟大十月革命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世界新时代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而得出来的。这些论点不但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中经受了反复的考验。现代修正主义者和他们的追随者无法驳倒这些论点，因此，他们只好依靠肆意歪曲、制造谎言等办法，企图打倒真理。

但是，真理怎么会被打倒呢？那些妄图打倒真理的人，迟早总要被真理所打倒。这样说不是更正确一些吗？

现在，有些自命为“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自以为世界历史是按照他们的指挥棒运转的，而不是按照客观存在的社会规律发展的。说到这一点，使我们回忆到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引用过的法国著名哲学家狄德罗的一段话：

“能感觉的钢琴，有这样的一个神经错乱的瞬间：以为它自己是世界上唯一存在的钢琴；而宇宙间的全部谐调，都是在它自己内部进行的。”

让那些以为自己就是一切、而一切都包含在自己的主观里的历史唯心论者好好地想想这段话吧！

五、国家与革命

陶里亚蒂同志所谓“结构改革论”的“积极贡献”是什么？

陶里亚蒂等同志，把他们的“结构改革”的“基本路线”，说成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把他们的“结构改革”的论点，“作为目前形势下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战略原则”。

看来，陶里亚蒂等同志不仅要把“意大利道路”，加在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身上，而且还要强加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的身上。因为他们把自己提出的所谓“意大利道路”当成目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似乎是唯一的道路，而不能有旁的道路。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是很自负不凡的。

为着把问题弄清楚，我们不妨把他们提出的“意大利道路”、“结构改革”的主要内容，首先介绍如下：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打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这个最根本的观点，在今天是不是仍然完全有效？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他们说，“我们考虑到世界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因而显然对这个观点作了一些修改。”

二、“今天意大利工人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干俄国干过的事情。”这是陶里亚蒂同志在一九四四年四月间说的，在意共十大的报告中，他又重申这是“具有纲领性”的意见。

三、意大利工人阶级能够“在宪法制度范围内把自己组织成为统治阶级”。

四、意大利宪法，“给予劳动力量以新的首要的地位”，“准许和规定了若干结构改革”。“争取赋予意大利民主以新的社会主义的内容的斗争在宪法中有了广阔的发展场所。”

五、“我们可以谈论充分利用合法途径、甚至利用议会以实现深刻的社会改造的可能性。”“必须赋予议会以充分的权力，使它不仅具有立法任务，而且具有它所应有的领导和监督政府活动的职权”，“要把议会权力确实地扩大到经济方面”。

六、“建立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新民主制度是同形成新的历史集团紧密地联系着，这个新的历史集团，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为改变社会结构而斗争，而且是政治、思想和道德革命的承担者。”

七、“摧毁这个最落后和最累赘的意大利社会结构，走上民主和社会主义改造的

道路，不能够也不应该推迟到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夺得政权以后”。

八、意大利的国有化经济，即国家垄断资本，可以“同垄断组织相对立”，可以“代表人民群众”，可以成为“反对垄断资本发展的更有效的工具”。通过国有化，就能够“粉碎和废除巨大的生产力量的垄断所有制，并且把垄断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

九、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能够“保证经济的民主发展”，能够成为“反对大资本权力以打击、限制和粉碎大垄断集团统治的斗争工具”。

十、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能够接受“曾一度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计划化和规划化的概念”。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团结力量，充分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自主来参加计划政策方针的制定和计划政策的实施”，能够使计划政策“成为满足人们和全国集体的需要的工具”。

总之，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谓“意大利道路”，所谓“结构改革”，就是：政治方面，在保存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通过资产阶级民主、宪法、议会的“合法途径”，“逐步改变国家内部均势和结构”，“使新的阶级强行进入国家的领导”。至于什么是“新的阶级”，他们的说法总是含糊不清的。经济方面，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国有化”、“规划化”、“国家干预”，逐步达到“限制”、“粉碎”垄断资本。换句话说，就是在意大利实现社会主义，可以经过资产阶级专政，而不必经过无产阶级专政。

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他们的这类思想，是“对工人阶级的革命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化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可惜，这类思想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而是很古老很陈旧的东西，是马克思、恩格斯老早就无情批判过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以前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如果说陶里亚蒂等同志有什么“积极贡献”的话，决不是什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恰恰是发展了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他们把自由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发展成为垄断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但是，这种“发展”，实际上也是铁托集团老早提出的，是陶里亚蒂等同志对铁托集团的“经验”作了“研究和深入了解”之后接受过来的。

同列宁主义作一个比较

在资产阶级专政没有被推翻以前，在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建立的时候，能不能够过渡到社会主义，能不能够实现社会主义，——这历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进行争论的最根本问题。在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熟知的《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两部伟大著作中，列宁全面地深刻地阐明了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保卫了和发展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彻底揭露了和批判了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

实际上，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谓“结构改革”，所谓“改变国家内部均势”等等，

都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批判过的考茨基的观点。陶里亚蒂同志说：

“中国同志要吓唬我们，他们向我们提到考茨基，我们的政策同他的观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是不是我们在吓唬陶里亚蒂等同志呢？是不是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政策同考茨基的观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呢？我们也“请他们允许我们提醒”：好好地再读一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吧。

陶里亚蒂等同志不愿意理会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究竟有什么基本的区别。

列宁说：

“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现成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形式已经具备了；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种现成关系，……”。

在阶级社会里，任何国家政权都是为着保护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即一定的生产关系。正如列宁所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任何社会经济制度，都必须有与它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为它服务，为它扫除发展的障碍。

从过去的历史来看，不论是奴隶主，封建主，或者是资产阶级，为了使它们的生产关系成为统治的生产关系，为了巩固和发展它们的生产关系，都必须使它们在政治上成为统治阶级，都必须掌握国家政权。

剥削阶级进行革命和无产阶级进行革命，不同的根本点，在于三大剥削阶级，即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在它们还没有取得政权以前，社会上已经存在着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有的甚至已经是相当成熟了。而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前，社会上却没有现成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道理是很明白的：新的私有制能够在旧的私有制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出来，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却永远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出来。

可以把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思想和纲领同列宁主义作一个比较。

同列宁主义相反，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没有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无产阶级政权，就能够逐步出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认为，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可以不经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谓“意大利道路”，所谓“结构改革论”，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究竟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呢，还是陶里亚蒂等同志对呢？究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缺乏实际感”呢，还是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思想和纲领“缺乏实际感”呢？

让我们来了解了解意大利的实际吧。

意大利是一个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据统计，在和平时期，这个国家里，有官吏几十万人，常备军队四十多万人，宪兵近八万人，警察约十万人，有各级法庭一千二百多个，监狱近一千所。秘密的镇压机器和武装人员都没有包括在内。此外，在意大利还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的驻军。

陶里亚蒂等同志在他们的提纲中津津乐道意大利的什么民主、宪法、议会等等，却对意大利现有的军队、宪兵、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工具不做阶级分析。这些暴力工具究竟保护谁、镇压谁？是保护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镇压垄断资产阶级呢？还是保护垄断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呢？任何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谈论国家制度的时候，都不应当回避这个问题，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让我们再看看意大利的这些暴力工具究竟是在干什么的？这里，只举几个例子来说：

在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〇年的三年中，意大利政府在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中，就打死、打伤三千多人，逮捕九万多人。

一九六〇年七月，塔姆布罗尼政府在镇压意大利劳动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中，打死十一人，打伤和逮捕各一千多人。

在一九六二年范范尼的所谓“中左”政府成立以后，五月在切加诺，七月在都灵，八月在巴里，十月在米兰，十一月在罗马，连续发生政府镇压群众罢工和示威的事件，仅在罗马事件中，就打伤数十人，逮捕约六百人。

尽管这里举的是一些例子，但是，所谓“意大利民主”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主，不是充分暴露出来了吗？难道在一个具有为镇压人民而建立了公开的和秘密的强大国家机器的意大利，在那里，所谓“意大利民主”，能够说不是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的“民主”，即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的专政吗？

在陶里亚蒂等同志所吹嘘的“意大利民主”制度下，难道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能够参加制定意大利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吗？如果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是能够参加的，那末，你们能不能对现在意大利政府镇压人民的种种罪行负责呢？能不能对意大利政府让美国在意大利建立军事基地、对意大利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等行为负责呢？当然，你们会说，你们不能对意大利政府的这些对内对外反动政策负责。可是，你们既然自称能够参加政策的制定，为什么又不能丝毫改变现在意大利政府这些最根本的政策呢？

对于民主的阶级性质不加任何区别，而笼统地吹嘘“民主”，这是第二国际英雄们和右翼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唱烂了的调子。而现在有一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却把这些烂调子当作自己的“新创作”，这岂不是一件怪事吗？

陶里亚蒂同志或许想把自己同社会民主党人划一条小小的界线。他认为，就“抽象的道理”来说，可以承认国家的阶级性质，也可以承认意大利现在的国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要“把道理说得具体”，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他认为，就“具体的道理”来说，“从现行国家结构出发”，“实现宪法规定的深刻改革”，就能够“改变当前权力集团并且为形成另一个有劳动阶级参加和获得他们应有的职能的集团创造条件”，使意大利“在民主与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把陶里亚蒂同志这些暧昧的话翻译成人们能够看懂的话，就是：用不着意大利的人民革命，就可以使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逐步发生“质的改变”。

陶里亚蒂同志的“具体道理”反对他的“抽象道理”。他在说“抽象道理”的时候，接近了一点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当他说到“具体道理”的时候，就又远远地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概他认为，只有这样，才不算是“教条主义”吧！

按照陶里亚蒂等同志的“具体道理”来估量一番，那末，他们同社会民主党的小小界线就看不见了。

当现在有些人竭力糟蹋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的时候，当现代修正主义者假借列宁的名义猖狂地进攻列宁主义的时候，我们想提醒人们读一读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下面两段话：

“社会党人所以在理论上近视、被资产阶级偏见俘虏并在政治上背叛无产阶级，主要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作为这个社会基础的阶级斗争相当尖锐的时候，除了资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外，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道路。幻想走第三条道路，这是小资产者的反动的悲叹。一切先进国家百多年来资产阶级民主和工人运动发展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近五年来的经验更证明了这一点。全部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也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阐明了在商品经济的统治下资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必然性，能够代替资产阶级的，没有别的阶级，只有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所发展、扩大、团结、巩固起来的阶级，即无产阶级。”

“社会党人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另一个错误，在于不懂得从古代的民主萌芽时期起，在几千年过程中，民主的形式必然随着统治阶级的更换而更换。在古代希腊各共和国中，在中世纪各城市中，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有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如果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世界上政权第一次由少数剥削者手里转到多数被剥削者手里的现象，能够在旧式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旧范围内发生，不需要最急剧的转变，不需要建立新的民主形式和体现运用民主的新条件的新机关等等，那就荒谬绝伦了。”

请看，列宁在这里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根据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全部经验，根据十月革命的全部经验，得出了这样明确、这样肯定的结论。列宁认为，在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旧范围内，不可能使政权从资产阶级的手里转移到无产阶级手里，不可能实现人类历史上这种最深刻的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从列宁在一九一九年说这些话的时候到现在，世界上一切陆续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经验，不是在反复地证明列宁所阐明的这些具体真理吗？不是在反复地证明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人类解放的共同道路吗？

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声明，不是在重申各国工人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共同道路吗？当然，各国工人阶级是经过和平的方式还是经过非和平的方式，“是决定于反动集团对于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抵抗到什么程度，决定于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这一或那一阶段上这些集团是不是采取暴力”。但是，不管采取哪种方式，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旧的国家机器，都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陶里亚蒂等同志不是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经验出发，不是从意大利现实的社会生活出发，而是从现有的意大利宪法出发，认为意大利利用不着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就能够在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他们所说的“新民主制度”，就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扩大”。这就难怪，他们的所谓“具体道理”，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体真理，是多么的不同。

一部十分奇妙的宪法

意共十大提纲这样写着：“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要经过建立宪法所规定的新国家（这个新国家和目前的制度是大不相同的）和经过新的领导阶级进入这个国家的领导。”

按照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说法，意大利的宪法简直是一部十分奇妙的宪法：

一、共和国宪法“是意大利大多数人民自由缔结的团结公约”。

二、共和国宪法规定了“某些带有社会主义标记的根本改革”。

三、共和国宪法“确认主权属于人民的原则”。

四、共和国宪法“宣布国家政权‘以劳动为基础’”，它“给予劳动力量以新的首要的地位”。

五、共和国宪法承认了“劳动者享有进入国家领导的权利”。

六、共和国宪法“肯定必须进行革新我国社会、并推动它走向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政治和经济改造”。

七、共和国宪法已经解决了“在民主法制的范围里走向社会主义的原则问题”。

八、意大利人民“能够在完全接受和维护宪法的情况下反对国家的阶级本质和阶级目的”。

九、意大利工人阶级能够“在宪法制度范围内把自己组织成为统治阶级”。

十、“遵守、保卫和完全实施共和国宪法是党的整个政治纲领的中枢”。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意大利现有的宪法是有一些美妙的词句的。但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怎么能够把资产阶级宪法所写的某些美妙词句，当作真实的生活呢？

意大利现行宪法一共有一百三十九条。但是归根到底，最能够表达这个宪法的阶级本质的，还是第四十二条关于“法律承认并保障私有财产”这一个规定。从意大利的现实生活来说，这个规定就是保障垄断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在宪法中有了这个规定，垄断资产阶级的要求就可以得到满足，他们的私有财产就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企图掩盖意大利宪法的这个实质，把这个宪法说得天花乱坠，这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陶里亚蒂等同志说，意大利宪法“带有工人阶级参与的标志”，它“确认主权属于人民的原则”，“承认劳动者的若干新权利”。陶里亚蒂等同志在谈到这种所谓“原则”

和“新权利”的时候，为什么不把意大利宪法和其他资产阶级宪法比较一下，再做出论断呢？

应当知道，“主权属于人民”，这是从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人权宣言”发表以来，几乎所有资产阶级的宪法都有的一条，并不是意大利宪法所特有的东西。“主权属于人民”这个口号，曾经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朕即国家”的革命口号。而在资产阶级确立自己的统治以后，资产阶级宪法中的这个条文就成为掩盖资产阶级专政的空洞词句了。

应当知道，并不是只有意大利宪法有关于“公民自由权利”的条文。几乎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中，都有这类的条文。但是，有的宪法在规定了公民的自由权利之后，接着就做了限制或取消这类权利的规定。正像马克思评一八四八年法兰西宪法所说的：

“每个条款都包含着相反的一面，而完全取消条款本身”。有的宪法虽然没有在每条之后都接着做出这种限制或取消的规定，而资产阶级政府尽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和手段，来达到他们的这种目的。意大利的宪法属于前一种情况，就是说，它更是一种赤裸裸的资产阶级宪法，根本说不上是什么“具有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精神”的宪法。

列宁说过：“当法律同现实脱节的时候，宪法是虚假的；当它们是一致的时候，宪法便不是虚假的。”意大利现在的宪法正是包含着“虚假的”和“不是虚假的”这种两重性。所谓“不是虚假的”，就是公开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那类实质的东西；所谓“虚假的”，就是那些用以欺骗人民的美妙词句。

陶里亚蒂同志在一九四八年一月意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国政治的前途以至于宪法的前途是不确定的，因为进步力量与保守反动力量之间将发生严重的冲突是可以预料得到的：前者要以我们宪法的一部分为依据，而后者却要利用宪法的另一部分来作为自己进行抵抗的武器。所以，如果局限于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说：‘现在一切都写在宪法上了；让我们实现宪法上的那些规定，到那时人民的一切愿望就会实现了。’那就是一种严重的政治错误和欺骗人民的行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如果没有公民的觉悟、他们的力量和他们制止反动派任何阴谋的能力来保卫自由的话，那末任凭哪一种宪法都不可能拯救自由。如果劳动群众中的有组织有觉悟的力量不善于领导全国人民走向民主进步与社会进步的道路，不善于粉碎反动势力的反抗的话，那末任凭哪一种宪法的章则本身也不可能保障我们有这种进步。”

或许，在一九四八年说的这段话里，陶里亚蒂同志还保留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承认意大利政治的前途和宪法的前途是不确定的，承认意大利宪法有保守反动力量可以利用的和进步力量可以利用的这种两重性。当时他认为，对于意大利宪法的迷信，“是一种严重的政治错误和欺骗人民的行为”。

在一九五五年一月间，陶里亚蒂同志在一篇演讲中又说：“很清楚，我国的宪

法包含着具有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精神的一种政治的同时也是经济和社会的纲领的要点”。就是说，在这个时候，陶里亚蒂同志已经把意大利宪法当作“具有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精神”的宪法了。

这样，一九五五年的陶里亚蒂起来反对了一九四八年的陶里亚蒂。

从此以后，陶里亚蒂同志就急转直下，简直是把意大利宪法完全神化了。

一九六〇年，陶里亚蒂同志在意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我们在宪法范围内行动，而且对一切问我们执政时要做什么事情的人，我们请他们看看宪法。我们在我们的《纲领声明》中写过，我们现在重说一遍：可以‘在完全符合宪法法制的情况下实现必要的结构改革，以便打垮垄断集团的权力，保卫全体劳动者的利益不受经济和金融寡头损害，把这些寡头排除在政权之外和使劳动阶级进入政权’。”就是说，陶里亚蒂同志要求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都要在完全符合资产阶级宪法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依靠资产阶级宪法，去“打垮垄断集团的权力”。

一九六二年，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又重申他们这种意见是“坚定不移的”。他们说：“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要“经过建立宪法所规定的新国家和经过新的领导阶级进入这个国家的领导”；是要“遵循宪法来要求和强制进行国家的变革，在国家内部夺得新的实力地位，以及推进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要形成“能够在合乎宪法法制的条件下实现意大利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政治集团”。他们还说：“在完全接受和维护宪法的情况下反对国家的阶级本质和阶级目的，进行广泛的、协调的行动，这种行动旨在把国家推上一条能够朝着社会主义发展的进步民主道路”。

总之，陶里亚蒂等同志是要在意大利资产阶级宪法的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而根本忘记了：即使意大利宪法有一些词句美丽的条文，但是，在垄断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器的条件下，在垄断资产阶级拥有全副武装的条件下，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在一有机会的时候，就把宪法宣布为废纸。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需要揭露资产阶级宪法的虚假性，同时也应当利用资产阶级宪法的某些可以利用的条文，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在普通的情况下，如果拒绝利用资产阶级宪法进行可能的合法的斗争，这是错误的，这就是列宁所说的“左”倾幼稚病。但是，号召共产党员，号召人民去迷信资产阶级宪法，宣传资产阶级宪法能够给人民以社会主义，并且把遵守、保卫和完全实施资产阶级宪法说成是“党的整个政治纲领的中枢”，这就不简单是什么“幼稚病”，而已经是如列宁所说的，在精神上做了资产阶级偏见的俘虏。

当代的“议会迷”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也承认实现社会主义要有斗争，要经过斗争。但是他们把人民的斗争限制在资产阶级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并且把议会的作用放在

首要的地位。

陶里亚蒂同志在叙述意大利今天的宪法是如何产生的时候，说：“这是由于共产党人在一九四六年拒绝采取破坏法制来拼命试图夺取政权的道路而选择了参加立宪议会的道路”。

陶里亚蒂同志就是这样把“议会的道路”，作为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多年来，陶里亚蒂等同志反复地强调：

“今天，已经普遍提出有可能采取民主法制形式、甚至议会形式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论点”。“这个论点就是我们在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六年的那个论点”。

“可以利用议会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

这里，我们愿意同陶里亚蒂等同志讨论：利用议会形式能否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

应当把问题说清楚。我们从来认为参加议会的斗争，是工人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应当利用的一种合法斗争手段。在应当利用议会斗争的时候拒绝利用，而玩弄革命的儿戏，玩弄革命的空谈，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决反对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直坚持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所阐述的全部理论。有人故意曲解我们的观点，说我们一概否认议会斗争的必要性，否认革命发展的曲折性，说我们认为各国人民革命可以在一天早上到来，或者如陶里亚蒂同志今年一月十日答复我们的文章中所说的我们要意共同志“只限于宣传和等待革命的伟大时刻”。采用这种歪曲对方论点的办法来讨论问题，在最近一个时期，几乎成了那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对付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得意的伎俩。

现在要问：在对待资产阶级议会问题上，我们同陶里亚蒂等同志的分歧何在呢？

首先，我们认为资产阶级议会，包括意大利现在的议会在内，都有它的阶级性，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装饰品。正如列宁所说的：“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后台决定的而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来执行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愈发达，交易所和银行家就愈能操纵资产阶级议会”。

其次，我们主张利用议会斗争，但是反对散布“议会迷”的幻想。也正如列宁所说的：工人阶级政党“主张利用议会斗争，主张参加议会斗争，但是他们又无情地揭露‘议会迷’，即无情地揭露认为议会斗争是唯一的或者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主要的政治斗争形式的信念”。

又其次，我们主张利用资产阶级议会的讲坛，来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脓疮，揭露资产阶级议会的欺骗性。资产阶级考虑自己的利益，在一定条件下，在他们的议会中容纳工人阶级政党的代表，同时，他们也正是企图用这种办法来欺骗、腐化以至收买某些工人代表，某些工人领袖。因此，在进行议会斗争的时候，工人阶级政党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并且随时坚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

在上述三个问题上，陶里亚蒂等同志根本抛弃了列宁主义的观点。他们把议会看成是超阶级的东西，毫无根据地夸大资产阶级议会的作用，把议会看成是意大利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

陶里亚蒂等同志对意大利的议会，完全着迷了。

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有了什么“公正的选举法”，“在议会中形成符合人民意志的多数”，就会“实行深刻的社会改革”，“改变当前生产关系，从而也改变大财产制度”。

事情真能够是那样吗？

不。事情只能够是这样：在保留资产阶级军阀官僚的国家机器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及其可靠的同盟者要在通常情况下，按照资产阶级选举法，取得议会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根本不可靠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议会中都占有议席，有的党还占有相当多的议席。但是，资产阶级总是采取种种手段，或者是宣布选举无效，或者是解散议会，或者是修改选举法和宪法，或者是宣布共产党非法，不允许共产党的议员成为议会中的多数。法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一个相当时间内，获得选票最多，在议会中也是第一大党，但是，当垄断资产阶级采取修改选举法，以至修改宪法的手段以后，就剥夺了法国共产党大量的议席。

只是依靠选票，能不能够使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呢？历史上任何一个被压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都不是依靠选票的。资产阶级宣扬议会民主和选举制度，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代替封建主而成为统治阶级，也都不是依靠选票的。无产阶级要成为统治阶级，更不可能是依靠选票。正如列宁在《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一文中所说：“只有坏蛋或者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资产阶级压迫下和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方式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这是绝顶的愚蠢或绝顶的虚伪，这是用旧制度旧政权下的投票来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

历史告诉我们：当“工人政党”放弃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属品，使自己成为资产阶级御用的政党的时候，资产阶级也可以允许这样的党在议会中占有暂时多数的议席，并组织政府。像英国工党就是这样，已经背叛了社会主义革命纲领的若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也是这样。但是，这只能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专政，丝毫不可能改变无产阶级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英国工党一九二四年以来曾经三次执政，但是，帝国主义的英国照旧是帝国主义的英国，英国的工人阶级的无权状态照旧是无权状态。我们要问：陶里亚蒂同志是不是想步英国工党和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后尘？

意共十大提纲说：必须赋予议会以立法、领导和监督政府活动的充分权力。我们不知道意共的一些领导人所渴望的这种议会的权力，究竟将由谁来赋予？是由资产阶级赋予，还是由陶里亚蒂等同志赋予？事实是：资产阶级议会的权力，是资产

阶级赋予的。资产阶级赋予它的议会的权力的大小，是由资产阶级根据它的利益来决定的。不管资产阶级赋予它的议会的权力有多大，议会总不可能成为资产阶级国家的真正权力机关。资产阶级用以统治人民的真正权力机关，是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组织，而不是资产阶级议会。

共产党人抛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光指望通过投票，在资产阶级议会里取得多数，并等待着被赋予领导国家的权力，这同考茨基的议会道路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考茨基说：“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驾于政府之上的主宰”。列宁批评考茨基的道路说：“这就是最纯粹最卑鄙的机会主义”。

陶里亚蒂同志在一九五六年三月谈到利用合法途径和议会途径的时候说：“我们现在所做的，在三十年前是既不正确，又不可能的，这会是像我们当时所说的纯粹机会主义。”

有什么根据可以说，在三十年前是既不正确又不可能的东西，到了现在就成为既正确又可能的东西呢？有什么根据可以说，过去是纯粹的机会主义，现在忽然成为纯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呢？陶里亚蒂同志的话，实际上承认了他们现在所走的路，同过去机会主义者所走的路是一样的。

但是，当别人说他们走的就是议会道路的时候，陶里亚蒂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却又改口说：“我要纠正这样的一些同志：他们说——仿佛是无可怀疑的事——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意大利道路意味着议会道路，仅此而已。这是不真实的。”他又说：“把这个斗争降低为议会竞选和等待取得百分之五十一的选票，那将不只是幼稚，而且是幻想。”陶里亚蒂同志争辩说，他们不仅是主张“必须有一个起作用的议会”，而且还主张必须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很好，要求有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然是应当高兴的。同时，应当承认，现在意大利有相当规模的群众运动，意共在这方面的的工作是有成就的。可惜，陶里亚蒂同志只是从议会这个框框来看待群众运动。陶里亚蒂同志认为，开展群众运动，“在全国提出要求，然后可以由一个人民力量得到充分强大的代表权的议会来满足这些要求。”

群众提要求，议会来满足，——这就是陶里亚蒂同志的群众运动的公式。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策略问题上的根本原理是：在一切群众运动中，同样，在议会的斗争中，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划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把运动的现在利益同将来利益结合起来，把当前的运动同工人阶级斗争的全部进程和最终结局联系起来。如果忘记了和违背了这个原理，就会陷入伯恩斯坦主义的泥坑，而在实际上接受“运动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这一个臭名昭著的公式。试问，陶里亚蒂同志关于群众运动的公式，同伯恩斯坦的公式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国家垄断资本可以成为“反对垄断资本发展的更有效的工具”吗？

意共主要领导人之一路易吉·隆哥同志在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答复中国《人民

日报》社论的一篇文章中说：“我们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也有力地重申，我们所称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的坚定不移的一点，就是承认：在当前国际和国内条件下，即使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存在，今天也已经有可能和有必要消除垄断组织及其经济和政治权力。”他们认为按照他们制定的办法，就能够改变意大利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改变意大利的垄断资产阶级的“大财产制度”。

陶里亚蒂等同志所制定的“结构改革论”在经济方面的办法，照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实现“某些国有化的要求、规划化的要求、国家干预以保证经济的民主发展的要求等等”；就是：“通过规划化、甚至若干生产部门的全部国有化等等来扩大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

也许陶里亚蒂等同志还会想出更多的办法。

当然，陶里亚蒂等同志有权想些什么，说些什么，谁也无权干预，我们也不想干预。但是，既然他们要别人也跟着他们想，跟着他们说，我们也就不能不继续就他们提出的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先就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问题说起吧。

从国家产生的时候起，各种性质的国家，如奴隶主国家，封建主国家，资产阶级国家，究竟有哪种国家没有干预过经济生活呢？当这些阶级处在上升时代，它们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可以采取某一种形式；当这些阶级处在没落时代，它们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又可以采取另一种形式。同样性质的国家，在不同的国度里也会有不同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形式。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说奴隶主国家怎样干预经济生活，也不说封建主国家怎样干预经济生活，单来说说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资产阶级国家实行的政策，如争夺殖民地的政策，争夺世界霸权的政策，或者自由贸易的政策，或者保护关税的政策，等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国家为保护资产阶级利益而老早实行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这类国家干预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所以，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并不是现在的意大利才出现的新鲜东西。

或许，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说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不是前面所说的资产阶级老早就实行过的政策，而主要是他们所说的“国有化”。

好吧，我们就来谈谈“国有化”的问题吧。

实际上，从奴隶社会起，各种性质的国家都有它们不同的“国有化经济”。奴隶主国家有它的国有化经济，封建主国家有它的国有化经济，资产阶级国家在它诞生的时候就有了它的国有化经济。所以，问题是要弄清楚国有化的性质，弄清楚它是什么阶级的国有化。

像陶里亚蒂同志这样老的共产党人，当然不会不知道恩格斯在《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一书中有下面这些话：

“无论如何，不管有托拉斯或没有托拉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正式代表的国

家总是不得不负起对于生产的领导责任的。这种转化为国有财产的必要性，首先是表现在大规模交通工具方面：表现在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

对这一段话，恩格斯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注解：

“我说‘不得不’，因为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工具真正发展到超出股份公司发展范围，而其国有化已成为经济上必不可免措施的场合，国有化——即令它是由现代国家实行——才是经济上的进步，才是在社会本身掌握一切生产力的道路上又向前进一步。可是近来，自从俾斯麦力倡国有化时起，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伪社会主义，它在有些地方甚至蜕化为一种自愿的奴仆行为，直截了当地把生产资料的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式的国有化，都宣布为社会主义。如果说国家烟草专卖制算是社会主义的话，那末拿破仑和梅特涅一定是应该算作社会主义创始人了。比利时政府为了极平常的政治上财政上的计较，自动去建造主要的铁路；俾斯麦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必要而把普鲁士的主要铁路转归国家所有，目的只是要使铁路更便于战时利用，为的是把铁路官员训练成一群忠顺投票拥护政府的猪仔，而主要是为了要造成一种不依赖于国会的新的收入来源——这一切无论如何都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皇家海上贸易公司，皇家制磁厂，甚至陆军被服队，或是甚至三十年代在弗利德里赫·威廉第三统治时由一聪明才子认真建议过的……妓院国有制，也都应该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

随后，恩格斯又着重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国家中所谓“国有财产”的性质问题。他说：

“但是，无论转入股份公司与托拉斯手中，无论是转化为国有财产，都不会使生产力的资本主义性质消灭下去。关于股份公司与托拉斯，这点是十分明显的。至于现代国家，那末它也不过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自己建立的一个组织，用以保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外部条件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侵害罢了。现代国家，无论其形式如何，在实质上总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合资本家。它把生产力愈多地拿到自己手中，它转化为总合资本家的程度也愈加完备，它所剥削的公民人数也愈加众多。工人仍然还是雇佣工人，无产者。资本主义关系非但不会因此而被消灭，反而要达到极点，达到顶点。可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的国有制不会解决冲突，但它包含有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包含有解决冲突的可能性。”

恩格斯这几段话，是在垄断资本开始出现的时代写的，是在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开始变为垄断的时代写的。恩格斯所写的道理，到了垄断资本占完全支配地

位的时候是否已经失效了呢？能否说这个时候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已经变革甚至消灭了“生产力的资本主义性质”呢？能否说这个时候由资本主义国有化或其他形式所形成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了呢？也许在别的国家不能这样说，而在意大利可以这样说吧？

在这里，我们只好来探讨一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来探讨一下意大利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

资本的集中产生垄断。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世界资本主义不仅向一般垄断前进了一步，而且从一般垄断向国家垄断前进了一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在一九二九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以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各国都有了新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双方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在战争中谋取高额利润，都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国家垄断资本。战后，在某些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家垄断资本甚至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国家经济生活的支配力量。

在世界上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当中，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基础是比较薄弱的。为了集中资本的力量，攫取最高利润，同国际垄断资本竞争，扩大市场，重新瓜分殖民地，意大利早就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到了一九一四年，意大利政府成立了工业企业贷款银行团，给大银行和工业企业提供贷款和补助。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时期，国家机构和垄断资本组织进一步地结合起来。特别是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的大危机中，意大利政府以危机前的价格大量收购陷于破产的银行和企业的股票，把许多银行和企业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组织工业复兴公司，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国家垄断资本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曾经作为法西斯政权基础的意大利垄断资本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不仅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而且以更高的速度发展起来。目前，意大利的国家垄断资本企业以及国家垄断资本同私人垄断资本合营的企业，在整个经济中已经占了大约百分之三十的比重。

对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能不能像陶里亚蒂同志和其他某些意共同志所说的那样，在意大利，国有化企业，即国家垄断资本可以“同垄断组织相对立”，可以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而且可以成为“反对垄断资本发展的更有效的工具”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合为一体的垄断资本主义。它充分利用国家的权力，加速资本的集中和积聚，加紧压榨劳动人民，加紧吞并中小企业，加剧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相互兼并，并且加强垄断资本在国际上的竞争和扩张。它打着“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反对垄断”的幌子，用“国家”的名义进行欺骗，以隐蔽的巧妙手段，把大量的利润转移到垄断资本集团的手里。

国家垄断资本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主要方式是：

第一，利用国库资金，利用人民缴纳的税款，来承担资本家投资的风险，保证垄断集团可靠地获得巨额利润。

例如，意大利最大的国家垄断组织工业复兴公司系统，为筹措资金而发行的债券，就一律由国家保本付息，年利一般高达百分之四点五到百分之八，在企业盈利时还能再分得红利。

第二，通过国家的立法和预算，把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作有利于垄断资本组织的重新分配，来保证垄断资本集团获得大量利润。

例如，意大利政府一九五五年向私人垄断资本集团采购、订货等费用，就占了国家预算支出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通过国家收购企业和卖还企业这两种相互交替的形式，在一定的時候，把亏本和破产的企业，或者把国有化以后有利于某些垄断集团的企业转到国家手里；在一定时候把赢利企业转到私人垄断资本集团手里。

例如，据意大利经济学家季诺·隆哥的统计，从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五五年，意大利历届政府为收购破产银行和企业的股票，共用去一万六千四百七十亿里拉（一九五三年价格），相当于一九五五年意大利资产在五千万里拉以上的全部股份公司名义资本的二分之一以上。又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工业复兴公司从建立到一九五八年止，就先后把价值达四千九百一十亿里拉（一九五三年价格）的赢利企业的股票，卖还给私人垄断资本组织。

第四，利用国家权力加强资本的集中和积聚，加剧垄断资本对中小企业的吞并。

例如，控制着意大利国家经济命脉的十家最大的垄断资本集团，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八年的期间，名义资本总额增加到十五倍。其中，菲亚特公司增加到二十五倍，意大利水泥公司增加到四十倍。意大利十家最大的公司，在意大利的股份公司总数中只占百分之零点零四，但是，它们所直接掌握和控制的私人股份资本占意大利的私人股份资本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四。同时，意大利的中小企业破产数字不断上升。

第五，通过“国家”的形式和外交手段，在国际上进行剧烈的争夺市场的斗争，并且作为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一种有利的工具。

例如，意大利国家碳化氢公司，仅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一年期间，就在阿联、伊朗、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埃塞俄比亚、苏丹、约旦、印度、南斯拉夫、奥地利、瑞士等国，取得了勘探和开采石油，或者销售石油，或者修建油管和炼油厂的权利，为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在国际石油市场上夺得了阵地。

从上述的事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国家垄断和私人垄断，实际上是垄断资产阶级掠夺大量利润的互相配合的两种形式。国家垄断资本的发展，加剧了帝国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矛盾，绝不是像陶里亚蒂等同志所说的那样，能够“限制和摧毁大垄断资本集团的权力”，能够改变帝国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各种矛盾。

在意大利的一些人中间流行着这样的观点，认为，今天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同于五十年前的资本主义，进入了“新阶段”。这些人把意大利现在的资本主义叫做“新资本主义”。他们硬说在这种所谓“新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新阶段”，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等根本原理都没有用处了。照他们看来，这种所谓“新资本主义”似乎能够起这样的作用，即利用“规划化”、“技术进步”、“充分就业”、“福利国家”等办法，并

且通过“国际结盟”，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在意大利，拥护和传播这种“理论”的，首先是天主教运动和社会改良主义者。陶里亚蒂等同志实际上也就是从这种“理论”中为他们的“结构改革论”找到了一种新的根据。

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曾一度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计划化和规划化的概念，今天被越来越广泛地讨论和接受。”

陶里亚蒂同志的意见是：第一，不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能够这样；第二，在资本主义的意大利，能够接受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计划化和规划化。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认为，资本主义的国家为着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有必要并且能够对于国民经济采取某种调节的政策。我们前面引述的恩格斯的一些话，就包含有这样的意思。在垄断资本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调节作用，主要是为着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这种调节，有时甚至可以牺牲某些垄断集团的利益，但是，绝对不会损害垄断资产阶级的总的利益，而恰恰是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总的利益。

列宁说得很好：“目前最普遍的一种错误就是根据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来断定，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已经可以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等等。完备的计划性当然是托拉斯所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尽管托拉斯有一点计划性，尽管资本大王们预先考虑到了一国范围内甚至国际范围内的生产规模，尽管他们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还是资本主义”。

可是，某些意共同志认为，在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意大利，实现什么“计划化”，就可以解决意大利历史上形成的重大问题，其中包括“工人阶级的自由和解放问题”。怎样会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奇迹呢？

陶里亚蒂同志说：“列宁说过，在几乎所有大国中，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现代形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这样一个阶段，越过这个阶段前进，就是社会主义。但是从这一客观的需要中，必须产生一种自觉的运动。”

我们都知道，列宁说过，“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帝国主义，一般垄断已经发展为国家垄断。这一切推进了社会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客观条件”。在别的地方，列宁也还说过同类的话。列宁的意思是很清楚的，这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的言论”。而陶里亚蒂同志的所谓“结构改革”和他的所谓“自觉的运动”，恰恰像改良主义者一样，都是用暧昧的语言，来回避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并且力图粉饰意大利的资本主义。

记住伟大列宁的教训

从前面叙述的一系列的问题中，可以看出，陶里亚蒂等同志的“结构改革论”，

是在国家与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了彻头彻尾的总修正。

陶里亚蒂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就公开地举起这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总修正的旗帜。在这一年六月间意共中央全会上，他说：

“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然后是列宁，在阐述这个学说（即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本刊编者注）的时候说：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能用来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由工人阶级来打碎和摧毁这个机器，必须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也就是工人阶级自己领导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这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来的观点，而是他们在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所主张的观点；这个观点特别被列宁发展了。这个观点今天是不是仍然完全有效呢？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事实上，当我们肯定说，不仅可能在民主的基础上、而且也可能利用议会形式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时候，我们考虑到世界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因而显然对这个观点作了一些修改。”

陶里亚蒂同志在这里装作好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家”，但是，根本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请看这些事实：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所写的《共产党宣言》里面，就已经极其显明地提出了，“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阶级变成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正如列宁所说明的，“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后所说的那样）的思想”。

在总结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一年的经验以后，马克思提出了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问题。正如列宁所说明的，“在这里，问题已经提得具体了，还做出了非常确切、肯定、实际而具体的结论：过去一切革命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但是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列宁说，“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

根据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一年的经验，马克思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革命将不会像以前的革命那样，简单地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至于应当用什么来代替被摧毁的国家机器，那时候，马克思还没有具体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提出任务不是根据逻辑推论，而是严格地根据历史的经验。在一八五二年以前，在这个具体问题上，经验还没有提供材料，后来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才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是‘终于发现的’政治形式，这个政治形式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

由此可见，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用什么代替被摧毁的国家机器，这是两个问题，而马克思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经验先后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陶里亚蒂同志说，无产阶级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经验以后才主张的。这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陶里亚蒂同志也像考茨基一样，“认为不破坏国家机器也能夺取政权”。认为可以保留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利用这种现成的国家机器，就可以达到无产阶级的目的。关于这一点，陶里亚蒂同志不妨看一看列宁是怎样一再批判考茨基的。列宁说：“考茨基不是根本反对国家权力转到工人阶级手中，就是容许工人阶级把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拿到手中，但决不让他们打碎和摧毁这个机器，用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代替它。不论怎样‘解释’和‘说明’考茨基的议论，考茨基背弃马克思主义和投降资产阶级的的事实，在两种情况下都是十分明显的。”

当陶里亚蒂同志吹嘘他们的纲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化和发展”的时候，必须知道，所谓“结构改革论”实际上正是考茨基首先发明的。考茨基在《社会革命》一书中说：“不言而喻，我们是不会在目前条件下取得统治地位的。革命本身要求先进行长期的深刻的斗争，这些斗争就定会改变我们目前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可见考茨基老早就已经企图用“结构改革论”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陶里亚蒂同志不过是继承考茨基的衣钵而已。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他们两人的论点，那末，就可以看出，陶里亚蒂同志比考茨基还跳得更远。因为考茨基承认“我们是不会在目前条件下取得统治地位的”，而陶里亚蒂同志却恰恰认为“在目前条件下”他们能够取得统治地位。

陶里亚蒂等同志认为，意大利要向社会主义前进，需要按照意大利那部十分奇妙的宪法，建立一个“新民主制度”，同时需要形成一个“新的历史集团”，或者又叫做一个“新的社会和政治领导力量集团”。他们认为，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和道德革命的承担者”是这个“新的历史集团”，而不是意大利的无产阶级。至于这个“新的历史集团”究竟是什么，它是怎样形成的，谁也不理解。陶里亚蒂等同志有时说这个“新的历史集团”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有时又说这个“新的历史集团”本身就是“领导力量集团”。这样的集团究竟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还是各个阶级的联盟组织？究竟是工人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还是别的阶级领导？这些也都只有天知道！归根到底，他们这类异想天开、使人难以捉摸的提法，无非是为了避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个根本思想。

陶里亚蒂同志所想的是，第一，不需要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第二，不需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因而他就否认了巴黎公社的经验。

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不断地阐明巴黎公社的经验，始终认为巴黎公社的经验对于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说来，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列宁不是把俄国革命的经验同巴黎公社的经验分开，而是把俄国革命的经验看成是巴黎公社经验的继续和发展。列宁认为苏维埃是“再造了巴黎公社所创造的那种国家类型”，认为巴黎公社在粉碎旧国家机器这条道路上，“走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苏维埃政权走了第二步”。

陶里亚蒂同志否认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就不能不使自己的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直接对立起来，并且也直接地否认了十月革命的经验，还否认了十月革命以后各

国人民革命的经验，把所谓“意大利道路”同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道路对立起来。

陶里亚蒂同志说：“今天意大利工人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干俄国干过的事情。”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一九五六年意共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声明大纲说：“用在苏联获得了胜利的那种革命方式来夺取政权，在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那些年代内已经表明是不可能的”。问题的实质也在这里。

陶里亚蒂同志在提到中国革命经验的时候说，中国人民在争取政权的斗争时期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同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月的革命过程中所遵循的战略和策略路线丝毫不相符合的”。这也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的歪曲。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中国革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反复说明的，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而制定的。我们一直认为，中国革命是伟大十月革命的继续，当然也是巴黎公社事业的继续。在打碎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这一个国家与革命学说的最根本的问题上，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同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基本经验是完全一致的。正如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九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名论文中所说的：“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陶里亚蒂同志为了辩护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原理的修正，或者像他们自己所说的“修改”，而把中国革命的经验同十月革命的经验说成是“丝毫不相符合”的两件事，这种歪曲对于陶里亚蒂等同志的“结构改革论”能够有什么帮助呢？

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谓“结构改革论”，就是“和平过渡论”，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也就是“通过民主与和平的道路向社会主义前进”。他们的全部理论和全部纲领，充满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和平”的赞美，根本没有什么“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内容；只有阶级的“和平”，丝毫没有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在革命的实践中，它是不断发展的，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不能不由适合新历史条件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代替。但是，不能因此而抛弃和修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与革命的学说，绝不是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总结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经验所得出的根本原理。抛弃和修改了这个根本原理，就是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这里，我们也愿意向陶里亚蒂同志“敬奉”一点忠言：不要自己高傲地声称不干俄国十月革命干过的事情，而是应当谦逊些，记住伟大列宁在一九二〇年所提到的这个教训：“在无产阶级革命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一切国家都必然要做俄国已经做过的事情”。

拥护或者反对列宁所提出而为伟大十月革命的胜利所证实的无产阶级战略原则，这就是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和他们的追随者的根本分歧。

六、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历史的分析

最近一个时候，有一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又忽然大嚷大叫，反对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他们一会儿说这是“低估帝国主义，涣散人心”，一会儿又说这是“对社会主义力量的轻视”；一会儿说这是“假革命”，一会儿又说这是“因为害怕”。他们喧嚣的声音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更卖气力，力求“后来居上”，表示自己并不“落后”。他们的说法矛盾百出，几乎语无伦次，无非是企图打倒这一个论点。但是，他们的一切说法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总是不敢稍为认真地接触到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一个科学的论断。

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陶里亚蒂同志首先发动了这个攻击。他说：“肯定说帝国主义是一只简单的纸老虎，用肩膀一推就倒，是错误的。”又说：“如果它是纸老虎，为什么为打倒它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和进行这么大的斗争呢？”在这里，陶里亚蒂同志如果是一个在小学里读书的小学生，他在回答语文课中一般词汇的释义的试题时说，纸老虎就是用纸糊的老虎，那倒满可以及格的。但是，用庸俗的观点是不能研究理论问题的。自命为“对工人阶级的革命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化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的陶里亚蒂同志，在回答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的时候，却搬出这样一个小學生的答案来，这岂不是荒唐又荒唐，可笑又可笑吗？

毛泽东同志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从来就是十分清楚的。他说：

“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不愿倾听真理的人比聋子还要聋。谁个说过，用肩膀推一下，帝国主义就倒了？谁个说过，为打倒它不需要花费力气和不需要进行斗争呢？

在这里，我们愿意再引述毛泽东同志讲过的另外一段话。他说：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

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说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毛泽东同志这一段话，不但说明了三大剥削阶级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两重性，而且说明了它们在面临人民决死斗争的时候的两重性。显然，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分析。

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分水岭

历史告诉我们，一切革命者，当然也包括资产阶级革命者在内，他们之所以成为革命者，首先在于他们敢于藐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畏惧敌人，不敢斗争，不敢胜利的人，只能是懦夫，只能是改良主义者，或者是投降主义者，而不可能是革命者。

历史上一切真正的革命家之所以敢于藐视反动派，敢于藐视反动的统治阶级，敢于藐视敌人，就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已经开始感觉到有用新的制度代替旧制度的必要性，新的历史任务已经摆在人民的面前。只要有了变革的需要，变革便是不可抵抗的，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变革迟早总是要出现的。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变革的需要唤起了人们的革命意识。当历史条件还没有产生变革需要的时候，谁也不可能勉强提出革命的任务，勉强进行革命；但是，当历史条件已经产生变革需要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革命家，这样的人民先锋队，他们敢于贬斥反动的统治阶级，把它们看成纸老虎。他们在活动中，总是壮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这是历史的必然性，这是社会革命的必然性。至于革命在什么时候爆发，在爆发以后革命或者迅速胜利，或者要拖延一个很长时间才取得胜利，或者要经过许多严重的困难、严重的挫折、甚至严重的失败才最后取得胜利，等等，则要取决于各种不同的具体历史因素。但是，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家，即使在革命过程中遇到严重的困难、严重

的挫折、甚至严重的失败，他们也还是敢于藐视敌人，坚信革命胜利的可能性。

在中国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败以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处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向我们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的前途。他一方面认为不适当地夸大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反革命力量，这是片面的、错误的。另一方面又着重指出了夸大反革命力量，而过低地估计革命的潜在力量，也是片面的、错误的。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证实了毛泽东同志当时的估计。现在整个世界的形势对各国人民是很有利的。在这样的形势面前，有些人竟然集中力量肆意攻击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观点，夸大帝国主义的力量，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张目，帮助帝国主义吓唬革命的人民。他们不是壮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相反的，他们是在那里壮敌人的威风，企图灭人民的志气。

列宁说：“想要革命吗？你们就应当是强者！”为什么革命家应当是强者，而且必然是强者呢？因为革命家代表了社会新兴的力量，相信人民的力量，他们有强大的人民力量作为自己的后盾。反动派只能是弱者，而且必然是弱者，因为他们是脱离人民的，不管他们暂时在表面上多么强大，他们总归是要失败的。“在辩证法看来，最重要的不是现时似乎坚固，但已经开始衰亡的东西，而是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哪怕它现时似乎还不坚固，因为在辩证法看来，只有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不可战胜的。”

为什么列宁一再地把帝国主义比做“泥足巨人”，比做“稻草人”呢？归根到底，就在于他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信新生的社会力量总归要战胜腐朽的社会力量，相信人民的力量总归要战胜反人民的力量。难道不是这样吗？

那些企图驳倒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的人，你们应当首先驳倒列宁的论点。你们为什么不直接驳斥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泥足巨人”、“稻草人”等论点呢？这不是表示你们在真理面前的怯懦，又是表示什么呢？

对于每一个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来，不论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泥足巨人”、“稻草人”的说法，或者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说法，都是很正确的譬喻。这种譬喻是根据社会规律得出的，是为着通俗地说明问题的本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有许多科学家、哲学家，从来常用譬喻来说明问题，有许多譬喻甚至是非常深刻而确切地说明了问题。

有人表面上曾经被迫地表示同意列宁所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本质的譬喻，而仅仅要反对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本质的譬喻。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在这个问题上这样纠缠不清呢？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要这样大喊大叫呢？这除了他们思想上的极端贫困以外，当然还有他们的目的。

他们的目的何在？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大大增强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的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革命，一直在前进着。在帝国主义国家，国内国外的各种不可调和的重重矛盾，就像一座火山，一直在威胁着垄断资

产阶级的统治宝座。帝国主义各国加剧进行军备竞赛，并且竭力把它们国民经济纳入军事化的轨道上。这些都是在把帝国主义引导到绝境。帝国主义的各种智囊团，曾经为他们的老板们现在和将来的命运，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计策，但是，都无法使帝国主义在绝境中找到可靠的出路。在这样的国际局势面前，有一些人，虽然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实际上却昏头昏脑，以某种“世纪末”的感伤代替了清醒的理智。他们不想引导各国人民去摆脱帝国主义所制造的种种灾难，也不相信各国人民有摆脱这些灾难、创造自己新生活的能力。

这些人，与其说他们是关心社会主义和各国人民的命运，倒不如说他们是关心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命运。他们现在这样炫耀和夸大敌人的力量，替帝国主义摇旗呐喊，目的只在于不要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起来革命，而并不在于他们想反对什么冒险主义，他们最多只是用“反对冒险主义”作借口，来达到他们反对革命的目的。

列宁在一九〇六年论俄国杜马（沙皇议会的名称）里面的自由派政党的时候，说过：“杜马内的自由派政党只是很不充分地、很怯懦地支持人民的意愿，它们对缓和和削弱正在进行着的革命斗争的问题比对消灭人民的敌人的问题更要关心。”

现在，我们在工人运动队伍里面正是遇到了列宁所说的这样的自由派，即资产阶级自由派。这样的自由派，他们更加关心的是，缓和和削弱正在广泛发展着的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而不是消灭帝国主义者和人民的敌人。要求这样的人理解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原理，当然是很困难的。

伟大的范例

某些英雄们，把中国共产党人所说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这个论点痛骂一顿以后，又把“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个论点痛骂一顿。这些英雄们说，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这种提法是“两面态度”，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英雄们在表面上似乎还承认战略和战术是有区别的，似乎还承认战术必须为达到战略的目标服务，但是在实际上，他们恰恰是抹杀战略和战术的区别，把战略的概念和战术的概念完全混淆在一起。他们不是把战术服从于战略，而是把战略服从于战术。他们沉溺于日常的斗争，并且在具体斗争中，或者是一味迁就，犯投降主义的错误；或者是轻举妄动，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归根到底，他们的目的是在于取消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战略原则，取消国际共产党人的战略目标。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在历史上，一切革命者之所以成为革命者，首先在于他们敢于藐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这里，我们还要说明，同样，在历史上，一切成功的革命家之所以成为成功的革命家，不仅因为他们敢于藐视敌人，而且因为他们在每一个局部问题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能够重视敌人，采取谨慎

态度。一般说来，革命家，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不能够这样做，就不能指导革命顺利的发展，就可能犯冒险主义的错误，给革命带来损失，甚至使革命遭受失败。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他們为无产阶级事业的毕生斗争中，一直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他们总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又反对“左”倾冒险主义。他们在这些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伟大的范例。

大家都很熟悉，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是用以下的一段话来结束的：

“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这里所说的，一直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战略原则和总战略目标。但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非常审慎地估计到各国共产党人所处的不同条件。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千篇一律的死板的公式，要勉强套在各国共产党人的身上，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各国共产党人需要根据本国的条件，规定本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的战略任务和策略任务。

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参加了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的群众革命斗争。他们把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看成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同时，反对那种提出立即“为建立工人共和国而斗争”的口号。这是他们当时的具体战略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反对从外面用武力发动德国革命，认为这是“把革命当做儿戏”的做法。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在外国的德国工人“一个一个地”回国，以便他们投入国内的群众革命斗争。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的具体策略问题上、战术问题上的主张和做法，同那些“左”倾冒险人物根本不同。在具体的斗争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力求从可靠的阵地出发。

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的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五〇年春天，对当时的形势，曾经一度估计，一次新的革命正要来临。但是到了夏季，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觉革命快要再起这件事已经不可能了。当时有些人不顾客观可能的条件，用革命的词句代替实际的革命发展，企图凭空制造一种“人为的革命”，他们告诉工人们说，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就躺下睡大觉。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地反对这种冒险主义。正如列宁所说的：“当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革命时代已经结束时，马克思便反对任何玩弄革命的儿戏（反对沙佩尔和维利希一流人物），要人们善于在似乎是‘和平地’准备着新革命的那个新阶段进行工作。”

在巴黎公社起义前几个月，即在一八七〇年九月间，马克思警告法国无产阶级不要举行不合时机的起义。但是，一八七一年三月，当工人被迫进行起义以后，在

那时候，马克思便以高度热情歌颂巴黎公社工人们的冲天英雄气概。他当时在给路·库格曼的信中这样说：

“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忍受了六个月与其说是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内部叛变所造成的饥饿和破坏之后，他们在普军的刺刀下起义了，好像法国和德国之间不曾发生战争似的，好像敌人并没有站在巴黎的大门前似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如果他们将来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宽大’。”

请看，马克思就是这样歌颂巴黎公社工人们藐视敌人的英雄气概的！马克思正是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战略目标来估价巴黎公社，认为巴黎公社的斗争是“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

尽管巴黎公社在起义以后犯了一些错误，没有立即向反革命的凡尔赛进军，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尽管巴黎公社是失败了，但是公社所举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旗帜永远是光辉灿烂的。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永久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钉在万年臭柱上，不论他们的牧师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在纪念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的时候，恩格斯说：“公社的高度国际主义性质使公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是对资产阶级沙文主义一切表现的勇敢挑战。全世界无产阶级很清楚地懂得这一点。”

可是，现在我们的陶里亚蒂同志，却似乎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具有普遍意义的巴黎公社的高度评价，已经再不值得一提。

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巴黎的工人，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需要长期的休息，以便养精蓄锐。而布朗基主义者不顾当时条件，主张举行新的起义，这种冒险主义的企图遭到了恩格斯的尖锐批评。

在欧美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工人运动中继续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他们严厉地责备了革命空谈，主张利用“资产阶级的合法性”，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另一方面，又严厉地、甚至更加严厉地批判了当时在社会民主党中占得统治的机会主义思想，因为这种机会主义根本失掉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性，他们只要合法斗争，而没有决心同时采用不合法的手段，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这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任何时候，同样，在和平发展时期，总是毫不动摇地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原则，同时，又根据每个时期的具体条件，审慎地采取灵活的战术和策略。

当列宁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舞台的时候，他的第一部名著《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结束语，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问题。他说：

“当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了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时，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在工人中造成一种把他们现时分散的经济战变为自觉的阶级斗争的坚固组织时，俄国工人就能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并排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

列宁提出的这个战略原则，一直是指导俄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同俄国人民为解放而斗争的总方向。

列宁始终坚持这样的战略原则。为了坚持这个战略原则，他不调和地同俄国的民粹派进行斗争，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斗争，同经济主义者进行斗争，同孟什维克进行斗争，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进行斗争，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进行斗争。

一九〇二年，在制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的时候，列宁同普列汉诺夫围绕着无产阶级的战略原则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列宁坚持把无产阶级专政写到党纲里面去，并且要求在党纲中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中，列宁写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在这本书中，表达了俄国无产阶级敢于领导斗争、敢于夺取胜利的英雄气概。列宁完整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学说，完整地提出了以工人阶级为领袖的工农联盟的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列宁写了《第二国际的破产》、《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极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把无产阶级的战略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认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首先在一国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些战略思想为伟大十月革命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如此等等。

在具体的策略问题上，战术问题上，列宁总是根据不同的情况，规定无产阶级的行动。例如，无产阶级政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当参加议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当抵制议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当组织这样的联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当组织那样的联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当实行必要的妥协，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应当拒绝妥协；在哪些场合应当进行合法的斗争，在哪些场合应当进行不合法的斗争，怎么样把这两种斗争形式灵活地结合起来；在什么时候应当进攻，在什么时候应当退却、迂回前进，等等。这些问题，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都作了深刻的系统的阐明。

列宁说得很对：

“第一、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毫不遗漏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第二、革命阶级必须准备最迅速和突然地用一种形式

来代替另一种形式。”

列宁在说到各种斗争形式的时候，还说，各国共产党人在每个国家中为解决统一的国际任务，为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左倾教条主义，为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采取具体办法的时候，必须考察、研究、探索、揣测和把握每个民族的特点和特性。在斗争中不考虑自己民族的特点，是完全错误的。

根据列宁的思想看来，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切具体策略，一切战术，都是为着组织千千万万的群众，调动广泛的同盟者，最大限度地孤立人民的敌人，孤立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以便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人民解放的总战略目标。这正如列宁自己所说的：“斗争的形式可能变更，而且确实由于各种比较次要的和暂时的原因而经常变更，但是，斗争的本质、斗争的阶级内容在阶级存在的时候是始终不会改变的”。

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和战术。

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思想，毛泽东同志在下面的一段话中，作了概括的说明：

“全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统治，已经腐烂，没有前途。我们有理由轻视它们，我们有把握、有信心战胜中国人民的一切内外敌人。但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不论是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或思想的斗争），却又决不可轻视敌人，相反，应当重视敌人，集中全力作战，方能取得胜利。当着我们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如果我们在全体上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们，不敢胜利，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中农，独立工商业者，中产阶级，学生、教员、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一般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和开明绅士），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关于无产阶级斗争全局的问题，即战略问题，是说得很明确的，没有丝毫的含糊；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每一个局部，每一个具体问题，即战术问题，也是说得很明确的，没有丝毫的含糊。

为什么在全局上，在战略上，可以藐视敌人呢？因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腐朽的，是没有前途的，是可以被打倒的。看不到这一点，就不敢进行革命斗争，就会丧失革命的信心，就会把人民引入迷途。为什么在具体的斗争中，在战术上决不可以轻视敌人而必须重视敌人呢？因为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还掌握着统治的机器，还有全副的武装，他们在人民中还有欺骗的作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要推翻帝国

主义者和反动派的统治，就必须经历严重的曲折的斗争。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统治宝座是不会自行倒塌下来的。

任何革命党派，如果放弃推翻旧制度的战略目标，不相信敌人可以打倒，不相信自己可以胜利，他们就不会去进行革命的斗争；如果只提出革命的目标，不在革命斗争中认真地、谨慎地对付敌人，不去一步一步地积累和扩大革命的力量，而只是把革命当成空谈，或者盲目地乱撞一顿，革命也就不可能得到预期的胜利。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说来，事情更是这样。无产阶级政党，在坚持无产阶级战略原则的同时，如果在革命斗争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上重视敌人，善于同敌人作斗争，那么，即使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处于劣势，也总归会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这就是说，在战术上、在具体的斗争问题上重视敌人，力求每次具体斗争的胜利，就有可能加速革命胜利的到来，而不会延缓或推迟革命的胜利。

无产阶级政党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争取具体斗争的胜利，这就能够使越来越多的群众通过自身的经验相信敌人是可以打倒的，相信我们藐视敌人是有理由的，有根据的。中国古代有这一类的话：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起于足下。革命人民要推翻反动派，道理是同样的，也就是说，只有经过一个一个的、许许多多的具体斗争，力争具体斗争的胜利，才能最后达到打倒反动派的目的。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过：“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又说：“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这里说的是军事斗争的原则，但是，这种原则也适用于政治斗争。在历史上，一切革命派，包括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开始的时候，总是处于少数的地位，他们领导的力量总是比较弱小的。在对敌人的斗争中，如果他们在战略上没有“以少胜多”、“以一当十”的气概，就只能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不能有所作为，就不能最后取得多数。反过来说，如果在战术上，在具体的斗争上，不懂得组织群众，不懂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同盟者，不懂得利用敌人之间客观存在的矛盾，不会运用“以多胜少”、“以十当一”的斗争方法，不会在具体斗争中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那就不可能取得每一个具体斗争的胜利，不可能积小胜为大胜，而有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浪费革命的力量。

一面镜子

总之，在战略和战术的关系上，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十分关切解放劳动人民的最终目的，必须有压倒敌人的气概和信念，不能因为迷恋于眼前的、微小的利益和胜利，而忘记了最终目的，不能因为敌人表面上的暂时的强大，而丧失人民革命胜

利的信心。同时，也要重视经常的、即使看来是不怎么显著的微小斗争，必须在每一次具体的斗争中，做好妥当的准备，做好团结群众的工作，讲究斗争的艺术，使每一次具体斗争尽可能地能够取得胜利，以便不断地教育和鼓舞群众。应当充分地估计到，许多具体的斗争，包括微小的斗争，汇集起来，发展起来，会成为动摇旧制度的力量。

由此看来，问题是很清楚的，战略和战术的关系，既是有区别的，又是一致的，这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待问题的辩证法。有些人，把“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说成是“经院哲学”，说成是“两面态度”，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哲学”究竟是什么？他们的“一面态度”究竟是什么？

列宁在《论我国革命》这篇文章中，对于那些机会主义的英雄们，说过下面的一段话：

“他们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却迂腐到了极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是一窍不通的。”

在同一篇文章中，列宁又说过下面的一段话：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他们是些畏首畏尾的改良主义者，惟恐离开资产阶级一步，更怕跟资产阶级决裂，同时又用毫无内容的、大言不惭的空谈来掩饰自己的怯弱。”

请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仔细地读一读列宁的这两段话吧！这两段话是真正可以作为某些人的政治镜子的。

七、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现代修正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

意大利共产党是目前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一个政党。在法西斯统治的极其黑暗的岁月中，这个党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意大利共产党有光荣的斗争传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了本国人民英勇地进行反法西斯的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争。人民武装部队逮捕了墨索里尼，并把这个法西斯的魔王判处了死刑。

意大利共产党的战斗业绩，赢得了意大利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这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处在一个和平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意大利共产党利用合法斗争的形式，做了不少工作。合法斗争的条件对工人阶级政党的活动有积极作用，但是，如果工人阶级政党在合法斗争中缺乏革命警惕性和坚定性，那末，也可能在另一方面产生消极作用。关于这一点，不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论列宁，都是经常向无产阶级提出警戒的。

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修正主义被公认为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

呢？这是：第一，鉴于历史上有过许多国家所提供的合法斗争的各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第二，因为世界现实生活中存在着滋长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条件；第三，事实上已经出现了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

从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许多论点看来，可以直率地说，在意大利党内，也存在着这种危险。最近法国共产党的某些同志，写了一连串的文章，攻击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攻击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根本问题上的论点，同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论点，差不多都是一个版本。不仅如此。最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同时出现了一些人，正如列宁所形容过的，他们“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怪现象。但是，只要懂得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要对这种现象加以分析，就会了解，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

现代修正主义不只是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而且也会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铁托集团就是首先举起修正主义的旗子，使原来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南斯拉夫一步一步地变质。铁托集团不仅在政治上早已是美帝国主义者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帮手，而且使南斯拉夫在经济上成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一步一步地把南斯拉夫的经济变成像帝国主义者所说的“自由化的经济”。

一九二一年五月间，列宁在俄共第十次代表会议上说过：

“米留可夫是对的。他十分清醒地估计到了政治发展的阶梯，他说，要恢复资本主义就必须经过社会革命党主义和孟什维主义这样的阶梯。资产阶级需要这样的阶梯，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傻瓜。”

列宁这一段话说得这样好，就像是对于几十年后的铁托集团的预言一样。

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出现修正主义？这正如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

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声明，重申了莫斯科宣言关于国际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这个重要论点，同时谴责了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声明完全正确地指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使自己的国家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使它依赖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所谓‘援助’，从而使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斗争所取得的革命成果有失去的危险。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他们以非集团政策为借口，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

莫斯科声明还说：“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积极斗争，仍然是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项必要任务。”

在这个庄严的莫斯科声明上签字的有八十一个党的代表，其中有意大利党的代表，有法国党的代表，有社会主义各国党的代表。但是，签字的墨迹未干，有些党的负责人就忽然同铁托集团称兄道弟起来了。

陶里亚蒂同志公然宣称，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声明对南斯拉夫铁托集团所采取的立场是“错误的”，说什么“咒骂‘铁托集团’绝不能使我们前进一步，相反却会使我们退后许多步”。有人还说什么“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向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接近和团结方面迈出了脚步”，“在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国际问题上”，铁托集团的立场和他们的立场是“吻合和相近”的。他们言行不一，把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当作官样文章。他们为了替自己作辩护，不择手段地糟蹋莫斯科声明，不承认修正主义是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而认为，“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在最近时期中，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在最近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在致词中坚持莫斯科声明而谴责铁托集团的修正主义，竟然受到十分无礼的对待。而参加大会的铁托集团的代表却受到了狂热的欢迎。难道这就叫做“一贯遵守共同的、一致商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路线”吗？谁都知道，这是一种在精心策划下的为亲者所痛、为仇者所快的行动。

上述种种，使铁托集团陡然“身价十倍”。有些人这样做，目的就是要将铁托集团推崇为他们的“思想中心”，企图用铁托集团所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企图用铁托集团的现代修正主义纲领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代替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有人不是经常说要“对对表”吗？现在有两种表：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表；一种是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表。究竟要对的是哪一种表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表，还是现代修正主义的表呢？

有人不仅不允许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而且不允许我们提到第二国际时代的老修正主义，而他们自己却连篇累牍地、洋洋得意地重弹老修正主义者的调子。恩格斯曾经在《论住宅问题》一书的第二版序言中，谈到蒲鲁东主义的时候，这样说过：“谁要是稍微详细地研究现代社会主义，谁也就应当知道运动中的那些‘已被克服的观点’”。他认为，只要社会上继续存在着产生这种观点的条件，这种观点或者它的倾向总会一再地表现出来。“如果这种倾向日后具有了较为稳定的形式和较为明确的轮廓，……那末它为了规定自己的纲领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辈人物那里去”。我们现在要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自然也必须研究他们的前辈人物，研究历史的教训，研究现代修正主义者是如何回到他们的前辈人物那里去的。这难道不应当吗？为什么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历史比拟”呢？这样做，难道是触犯了什么忌讳吗？

既然这些人重弹伯恩斯坦、考茨基等老修正主义者的调子，用老修正主义者的观点、老修正主义者的手法、老修正主义者的语言，来攻击和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攻击和诽谤中国共产党人，那末，他们也就没有理由禁止我们用列宁对老修正主义者的批评来回答他们。

列宁说：

“伯恩斯坦派就是一直在一字不改地翻来复去地说，只有他们才了解无产阶级的真正需要，了解发展无产阶级力量、加深全部工作、准备新社会的因素以及进行宣传和鼓动等任务。我们要求公开承认现有的东西！——伯恩斯坦这样说，因而也就是推崇没有‘终极目的’的‘运动’，推崇单纯防御性的策略，鼓吹‘不要使资产阶级退出’的恐惧策略。伯恩斯坦派也曾大骂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雅各宾主义’，大骂不懂‘工人的自动性’的‘著作家’以及其他等等。其实任何人都知道，革命社会民主党人连想都没有想过要抛弃日常的细小的工作、准备力量的工作以及其他等等。他们仅仅要求清楚地了解终极目的，明白地提出革命任务；他们是想把半无产者阶层和半小资产者阶层提高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水平上来，而不是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水平降低为‘不要使资产阶级退出’这种机会主义的想法。‘我们敢不敢胜利？’我们取得胜利是不是容许的？我们取得胜利有没有危险？我们是不是应该争取胜利？——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最突出地表现了党内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一翼和无产阶级革命者一翼间的这一分歧。初看起来，这个问题是很奇怪的，但是这个问题确实提出过，而且是应当提出来的，因为机会主义者害怕胜利，恐吓无产阶级，使它不敢去争取胜利，预言胜利能引起种种不幸，嘲笑直接号召争取胜利的口号。”

我们引的列宁这段话，确实可以用来说明伯恩斯坦主义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复活，可以用来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分歧的实质。

“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有些自命为“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说，时代已经变了，条件已经不同了，重复马克思、列宁他们说过的根本原理已经没有必要。他们反对我们引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来说明问题，把这种引证叫做“教条主义”。

借口摆脱“教条”的束缚，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很方便的手法。列宁老早就揭露了机会主义者所采用的这种手法，他说：“‘教条’这是一个多么便于利用的字眼！只要把论敌的理论稍稍歪曲一下，只要用‘教条’这个唬人的字眼把这种歪曲掩盖一番，这就万事大吉了！”

大家知道，列宁生活和斗争的时代，同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大不相同的。列宁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列宁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新情况、新特点，写了许多杰出的著作，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大大地丰富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的思想，向国际工人运动提出了新的方针、新的任务。为了保卫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保卫马

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反对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糟蹋，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大量地、反复地引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过的东西，例如在《国家与革命》这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最根本意义的伟大著作中，更是不厌其详地作了许多的引证。列宁在这部书的第一章就说：

“在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风气空前流行的时候，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马克思关于国家的真正学说。为此，必须大段大段地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当然，大段的引证会使文章冗长，不通俗，但是没有这样的引证是绝对不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论到国家问题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我们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证，一方面使读者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整个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有一个独立的概念，同时也可以确凿地证实并清楚地指明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考茨基主义’对这些观点的歪曲。”

由此可见，当马克思主义遭到荒唐糟蹋的时候，列宁大量地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现在，当列宁主义遭到荒唐糟蹋的时候，一切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就不能不引证列宁的话。因为这样做，可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谬论作一个鲜明的对照。

由此可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的引证，并不如有些人所说的是一种“罪过”。问题是是否有必要引证？如何引证？引证得对不对？

有人故意避开我们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所要证明的主题，甚至连我们引用了一些什么话也不敢公之于众，而只是简单地攻击我们“一段一段的引证”。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道报》竟然这样攻击中国共产党，说我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歪曲到只保留一些僵硬公式的地步，并赋予自己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传教师的权利来负责传布教条”。他们使用这样自以为得意的刻薄语言来攻击我们，究竟说明了什么呢？这只是反映了他们的一种思想感情，就是：他们一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话，立刻就引起了强烈的反感。这些反对别人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教师”的人，实际上是充当了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教师”，充当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教师”。

有些人强烈地攻击我们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来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可是他们自己却偏偏在实际上唠唠叨叨地重复伯恩斯坦、考茨基以及铁托的语言，他们的许多根本论点都是从伯恩斯坦、考茨基和铁托那里抄袭过来的。

还有这样的人，大肆攻击他们所说的“教条主义”，但是，他们却特别喜欢圣经中的教条。他们的头脑里只装满了圣经之类的东西，而丝毫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子。

列宁经常反复地说到马克思、恩格斯这句话，“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当现在有些人宣传我们是“教条主义者”的时候，我们直率地告诉他们：中国共产党在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上是有丰富经验的。二十多年以前，我们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就曾经出色地进行过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并且到现在一直注意反

教条主义的斗争。

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是躺在书本上面，而是要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当时国际国内的具体环境、具体情况、具体条件，研究实际斗争的各种经验，而提出自己行动的方针。毛泽东同志不断提醒我们要注意列宁所说的这个至理名言：“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毛泽东同志批评我们队伍中的教条主义者，说他们“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

在一九四二年《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这样尖锐地批判了教条主义：

“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我们反对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必须攻破教条主义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现在那些卖气力大喊大叫反对教条主义的人，根本不知道教条主义究竟是什么，更说不上怎样反对教条主义。他们口口声声说，时代变化了，情况变化了，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在实际上他们是用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来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根本认识不清时代变化的本质，情况变化的本质，根本不懂得当代世界矛盾的问题，不懂得当代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什么。他们不能掌握客观事物的规律性，时而这样，时而那样，时而陷入投降主义，时而陷入冒险主义。迁就眼前事变，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的特点。因此，他们没有原则性的政策，常常不分敌我友的界限，甚至颠倒敌我友，把敌人当作亲人，把亲人当作敌人。

列宁说：“庸人从来不依据坚定的世界观和完整的党的策略原则行事。他们总是随波逐流，任凭感情支配。”现在有些人不就是这样吗？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毛泽东同志二十多年前在我们党内提出了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

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著名的命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时期中，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这样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的经验总结。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命题，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必须时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修正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必须经常从实际生活出发，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根据实践经验来考察自己的工作，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呢？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呢？列宁说：“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给予人们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或者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不是主观虚构的，而是总结了整个人类历史斗争的经验，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所得出的科学结论。

从伯恩斯坦起，各色各样的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总是借口什么新变化，什么新情况，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已经过时。但是，一百多年来，全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变，都不断地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种普遍真理不但适用于西方，而且适用于东方；不但为伟大的十月革命所证实，而且为中国革命所证实，也为世界各国已经胜利的革命所证实；不但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历来的工人运动所证实，而且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正在进行的伟大革命斗争所证实。

列宁在一九一三年《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就说过，自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全世界的每一历史时代，“都使它获得了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但是，即将来临的历史时代，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

列宁在一九二二年《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还说过：“马克思把这个辩证法运用得这样成功，以致现在东方（日本、印度、中国）的新兴阶级，即占世界人口大多数但因历来毫无作为和沉睡不醒而使欧洲许多先进国家停滞和腐败的数亿人民日益奋起斗争的事实，新民族和新阶级日益奋起斗争的事实，越来越鲜明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几十年来的历史事实，进一步地证实了列宁的这些论断。

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提出了普遍适用于各个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一些主要规律。宣言提出的共同规律的第一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陶里亚蒂等同志的所谓“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恰恰是抛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最根本的原则，否认了莫斯科宣言所肯定的这条最根本的规律。

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根本原理的人，也必然要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完整的世界观，“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

莫斯科宣言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是这样写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论。这种宇宙观反映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普遍发展规律，适用于过去、现在和将来。辩证唯物论的对立物是形而上学和唯心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如果不用辩证法和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就会产生片面性和主观主义，就会使思想僵化和脱离实际，不善于对事物作恰当的分析，就会犯修正主义或者教条主义的错误，就会在政治上犯错误。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和广大群众，是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迫切任务之一。”

现在有些人，完全蔑视莫斯科宣言中这个极其重要的论点，而把他们自己放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相对立的地位。他们十分厌恶唯物辩证法，把辩证法叫做“两面态度”，叫做“经院哲学”。他们也同老修正主义者一样，“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来对付，耸肩蔑视辩证法，而自己却又宣扬一种比黑格尔唯心主义还要浅薄和庸俗一千倍的唯心主义”。很清楚，这些人向唯物辩证法进攻，目的就是为了抛售他们的现代修正主义的货色。

当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不但同修正主义是对立的，而且同教条主义也是对立的。

我们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同时，所以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就是因为教条主义脱离了革命的具体实践，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成是死板的公式。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生气勃勃，它的不可战胜，就是因为它是在革命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不断从新的革命实践中吸取新的经验，而不断地丰富自己。

列宁经常说到马克思主义是把最高限度的严格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结合起来。他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不同，它既能以非常科学的冷静的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进化的客观进程，同时又能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同某些阶级的联系，并实现这种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力、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并且把这两方面卓越地结合起来。”

列宁这段话，准确地说明了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时又要反对脱离革命实践、脱离人民群众的教条主义。

毛泽东同志关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反对教条主义这两方面的相互联系的论述，同列宁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他在论到认识问题的时候，这样说过：

“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

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

教条主义的错误，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或者说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

教条主义是从另一方面来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脱离实际，臆想某些抽象的空洞的公式，或者生吞活剥地搬运外国的经验，硬加在群众的头上，从而限制群众的斗争，使群众的斗争得不到应有的结果。他们不顾时间、地点、条件，只是死啃着一种斗争形式，不懂得任何国家的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都有着无限复杂的形式，不懂得同时应当采用各种必要的形式来互相补充，不懂得在情况变化的时候需要用新的形式代替旧的形式，或者利用旧的形式，充实以新的内容。因此，他们往往脱离群众，脱离可能争取的同盟者，而陷于宗派主义的错误；也往往轻举妄动，陷于冒险主义的错误。

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如果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那末，它就不能掌握革命实际运动的规律，它在理论上必然是暮气沉沉的，在策略上必然是错误百出的。这样的党就绝不可能把本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引导到胜利。

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内反对教条主义，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他说：“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像，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一部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没有这种结合，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设想的。

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这是列宁的名言。马克思主义所以能够战胜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思潮，而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取得统治的地位，就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了原则的政策。列宁主义所以能够继续战胜各色各样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潮，指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并且在新时代的国际工人运

动中取得统治地位，就是因为列宁，接着是斯大林，他们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事业，坚持了原则的政策。

什么是原则的政策？这就是，我们提出和制定的所有政策，都必须根据无产阶级的立场，根据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都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只看眼前利益，不能随风倒，而抛弃根本利益；不能只是迁就眼前事变，不能忽而赞成这个忽而赞成那个，忽而主张这样忽而主张那样，而把原则当作商品去作买卖。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在思想上、政治上把自己同其他一切阶级和它们的政党区别开来，不但要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相区别，而且要同小资产阶级相区别。在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同反映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者相区别。

有些人昨天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上签了字，同意宣言和声明中提出的革命的根本原则，今天却糟蹋这些革命原则。有些人刚刚在莫斯科声明上签了字，同意声明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论断，而不久却把铁托这些叛徒当作最亲密的兄弟。有些人同意声明关于“美国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国际宪兵，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这个论断，而不久就认为人类命运取决于美苏两国首脑的“合作”、“信任”和“协议”。有些人同意宣言和声明关于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而不久就抛弃了这些准则，在自己的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随心所欲地公开谴责另一个兄弟党和兄弟国家。他们口口声声说决不允许把兄弟党之间的思想意识的分歧扩大到经济和国家的关系上去，而自己却随意撕毁兄弟国家之间订立的许许多多经济技术合同，甚至在实际上断绝同另一个兄弟国家的外交关系。有些人同意宣言和声明关于国际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的论断，不久又大肆宣传说“教条主义是主要危险”。如此等等。他们这样做，有什么原则性呢？他们的政策，是什么原则的政策呢？

无产阶级政党在坚持原则的政策的时候，还必须有灵活性。在革命的斗争中，否认随机应变，否认迂回前进，这是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区别，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主张的灵活性是实行原则政策的灵活性，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灵活性，实际上是抛弃原则政策。

在原则性基础上的灵活性，这不是机会主义。相反，如果不懂得根据具体的条件，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实行必要的灵活性，适合时机地行动，而使革命斗争遭受不应有的损失，那就可能犯机会主义的错误。

妥协问题，是灵活性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这样看待妥协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不拒绝有利于革命的必要的妥协，即有原则的妥协；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任何时候都不允许实行变节的妥协，即无原则的妥协。列宁说得很好：“马克思和恩格斯被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是各种空谈的死对头。他们教导大家要科学地提出社会主义问题（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的策略问题）。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当恩格斯分析公社流亡者法国布朗基分子的革命

宣言时，恩格斯曾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他们‘不作任何妥协’的胡吹的声明是一句空话。决不能发誓不妥协。由于种种情况，有时甚至连最革命的阶级的最革命的政党也不得不实行妥协，问题在于要善于通过一切妥协来保持、巩固、锻炼、发展工人阶级及其有组织的先锋队即共产党的革命策略、革命组织、革命意识、决心和素养。”

一个真正实事求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怎么能够笼统地反对一切妥协呢？今年《红旗》第一期的《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这一篇社论，曾经说过：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同国内外的敌人进行过多次的妥协。我们同蒋介石反动派妥协过，我们在抗美援朝的斗争中还同美帝国主义者妥协过，如此等等。”又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按照列宁的指示，“来辨别不同的妥协，赞成有利于人民事业的妥协，赞成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妥协，而反对叛卖性的妥协。事情很清楚，只有那些时而犯冒险主义、时而犯投降主义的人，他们的思想才真是托洛茨基主义，或者是变形的托洛茨基主义”。

人们知道，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过程中，在整个俄国革命和苏联建设的历史中，托洛茨基扮演了一个十分可耻的角色。托洛茨基在一切主要的问题上反对列宁，反对列宁主义。托洛茨基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能够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他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毫无原则性，时而表现为“左”倾冒险主义，时而表现为右倾投降主义。在布列斯特和约事件中，他先是盲目地主张采取冒险主义的政策；后来他在出席布列斯特和会的时候又违背列宁的指示，拒绝签订和约，同时，向德方发表叛徒式的声明，通知德方，苏维埃共和国准备停止战争，复员军队。这样就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德国提出了更苛刻的条件。

这就是在布列斯特和约事件中的托洛茨基主义。现在有人把古巴事件同布列斯特和约事件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硬拉在一起，作历史类比，把自己比作“列宁”，把反对牺牲别国主权的人叫做“托洛茨基”，这是十分荒唐可笑的。

列宁当时主张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是完全正确的。列宁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赢得时间，巩固十月革命已经取得的胜利。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大力地批评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他在谈到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这样说过：“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塞维克如果依照‘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意见拒绝对德和约时，新生的苏维埃就有夭折的危险。”事变的发展证实了列宁的预见，说明了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是一种革命的妥协。

古巴事件呢？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个事件中，古巴人民和他们的领袖誓死保卫自己祖国的主权，显示了伟大的英雄主义和高度的原则性，他们既没有犯冒险主义的错误，也没有犯投降主义的错误。在古巴事件中，有人先犯冒险主义的错误，随后又犯投降主义的错误，要古巴人民接受牺牲自己祖国主权的屈辱条件。这些人拿列宁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例子来掩盖自己，实际上是弄巧成拙，更清楚地暴露了自己。

关于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相互关系问题，刘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曾经作了如下的阐述。他说：

“我们的灵活性，是在一定原则之下的灵活性。无原则的所谓灵活，超出原则的让步与妥协，原则上的模糊与混乱，是错误的。党的原则，是一切政策与策略变动的标准和尺度。党的原则性，是灵活性的标准和尺度。比如，为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奋斗，是我们一个不变的原则，这个不变的原则，是测量我们一切政策与策略变动是否正确标准和尺度，一切合于这个原则的变动，都是正确的，一切不合这个原则的变动，都是不正确的。”

这就是我们对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相互关系的看法，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这个伟大的号召，永远是国际无产阶级所必须遵守的准则。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把维护这种团结当作自己的神圣义务。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人民日报》今年一月二十七日的社论，已经重申了我们的立场。这篇社论说：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究竟要不要团结？究竟是要真团结，还是要假团结？究竟是要在什么基础上的团结，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还是在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纲领的基础上或者别的什么基础上‘团结’？这就是说，究竟是要消除分歧，增强团结，还是扩大分歧，制造分裂？”

“中国共产党人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全世界进步人类共同一致的愿望是：维护团结，反对分裂；要求真团结，反对假团结；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共同基础，反对破坏这个基础；要求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问题上的坚定不移的态度。

有些人在自己发动了并且组织了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一连串的荒唐攻击之后，忽然又唱起“团结”的调子来了。但是，他们的所谓“团结”，是只许自己骂人，不许别人讲理。他们的所谓“停止公开论战”，是只许自己任意攻击别人，不许别人给以必要的回答。他们一面讲团结，一面继续破坏团结；一面讲停止公开论战，一面又继续公开攻击。他们还以威胁的口吻说，被他们攻击的人如果不封起自己的嘴巴，“那末就必须继续进行坚决的斗争，甚至加强这种斗争”。这些人对铁托集团倒是真正讲团结的。他们要的是同铁托集团的团结，而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要的是在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基础上的团结，或者是在某些人指挥棒的基础上的团结，而不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的团结，不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的团结。这样，他们所说的团结，实际上只是分裂的代

名词。他们企图用团结做幌子，来掩盖他们进行分裂的实际活动。修正主义代表工人贵族的利益，也就是代表反动资产阶级的利益。修正主义思潮违背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违背了人民大众的利益，违背了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利益。从伯恩斯坦起，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思潮曾经多次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喧嚷一时。但是，历史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无敌的。所有向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挑战的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一个一个地在真理面前倒下去了，一个一个地被群众抛弃了。伯恩斯坦失败了，考茨基失败了，普列汉诺夫失败了，托洛茨基失败了，布哈林失败了，陈独秀失败了，白劳德失败了，等等。现在有些人在向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动新的进攻的时候，虽然也神气十足，气焰嚣张，但是，可以断定，如果他们老是不听劝告，老是执迷不悟的话，他们的下场决不会比那些老修正主义者、老机会主义者好一些。

有些人采用许多不老实的手段，采用造谣污蔑的手段，采用挑拨离间的手段，在起劲地闹分裂，但是，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是要求国际共产主义队伍团结的，是反对分裂的。某些人的分裂行动，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行动，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行动，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行动，是违反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愿望的，是十分不得人心的。他们那种假团结、真分裂的手法，在人们的眼里是能够看得很清楚的。在历史上，一切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裂主义者，从来都是没有好结局的。我们曾经劝告那些闹分裂的人要“悬崖勒马”，可是有人还不愿意接受我们的劝告。他们认为现在还没有到达“悬崖”，也不准备“勒马”。看来，他们还很有兴趣把分裂活动继续闹下去。他们既然一定要闹，他们就闹下去吧。群众是会给他们做结论的，历史是会给他们做结论的。

一种很有趣味的现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普遍地出现了。什么现象呢？就是那些自称手中握有全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英雄好汉们，却十分害怕他们所使劲地斥责的所谓“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们为了答辩他们的攻击所写的文章。他们不敢在他们报纸、刊物上发表这些文章。他们胆小如鼠，害怕得要命，对我们的答辩文章，不敢让自己国内的人民同它们见面，严密封锁，水泄不通。甚至用强大的电台干扰，不使人民听到我们的广播。可爱的掌握了全部真理的朋友们，同志们，你们既然肯定我们的文章是错误的，何不将这些错误文章通通发表出来，然后逐条予以批驳，以便在你们自己国内的人民中间能够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们称之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邪魔外道”呢？你们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封锁得铁桶一般呢？你们怕真理。一个“教条主义”亦即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幽灵在全世界徘徊着，这个幽灵威胁着你们。你们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们，你们脱离群众，所以你们害怕真理，害怕的情况达到那样可笑的程度。朋友们，同志们，好样的，站出来，双方互登对方一切批评自己的文章，让全国全世界人民去思考去判断谁是谁非。我们希望你们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敢

于全部全文地登载你们的东西。在登载你们一切痛骂我们的“伟大”作品以后，然后逐条地或者扼要地驳斥你们，当作我们的回答。有时我们只登载你们的文章，我们不作回答，让读者们自己去思考。这难道还不算公平合理吗？现代修正主义的老爷们，你们敢不敢这样做呢？好样的，就敢。心亏理怯，色厉内荏，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那你们就不敢。我们断定你们是不敢的。是不是这样的呢？请回答吧。

中国共产党认为，解决分歧的道路是存在着的。这个道路就是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指出的道路。在本文结束的时候，我们愿意把莫斯科宣言所作的一个重要的结论引述如下：

“会议参加者交换意见以后，得出了结论，认为在现代条件下，除了举行领导人员的双边会谈和相互交换情况以外，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举行更广泛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以便讨论迫切的问题，交流经验，了解彼此的观点和立场，协议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目的而进行的共同斗争。”

我们还愿意把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关于兄弟党关系基本准则的几段话引述如下：

“在帝国主义反动派联合自己的力量来反对共产主义的条件下，尤其有必要尽一切力量团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致和团结，使我们运动的力量成倍地增长，并且为伟大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前进和在击退敌人的一切进攻方面取得成就提供可靠的保证。

“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和为实现这个学说而进行的共同斗争，把全世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要求每个共产党本着团结的精神，遵守各兄弟党在会议上共同确定的有关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共同任务的估计和结论。

“为工人阶级的事业而斗争的利益，要求日益加强每个共产党的队伍的团结，加强所有国家共产党人巨大队伍的团结，要求它们意志统一和行动统一。关心不断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最高的国际义务。

“坚决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不允许能够破坏这种团结的任何行动，是在争取民族独立、民主与和平、争取顺利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违背这些原则，就会导致共产主义力量的削弱。

“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是独立的、平等的，它们从本国的具体条件出发，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制定政策，并且相互支持。每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事业要获得成功，需要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国际主义的同情支持。每个党都对本国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负责，都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负责。

“共产党和工人党根据需要举行会议来讨论迫切的问题，交流经验，互相了解彼此的观点和立场，通过协商途径得到一致的观点，协调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

“当某一个党遇有同另一个兄弟党的活动有关的问题时，由这个党的领导方面向有关党的领导方面提出，必要时进行会谈和协商。

“最近几年来举行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谈的经验和结果，特别是两次最大的会议——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会议和这次会议的结果表明：在目前条件下，这种会议是相互交换意见和经验、通过集体努力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确定一致立场的有效形式。”

在一年多以前发生了一个党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对另一个兄弟党进行公开攻击的事件以后，我们就多次呼吁，要根据上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提出的原则和办法，解决兄弟党之间的分歧。我们多次指出，对任何一个兄弟党的公开的片面的攻击，是有助于问题的解决的，是有助于团结的。我们一直主张，有争执和分歧的兄弟党，特别是首先发动攻击的党应当采取主动，停止公开论战，回到内部协商的轨道上来。我们现在的主张依然是这样。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六二年四月间，就向有关的兄弟党提出，我们衷心支持一些兄弟党提出的召开兄弟党会议的主张，认为，考虑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是适宜的。我们当时就提出，要举行兄弟党会议，并使会议取得成就，有赖于事先克服许多困难和障碍，有赖于进行许多准备工作。

我们当时就希望，从那时起，彼此间有争执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能够采取有利于缓和关系、恢复团结的步骤，即使是微小的步骤也好，以便改善气氛，为兄弟党会议的召开和取得成就准备条件。

我们当时就建议，各有关兄弟党应当停止公开攻击。

我们当时就认为，某些兄弟党之间根据需要，举行双边的或者多边的会谈，交换意见，这对于兄弟党会议取得成就也是会有帮助的。我们在一九六二年四月间向有关兄弟党提出的这些意见，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是完全符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关于解决兄弟党之间分歧的规定的。我们曾经多次地说明过这些意见。现在，我们再一次地说明这些意见。

最近，有的党的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表示接受我们的意见。如果是诚意的话，是言行一致的话，这当然是很好的，这是我们历来所希望的。

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必须团结起来，也一定能够团结起来！

让我们高呼：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一切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

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

原载人民日报 1963-03-04

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今年一月九日，美国共产党发表了一篇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声明。美国共产党的一些同志，在近几个月来还发表了其他许多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言论。

美国共产党的声明，特别恶毒地诬蔑和诽谤中国共产党在加勒比海危机中的立场。声明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导致热核战争的政策”；“我们的中国同志这种假左派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路线，同最富有冒险性的美帝国主义的路线是吻合的，并且使后者得到了鼓励。”

这是什么话？！这种可耻的诽谤竟然出自美国共产党人之口，不能不使人感到十分惊讶。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加勒比海危机中的立场，是很明确的。我们支持古巴革命政府的五项正义要求，反对轻信肯尼迪的假“保证”，反对把“国际视察”强加在古巴身上。我们始终把斗争的锋芒对准着侵略古巴的美帝国主义。我们既没有主张把导弹武器运进古巴，也没有阻挠从古巴撤出所谓进攻性武器。我们既反对冒险主义，也反对投降主义。试问，我们的这种正确立场有什么可非议的呢？怎么能说是“导致热核战争的政策”呢？有哪一点同美帝国主义的路线相“吻合”呢？

人们不难看到，同帝国主义的路线相吻合的路线，确实是有的。美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在加勒比海危机问题上，不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侵略古巴的祸首美帝国主义，而是指向坚决支持古巴的中国共产党。这不是同最富有冒险性的美帝国主义者一鼻孔出气吗？

你们把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国同志叫做“假左派”，我们要问，你们心目中的真左派又是什么呢？是不是拿别国的主权去同美帝国主义做政治买卖，就叫做真左派呢？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才是货真价实的假左派，真右派。

美国共产党一些领导人在加勒比海危机问题上攻击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偶然的。他们这样做，反映了他们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和所采取的立场是完全错误的。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共产党一些领导人，在他们的报告和言论中，极力美化帝国主义，极力美化帝国主义的头子肯尼迪，并且极力表白自己对美国统治阶级的忠诚。

他们赞赏肯尼迪提出的把美国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世界六大洲的所谓“新边疆”思想，说“像肯尼迪那样谈到新边疆是好的”。（见一九六一年二月《政治月刊》所载霍尔在美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他们称赞肯尼迪号召美国人民作出牺牲来推进美帝国主义事业的就职演说，说这“是走向和平道路的一个可能的开端”。（见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工人报》）

他们颂扬肯尼迪一九六一年鼓吹“一手抓箭、一手抓橄榄枝”的反革命两手策略的国情咨文，说这个咨文“受到绝大多数美国人民的欢迎”。（见一九六一年二月五日《工人报》）

他们认为，“肯尼迪政府的主要群众支持”是“工人阶级、黑人、和平力量”，并且一厢情愿地把希望寄托于肯尼迪政府“朝着和平民主的方向改变政策”。（见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六日《工人报》所载霍尔的政策声明）

他们从肯尼迪一九六二年宣布要加速武装起来实现美国独霸世界目标的国情咨文中得出结论说，肯尼迪政府“能够被迫接受来自人民的压力”。（见一九六二年二月《政治月刊》）

他们把肯尼迪在一九六二年钢铁涨价事件中支持洛克菲勒财团打击摩根财团的做法，说成是“唤醒了美国人民反垄断的传统”，“作出了伟大贡献”。（见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工人报》）

他们在评论肯尼迪一九六三年要用核讹诈来建立美国领导的“法治世界”的国情咨文时，竟然鼓吹肯尼迪所说美国“追求的不是一个国家或一种制度在全世界的胜利，而是人类在全世界的胜利”，把这种骗人鬼话说成是肯尼迪“对于世界现实的认识”，“大多数人听了都高兴”，并且“激起了希望”。（见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日《工人报》）

他们说，他们“任何一天或者每一天都可以”发誓不主张使用暴力推翻美国政府。在有人问到“如果苏联进攻美国，你将支持谁”的时候，他们回答说：“如果我认为我的国家受到进攻，我将保卫它”。（见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工人报》）

美国共产党一些领导人美化美帝国主义和向它表白忠诚的这些言论，同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对于美帝国主义所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结论，是没有共同之处的。

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对美帝国主义作了科学的分析，明确地指出：美帝国主义是最大的国际剥削者，是全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是国际宪兵，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

美帝国主义正在“和平”和“裁军”的幌子下，加紧扩军备战。它正在准备打一切类型的战争，不仅准备打全面核战争，准备打有限战争，而且已经在打着“特种战争”。它采取武力和美元交互使用的反革命两手策略，并且利用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作为它的别动队，在全世界，特别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镇压和破坏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推行新殖民主义。它最贪婪地掠夺世界各国的财富，连它的盟国也不放过。它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就代替德日意法西斯的地位，把全世界一切最反动、最腐朽的势力都集结在自己的周围。它是现代最富有寄生性、腐朽性和反动性的资本主义，是现代侵略和战争的主要根源。

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正是从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本性，从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

政策，从世界的现实，日益清楚地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是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最凶恶的敌人，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是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

美国共产党一些领导人也许会说，他们并没有否认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各地所犯下的各种侵略和战争活动的罪行。然而，他们在谈到这些罪行时，总是马上说，这些坏事不是美国总统干的，而是所谓“极右派”干的，或者是总统在“极右派”的压力下干的。他们把美国前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和现任总统肯尼迪，说成是什么具有“清醒头脑”和“现实感”的“明智派”。他们常常说，“华盛顿有两个势力中心，一个在白宫，另一个在五角大楼”；“五角大楼将领及其极右派、共和党领袖和华尔街的同伙们”是“独立于白宫之外的”势力。请问，如果美国共产党领导人还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承认美国的国家机器是垄断资本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怎么可能有“独立”于垄断资本之外的总统，怎么可能有“独立”于白宫之外的五角大楼，又怎么可能在华盛顿形成两个互相对立的中心呢？

拿美国现任总统肯尼迪来说，他本人就是大资本家。正是他，在一九六一年下令对古巴进行武装入侵，在一九六二年下令对古巴实行军事封锁和战争挑衅。正是他，在越南南部进行绝灭人性的“特种战争”，利用“联合国军”镇压刚果民族解放运动，组织“特种部队”在拉丁美洲各国进行扑灭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猖狂活动。肯尼迪上台以来，逐年大量增加军费。肯尼迪最近提出的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四年度预算中的军费高达六百亿美元以上，比艾森豪威尔提出的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度预算中的军费四百五十九亿美元增加百分之三十以上。事实证明，肯尼迪政府在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方面，更富有冒险性。

美国共产党一些领导人，硬要把肯尼迪装扮成“明智派”，这不是甘心充当美帝国主义的辩护士，帮助它欺骗世界人民吗？

美国共产党一些领导人如此热中于美化美帝国主义，热中于表白自己对于美国统治阶级的忠诚，使我们想起了曾经在美国共产党中出现过的白劳德修正主义。工人阶级叛徒白劳德，否认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否认美国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性质，认为它还“保持着青年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些特点”，认为它在一个长时期内还要起进步作用，还是世界上一支争取和平的力量。这些美国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不想一想，你们现在这样为美帝国主义涂脂抹粉，同白劳德修正主义到底还有什么区别呢？

显然，在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于如何认识和对待美帝国主义这个全世界人民的大敌，是存在着原则分歧的。

我们一贯认为，必须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按照事物本来的面貌，不断地揭露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不断地揭露美帝国主义及其当权人物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明确地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必须不断地对人民群众进行革命的宣传工作，武装人民群众的思想，提高人民群众的革命坚定性和革命警惕性，动员人民群众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但是，有一些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不仅自己竭力为美帝国主义涂脂抹粉，而且拼命反对别人揭露美帝国主义。他们竟然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革命宣传工作，诬蔑为“诅咒”、“谩骂”、“语言的武器”、“巫婆的咒语”、“马粪纸的剑”等等，还说什么“单单谩骂帝国主义，不论谩骂得多么有理，也不能削弱它的力量”。按照这些人的说法，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共产党人所进行的一切革命宣传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切揭露资本主义的著作，列宁的一切揭露帝国主义的著作，各国共产党共同制订的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等等，岂不是都变成了“马粪纸的剑”吗？这些人根本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一旦掌握人民群众，就会产生多么巨大的物质力量。人民群众一旦被革命思想武装起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就会干出翻天覆地的事业来。反对揭露帝国主义，反对进行一切革命宣传工作，目的究竟何在呢？实际上，这只能是不要人民群众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显然，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

我们还一贯认为，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积一百二十年之久的基本经验，也是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积累起来的共同经验。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采取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和方式来反对各国革命人民。各国革命人民也必须学会和掌握有利于打击敌人、保护和发展自己的一切斗争手段和斗争方式。例如：以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统一战线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革命统一战线，用革命的两手策略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策略，以自卫战争对付侵略战争，以谈判对付谈判，以革命宣传对付反革命宣传，等等。我们所说的“针锋相对”，就是这样的。经验证明，只有这样，才能够锻炼和壮大人民的力量，积累和丰富革命的经验，取得革命事业的胜利。只有这样，才能够打击帝国主义的气焰，制止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住世界和平。

但是，有些人故意曲解和攻击我们关于对帝国主义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观点，说我们反对同帝国主义谈判。美国共产党在它的声明里，也跟着别人毫无道理地歪曲和攻击我们的这种观点。其实，他们并不是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一向赞成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坐下来进行谈判，包括举行大国首脑会谈，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缓国际紧张局势。他们也知道，我国政府为了实现这个主张，作了积极的努力和重大的贡献。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喋喋不休地歪曲和攻击我们的这种正确的立场呢？

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在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的方针问题上，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存在着原则分歧。我们相信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我们主张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应当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团结和斗争，依靠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联合斗争。同我们相反，他们不信任人民群众，不是把主要希望寄托在人民群众的团结和斗争上面，而是把主要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的“明智”和“善良”上面，寄托在两个大国首脑的会谈上面。

他们十分醉心于大国首脑会谈，把举行大国首脑会谈吹嘘为什么“新阶段”、什么“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什么“在世界历史中打开一条新的河流”。

在这些人看来，人类命运和历史进程是要由两个大国、两个“大人物”来决定的。对于他们说来，国家无分大小一律独立平等，只是一句空话，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都必须听从两个大国的摆布。对于他们说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只是一句空话，只要两个“大人物”坐在一起，天下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了。这难道不是大国沙文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理论”吗？这难道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任何相同之点吗？实际上，这种观点并不新鲜，而是从叛徒白劳德那里抄来的。白劳德早就说过：世界上两个最大强国的“联盟”，“将在战后时期成为集体安全和各族人民进步的伟大堡垒”，“世界的前途取决于”两个最大强国的“友谊、谅解和合作”。

美国共产党的声明别有用心地提到了台湾、香港和澳门。声明说，中国同志“对台湾、香港和澳门，还正确地没有采取冒险政策，而他们却鼓吹别人采取冒险政策。为什么采取这种双重标准的态度呢？”

我们知道，这种奇谈怪论是从哪里学来的。我们也知道，制造这种奇谈怪论的人怀着什么目的。

我们愿意在这里答复一切提出这个问题的人。

对于我们来说，从来不发生什么“双重标准”的问题。处理台湾问题也好，处理香港和澳门问题也好，处理一切国际问题也好，我们只有一个标准，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就是世界和平和世界各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利益。在国际斗争中，我们既反对冒险主义，也反对投降主义。这两顶帽子，无论如何是安不到我们头上来的。

既然有些人提到台湾、香港和澳门，我们就不能不在这里谈一谈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

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前的一百多年期间，美国、英国、法国、沙皇俄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帝国主义和殖民国家，曾经猖狂地侵略中国。它们强迫旧中国政府同它们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诸如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一八五八年爱珥条约、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一八八一年伊犁条约、一八八七年中葡条约、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一八九八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一九〇一年辛丑条约，等等。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它们从中国的东南西北方侵夺中国的领土，从中国的沿海和内地租借中国的土地。它们有的攫取台湾、澎湖，有的侵占香港、强租九龙，有的永占澳门，等等。

我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就宣布，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历届中国政府同外国政府所订立的条约，要分别按其内容，或者承认，或者废除，或者修改，或者重订。在这方面，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同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是根本不同的。对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我们在政策上也是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事实上，历史上的许多条约有的已经失效，有的已经废除，有的则被新的条约所代替。还有

一些历史遗留下来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例如香港、九龙、澳门问题，以及一切未经双方正式划定的边界问题，就是这样。至于台湾、澎湖，已经在一九四五年归还中国，现在的问题是美帝国主义侵占台湾、澎湖，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人民一定要行使主权，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同时，通过中美两国大使级的华沙谈判，争取解决美国武装部队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的问题。我们这种立场，不但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符合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我们这种正确的政策，为什么在加勒比海危机以后，突然引起了一些人的议论，竟然变成了他们反华运动的一个题目呢？

看来，这些英雄好汉，从粪坑里捡起这样一块石头，得意洋洋，自以为一下子就可以把中国人打倒了。但是，这块臭石头到底打着了谁呢？

你们不是不知道，香港、澳门这类问题，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问题。试问，你们提出这一类问题，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问题通通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你们是不是想过，这样做会引起什么后果呢？难道你们认为，这样做对你们真的会有什么好处吗？

从表面上看，你们似乎赞同中国对香港、澳门的政策。但是，你们又拿印度解放果阿来同中国对香港、澳门的政策相比，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你们无非要证明中国人是胆小鬼。老实说，中国人民并不需要在香港、澳门问题上显示武力，来证明自己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和坚定性。我们的勇气和坚定性是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领教过的。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在朝鲜战场上，同朝鲜人民并肩抗击美国侵略者达三年之久，洒下了自己的鲜血。你们现在竟然在香港、澳门问题上嘲笑我们，难道不觉得自己是“愚蠢的”、“可悲的”吗？

我们很知道，你们当然也知道，你们提出香港、澳门这类问题，拆穿来说，不过是企图拿它们当作遮羞布，掩盖你们自己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做下的丑事。这完全是枉费心机。真理和谬误都是有客观标准的。正确的不能说成是错误的，错误的也不能说成是正确的。拿丑事来夸耀，决不会给自己增加任何光彩。中国人民在香港、澳门问题上的正确政策，怎么能够同你们在加勒比海危机中的错误政策相提并论呢？怎么能够帮助你们开脱呢？我们在台湾问题上坚决维护自己的主权，同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坚决支持古巴人民维护自己的主权，立场是完全一致的，怎么说得上什么采取“双重标准的态度”呢？

硬充英雄好汉的朋友们，真正采取“双重标准的态度”的，并不是我们，而是你们。对于美帝国主义，你们今天说它是海盗，明天又说它关心和平。对于革命的古巴，你们一面说支持它的维护独立主权的五项要求，一面又企图把“国际视察”强加在它身上。在中印边界纠纷中，你们一面讲什么“中国是兄弟”、“印度是朋友”，一面又恶毒地攻击中国，多方面地支持印度反动派。在香港、澳门问题上，你们表面上替中国作辩解，骨子里向中国放冷箭。你们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双重标准”

的态度吗？难道不是双重人格的表现吗？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同美国共产党人和美国人民，站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同一条战线上。我们十分尊敬美国共产党的缔造者、美国无产阶级的杰出领袖福斯特同志。我们没有忘记，以他为代表的美国共产党人，在中国人民革命的艰苦岁月里，曾经给予我们热情的声援，并且奠定中美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友谊。美国共产党人现在受到美国政府的横蛮迫害，我们十分同情他们的这种艰难处境。一年以前，中共中央曾经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迫害美共的暴行。中国人民也展开了声援美共的群众运动。但是，不知为了什么缘故，美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不值得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美共的声援，告诉美国共产党人和美国人民。

美国共产党领导人自称自己意识到处于世界上最强大、最狂妄的帝国主义心脏而担负的国际义务。他们如果对于自己的义务真有正确的了解，我们当然感到高兴。在美国，有强大的工人阶级，有广泛的民主和进步的社会力量，在科学界、艺术界、新闻界、文化教育界有许多正直和进步的人士。在美国，有规模巨大的工人斗争，有不断发展的黑人斗争，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进步的运动。在美国，存在着反对垄断资本、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在美国共产党内和党外，都有不少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如果美国共产党领导人能够继承和发扬福斯特同志的革命传统，面向群众，依靠群众，在群众中进行艰苦的革命工作，在工人运动中抵制资产阶级的腐蚀和改良主义的毒害，在自己的队伍中清除洛夫斯通、白劳德的修正主义影响，发展本国人民反对本国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的革命斗争，从美帝国主义的心脏配合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那么，这才是真正理解和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对于美国工人阶级和美国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寄以殷切的希望。

今天，摆在各国共产党人面前的迫切任务，是团结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结成一条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伟大口号，鼓舞着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国际无产阶级，鼓舞着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吸引着他们在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团结起来，并肩战斗。

对于全世界共产党人说来，我们大家必须团结起来。我们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把全世界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坚持到最后胜利！

原载人民日报 1963-03-08

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满意地指出：我们提出的关于加强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一致和团结的措施的提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响应。我们对你们同意举行苏中两党代表会谈表示欢迎。这种会谈应该对在各兄弟党相互关系中造成良好气氛，对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近以来发生的分歧起重要作用。我们愿意希望，经过这次会谈，克服现有困难的一系列建设性措施能够得以实现。

中共中央在来信中邀请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访问柬埔寨时顺便访问北京。苏共中央和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对这一邀请表示感谢。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很愿意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中共的领导进行会谈，就有关国际形势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已经成熟的问题交换意见，以便对于我们的任务和加强我们两党之间的团结问题取得共同的理解。但是，你们在信中所说的关于尼·谢·赫鲁晓夫同志访问柬埔寨的事并未安排过。大家都知道，根据我们领导机关还在今年二月十二日就通过的决定，将要访问柬埔寨的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此事已经通知了柬埔寨政府并且在报上公布了。曾经三次访问过中国的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并不放弃在将来应你们的盛情邀请访问中国以及同中国同志们见面的希望。

我们记得，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的时候说，他只到过苏联两次，并且只访问过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他表示希望再次访问苏联，以便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国家。当时他说，他愿意在我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作一次旅行。对毛泽东同志的这种愿望，我们表示了欢迎。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二日，苏共中央写信给毛泽东同志，邀请他到苏联来休养，并且了解苏联人民的生活。遗憾的是，那时毛泽东同志未能应邀。苏共中央欢迎毛泽东同志来访问。即将来临的春天或夏天——我国一年中的好季节，是进行这种访问的最好时间。我们也愿意在其他任何时候对兄弟党和兄弟的中国人民的代表毛泽东同志给以应有的接待。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到我国访问的时候当然不会是一个人，我们党的领导同志会同他在一起，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机会就各种问题交换意见。毛泽东同志可以看到苏联人民如何劳动，看到他们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在实现我们党的纲领方面获得了哪些成就。

如果毛泽东同志目前不能前来莫斯科，那末，我们愿意接受你们所表示的关

于在莫斯科举行苏中两党高级代表会谈的意见。我们认为，这次会谈可以大约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五日举行，如果这个日期对你们是可以接受的话。

我们十分高兴，中国同志也像我们一样，把中苏两党代表将要举行的会谈看作是“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一个必要的准备步骤”。的确，这种会谈，在不违反平等原则和不损害其他兄弟党利益的同时，应当有助于更好地准备和举行会议。不举行这种会谈，同样，不停止在刊物上公开论战，不停止在自己党内批评其他兄弟党，要准备开会和达到主要目的，即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就会有困难。正是因为这样，苏共中央在表示赞同越南、印度尼西亚、英国、瑞典及其他同志于一九六二年初提出的关于召开各国兄弟党会议的提议的同时，曾经强调过，必须实现能够为世界性共产主义集会的工作创造有利局面的措施。

苏共中央早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的信中就呼吁“停止就那些我们之间有不同见解的问题进行的不必要的争论，不再发表那种不能缓和而只能加深我们分歧的公开声明。”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我们写道：“你们很清楚地知道，我们党过去和现在都主张集体讨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问题。苏共中央是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各国兄弟党会议的发起者。这两次会议都是与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和必须制定共产主义运动的相应策略有关系的。这一次，我们也完全支持召开各国兄弟党会议的提议。”

我们认为有益处的是，为了筹备这种会议，各兄弟党都能深刻地全面地分析国际生活中的新现象和自己在实现我们运动的集体决议方面的活动。苏共中央曾经表示过为所有共产党人都完全理解的关心，就是：这次会议不要加深已发生的分歧，而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这些分歧的克服。

最近，兄弟党的许多领导人在他们的言论中都公正地表示了类似的看法：在这次会议之前，必须采取一系列步骤，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正常的情况，把意见争论纳入党的同志式的争论所允许的范围。从你们的信中可以看出，现在你们也同意这一点。可以认为，在这次会议的筹备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不言而喻，当我们两党讨论涉及所有兄弟党的问题的时候，这种讨论只能具有初步性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的会议表明：只有所有兄弟党集体参加，只有在应有的程度上考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切队伍的全面经验，才能顺利地制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

我们仔细地研究了你们提出的关于苏中两党代表会谈时可以讨论的问题范围的意见。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愿意讨论它们。

在这封信中，我们也愿意谈谈若干原则性的问题，在我们看来，这些问题是兄弟党注意的中心，是它们为我们共同事业而斗争的中心。当然，这里不是详尽地叙述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我们只准备指出我们在世界舞台上实行自己的政策的时候，在和兄弟党的相互关系中所遵循的那些原则上重要的东西。

我们希望，这样叙述我们的观点，将有助于画出在双边会谈时需要交换意见的

问题的范围，有助于克服现有的分歧。我们这样作，是为了再一次强调我们有决心坚定地一贯地保卫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纲领和它的反映在宣言与声明中的共同路线。

在声明通过以后的这段时间里，生活不但没有动摇它的任何一个基本结论，相反完全证实了在总结现代经验和创造性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共同制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的正确性。

苏共的出发点是：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主要内容的我们的时代，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

在世界上所形成的局势，给我们的运动开辟了新的可能性的国际舞台上阶级力量分布情况的变化，都要求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符合它在现阶段的根本任务的总路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一系列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以及亚洲一些其他国家取得了胜利，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新的制度在人民民主国家巩固起来了，并且保证了这些国家在经济、政治与文化上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快速发展。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紧密地团结起来了。由于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成就，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帝国主义的重大变化。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的是，美国失去了对原子—氢武器的垄断，以及苏联建立了强大的军事能力。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建立，是国际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的历史成果。它实际上体现着人类关于新社会的理想。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的增长，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使得社会主义大家庭建立起这样的经济和防御力量：它不仅可靠地保卫着社会主义的成果，而且是全世界人民和平与安全的强大堡垒。

力量对比的根本变化，也是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与它的一切矛盾的尖锐化联系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力量分布情况改变了。帝国主义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随着它的经济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成了国际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它担任了资本主义救星的角色。目前，美帝国主义履行着国际宪兵的职责。美帝国主义利用军事集团政策力图使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服从它的统治。这引起法国、西德、日本和其他资本主义大国对美国的对抗。世界大战中受到损失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的恢复，它们的高于美国的发展速度，使得欧洲一些国家更加力图摆脱美国的操纵。这一切导致帝国主义竞争和冲突的原有症结更为加深，导致新的症结的产生，这削弱着整个资本主义体系。

帝国主义的反人民的掠夺本性没有改变，但是，随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建立及其经济和军事威力的加强，帝国主义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可能性在明显地缩小，同时它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反对世界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方式和方法

也在变化。帝国主义者非常惧怕社会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力量的急速增长，他们联合自己的力量，进行疯狂的努力，来继续为自己的剥削目的而斗争，并且力图到处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阵地，削弱它们的影响。

十分明显，在现时代，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向的，已经不是帝国主义，而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切进步力量。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我们时代的主要矛盾。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命运，在决定性的程度上取决于两个世界体系的斗争的结局。同时，世界舞台上力量的对比不断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为自己的民族与社会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和他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就，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一切劳动者反对垄断组织，反对任何剥削，争取社会进步的日益高涨的斗争，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命运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革命，人民民主主义革命，广泛的农民运动，人民群众为了推翻法西斯和其他暴虐制度的斗争，反对民族压迫的一般民主运动，这一切在当代正在汇合成一股冲击和摧毁资本主义的世界的革命的洪流。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根据新的条件制定自己的方针时，也不能不十分认真地考虑这样一个重要因素——进行战争的军事技术手段的根本质变，这种质变是同具有空前破坏力的热核武器的出现和积累相关联的。只要裁军没有实现，社会主义大家庭就应该在其武装力量方面一直保持对帝国主义者们的优势。我们将要迫使帝国主义者记住，如果他们发动战争，要用武力去解决人类沿着什么道路——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问题，那么这将是最后一次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帝国主义将最终地被粉碎。

在目前条件下，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所有战士的义务在于，最大限度地利用对社会主义的胜利有利的可能性，不容许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

对世界舞台上阶级力量分布情况的正确分析和在两次莫斯科会议上所制定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针，使各国兄弟党在发展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阶级的革命斗争的开展以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

社会主义体系对于世界发展进程的影响越来越大。现在，整个世界的革命的过程正在社会主义各国内新生活的范例的伟大力量的直接影响下发展。我们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中的成就越大越多，共产主义的思想就会越加顺利地深入广大人民群众的海和心里。因此，很明显，凡是想加速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人，他就应当首先关心加强伟大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及其经济威力，就应当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争取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致和团结，提高它的国际威信。莫斯科会议的声明，使社会主义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人民在国际工人运动面前担负起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责任。

我们各国兄弟党和人民在不断地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从而都对国际工人阶

级、所有劳动者以及整个解放运动争取本着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利益解决当代根本问题所进行的伟大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目前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使得社会主义各国同所有爱好和平力量一起能够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一个完全现实的任务——防止新的世界战争，保障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

莫斯科声明通过以后的这几年，完全证明了这种论点的正确性。侵略势力没有能够把人类推入毁灭性的热核战争的深渊，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其威力、始终不渝地执行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的极重要的结果，这种政策越来越为亿万人民所承认并且得到他们的支持，它正在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占上风。

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怀疑：帝国主义由于一个接着一个地丧失阵地，力图用一切手段保持它对各国人民的统治，夺回已经失去的阵地。目前，帝国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各国和世界的解放运动正在进行历史上最大的国际勾结。当然，不能保证帝国主义者不企图发动世界战争。共产党人应该清楚地看到这种危险。

但是，侵略者在目前条件下的处境，根本不同于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处境，尤其是不同于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处境。从前，战争的结局一般都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战胜了另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战败国继续生存下去，过一个时期又恢复了自己的力量，而且甚至能够再一次发动侵略，德国的例子恰好证明了这一点。热核战争不会给任何侵略者提供这种前景，帝国主义者是不能不考虑这种情况的。害怕受到回击，畏惧遭到报复，这会阻止他们发动世界战争。社会主义大家庭变得如此强大，以致帝国主义已经不能和过去一样把自己的条件强加于各国人民和迫使各国人民接受他们的意志了。这是国际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

帝国主义由于它的掠夺本性，不能放弃用战争来解决国际舞台上的矛盾的企图。可是，另一方面，它也不能去发动世界热核战争而不考虑这会使自己有遭到毁灭的危险。

帝国主义用以威胁人类的世界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力量越来越超过帝国主义力量，和平力量越来越超过战争力量，这正导致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之前，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将会出现把世界战争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

当然，为了防止这种战争，必须进一步全力加强社会主义体系，必须团结国际工人阶级的一切力量，团结民族解放运动，团结一切民主力量。凡是珍视社会主义利益、珍视和平利益的人，都应该作一切必要的努力来粉碎世界反动派的罪恶阴谋，不允许它发动热核战争而把数以亿计的人们带到坟墓里去。对热核战争会给全人类、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的清醒估计，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迫切地提出了一项任务：尽我们的一切可能来防止新的世界冲突。

苏共中央坚决遵循一九六〇年声明的下述主张：“在世界分裂为两个体系的情况

下，国际关系中唯一正确的和明智的原则是弗·伊·列宁提出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这一原则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中，在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在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文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由伟大的列宁用同帝国主义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的精神教育出来的我们党，记着列宁关于资本主义临死还能给人类带来无数灾难的警告。苏联大力发展经济，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改进自己的国防，增强军事威力，使武装力量经常处于准备状态。但是，过去和将来我们利用我国越来越增强的威力的目的，不是为了威胁任何人，不是为了燃起战争的狂热，而是为了巩固和平，为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为了保卫自己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和平共处政策符合所有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它有助于社会主义阵地的巩固，有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影响的增长，提高共产党人的威信和影响。

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调和。走上这条道路，就意味着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阻碍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一种特洛伊木马，帝国主义总想把它塞进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队伍里来。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预计到两个社会体系之间进行毫不松懈的思想、政治和经济斗争；预计到资本主义体系国家的劳动者进行阶级斗争，其中包括武装斗争，当人民认为它是必要的时候；预计到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不断发展民族解放运动。

事实证明，为防止世界战争所进行的斗争，丝毫不束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相反，它把极广泛的人民群众联合在共产党人的周围。恰恰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古巴实行了社会主义革命，阿尔及利亚人民获得了民族独立，四十多个国家取得了民族独立，各兄弟党成长壮大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增长了。

社会主义各国，利用和平共处的形势，在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中取得越来越多的成就。我们的敌人了解，他们在同我们的竞赛中，是难望获胜的。他们无法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快速度，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榜样对于受资本主义压迫的人民的吸引作用面前，他们是无能为力的。

随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劳动者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获得更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可能性，将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来说，是一个伟大的吸引力。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就，对于在资本主义国家展开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战胜资本主义来说，将是一种催化剂和革命化的因素。

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各国人民，继承了过去遗留下来的不同水平的经济和文化。但是，尽管如此，社会主义激发起了强大的生产力，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在这方面就是一个例子。在发展经济方面，苏联已经超过了欧洲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

国家，占居了世界第二位，而在不久的将来将占居世界第一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获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制度是这样进步，它能够使各国人民快速地消除落后状态，赶上比较发达的国家，并且同这些国家在一个行列中为建成共产主义而斗争。

这一切鼓舞着各国人民，使他们相信不管他们目前处在历史发展的什么水平上，他们都能够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在这条道路上获得成就。便于各国人民向新生活前进的是，他们有可能从社会主义建设的世界经验中挑选最好的东西，考虑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的肯定的方面和否定的方面。

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得越快，它们的经济力量增长得越高，社会主义大家庭为了和平的利益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利益对于整个历史发展的速度和方向所发生的影响也就越加有力。

我们党从这样一点出发：在当前时代，有着有利于越来越多的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国际条件和国内条件。这无论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或是对于不久前取得了民族独立的国家来说，都是如此。

世界的革命的过程越来越扩大，席卷世界各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是紧密地相互联系的，是相互援助的。社会发展的进程使得革命斗争，无论它在什么国家进行，都是针对着共同的主要的敌人——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

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有一个共同的最终目标，那就是动员一切力量去为工人和劳动农民夺取政权而斗争，去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每一个共产党在制定自己的斗争的策略路线时，不能不考虑到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不能不注意到我们整个运动的利益、目标和任务，以及这一运动在当前时期的总路线。

虽然如此，在每一个国家制定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形式和方法，是各该国工人阶级及其共产主义先锋队的内部事情。任何别的兄弟党，无论其人数多少，经验与威信如何，都不能规定其他国家革命斗争的策略、形式和方法。革命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事业。准确地分析具体形势，正确地估计力量对比，是革命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当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成熟的时候，不能制止革命群众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热潮。如果去制止，就等于死亡。但是，不能人为地去推动革命，如果条件还没有成熟的话。革命的阶级斗争的经验教导说：没有成熟的起义注定要失败。共产党人号召劳动人民高举红旗，是为了在争取世界上最好的生活的斗争中取得胜利，而不是为了死去，即便是英雄地死去。革命战斗中的所必需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不是为了它们本身的需要，而是为了取得伟大社会主义思想的胜利。

苏共在过去和将来都欢迎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在自己的共产主义先锋队的领导下，善于利用革命形势，对阶级敌人给以致命的打击，建立新的社会制度。

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策略和政策都有本质上的共同特征，这些特征是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当前阶段，同国际舞台上所形成的力量对比联系着的。由于国家垄

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但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过去所发生的矛盾，而且产生了新的矛盾。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使帝国主义在国内的社会基础进一步缩小，使政权集中在一小撮最大的垄断资本家手里。这就使得在另一极上产生了一支统一的反对垄断组织的洪流，其中包括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劳动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关心摆脱垄断组织的独裁、摆脱剥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某些其他阶层。

在我们的时代，各种民主运动，例如争取普遍和平、防止世界热核灾难、维护民族主权、维护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进攻、争取实行土地改革的斗争，以及保卫文化的人道主义运动和其他运动的意义，都在急剧地增长着。

我们党完全站在列宁主义的立场上，站在声明的立场上，即社会主义革命不一定同战争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世界战争孕育着胜利的革命，那么没有战争，革命也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共产党人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世界大战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不仅不能赢得群众对社会主义的同情，而且会使他们同社会主义疏远。在存在着具有可怕的毁灭性后果的进行战争的现代化手段的条件下，这类号召只能有利于我们的敌人。

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争取以和平方法，不通过内战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可能性的实现符合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利益，符合本国全民族的利益。与此同时，革命发展途径的选择不仅仅取决于工人阶级。如果剥削阶级要对人民施行暴力，工人阶级就不得不采用非和平道路来夺取政权。一切都取决于具体条件，取决于国内和世界舞台上的阶级力量的分布情况。

自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管通过何种形式来实现，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各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可能的。苏共高度评价资本主义国家内以共产党人为首的工人阶级的忘我斗争，并认为给它们以一切援助和支持是自己的义务。

我们党把民族解放运动看成是世界的革命过程的组成部分，是破坏着帝国主义阵线的强大力量。从前的殖民地人民，现在正在站立起来，去进行独立的历史性创造，并且正在寻找提高自己的民族经济和文化的途径。社会主义体系力量的增长积极地促进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和取得经济独立，促进民族解放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促进民族解放运动反对任何形式的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

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消灭殖民制度的最后阶段。现在还暂时处在殖民主义者桎梏下的一切人民获得自由和独立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获得解放的各族人民都立即碰到以下的问题，就是巩固政治上的独立，消除经济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消除对帝国主义的各种形式的依赖。

在摆脱了殖民压迫的国家里，民族复兴的迫切任务，只有在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进行坚决斗争的条件下，把本民族的一切爱国力量——工人阶级、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知识分子联合成民族统一战线，才能顺利实现。

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人民和已经赢得政治独立的人民，已不再是，或即将

不再是帝国主义的后备军，他们在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进步力量的支持下，越来越经常地使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同盟遭到失败。

年轻的民族国家在两种世界社会体系竞赛的条件下发展着。这种情况对它们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对它们选择将来要走的道路，有极大的影响。不久前获得了民族解放的国家，既没有进入社会主义国家的体系，也没有进入资本主义国家的体系，但是其中绝大部分还没有摆脱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轨道，虽然它们在那里占有特别的地位。这是世界上仍然受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剥削的一部分。

现在，当年轻的主权国家取得了政治独立以后，占首要地位的已经是它们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彻底的民族复兴、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了。不发达国家取得完全独立，就会使帝国主义受到新的严重的削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粉碎当前的掠夺式的和不平等的国际分工的整个体系，必然会破坏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对“世界农村”进行经济剥削的基础。不发达国家的、依靠社会主义体系有效援助的、独立的民族经济的发展，将给帝国主义以新的沉重打击。

在争取和巩固独立的斗争中，必须全力团结所有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由于力图巩固自己在取得独立以后的统治地位，会在一定时期内建立反动的政权迫害共产党人及其他民主人士。但是，因为这种政权阻碍进步，阻碍解决迫切的民族任务——首先是阻碍取得经济独立和发展生产力，所以它是长久不了的。正因为这样，尽管受到帝国主义的积极支持，这种政权将为人民群众的斗争所扫除。

苏共把同挣脱了殖民主义枷锁的人民以及同半殖民地人民的兄弟同盟，看作是自己国际政策的基石之一。我们党认为，帮助所有沿着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的道路前进的人民，帮助所有为完全消灭殖民主义体系而斗争的人民，是自己的国际义务。苏联过去和现在都支持各国人民争取本身自由的神圣战争，对民族解放运动给以道义、经济、军事和政治上的大力支持。

当阿尔及利亚人民进行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斗争的时候，苏联人民向他们提供了巨大的支援。当也门人民起来反对本国的奴隶制度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向他们伸出了援助的手。在印度尼西亚人民为解放西伊里安、反对依靠美帝国主义者的荷兰帝国主义者而进行的斗争中，我们给予了全面的援助。我们欢迎印度尼西亚人民为解放北加里曼丹而进行的斗争。

新老殖民主义者对东南亚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密布阴谋诡计的网罗。我们的同情和支持始终是在争取自己民族自由和独立的人民的一边。我们深信，南越和南朝鲜人民，不管美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傀儡的一切挣扎，将一定得到胜利，恢复祖国土地的统一。

我们党在反对革命输出的同时，过去和现在都尽一切力量来阻挡反革命输出。我们坚信，当代三种伟大革命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各国人民，国际革命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相互联系和统一行动，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

争的基础，是他们取得胜利的保证。

最近几年世界发展的整个进程完全证明了共产主义运动路线的正确性，这条路线在实践中带来了显著成果。由于实现了这条路线，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而进行斗争的力量，取得了新的成就。苏共认为，彻底地和坚定地贯彻这条路线是自己的义务。

我们深信，没有任何理由来修改这条路线。

同时，苏共中央认为，在筹备和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时候，就最近几年宣言和声明中所规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的为实际生活所丰富的那些新的东西交换意见，是有益处的。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在自己的信中正确地指出，加强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一致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是我们一切成就的保证。最近时期，苏共在自己的各次代表大会上和共产党的国际会议上，不止一次地表示了它对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间相互关系原则的理解。我们在全世界面前强调指出过，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过去和现在都存在完全的平等。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上级党”和“下级党”。而且也只能是这样的。任何一个党的为首地位或者任何一种领导权的表现，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除了坏处以外，决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所有共产党都是独立的和平等的，它们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对它的胜利和挫折都负有责任，它们都应该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互相帮助的基础上建立它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还从这样一点出发：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一切党，不管大小，提出一样的要求，对谁都不例外。所有兄弟党都应该同样地关心使它们的活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使其符合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加强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团结的利益。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赋予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间的正确的相互关系问题以特别的意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是执政党。它们对国家的命运和本国人民的命运负责。在这种条件下，破坏党与党之间相互关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不仅会触及党的利益，而且会触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苏共遵循着我们事业的最高利益，消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后果，尽了一切努力来完全恢复兄弟党关系中的平等和尊重社会主义国家主权的列宁主义原则。这对加强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起了巨大的良好作用。现在已建立了有利的局面，使我们的友谊在平等、尊重各国主权、互助和同志般合作、每个国家自愿地完成其国际义务的基础上巩固起来。同时，我们愿意着重指出，社会主义平等不仅在于有参加集体制订共同路线的同等权利，而且也在于各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对整个大家庭的命运担负同等责任。

兄弟党莫斯科会议声明着重指出，脱离了资本主义的国家必须结成最密切的同盟，必须联合自己的努力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原理。整个社会主义体系

的利益和民族利益是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生活证明，每个国家只有在真正团结和互助的基础上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最密切地合作，才能够最好地解决自己的民族任务。

我们的团结、我们的一致行动不是自发产生的。它们是客观的必要性所促使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有意识的活动及其目的性明确的国际主义政策的结果，是它们对我们队伍的团结不倦关心的结果。

我们并不是闭眼不见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对国内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些或那些问题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对我们合作的形式和方法会产生不同的理解。这是可能的，因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处在建设新社会的不同阶段上，它们发展对外关系的经验也不完全一样。同时，不能排除：这些或那些兄弟党中对待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问题的不同态度也会是分歧的原因。夸大民族的独特的特点的作用，会导致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忽视民族特点，会导致脱离生活、脱离群众，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损失。

这一切都责成我们要经常关心制定这样一些手段和方法，它们使我们能够从原则性的立场出发，在使我们的共同事业付出最少的代价的条件下，解决已产生的分歧。

我们共产党人是可以彼此争论的。不过，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神圣义务，都是用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所有人民保持紧密团结的精神来教育本国人民。共产党人有责任培养人民不仅爱自己的国家，而且爱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爱一切人民，有责任教育生活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每一个人都了解自己对全世界劳动者所负的兄弟义务。不这样作，就是不履行共产党人的首要训条，这个训条要求团结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各国人民，要求像保护眼珠一样来保护我们的团结。

思想上和策略上的分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被利用来作为煽起民族主义情绪和偏见、煽起各社会主义人民之间的互不信任和纠纷的源泉。我们十分负责地声明：苏共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采取任何一个步骤，来在我国各族人民当中播下对兄弟的中国人民以及其他国家人民的恶感。相反，我们党在一切情况下都坚定不移地一贯宣传国际主义思想，宣传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同全世界各国人民热烈友好的思想。我们认为强调这一点是重要的，并且希望中共中央能赞同这种立场。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中，必须把共同的努力联合起来，动员各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战斗号召，意味着这种联合的基础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的团结，而不是民族的区分、肤色或地理原则。仅仅根据属于这个洲或那个洲——无论是非洲、亚洲、拉丁美洲或欧洲的原则，来团结群众反对帝国主义，这会给正在进行斗争的各国人民带来损害。这将不是联合，而事实上是拆散反帝统一战线力量的力量。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在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忠实。苏共过去进行了、今后仍将进行反对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任何机会主义的斗争。

我们坚定地遵循一九六〇年声明中的论点，这些论点指出，必须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声明正确地指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同时也指出必须进行反对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坚决斗争，如果不同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始终不渝的斗争，它们也可能成为某些党在这一或那一发展阶段上的主要危险。

我们党本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利益，今后仍将进行坚决的斗争，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也反对其危险目前并不小于修正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今后我们在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策略的原则性的根本问题上仍将不会调和，并将进行反对修正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与此同时，我们将不惜力量通过耐心的同志般的讨论，来弄清那些出现了不同理解的问题，以便从道路上清除妨碍我们团结的一切积垢。在这方面，我们的出发点是：各兄弟党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在批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性问题上的这些或那些错误时，它们的任务是指出这种错误的危险性，帮助纠正错误，而不是把这些错误永远地固定下来。我们力求尽一切力量促进团结，而不是拆散革命力量，不是割除我们运动的这一或另一队伍。当然，共产党人不能容许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原则性问题上让步。

作为国际主义政党的苏联共产党，仔细地研究世界所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斗争经验。我们高度评价工人阶级及其革命先锋队——法国、意大利、美国、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以及为反对帝国主义垄断组织的专横、反对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为争取民族自由和社会自由而英勇奋斗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共产党的斗争。

各共产党已经成长为各民族的有影响的力量，成长为争取本国人民幸福的战士的先进队伍。反对派接连不断地给共产党以打击，企图挫折他们的意志，这并不是偶然的。在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中，反动派利用着所谓“莫斯科之手”这种陈旧不堪的谎言，说什么共产党不是民族力量，它们是执行他国的政策，是他国的工具。帝国主义者这样作是怀着恶意的，其目的是反对共产党日益增长的影响，引起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不信任，并且为对共产党人进行的警察镇压寻求辩护。

但是，一切正直的人都知道，正是共产党是民族利益的真正表现者和保护者，是在争取人民幸福的斗争中把对祖国的热爱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忠实的爱国主义者。苏共认为它的职责是大力支持资本国家里的自己兄弟的英勇斗争，加强同他们的国际主义团结。

这就是我们认为有必要在这封信里提到的我们对当代的最重要的原则性问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战略和策略的最重要的原则性问题的一些概括性意见。

我们坚信体现在各兄弟党宣言和声明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目前方针是唯一正确的，同时我们认为在将要举行的苏中两党代表的会谈中讨论下列最迫切的问题是适宜的：

(一) 为进一步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威力和把它变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是我们时代的主要特征——而斗争的问题。我们可以共同讨论，如何更快地和更好地保证各社会主义国家在同资本主义的和平经济竞赛中赢得胜利；

(二) 为和平与和平共处而斗争的问题。把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努力联合起来争取防止新的世界热核战争的必要性。建立和巩固和平拥护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揭露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提高警惕性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对帝国主义者准备新的世界战争的斗争，粉碎帝国主义者侵略阴谋，孤立反动派和战争势力。在国际关系中确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为全面彻底裁军和消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迹而斗争；

(三) 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斗争问题。为了我们事业的利益利用资本主义阵地的削弱，利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日益增长的不稳定状态，利用资本主义的矛盾尖锐化，首先是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利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深刻危机。支持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为反对垄断组织、为争取自己的社会解放、为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以及为扩大各国人民的民主权利与自由而进行的阶级的和革命的斗争；

(四) 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支持与大力开展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为完全地彻底地消灭殖民主义和各种形式的新殖民主义而斗争。支持反对殖民主义的人民以及已经取得自己民族解放的国家。同这些国家发展经济和文化合作；

(五) 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一致和团结问题。必须尽全力团结我们时代最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在帝国主义反动派正在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的时候更应如此。不允许能够破坏这种团结的任何行动，每个兄弟党都应当本着团结精神遵守共同制定的评价和结论。继续反对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斗争，这是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创造性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共产主义运动进一步取得成就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互援助和支持的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各兄弟党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加强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动派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制定共同的措施。

在谈判时，可以讨论你们信中所提出的一切问题，讨论共同感到兴趣的、为实现莫斯科会议决议而斗争的任务所产生的问题。讨论有关加强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团结的问题，将会有巨大的意义。

你们在自己的信中涉及到阿尔巴尼亚问题和南斯拉夫问题。正如我们已经向你们写信谈过的，我们认为，这些问题虽然是原则性问题，但是，它们不能、也不应当遮住我们在会谈时需要讨论的当代主要问题。

我们党谴责了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分裂行动，同时不止一次地采取了必要的步骤，使阿劳动党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关系正常化。尽管阿劳动党的领导人最近不止一次地对我们党和苏联人民进行了并且继续进行诬蔑性的攻击，但是，我们还是遵循着最高的利益，不放弃关于苏共和阿劳动党之间关系能够得到改善的想法。今

年二月底，苏共中央又一次表现了主动，向阿劳动党中央提出了关于举行我们两党代表双边会谈的建议。但是，我们这个同志式的步骤，也没有得到阿尔巴尼亚领导方面的应有反应。阿劳动党领导人甚至认为没有必要接受苏共中央关于举行双边会谈的信。随后，看来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改变了主意，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们谈到这种会谈，然而提出了一系列保留和条件。如果将确实表示有愿望，我们愿意进行会谈。

至于南斯拉夫，我们根据对那里的客观的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的分析和估计，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同它的关系上，我们争取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同社会主义大家庭接近，这是符合各兄弟党的联合世界上一切反帝力量的路线的。我们还考虑到最近在南斯拉夫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的一定的良好趋向。与此同时，苏共中央也看到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一系列意识形态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并且认为必须把这一点直截了当地告诉南斯拉夫同志，批评他们的不正确的观点。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的信中表示同意我们所说的：现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已经出现了一个极其严重的时刻。今后我们是在同一行列中一起前进，还是让自己卷入对两国工人阶级和我们人民、对所有劳动者都有害的斗争——这种斗争只能导致彼此疏远，削弱社会主义力量，破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这取决于我们，取决于我们的党，取决于我们的政策是否正确。

当然，苏共和中共作为强大的党，在这种情况下受到的损失会少一些，但是对其他兄弟党，特别是对在复杂情况下工作的兄弟党来说，将会造成很大的、而且是不必要的困难。这自然不是我们的目的。

一切都取决于在这种严重而复杂的情况下如何行事。是走上进一步论战的道路，受激动情绪的摆布，把争论变为互骂和对兄弟党的无根据的指责和攻击，抑或是意识到自己对我们伟大事业的命运所负的崇高责任，把事态的发展引向另一个轨道，即有勇气超乎那些今天使我们分离的东西之上，停止非同志式的论战，并集中努力来寻求巩固苏中战斗合作、巩固所有兄弟党的友谊的途径。

我们了解，没有各种意见的斗争就不可能有任何运动，包括共产主义运动在内。但是，无论什么样的分歧，无论对这一个党或那一个党的行为怎样不满，都不能为采取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斗争手段作辩护。我们对国际工人阶级的目标和任务的理解越深越广，我们就越应该更加努力地争取使我们能够心平气和地从实质上讨论我们之间的分歧，不管它们今天看来有多么严重；使这些分歧不妨碍我们的积极工作，不给国际工人阶级的革命活动带来混乱。

让我们来共同斗争，争取彻底实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针，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团结，使集体制定的路线受到尊重，反对对这条路线的任何违犯和任意解释。

我们党不会陷于论战斗争的狂热境地，而是意识到我们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面前所负的共同责任，力求使陷于新一轮争论的危险过程停止下来。大家很清楚，

我们也可以讲出不少东西，来保卫苏共的列宁主义路线，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方针，答复中国报刊最近所发表的文章中的毫无根据的攻击。现在我们所以不这样做，那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叫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感到高兴。我们希望，日益尖锐化的论战的危害性将被理解，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利益将被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因此，我们向你们建议举行会谈，并不是为了使斗争尖锐化，而是为了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极重要问题达成相互谅解。

我们意识到，我们在世界各国的朋友们都期待着这次会谈，而且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这次会谈上。我们的会谈是否能获得使我们的朋友高兴、使共产主义的敌人痛心的结果，这取决于我们，取决于我们的意志和理智。这将是我们对争取解放一切被压迫人民的事业，对为和平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革命学说的胜利而斗争的事业的共同贡献。

此致共产主义敬礼！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

原载人民日报 1963-04-04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研究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的来信。

一切关心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人们，都对中苏两党会谈十分关切，希望我们的会谈有助于消除分歧、加强团结，为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创造有利的条件。

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的神圣责任。中苏两党，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负有更大的义务，理应作出更大的努力。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存在着一系列的重大原则性的分歧。但是，不管这种分歧多么严重，我们都应当有充分的耐心，寻求消除分歧的途径，以便把我们的力量联合起来，加强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斗争。

中共中央就是抱着这样的真诚愿望，对待即将到来的中苏两党会谈的。

苏共中央在三月三十日的来信中，就中苏两党会谈需要讨论的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特别是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我们也愿意在这封信里，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谈谈我们的观点，作为我们的建议。

我们希望，这样阐明自己的观点，会有助于我们两党的相互了解，会有助于在两党会谈中逐点的、详细的讨论。

我们还希望，我们这样做，会有助于各国兄弟党了解我们的观点，会有助于在兄弟党的国际会议中充分地交换意见。

(一)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只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革命理论为准则，而不能离开这个准则。

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两次莫斯科会议，经过充分地交换意见，根据协商一

致的原则，通过了宣言和声明。这两个文件，指出了我们时代的特点，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规定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共同路线。宣言和声明，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

几年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对于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确实有不同的认识和态度。这些不同的认识和态度，中心的问题是，承认不承认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的问题。归根到底，这也就是承认不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问题，承认不承认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的问题，承认不承认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还要进行革命的问题，承认不承认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还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

坚决捍卫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已经成为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要的迫切的任务。

只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只有坚持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才能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

(二)

什么是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呢？概括地说，就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在我们看来，这就是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三)

这条总路线，是从世界现实的全局出发的，是从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的阶级分析出发的，是针对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全球战略的。

这条总路线，是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无产阶级为核心，建立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反动力量的路线。

这条总路线，是各国人民坚决进行革命斗争，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行到底的路线；也是最有效地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路线。

如果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那就是违反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那就是抛弃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历史使命，那就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应当表达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规律。各国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都要经历不同的阶段，都会具有自己的特点，但是都不会超出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规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应当为各国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指出基本方向。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制定本国的具体路线和政策的时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十分重要的。

(四)

对于世界政治、经济的总和，世界的具体情况，即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这是规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出发点。

如果避开具体的阶级分析，或者随便找一些表面的现象，作出主观的臆断，就必然不可能得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正确结论，必然滑到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不同的另一条轨道上去。

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向来认为，这些基本矛盾是：

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

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

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

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根本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这种矛盾毫无疑问是很尖锐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把世界范围内的矛盾，简单地看成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

世界力量对比变化了，变得越来越有利于社会主义，越来越有利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而大大不利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尽管这样，以上的这些矛盾还是客观地存在着。

这些矛盾及其引起的斗争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人们既不能抹煞这些基本矛盾中的任何一个矛盾，也不能主观地用其中的一个矛盾代替其他的矛盾。

这些矛盾必然要引起各国人民的革命，也只有各国人民的革命才能解决这些矛盾。

(五)

在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问题上，以下的错误观点应当受到批判：

1，抹煞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的阶级内容，没有把这种矛盾看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同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矛盾。

2，只承认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而忽视或者低估在资本主义世

界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所引起的斗争。

3，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需要经过本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就可以解决；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不需要经过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就可以解决。

4，否认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矛盾的发展必然要引起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紧张斗争的新局面，认为经过“各大垄断资本之间达成国际协定”，就能够调和甚至消除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

5，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世界体系的矛盾会在“经济竞赛”中自然地消失，而世界的其他基本矛盾，都会随着两个体系矛盾的消失而自然地消失，出现什么“没有战争的世界”、“全面合作”的新世界。

显然，这些错误观点都必然会引出错误的、有害的政策，而使人民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遭到这样或那样的挫折和损失。

（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变化的主要标志是：世界上已经不是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已经不只是近两亿人口，而是十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社会主义阵营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斗争的产物。社会主义阵营不仅属于社会主义各国人民，而且属于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他们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共同要求，主要是：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对内对外政策；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国防；

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实行社会主义各国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相互支持；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反对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

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实现这些要求，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对本国人民应尽的义务，

也是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应尽的义务。

实现这些要求，社会主义阵营就会对人类历史进程发生决定性的影响。

正因为这样，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总是千方百计地力图影响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力图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力图分裂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特别是中苏的团结。他们总是力图渗透和颠覆社会主义各国，甚至妄想消灭社会主义阵营。

怎样正确对待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是摆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面前的一个十分重大的原则性问题。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目前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联合和斗争的。当世界上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当这个国家由于坚决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和政策，遭到所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敌视和危害的时候，是否坚决维护这个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每一个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金石。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这个阵营是由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这十三个国家组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坚决维护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是否维护组成这个阵营的所有国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是否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所必须实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政策，这就成为每一个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金石。

如果有人不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和政策，不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反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制造紧张局势，制造分裂，甚至追随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政策，力图取消社会主义阵营，或者援助资本主义国家来攻击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那就是背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如果有人跟在别人后面，不是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所必须实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和政策，而是维护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和政策；不是维护团结的政策，而是维护分裂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七)

美帝国主义者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条件，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企图在全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美帝国主义的战略目标一直是：侵略和控制处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扑灭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并且进而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把全世界所有的人民和国家，包括美国的同盟国在内，都置于美国垄断资本的奴役和控制之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者一直进行着反对苏联、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争宣传。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帝国主义确实在准备进行反苏的战争、反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争；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又利用这种宣传作为烟幕，来掩盖

它压迫本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

一九六〇年声明指出：

“美国帝国主义成了最大的国际剥削者”。

“美国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

“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美国帝国主义”。

“近年来国际事件的进程，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证明美国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国际宪兵，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

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其结果只能同它的愿望相反，只能促进各国人民的觉醒，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

这样，美帝国主义就把它自己置于同全世界人民相对立的地位，使自己陷于全世界人民的包围之中。国际无产阶级必须而且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把各国人民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寄托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和斗争上面，寄托在各国人民的联合和斗争上面，这是现实的、正确的道路。

相反的，不分敌我友，把各国人民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寄托在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上面，这是要把人们引入迷途。几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种幻想的破产。

(八)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

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

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严重地打击着和削弱着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基础，是当代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

因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绝不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的全局性的问题。

现在有人竟然否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伟大国际意义，而借口什么打破民族的、肤色的和地理的界限，力图抹煞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和压迫国家的界限，力图压制这些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实际上是要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为帝国主义在这些地区维持统治和推行新老殖民主义政策制造新“理论”。这种“理论”，并不是真正要打破民族的、肤色的和地理的界限，而是要维持所谓“优等民族”对被压迫民族的统治。这种骗人的“理论”，受

到这些地区人民的抵制，是理所当然的。

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必须真正实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研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地区的人民的革命经验，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把他们的解放事业，看做是对自己的一种最可靠的支援，看做是本国工人阶级的直接的利益。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地打破民族的、肤色的和地理的界限，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没有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没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不可能赢得自己的解放。列宁说得很对：“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资本压迫的千百万‘殖民地’奴隶充分地最紧密地联合起来，那末，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50]

现在，国际共产主义的队伍中，有人竟然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采取消极、鄙视和否定的态度，那在实际上就是保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背叛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使自己堕落成为社会民主党人。

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采取什么态度，是区别革命和不革命的重要标志，也是区别谁是真正保卫世界和平、谁是助长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的重要标志。

(九)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迫切任务。

历史赋予这些地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光荣使命是：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旗帜，站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最前列，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

这些地区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人们是极其广泛的，不仅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也包括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信任人民群众的力量，主要地是要联合农民，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在农村中进行工作，帮助农民组织起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具有头等重要意义。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阶层，组织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独立性，坚持革命的领导权。

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的人民需要学会各种斗争方式，包括武装斗争的方式在内。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实行武装镇压的情况下，就用革命的武装力量去打败反革命的

[50]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中文版，第二百三十八页。

武装力量。

一系列新获得政治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仍然面临着巩固政治独立、肃清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反动派、实行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的艰巨任务。对这些国家来说，警惕和反对老殖民主义者采用新殖民主义政策来保持它们的利益，特别是警惕和反对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些新独立国家的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并且采取一些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措施。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充分估计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作用，巩固同他们的团结。

有些新独立国家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随着国内社会矛盾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越来越投靠帝国主义，实行反人民、反共、反革命的政策。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坚决反对这种反动政策。

一般地说，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无产阶级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时候，应当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对于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进步倾向，实行联合的政策；对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妥协和勾结的反动倾向，实行斗争的政策。

在民族问题上，无产阶级政党的世界观是国际主义，不是民族主义。在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政党支持进步的民族主义，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任何时候，无产阶级政党都必须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划清界限，不能做它的俘虏。

一九六〇年声明说：“共产党人揭露资产阶级中的反动派把自私的、狭隘的阶级利益冒充全民族的利益的企图，揭露资产阶级政客为了同样目的利用社会主义口号招摇撞骗”。

如果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成为地主资产阶级的尾巴，那么，民族民主革命要取得真正的、彻底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即使取得某种胜利，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

在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只有独立地提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内反动派、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纲领，独立地进行群众工作，不断地扩大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反动力量，才能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且把革命引导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

(十)

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要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必须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争取实现这一任务的过程中，在目前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积极领导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保卫民主权利的斗争，反对法西斯危险的斗争，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在美帝国主义控制或者企图控制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主要打击是针对美帝国主义，也针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垄断资产阶级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

近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的各种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显示了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正处在新觉醒之中。他们的斗争，打击着垄断资本和反动势力，不仅为本国的革命事业展开了光明的前景，而且是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有力支持，也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有力支持。

在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革命斗争的时候，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同时，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反对垄断资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人在积极领导当前斗争的时候，应当把这些斗争同为长远的和全局的利益的斗争结合起来，应当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教育群众，不断地提高群众的觉悟，担当起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如果不是这样，把眼前的运动当作一切，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那就是十足的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列宁早就指出，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在任何时候，共产党人必须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问题上同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和各国工人群众中肃清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影响。毫无疑问，共产党人应当争取社会民主党影响下的群众，应当争取社会民主党内那些愿意反对本国垄断资本和外国帝国主义控制的左翼分子和中间分子，同他们在工人运动的日常斗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实现广泛的联合行动。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了领导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革命，必须善于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并且善于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迅速地用一种斗争形式去代替另一种斗争形式。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只有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和平的与武装的，公开的与秘密的，合法的与非合法的，议会的与群众的，等等，才能在任何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在应当利用和可能利用议会斗争和其他合法斗争形式的时候拒绝利用，这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变成为议会迷和合法主义者，把斗争限制在资产阶级所允许的范围内，这就必然导致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十一)

无产阶级政党对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必须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从革命的观点出发，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为依据。

共产党人从来愿意经过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是不是可以把和平过

渡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世界战略原则呢？绝对不能这样。

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向认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都明确地指出：“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任何旧政府，如果不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是不会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

马克思和列宁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曾经提出过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但是，正如列宁所说，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是“革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机会”。

事实上，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

有人说，马克思在预言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时候并没有先例，为什么不可以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预言资本主义将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呢？

这是一种荒唐的比拟。马克思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得出了科学的结论；而那些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和平过渡”的预言家，却是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抹煞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矛盾，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作出了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人，怎么能够从马克思那里找到帮助呢？

现在，大家都看到，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加强它们的国家机器，特别是军事机器，其目的首先是镇压本国人民。

无产阶级政党绝不能把自己的思想、革命方针和全部工作建筑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愿意接受和平变革的估计上面。

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准备两手，即在准备革命的和平发展的同时，必须对革命的非和平发展作充分的准备。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艰苦地积蓄革命力量方面，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夺取革命的胜利，或者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发动突然袭击和武力进攻的时候，给予有力的回击。

如果不作这样的准备，就会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装，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陷于完全无准备的被动局面，以致葬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十二）

人类历史上各种不同阶段的社会革命，都是历史的必然性，都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客观规律。历史证明，革命没有不通过一些曲折的道路，也没有不遭受某些牺牲而能够取得胜利的。

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分析具体的历史条件，提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领导人民群众绕过暗礁，避免某些不必要的牺牲，有步骤地去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不是可以完全避免牺牲呢？奴隶革命，农奴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民族革命，都不是这样，无产阶级革命，也不是这样。即使革命的指导路线是正确的，也不能完全保证革命不遭受某些挫折，也不能完全保证避免某些牺牲。

只要坚持正确路线，革命最终总是要胜利的。借口避免牺牲而取消革命，这实际上只能是要人民永远当奴隶，永远忍受无限制的痛苦和牺牲。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革命引起的分娩阵痛，总比旧社会的慢性痛苦少得多。列宁说得很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即使在最平静的日子里，也经常地而且不可避免地会使工人阶级遭到无数的牺牲”。^[51]

如果谁认为只有革命一帆风顺，事先得到不会遭受牺牲和失败的保票，才可以进行革命，那他就根本不是革命者。

不管在怎样的困难的情况下，不管革命遭受怎样的牺牲和失败，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应当用革命精神教育群众，都应当坚持而不应当抛弃革命的旗帜。

在客观条件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就轻率地发动革命，那就是“左”倾冒险主义。在客观条件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不敢领导革命，不敢夺取政权，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无产阶级政党即使在平常的日子里，在领导群众进行日常斗争的时候，也应当在自己的队伍和人民群众中进行革命的思想准备、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促进革命斗争的发展，以便在革命条件成熟的时候，不失时机地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新政权。否则，即使客观条件成熟，也会白白地丧失夺取革命胜利的时机。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高度的原则性，也要有灵活性，有时也要实行有利于革命的必要的妥协。但是，不能借口灵活性和必要的妥协，而根本放弃原则的政策和革命的目的。

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人民群众同敌人作斗争，也要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但是，利用敌人的矛盾，是为了便于达到人民革命斗争的目的，而不是要取消人民的革命斗争。

无数事实证明，那里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黑暗统治，那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总是要起来革命的。

如果共产党人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那么，他们就势必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被抛到革命潮流的后边去。

如果党的领导集团采取不革命的路线，使党变成改良主义的政党，那么，党内的和党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会代替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起来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就会起来领导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就会丧失革命的领导权。当反动的资产阶级叛变革命、镇压人民的时候，机会主义路线就会使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不应有的惨重牺牲。

如果共产党人沿着机会主义道路滑下去，那么，他们就会堕落成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成为帝国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的附庸。

现在自称为继列宁之后对革命理论作了最大创造性贡献的一些人，自称是唯一正确的一些人，他们真正考虑过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面经验没有，他们真正

[51] 《新的激战》。《列宁全集》第五卷，第十一页。

注意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整个运动的利益、目标和任务没有，他们有一个真正的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没有，这些都是很令人怀疑的。

近几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教训，是很多的。有应当受到人们歌颂的经验，也有使人痛心的经验。各国共产党人和各国革命人民需要认真地思考和研究这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以便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吸取有益的教训。

(十三)

社会主义国家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是相互支持、相互援助的。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力支援。否认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

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只能采取热烈同情、积极支持的态度，而绝对不能采取敷衍的态度、民族自私的态度、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

列宁说：“同先进国家的革命者和一切被压迫的人民结成联盟，反对所有帝国主义者，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对外政策。”^[52]谁不了解这一点，把社会主义国家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支援，看成是一种负担，或者看成是一种恩赐，都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道而驰的。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成就，对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说来，具有示范作用和鼓舞作用。

但是，这种示范作用和鼓舞作用，决不能代替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有依靠自己的坚决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解放。

有些人片面地夸大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竞赛的作用，企图用和平竞赛来代替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按照他们的说教，似乎帝国主义会在这种和平竞赛中自然而然地垮台，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要安安静静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就行了。这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又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有些人还制造一种奇谈，说什么中国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要“发动战争”，要通过“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推行社会主义。这种奇谈，正如一九六〇年声明所说，不过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制造的诽谤。这些人重复这种诽谤的目的，拆穿了说，那就是为了掩饰他们自己反对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也反对别人支持这种革命。

[52] 《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七十二页。

(十四)

几年以来，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已经说得不少了，说得够多了。我们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观点和政策，是全世界的人们都知道的，是任何人都歪曲不了的。

很可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些人尽管谈论自己怎样爱好和平，怎样憎恶战争，却不愿意稍微领会一下列宁关于战争问题所说的简单明白的真理。

列宁说：“我觉得，在战争问题上，人们常常忘记和注意不够的，以及引起很多可以说是空洞无谓的争论的，主要是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这个战争具有什么样的阶级性，它是由什么引起的，它是由那些阶级进行的，它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济条件造成的。”^[53]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任何战争都是同产生它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斗争分不开的。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为世界全部阶级斗争历史所证实的科学论点，就永远不可能理解战争的问题，也不可能理解和平的问题。

有各种各样的和平，有各种各样的战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和平，是什么样的战争。把正义战争同非正义战争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一律加以反对，这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观点，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有人说，没有战争，革命也是完全可能的。这究竟说的是什么战争呢？是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还是世界战争？

如果说的是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那么，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反对革命战争，也就是反对革命。

如果说的是世界战争，那么，这显然是无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虽然曾经根据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说明过世界战争不可避免地引起革命的这种事实，但是，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革命非经过世界战争不可，也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主张。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消灭战争当做自己的理想，相信战争是能够消灭的。

但是，怎样才能消灭战争呢？

列宁是这样看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人类划分为阶级的现象，消灭人剥削人和一个民族剥削另一个民族的现象，从而使战争根本不能发生。”^[54]

一九六〇年声明也说得很清楚：“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将最终消除产生任何战争的社会原因和民族原因。”

现在，有人竟然认为在帝国主义制度和人剥削人的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能够

[53] 《战争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百六十七页。

[54] 《战争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百六十七——三百六十八页。

通过“全面彻底裁军”，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所谓没有武器、没有军队的世界，只能是没有国家的世界。列宁说过：“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去销毁一切武器。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是这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55]

世界的现实又是怎样的呢？以美国为首的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究竟那里有一点准备实行全面彻底裁军的影子呢？他们不是毫无例外地都在进行全面彻底扩军吗？

为了揭露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我们一向认为，提出普遍裁军的主张，是必要的。经过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和全世界人民的联合斗争，迫使帝国主义接受某种裁军协议，是可能的。

如果把全面彻底裁军当做争取世界和平的最根本道路，散布帝国主义会自动放下武器的幻想，借口裁军来取消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那就是蓄意欺骗世界人民，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效劳。

为了克服现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思想混乱，我们认为很有必要恢复被现代修正主义者所抛弃的列宁的论点，以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以利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

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世界人民的普遍要求。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

现在的问题是，争取世界和平的道路究竟是什么？从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世界和平只能是世界各国人民争得来的，而不能是向帝国主义乞求得来的。只有依靠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发展，依靠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依靠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依靠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斗争，才能有力地保卫世界和平。

列宁主义的政策正是这样。与此相反的政策，绝不能引向世界和平，只是助长帝国主义者的野心，增加世界战争的危险性。

近年来有些人散布一种论调，说什么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的星星之火，会导致一场毁灭人类的世界大战。事实是怎样的呢？恰恰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的许多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并没有导致世界大战。这些革命战争的胜利，直接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大大增强了制止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难道事实不是证明这种论调是十分荒谬的吗？

（十五）

全面禁止核武器，完全销毁核武器，是保卫世界和平斗争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必须为此尽最大的努力。

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所以美帝国主义者十几年来采取了核讹诈的政策，

[55]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七十七页。

企图用以实现它的奴役全世界人民和称霸世界的野心。

但是，帝国主义者用核武器威胁其他国家，也使本国人民受到威胁，促使本国人民起来反对核武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时，帝国主义者妄图用核武器毁灭对方，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被毁灭的地位。

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帝国主义者如果被迫接受禁止核武器的协定，绝不是因为他们对人类的“博爱”，而只是由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压力和他们本身的利害关系。

同帝国主义者相反，社会主义国家依靠的，是人民的正义力量，是自己的正确的政策，它根本不需要在世界上玩弄核武器的赌博。社会主义国家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着防御的目的，为着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历史的发展上和现实的生活中，人是决定的因素。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重视技术变革的作用，但是，如果贬低人的因素的作用，夸大技术因素的作用，是错误的。

核武器的出现，不能阻止人类历史的前进，不能挽救帝国主义制度的灭亡，正如历史上一切新技术的出现，不能挽救各种旧制度的灭亡一样。

核武器的出现，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当代世界的各种基本矛盾，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阶级斗争的规律，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性。

因此不能说，由于核武器的出现，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已经消失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原理，已经过时和已经变成陈腐的“教条”了。

（十六）

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是列宁提出的。众所周知，在伟大的苏联人民打退外国武装干涉之后，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在列宁领导下，随后又在斯大林领导下，一直实行这种和平共处的政策，而只是在德帝国主义者举行进攻的时候，才被迫进行自卫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也一直坚持实行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并且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者。

可是，几年以来，有些人忽然把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政策算成是自己的“伟大发现”，自认为对这一政策的解释有垄断权。他们把“和平共处”当做是包罗万象的、不可思议的天书，把世界各国人民的一切斗争成就，一切功劳，都记载在这本天书上面。他们还把一切不同意他们这样歪曲列宁意见的人，都说成是和平共处的反对者，说成是对于列宁和列宁主义都毫无所知，说成是大逆不道的异教徒。

中国共产党人怎么能同意这样的观点和做法呢？不，这是不可能的。

列宁关于和平共处的原则是很清楚的，是普通人很容易理解的。和平共处是指

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能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和压迫国家、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的关系方面，不应当把和平共处说成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内容，更不应当说什么和平共处是全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这是一回事。和平共处根本不容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各国的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另一回事。这些斗争，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和平共处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任何一个国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只能经过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地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着斗争，而绝不可能是什么“全面合作”。

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这样的和那样的谈判，是必要的。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政策和各国人民群众的压力，通过谈判达成某些协议是可能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某些必要的妥协，并不要求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随之也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实行妥协。在任何时候，谁都不能拿和平共处的名义，来要求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放弃自己的革命斗争。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政策，有利于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有利于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有利于孤立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势力。但是，如果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局限于和平共处，那就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关系。因此，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错误的。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在我们看来，应当包括下列内容，即：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三项内容，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缺一不可的。

（十七）

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不同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

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多次指出：

- 1，被推翻的剥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
- 2，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分子。
- 3，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职员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

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4，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

实际生活证实了列宁以上的论断。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的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不能说，那里已经完全没有像列宁所反复痛斥过的资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这类分子；也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需要或者可以放弃列宁所提出的“清除这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的任务。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这种斗争时起时伏，是波浪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一九五七年宣言说得好：“对于工人阶级说来，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

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中的阶级斗争，否认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是错误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十八)

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国家，在这个过渡时期中，要经历由建立、巩固、加强到逐渐消亡的辩证过程。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横着一个从前者进到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合的也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则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56]

列宁经常强调地重申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伟大学说，特别是在他的《国家与革命》这本伟大的著作中，分析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发展过程，同时自己又写道：“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57]

列宁又说：“一个阶级专政，不仅一般阶级社会需要，不仅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而且，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

[56]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三十一页。

[57] 《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百四十六页。

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58]

如上所述，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思想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即在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进到无阶级社会以前的时期，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存在。

如果在半路上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是不必要的，那会怎么样呢？

那岂不是在根本上同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相抵触？

那岂不是要放纵那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的发展？

就是说，那就会引出极严重的后果，更谈不上什么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

会不会有什么“全民国家”呢？可以不可以用什么“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呢？

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而是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一个根本问题。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只要是国家，总是具有阶级性的；只要还有国家存在，就不可能是“全民”的。一旦社会没有阶级了，也就没有什么国家了。

那么，所谓“全民国家”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

任何一个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全民国家”，并不是一件什么新鲜的东西。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向来都把资产阶级国家叫做“全民国家”，或者叫做“全民政权的国家”。

有人会说，他们那里已经是没有阶级的社会了。我们回答说，不，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

既然那里还存在着企图复辟的旧的剥削阶级残余分子，既然那里还经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既然那里还有寄生虫、投机倒把分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等等，那怎么能说，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呢？那怎么能说，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没有必要了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除了镇压敌对阶级以外，还必须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巩固工人阶级同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联盟，并且为逐步消灭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创造条件。

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来看，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别，也还存在着个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种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种生产关系。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劳动的工人和在集体所有制农庄中劳动的农民，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类劳动者。因此，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这种差别，只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才能消失。现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

[58] 《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百页。

经济发展的水平,都还离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很远很远。因此,要消灭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还需要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而只要这些阶级差别还没有消失,那么,就不能说是没有阶级的社会,就不能说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必要了。

把社会主义国家叫做“全民国家”,这是不是要用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呢?是不是要用具有另一种性质的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呢?

如果是这样,只能是历史的大倒退。南斯拉夫社会制度的变质,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十九)

列宁主义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不能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反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敌人,要改造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要经常整顿无产阶级的队伍,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过渡到共产主义,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不行的。

会不会有什么“全民的党”呢?可不可以用什么“全民的党”来代替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呢?

这个问题,也不是那一个国家的党的内部问题,也是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一个根本问题。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政党。一切政党,都是具有阶级性的。党性,就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

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唯一能够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它之所以能够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恰恰因为它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思想和意志的集中者。它之所以能够领导全体人民,就是因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它自己,就是因为它能够根据无产阶级的本性,根据无产阶级的现在和将来的利益来考虑问题,对人民有无限忠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因而形成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铁的纪律。没有这样的政党,就不可能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

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的时期,如果半路上宣布无产阶级的政党已经成为什么“全民的党”,否认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那会怎么样呢?

那岂不是在根本上同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相抵触?

那岂不是在组织上、精神上解除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武装,等于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效劳?

在这种情况下,谈论什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那岂不是南其辕而北其辙吗?

(二十)

几年以来,有些人违反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错误的,有害的。

列宁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学说是这样的:

- 1, 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
- 2, 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
- 3, 政党通常是由比较稳固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

列宁说,以上这些“都是起码的常识”。

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和战斗的指挥部。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实行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必须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强有力的领导,才能成为有组织的和有战斗力的先锋队。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

列宁批判了那种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他说:这“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

中国共产党历来不赞成夸大个人的作用,而主张和坚持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主张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认为凡属正确的领导,都必须善于集中群众的意见。

有些人大肆进行所谓“反对个人迷信”,而在实际上竭力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却大肆渲染某些个人的作用,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绩归于自己。

更严重的是,有些人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粗暴地干涉其他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政,强行改变别的兄弟党的领导,以便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别的兄弟党。这种做法,不是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不是颠复活动,又是什么呢?

现在应该是到了认真地、全面地宣传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的时候了。

(二十一)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论大国或小国,经济发达或不发达,必须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的基础上。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主要地应当依靠自力更生。

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必须按照本国的具体情况,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劳

动和智慧，充分地有计划地利用本国一切可能利用的资源，发挥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潜力，才能够卓有成效地建设社会主义，才能够迅速地发展本国的经济。

也只有这样，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增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才能增加援助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力量。因此，实行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具体表现。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只从本国的局部的利益出发，片面地要求别的兄弟国家服从自己的需要，并且借口反对所谓“单干”、所谓“民族主义”，来反对别的兄弟国家执行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反对别的兄弟国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经济，甚至对别的兄弟国家施加经济压力，那就是真正的民族利己主义的表现。

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实行互助合作、互通有无是完全必要的。这种经济合作，必须建立在完全平等、互利和同志式的相互援助的原则基础上。

如果否认这些基本原则，假借“国际分工”、“专业化”的名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损害别的兄弟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损害别的兄弟国家人民的利益，那就是大国沙文主义。

如果把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的损人利己的做法搬到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来，甚至认为垄断资本集团为了争夺市场、瓜分利润而建立的所谓“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市场”，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各国经济互助合作的榜样，那更是极其荒谬的。

(二十二)

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规定了兄弟党关系的准则。这些准则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实行联合的原则，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则，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

我们注意到，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的来信中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上级党”和“下级党”，所有共产党都是独立的和平等的，它们都应当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互相帮助的基础上建立它们之间的关系。

共产党人可贵的品质是言行一致。只有不仅在言论上，而且更重要的在行动上，真正坚持而不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真正遵循而不是破坏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才是维护和加强兄弟党团结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的独立和平等的原则，那就不能允许把自己置于其他兄弟党之上，不能允许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不能允许在兄弟党关系中实行家长制。

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没有“上级”和“下级”之分，那就不能允许把自己一党的纲领、决议、路线当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强加给别的兄弟党。

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的协商一致的原则，那就不应当强调什么“谁是多数，谁是少数”，依恃所谓多数来强制推行自己的错误路线，实行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政策。

如果同意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应当通过内部协商的途径来解决，那就不应当利用自己的和别人的党代表大会、领导人的讲话、通过决议和声明等方式，公开指名攻击别的兄弟党，更不应当把兄弟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我们认为，在目前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存在着分歧的情况下，强调严格遵循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关系准则，是特别重要的。

目前，在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中，苏联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苏阿两党、两国关系问题，是如何正确地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问题，是要不要遵守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对于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具有原则性的意义。

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这是一回事。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这是另一回事。绝不能把这两个根本不同性质的问题相提并论。

你们在来信中，一方面表示“不放弃关于苏共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关系能够得到改善的想法”，一方面又继续攻击阿尔巴尼亚同志采取“分裂行动”。这显然是自相矛盾，无助于苏阿关系问题的解决的。

究竟是谁在苏阿关系方面采取了分裂的行动？

究竟是谁把苏阿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究竟是谁把苏阿两党、两国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

究竟是谁公开号召改变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领导？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明明白白地摆在全世界面前的。

苏阿关系恶化到现在这样严重的地步，苏共领导同志难道真的不感到自己的责任吗？

我们再一次真诚地希望，苏共领导同志能够遵循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主动寻求改善苏阿关系的有效途径。

无论如何，怎样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是一个必须郑重对待的问题。只有严格遵守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才是对帝国主义反动派所谈论的“莫斯科之手”之类的诽谤的最有力的回击。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要求，对于大党和小党，对于执政的党和没有执政的党，都是没有例外的。但是，大党和执政的党，在这方面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过去一个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令人痛心的事件，不仅损害有关兄弟党的利益，而且损害有关兄弟国家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个事实有力地证明，大国大党必须谨记列宁的遗训，千万不能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

苏共同志在来信中声明，“苏共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采取任何一个步骤，来在我国各族人民当中播下对兄弟的中国人民以及其他国家人民的恶感”。我们不愿意在这里追述过去许多不愉快的事实，但愿苏共同志能够在今后的行动中恪守这个声明。

几年来，虽然我们面临一系列违反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严重事件，遭

到许多强加给我们的困难和损失，我们的党员，我们的人民，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和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二十三)

为了实现各国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必须同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种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宣言和声明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

声明特别指出：

“各国共产党一致谴责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现。”

声明接着指出：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使自己的国家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使它依赖美国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所谓‘援助’”。

声明继续指出：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他们以非集团政策为借口，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

因此，声明就得出这样的结论：

“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积极斗争，仍然是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项必要任务。”

这里提出的问题，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直到最近，铁托集团还公开声明坚持他们的修正主义纲领，坚持他们同宣言和声明相对立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

长时期以来，美帝国主义及其北大西洋集团的同伙，用了几十亿美元豢养铁托集团。铁托集团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打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旗号，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人民革命事业，充当美帝国主义的别动队。

说南斯拉夫发生“一定的良好趋向”，说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说铁托

集团是“反帝力量”，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完全没有根据的。

现在，有人企图把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引进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来，公然撕毁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议的一致协议，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几年来，修正主义思潮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泛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充分证明了宣言和声明所作的关于修正主义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可是，有些人公然说什么主要危险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或者说什么教条主义的危险不小于修正主义，等等。这究竟有什么原则性呢？

一个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必须把原则放在第一位。不能拿原则去做交易，忽而赞成这个，忽而赞成那个，忽而主张这样，忽而主张那样。

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为了维护宣言和声明的原则立场，中国共产党人将继续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一起，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危险修正主义的同时，共产党人也必须反对教条主义。

一九五七年宣言说，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这就是说：

一方面，必须时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修正主义的错误。

另一方面，必须经常从实际生活出发，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独立地制定和实行符合本国情况的政策和策略。如果不这样做，机械地抄袭别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盲目地接受别人强加的意志，不加分析地把别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当作自己的路线，那就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现在，有些人正是违背了宣言早已肯定的这个基本原则。他们借口什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他们又把主观臆造出来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药方，说成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而强迫别人无条件地加以接受。

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严重现象，正是这样发生的。

（二十四）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经验是：革命能不能得到发展和胜利，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善于把领导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善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革命党。

只有这样的革命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才能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如果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而是资产阶级的改良党，

如果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而是修正主义的党，

如果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而是资产阶级尾巴的党，

如果不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党而是代表工人贵族利益的党，

如果不是国际主义的党而是民族主义的党，

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又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性的党，

这样的党，就绝不可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绝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绝不可能完成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

这是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觉的工人，一切先进分子，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

(二十五)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分歧，有责任分清是非。为了团结对敌的共同利益，我们历来主张经过内部协商来解决问题，反对把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

苏共同志知道，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是某些兄弟党的领导人挑起来的，是强加在我们身上的。

公开争论既然被挑动起来，那么，这种争论，就只能在各兄弟党的平等基础上进行，只能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只能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

我们认为，某些党的领导人，既然公开攻击了其他兄弟党，挑起了公开的争论，就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禁止被攻击的兄弟党公开回答他们。

某些党的领导人既然自己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攻击其他兄弟党，那么，为什么不把其他兄弟党答辩的文章在自己报刊上公开发表出来呢？

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遭到了最荒唐的攻击。那些攻击者大喊大叫，不顾事实，捏造了许多罪名，硬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把这些攻击我们的文章和言论，

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了。

苏联领导人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苏联真理报一九六三年一月七日的编辑部文章，苏共代表团团长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苏联真理报一九六三年二月十日的编辑部文章，这些也在我们的报纸上全文发表了。

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和三月三十日的两次来信，我们也全文发表了。

我们对于若干兄弟党攻击我们的文章和言论，有些已经作了回答，有些还没有回答。例如，对苏共同志的许多文章和言论，我们都还没有直接回答。

我们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一共写了七篇文章回答攻击者。这些文章的题目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
《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
《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你们在三月三十日的来信的末尾，指责中国报刊对苏共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攻击”，大概指的就是这些文章。把我们回答攻击者的文章叫做“攻击”，这完全颠倒是非。

既然你们把我们文章说得是“毫无根据”，是那么坏，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像我们发表你们的文章那样，也把我们的这七篇所谓“毫无根据的攻击”的文章，统统公开发表出来，让全体苏联同志、全体苏联人民去思考，去判断谁是谁非呢？当然，你们也尽可以逐条驳斥这些你们认为是“毫无根据的攻击”的文章。

你们说我们的文章“毫无根据”，说我们的论点是错误的，可是，又不如实地把我们的真正论点告诉苏联人民。这种做法，总不能说是对待兄弟党之间讨论问题，对待真理，对待群众的严肃态度吧。

我们希望，兄弟党的公开争论能够停止下来。这个问题，必须根据兄弟党的独立、平等、协商一致的原则来处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谁都没有权利单凭自己的意图，想发动攻击就发动攻击，想禁止对方答辩就下令“停止公开争论”。

苏共同志知道，为了给召开兄弟党会议创造良好的气氛，我们已经决定，从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起，对于兄弟党同志对我们的公开指名攻击，暂时停止作公开的答辩。我们保留公开答辩的权利。

我们在三月九日给你们信中说，关于停止公开争论问题，“需要我们两党和各有关兄弟党讨论一下，达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公平的协议”。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的意见。我们这样坦率地提出这些意见，正像我们在这封信开头的时候所希望的，会有助于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当然，对于这些意见，同志们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但是，在我们看来，我们在这里所谈的问题，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需要注意和解决的中心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以及你们在来信中所提出的问题，我们都希望在两党会谈中和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中进行充分的讨论。

此外，还有一些共同有关的问题，例如，批判斯大林问题，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重大原则性问题，等等，我们也希望在会谈时坦率地交换意见。

关于举行两党会谈，我们在三月九日给你们信中，曾经建议赫鲁晓夫同志到北京来，如果不方便，请苏共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率领代表团到北京来，或者由我们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

你们在三月三十日的来信中表示赫鲁晓夫同志不能到中国来，也没有表示愿意派代表团到中国来，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

你们在三月三十日的来信中，邀请毛泽东同志访问苏联。毛泽东同志早在二月二十三日同苏联驻中国大使的谈话中，就已经明确地谈过他现在不准备访问苏联的原因。关于这一点，你们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在五月九日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已经通知你们，中共中央将派出代表团，在六月中旬前往莫斯科。后来，根据苏共中央的要求，我们又同意把两党会谈推迟到七月五日举行。

我们真诚地希望，中苏两党会谈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能够为准备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作出贡献。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各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中国共产党愿意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起，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起，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为了维护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的利益，为了维护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世界和平事业的利益，继续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们希望，国际共产主义队伍里今后不再重复出现那种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的现象。

中国共产党人坚决相信，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在促进世界人民革命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斗争中，必将进一步团结起来，克服种种困难和障碍，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此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

原载人民日报 1963-06-17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 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编者按：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是对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的评价。中共中央发言人已经指出，这封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这封信采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对不能允许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

例如，关于核战争问题，苏共中央公开信中说，中共领导人不惜通过世界核战争，牺牲亿万人，来取得社会主义。苏共领导人企图用这样蛊惑人心的说法，恶意地指责所谓“中国的好战态度”，特别是攻击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观点，是光明磊落的，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那些诽谤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的人，是心劳日拙的，除了使他们的肮脏目的暴露无遗以外，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中国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通过世界人民的联合斗争，世界战争是可以防止的，核战争是可以防止的。

早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就指出：“我们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够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之不能发生”。

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在十一月十八日的讲话中，曾经详细地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关系的变化。他列举战后世界十大事件，论证国际形势的发展在当时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已经超过战争和帝国主义的力量，愈来愈有可能防止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就是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同志一再地说，我们不要打仗，我们希望和平，我们努力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毛泽东同志一直坚持不懈地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揭露他们散布核恐怖的罪恶目的，是要吓唬各国人民，企图奴役全世界。

毛泽东同志说，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如果帝国主义竟然发动核战争，强使人类遭受一次空前的灾难，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应该怎么办？十分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选择：要么坚决抵抗，埋葬帝国主义；要么害怕牺牲，宣布投降。但是，有人认为，如果发生核战争，人类就要全部死绝。实际上，这种论调就是说，在帝

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只能屈服。针对着这种投降主义的悲观论调，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打核战争，一定要把核战争强加给人类，以致可能使亿万人遭到牺牲，但是人类也绝不会毁灭。人类的前途还是光明的。帝国主义企图毁灭人类和人类文明的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毛泽东同志说：“如果帝国主义好汉们决心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们除了促使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灭亡以外，不会得到什么别的结果。”问题就是这样。

又例如，关于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问题，苏共公开信中说，中国领导人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苏共领导人清楚，中共中央从来没有全盘肯定苏共二十大。对苏共二十大借口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片面强调和平过渡，我们从来没有同意过。

苏共二十大以后，关于苏共领导人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三十年间所起的领导作用，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曾经多次向苏共同志提出过批评。从一九五六年四月到十一月，毛泽东同志就亲自同苏共同志谈过四次。当时，我们就一再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要全面估价。我们认为，苏共领导人的错误是：缺乏全面分析，缺乏自我批评，没有同兄弟党商量。

在那个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用正面讲道理的方式，对斯大林作了全面的估价，婉转地批评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

同样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中共中央也多次向苏共提出了我们不同的意见。我们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而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

但是，当时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了照顾苏共和苏联的威信，我们在斯大林问题与和平过渡问题上没有公开批评过苏共领导人。

怎么能够说，中国共产党对于苏共二十大这种一贯的立场，是什么“摇摆不定”和“虚伪”的呢？

又例如，关于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问题，事实是，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六日，苏联方面突然通知中国，决定在一个月內，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一千三百多名，撕毁了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许多重要设备和物资。这就给中国的经济、国防和科学研究工作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困难和损失，成为中苏经济贸易联系减缩的主要原因。中国是受害者。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反而责怪中国缩减了中苏经济贸易联系，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颠倒是非竟然到了这种程度，实在令人吃惊！

类似这样的情况，通篇皆是，总共有七八十处的样子，举不胜举，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材料，加以澄清。

本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十四日讯：苏联《真理报》七月十四日发表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同时，这家报纸还登

载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今年六月十四日的信件。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同志们！

苏共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向你们写这封公开信，以便就中国共产党中央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的来信阐述自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问题的立场。

苏联人很了解，我们党和政府表达全体苏联人民的意志，不遗余力地加强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共同斗争把我们联合在一起，我们有同一的目标、同一的愿望和希望。

许多年来，我们的党之间的关系是良好的。但是，若干时候以前，在以中共为一方、以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为另一方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方面的破坏我们的党之间的团结和我们的人民的友谊的言论和行动，引起苏共中央委员会日益加深的焦虑。

苏共中央方面尽了一切可能来克服已经出现的分歧，并在今年一月份提出了关于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停止公开论战、以便平心静气地和实事求是地讨论争执问题、在原则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苏共的这个建议得到了所有兄弟党的热烈支持。随后达成了关于苏共代表和中共代表举行会谈的协议，现在会谈正在莫斯科进行。

苏共中央曾经希望，中国同志也像我们一样，表现出诚意并促进会谈成功，以利于我们的人民，以利于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我们遗憾的是，正当对苏共和中共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谈一事已经达成协议，当代表团已经委派，会谈日期已经商定的时候，中国同志不是把现有的分歧拿到这次会谈期间去讨论，而是突然认为可以公开在全世界面前不仅陈述旧的分歧，而且对苏共和其他共产党提出新的指责。这一点表现在发表中共中央今年六月十四日的信件这件事上，这封信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歪曲了这两个历史性文件的最重要的论点。在中共中央的信中包含有对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对第二十次、第二十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苏共纲领的没有根据的、诽谤性的攻击。

苏共中央主席团看了这封信后得出结论，正如你们从今年六月十九日刊登在《真理报》上的苏共中央声明中所得悉的，认为那时候在苏联报刊上发表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是不适宜的。发表信件，自然就要求我们方面作出公开的答复，这会使论战进一步加剧，煽起激动情绪，从而恶化我们的党之间的关系。由于苏共代表和中共代表的会谈即将举行，当时发表中共中央的信件尤其是不适时的，因为我们认为，会谈的目的是，通过在同志式的气氛中研究现存的分歧来帮助我们两党在现代世界发展的最重要问题上更好的相互了解，为准备和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创造有利气氛。

同时，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使苏共中央委员和全会全体参加者了解中共

中央的信件是必要的，并且把中共领导同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分歧的实质告诉了大家。

中央委员会全会在自己一致通过的决议中完全赞同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进一步团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力量方面的政治活动，以及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相互关系中所采取的一切具体行动和措施。

苏共中央全会责成中央主席团在同中共代表的会谈中坚定地执行我们党第二十次、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在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得到赞同的、并在宣言和声明中得到反映的、被实际生活、被国际事件的进程完全证实的路线。中央全会断然拒绝中共中央对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对第二十次、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苏共纲领的攻击，认为这种攻击是没有根据的和诽谤性的。全会表达了我们全党的意志，声明自己准备和决心始终一贯地执行团结兄弟党和克服现有分歧的方针。全会声明，我们党今后仍将致力于加强苏共和中共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和兄弟友谊，以利于为我们共同事业的斗争。

遗憾的是，最近的事件表明，中国同志按自己的意思来解释我们所表现的克制。他们把我们避免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加剧论战的真诚愿望竟然说成是要向共产党员，向苏联人民隐瞒中国领导人的观点。中国同志把我们的忍耐当作软弱，不顾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准则，越来越纠缠不休地和顽固地开始在莫斯科和苏联其他城市违法散发用俄文大量刊印的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国同志不以此为满足，开始在全世界加紧宣传和散发旨在反对我们党的这一信件和其他文件，不惜利用帝国主义的出版社和通讯社来达到散布这些文件的目的。

事情由于下述情况而更加严重：当苏联外交部提醒中国驻苏联大使注意这种粗暴践踏我国主权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时候，中国人员不仅没有停止这种行为，而且还以示威的方式说，他们认为在苏联继续散发信件是自己的权利。

七月七日，在莫斯科会谈已经开始以后，北京举行了人数众多的集会，官方人士在会上把由于违法散发攻击我们党和苏联政府的材料而被从苏联撵走的中国工作人员当作英雄予以欢迎。在会上，中国官方人士在兄弟的中国人民中煽动对苏联的不友好的感情和情绪，同时一再企图证明自己有权破坏我们国家的主权和国际关系的准则。七月十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一项新的声明，为这种行为辩解，并且实质上想赋予自己干涉苏联内部事务的权利，当然，这是苏联政府任何时候也不会允许的。这样的行动不可避免地只是导致关系的加剧，并且只会带来害处。

《人民日报》七月十三日社论又一再攻击我们党，歪曲地解释在苏联报刊上未发表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这件事。

中共领导人的公然的不友好行动，他们要加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论战的顽固企图，对我们党的立场的明显歪曲，对我们暂时不发表的动机的不正确的解释，

促使我们发表中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的信件，并对这一文件作出评价。

读过中共中央信件的每个人，都会在关于一致和团结的响亮词句后面看到对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不友好的和诽谤性的攻击，看到想贬低我国人民争取共产主义在苏联的胜利、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的斗争的历史意义的企图。还有什么对苏共和苏联的直接的和隐蔽的指责没有包含在这个文件中呢。信件的作者竟然说出了“背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全世界人民”、“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些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不体面的和侮辱性的谰言，暗示“在帝国主义者面前胆怯”、“历史的倒退”，甚至说，“在组织上、精神上解除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武装”等于在我国“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效劳”。对伟大列宁的党，对社会主义的祖国，对在上世界上首先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同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的极残酷搏斗中捍卫了它的伟大成果、在建设共产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出英雄气魄和忘我精神的奇迹、对全世界劳动人民诚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国际义务的人民，怎么能说得得出这种话。

几乎半个世纪以来，苏维埃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胜利，为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进行着斗争。从苏维埃国家存在的最初日子起，当伟大的列宁还领导着我们国家时起直到今天，我国人民始终给予所有为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枷锁下获得解放、为建设新生活而斗争的人民以巨大的无私的援助。

一个国家以这样的规模援助其他国家发展经济、科学和技术，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中国的劳动人民和中国的共产党员无论是在为解放自己祖国而进行革命斗争的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都充分地感到了苏联人民和我们党的兄弟支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苏联政府就同人民中国的政府缔结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条约是抵御帝国主义侵犯的强大手段，是加强远东和全世界和平的因素。

苏联人民把自己多年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全部经验和科学技术成就慷慨地介绍给了自己的中国兄弟。我国过去和现在对发展人民中国的经济给予了相当大的援助。在苏联的积极援助下，人民中国建成了用最新设备装备起来的一百九十八项工业企业、车间和项目。在我国的协助下，中国建立了汽车、拖拉机、飞机等等新的工业部门。苏联给了中国两万一千套以上的科学技术资料，其中包括一千四百多份大型企业的设计资料。我们一直帮助中国巩固国防和建立现代化的国防工业。在苏联的高等学校里，在我国的企业里，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中国专家和工人。而且现在苏联还继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八十八个工业企业和项目的建设给予技术协助。我们讲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自夸，而仅仅是因为中共领导人最近企图贬低苏联援助的意义，并且我们

也没有忘记，苏联也从中国获得了需要的货物。

还在不久前，中国领导人曾经就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就苏共和中共的团结说过很多公道话，曾经高度评价苏联的援助，并号召学习苏联经验。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说过：“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获得了苏联人民兄弟般的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胜利之后，苏联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给予全面的、巨大的援助。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

中国领导人开始忘记了这一点，对此只能表示遗憾。

我们党、全体苏联人为伟大的中国人民在新生活建设中取得的成就而高兴和骄傲。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盛大招待会上说过：“在自己的光荣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显示，人民一旦掌握了政权，能做出什么样的事业来……现在，大家都公认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成就。亚非各国人民看到，应当走什么道路和采取什么制度才能真正地发挥出人民的才能和创造力，才能让人民全面地和充分地显示他们强大的创造力量。”

这就是中国领导人没有开始脱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共同方针以前的情况。

一九六〇年四月中国同志公开地暴露了他们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发表了名为《列宁主义万岁！》的文集。在这本以篡改列宁的著名著作和断章取义地、不正确地解释其论点为基础的文集中包含的论点，实质上旨在反对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宣言（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共在这项宣言上签了字）的基础，反对列宁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反对在现时代有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反对既利用和平的，也利用非和平的途径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中共领导人开始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所有兄弟党。一九六〇年六月，当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不经兄弟党领导的同意便召集了当时在北京的某些党的代表的会议，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立场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通过的宣言展开了公开的批评。不仅如此，中国同志还把他們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带到了非党组织的公开讲坛上。

中共领导的这些步骤引起了兄弟党的严重不安。考虑到这一点，在一九六〇年共产党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曾尝试同中共领导人讨论已产生的分歧。五十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对中国领导人的观点和行动进行了同志式的批评，呼吁他们根据莫斯科宣言的原则回到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和合作的道路上来。遗憾的是，中共领导藐视同志式的帮助，继续执行自己的错误方针，加深自己同兄弟党的分歧。

为了防止事态的这种发展，苏共中央提出了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谈的建议。会谈于一九六〇年九月在莫斯科举行了。但是，那时也由于中共代表团顽固地不愿倾听兄弟党的意见而未能克服已产生的分歧。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举行的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绝大多数的兄弟党拒绝了中共领导的错误观点和主张。中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特殊观点，只是在出现了它会完全孤立的威胁的时候，它才签署了声明。

现在十分明显，中共领导人在一九六〇年的声明上签字，不过是玩花招而已。在会议结束后不久，他们利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作为传声筒，以便重新开始宣传自己的方针。他们背着我们党展开了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运动。

一九六一年十月，苏共中央作了新的努力谋求同中共的关系正常化。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弗·罗·科兹洛夫同志、阿·伊·米高扬同志同周恩来同志和彭真同志以及参加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其他领导工作者举行了会谈。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向中国代表团详细叙述了苏共中央对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讨论的原则性问题的立场，强调指出我们始终不变地致力于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友谊和合作。

苏共中央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和五月三十一日的信件中提请中共中央注意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削弱可能给我们共同事业造成的危险后果。当时我们建议中国同志采取措施，不让帝国主义者有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苏中关系中发生的困难。苏共中央还建议在交换内部政治情报、在各兄弟党在国际民主组织和其他方面协调立场等问题上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但是，这些信件和目的在于在一切方面改善同中共和中国关系的其他实际步骤，没有得到北京的反应。

去年秋天，在前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同志离开莫斯科之前，苏共中央主席团曾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在这次谈话过程中，中央主席团的委员们再一次表现出在加强中苏友谊方面的主动精神。赫鲁晓夫同志请刘晓同志向毛泽东同志转达我们的建议：“抛开一切争论和分歧，不去分辨谁对谁错，不要翻过去的东西，而是从新的一页开始我们的关系。”我们这种真挚的呼吁甚至没有得到任何回答。

中共领导人加深自己同各兄弟党的意识形态分歧，开始把这种分歧扩大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中国机构开始缩减中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贸易联系。由于中国政府的主动，中国同苏联的贸易额在最近三年里减少了几乎三分之二；成套设备的提供减少到原来的四十分之一。这种减少是由于中国领导人的主动而产生的。我们对中国领导走上了这样的道路，感到遗憾。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应该继续发展苏中联系，发展合作。这对我们双方会是互利的，而首先有利于人民中国，它曾经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得到过大量援助。以前，苏联曾同中国发展广泛的联系，今天，苏联仍主张扩大、而不是缩减这种联系。本来，中共领导应该首先对发展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表现关怀。但是，中共领导却朝着相反的方向行动，不考虑这种行动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损失。

中国领导人没有把由于谁的过错而使这些联系减少了的真相告诉本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党员当中，甚至在居民当中，展开了旨在诋毁苏共内外政策、煽起反苏情绪的广泛宣传。

苏共中央曾提醒中国同志注意这些不正确的行动。我们对中国同志说过，不要以所产生的争论和分歧为转移而促使人民时而赞扬、时而咒骂这个或那个党。每个共产党员都明白，兄弟党之间的分歧，不过是暂时性的事件，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

之间的关系现在是永久确立了。

但是，中国领导人对苏共提出的同志式的警告每次都置之不理，而继续加剧中苏关系。

从一九六一年年底起，中国在国际民主组织中的代表开始公开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强加于人。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在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反对召开争取和平与裁军世界大会。在一九六二年，由于中国代表的分裂行动，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和平运动、亚非团结运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和其他许多组织的活动都受到了威胁。中国代表反对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亚非团结委员会的代表参加在莫希举行的第三次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中国代表团领导人对苏联代表说，“白人在这没有什么事可做”。在雅加达举行的新闻工作者会议上，中国代表实行的方针是以苏联……不属于亚洲国家为理由不让苏联的新闻工作者成为有充分权利的参加者。

令人感到奇怪和惊异的是，中国同志指责不久之前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的绝大多数人进行分裂活动和执行错误的政治路线，而在通过告各大洲妇女书时，参加大会的一百一十个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妇女代表投票反对。这倒真是：爱好自由的妇女的整个亿万大军步调都不一致，而只有两个走得正确，遵守队形！

中国领导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的简单经过就是这样。它表明，中共领导人把自己的特殊路线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方针对立起来，力图把自己的号令、自己对当代根本问题的极其错误的观点强加给共产主义运动。

二

以中共为一方，同以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另一方之间的分歧的实质何在呢？无疑，每一个看了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的人都会产生这个问题。

这封信的许多论点乍一看来可能令人不解：中国同志究竟在同谁争论？例如，难道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或者不认为进行反帝斗争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是自己职责的共产党人吗？为什么中共领导如此纠缠不休地提出这种论点呢？

也可能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同意中国同志在他们的信件中所叙述的对许多重要问题的立场呢？就拿战争与和平这样一个根本问题来说吧。中共中央在自己的信件中说到和平与和平共处。

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同志在向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当代根本问题的方针开始发动进攻后，第一，把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从未表达过的以及同它们格格不入的观点硬加在它们身上；第二，他们竭力用口头承认从共产主义运动文件中拿出来的公式和方针的办法来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和不正确立场伪装起来。如果公开反对各国人民争取和平、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反对裁军等等，

那就意味着在全世界共产党人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眼前暴露自己的立场，并把他们从自己身边推开。因此，论战越是进行下去，中共领导立场的弱点越暴露，它就越要竭力采用这种伪装。如果不考虑到中国同志这种手法，那么从旁看来甚至会认为，似乎争论的性质是烦琐的，似乎谈的只是远离迫切问题的个别提法。

而事实上，争论的中心是涉及到各国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

这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和发展的作用，这就是反对“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的问题，这就是世界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

这些问题是由生活本身、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动、近几年来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在我们的运动面前出现的新的可能性提出来的。共产主义运动应当回答这些问题，并且已经回答了这些问题，结合世界发展现阶段的条件和要求制定了总路线。

各共产党一致认为，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开辟了新阶段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这方面起了巨大作用。这一评价记载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各共产党集体制定的、规定了现代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方针的文件中。

但是，中共领导人现在提出了同它相对立的另一种方针，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他们的立场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日益分歧。

这首先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在评价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对待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方面，不能有任何含糊不清和吞吞吐吐，要知道，问题关系到各国人民的命运和全人类的未来。

苏共中央认为自己有责任十分坦率地告诉党和人民，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中共领导同我们、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原则性的分歧。这些分歧的实质是，对防止世界热核战争的可能性、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以及争取和平的斗争同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最重要的问题上，各持相反的态度。

我们党在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宣言和声明中，都把争取和平与防止世界热核灾难的斗争作为头等任务向共产党人提了出来。我们现实地估计世界力量的对比，并由此作出结论：虽然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变，发生战争的危险性没有消除，但是在当前条件下，以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为主要支柱的和平力量，可以通过联合努力来防止新的世界战争。

我们还冷静地估计到进行战争的手段有了根本的、质的改变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在本世纪中叶所制成的火箭—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这种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只说一点就够了，即一个强大的热核炸弹的爆炸力就超过包括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内的以前所有战争中使用的全部战斗武器的爆炸力。而这样的炸弹已经积贮了成千上万个！

共产党人有权无视这种危险吗？我们应不应该把关于热核战争后果的全部真实情况告诉人民呢？我们认为，毫无疑问，这是应该的。这不可能像中国同志所断言的那样对群众起“麻痹”作用。相反地，关于现代战争的真实情况正在把群众的意志和精力动员起来为争取和平、反对战争危险的根源——帝国主义而斗争。

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是组织和领导各国人民为防止世界热核战争而斗争。

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一项完全现实的和可以完成的任务。我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在我们时代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的注定不可避免性是不存在的这样一个有最伟大的意义的结论。这一结论不是善良动机的结果，而是现实地和严格科学地分析世界舞台上阶级力量对比的结果；它是以世界社会主义的巨大威力为基础的。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得到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赞同。声明中强调指出：“能够防止世界战争”；“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之前，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将会出现把世界战争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

在这个声明上也有中国同志的签字。

中共领导采取的立场是怎样的呢？它宣传这样一些论点：只要存在着帝国主义，就消灭不了战争；和平共处是幻想，它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原则；争取和平的斗争妨碍革命斗争，这些论点能够表明什么呢？

这些论点表明，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中国同志违背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方针。他们不相信有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对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估计不足，对帝国主义力量估计过高，实际上是忽视动员人民群众同战争危险进行斗争。

可见，中国同志不相信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国际工人阶级、一切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力量能够粉碎战争罪魁的计划，能够为我们这一代和后代谋得和平。在中国同志响亮的革命词句的后面是什么呢？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它的革命能力，既不相信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也不相信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胜利。在争取防止战争的斗争中，所有爱好和平的力量正在联合起来。这些和平力量按其阶级成份和阶级利益来说是不同的。但是，争取和平、争取防止战争的斗争能够把他们联合起来，因为原子弹不遵循阶级原则，它会消灭所有落进其破坏作用范围内的人。

走上中国同志所建议的道路，就意味着把人民群众推离曾经以自己坚持不懈的和英勇的争取和平的斗争赢得各国人民同情的各国共产党。

现在，在广大群众意识中，社会主义与和平是分不开的！

中国同志显然对热核战争的全部危险性估计不足。他们断言，“原子弹是纸老虎”，它“并不可怕”。他们说，主要的是尽快消灭帝国主义，至于通过什么途径，以怎样的损失来达到这一点，似乎是次要的问题。试问，对谁来说是次要的呢？是对一旦爆发热核战争时便注定要遭到死亡的亿万人呢？还是对在这种战争的最初几小时就会从地球上消灭的国家？

任何人，包括大国在内，都没有权利玩弄千千万万人的命运。那些不愿作出努力把世界战争从各国人民生活中排除出去并防止人们遭到大规模消灭和人类文明的

珍品受到毁坏的人，是该受谴责的。

中共中央在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说了许多关于似乎为了革命会有“不可避免的牺牲”之类的话。某些负责的中国领导人也说过在战争中牺牲数以亿计的人的可能性。在中共中央赞同的《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中断言，“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

试问中国同志：他们是否明白，世界火箭—核战争会留下什么样的“废墟”？

苏共中央（而且我们相信，我们全党、全体苏联人民在这方面一致支持我们）不能同意中国领导关于在数以亿计的人的尸体堆上创造出“高千百倍的文明”的观点。这种观点根本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试问中国同志：为了消灭帝国主义，他们建议采取何种手段？

我们完全赞成消灭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我们不仅相信资本主义必然死亡，而且正在尽一切努力，使这点能通过阶级斗争实现，而且能尽速实现。这一历史问题应当由谁来解决？首先是每个国家中以自己的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首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

中国同志提出另一种东西。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换言之，由于发动战争的结果，“将创造起美好的将来”。如果同意这样做，那么，和平共处原则、争取巩固和平的斗争，的确用不着了。我们不能走这种冒险主义的道路；它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

大家都知道，在现代条件下，世界战争将是一场热核战争，帝国主义者决不想自动退出舞台，自动躺入棺材，而不使用他们所拥有的最极端的手段。

显然，那些把热核武器称为“纸老虎”的人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武器的破坏力。

我们清醒地估计到这点。我们自己在制造热核武器，并生产了足够数量的热核武器。我们对它的破坏力十分清楚。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那么我们就毫不踌躇地对侵略者使用这种可怕的武器。但是，如果别人不进攻我们，我们不会首先使用这种武器。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是通过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而是通过团结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团结各国工人阶级，团结为自己的自由和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各国人民，依靠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 and 国防威力，来力求保障巩固的和平。

请问建议把美好的将来建筑在毁灭于热核战争中的旧世界的废墟上的中国同志：他们有没有就这个问题同帝国主义统治着的那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商量过？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阶级一定会这样回答他们：难道我们请求你们，要你们发动战争，在消灭帝国主义者的同时毁灭我们的国家吗？要知道，垄断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是比较少的一撮人，而资本主义各国居民的基本组成却是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原子弹是不会辨别帝国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而劳动人民又在什么地方，它轰击成片的地方，所以消灭一个垄断资本家，就会消灭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工人阶级、

劳动人民要问这样的“革命者”：你们有什么权利为我们决定我们的生存和我们的阶级斗争的问题，我们也赞成社会主义，但是我们愿意在阶级斗争中，而不是通过发动世界热核战争来取得社会主义。

中国同志对问题的这种提法会使人产生理所当然的怀疑：这里已经不是用阶级的态度来看待消灭资本主义的斗争，而是怀有某种完全另外的目的。如果在旧世界的废墟下，既埋葬剥削者，又埋葬被剥削者，那么将由谁来建设“美好的未来”呢？

在这方面不能不注意到，中国同志不是采取表现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中的阶级的、国际主义的态度，而是顽固地宣传没有阶级内容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口号。

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坚定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立场上，认为每个国家的革命都由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来实现，无需外来的军事干涉。

不言而喻，如果帝国主义狂人竟然发动战争，各国人民一定把资本主义消灭和埋葬，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代表人民的共产党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真正捍卫者应当尽一切努力，不让可能造成数以亿计的人死亡的新的世界战争爆发。

任何一个真正珍视人民利益的党，都不能不意识到自己在争取防止新的世界战争、争取保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中的责任。

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表达我们党的路线时曾经说：“只要存在着帝国主义，只要存在着殖民主义，就会有解放战争。这是革命的战争。这种战争不仅是允许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殖民主义者不会自愿地给各国人民以独立。因此，各国人民只有用斗争，其中包括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苏联给予民族解放运动以最广泛的支持。我国曾经向越南、埃及、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和也门的人民、向古巴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提供的实际援助是众所周知的。

苏联共产党宣布了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并坚定地遵循这一原则。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特别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爱好和平的政策的活动程度大大加强了，它对国际关系的整个进程发生的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影响提高了。

中国同志把这样一种说法硬加于我们：似乎我们的出发点是，我们不仅同帝国主义国家，而且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不久前摆脱了殖民主义压迫的国家的关系的原则仅限于“和平共处”的概念。他们清楚地知道，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们首先宣布友好和同志互助的原则是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相互关系中最重要原则，并坚定地始终不渝地遵守这一原则；我们正在给获得了解放的人民以大力的和各方面的援助。可是，他们仍然出于某种考虑，认为把所有这一切加以完全歪曲对自己是有利的。

苏联为争取和平和国际安全、争取全面彻底裁军、争取消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残迹、争取通过谈判解决一切有争执的国际问题而进行的顽强斗争获得了成果。我国在全世界的威信比任何时候都高，我们的国际地位比任何时候都巩固。这应当归功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威力以及它们的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

苏共中央声明，我们过去奉行，现在奉行，将来仍要奉行列宁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政策。我们党认为这是自己对苏联人民和对所有其他国家人民的职责。保证和平，就是要最有效地加强社会主义体系，从而加强它对解放斗争的整个进程以及对世界革命进程的影响。

苏共、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一方和中共领导人为另一方，在战争、和平与和平共处问题上的观点的深刻差异，在一九六二年加勒比海危机期间特别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是一次尖锐的国际危机：人类从来没有像去年十月那样接近过热核战争边缘。

中国同志断言，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我们把火箭运到古巴是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而后来我们从古巴运走火箭则是向美帝国主义“投降”。

（原注：这种断言见《人民日报》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这种断言是根本违背事实的。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拥有确凿的材料说明，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武装侵略眼看就要开始。我们当时十分清楚地了解，为了反击侵略，为了有效地保卫古巴革命，需要最坚决的措施。诅咒和警告——即使把它们叫做“严重警告”并重复它二百五十次——对帝国主义者都是不起作用的。

从保卫古巴革命的必要性出发，苏联政府和古巴政府商定在古巴设置火箭，因为这是警告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唯一现实的办法。在古巴设置火箭曾经意味着，进犯古巴，就将使侵略的组织者遭到使用火箭武器的坚决回击。苏联和古巴方面的这种坚决措施引起了美帝国主义者的震动，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感觉到：一旦他们对古巴进行军事入侵，他们本国的领土就会受到毁灭性的回击。

由于问题不简单地是美国和古巴之间的冲突，而是两个最大的核国家的冲突，加勒比海地区的危机会由局部性的变为世界性的。产生了世界热核战争的实际威胁。

在当时的局势中有两条出路：受“狂人”（人们这样称呼美帝国主义的最富于侵略性和最反动的代表人物）的支配而走上发动世界热核战争的道路，或者，利用运进火箭所造成的可能性，采取一切措施，以便就和平解决所产生的危机达成协议，不许对古巴共和国进行侵略。

大家知道，我们选择了第二条道路，而且相信我们做得对。我们相信，我国全体人民也都抱同样的看法。苏联人不止一次用事实证明，他们善于捍卫自己，保卫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谁也没有他们更清楚地知道，战争会带来多少痛苦和灾难，战争会使各国人民受到什么样的苦难和牺牲。

为交换美国政府作出不入侵古巴并约束其盟国也不这样做的保证而达成的撤出火箭武器的协议、古巴人民的英勇斗争、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对古巴人民的支持，使得有可能粉碎准备蛮干的美帝国主义极端冒险分子的阴谋。结果保卫住了革命的古巴，拯救了和平。

中国同志认为我们关于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危机过程中也表现了一定的明智和现

实态度的说法是“为帝国主义涂脂抹粉”。难道他们真的认为，一切资产阶级政府在所有事情上都丧失了任何明智吗？

由于苏联的勇敢而有远见的立场，由于英勇的古巴人民和他们政府的坚定和刚毅，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力量证明，它们能够约束帝国主义侵略力量，强迫战争拥护者同意和平。这是明智政策、和平与社会主义力量的巨大胜利；这是帝国主义力量、战争冒险政策的失败。

结果，革命的古巴过着和平的生活，并且在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和古巴人民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的领导下建设着社会主义。

当同美国总统达成协议，从而为消除加勒比海地区危机打下基础时，中国同志力图证明帝国主义者的话是绝对信不得的，特别对苏联竭尽侮辱和谩骂之能事。

我们生活在存在两个世界、两种体系：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时代。如果认为这两种体系各国之间的关系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一切问题都应当只用武力解决，排除任何谈判和协议，那是荒谬的。那样的话，战争就会无休止了。我们反对这种态度。

中国同志力图证明，帝国主义者是绝对信不得的——他们一定要欺骗人的。但这里的问题完全不是信不信，而是清醒的估计。加勒比海地区危机消除至今已有八个月，美国政府仍在履行自己的诺言——没有对古巴国境进行任何入侵。我们也作出了从古巴运走火箭的保证，并履行了保证。

但是也不能忘记，我们也对古巴人民作了保证：如果美帝国主义者食言而入侵古巴领土，我们就要援助古巴人民。每个思想健全的人都清楚地了解，一旦美帝国主义者入侵，我们像在古巴领土上援助古巴人民一样，在苏联领土上援助他们。诚然，在这种情况下火箭飞的时间稍微长些，但是它们的命中率并不因此而稍差。

古巴革命领导人自己把苏联政府的政策看作是兄弟声援和真正的国际主义的政策，为什么中国同志顽固地无视古巴革命领导人的这一评价呢？中国领导人究竟为什么不满意呢？也许是防止了对古巴的入侵和制止了世界战争的爆发这点使他们不满吧？

中共领导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的行径是怎样的呢？中国同志在这危急的关头提出自己的独特立场，同苏联政府的现实而坚定的方针相对抗。他们遵循某种自己的特殊概念，把批评的火力与其说是集中在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身上，不如说是集中在苏共和苏联身上。

在这之前曾经论证帝国主义随时都可能发动世界战争的中共领导在最紧要的关头采取了批评家的立场，而不是战斗的同盟者和同志的立场。在那些日子里，谁也没有听到中国领导人发表过关于他们采取实际行动来保卫古巴革命的声明。中国领导人不是这样做，而是显然企图使加勒比海地区本来就已经尖锐的局势更加尖锐化，往阴燃的冲突之火里添干柴。

中共领导的真正立场，非常明显地表现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表现在它极其低估，甚至故意无视争取裁军的斗争。中国同志甚至反对共产党人提出这个问题，竟

敢援引马克思列宁主义，千方百计地证明，裁军一方面是“不可实现的”，另一方面是不必要的。他们引经据典来证明，似乎只有社会主义在地球上彻底胜利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全面裁军。

当世界被军备竞赛压得透不过气来，当帝国主义者们在积储核武器，威胁要把人类推入世界战争的深渊时，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应当袖手等待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呢？

不，在时代的威严命令面前，这将是犯罪性的无所作为。

一切真正的、意识到自己对各国人民的责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早已懂得这一真理。他们若干年来一直进行、今后也将进行争取全面彻底裁军、争取停止核武器试验和禁止这种武器的顽强和坚持不懈的斗争。

在为和平而斗争，提出全面裁军的口号时，我们从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考虑到实际情况，没有闭目无视困难。当然，帝国主义者尽力拖延和破坏关于裁军的协议，这对他们是有利的。他们利用军备竞赛来发财致富，并使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处于恐怖之中。但是，我们是否应当随波逐流，听任帝国主义摆布而不动员一切力量来为保障和平、为裁军而斗争呢？

不，这样做，将意味着向侵略势力、向军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投降。而我们认为，各国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能够迫使帝国主义政府进行裁军，能够防止战争。为此，他们必须首先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

对抗帝国主义势力和战争势力的应当是世界工人阶级的组织起来的力量。世界工人阶级现在拥有这样的优越性，即可以依靠同帝国主义相对抗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物质实力和防御威力。帝国主义独霸的时代已经过去。比起十月革命后的头几十年来，形势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当时我国是单独一个国家，并且比现在弱得多。现在，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完全不同了。因此，现在坚持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就意味着不相信社会主义的力量，受绝望和失败主义情绪的支配。

可以无休止地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把这种观点冒充为自己“革命性”的表现，但是，实际上，这种态度只反映出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害怕帝国主义。

在帝国主义阵营中，还存在着反对裁军的强大势力。但是，正是为了强迫这种势力退却，必须激发各国人民的愤怒来反对它们，迫使它们执行各国人民的意志。

各国人民希望裁军，并且相信，共产党人才是各国人民为达到这个目标而斗争的先锋队和组织者。

我们争取裁军的斗争，不是一个策略手法。我们真诚地希望裁军。在这方面，我们完全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弗·恩格斯在上一世纪末就曾指出，裁军是可能的，并称裁军是“和平的保证”。在我们时代，裁军的口号是弗·伊·列宁作为一个实际任务而首先提出来的，苏联关于全面的或局部的裁军的第一个建议，在一九二二年的热那亚会议上就提出来了。这是列宁在世时的事情，而且关于裁军的建议也是由他拟定的。

争取裁军的斗争，是防止战争的最重要因素，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有效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人类的绝大多数是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

中国同志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的口号，用这一口号来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行的旨在缓和国际局势和停止“冷战”的政策对立。这种口号实质上是往帝国主义的“战争边缘”政策的磨盘中注水，给主张军备竞赛的人帮忙。给人的印象是，中共领导人认为，保持和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特别是苏联同美国关系中的紧张局势，是有利的。显然，他们认为苏联应该以挑衅来回答挑衅，走进帝国主义阵营的“狂人”所设的陷阱中去，应该接受帝国主义者的这样的挑战：在冒险主义和侵略性方面进行竞赛，也就是说，不是进行保障和平的竞赛，而是进行发动战争的竞赛。

走这条路，意味着使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受到威胁。珍视各国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永远不会走这样的道路。

争取和平和争取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原则的斗争，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他们正在准备的新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国家的侵略活动，反对帝国主义者在他们领土上设置的军事基地，反对军备竞赛等等的最重要斗争形式之一。这个斗争符合工人阶级、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阶级斗争。

我们党、所有兄弟党都记得，并在自己的活动中遵循声明的下列结论：不要等到落原子弹和氢弹的时候，才展开反对新的世界战争危险的斗争。现在就应当进行这一斗争，并且要一天比一天更加努力。主要的是及时约束侵略者，防止战争，不使它爆发。今天，为和平而斗争，就是保持最大的警惕性，不倦地揭露帝国主义的政策，警觉地注视战争挑拨者的阴谋诡计，唤起世界人民对那些奉行战争方针的人的神圣愤怒，提高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组织性，不断加强群众保卫和平的积极行动，同一切对新战争不感兴趣的国家加强合作。

争取和平和和平共处的斗争削弱着帝国主义阵线，使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集团在人民群众中陷于孤立，帮助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和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争取和平、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有机地联系着。八十一个共产党在自己的声明中写道：“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出现着有助于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开展阶级斗争、有助于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可能性。同时，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就又促进和平共处的巩固。”

在和平共处的情况下，最近几年，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都取得了新的重大胜利，世界革命进程顺利地发展着。

因此，把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独立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割裂开来，把它们互相对立起来，像中国同志所做的那样，就意味着把和平共处原则归结为一句空话，阉割它的现实的内容，实际上无视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而进行坚决斗争的必要性，这只会有利于帝国主义者。

中共中央在六月十四日的信中指责各共产党，说它们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引伸到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劳动人民群众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关系方面。这是对领导无产阶级同资本进行阶级搏斗、一向支持革命斗争和正义的反帝解放战争的兄弟党进行的真正骇人听闻的臆造和诽谤。

中共领导人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进行斗争的论据是如此软弱无力，以致他们不得不采取种种诡计。他们先是把他们自己臆造出来的毫无根据的论点强加在我们头上，然后揭露这些论点，开始指责我们，同我们斗争。他们硬说苏共和其他兄弟党放弃革命，用和平共处来代替阶级斗争的荒唐说法，其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任何一个政治学习小组都清楚知道，当我们谈和平共处时，我们是指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关系而言。和平共处的原则当然绝对不能引伸到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敌对阶级之间的关系中，也不允许把它引伸到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争取本阶级的利益的斗争中，以及被压迫人民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中。苏共坚决反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和平共处。这是一切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现在都应当掌握的起码的常识。

三

中共同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同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后果作斗争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中共领导人扮演了个人迷信维护者和斯大林错误思想的传播者的角色。他们企图把个人迷信时期盛行的那些制度、意识形态和道德以及领导的方式方法强加给其他党。我们直率地说，这种角色是不令人羡慕的，它既不会带来荣誉，也不会带来光荣。谁也无法让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进步的人们走维护个人迷信的道路！

苏联人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正确地评价了我们党及其以尼·谢·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在反对个人迷信后果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刚毅和真正的列宁主义原则性。

大家知道，我们党这样做是为了解除束缚劳动人民强大力量的沉重压迫，从而加速苏联社会的发展。我们党这样做是为了纯洁伟大的列宁遗留给我们的社会主义理想，清除玷污了这种理想的滥用个人权力和专横的行为。我们党这样做是为了永不重演那些伴随个人迷信而产生的悲剧性事件，是为了使所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们从我们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正确地理解和支持了反对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迷信及其有害后果的斗争。当时中国领导人也赞同这样做，他们谈过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巨大国际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主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时说：

“苏联的同志们，苏联的人民，按照列宁的指示做了。他们在不长的时间

内，取得了极其灿烂的成就。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

在刘少奇同志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共中央政治报告中，这一评价得到了更加全面的表达：

“今年二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仅制定了规模宏伟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决定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许多重大的政策方针，批判了在党内曾经造成严重后果的个人迷信现象，而且提出了进一步促进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主张，对于世界紧张局势的缓和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邓小平同志也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说过：

“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迷信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同志在《人民日报》众所周知的编辑部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中写道：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破除关于斯大林的迷信、揭露斯大林的严重错误、消除斯大林错误的后果方面，表现了巨大的决心和勇气。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同情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们，都支持苏联共产党纠正错误的努力，希望苏联同志的努力得到完满的成功。”

情况正是这样。

任何一个客观的人，如果把中国领导人的这些讲话同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中所说的话对照一下，就会看到，他们在对我们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评价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但是在这种原则性的问题上难道可以摇摆不定吗？当然不可以。二者必居其一：要末是中国领导人以前在这些原则问题上同苏共中央没有分歧，要末是所有这些话都是虚伪的。

大家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好标准。

正是实践令人信服地证明，实现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在我国生活中产生了多么出色的结果。自从我们党向恢复党内生活中的列宁主义原则和准则作了急剧的转变以来，已经过了十年，在这段时期中，苏联社会在发展经济方面，在提高文化、科学方面，在提高人民福利方面，在加强国防力量方面，在外交政策成就方面，都取得了真正伟大的结果。

在个人迷信时期毒化人民生活的恐惧、怀疑和徬徨的气氛已经永远消逝了。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苏联人的生活更好了，享受着社会主义的福利。请问一问获

得了新住宅的工人（这样的人数以百万计！），问一问晚年得到了保障的领养老金者，问一问富足的集体农民，问一问成千上万在个人迷信时期受到不应有的迫害而已经恢复自由和名誉的人，你们就会知道，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列宁主义方针的胜利对苏联人来说，实际上意味着什么。

请问一问那些父母在个人迷信时期成了镇压的受害者的人，承认他们的父母兄弟是正直的人，他们自己并不是我们社会的变节者，而是苏维埃祖国值得尊敬的享有充分权利的儿女，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工业、农业、文化、科学和艺术，不管我们把目光转向哪里，处处都在迅速前进。我们的宇宙飞船现在正在辽阔的太空遨游，在这方面也光辉地证明我们党用以领导苏联人民的方针的正确性。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在我国已经为苏联人和为改善他们的生活做了一切。苏联人明白，这一原则的实现不只取决于我们的愿望。必须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和创造丰裕的物质财富。因此我国人民在顽强地劳动，以便更迅速地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使共产主义的胜利早日来到。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正在按照正确的方针前进，清楚地看到我们发展的前景。

在苏共纲领里规定了共产主义建设的具体计划。这一计划的实现将保证苏联人民有最高的生活水平，给逐步过渡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个梦寐以求的共产主义原则奠定基础。

苏联人听到中国同志企图辱骂苏共纲领——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宏伟计划，感到奇怪和荒诞。

中共领导人针对我们党宣布为人民争取美好生活是自己的任务，暗示苏联社会的某种“资产阶级化”和“蜕化”。按照他们的逻辑，如果人民穿草鞋和喝大锅清水汤，这就是共产主义，而如果劳动者生活得好和希望明天生活得更好，这仿佛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还想把这种哲学当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新发现赠送给我们！这暴露了这种“理论”的作者是些不相信已掌握了政权和已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和能力的人。

如果看一下我国历史，看一下苏共纲领，就会很容易看出，当我们在列宁领导下取得了政权的时候，我们是从什么起点开始的，而苏联人民现在达到了什么样的顶峰。我们国家变成了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产值上，苏联占欧洲第一位，占世界第二位，很快就要赶上美国而跃居第一位。苏联工人阶级、苏联集体农民、苏联知识分子是我们一切胜利的缔造者。

我们确信，不仅苏联人民能，而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能树立伟大的劳动功勋，只是必须要保证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正确领导，必须要实行这种领导的人现实地思考，作出可以把劳动人民的力量和精力引上正确道路的决定。

中国领导人企图为个人迷信辩护，在自己的信中充满着关于在苏联的阶级斗争、

关于苏共纲领中似乎是错误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论点的远离马克思主义的论断。

我们打算在这封信中详细地分析他们的一切论据。任何一个读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的人，无疑都会注意到，中共中央的信件中所包含的论断是完全无力的和脱离苏联人民的生活的。他们教导我们说，在苏联的社会中还存在着敌对的阶级，因此也还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这是一些什么阶级呢？从中共中央的信件中可以了解，这是“资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

不用说，中国同志对阶级和阶级斗争有着奇特概念。从什么时候起这些寄生分子被认为是阶级呢？是什么阶级呢？是懒汉阶级还是流氓阶级，是盗窃国库者阶级还是寄生虫阶级呢？罪犯在任何社会中也不构成一定的阶级。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当然，这些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构成阶级。这是资本主义残余的表现。

同这样一些人作斗争并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全民国家完全能够完成并且正在完成这一任务。我们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知道，党、工会和其他社会团体的教育工作做得越好，舆论的作用越大，苏联民警的工作做得越好，同犯罪现象的斗争就越有成效。

现在苏联的社会是由工人和农民两个基本阶级，以及知识分子组成的，同时苏联社会没有一个阶级占有可以剥削其他阶级的地位。这一事实是不能否认的。专政是一个阶级概念；中国同志建议在苏联对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呢？对集体农民还是对人民知识分子？不能不考虑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已起了本质上的变化，它们之间的差别、界限日益消失。

在社会主义取得完全的、最终的胜利以后，工人阶级已不再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在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条件下，工人阶级仍然是社会上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先进作用，是由它的经济地位，由它同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最高形式具有直接联系，以及由它在数十年的阶级斗争中受到最大的锻炼和拥有革命的经验所决定的。

中国同志引用卡·马克思的话说：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内容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马克思在谈到这一点时是指共产主义这个完整的、统一的社会经济形态（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而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过渡到这一形态的。弗·伊·列宁也发表过一系列的意见，其中十分清楚地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需要，恰恰是为了用来战胜剥削阶级的反抗，组织社会主义建设、保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胜利的。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胜利以后，当社会上只剩下劳动者、友好的和本性已经完全改变的阶级，而再也没有人要受镇压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就会消失。

如果从中共中央关于这些问题的信件中所包含的一整套虚假的理论论断中提取真正的内容，那么这个内容就是：中国同志反对在我党第二十次、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中以及在苏共纲领中那样有力地宣布的苏共发扬社会主义民

主的路线。在他们全篇冗长的信中甚至找不到一处提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以及共产主义建设条件下发扬民主的问题，这绝不是偶然的。

很难充分判断中国同志保卫个人迷信所持的动机。实际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我们还是第一次遇到公开颂扬个人迷信的事。必须说，甚至在我国个人迷信盛行时期，斯大林本人也不得不在口头上竭力否认这个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并且说过，这个理论是从社会革命党人那里来的。

想借助马克思和列宁来保卫个人迷信的意识形态的企图不会引起别的，只能使人感到惊奇。莫非中国同志不知道，列宁早在我党建立初期就同民粹派关于英雄与群氓的理论进行了巨大的斗争，在列宁在世时实现了我党中央和苏维埃国家的真正集体领导方法，列宁是一个异常谦逊的人，并无情地斥责了那些对他的阿谀奉承和献媚的极微小的表现。

当然，我党或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从来没有把反对个人迷信理解为否认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威信。苏共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其中包括在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党是珍视自己的领导的威信的；在揭露个人迷信并克服其后果的同时，党是高度评价那些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并且把自己的力量献给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因而享有应得的威望的活动家的。

四

分歧中心的另一个大问题，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道路和方法，关于全人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

在中国同志的描绘中，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看来是这样：他们自己为一方主张世界革命，而另一方——苏共和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则忘记了革命，甚至“害怕”革命，它们不关心革命斗争，反而去关心那些与真正的革命者“不相称”的东西：和平、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和这些国家人民福利的提高、争取资本主义各国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切身利益的斗争。

但是，事实上，中共的观点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观点之间的分水岭完全是在另一方面：一些人，即中共的领导人不管恰当与否地谈论世界革命，利用各种借口，而且往往是没有理由地炫耀“革命的”辞藻，可是另外一些人——恰巧是被中国同志们批评的那些人——以极严肃的态度来对待革命的问题，他们不是高谈阔论，而是顽强地劳动，努力寻求最正确的、符合于时代条件的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为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而进行顽强的斗争。

我们来研究一下中国同志对现代革命运动的问题的基本观点。

为着“世界革命”而停止争取和平，放弃和平共处与和平经济竞赛的政策，放弃为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切身利益和民主改革而斗争，这种方针会有助于各国和各国人民向社会主义过渡吗？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争取和平和奉行和平共处的

政策，难道就是只顾自己而忘掉了资本国家中自己的阶级兄弟吗？

每一个人，只要考虑过当前争取和平反对热核战争的斗争的意义，就懂得，苏联共产党人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以自己的和平政策给予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以无可估价的援助。这里的问题不仅在于，防止核战争意味着拯救工人阶级和整个国家甚至整个洲的人民免于毁灭，虽然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我们的整个政策都是正确的。

问题还在于：这样的政策是帮助国际革命工人运动达到其基本的阶级目标的最好方法。社会主义国家在它们所争得的和平的条件下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卓越的成就，在科学技术方面获得日新月异的胜利，不断改善人们的生活和劳动条件，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这难道不是对工人阶级斗争的巨大贡献吗？

资本主义国家的每个工人看到这些成就和胜利时会说：“社会主义用事实证明：它比资本主义好，为这个制度而斗争是值得的”。在目前条件下，社会主义之深入人心不仅是通过书本，而首先是由于自己的行动，自己的活生生的范例。

一九六〇年声明认为，我们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参加会议的所有共产党得出了共同的结论，根据这个结论，站在现时代的中心的是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革命运动的所有其他任务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巩固。因此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有义务“不倦地巩固各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这个大家庭的国际作用和对世界事件进程的影响一年比一年地增长着”。我们党把实现这个最重要的任务看作是自己的崇高的国际义务。

弗·伊·列宁教导说：“……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经济政策去影响国际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斗争已经转到这个方面来了。我们一旦解决了这个任务，那我们就是在国际范围内真正地最终地取得了胜利。”（《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中文版四二七——四二八页）

苏联共产党人牢牢记住了伟大列宁的遗训，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也遵循着这个遗训。但是有些同志却认定弗·伊·列宁是不正确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不相信社会主义国家有能力在经济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吗？或者这是这样一些人的立场，他们一碰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就灰心失望，看不到有可能用自己的经济成就，用本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的榜样对国际革命运动施加主要影响？这些人想通过另一些在他们看来更为近便的途径来更快地实现革命。但是，胜利了的革命能够以人民的劳动，并且只能够以人民的劳动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成就，证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诚然，这是不容易的，尤其是革命如果是在继承了过去经济不发达的遗产的国家中进行的话。但是，苏联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榜样令人信服地表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实行正确的领导，就能取得巨大的成就，就能向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其次，什么样的局势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更有利——是和平与

和平共处的局势，还是经常的国际紧张状态和“冷战”的局势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是有任何疑问的。谁不知道，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集团利用“冷战”局势来煽起沙文主义、战争歇斯底里和疯狂的反共主义，以便使极端反动分子和亲法西斯分子当政，以便取消民主，镇压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会和其他群众性组织。

共产党人争取和平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加强着他们同群众的联系，加强着他们的威信和影响，也就是说，有助于建立一支所谓革命政治大军。

争取和平和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决不会阻碍，决不会推迟，相反地，却提供可能充分开展为达到国际工人阶级最终目的而进行的斗争。

很难相信，像中国同志这样自己进行过革命而且富有经验的人会不了解一个基本东西：在今天，进行世界革命，要通过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加强，要通过资本主义各国工人的革命阶级斗争，要通过争取民族解放运动和加强亚洲、非洲新获得解放的国家的政治独立和经济自主的斗争，要通过争取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斗争，要通过人民群众的反对垄断的斗争以及其他许多途径，不应当把这些途径彼此对立起来，而应当把它们结合起来，导向一个目的——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中国同志高傲地和侮辱性地指责法国、意大利、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说它们不折不扣地是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是“议会迷”，甚至说它们陷入了“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什么根据呢？根据就是：这些共产党没有提出立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虽然中国领导人也应当理解，没有革命形势，是不能这样干的。

任何一个内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知道，当国内还不存在革命形势的时候，过早地提出武装起义的口号，就意味着使工人阶级注定遭到失败。大家知道，列宁曾以怎样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他曾以怎样的政治远见和对具体情况的了解来对待革命发动时机的选择。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曾指出，十月二十四日发动还太早，而到十月二十六日发动就已经晚了，会失去一切，因而，一定要在二十五日夺取政权。谁来确定阶级矛盾的尖锐程度和革命形势的存在，谁来选择发动的时机呢？只有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它的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才能做到这一点。

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表明，那种自称为工人党、只研究经济问题、不用革命精神教育工人阶级、不培养工人阶级去进行政治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党是不好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滑到改良主义的立场上去。但是，那种脱离争取改善工人阶级、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经济状况的斗争而提出政治斗争的任务的党，也是不好的。这样的党必然要脱离群众。一个党只有正确利用阶级斗争的一切形式，善于把它们结合起来，才能成为真正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成为群众的领袖，顺利地引导工人阶级向资本冲击，去夺取政权。

中国的领导人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共产党所犯的滔天大罪，是它们认为自己的直接任务是为争取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为争取实现民主改革而斗争。这些改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可以实现，能够改善工人阶级、农民和居民

中的小资产阶级阶层的生活条件，有助于建立作为进一步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的广泛反垄断组织的战线。也就是说，它们所做的正是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中所写的东西。

中国同志反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目前所做的一切，对于在阶级斗争前沿同资本搏斗的共产党人，既没有表现出最起码的团结一致的感情，对这些国家的具体条件，这些国家中工人阶级革命运动所走的特殊道路，也没有了解。实质上，他们说“为了革命”，却正好是否定了导致革命的道路，硬要人们采取使共产党在群众中陷于孤立、使工人阶级失去同垄断组织的统治、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同盟军的那种方针。

在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上，中国同志也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分歧。

大家知道，正如莫斯科会议文件和苏共纲领中所明确说明的，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从和平地和非和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出发的。尽管如此，中国同志却顽固地硬说我们党和其他兄弟党只承认和平道路。

苏共中央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信件中再次阐述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立场：

“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争取以和平方法，不通过内战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可能性的实现符合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利益，符合本国全民族的利益。与此同时，革命发展途径的选择不仅仅取决于工人阶级。如果剥削阶级要对人民施行暴力，工人阶级就不得不采用非和平道路来夺取政权。一切都取决于具体条件，取决于国内和世界舞台上的阶级力量的分布情况。

自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管通过何种形式来实现，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各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可能的。苏共高度评价资本主义国家内以共产党人为首的工人阶级的忘我斗争，并认为给它们以一切援助和支持是自己的义务。”

我们已经多次地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在这里没有必要更详细地阐述了。

而中国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怎样的呢？它像一根红线一样地贯穿在他们的所有言论和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中。

中国同志把是否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任何地方都承认武装起义看作是衡量革命性的基本标准。因而中国同志实际上否认了利用和平方式进行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斗争的可能性，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说，共产党人应当掌握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一切形式——暴力的和非暴力的形式。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联系问题。

今天以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为代表的国际革命工人运动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当代的伟大力量。它们之间

的正确的相互关系是战胜帝国主义的主要条件之一。

中国同志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从他们的新“理论”中可以看出，根据这种理论，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竟然不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同志看来，反帝斗争的决定性力量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而仍然是民族解放运动。

中国同志这样做，看来是想用最轻易的办法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当中赢得声望。然而，但愿这种“理论”谁也欺骗不了。这种理论的实际意义，不管中国理论家们愿不愿意，在于使民族解放运动孤立于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之外。但这对民族解放运动本身是巨大的危险。

事实上，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尽管有十分英勇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但如果不是十月革命以及后来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从根动摇了帝国主义，摧毁了殖民主义者的力量，难道能够取得胜利吗？

现在，当解放了的各国人民进入了自己斗争的新阶段，集中努力来巩固政治成果和经济独立的时候，难道他们没有看到，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解决这些任务要困难得无可比拟，甚至根本不可能吗？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强调指出民族解放运动及其伟大未来的世界历史意义，但他们认为民族解放运动取得进一步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同作为反帝主要力量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结成巩固的同盟和合作，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结成巩固同盟。这种立场是在一九六〇年的声明中确定的。这种立场所依据的，是列宁关于工人阶级的领导（领导权）是反帝斗争取得胜利的条件的思想。只有在取得这种领导权的条件下，这个运动才能最终具有真正社会主义的性质，才能以向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过渡来完成。

列宁的这一思想在十月革命的经验中，在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已经得到检验，而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但是，看来中国同志竟想“纠正”列宁的思想，证明似乎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应当是全世界反帝斗争中的领导。而在这以后，中共领导又教训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说，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丧失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

无论是国际工人阶级，还是民族解放运动，未来胜利的保证都在于它们的巩固联盟和合作，在于它们进行联合的、为共同利益所要求的反帝斗争。在反帝斗争中，工人阶级以自己的自我牺牲和忘我地为各国人民的利益服务而博得对其领导作用的承认，使自己的同盟者相信，工人阶级的领导是它自己获得胜利和它的同盟者获得胜利的可靠保证。

我们列宁的党把民族解放运动看作是世界革命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力量。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已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战斗旗帜。马克思和恩格斯事业的继承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指

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为争取世界革命胜利而斗争的主要口号。在新的条件下，这一口号的内容扩大了。大家知道，列宁是赞成“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这一口号的，这一口号着重指出无产阶级的主导作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业已增长的意义。我们党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都严格遵循着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

现在产生一个问题：怎样解释中共领导在现代一些根本问题上的不正确方针？或者是，中国同志同实际现实完全脱节，用教条主义的、学究式的态度对待战争、和平和革命问题，而不理解现时代的具体条件。或者是，在中国同志掀起的关于“世界革命”的大肆喧嚷的后面藏着同革命毫无共同点的其他目的。

从这一切可以看出中共领导强加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的错误性、危害性。中国领导人以“总路线”为名所建议的东西，无非是不考虑时间和现实的阶级力量对比，不考虑现代历史阶段的特点而罗列工人阶级的最一般的任务。中国同志没有看到，或是不愿看到，我们的运动在现时代条件下的任务在如何地变化。他们把总路线归结为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各阶段都保持效力的一般任务，从而使这条路线失去了具体性、明确的目的性和真正的有效性。

各兄弟党在制订自己当前的方针时，具体地分析了在各别国家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力量的配置情况、现阶段两个对立体系的发展和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特点。

对世界局势变化的精确分析，使全世界的兄弟党能够对时代作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评定：“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主要内容的我们的时代，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

对现时代的这个定义，是在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时采取正确态度的基础。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确定了自己的共同路线，它的基本论点归结如下：

——现时代世界革命过程的性质和内容，是由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民、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一般民主运动汇合成统一的反帝斗争洪流等确定的。在反帝革命力量的联盟中，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以示范的力量和自己的经济建设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起着它的主要影响；

——由于业已形成的客观历史条件（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达到极点，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武器的出现等等），防止热核战争的斗争就成为当代反帝力量所面临的一切任务的中心。各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团结一切爱好和平力量来保卫和平和拯救人类免于核灾难；

——社会主义革命由于每个国家阶级斗争的内部发展而进行，它的形式和道路

决定于本国具体条件。共同规律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资本政权和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可能性以采取和平的、不同国内战争相联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同时又准备采取非和平的道路、准备对资产阶级反抗实行武装镇压；一般的民主斗争是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必要的组成部分；

——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目的，是把反帝的、民主革命的任务进行到底，是发展和巩固以同农民和爱国民族资产阶级联盟为基础的民族阵线，是为建立民族民主国家和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准备条件；

——社会主义各国的合作和互助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团结一致，对共同制定的立场和估价的忠诚、对各党生活及其相互关系的列宁主义原则的忠诚，是顺利地解决共产党人所面临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

现时代世界革命过程发展的基本道路就是这样的，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本论点就是这样的。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这就是这一总路线的实质的概貌。始终一贯地在实践中执行这一路线，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胜利的保证。

所有这些由各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宣言和声明中集体制订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现代条件下的最重要的原则性论点，都在苏共新纲领中得到了反映，苏共新纲领完全是建立在对我国和国际范围内的革命经验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总结的基础上的。

五

中共领导人在当代根本的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是同他们旨在破坏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实际活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同志在口头上承认，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团结是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支柱，然而事实上他们在各个方面破坏同我们党、同我国的联系。

中共领导常常说自己忠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家庭。可是中国同志对这个大家庭的态度推翻了他的响亮言词。

统计表明，近三年来，中国同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贸易总额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以上。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特别强烈地感觉到中国同志的这种方针的结果。

中国领导的行动不仅极其严重地违背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原则，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极其严重地违背一切国家应该遵循的公认的规则和准则。

破坏早先签订的协定，给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显而易见，由于缩减经济联系，中国自己的经济也遭到了不小的损失。

为了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证明自己的行动是正确的，中共领导不久前提出了“自

力更生”的理论。一般来说，在每个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首先要依靠人民自己的努力，最好地利用本国国内资源，这是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正确道路。每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事业，这首先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及其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事业。

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曾不得不单单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利用国内资源来建设社会主义。虽然现在存在着社会主义国家体系，这绝不意味着，某个国家的人民可以只是袖手坐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认为调动一切国内资源来顺利地进行经济建设是自己的义务。因此，中共中央关于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说法，就其直接意义来说，是不会引起反对的。

但是，正如中共中央的信和中国报纸上的许多言论所表明的，这一论点实际上包含着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内容。

在“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公式下掩盖着建立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这一概念，对这种经济来说，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仅限于贸易。中国同志力图把这种态度强加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中共领导所以要宣布“自力更生”的方针，看来是为了削弱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密切的友好关系。当然，这种政策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毫无共同之处。不能把它看成是别的，只能看成是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的企图。

除了缩减经济联系的方针之外，中共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剧同苏联的关系的措施。

中国领导人不仅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而且破坏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践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粗暴地违反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

中共领导策划和支持美国、巴西、意大利、比利时、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共产党的各种变节者的反党集团去进行反党活动。例如，在比利时，中共领导支持一个由比共最近一次代表大会开除出党的格里巴集团。在美国，以反对美国共产党为主要目标的左倾机会主义派别“锤与钢”的颠覆活动受到支持。在巴西，被共产党开除出党的一些派别集团（例如阿马佐纳斯—格腊布伊斯集团）受到了中国同志的支持。

在澳大利亚，中共中央企图依靠前澳共领导成员之一希尔去组织反对澳共和澳共领导的分裂活动。希尔在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曾公开表示反对澳大利亚共产党，并企图把同道者纠合在自己的周围。希尔被澳共开除出党中央委员会以后，就示威式地到北京去了。

在意大利，中国人士鼓励意共帕多瓦省委会的一批以前的工作人员的活动：这批工作人员印发了一些传单，挑衅性地号召举行“革命”暴动。

中共同志特别努力地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进行颠覆活动。

中国领导人对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之外的变节者和叛徒大加赞扬，在自己

的报刊上转载这些叛徒集团的出版物中旨在反对苏共的政策、反对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的诽谤性文章。

中国人士在锡兰同埃·萨马拉科迪集团保持着密切的接触，这个集团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第四国际”的工具。

“第四国际”的托洛茨基分子企图利用中国同志的立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甚至在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中直截了当地声明：“从建立之日起就同你们今天所反对的那些思想进行……斗争的第四国际，是站在你们一边的……第四国际的国际书记处欢迎你们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始的这次辩论。它呼吁你们发展这次辩论。”

中国领导人对于不愿背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兄弟共产党及其领导人进行猛烈的攻击。他们用许多种语言发表和散发文章，诋毁美国、法国、意大利、印度的共产党的活动。这些文章的作者对兄弟党的著名领袖还有什么辱骂的字句没有用上！如“两面态度”和“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违背共产主义的道德准则”，“社会民主主义的蜕化”和“心虚”，“不负责任”和“鹦鹉学舌”，“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革命人民采取傲慢和藐视的态度”。

中国领导人指责美国和西欧的共产党说，它们“同最富有冒险性的美帝国主义者一鼻孔出气”。印度共产党领导竟然被称为“集团”。对法国、意大利、印度、美国共产党领导人横加骇人听闻的责难，说他们“关心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命运”。而中共领导在其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竟然堕落到进行诽谤，似乎连苏共也“起着帝国主义帮凶的作用”。除托洛茨基分子之外，鉴于明显的荒谬性，至今还没有谁敢于对列宁的伟大的党提出这种诽谤性的指责！

帝国主义的宣传对中国同志的这种行动感到高兴，这有什么奇怪呢？资产阶级报刊时常叫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并且要求帝国主义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因中共中央的立场所引起的分歧，这不是偶然的。

中共代表退出了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集体的、理论性和情报性的机关刊物——《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编辑委员会，停止这一杂志中文版的发行，想以此来使中国共产党人无法获得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的情报的客观来源。

中国领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的分裂活动引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的理所当然的愤慨和反击。

中共中央的信中说，在同兄弟共产党的关系上，一个党“不能允许把自己置于其他兄弟党之上，不能允许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这是个不坏的声明。但正是中国同志自己采取这种不能容许的行动。他们损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违反宣言和声明中所阐明的准则和原则，企图要其他兄弟党从属自己的影响和控制。

中共领导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采取特殊路线的一个明显例子，就是它对阿尔巴尼亚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大家知道，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在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就对当代一些基本问题公开提出了左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开始执行敌对的政策。阿尔巴尼亚领导在国内展开了反苏运动，这个运动导致

了同苏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关系的破裂。

绝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都坚决谴责了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这种反列宁主义的活动。而中共领导人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他们尽力利用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作为自己的传声筒。现在大家知道，中国同志直接把他们推上了公开反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道路。

中共领导人在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攻击中，把南斯拉夫问题放在一个特别的地位，他们企图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是由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南斯拉夫的关系改善而产生的。他们不顾事实硬说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大家知道，一九五五年苏共同其他兄弟党一起在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方面表现了主动，以克服要由斯大林承担主要过错的长期冲突。在这个时期，中共领导人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没有产生任何疑问。例如，《人民日报》曾经指出，“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对南斯拉夫社会经济进程的客观分析表明，在以后的年代里，那里的社会主义阵地加强了。如果说，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成分在工业中占百分之百；在农业中占百分之六，在商业中占百分之九十七，那么，现在社会主义成分在工业中占百分之百；在农业中占百分之十五；在商业中占百分之百。在开始关系正常化以后的时期内，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出现了南斯拉夫立场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的接近。

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如此急剧地改变了自己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呢？他们把这看作是一个他们认为有利的借口，用来污蔑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政策，此外很难作别的解释。

苏联共产党人知道，在苏共和南共联盟之间在若干原则性的意识形态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分歧。我们过去直率地向南斯拉夫领导人说出了这一点，而且要继续说这一点。但是，像中共领导人所做的那样，根据这一点便把南斯拉夫“革除”出社会主义，把它从社会主义国家中赶开并推入帝国主义阵营，是不正确的。这正好是帝国主义者所希望的。

现在世界上有十四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深信，在不久的将来，它们将会多得多。执掌国家领导权的兄弟党所遇到的问题，范围日益扩大，而且每一个兄弟党都在不同的条件下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各兄弟党对解决这些或那些问题可能出现不同的态度，这是不足为奇的。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如何行动呢？应当由于某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不同意他们的意见，就宣布这个国家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这将是名副其实的专横的表现，这种方法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如果仿效中国领导人的榜样，那么，由于我们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袖们的严重分歧，我们不是早就该宣布阿尔巴尼亚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但这是对问题的不

正确的、主观主义的态度。尽管同阿尔巴尼亚领导有分歧，苏联共产党人认为阿尔巴尼亚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从自己方面采取措施，不使阿尔巴尼亚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

我们痛心地看着，中共领导人如何在破坏苏中的传统友谊，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

苏共现在和将来都主张社会主义大家庭、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和团结。

六

现在我们来作几点总结。

自一九六〇年声明通过以来的这一段时间完全证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是正确的。苏联在共产主义建设方面的成就，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成就，正在对全世界人们的思想发生着越来越大的革命化的影响。革命的古巴在西半球点亮了社会主义的灯塔。已经接近被彻底消灭的殖民主义体系遭到了决定性的打击。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取得了新的胜利。世界革命运动在不停地前进。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一九六〇年声明正确地制订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现在的任务是，按照这条总路线来工作和行动，根据每一个共产党的条件发展它和使它具体化。因此，像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中所做的那样，把某种新的总路线强加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任何企图，都是站不住脚的和有害的。采取这条“总路线”，就意味着背离一九六〇年声明，同意那种同八十一个党所通过的这个声明相抵触的纲领性方针。我们党不会走这条道路。

我们光荣的列宁的党，在其整个历史时期中，同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在国内以及国际舞台上的一切表现，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我们党在这一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纯洁性的斗争中受到了锻炼，并得到了巩固，它不怕现代分裂分子和机会主义者的任何攻讦，不管这种攻讦是从哪里发出的。

生活表明，苏共在成为全民政治组织以后，加强了自己同群众的联系，获得了更大的力量，具有更高度的纪律。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已成为全体人民和他们的先进部分的意识形态。工人阶级的目标——建成共产主义——已成为全民的目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然只能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这种加强感到高兴。我们可以说，在弗·伊·列宁逝世以后，我们党还从来不曾如此强大：它能够解决与建立新世界相联系的最豪迈的任务。

现在，当社会主义在我国已经取得完全的和最终的胜利的时候，当我们正在一砖一石地兴建美好的共产主义大厦的时候，我们党和全体苏联人民更加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思想必将在全世界获胜。

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具有与我们同样的信心，他们高度评价苏联对为和平、民主、民族自由和独立以及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共同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

苏联共产党过去和现在一直主张同中国共产党保持亲密的友谊。我们同中共领导人严重的分歧，但是我们认为，两党之间、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的建立，应当从我们共同的目的是建设新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帝国主义这一点出发。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大国通过联合的努力，可以为共产主义的胜利做很多事情。这是我们的朋友和敌人都清楚知道的。

目前正在莫斯科举行苏共和中共代表团会谈。遗憾的是，中共代表在这次会谈中继续使情况尖锐化。尽管如此，苏共代表团表现最大的耐心和忍耐，力求使会谈取得积极的结果。最近的将来就会表明，中国同志是否同意把我们的相互关系建立在使我们联合起来、而不是使我们分离的东西的基础上，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的基础上。

我们的敌人指望中共和苏共的分歧加深。他们现在就在窥伺，能不能捞点什么东西。最近，美国报纸《每日新闻》写道：“那就让我们驱使赤色俄国同赤色中国相互反对吧，让他们相互撕得粉碎。”我们共产党人绝不能忘记帝国主义者的这些阴险的打算。

我们党理解自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全世界人民的责任，呼吁中国同志走上消除分歧和加强我们的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真正团结的道路。

我们的列宁的党同所有兄弟党一道，过去和现在都争取把工人阶级、全体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

苏共中央委员会对党、对全体苏联人民完全负责地宣布，为了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为了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在列宁的旗帜下，为了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各国的团结，为了有效地援助正在同殖民主义斗争的各国人民，为了加强和平事业和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在全世界的胜利，我们曾经尽了我们的一切力量，并且仍将尽我们的一切力量。

苏联全体劳动人民将更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亲爱的共产党及其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的周围，将用自己的全副精力来实现建设共产主义的宏伟纲领。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原载人民日报 1963-07-20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声 明

今年七月十四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封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言人在七月十九日的声明中指出，“苏共中央这封公开信是对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的评价。中共中央认为，这封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中共中央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澄清和评论。”

人民日报和中国其他全国性报纸以及所有省、市级报纸，已经在七月二十日全文刊载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国的广播电台也全文广播了这封公开信。

自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发表以后，苏联全国性报刊上又发表了近三百篇攻击中国的文章和材料。人民日报已经将其中一部分摘要发表。

从今天开始，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将陆续发表文章，评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已经一个多月了。苏共领导发表这封公开信和随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已经把中苏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推到一个空前严重的阶段。

现在，莫斯科、华盛顿、新德里、贝尔格莱德打得火热，苏联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刊登着攻击中国的各种奇谈怪论。苏共领导公然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然撕毁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公然违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联合美帝国主义，联合印度反动派，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反对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中苏两党的分歧，是涉及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的分歧。中共中央在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已经系统地、全面地论述了这种分歧的实质。中共中央在这封信件中指出，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中苏两党的分歧，归根到底，是要不要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分歧，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分歧，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分歧，要不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分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究竟是怎样发展到目前这样严重地步的呢？这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我们在《分歧从何而来？》（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这篇文章中，曾经概括地论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当时，我们对于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事实，特别是涉及苏共领导的一些重要事实，有意识地作了保留，给苏共领导留了余地，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说明真相，弄清是非。现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在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这个问题上，扯了许多谎话，完全歪曲了事情的真相。因此，我们不得不列举一些事实来详细地说明这个问题。

苏共中央公开信不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诉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苏共领导不是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具有的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是采取资产阶级政客所惯用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一味地要把分歧的产生和扩大的责任，转嫁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列宁说过，“政治上采取诚实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现，政治上采取欺骗态度，是软弱的表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是采取诚实的态度，总是尊重事实的。只有政治上堕落了的人才靠说谎过活。

事实是最雄辩的。事实是最好的见证人。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分歧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

俗语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当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散布一种说法，似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从一九六〇年四月我们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而引起的。这是一个澜天大谎。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原则分歧，早在七年多以前就开始了。

具体地说，这是从一九五六年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现在，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经历了一个产生、形成、发展和系统化的过程。人们对于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我们历来认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当代国际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许多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特别是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更是极其重大的原则错误。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无论在原则上，在方法上，都是错误的。

斯大林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三十年间，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领袖，世界革命的旗手。斯大林的一生中，犯过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同他的伟大功勋相比较，毕竟是第二位的。

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说过：

“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

斯大林的错误是应该批判的。但是，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伟大的苏联，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完全不是运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认真严肃地分析和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而是采取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斯大林，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捏造了大量的谎言，使用了恶毒的煽动性的语句，攻击斯大林是“迫害狂”，“严酷的专横”，“走上了大规模迫害的道路，走上了恐怖的道路”，“只是从电影上来研究国内情况和农业”，“按照地球仪计划战役”，斯大林的领导“成了苏维埃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等等。他根本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同一切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取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的功绩，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保卫和巩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的功绩，抹煞了斯大林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功绩。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正是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开始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了所谓“和平过渡”的论点。他说，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现在情况变化了，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错误论点，实质上是公开地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公开地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

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也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原理是否继续有效的问题，在实际上篡改了列宁的学说。

赫鲁晓夫把美国政府及其首脑看作是抵抗战争势力的人，而不是帝国主义战争势力的代表。他说，“在美国主张以战争方式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的人还占据着强有力的地位，他们还继续在对总统和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他还说，帝国主义者开始承认实力地位政策已经破产，他们中间“出现了头脑有些清醒的征象”。这就是说，美国政府及其首脑可以不代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可以放弃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了。

赫鲁晓夫宣布，“我们希望在为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的斗争方面，以及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同美国友好合作”。正是这种错误观点，后来发展成为“苏美合作解决世界问题”的路线。

赫鲁晓夫歪曲列宁的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正确原则，提出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就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互助合作，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支援，都排除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之外去了；或者是把这一切都从属于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了。

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斯大林的问题和所谓“和平过渡”的问题，绝不是苏共一个党的内部事务问题，而是同各国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重大问题。苏共领导事先毫不征求兄弟党的意见，就武断地作出结论，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并且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作为借口，粗暴地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政，颠覆他们的领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自己的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政策。

后来事实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苏共领导人背离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是从上述这些错误发展起来的。

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一向就有原则性的不同意见，这是苏共领导同志十分清楚的。但是，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却硬说中国共产党过去是完全支持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硬说我们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评价“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说我们的立场是“摇摆不定”的，是“虚伪”的。

苏共领导想要一手遮天，这是办不到的。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事实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曾经多次在内部会谈中，严肃地批评了苏共领导的错误：

一九五六年四月，即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到两个月，毛泽东同志先后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同志，同苏联驻中国大使的谈话，都对斯大林问题表示了我们的意见。

毛泽东同志着重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同志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指出，“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又指出：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同苏共领导人的谈话，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同当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苏共代表团的谈话，周恩来同志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同苏共领导人的谈话，都一再谈到我们对斯大林问题的意见，批评了苏共领导人的错误。这些错误主要是：对斯大林“完全没有全面的分析”；苏共领导人“缺乏自我批评”；“事先没有同兄弟党商量”。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同苏共同志的内部谈话中，也提出过我们的不同意见。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还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书面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地、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

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同苏共同志的多次内部谈话中，还针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就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问题，系统地阐述了我们的观点。

所有这些，都是明明白白的事实。苏共领导怎么可以睁着眼睛说瞎话，一笔加以抹煞呢？

苏共中央公开信企图把这些重要事实掩盖起来，断章取义地摘引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的某些公开讲话，用来证明中国共产党曾经全盘肯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是徒劳的。

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从来没有全盘肯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从来没有同意过全盘否定斯大林，从来没有同意过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

我们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即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其后，又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文章，在驳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共谰言的同时，对于斯大林的一生作了全面分析，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总结了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委婉地然而又是十分明确地批评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论点。难道这不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吗？

中国共产党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一直是继续把斯大林的像片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伟大的革命领袖的像片挂在一起的。难道这不也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吗？

当然，有必要指出，当时我们考虑到，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正在利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猖狂地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为了团结对敌，为了照顾苏共领导人的困难处境，同时，苏共领导那时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没有像后来走的那样远，我们没有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进行公开的批评。当时，我们怀着满腔热忱，还希望苏共领导能够改正错误。因此，我们总是努力寻求它的积极因素，在公开场合给以适当的、必要的支持。

即使这样，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公开讲话中，也还是着重从正面、从原则上阐明了我们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立场。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刘少奇同志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全盘肯定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但是，恰恰正是在这个报告中，刘少奇同志论述了中国革命的经验，说明了所谓“和平过渡”的道路是错误的，也是行不通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邓小平同志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全盘肯定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做法。但是，恰恰正是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同志详细论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问题，领袖和群众的相互关系问题，并且说明了我们党一贯的正确作风，这就在实际上批评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错误。

我们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呢？难道这不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有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态度吗？

怎么能够说，中国共产党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这种一贯的、正确的立场，是什么“摇摆不定”的、“虚伪”的，是什么“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呢？

苏共中央公开信对我们提出这样的指责，大概是他们以为，我们过去的批评只有苏共少数领导人知道，可以赖账，可以用谎言来欺骗广大的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但是，这种做法，不是恰恰证明他们自己是虚伪的吗！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引起的严重恶果

苏共中央公开信极力吹嘘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产生了“出色的结果”、“伟大的结果”。

然而，历史是篡改不了的。只要是不健忘的人，总会记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并没有带来什么“出色的结果”或是“伟大的结果”，而是败坏了苏联的声誉，败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声誉，败坏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声誉，给了帝

国主义、反动派和其他一切共产主义敌人以可乘之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当时，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气焰高涨，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浪潮。美帝国主义把苏共领导大反斯大林看作是“空前未有的合乎我们目的”的举动，叫嚷要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为武器来摧毁共产党运动的威望和影响”，并且乘机鼓吹促进苏联的“和平改变”。

当时，铁托集团嚣张万分。他们打着所谓“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动口号，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叫嚷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在南斯拉夫开始的“新趋势”“创造了相当多的因素”，“现在的问题是：是这条路线得胜呢，还是斯大林主义路线再度得胜”。

当时，处于绝境的共产主义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大肆活跃起来。所谓第四国际在他们的《告全世界工人和人民书》中叫嚷说：“当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自己承认斯大林的罪恶时，他们就是默认……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进行的、反对工人国家堕落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使修正主义思潮大为泛滥起来。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内，一批叛徒跟着帝国主义、反动派和铁托集团一起，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攻。

在这期间发生的最突出的事件，是苏波关系事件和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这两个事件，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苏共领导对这两个事件都曾经犯了严重错误。苏共领导调动了军队，企图用武力压服波兰同志，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苏共领导在匈牙利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布达佩斯的紧急关头，曾经一度准备采取投降主义的政策，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抛弃给反革命。

苏共领导的这些错误，使一切共产主义的敌人猖狂起来，给许多兄弟党造成了严重的困难，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面对着这种局势，中国共产党人同各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一起，坚决主张击退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进攻，捍卫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时，我们坚决主张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粉碎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坚决反对抛弃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我们坚决主张采取正确的原则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问题，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做法。同时，我们用极大的努力，维护了苏共的威信。

当时，苏共领导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由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检讨了他们过去在处理兄弟国家关系方面的一些错误。十一月一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苏联政府的宣言表示支持。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也是为了劝告苏共领导及时地接受教训，纠正错误，而不要沿着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滑下去。然而，后来

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却反而对我们怀恨在心，把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推行错误路线的最大障碍。

一九五七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

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是在击退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进攻以后召开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制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事实恰恰相反。一九五七年兄弟党会议，正是在许多重大原则性问题上，拒绝了并且纠正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观点。

莫斯科会议通过的著名的一九五七年宣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各国共产党共同的斗争任务，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概括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规定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相对立的。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是同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宗派主义相对立的。

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会议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中共代表团一方面同苏共领导进行充分的协商，对他们作了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帮助他们改正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又同其他兄弟党领导人反复交换意见，力求达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文件。

在这次会议中，我们同苏共代表团的争论，主要是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苏共领导原来提出的宣言草案中，硬要塞进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和平过渡的错误观点。这个草案，根本不提非和平过渡，只提和平过渡，而且又把和平过渡说成是“在议会中争取多数，并把议会从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真正的人民政权的工具”。这实际上是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所谓“议会道路”来代替十月革命的道路，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基本原理。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苏共领导所提出的宣言草案中的错误观点。我们对于苏共中央先后两次提出的宣言草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且在作了相当多的原则性的重大修改以后，提出自己的修正草案。后来，中苏两党代表团在我们的修正草案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次的讨论，然后提出《苏共和中共共同起草的宣言草案》，征求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意见。

经过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同苏共领导第一次提出的草案相比较，有两点重大的修改：第一，在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指出非和平过渡的道路，并且强调“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

权的”；第二，在谈到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的同时，强调“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的条件”。

虽然作了上述的修改，我们对于宣言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表述，还是不满意。只是由于照顾到苏共领导一再提出的希望能够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的愿望，我们才作了让步。

但是，当时我们就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地、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这个提纲着重指出：

“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如果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靠不住的”。（见附件一）

经过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一九五七年宣言还纠正了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错误观点，并且在一系列的原则性问题上，增加了或者补充了许多重要内容。其中主要有：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人民群众的最凶恶的敌人；帝国主义如果发动世界战争就注定灭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的重要性；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终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等等。

同时，中共代表团作了必要的妥协。除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以外，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那一段文字，我们是不同意的，并且提出过修改意见。但是，为了照顾苏共领导当时的困难处境，我们没有坚持修改这一段文字。

谁也不会想到，我们这种照顾大局的让步，竟然被苏共领导拿来作为借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加剧分歧，制造分裂。

现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口声声地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等同起来，企图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路线代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我们早就说过，现在有必要再一次指出，根据兄弟党独立的、平等的原则，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其他兄弟党接受某一个兄弟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或者任何别的什么东西。任何一个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不能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对别的兄弟党都没有约束力。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兄弟党一致协议的文件，才是对我们和所有兄弟党具有约束力的共同行动准则。

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发展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以后，有了一个各国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宣言，我们本来希望，苏共领导能够遵循这个宣言的路线，改正自己的错误。不幸的是，同我们的愿望相反，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的愿望相反，苏共领导反而越来越严重地违反宣言的革命原则，违反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越来越远。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这就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随之加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共同结论，热衷于追求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追求苏美两国首脑解决世界问题。特别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戴维营会谈前后，赫鲁晓夫简直把艾森豪威尔捧上了天，把他说成是“得到本国人民绝对信任的人”、“也像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苏共同志还极力宣扬连艾森豪威尔都不承认的所谓“戴维营精神”，说这是什么“国际关系的新纪元”、“历史的转折点”。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的革命路线，在赫鲁晓夫的言论和苏联报刊的文章中，大肆宣扬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线，宣扬帝国主义的“明智”和“善良愿望”，宣扬在帝国主义还统治和控制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下，就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宣扬全面彻底裁军“能够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开创一个崭新的纪元”，等等。

苏共还出版了许多著作，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阉割它的革命灵魂，宣扬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

苏共领导还力图把自己的一系列的错误观点，强加给国际民主组织，改变它们的正确路线。苏联同志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上的做法，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在百般讨好美帝国主义的同时，放肆地进行反对中国的活动。苏共领导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障碍。他们自以为他们的内部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定”了，可以加紧推行他们的“对敌和、对友狠”的政策了。

一九五八年，苏共领导提出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府正当的、坚决的拒绝。不久以后，一九五九年六月，苏联政府就片面地撕毁了中苏双方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

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接着，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夕，苏共领导不顾中国方面多次提出不同意见，迫不及待地在九月九日发表了塔斯社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偏袒印度反动派。这样，苏共领导就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苏共领导撕毁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和发表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声明，这是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创造所谓“戴维营精神”，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

苏共领导人和报刊还对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进行了大量的恶毒的攻击。这种攻击，几乎每一次都是由赫鲁晓夫带头进行的。他影射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超阶段”和“平均共产主义”，攻击中国的人民公社“实际上是反动的”。他影射攻击中国好战，犯了“冒险主义”，等等。他从戴维营会谈回来以后，竟然向中国推销美国的“两个中国”计划，并且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国宴上，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苏共领导推行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引起了严重的混乱。美帝国主义好像已经不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艾森豪威尔被某些共产党人当作“和平使者”来欢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九五七年宣言似乎已经过时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澄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混乱，在一九六〇年四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在这三篇文章中，我们根据一贯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立场，着重阐述了一九五七年宣言的革命观点，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这三篇文章的观点，是同苏共领导所宣扬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完全相对立的。但是，当时为了顾全大局，我们仍然没有公开批评苏共同志，而是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极力歪曲和攻击《列宁主义万岁》这三篇文章，但是举不出任何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证明他们的攻击是站得住的。我们要问：在当时的情况下，难道我们应当对盛行一时的错误观点和荒谬言论沉默不言吗？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和义务起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吗？

苏共领导对中共的突然袭击

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发表了八天之后，就发生了美国 U—2 飞机侵犯苏联领空、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的事件。所谓“戴维营精神”，完全垮台了。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我们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

大敌当前，迫切需要中苏两党、全世界兄弟党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

但是，事情同人们所期待的相反：一九六〇年夏季，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的分歧进一步扩大了，大规模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发生了，苏共领导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了。

本来，在一九六〇年六月初，苏共中央提出，利用六月间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局势交换意见。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匆忙地召开这样的会议，也不赞成只召开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我们积极建议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且主张为了开好这个国际会议，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我们的这个建议得到苏共的赞同。两党并且同意，为了准备这个国际会议，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兄弟党代表，可以就这个国际会议的召开日期和地点，初步交换意见，但不作任何决定。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苏共领导竟然背弃自己的约言，把本来应该针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矛头转向中国共产党，在布加勒斯特对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

兄弟党代表布加勒斯特会谈，是在六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六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公开信把这次会谈说成是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什么“同志式的帮助”，这完全是骗人的。

事实上，在会谈前夕，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分别向兄弟党代表散发了或者宣读了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这个通知书，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毫无根据的诬蔑和攻击，这是苏共领导的反华纲领。

在会谈中，赫鲁晓夫带头组织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大规模的围攻。赫鲁晓夫在发言中，放肆地诬蔑中国共产党是“疯子”，“要发动战争”，“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拿起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纯粹的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对苏共采取“托洛茨基方式”。一些听从赫鲁晓夫指挥的兄弟党代表，也跟着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是“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假革命”、“宗派主义”、“比南斯拉夫还坏”，等等，等等。

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谈中发动的反华运动，对于许多兄弟党来说，也是一种突然袭击。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代表，是不同意苏共领导的这种错误做法的。

在这次会谈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拒绝服从苏共领导的指挥棒，坚决反对苏共领导的宗派活动，苏共领导就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看作眼中钉。他们从此进行了越来越激烈的反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活动。

苏共领导发动的对中国共产党的这样恶劣的攻击，难道能够说是什么“同志式的帮助”吗？不。这是苏共领导事先预谋的反华大演出，这是粗暴破坏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兄弟党关系准则的严重事件，这是以苏共领导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为了维护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同苏共领导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出席布加勒斯特会谈的中共代表团，为了顾全大局，在会谈公报上签了字，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

示，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六日发了一个书面声明。中共代表团在声明中指出，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谈中的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中共代表团严正声明：

“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则上是同赫鲁晓夫同志有分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取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绝不是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我们党只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见附件二）

苏共领导对于在布加勒斯特没有能够压服中国共产党并不甘心。紧接着布加勒斯特会谈之后，苏共领导采取一系列步骤，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进一步对中国施加压力。

七月间，苏联政府突然片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从而撕毁了几百个协议和合同。苏联方面还片面撕毁中苏双方分别出版和互惠发行《友好》杂志和《苏中友好》杂志的协议，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召回驻苏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并且挑起了中苏边境纠纷。

看来，苏共领导以为，只要挥舞手中的指挥棒，纠合一批打手进行围攻，只要施加政治的和经济的巨大压力，就能够迫使中国共产党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顺从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意志。但是，久经考验和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打不倒、压不垮的。妄想组织围攻和施加压力就能使我们屈膝的人，完完全全打错算盘了。

关于苏共领导破坏中苏关系的真相，我们准备在另外的文章里作详细的论述。在这里，我们只打算指出，苏共中央公开信在谈到中苏关系的时候，竟然故意隐瞒了苏联政府撤退全部在华专家、片面撕毁几百个协议和合同的事实，隐瞒了正是苏联方面的这些片面的行为造成了中苏贸易的缩减，反而指责中国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指责中国缩减中苏两国贸易。苏共领导竟然这样明目张胆地欺骗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这才真正是可悲的。

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议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围绕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召开，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进一步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坚持原则、维护团结还是抛弃原则、制造分裂这两种方针的斗争。

在兄弟党会议召开之前，种种迹象表明，苏共领导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并且力图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国共产党深深感到分歧的严重性。我们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作了

许多努力，希望苏共领导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对于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通知书，作了答复。在这个答复书中，中共中央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驳斥了苏共领导对我们的攻击，批判了苏共领导的错误观点，并且向苏共中央提出了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积极建议。（这五项建议，见附件三）

接着，中共中央派遣代表团在九月间前往莫斯科，同苏共代表团举行会谈。在会谈中，中共代表团指出，苏共领导一面美化美帝国主义，一面大肆反华，把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把同敌人的关系和同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摆错了位置。中共代表团再三地劝告苏共领导改变这种错误的立场，回到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上来，加强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反对共同的敌人。但是，苏共领导根本无意改正自己的错误。

这样，一场尖锐的斗争就不可避免了。这个斗争首先在有二十六个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为兄弟党会议准备文件的起草委员会中展开，接着就在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中达到空前未有的激烈的程度。

十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的起草委员会中，苏共领导企图强行通过自己起草的声明草案，这个草案包含了苏共领导的一系列错误观点。由于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坚持原则的斗争，起草委员会经过激烈的辩论，对苏共提出的声明草案作了许多重大的原则性的修改。起草委员会就声明草案的绝大部分达成了协议。但是，苏共领导存心要继续争论，拒绝对声明草案中仍然遗留的几个重大分歧问题达成协议，而且赫鲁晓夫从纽约回来以后，甚至把在有的问题上已经达成的协议也推翻了。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苏共领导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其他许多兄弟党的代表团的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愿望，竟然在会议的前夕，向齐集莫斯科的兄弟党代表，散发了一封更加粗暴地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长达六万余字的信件，挑起了更加尖锐的争论。

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就是在这样的极不正常的气氛中举行的。苏共领导的恶劣做法，曾经使会议濒于破裂的边缘。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由于大多数兄弟党代表团要求团结、反对分裂，会议最后还是达成了协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代表团“只是在出现了它会完全孤立的威胁的时候，它才签署了声明”。这又是在说谎。

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苏共领导在会议中以及在会议之前，确实组织了不少兄弟党代表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攻，也确实企图依靠所谓多数来压服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代表团，也确实企图强迫它们接受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观点。但是，无论在二十六个兄弟党起草委员会中，或者在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中，苏共领

导的强加于人的作法都失败了。

事实是：苏共领导提出的声明草案中的许多错误观点都被否定了。举例来说：

苏共领导关于和平共处与经济竞赛是社会主义各国对外政策总路线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新阶段的出现是由于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反对社会主义各国“单干”，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各国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所谓“集团活动”和“派别活动”，实际上是要兄弟党听从苏共领导的指挥棒，取消兄弟党关系中独立、平等的原则，用多数压服少数来代替协商一致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低估现代修正主义严重危险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事实是：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提出的许多重要的原则性的正确意见写到声明中去了。声明中关于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的论点；关于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人民的敌人的论点；关于建立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论点；关于民族解放运动是防止世界战争的重要力量的论点；关于新独立国家彻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论点；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工人运动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论点；关于在处于美国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和军事统治下的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主要打击是针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也针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垄断资本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的论点；关于兄弟党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关于反对修正主义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的论点；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等等；都是吸收了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的意见的。

当然，也应当提到，在苏共领导同意删掉他们的错误论点，接受了兄弟党的正确意见之后，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也作了一些让步。例如，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问题，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我们都是有不同意见的，只是为了照顾苏共和一些兄弟党的需要，我们才同意在声明中照抄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这两个问题的文字。但是，我们当时就告诉苏共领导，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我们只能再照顾这一次，以后决不能照顾了。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到，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的整个过程，贯穿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次会议中表现出来的苏共领导的错误，较之前一时期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苏共领导提出的声明草案中和在会议的发言中，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到，苏共领导企图强加给兄弟党的错误路线，在政治上是以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错误观点为中心内容，在组织上是实行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错误政策。这是一条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

义根本相违反的修正主义路线。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代表团，坚决反对这条路线，坚决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路线。

在这次会议中，斗争的结果是，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观点基本上被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会议通过的声明所体现的革命原则，是全世界兄弟党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有力武器，也是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有力武器。

在这次会议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对苏共领导的一系列错误观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迫使苏共领导不能不接受兄弟党的许多正确意见，从而打破了那种对苏共领导的错误一点也批评不得、苏共领导说了就算的极不正常局面。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中共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这不过是苏共领导打肿了脸充胖子。

这次会议，还体现了兄弟党既互相联合又独立平等的原则，体现了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挫败了苏共领导企图用多数压服少数、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兄弟党的错误做法。这次会议又一次表明，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来说，在解决兄弟党分歧的时候，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是完全必要的。

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系统化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中共领导人在一九六〇年的声明上签字，不过是要花招而已”。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不，恰恰相反，耍花招的不是我们，而是苏共领导。

一系列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在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议上，同意删改他们在声明草案中的错误论点，是迫不得已的；他们接受兄弟党的正确论点，也不是真诚的。苏共领导根本不把兄弟党共同协议的文件放在眼里。一九六〇年声明签字墨迹未干，苏共领导就开始动手破坏它。十二月一日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在声明上签字，过了二十四小时以后，同一个赫鲁晓夫，就在招待各国兄弟党代表团的宴会上，违反兄弟党的协议，大讲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八十一个兄弟党会议以后，苏共领导越来越放肆地破坏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苏共领导一方面把声明所宣布的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看作是朋友，鼓吹“美苏合作”，表示要同肯尼迪一起，“动手架设信任、相互谅解和友谊的牢固桥梁”；另一方面，把一些兄弟党、兄弟国家看作是敌人，急剧地恶化了苏联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一九六一年十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新的高峰。这是苏共领导把他们自己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形成完整体系的一个

里程碑。

在这次大会上，苏共领导发动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大规模的公开攻击。赫鲁晓夫在发言中甚至公开号召推翻霍查同志和谢胡同志的领导。苏共领导就是这样地开创了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兄弟党的恶劣先例。

在这次大会上，苏共领导干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在斯大林逝世八年之后，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五年之后，又一次集中地大反斯大林。

苏共领导这样做，归根到底，是为了抛弃宣言和声明，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行一条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集中地表现在这次大会通过的新的苏共纲领中。

苏共中央公开信把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路线，说成是“在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得到赞同的，并且在宣言和声明中得到反映的”。苏共领导这样说，难道不感到太粗心了吗？怎么能把一九六一年发生的事情，说成在一九六〇年甚至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就“得到赞同”或者“得到反映”了呢？

这里姑且不谈这样荒诞的自我吹嘘，首先必须弄清楚的是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共纲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货色。

只要稍微认真地研究一下苏共纲领和赫鲁晓夫的报告，就不难看出，苏共领导提出的是一个根本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违反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

这个纲领，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违背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在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议上被否定了的苏共领导的许多错误观点，又在苏共纲领中出现了。例如：把和平共处说成是对外政策的总原则，片面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把社会主义国家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诬蔑为“单干”，等等。

这个纲领，把苏共领导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执行的错误路线更加系统化，它的主要内容就是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

这个纲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作了粗暴的修正，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没有必要，宣布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已经改变，提出了“全民国家”和“全民的党”的谬论。

这个纲领，用人道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用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代替共产主义理想。

这个纲领，是反对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进行革命的纲领，是反对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纲领，是保存和恢复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应邀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在致词中就申述了我们党的立场，后来在同赫鲁晓夫和其他苏共领导人的会谈中，也坦率地批评了苏共领导的错误。

在同中共代表团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完全拒绝中共代表团的批评和劝告，甚至公然表示支持中共党内的反党分子。赫鲁晓夫毫不掩饰地表示：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当他们开始走上“同斯大林不同的道路”，也就是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的时候，他们还需要兄弟党的支持。他说，“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好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赫鲁晓夫的这些话，表明苏共领导已经下定决心，沿着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走下去。不管中国共产党怎样多次进行同志式的规劝，他们根本不放在心里，而且毫无悔悟之意了。

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逆流

苏共中央公开信，竭力想使人相信，似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曾经“作了新的努力”，谋求改善中苏两党的关系，谋求加强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

这又是在说谎。

事实究竟是怎样呢？

事实上，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苏共领导为了推行自己制定的完全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肆无忌惮地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政策。这就使中苏关系越来越恶化，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下面就是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来，苏共领导破坏中苏团结，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团结的主要事实：

第一，苏共领导力图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力图用自己的修正主义纲领代替宣言和声明。他们把自己的错误路线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近年来的全部列宁主义方针”，把自己的修正主义纲领说成是“我们时代的真正的共产党宣言”，是“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社会主义友好共同体各国人民”的“共同纲领”。

任何一个兄弟党，只要它不接受苏共的错误路线和纲领，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苏共领导就把它当作敌人，就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手段，反对它，攻击它，损害它，颠覆它的领导。

第二，苏共领导不顾一切地采取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中史无前例的行动，断绝了同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

第三，苏共领导继续向中国施加压力，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责我们采取什么“特殊的立场”，实行什么与兄弟党共同方针不同的路线，并且把我们支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也算是一条罪状。苏共领导还企图迫使中国共产党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放弃自己一贯坚持的完全符合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的

路线，接受苏共领导的错误路线，接受他们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既成事实，作为改善中苏关系的条件。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大肆吹嘘这个时期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件，一九六二年十月赫鲁晓夫对中国驻苏大使讲了一些要团结的话等等，其实都是为着达到这个可鄙的目的。

第四，苏共中央拒绝了印度尼西亚、越南、新西兰等兄弟党关于召开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倡议，也拒绝了中共中央一九六二年四月七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为准备召开兄弟党会议而提出的五项积极建议。苏共中央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日给中共中央的复信，甚至要求阿尔巴尼亚同志必须放弃自己的立场，作为改善苏阿关系的先决条件，也作为召开兄弟党会议的先决条件。

第五，一九六二年四月到五月间，苏共领导通过他们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颠覆活动，引诱和胁迫几万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在中国政府再三提出抗议和交涉之后，苏联政府还以“苏维埃法制感”、“人道主义”为借口，拒绝遣返这些中国公民。这一事件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是史无前例的、骇人听闻的事件。

第六，一九六二年八月间，苏联政府正式通知中国说，苏联将同美国达成关于防止核扩散的协议。这是苏美合谋垄断核武器，企图剥夺中国拥有核武器以抵抗美国核威胁的权利。中国政府对此一再提出了抗议。

第七，苏共领导越来越热衷于同美帝国主义做政治买卖，一心一意要同肯尼迪结成反动同盟，不惜牺牲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苏共领导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接受美国政府提出的侵犯古巴主权的“国际视察”，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第八，苏共领导越来越热衷于勾结印度反动派，一心一意要同尼赫鲁结成反动同盟，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国。苏共领导和他们的报刊公开站在印度反动派方面，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正义立场，为尼赫鲁政府辩护。苏联对印度的经济援助，有三分之二是在印度反动派挑起中印边境冲突以后给印度的。苏共领导甚至在一九六二年秋季中印边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发生以后，还给印度反动派以军事援助。

第九，苏共领导越来越热衷于勾结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一心一意要同叛徒铁托结成反动同盟，反对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苏共领导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公开撕毁一九六〇年声明，为铁托集团翻案。

第十，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起，苏共领导在国际范围内更加猛烈地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掀起一个新的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逆流。赫鲁晓夫接二连三地发表讲话，苏联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几百篇文章，在一系列问题上攻击中国共产党。在苏共领导人的指挥之下，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五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变成了反华大演出的舞台；四十多个兄弟党发表了决议、声明和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上面列举的这些事实，是苏共领导无可抵赖的。这些铁的事实，证明了他们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所作的“新的努力”，并不是谋求改善中苏关系，加强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而是恰恰相反，是进一步勾结美帝国主义、印度反动派和叛徒铁托集团，进一步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对一些兄弟党的攻击进行公开的答辩。我们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发表了七篇答辩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我们仍然留有余地，没有对苏共领导进行公开指名的批评。

虽然由于苏共领导的过错，中苏关系已经处于严重恶化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仍然同意派代表团到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并且为了在会谈中系统地交换意见，在六月十四日答复苏共中央的信件中，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后来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不但对消除分歧、加强团结毫无诚意，而且利用中苏两党会谈作为掩护他们进一步恶化中苏关系的烟幕。

在中苏两党会谈前夕，苏共领导采取发表声明和通过决议的方式，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同时，还无理驱逐中国驻苏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和研究生。

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七月十四日，也就是美英苏三国会谈前夕，苏共领导迫不及待地发表苏共中央致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国共产党大肆攻击。这又是苏共领导讨好美帝国主义者，给美帝国主义者的一份“珍贵的”见面礼。

紧接着，苏共领导公然出卖苏联人民的利益，出卖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包括中国人民的利益，出卖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同美英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部分停止核试验的条约；苏印间进行频繁的接触；赫鲁晓夫到南斯拉夫“休假”；苏联报刊上开展了一个疯狂的反华运动……一系列的事件，突出地表明了苏共领导不顾一切地联合帝国主义，联合各国反动派，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这是苏共领导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大暴露。

目前，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反华大合唱”甚嚣尘上。赫鲁晓夫领导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运动，正在日甚一日地继续进行中。

七年来的事实说明了什么？

我们在上面详细地回顾了分歧的由来和分歧的发展，目的是为了澄清被苏共中央公开信所歪曲的事实，使我们的党员和我国人民，也使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了解真相。

七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在中苏两党之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歧的产生完全是由于苏共领导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一条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路线。苏共领导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的过程，也就是分歧的发展和加剧的过程。

七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

义路线，同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分歧。这是坚持革命路线，同坚持不革命、反对革命的路线的分歧。这是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路线，同坚持向帝国主义投降的路线的分歧。这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坚持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分歧。

七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苏共领导所走的道路，是一条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联合美国、反对中国，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世界人民，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道路。苏共领导的这条错误路线，已经在国际范围内使修正主义思潮泛滥，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空前严重的分裂危险，使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受到严重的损害。

七年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了阻止事态的恶化，为了坚持原则、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作了一系列的努力。我们是非常克制的，是仁至义尽的。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中苏两党、两国团结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对于伟大列宁所缔造的苏联共产党一向是尊重的。我们对于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从来抱着深厚的无产阶级的感情。对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取得的成就，我们总是感到高兴；对于苏共领导危害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错误，我们总是感到难过。

中国共产党人发现苏共领导的错误，不自今日始。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我们就忧虑地注视着苏共领导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

面对这种严重的情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党曾经几十次地反复地考虑：怎么办？

我们曾经设想，可以不可以跟着苏共领导走，一切照他们的意见办？当然，这样做，苏共领导会高兴，但是我们自己岂不是也变成修正主义者了吗？

我们也曾经设想，可以不可以对苏共领导的错误保持沉默？我们认为，苏共领导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个别的、无关宏旨的，而是一系列原则性的错误，危害着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对于苏共领导这样的错误，我们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一员，怎么能够无动于衷，缄默不言呢？如果我们那样做，岂不是放弃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责任吗？

我们也考虑到，我们批评苏共领导的错误，势必遭到他们报复性的打击，这就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害。但是，共产党人难道可以采取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因为害怕报复性的打击就不敢坚持真理吗？共产党人难道可以拿原则做交易吗？

我们还考虑到，苏共是列宁缔造的党，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全世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对他们进行批评，特别慎重，特别耐心，尽一切可能约束在中苏两党领导人内部会谈的范围内，尽一切可能使分歧能够通过内部的讨论得到解决，而不要公开进行论战。

但是，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在几十次内部会谈中对苏共领导的同志式的批评和劝告，都没有能够使他们迷途知返。他们在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苏共领导对我们的好意规劝的报答，是对我们施加了一系列的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压力，是对我们发动越来越粗暴的攻击。

苏共领导有一个坏习惯：谁批评他们，就给谁乱扣帽子。

他们说：“你们反苏！”不对。朋友们，“反苏”的帽子戴不到我们头上。我们批评你们的错误，正是为了维护伟大的苏共和伟大的苏联，正是为了使苏共和苏联的威信不致被你们糟蹋得不成样子。老实说，真正反苏的，败坏苏共和苏联的，给苏共和苏联抹黑的，是你们而不是我们。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开始，你们就一直不断地、无数次地干着这样的坏事。你们倾伏尔加河之水，也无法洗刷你们给苏共和苏联带来的耻辱。

他们说：“你们争领导权！”不对。朋友们，你们这种诽谤实在太不高明了。按照你们的说法，好像有人在同你们争夺什么“领导权”。这不是等于大言不惭地宣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存在什么“领导权”，而这个“领导权”是在你们手中吗？你们这样以老子党自居，是一个很坏很坏的习惯。这是完全非法的。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明确规定，各国共产党是独立的、平等的。根据这个原则，兄弟党之间根本不应当有领导党和被领导党的关系，更不应当有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关系。我们从来反对任何一个党指挥其他兄弟党，也从来没有想过由自己来指挥其他兄弟党，根本谈不上什么争夺领导权的问题。现在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不是由这一个党或那一个党来领导的问题，而是究竟要听从修正主义的指挥棒，还是坚持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的问题。我们批评苏共领导的，正是他们企图凌驾于兄弟党之上，把自己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强加给兄弟党。我们所要求的，只是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独立的、平等的地位，只是各国兄弟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是由苏共领导一手挑动和扩大起来的，是由他们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既然苏共领导对我们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不择手段地对我们进行种种诬蔑，既然苏共领导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开撕毁宣言和声明，那么，他们就不能指望我们不答辩，不辟谣，不保卫宣言和声明，不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战已经开始，就必须把是非彻彻底底地弄清楚。

中国共产党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当我们同苏共领导论战的时候，我们仍然希望苏共领导能够看到，你们不要革命，不要全世界革命人民，不要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一心一意同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叛徒铁托集团合作，这是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

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全世界人民的利益，都要求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我们愿意在这里再一次呼吁苏共领导改正错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

级国际主义的轨道上来，回到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轨道上来。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一个重要的时期。目前的论战，关系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历史将会证明，经过这场大论战，马克思列宁主义将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将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原载人民日报 1963-09-06

关于斯大林问题

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们同苏共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指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违反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的,是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对我们提出的原则性的论据,避而不答,只是给中国共产党人扣上了什么“个人迷信维护者和斯大林错误思想的传播者”的帽子。

列宁在反对孟什维克的时候说过:“不回答论敌的原则性的论据,硬给论敌扣上‘激动’的帽子,这不是争论,而是谩骂”。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态度同孟什维克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

尽管苏共中央公开信用谩骂来代替争论,我们却要用原则性的论据,用大量的事实,来回答苏共中央公开信。

伟大的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起初是列宁,在列宁逝世以后,是斯大林。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他不仅是苏联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认的领袖。

从十月革命开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到现在只有四十六年。斯大林作为这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近三十年之久。无论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说,或者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说,斯大林一生的活动,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怎样认识和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不只是对斯大林的个人

评价问题，更重要的是，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问题，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问题。

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问题，事前不同兄弟党商量，事后又要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如果谁对斯大林的评价和苏共领导不同，谁就不仅被认为是“维护个人迷信”，而且是“干涉”苏共的内部事务。可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历史经验的国际意义，不能否认斯大林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的这一历史事实，因而也就不能否认，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是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的重大原则问题。苏共领导人有什么理由禁止其他兄弟党对斯大林提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呢？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而不应当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任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主观地、粗暴地全盘否定斯大林。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斯大林是有过一些错误的。这些错误，有思想认识的根源，也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如果站在正确的立场，采取正确的方法，批判斯大林确实犯过的错误，而不是凭空加给他的所谓错误，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历来反对采取错误的立场、错误的方法，对斯大林进行不正确的批评。

斯大林，当列宁在世的时候，他曾经为反对沙皇制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斗争；在参加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领导以后，曾经为准备一九一七年革命进行了斗争；在十月革命以后，曾经为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进行了斗争。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同国内外的一切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了并且巩固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斯大林，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国内坚持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斯大林，他领导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斯大林，他在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斯大林，他的一系列理论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斯大林，他领导的苏联党和政府，从总的方面来说，实行了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包括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了巨大的援助。

斯大林，他站在历史潮流的最前面指导斗争，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斯大林的活动，是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分不开的。

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

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为苏联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功勋的同时，也的确犯了一些错误。斯大林的错误，有些是原则性的错误，有些是具体工作中的错误；有些是可以避免的错误，有些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错误。

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问题上，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因而有时脱离了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他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曾经造成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他在党和国家组织中，没有充分地实行或者部分地违反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他在处理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方面，也犯过一些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也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这些错误，给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一些损失。

斯大林一生的功绩和错误，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斯大林的功绩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每一个正直的、尊重历史的共产党人，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时候，一定会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因此，在正确地认识、批判和克服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必须保卫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保卫他所捍卫过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列宁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有些虽然犯过错误但仍不失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倍倍尔、卢森堡等人所采取的态度，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完全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掩饰倍倍尔、卢森堡等人的错误，而是通过他们的错误例子，“学会避免这些错误，应当符合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更严格的要求”。与此相反，修正主义者对倍倍尔、卢森堡的错误，只是“幸灾乐祸”、“欢喜若狂”。为此，列宁引用了俄国的一个寓言讽刺修正主义者说，“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倍倍尔、卢森堡是“伟大的共产党人”，虽然他们犯过错误，但他们始终是“鹰”，而修正主义者，则是“工人运动后院粪堆里”的一群“鸡”。

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

当更加慎重些。

苏共领导人指责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辩护”。是的，我们是要为斯大林辩护。在赫鲁晓夫歪曲历史、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情况下，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地要起来为斯大林辩护。

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辩护，是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辩护，是为十月革命创造出来的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光荣斗争历史辩护，是为苏联共产党的光荣斗争历史辩护，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劳动人民中的声誉辩护。一句话，是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辩护。不仅中国共产党人要这样做，一切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一切坚决革命的人，一切正直的人，也都已经或者正在这样做。

我们为斯大林辩护，并不是为他的错误辩护。对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中国共产党人是早有切身体会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犯过“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这些错误，从国际方面的原因来说，有几次就是在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下产生的。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

但是，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主张，是被某些中国同志所接受和实行的，中国人自己应当负责，所以我们党进行的反对“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从来只限于批评我们自己的犯了错误的那些同志，而没有把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我们进行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分清是非，接受教训，推进革命事业。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们不改，也可以等待他们在实践经验中逐步觉悟过来，只要他们不组织秘密集团，暗中进行破坏活动。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常方法，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们认为，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所以应当采取这样的方法来处理。

赫鲁晓夫同志和苏共其他某些领导人，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对斯大林采取了一种什么态度呢？

他们不是对斯大林一生的活动进行历史的、科学的全面分析，而是不分是非，全盘否定；

他们不是用对待同志的态度对待斯大林，而是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斯大林；

他们不是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总结经验教训，而是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斯大林身上，或者把任意编造的所谓“错误”硬栽到斯大林身上；

他们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用煽动的、蛊惑人心的语言，对斯大林进行人身攻击。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强盗”、“赌棍”、“伊凡雷帝式的暴君”、

“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等等。当我们不得不列举这些污秽的、下流的恶言毒语的时候，我们实在担心弄脏自己的纸笔。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这岂不是等于说，苏联人民在长达三十年之久的一段时期内，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而是在“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的“暴政”下生活的吗？伟大的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这岂不是等于说，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三十年内向全世界人民提供的经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而是在封建主义“暴君”统治下的经验吗？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人、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强盗”。这岂不是等于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在一个长时期内，是以一个“强盗”为首的国家吗？伟大的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混蛋”。这岂不是等于说，在过去几十年中进行着英勇革命斗争的苏联共产党曾经是以一个“混蛋”为其领袖的政党吗？苏联共产党人和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白痴”。这岂不是等于说，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苏联军队，曾经是以一个“白痴”为其最高统帅的军队吗？光荣的苏军将士和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的战士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凶手”。这岂不是等于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几十年内竟然把“凶手”作为自己的导师吗？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包括苏联共产党人在内，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赌棍”。这岂不是等于说，各国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中，曾经是以一个“赌棍”作为自己的旗手吗？全世界各国革命人民，包括苏联人民在内，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这样咒骂斯大林，是对伟大的苏联人民的莫大污辱，是对苏联共产党的莫大污辱，是对苏联军队的莫大污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莫大污辱，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莫大污辱，是对全世界革命人民的莫大污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莫大污辱。

在斯大林领导时期也曾参与党和国家的领导的赫鲁晓夫，现在这样捶胸拍案、声嘶力竭地咒骂斯大林，究竟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呢？是把自己放在“凶手”、“强盗”的同谋者的地位上呢？还是放在“混蛋”、“白痴”一类人的地位上呢？

赫鲁晓夫这样咒骂斯大林，同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共产主义的叛徒对斯大林的咒骂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对斯大林有这么深的刻骨的仇恨呢？为什么要采取比对待敌人更加凶恶的态度来攻击他呢？

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实际上是疯狂地反对苏维埃制度，反对苏维埃国家。在

这方面，他所使用的语言，比起考茨基、托洛茨基、铁托和德热拉斯等叛徒，都毫无逊色，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人们正是应当用苏共中央公开信中的一段话来质问赫鲁晓夫：“对伟大列宁的党，对社会主义的祖国，对在世界上首先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同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的极残酷搏斗中捍卫了它的伟大成果、在建设共产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出英雄气魄和忘我精神的奇迹、对全世界劳动人民诚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国际义务的人民，怎么能说得出这种话”！

列宁在《谩骂的政治意义》一文中说：“政治上的谩骂往往掩盖着谩骂者的毫无思想原则、束手无策、软弱无力、恼人的软弱无力。”那些时时刻刻都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在威胁着他们的苏共领导人，不就是用谩骂斯大林来掩盖自己的毫无原则、束手无策和恼人的软弱无力吗？

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

特别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苏共领导人在百般咒骂斯大林的同时，却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之流“表示尊重和信任”！咒骂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却恭维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得到绝大多数美国人民的支持”！咒骂斯大林是“白痴”，却歌颂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明智”！一面对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口诛笔伐，一面对帝国主义的头子颂扬备至，这种现象难道是偶然地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然逻辑吗？

赫鲁晓夫如果不健忘，就应该记得，正是他自己，一九三七年一月在莫斯科召集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曾经正确地谴责那些攻击斯大林的人说：“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我们全体，攻击工人阶级，攻击劳动人民！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正是他自己，多次地歌颂斯大林是“伟大列宁的亲密朋友和战友”，“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伟大的常胜元帅”，“人民真诚的朋友”，“自己生身的父亲”。

人们如果把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讲的话，同他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讲的话对照一下，就会看到，他对斯大林的评价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赫鲁晓夫如果不健忘，当然应该记得，在斯大林领导时期，正是他自己，特别积极地支持和执行当时的肃反政策。

赫鲁晓夫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莫斯科州第五次党代表会议上说：“我们党一定毫不留情地粉碎叛徒匪帮，把整个托洛茨基——右派集团从地面上消除掉。……

这一点的保证就是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坚定领导，我们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坚定领导。……我们将一个也不留地全部消灭敌人，要焚尸扬灰。”

赫鲁晓夫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八日基辅州第四次党代表会议上说：“雅基尔分子、巴利茨基分子、柳比奇分子、查东斯基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想把波兰地主引进乌克兰来，想把德国法西斯分子、地主和资本家引到这里来。……我们消灭了相当多的敌人，但还没有消灭所有的敌人。因此必须提高警惕。我们应当牢牢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敌人就会派遣间谍和破坏分子到我们这里来。”

在斯大林领导时期，曾经参与了党和国家的领导的赫鲁晓夫，曾经积极支持和坚决执行了当时肃反政策的赫鲁晓夫，为什么把斯大林领导时期的一切都全盘否定，并且把一切错误都推给斯大林一人，而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呢？

斯大林做错了事，是能够做自我批评的。例如，他对中国革命曾经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对于清党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斯大林在一九三九年联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是承认了的。而赫鲁晓夫呢？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自我批评，他只知道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

赫鲁晓夫的这些丑恶的行为，发生在现代修正主义泛滥的时期，并不奇怪。正如列宁在一九一五年批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时所说：“在讲过的话可以忘记、原则性可以丧失、世界观可以抛弃、决议和庄严的诺言可以扔到一边的今天，发生这种事情是不足为奇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一系列事件充分证明，由于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已经招致了何等严重的恶果。

全盘否定斯大林，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反苏反共的弹药。就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帝国主义利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反苏、反共的浪潮。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铁托集团和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者，都乘机向苏联进攻，向社会主义阵营进攻，向各国共产党进攻，使许多兄弟党、兄弟国家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

苏共领导反斯大林的狂热运动，使早已成为政治僵尸的托洛茨基分子死灰复燃，叫嚣要为托洛茨基“恢复名誉”。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闭幕的时候，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所谓第四国际的国际书记处，在《致苏共二十二大及新的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说，托洛茨基在一九三七年就说过，将来要“为受斯大林陷害者树立纪念碑”，“今天这一预言实现了。在你们的代表大会上，你们党的第一书记作了诺言将树立这个纪念碑。”这封信特别要求把托洛茨基的名字“用金字刻在为受斯大林陷害者树立的纪念碑上”。托洛茨基分子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喜悦，他们认为，苏共领导的反斯大林运动，“为托洛茨基主义打开了门户”，“将大大有利于托洛茨基主义及其组织——第四国际的进展”。

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斯大林是在一九五三年逝世的，三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大反斯大林；八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又一次大反斯大林，并且搬尸焚尸。苏共领导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反斯大林，是为了扫除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中不可磨灭的影响，也是为了否定斯大林曾经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他们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开辟道路。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正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形成完整体系的。事情越来越清楚地证明，苏共领导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等等，都是同他们全盘否定斯大林分不开的。

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进行的。

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并不是像他们自己所宣扬的那样，要恢复什么“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和领导原则”。而是恰恰相反，违背了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要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就必须正确地处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这样的党，要求有一个比较稳固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要由一批久经考验的、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领袖们组成。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不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还是地方委员会委员，是在阶级斗争中、在群众的革命运动中产生的，是对群众忠心耿耿，同群众有血肉联系的，是善于把群众的意见正确地集中起来和坚持下去的。这样的领袖，是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这样的领袖，是群众公认的。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这样的领袖，是这个党在政治上成熟的表现，是无产阶级事业胜利的希望。

列宁说得完全正确：“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能取得统治地位。”他又说：“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领袖，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学说，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说，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我们历来坚持集体领导，但是反对贬低领袖的作用。我们重视领袖的作用，但是反对对个人进行不符合实际的过分颂扬，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早在一九四九年，中共中央就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

我们这些一贯的、正确的主张，同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根本不同的。

事情越来越清楚,苏共领导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并不是像他们自己所说的,是为了什么发扬民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而完全是别有用心。

苏共领导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揭穿来说,无非是:

一、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把党的领袖斯大林同党的组织、同无产阶级、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

二、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

三、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抬高自己,打击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者,为修正主义的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开辟道路;

四、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力图按着自己的意愿颠覆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领导;

五、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打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赫鲁晓夫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这种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他们“在揭露个人迷信并克服其后果的同时”,“高度评价”那些“享有应得的威望的活动家”。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苏共领导在把斯大林踩在脚下的同时,却把赫鲁晓夫捧到天上。

他们把十月革命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赫鲁晓夫,把这个在国内战争时期的低级政治工作人员,吹捧成“红军的积极缔造者”。

他们把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的巨大功绩完全归功于赫鲁晓夫,说什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十分经常地听到赫鲁晓夫的声音”,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格勒人的灵魂”。

他们把核武器和火箭技术的伟大成就,完全归功于赫鲁晓夫,说他是什么“宇宙之父”。但是,谁都知道,苏联造成原子弹和氢弹,都是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科学技术人员和苏联人民的伟大成就。火箭技术也是在斯大林领导时期奠定基础的。怎么能够把这些重要历史事实一笔抹煞呢?怎么能够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赫鲁晓夫呢?

他们把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并且认为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的赫鲁晓夫,吹捧为“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光辉范例”。

苏共领导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口号的掩饰下所作的这些事情,正如列宁所说,实际上是“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

苏共中央公开信把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诬蔑为“企图把个人迷信时期盛行的那些制度、意识形态和道德以及领导的方式方法强加给其他党”。这种说

法，进一步地暴露了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荒诞无稽。

按照苏共领导人的说法，苏联在十月革命结束了俄国资本主义时期以后，又出现了一个所谓“个人迷信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道德”，似乎不是社会主义的。在这个时期里，苏联劳动人民遭受了“沉重压迫”，笼罩着“毒化人民生活的恐惧、怀疑和徬徨的气氛”，苏联社会的发展遭受了阻碍。

赫鲁晓夫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在苏匈友好大会上的讲话中大讲什么斯大林的“恐怖”统治，说斯大林“是用斧头维持自己的政权的”。他描绘当时的社会秩序说，“在那个时期，当一个人去上班的时候，常常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妻子，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儿女。”

苏共领导所说的“个人迷信时期”，简直是一种比封建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时期还要“可恶”、还要“野蛮”的社会。

按照苏共领导的说法，由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几十年来，并没有解除了劳动人民所受的压迫，并没有加速了苏联社会的发展。只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进行了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以后，才解除了劳动人民所受的“沉重压迫”，才突然“加速了苏联社会的发展”。

赫鲁晓夫说：“唉呀！斯大林如果早死十年，那多好啊！”人们知道，斯大林是一九五三年逝世的，如果早死十年，那正是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反攻的一九四三年。在那个时候，盼望斯大林死去的是谁呢？希特勒！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之类的口号，诽谤无产阶级领袖、破坏无产阶级事业的勾当，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玩艺，而是早已被人识破的卑鄙伎俩。

第一国际时代的阴谋家巴枯宁，曾经用这类口号咒骂过马克思。起初，这个阴谋家为了骗取马克思对他的信任，曾经写信给马克思说：“我是你的学生，而且我是以此为荣的”。后来，当他篡夺第一国际领导权的阴谋失败之后，就咒骂马克思说：“作为一个德国人和犹太人，他从头顶到脚跟是一个权威主义者”，是一个“独裁者”。

第二国际时代的叛徒考茨基，也曾经用这类口号咒骂过列宁。考茨基诽谤列宁“像一神教的神一样”，说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不仅仅降到了一个国教的地位，而且是降到了中世纪或者东方迷信的地位”。

第三国际时代的叛徒托洛茨基，也同样用这类口号咒骂斯大林。他说，斯大林是“专制君主”，“斯大林官僚创造了卑鄙的领袖崇拜，给领袖加上了神圣的品质”。

现代修正主义的铁托集团，也利用这类口号来咒骂斯大林，说斯大林是“个人极权制度中”的“独裁者”。

可见，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从巴枯宁、考茨基、托洛茨基、铁托一脉相传下来的，是他们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领袖，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机会主义者们用诋毁否定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赫鲁晓夫用诋毁也否定不了斯大林。

列宁指出，特权地位并不能保证诋毁得到成功。

赫鲁晓夫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搬走，但是要想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把斯大林的伟大形象从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搬走，那是永远不会成功的。

赫鲁晓夫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这样或那样的篡改，但是要想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把斯大林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捍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打倒，那是永远不会成功的。

我们劝告赫鲁晓夫同志一句诚恳的话，希望你迷途知返，从完全错误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革命学说万岁！

原载人民日报 1963-09-13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这个问题，不仅是判断南斯拉夫国家的性质的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是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沿着南斯拉夫的道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问题，也关系到究竟怎样认识铁托集团，它是兄弟党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对于这个问题，苏共领导同我们，同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存在着根本分歧。

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南斯拉夫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南斯拉夫人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苏共领导却认为，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是兄弟党的一员，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就宣称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宣布铁托集团是什么“执掌国家领导权的兄弟党”。

赫鲁晓夫同志最近访问南斯拉夫，发表了许多讲话，把过去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遮羞布丢得精光，他们的真实观点暴露得更清楚了。

在赫鲁晓夫看来，原来南斯拉夫不仅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是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不是“空谈革命”，而是“具体建设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发展”是“对总的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具体贡献”，很值得赫鲁晓夫羡慕和学习。

在赫鲁晓夫看来，原来苏共领导同铁托集团“不仅仅是阶级兄弟”，而且是“由我们所面临的一致目的而联系起来的兄弟”。苏共领导是铁托集团的“可靠的和忠实的同盟者”。

在赫鲁晓夫看来，原来他从铁托集团那里找到了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什么“苏共和南共联盟之间在若干原则性的意识形态问题上依然

存在着分歧”，不过是装模作样。现在赫鲁晓夫对铁托集团说，“我们属于同一个思想，以同一个理论为指南”，都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

赫鲁晓夫早已把一九六〇年声明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声明说：“各国共产党一致谴责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现”。

声明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

声明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依赖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所谓‘援助’，从而使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斗争所取得的革命成果有失去的危险。”

声明说：“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 and 国家的团结的活动”。

声明说得这样清清楚楚，而苏共领导竟然说：“根据一九六〇年声明，我们认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真亏他们说出口！

请问：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在国际机会主义的变种——现代修正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 and 国家的团结的活动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花了几十亿美元豢养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这真是闻所未闻的咄咄怪事！

看起来，陶里亚蒂同志要比赫鲁晓夫同志说得明白一点。陶里亚蒂干脆说，一九六〇年声明对铁托集团所采取的立场是“不正确的”。赫鲁晓夫既然一心一意要为铁托集团翻案，就应该坦白一点，大可不必假心假意、装作维护声明的样子。

声明关于南斯拉夫问题所做的结论，究竟错了没有，该不该推翻呢？陶里亚蒂说：做错了，应该推翻。赫鲁晓夫实际上也是说：做错了，应该推翻。我们说：没有错，绝对不能推翻。一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一九六〇年声明的兄弟党，也都说：没有错，绝对不能推翻。

苏共领导认为，我们这样做，就是坚持“死板的公式”，坚持“资本主义世界的野兽的法律”，是要“把南斯拉夫‘革除’出社会主义”。他们还认为，谁要说南斯

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谁就是“不顾事实”，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而他们闭着眼睛硬说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倒是

“从客观规律、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出发”，“对实际情况进行深刻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从客观规律、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出发，对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刻的分析，究竟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南斯拉夫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

赫鲁晓夫断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据之一是，南斯拉夫没有私人资本，没有私人企业，没有资本家。

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不。

事实是，南斯拉夫的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是大量存在着，而且在迅速发展。

根据社会主义各国的一般情况，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中，国民经济中存在着多种经济成份，存在着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份，这种现象并不奇怪。问题在于，国家政权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消灭的政策，还是采取放纵、扶植和鼓励的政策。这是判断这个国家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根据。

铁托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是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在战后初期南斯拉夫曾经一度实行过的社会改革，本来就是不彻底的。在铁托集团公开叛变以后，他们所采取的政策，不是改造和消灭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而是培植和发展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

一九五三年，铁托集团公布条例，规定“合伙的公民”有权“创办企业”，“雇用劳动力”。同年，铁托集团公布法令，规定私人有权购买国家经济组织的固定资产。

一九五六年，铁托集团从税收政策等方面，鼓励地方政权扶植私人资本。

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规定，私人有购买外汇的权利。

一九六三年，铁托集团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又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下来。这个宪法规定，在南斯拉夫，私人可以创办企业，可以雇用劳动力。

在铁托集团扶植下，南斯拉夫的城市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像雨后春笋似地发展起来。

据贝尔格莱德官方出版的《一九六三年南斯拉夫统计手册》的材料，南斯拉夫的私人“手工业”已有十一万五千多家。实际上，许多私人企业主并不是什么“手工业者”，而是典型的私人资本家。

铁托集团承认，虽然按照法令，私有者有权最多雇用五名工人，但是有些私有

者雇用的工人却高出十倍以至二十倍以上,有的甚至雇用“五百个到六百个工人”。^[59]有些私人企业每年的流通额,达到一亿第纳尔以上。^[60]

南斯拉夫《政治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七日透露说,这些私人企业主往往还是“大企业主”。“这些私人企业主的网散布得多广,他们拥有多少工人,是很难确定的。按照法律,他们有权雇用五个工人帮助他们工作。但是据熟悉内情的人说,这五个人其实是五个包工头,而这些工头又有一些‘低一级的工头’”。“这些包工头往往是一些不再劳动而只是下命令、订计划,坐着汽车从一个企业到另一个企业并签订合同的人”。

从私人企业主获得的利润,也可以看出他们确实是不折不扣的资本家。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八日南斯拉夫《世界报》说,“某些私人手工业者每月的纯收入达到一百万第纳尔”。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贝尔格莱德《新闻晚报》说,贝尔格莱德有“一百一十六家私人企业主在去年都获得了超过一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有的企业主在一年内“得到了约七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按照官价汇率折算,近十万美元。

在南斯拉夫的城市中,不但有私人工业企业,私人服务企业,私人商业,私人房地产业,私人运输业,而且还有被称为“私人银行家”的高利贷者。这些高利贷者公开活动,甚至在报纸上刊登这样的广告:“出借三十万第纳尔,三个月为期,归还四十万第纳尔,需要抵押品。”^[61]

所有这些,都是无可置辩的事实。

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说南斯拉夫没有私人资本,没有私人企业,没有资本家呢?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农村的泛滥

我们再来看一看南斯拉夫农村的情况吧。

是不是像赫鲁晓夫所说的那样,在那里也已经没有资本家了呢?

不,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南斯拉夫资本主义的泛滥,在农村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个体经济,小生产者经济,每时每何地产生资本主义,只有实行农业集体化,才能把农业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斯大林曾经指出,“列宁说,只要产生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的个体农民经济在国内还占优势,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会存在。显然,只要这种危险还存在,就不能真正地来谈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的胜利”。(《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七页。)

铁托集团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同社会主义完全背道而驰的路线。

[59] 托多罗维奇:《两条战线的斗争》。见南斯拉夫《我们的实况》杂志,一九五四年三月号。

[60]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八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七百五十第纳尔合一美元,三百零三第纳尔约合一元人民币。

[61]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六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

本来，南斯拉夫在战后初期曾经实行过土地改革，也组织过一批农民劳动合作社，但是基本上没有触动富农经济。

从一九五一年起，铁托集团就公开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开始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这是铁托集团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严重步骤。到一九五三年底，这种合作社由一九五〇年的六千九百多个，缩减到一千二百多个。一九六〇年，又缩减到一百四十七个。南斯拉夫的农村，是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

铁托集团公开说，集体化在南斯拉夫是行不通的。他们恶毒地咒骂“集体化和剥夺是一回事”，^[62]集体化是一条“最长久地保持农奴制和农民的贫困”的道路。^[63]他们还荒谬地主张把农业的发展“建立在各种经济力量自由竞赛的基础上”。^[64]

铁托集团在解散大批农民劳动合作社的同时，从一九五三年开始，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鼓励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这种政策之下，农村资本主义势力迅速泛滥，农村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这是铁托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方面。

农村的两极分化，首先表现在土地占有情况的变化。南斯拉夫前农林秘书科马尔承认：一九五九年，在农村中，占地五公顷以下的贫苦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他们拥有的耕地，只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三；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富裕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三，他们拥有的耕地，却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科马尔还承认，每年进行土地买卖的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十左右。^[65]出卖土地的农户，多数是贫苦农户。

土地集中的实际情况，比上面的材料要严重得多。据铁托集团的喉舌《战斗报》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透露：在一个县，就有“成千农户拥有大大超过法定最高限额十公顷的土地”。在比耶利纳区，“发现有五百家农户拥有十公顷到三十公顷的田产”。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

农村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耕畜和农具占有的悬殊。在主要产粮区的伏伊沃丁那省的三十万八千农户中，有百分之五十五没有耕畜。拥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占这个地区总农户的百分之四十点七，但他们的耕犁只占耕犁总数的百分之四点四，平均每二十户才有一张犁。这个地区的富裕农民，不仅拥有大量耕犁和畜力车，还有一千三百多台拖拉机和大量的其他农业机器。^[66]

农村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雇佣劳动制和其他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的发展。

一九五八年二月七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透露，一九五六年，塞尔维

[62] 卡德尔：一九五九年五月五日在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四届九中全会上的开幕词。

[63] 巴卡里奇：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64] 卡德尔：《关于我国农村政策的若干问题》。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杂志，一九五四年第四期。

[65] 科马尔：《农村和农户的若干问题》。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杂志，一九六二年第五期。南斯拉夫农林秘书相当于农林部长。

[66] 南斯拉夫《指数》杂志，一九六二年第二期。

亚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农户，有百分之五十二使用了雇佣劳动。

一九六二年科马尔说：有些农户的主人近年来“在强大起来，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是靠如下的活动获得收入：非法经商，不仅加工自己的产品、而且加工别人的产品，酿私酒，通过买地或者经常是租地、假分家、侵占或隐匿公有土地等办法，占有超过最高限额十公顷的农地，用各种投机办法购买拖拉机，通过代耕剥削邻近的贫苦农民”。^[67]

一九六二年八月三十日《战斗报》说：“所谓善良的生产者”，“是租种他人土地、雇用劳动力的人，是有经验的商人”。“这些人不是生产者，而是企业主。他们中间有些人整年都不拿锄头。他们雇用劳动力，而自己只是巡视田间，做做生意。”

在南斯拉夫农村中，高利贷者的活动也十分猖獗，其利息往往在百分之百以上。此外，还有所谓劳动力包买主，利用失业者的困境，从事中间剥削。

大批丧失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据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日的《政治报》的材料，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全国只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的货币收入，大约有百分之七十是靠出卖劳动力获得的。他们遭受重重剥削，过着悲惨的生活。

事实说明，在南斯拉夫在农村中，剥削阶级占据着统治的地位。

苏共中央公开信在辩护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说，南斯拉夫农村的“社会主义成份”已经从百分之六增加到百分之十五。

可惜的是，就连这些可怜的百分比，也并不是社会主义成份。

苏共领导所说的百分之十五的“社会主义成份”，无非是指铁托集团所推行的“农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等农业组织。然而，所谓“农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农场。所谓“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实质上是一种主要从事商业活动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它不但不触动土地私有制，而且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扶植富农经济的发展。

贝尔格莱德出版的《南斯拉夫农业问题》一书中说：从合作社“今天的情况和它们所起的作用来看，它们丝毫不意味着农业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其说它们的作用是在建立农村的社会主义据点，不如说在发展和帮助资本主义因素。有这种情况，这些合作社是富农分子的联合”。

铁托集团给予“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向农民收购农产品的垄断权。这种所谓“合作社”在它的商业活动中，凭借这种特权，利用农产品价格自由涨落的条件，大做投机生意，剥削农民。一九五八年南斯拉夫农业减产，“合作社”和其他商业机构就趁机哄抬农产品的销售价格。一九五九年的农业收成有所增加，“合作社”就破坏同农民签订的收购合同，减少收购数量，不惜让农产品烂在地里。

“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和“农场”，大量雇用长期的和临时的工人，进行剥削。据一九六二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的材料，一九六一年，仅仅各种“合

[67] 科马尔：《农村和农户的若干问题》。

作社”雇用的固定工人，就有十万多名。此外，还有大量的临时工人。据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南斯拉夫《劳动报》透露，雇佣工人“经常受到最粗暴的剥削（劳动日长达十五小时），他们的个人收入通常是十分低微的”。

由此可见，这些所谓“社会主义成份”的农业组织，都不过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组织。

剥夺贫苦农民，发展资本主义农场，这是铁托集团在农业方面的基本政策。铁托在一九五五年就说过：“我们并不放弃在南斯拉夫有一天将以某种方式把小农庄合并起来……。在美国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九五九年，铁托集团制定了“农地使用法”，个体农民如果不能按照规定的条件使用土地，就由“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或“农场”对他们的土地实行“强制管理”。这实际上是用剥夺贫苦农民，强制兼并土地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农场。这是道道地地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

斯大林在谈到小农经济向大的农业经济过渡的时候说：“这里有两条道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向前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向后退到资本主义的道路”。

除了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外，还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呢？斯大林说：“所谓第三条道路，其实就是第二条道路，就是回到资本主义去的道路”。“因为：回到个体经济去和恢复富农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恢复富农盘剥，恢复富农对农民的剥削，使富农有权势。但是，能不能恢复富农而同时又保持苏维埃政权呢？不，不能。恢复富农的结果必然是成立富农政权而取消苏维埃政权，因而，必然是成立资产阶级政府。成立资产阶级政府的结果又必然是恢复地主和资本家，恢复资本主义。”（《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二百一十七页。）

十几年来南斯拉夫农业的道路，正是这样一条恢复资本主义的道路。

所有这些，都是无可置辩的事实。

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说南斯拉夫没有资本家呢？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

南斯拉夫资本主义的复辟，不仅仅表现在城市私人资本主义和农村资本主义的泛滥。更重要的是，在南斯拉夫经济中占决定性地位的“国营”企业，已经蜕化变质了。

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的经济，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铁托集团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些“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资料，不是归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私人资本家所有，而实际上是归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包括官僚、经理在内的南斯拉夫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有。这个官

僚买办资产阶级，盗用了国家的名义，依附美帝国主义，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霸占了原来属于劳动人民的财产。所谓“工人自治”制度，实际上是处于官僚买办资本统治之下的一种残酷的剥削制度。

从一九五〇年起，铁托集团就公布一系列法令，规定工厂、矿山、交通运输、贸易、农业、林业、公用事业等所有国营企业，都实行所谓“工人自治”。这种所谓“工人自治”的主要内容就是把企业交给所谓“劳动集体”自行管理，由各企业自己采购原料，决定产品的品种、产量和价格，自己到市场上推销产品，自己决定工资，自己决定一部分利润的分配。南斯拉夫法令还规定，企业有权自行买卖和租赁固定资产。

铁托集团把所谓“工人自治”企业的所有制，叫做是什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更高形式”。他们说，只有实行“工人自治”，才是“真正地建设社会主义”。

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从理论上说，稍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工人自治”、“工厂归工人”这一类口号，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口号，而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老机会主义者、老修正主义者的口号。

所谓“工人自治”、“工厂归工人”的“理论”，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这一类“理论”，也早已被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驳得体无完肤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首先把生产资料转化为国有财产”。

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把生产资料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手中。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在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的初期，当有人主张把工厂交给“生产者”直接“组织生产”的时候，列宁曾经严厉地批评这种主张，指出这种主张的实质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直接或间接地把个别工厂或个别行业的工人对他们各自的生产的所有权合法化、或者把他们削弱或阻挠执行全国政权的命令的权利合法化的做法，都是对苏维埃政权基本原则的极大歪曲和完全放弃社会主义。”（列宁：《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性质》）

可见，所谓“工人自治”根本不是社会主义。

其实，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也并不是真的让工人来“自治”，而是一个骗人的幌子。

实行“工人自治”的企业，实际上是掌握在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手中。铁托集团控制了企业的财权和人权，拿走了企业收入的绝大部分。

铁托集团通过银行控制全国的信贷，控制各企业的投资基金和流动资金，监督

各企业的财务。

铁托集团通过税收和利息等渠道，攫取各企业的收入。据《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一九六一年工作报告》的材料计算，他们用这种方式，拿走了企业的纯收入的四分之三左右。

铁托集团掠夺人民的劳动果实，主要是用于他们这个官僚集团的挥霍，用于维持它们的反动统治，用于加强对劳动人民的镇压机器，用于通过归还外债和支付外债利息的形式向帝国主义交纳贡款。

铁托集团还通过经理来控制企业。这些企业的经理，名义上由企业招聘，实际上是铁托集团任命的。他们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这些企业的代理人。

在这些所谓“工人自治”的企业内部，经理同工人的关系实际上是雇佣同被雇佣、剥削同被剥削的关系。

实际情况是，经理有权决定企业的生产计划和经营方向，有权处理生产资料，有权决定企业收入的分配，有权招收工人和解雇工人，并且有权否决“工人委员会”或“管理委员会”的决议。

南斯拉夫报刊反映的大量材料证明，“工人委员会”只是一个徒具形式的“举手机器”，企业的“一切权力都操在经理手中”。

由于经理掌握和支配生产资料，并且掌握和支配企业收入的分配，这就使他们可以利用种种特权，侵占工人的劳动成果。

铁托集团自己也承认，在这些企业中，经理同工人之间不但工资悬殊，而且分红悬殊。有些企业，经理和高级职员分得的红利比工人高四十倍。“在某些企业中，一些领导人员领到的奖金总额，竟等于整个集体的工资总额”。^[68]

企业经理还利用特权，巧立名目，取得大量收入。接受贿赂，贪污盗窃，更是企业经理的一项大财源。

广大工人的生活是贫困的。工人的就业没有保障。大批工人因为企业倒闭而失业。据官方统计，一九六三年二月失业者的人数达三十三万九千人，相当于在业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左右。每年还有大量工人流亡国外。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南斯拉夫《政治报》承认：“在某些工人和职员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鸿沟，前者把后者看作‘吞掉’他们工资的‘官僚’”。

这些事实表明，在南斯拉夫的所谓“工人自治”的企业中，形成了一个少数人占有多数人劳动成果的新的社会集团，它是新产生的南斯拉夫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部分。

铁托集团推行所谓“工人自治”，使原来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完全脱离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轨道。

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取消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

[68]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七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给各级组织和领导的公开信。

第二，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经营积极性的根本手段。企业为了增加收入和利润，可以自行采取各种办法。这就是说，所谓“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是像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是为了追求利润。

第三，实行鼓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政策。铁托对企业经理说，“进行竞争将有利于我们的普通人、消费者”。铁托集团还公开说，他们所以允许“竞争、追逐利润和投机倒把等现象”，正是因为“对发扬生产者及其集体和公社等的主动精神起了积极作用”。^[69]

第四，把信贷和银行作为支持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的重要杠杆。铁托政权的信贷和银行机构采取招标的办法，投放贷款。谁有偿付能力，谁出的利息高，偿付快，谁就得到贷款。用他们的话说，这就是“把竞争作为常用的分配投资贷款的方法”。^[70]

第五，各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的互相支援、互相协作的社会主义关系，而是在自由市场中互相竞争、互相倾轧的资本主义关系。

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列宁说过：“没有国家的有计划的组织，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地遵守统一的准则，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百一十四页。）

列宁还说过：“如果对于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统计和监督，那么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维持下去，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就不可避免。”（《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百三十二页。）

在“工人自治”的招牌之下，南斯拉夫各经济部门和各企业之间充满着资本主义式的激烈竞争。所谓“工人自治”企业为了在市场上打击竞争对手，为了追求利润，营私舞弊，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贪污行贿，封锁技术秘密，争夺技术人员，甚至利用报纸和电台互相攻讦，已是司空见惯的了。

不仅在国内市场上，而且在对外贸易方面，南斯拉夫企业之间，也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报刊说，常常是二、三十个南斯拉夫外贸企业的代表来到同一个外国市场上，彼此抢生意，争夺交易对手。这些外贸企业，“由于自私的原因”，“不择手段”和“不惜一切代价地赚钱”。

由于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的市场极为混乱。不仅各个城市和地区之间，即使同一个地方的各个商店之间，甚至从同一个生产单位买来的同一类货物，价格也有很大差别。为了保持高价，有些企业不惜把大批农产品毁坏掉。

由于激烈的竞争，南斯拉夫有大批企业倒闭。据《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公报》的材料，近几年来倒闭的企业每年都有五、六百家。

所有这些都说明，南斯拉夫的“国营”经济，不是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规律支配的经济，而是受资本主义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支配的经济。铁托集团

[69] 巴卡里奇：一九五九年四月七日在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70] 帕皮奇：《南斯拉夫的投资拨款》。见《集体经济年鉴》，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一月号，贝尔格莱德印行。

的所谓“工人自治”企业，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而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控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说成是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呢？

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的过程，是同铁托集团投靠美帝国主义的过程，同南斯拉夫沦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的过程，交织在一起的。

铁托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就走上了出卖国家主权，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施舍过日子的可耻道路。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一九六三年一月，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给铁托集团的各种“援助”，总共约五十四亿六千万美元。其中，美国的“援助”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约有三十五亿美元。这些美援的绝大部分是在一九五〇年以后给的。

美援是南斯拉夫财政经济的支柱。根据官方材料统计，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从美国和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得到的贷款，共计三亿四千六百多万美元，相当于当年南斯拉夫联邦预算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四。如果把其他西方国家的援款包括在内，那么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从所有西方国家得到的援款，共计四亿九千三百多万美元，相当于当年南斯拉夫联邦预算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点六。

为了取得美援，铁托集团同美国缔结了一连串卖国条约。

一九五一年南斯拉夫同美国关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的换文规定，美国政府官员可以“自由地并毫无限制地”在南斯拉夫境内，对美国军援物资收受和分配情况进行视察和监督，并有“充分获得交通和情报方便”的权利。这个协定还规定南斯拉夫必须向美国提供战略原料。

一九五一年南斯拉夫和美国“军事援助协定”规定，南斯拉夫要对“自由世界的防御力量作出最大的贡献”，要准备向联合国提供军队。美国根据协定派出的军事使团，直接监督训练南斯拉夫军队。

一九五二年南斯拉夫和美国的“经济合作协定”规定，南斯拉夫必须把美援用于“促进个人的基本人权、自由和民主制度”，换句话说，就是促进资本主义制度。

一九五四年，南斯拉夫同北大西洋集团成员国希腊和土耳其缔结同盟政治合作和互相援助条约，规定这三个国家在军事上和外交上互相配合，事实上使南斯拉夫成为美国控制的军事集团的成员。

一九五四年以后，南斯拉夫又同美国签订一系列出卖主权的协定，仅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二年，就有五十多个协定。

由于签订了这些条约和协定，由于铁托集团使南斯拉夫依附于美帝国主义，美国取得了：

- (一) 控制南斯拉夫军事的权利；
- (二) 控制南斯拉夫外交的权利；
- (三) 干涉南斯拉夫内政的权利；
- (四) 支配和监督南斯拉夫财政金融的权利；
- (五) 控制南斯拉夫对外贸易的权利；
- (六) 掠夺南斯拉夫战略物资的权利；
- (七) 在南斯拉夫猎取军事和经济情报的权利。

南斯拉夫的独立主权，就这样地被铁托集团实行了大拍卖。

为了取得美援，铁托集团除了同美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卖国家主权以外，还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步骤，适应西方垄断资本侵入南斯拉夫的要求。

从一九五〇年开始，铁托集团就取消了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

一九五三年颁布《外贸经营法令》，允许企业独立经营对外贸易，允许企业直接和西方垄断资本企业进行贸易。

一九六一年，铁托政权又实行了一次外汇外贸制度的“改革”。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进一步放宽进出口的限制。对于重要的再加工材料和若干消费品的进口实行“完全自由化”，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放宽其他商品的进口限制。对于所谓自由进口的商品所需要的外汇，可以无限制地供应。

大家知道，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列宁说：“工业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工业保护是绝对不能恢复我国的工业、使俄国成为工业国的；这里的工业保护指的只是对外贸易垄断制，决不是什么关税政策。”（《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四百一十五页。）

斯大林说：“对外贸易垄断制是苏维埃政府的政纲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一”，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就是放弃国家工业化”，“就是让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充斥苏联市场”，“就是使我国由独立的国家变成半殖民地的国家”。（《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九十八、九十九页。）

铁托政权取消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就是向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大开门户。

铁托集团接受大量美援，向帝国主义大开门户，在经济上的后果是什么呢？

第一，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倾销市场。

帝国主义国家的大量工业品和农业品涌进了南斯拉夫的市场。为外国垄断资本服务而大发横财的南斯拉夫买办资本家们，为了追逐私利，对于国内能够生产、甚至有大量库存的商品也源源进口。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政治报》承认，“随处都能发现”南斯拉夫工业“正处在外国工业的不断的和非常复杂的竞争的打击下”。

第二，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投资场所。

南斯拉夫的工业企业，许多是靠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建立起来的。许多外国的私人垄断资本直接打入了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国家投资银行总经理帕皮奇说，在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六年这段期间，“国外资金的参加，达到经济投资总额

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五”。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一九六二年二月五日说，南斯拉夫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西方”。

第三，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原料基地。

从一九五一年开始，铁托集团就根据美南“军事援助协定”，源源不断地供给美国大量战略原料。据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的材料，一九五七年以来，南斯拉夫出口的镁、铅、锌、锑等重要矿产，有一半左右输往美国。

第四，南斯拉夫的工业企业变成了西方垄断资本企业的装配车间。

南斯拉夫很多重要工业，都是按照西方国家的许可证，依靠进口再加工材料、零件、部件和半成品来进行生产的。这些工业企业的生产，处在西方垄断资本企业支配之下。

事实上，南斯拉夫的许多工业产品，是从国外进口现成的零件，加以装配，然后贴上自己的商标，当作自己的产品出售的。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说，“我们某些工业部门开始变为特种商业组织，它们不是进行生产，而是进行安装，仅仅把自己的商标贴在他人的产品上。”

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就成为西方垄断资本的世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南斯拉夫不论在财政经济等各方面，都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结成不解之缘，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卖自己的独立主权，依附于帝国主义，这就不可避免要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

铁托集团宣扬的所谓依靠美援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并不是别的，就是按照帝国主义的需要，把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就是从独立国沦为半殖民地的道路。

对于这样一个美帝国主义的附庸，赫鲁晓夫竟然还说它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这真是海外奇谈。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批判过的各色各样的假社会主义之外，又增加了这样一个贴着美援商标的所谓社会主义的新品种。这大概是铁托和赫鲁晓夫“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伟大贡献”吧。

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别动队

从铁托集团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反革命作用来看，从铁托集团所执行的反动的对外政策来看，南斯拉夫更加谈不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国际舞台上，铁托集团是美帝国主义破坏世界革命的别动队。

铁托集团用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的实例，帮助美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

铁托集团打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招牌，疯狂地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充当反华的急先锋。

铁托集团打着“不结盟”和“积极共处”的幌子，破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为美国新殖民主义效劳。

铁托集团极力美化美帝国主义，麻痹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

铁托集团打着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招牌，到处推销他们的修正主义毒素，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

在十几年来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中，铁托集团总是扮演着美帝国主义走狗的角色。

第一件：希腊革命。一九四九年七月十日，铁托宣布对希腊人民游击队封锁南希边境。同时，却让希腊保皇法西斯军队通过南斯拉夫领土，从背后打击希腊人民游击队。铁托集团就这样帮助美英帝国主义扼杀了希腊人民革命。

第二件：朝鲜战争。一九五〇年九月六日，当时的外交部长卡德尔发表声明，公然诬蔑朝鲜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为美帝国主义辩护。十二月一日，铁托集团代表在安理会发言，攻击中国“积极干涉了朝鲜战争”。铁托集团并且在联合国投票赞成对中国和朝鲜“禁运”。

第三件：越南人民解放战争。一九五四年四月，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铁托集团极力诬蔑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说什么莫斯科和北京把越南人民“作为自己在战后冷战政策中的一张牌”。他们把越南人民解放奠边府的伟大战役，说成“不是善意的姿态”。

第四件：对阿尔巴尼亚的颠覆活动。长期以来，铁托集团对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一直进行颠覆活动和武装挑衅活动。他们先后在一九四四年、一九四八年、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一年，制造了四次重大的叛国案件。铁托集团在阿南边境所进行的武装挑衅活动，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八年，达四百七十多次。一九六〇年，铁托集团和希腊反动派，配合美国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策划过一次对阿尔巴尼亚的武装进攻。

第五件：匈牙利反革命暴乱。铁托集团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中，扮演了干涉者和挑拨者的可耻角色。在反革命暴乱发生以后，铁托发表一封信，支持叛徒纳吉的各项反革命措施。十一月三日，铁托集团通知纳吉到南斯拉夫驻匈牙利使馆避难。十一月十一日，铁托发表讲话，说反革命叛乱是“进步分子”的反抗，狂妄地提出是“南斯拉夫路线”得胜，还是“斯大林主义路线”得胜的问题。

第六件：中东事件。一九五八年，美帝国主义出兵侵占黎巴嫩，英帝国主义出兵侵占约旦，全世界掀起了巨大的抗议浪潮，要求美英军队立即撤走。南斯拉夫外交国务秘书科查·波波维奇，在联合国大会讨论中东局势的紧急会议上说：“问题不在于坚持谴责或赞同美国和英国所采取的行动”。他还主张由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联合国进行干涉。

第七件：台湾海峡事件。一九五八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打击美帝国主义

在台湾海峡的挑衅活动，惩罚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匪帮，炮击金门。铁托集团把中国的正义斗争诬蔑为“对全世界的威胁”，“有害于和平”。

第八件：U—2 飞机事件。一九六〇年美国派遣 U—2 间谍飞机侵犯苏联，破坏巴黎四国首脑会议。铁托在五月十七日发表声明，攻击苏联政府当时采取的正确立场是制造“如此规模的纠纷”。

第九件：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一九六〇年六月，日本人民掀起了空前的反美爱国正义斗争。铁托集团却为美帝国主义辩护说，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曾促进了日本政治生活民主化”。以后，铁托集团又攻击日本社会党前主席浅沼稻次郎所说“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话，是“主张极端路线”。

第十件：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斗争。铁托集团破坏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他们进行卑鄙的活动，企图阻挠印度尼西亚成立“纳沙贡”内阁，即包括民族主义者、宗教界、共产党人的民族团结政府。

第十一件：刚果事件。一九六〇年夏，当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对刚果进行武装侵略的时候，铁托集团不仅在联合国投票支持美帝国主义，而且遵照美帝国主义的意旨，派遣了一批空军人员，直接参加对刚果人民的血腥镇压。

第十二件：老挝问题。一九六一年一月，当美帝国主义扩大对老挝的干涉的时候，铁托集团却宣传美国“真正关心老挝的和平和中立化”。一九六三年五月，当美帝国主义在老挝制造政治谋杀和武装冲突的时候，铁托集团又攻击老挝爱国力量“把一切都归罪于美国”。

第十三件：美国“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一九六一年八月，美国胁迫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同它订立所谓“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作为美帝国主义奴役拉丁美洲人民的新工具。这个侵略计划受到拉丁美洲人民的强烈反对，但是铁托集团却捧场说，它“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拉丁美洲国家的要求”。

第十四件：中印边境冲突。自从印度反动派在一九五九年制造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以来，铁托集团一贯支持印度反动派对中国的扩张、侵略和挑衅活动。他们公开造谣说“划界工作在本世纪初就以众所周知的麦克马洪线的形式完成了”，并且极力颠倒黑白，诬蔑中国“放肆地用武力修改对印度的边界”，“侵略”印度。

第十五件：古巴革命和加勒比海危机。铁托集团发表了大量评论，攻击古巴“只是相信革命”，说什么古巴革命“与其说是典范，倒不如说是革命道路的例外”。在一九六二年秋天加勒比海危机期间，铁托集团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辩护，说什么“困难是从古巴革命刺着了美国公司的痛处开始的”，说“美国可能为在古巴，在它的近邻设立火箭基地而被激怒，这是可以理解的”。

从这里人们不难看到，十几年来，铁托集团是怎样疯狂地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破坏民族解放运动，诋毁各国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积极地为帝国主义效劳，特别是为美帝国主义效劳。

赫鲁晓夫口口声声说，苏共领导同铁托集团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是“吻合”的，

“一致”的。好，我们要问：铁托集团所干的一系列反革命的罪恶勾当，同你们的行径究竟吻合不吻合，一致不一致呢？如果你们有勇气，就请回答吧。

从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南斯拉夫城乡资本主义的泛滥，南斯拉夫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南斯拉夫沦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归根结底，是由于南斯拉夫党和政权性质的蜕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南斯拉夫人民，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南斯拉夫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政权。

不久以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使南斯拉夫的党和国家政权逐步地蜕化变质。

南斯拉夫共产党，是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的。铁托集团的叛变，首先在党内遇到了强烈的反抗。为了镇压这种反抗，铁托集团就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党内排斥和清洗大批的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员。仅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二年，就开除了二十多万党员，占南共原有党员总数的一半。他们用“情报局分子”的罪名，大批逮捕和屠杀南斯拉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被逮捕和监禁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就数达三万人以上。同时，铁托集团对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各式各样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想凭党证升官发财的投机分子大开方便之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铁托集团宣称，“党这个名称不再适用了”。他们把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名称改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铁托集团违背南斯拉夫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的意志，改变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使得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实际上成为维护铁托集团独裁统治的工具。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权是由共产主义的政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政党蜕化为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权的性质也就必然由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资产阶级专政。

南斯拉夫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南斯拉夫人民长期英勇斗争的结果。但是，铁托集团叛变以后，这个政权的性质就变了。

铁托集团宣称，“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即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手段，越来越没有必要”。

但是，他们那里是不是没有专政了呢？不。无产阶级专政真的没有了，资产阶级专政不但有，而且是最野蛮的法西斯专政。

铁托政权设立了许多法西斯式的监狱和集中营，使用各种惨无人道的刑罚，折磨死了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同时，铁托政权大量赦免反革命分子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的卖国贼。一九五一年一月七日，铁托在答合众社记者时说，南斯拉夫赦免了一万一千名政治犯。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三日，又赦免了国外流亡的反革命分子达

十五万人。对这些人民敌人的专政确实是取消了，这些人倒是得到了“民主”。铁托集团不管说得多么好听，他们所谓的“民主”，只是少数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内部的民主，对于广大的劳动人民，却是彻头彻尾的独裁。铁托集团把在南斯拉夫一度建立的、用来镇压剥削阶级少数人的革命的国家机器，变为镇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国家机器。

南斯拉夫国家政权的蜕化变质，不是通过暴力推翻原有的政权，重建新的政权，而是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径。表面上看，掌握政权的还是铁托集团这一帮人，但是，实质上，这些人已经不再代表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利益，而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新旧资产阶级的利益。

铁托集团利用国家政权，掌握国家经济命脉，最大限度地剥削南斯拉夫劳动人民，在南斯拉夫形成一个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官僚资产阶级，依附于美帝国主义，具有浓厚的买办性，也是一个买办资产阶级。铁托集团掌握的政权，就是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我们在上面所说的一系列的事实，从各个方面说明了铁托政权所执行的政策，是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也就是使南斯拉夫重新回到半殖民地或者附属国的政策。

南斯拉夫政权性质的蜕变，导致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复辟。当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新的形式重新建立起来，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逐步形成以后，他们就要求进一步强化资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发展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在南斯拉夫，从党和政权的蜕变，到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复辟，正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实现的。南斯拉夫的蜕变过程，已有十五年之久。这是一部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

铁托集团是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依靠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依靠被收买的一批工人贵族，依靠农村中的富农，来维持他们在南斯拉夫的统治的。同时，他们还采取种种欺骗手段，来掩盖他们的反动面目，蒙蔽人民群众。但是，他们的反动政策，是极其不得人心的。从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资本主义国家，从独立国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或者附属国，这是违背南斯拉夫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南斯拉夫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和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不能不反对的。

我们对于南斯拉夫人民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处境，抱着深切同情。尽管铁托集团在一个时期之内能够作威作福，但是，我们相信，任何一个与人民为敌的统治集团，不管采取什么样的高压手段，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欺骗伎俩，总不会有好下场的。铁托集团当然也不会例外。被蒙蔽的人们终究会逐步觉悟起来的。具有光荣历史的南斯拉夫人民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绝不会永远听从铁托叛徒集团的摆布。南斯拉夫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

中共对南斯拉夫问题的原则立场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有一个时期，“中共领导人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没有产生任何疑问”，又说，现在中国领导人“急剧地改变了自己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

不错，南斯拉夫曾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确实一度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

可是不久之后，由于铁托集团的叛变，南斯拉夫的社会制度就一步一步地蜕化变质了。

一九五四年，当赫鲁晓夫倡议同南斯拉夫改善关系的时候，我们同意，为了争取南斯拉夫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并且对铁托集团作进一步的观察，把南斯拉夫当作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看待。

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对铁托集团并不抱过高的希望。中共中央在一九五四年六月十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指出：应当估计到，南斯拉夫领导者在同帝国主义的关系上已经走得相当远了，他们可能拒绝争取，拒绝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即使出现了这种情况，对于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来说，在政治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相反地却会在南斯拉夫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中进一步地暴露出南斯拉夫领导者的伪善面目”。

我们不幸而言中了！铁托集团果然完全拒绝了我们的争取，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了。

铁托集团拒绝在一九五七年宣言上签字之后，在一九五八年提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树起了一面现代修正主义的大旗，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公认的共同纲领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在国内，南斯拉夫已经一步一步地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在国际上，铁托集团越来越卖劲地充当美帝国主义反革命的别动队。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待铁托集团，已经不是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问题，已经不是争取他们的问题，而是坚决地彻底地对这个叛徒集团进行揭露和斗争的问题。这一点，在一九六〇年声明中，已经作了明确的论断。

苏共中央公开信故意回避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兄弟党会议以后的一系列重要事实，回避了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议作出的一致结论，却引用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关于南斯拉夫的一句话，为苏共领导的错误立场辩解，这完全是枉费心机。

事实证明，我们对铁托集团的立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有原则性的，是符合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议的共同协议的。而苏共领导千方百计为铁托集团翻案，恰恰证明他们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抛弃了一九六〇年声明，帮助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欺骗南斯拉夫和全世界人民。是铁托“勾销了错误”，还是赫鲁晓夫以铁托为

师呢？

赫鲁晓夫说，南斯拉夫领导人勾销了非常多的错误。可是，铁托集团并不承认错误，更谈不上什么勾销错误。铁托集团说，要他们改正错误，“没有必要”，“只是浪费时间”，“这纯粹是多余而可笑的事情”。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铁托集团是不是改变了修正主义的纲领了呢？没有。他们是不是接受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了呢？没有。他们是不是改变了国内的和国际的修正主义政策了呢？也没有。

一九六三年四月，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所通过的新宪法，最清楚不过地表明，铁托集团丝毫没有改变他们的修正主义的立场。这个宪法，是把铁托集团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用法律的形式进一步加以肯定。卡德尔在关于新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新宪法是南共联盟纲领的概念“在政治法律和组织方面的具体化”。

赫鲁晓夫同铁托集团亲如兄弟，打得火热，并不是因为铁托集团改正了什么错误，而是因为赫鲁晓夫跟着铁托的脚印走。

请看：

一、铁托反对斯大林，是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也是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二、铁托和赫鲁晓夫都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都攻击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是“教条主义者”，都把自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篡改说成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三、铁托和赫鲁晓夫都为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吹嘘捧场。铁托说，艾森豪威尔是“努力保卫和平的人物”，肯尼迪的努力“有助于改善国际关系和和平解决世界的迫切问题”。赫鲁晓夫也说，艾森豪威尔“真诚希望和平”，肯尼迪“表现出对维护和平的关怀”。

四、铁托和赫鲁晓夫都极力渲染核战争的恐怖，用来恐吓世界人民，要他们放弃革命斗争。铁托说，一旦发生核战争，那就是“人类的毁灭”。赫鲁晓夫也说，一旦发生核战争，“我们将毁灭自己的诺亚方舟——地球”。

五、铁托同赫鲁晓夫都宣扬，在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的条件下，就可以实现所谓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

六、铁托宣扬“积极和平共处”是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基石”。赫鲁晓夫宣称“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七、铁托和赫鲁晓夫都宣扬“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增长了。铁托集团说，“人类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不可阻挡地深深地进入社会主义时代”。赫鲁晓夫说，可以用“议会的道路”代替十月革命的道路。

八、铁托宣扬通过“和平竞赛”实现世界“政治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赫鲁晓夫也宣扬通过“和平经济竞赛”，实现同帝国主义的“全面合作”。

九、铁托集团从各方面破坏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赫鲁晓夫借口“任何一个小小的‘局部战争’都会成为引起世界大战的火灾的星星之火”，反对民族解

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

十、铁托集团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也在“全民国家”的口号下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十一、铁托集团否认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赫鲁晓夫说，苏共已经“成了全体人民的党”。

十二、铁托标榜“非集团”，反对社会主义阵营。赫鲁晓夫也说，“集团之类的说法是暂时的”。他们都要取消社会主义阵营。

如此等等。

从这些事实中，人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赫鲁晓夫无论在对外政策或对内政策上，实际上都是以铁托为师，亦步亦趋地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滑下去了。

赫鲁晓夫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撕毁一九六〇年声明，同铁托叛徒集团同流合污，这是完全违背苏联的利益的，是完全违背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利益的。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伟大的苏联人民，绝大多数的苏共党员和各级干部，绝对不会容许这样做。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绝对不会同意赫鲁晓夫伙同铁托集团，反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绝对不会同意赫鲁晓夫伙同铁托集团，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国、阿尔巴尼亚等兄弟国家，破坏社会主义阵营。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绝对不会同意赫鲁晓夫伙同铁托集团，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各国人民，反对革命。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绝对不会同意赫鲁晓夫学习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榜样，改变党和国家的性质，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赫鲁晓夫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上空卷起了一片乌云。但是，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在苏联的历史上，这只能是一个插曲。一时受欺骗和蒙蔽的人们终究会逐步觉悟起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任何人，要扭转苏联人民前进的方向，都不过是螳臂当车。他们永远不会达到自己的目的。

简短的结语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历史教训。

它告诉我们，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以后，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斗争，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南斯拉夫就提供了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

它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在没有掌握政权的时候，有可能被工人贵族所把持，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而且在掌握政权以后，仍然有可能被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

的奴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就提供了这样一个蜕化变质的典型。

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并不一定要通过反革命政变，也不一定要通过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它还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来实现。堡垒是最易从内部夺取的。南斯拉夫就提供了这样的典型。

它告诉我们，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老修正主义，曾经是帝国主义收买和扶持工人贵族的政策的产物。现代修正主义也是这样产生的。现在，帝国主义这种收买的规模，扩大到不惜工本地收买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通过他们实现帝国主义追求的“和平演变”政策。美帝国主义把南斯拉夫看做“带头羊”，就是因为南斯拉夫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典型。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可以擦亮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眼睛，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看来，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就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消除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苏共领导大吹大擂地说，他们那里已经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已经建设共产主义了。如果真的是这样，这当然是令人高兴的。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他们正在从各方面学习南斯拉夫的榜样，他们已经走上了一条极端危险的道路。这使我们十分担忧，也使我们十分痛心。

我们本着热爱伟大的苏联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心情，仍然愿意向苏共领导诚恳地呼吁：同志们，朋友们，南斯拉夫的道路是万万走不得的！赶紧回头吧！不然，就太晚了。

原载人民日报 1963-09-26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出现了伟大的革命风暴。亚洲和非洲五十多个国家宣布了独立，中国、越南、朝鲜和古巴四个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镇压下，曾经遭到严重的挫折，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已经根本不同。帝国主义者再也不能扑灭民族解放运动的燎原大火。帝国主义的旧的殖民体系在迅速瓦解，帝国主义的后方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烽火连天的前线。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统治，在有些国家已经被推翻了，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受到很大的打击，摇摇欲坠了。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削弱和动摇帝国主义在本国的统治。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革命的胜利，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相互呼应，是我们时代的响彻云霄的凯歌。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革命的风暴，要求当代世界上的一切政治势力都要表示自己的态度。在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面前，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吓得发抖，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鼓掌欢呼。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说：“糟得很，糟得很”；全世界的革命人民说：“好得很，好得很”。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说：“这是造反，这是不许可的”；全世界的革命人民说：“这是革命，这是人民的权利，这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挡的历史潮流”。

对这个当代世界政治的最尖锐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定地站在被压迫民族一边，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现代修正主义者实际上站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一边，千方百计地否定和反对民族解放运动。

苏共领导在口头上，还不敢完全丢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有的时候，他们从自己的利害关系出发，也采取某些行动来装潢一下门面。但是，从主要的方面来看，从他们多年来鼓吹的一系列论点和执行的一系列政策来看，他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采取的是消极、鄙视和否定的态度，他们充当了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和苏共同志的许多文章和讲话，在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上，花了很大力气，为自己的错误观点辩护，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但是，所有这些，不过是进一步证明了苏共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对革命的立场。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苏共领导在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吧。

取消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这一点，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但是，能不能说，摆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面前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任务，已经结束了呢？

我们认为，不能这样说。这个斗争任务，还远远没有结束。

但是，苏共领导却经常散布一种论调，好像在今天的世界上，殖民主义已经消失或者接近消失了。他们强调说，“地球上还有五千万人口在殖民主义的统治下呻吟”，殖民主义制度只是在非洲的葡属安哥拉、莫三鼻给这些地方剩下一点残余，消灭殖民主义已经进入“完成阶段”了。

事实究竟是怎样呢？

先看一看亚洲和非洲的情形吧。这些地区的一系列国家宣布了独立。可是，许多国家并没有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奴役，它们仍然是帝国主义掠夺和侵略的对象，仍然是新老殖民主义者角逐的场所。在有些国家，老殖民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为新殖民主义者，通过他们所培养的代理人，继续维持他们的殖民统治。在另外一些国家，前门走了狼，后门又进来虎，新的、更大的、更危险的美国殖民主义者代替了老殖民主义者。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的魔爪，严重地威胁着亚洲和非洲各国人民。

再听一听拉丁美洲人民的声音吧。

第二个哈瓦那宣言说：“今天的拉丁美洲处在比西班牙殖民帝国更加具有兽性、更加强大多、残酷得多的帝国主义的桎梏下。”

又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投资超过了一百亿美元。拉丁美洲既是廉价原料的供应地，又是昂贵产品的购买者”。“金钱源源不断地从拉丁美洲流向美国：一分钟约四千美元，一天五百万美元，一年二十亿美元，五年就有一百亿美元。每抢走我们的一千块美元，就给我们留下一具死尸。一千块美元一具死尸，这就是所谓帝国主义的价格。”

事实很清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绝没有放弃殖民主义，而是采取新的方式，推行新的殖民主义。这种新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帝国主义被迫改变直接的殖民统治的旧方式，采取通过他们所选择和培养的代理人进行殖民统治和殖民剥削的新方式。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利用组织军事集团，建立军事基地，

或者成立“联邦”和“共同体”，扶植傀儡政权，把殖民地国家和已经宣布独立的国家，置于他们的控制和奴役之下。他们利用经济“援助”等等方式，继续把这些国家作为他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原料供应地和资本输出的场所，掠夺这些国家的财富，榨取这些国家人民的血汗。他们还把联合国作为一个重要工具，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对这些国家进行军事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侵略。当他们不能用“和平”手段维持对这些国家的统治的时候，就在这些国家制造军事政变，进行颠覆活动，以至对这些国家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和武装侵略。

在推行新殖民主义方面，以美国最为积极，最为狡猾。美帝国主义用新殖民主义的武器，力图把其他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攫为己有，建立自己的世界霸权。

这种新的殖民主义，是更阴险、更毒辣的殖民主义。

请问苏共领导，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说消灭殖民主义已经进入“完成阶段”了呢？

苏共领导为了给自己的谎言辩护，竟然想从一九六〇年声明中寻找帮助自己的借口。他们说，一九六〇年声明不是说过殖民体系迅速瓦解吗？可是，声明指出的旧的殖民制度迅速瓦解的论点，并不能给苏共领导散布的殖民主义消失的论点帮什么忙。声明明确地揭露了：“美国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拼命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形式，保持对原殖民地人民的殖民主义剥削”，他们“企图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把经济控制 and 政治影响的命脉保持在自己手里”。在这里，声明揭露的东西，恰恰是苏共领导力图掩饰的东西。

苏共领导还制造了一个“理论”，说什么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以所谓经济任务为中心的“新的阶段”。他们认为，“从前，斗争主要是在政治领域展开的”；现在，经济问题已经成了“中心任务”和“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基本环节”。

民族解放运动是进入了新的阶段。但是，这个新阶段绝不是像苏共领导所说的那种“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空前觉醒，革命运动空前高涨，迫切要求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他们国家中的势力，争取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彻底独立。这些国家面临的第一位的和最迫切的任务，仍然是进一步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这个斗争，仍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以及其他领域内剧烈地进行着。这些各个领域内的斗争，仍然集中表现为政治斗争，并且往往在帝国主义进行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武装镇压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武装斗争。新独立国家，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任务绝不能离开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

苏共领导的这种所谓“新阶段”论，同他们散布的所谓“殖民主义消失”论一样，分明是粉饰以美国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侵略和掠夺，掩盖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的尖锐矛盾，企图麻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斗争。

按照苏共领导的“理论”，既然殖民主义已经接近消失了，既然现在民族解放运

动的中心任务只是发展经济的问题了，那么，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了。这样一来，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岂不是也就压根儿取消了吗？从这里人们可以懂得，苏共领导所说的以经济任务为中心的“新阶段”，原来就是不要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阶段，也就是不要民族解放运动的阶段。

取消被压迫民族革命的药方

苏共领导根据他们的错误“理论”，给被压迫民族精心设计了一套包治百病的药方。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套药方吧。

第一个药方，叫做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

苏共领导经常把战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系列伟大胜利，都归功于他们所谓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就是这样说的：“在和平共处的情况下，最近几年，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都取得了新的重大胜利，世界革命进程顺利地发展着。”

他们还经常说，民族解放运动“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在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经济竞赛的情况下开展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促进各国人民摆脱外国垄断组织的经济统治的解放过程的发展”，能够对“全部资本主义关系”给予“毁灭性的打击”。

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实行列宁主义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但是，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所有殖民地和附属国要取得民族革命的胜利，首先必须依靠本国人民群众自己的革命斗争，而不能由任何别的国家来代替。

在苏共领导看来，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主要不是依靠各国人民群众自己的革命斗争，不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是要在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中，等待帝国主义自然而然地垮台。这实际上是要被压迫民族永远忍受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奴役，不要起来反抗，不要起来革命。

第二个药方，叫做援助落后国家。

苏共领导把他们对新独立国家的经济援助的作用吹得天花乱坠。赫鲁晓夫同志说，这种援助可以使这些国家“避免新的奴役，推动它们的进步，促进内部过程的正常进行和加速，这些过程能够把这些国家引上通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

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国际主义的原则，对新独立国家给予经济援助，是必要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是，怎么也不能说，这些国家的民族独立和社会变革，主要不是依靠本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仅仅是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

而且，老实说，苏共领导近几年来对新独立国家援助的政策和目的，是值得怀

疑的。苏共领导在援助新独立国家的问题上，往往采取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态度，损害这些国家经济的和政治的利益，因而败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名誉。至于苏共领导对印度的援助，更是别有用心。在苏联给新独立国家的援助中，印度占第一位。这种援助，显然是为了鼓励尼赫鲁政府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连美帝国主义者也说，苏联这种援助“同我们的利益是很符合的”。

苏共领导还公开主张同美帝国主义一道来“援助落后国家”。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九月在美国的一次演说中这样说：“我们和你们的经济成就将受到全世界的欢迎，整个世界都在期待我们两大强国去帮助那些在经济发展方面落后了数世纪的人民更迅速地站起来。”

看，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竟然能够帮助被压迫民族“迅速地站起来”！而苏共领导竟然甘心与新殖民主义者伍，而且引以为荣，这实在令人惊讶。

第三个药方，叫做裁军。

赫鲁晓夫说：“裁军就意味着裁减战争的力量，消除军国主义，排除武装干涉任何国家内政，彻底和最后地消灭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

赫鲁晓夫又说：“裁军会创造必要的条件来大大扩大对年轻的民族国家的援助。世界军费总数为一千二百亿美元，如果从中拨出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用于这个目的，那末在二十年内就可以消灭世界上贫困地区的饥谨、疾病和文盲状态。”

为了揭露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我们一贯主张进行争取普遍裁军的斗争。但是，绝不能说可以通过裁军来消灭殖民主义。

在这里，赫鲁晓夫简直像一个神父在说教：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们啊，你们有福了！等待着吧，等待着帝国主义放下武器，自由就会降临在你们身上，等待着帝国主义大发慈悲，世界上的贫困地区就会变成流着奶和蜜的乐园了……。

这不仅是幻想，而且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第四个药方，叫做通过联合国消灭殖民主义。

赫鲁晓夫认为：联合国如果采取措施彻底铲除殖民主义制度，“目前身受外国统治所造成的侮辱之苦的各国人民，就会有摆脱外国桎梏获得和平解放的光明近景”。

赫鲁晓夫在一九六〇年九月的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中说：“不由联合国来消除殖民主义管理制度，又由谁来消除呢？”

这句话问得实在离奇！在赫鲁晓夫看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人民不应该也不可能消灭殖民主义，要消灭殖民主义，就得指望联合国。

赫鲁晓夫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上还说：“我们向西方各国人民的明智和远见，向他们的政府和出席联合国这次崇高的会议的代表发出呼吁：让我们来协调旨在消灭殖民主义管理制度的步骤，从而加速这个合乎规律的历史进程。”可见，赫鲁晓夫所说的指望联合国帮助，无非是指望帝国主义帮助的代名词。事实证明，至今仍然操纵在帝国主义手中的联合国，只能维护和增强殖民主义的统治，而不能消灭任何殖民主义。

总归一句话，苏共领导给民族解放运动开的药方，就是要人们相信帝国主义可以放弃殖民主义，可以把自由解放恩赐给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因此，一切革命理论，一切革命主张，一切革命斗争，都过时了，都不需要了，都应当而且必须取消了。

反对民族解放战争

苏共领导所以这样千方百计地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放弃革命斗争，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口头上说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实际上他们在革命风暴面前吓得发抖。

苏共领导有一个著名的“理论”，认为“一个小小的火星也能够引起世界大战”，而一打起世界大战，就是热核战争，就是人类毁灭。因此，赫鲁晓夫大声疾呼“在当代，‘区域性战争’是很危险的事”，“我们要顽强地努力，扑灭可能燃起战火的小火星”。在这里，赫鲁晓夫根本不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背弃了共产党人必须支持正义战争的立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八年历史证明，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依靠他们的刺刀进行残暴统治和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进行武装镇压的情况下，民族解放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大大小小的、连绵不断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战争，打击了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加强了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有力地阻止了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计划。赫鲁晓夫大喊大叫为了和平必须“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拆穿了说，是借维护和平之名，行反对革命之实。

正是从这样的错误观点和错误政策出发，苏共领导不但要求一切被压迫民族放弃争取解放的革命斗争，要求他们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和平共处”，而且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采取种种手段扑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的星星之火。

就拿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来说，苏共领导不但长期不予支持，而且同法帝国主义站在一起。赫鲁晓夫就曾经把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问题，当作是法国的“内政”。他在一九五五年十月三日谈到阿尔及利亚问题时说：“我考虑到的首先是：苏联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他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接见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时又说：“我们不希望法国削弱，而希望它巩固它的尊严”。

苏共领导为了讨好法帝国主义，长期不敢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一直到阿尔及利亚人民抗法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法国已经被迫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时候，才慌慌忙忙地宣布承认。这种丑态，给社会主义国家丢了脸。而苏共领导却还要拿耻辱来进行夸耀，硬说阿尔及利亚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果实，也应该记在他们的那本所谓“和平共处”的功劳簿上。

再来看看苏共领导在刚果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不但不去积极支持刚果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反而急于同美帝国主义“合作”去扑灭刚果的星星之火。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苏联同美国一道投票赞成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派遣联合国军去刚果的决议，帮助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旗帜，对刚果进行武装干涉。苏联并且为联合国军队提供了运输工具。七月十五日，赫鲁晓夫在致卡萨武布和卢蒙巴的电报中竟然说，“联合国安理会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接着，苏联的报刊不断地赞扬联合国“帮助刚果共和国政府保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期待联合国“采取坚决的措施”。一直到八月二十一日和九月十日，苏联政府两次发表的声明，还为镇压刚果人民的联合国大肆吹捧。

一九六一年，苏共领导又推动基赞加去参加在联合国军“保护”下召开的刚果议会和参加傀儡政府。苏共领导当时竟然欺骗说，刚果议会的召开是“年轻共和国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民族力量的胜利”。

事实很清楚，苏共领导的这些错误政策给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帮了大忙。卢蒙巴被杀害，基赞加被拘禁，许多爱国者遭到迫害，刚果民族独立斗争遇到挫折，对于这些，苏共领导难道一点也不感到自己的责任吗？

当代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

苏共领导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的言行，遭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人民的反对，是理所当然的。可是，苏共领导并没有从这里得出必要的教训，改变他们的错误路线和政策，反而老羞成怒，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一系列诬蔑和攻击。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新理论”。公开信说，“根据这种理论，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竟然不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同志看来，反帝斗争的决定性力量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而仍然是民族解放运动。”

首先，这是捏造。我们六月十四日的信件指出，当代世界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

我们还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根本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这种矛盾毫无疑问是很尖锐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把世界范围内的矛盾，简单地看成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

我们的观点是清清楚楚的。

我们在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论证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形势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和作用。我们是这样说的：

第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

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

第二，“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

第三，“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严重地打击着和削弱着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基础，是当代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第五，“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

第六，“因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绝不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的全局性的问题。”

这些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也都是从现时代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科学分析得出来的结论。

谁都不能否认，目前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存在着大好的革命形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革命，是当前最重要的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力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

世界矛盾的集中点，世界政治斗争的集中点，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国际斗争和革命形势的变化而转移的。我们相信，在西欧和北美这些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和帝国主义的心脏地区，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发展，大搏斗的伟大日子，终有一天会要到来。那时，西欧和北美无疑地将成为世界政治斗争的集中点，成为世界矛盾的集中点。

列宁在一九一三年曾经说过：“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现出来了。”“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及其‘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五百八十三页。）

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说过：“殖民地国家是帝国主义的基本后方。这个后方的革命化不会不摧毁帝国主义，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将失去后方，而且因为东方的革命化必然会在促使西方革命危机尖锐化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九十二页。）

难道列宁和斯大林的话都说错了吗？这些道理本来早已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显然，当苏共领导一心要贬低民族解放运动的时候，就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码常识，连眼前的十分清楚的事实，都统统不顾了。

歪曲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的领导权思想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还在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上，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论点。公开信说：“中国同志竟想‘纠正’列宁的思想，证明似乎

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应当是全世界反帝斗争中的领导。”

这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的明目张胆的歪曲。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在提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时候说，历史赋予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光荣使命是：“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旗帜，站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最前列，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阶层，组织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独立性，坚持革命的领导权。”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在提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须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时候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迫切任务。”“这些地区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人们是极其广泛的，不仅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也包括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

我们的这些观点，都是很清楚的。必须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同时又必须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这究竟有什么不对呢？苏共领导为什么要歪曲和攻击我们的这些正确观点呢？

背弃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思想的，不是我们，恰恰是苏共领导。

按照苏共领导的错误路线，根本取消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根本反对进行民族解放战争，这就等于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卷起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旗帜，而把这个旗帜拱手送给别人。这样，还谈得上什么反帝统一战线呢？又谈得上什么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呢？

苏共领导还经常宣扬不管在什么人的领导下，即使在像尼赫鲁这样的反动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下，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更是离开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思想十万八千里了。

苏共中央公开信把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同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相互支持的关系，说成民族解放运动应当由社会主义国家和宗主国的工人运动来“领导”。他们居然还硬说这是以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思想为“根据”的。这显然是对于列宁思想的极大歪曲和篡改。这反映了苏共领导是要把他们的取消革命的路线强加于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

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

苏共领导在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中，企图给中国共产党加上一个罪名，说中国同志“使民族解放运动孤立于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之外”。

他们还攻击我们把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体系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隔离”起来，“对立”起来。还有像法共领导人那样的共产党人，也摹仿苏共领导的腔调，跟着大喊大叫。

可是，事实是怎样的呢？把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立起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不支持和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自己。

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的。我们一向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全局观点出发，来看待民族解放运动。我们认为，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发展，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都有极其伟大的作用。

但是，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却不愿意承认这种作用。他们只讲社会主义阵营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援作用，而否认民族解放运动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援作用。他们只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于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而贬低和否认民族解放运动对于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这种立场，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不顾事实的，是错误的。

怎样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关系，怎样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关系，这是一个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重大原则问题。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切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积极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取得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成为支持和发展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革命的根据地，必须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结成最亲密的联盟，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但是，苏共领导却把社会主义在一国或一部分国家的胜利，实际上看作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结束。他们要求民族解放革命服从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服从他们的一个国家的民族利益。

一九二五年，斯大林在同以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为代表的取消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时候指出，取消主义危险的特点之一，就是“不相信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不相信它会胜利；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抱怀疑态度……不了解国际主义的起码要求，即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发展和支持其他国家革命的手段”。（《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四页。）

斯大林说，“这是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是完全取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的道路，因为患这种病的人，不是把我们的国家看做被称为世界革命运动的那一整体的一部分，而是把它看做这一运动的开始和结束，认为其他一切国家的利益都应当为我们国家的利益而牺牲。”（《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四页。）

斯大林描绘取消主义者的想法是：“支持中国的解放运动吗？为什么呢？不会有危险吗？这不会使我们同其他国家发生纠纷吗？我们同其他‘先进的’列强一起在

中国确定‘势力范围’，从中国拿到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岂不是更好吗？这样做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如此等等。”（《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四页。）

斯大林的结论说，“这就是企图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和正在培养蜕化分子的新型的民族主义‘思想’。”（《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一页。）

现在的苏共领导，比起当时的取消主义者，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自以为是聪明人，他们尽干那些“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的事情，他们非常害怕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纠纷，因而一心一意地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他们迷恋于所谓两个超级大国在全世界确定“势力范围”。

斯大林批评取消主义者的这番话，正好是对现在的苏共领导的一幅画像。他们正是这样步取消主义者的后尘，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走上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

斯大林当时警告说：“很明显，只有在彻底的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只有在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的基础上，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才能保持住世界革命运动旗手的作用，而对外政策中阻力最小的和民族主义的道路，则是使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孤立和瓦解的道路。”（《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一页。）斯大林的这个警告，对于今天的苏共领导来说，仍然具有严重的现实意义。

社会沙文主义的一个典型

同样的，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必须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独立的权利，支持他们的解放斗争。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被压迫民族的援助下，才有更大的可能取得胜利。

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资本压迫的亿万‘殖民地’奴隶充分地最紧密地联合起来，那么，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百三十八页。）

但是，有些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恰恰是在这个根本原则问题上，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法共领导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法共领导人长期以来，一方面，放弃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美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对法国的控制和束缚不进行坚决的反对，把法国反美的民族旗帜完全让给戴高乐等人；另一方面，却用各种方法和借口维护法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利益，不支持并且反对法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反对民族革命战争，他们堕入民族沙文主义的泥坑。

列宁说过，“欧洲人常常忘记殖民地人民也是民族，谁容忍这种‘健忘精神’，谁就是容忍沙文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五十八页。）但是，以多列士同志为代表的法共领导不仅仅容忍这种“健忘精神”，而且公然把法属殖民地的人民统统看成是“非法国血统的法国人”，不承认他们有同法国分离的民族独立的权利，

并且公然支持法帝国主义的“民族同化”政策。

十几年来法共领导人追随法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充当了法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尾巴。一九四六年，当法国垄断资本统治者玩弄新殖民主义的花招，提出建立法兰西联邦的时候，他们就跟着鼓吹：“我们一贯把法兰西联邦看作是自由人民的自由联盟”，“建立法兰西联邦能够新的基础上解决法国人民和过去隶属于法国的海外各地人民的关系问题”。一九五八年，当法兰西联邦垮台，法国政府为了维护法国殖民体系，提出组成“法兰西共同体”的时候，法共领导人又跟着鼓吹：“我们相信成立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将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件”。

不仅这样，法共领导人为了反对法属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独立要求，竟然吓唬法属殖民地人民说：“脱离法兰西联邦的任何企图，虽然可以博得徒有其名的暂时的虚伪的独立，但是只能导致帝国主义加强”。他们还公然说：“问题在于这个已成为不可避免的独立，是通过法国来实现，还是不通过它并且反对它。我们国家的利益要求这个独立经过法国来实现。”

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法共领导人更是采取民族沙文主义立场。最近，法共领导辩解说，他们多年以前就“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对自由的正当要求”。可是，事实究竟是怎样呢？

长期以来，法共领导人根本不承认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的权利，他们跟着法国垄断资产阶级叫喊什么“阿尔及利亚是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叫喊法国“现在是而且将来也应该是一个伟大的非洲强国”。多列士等人最关心的是阿尔及利亚每年可以向法国提供“一百万头羊”和大量小麦，来解决法国“缺乏肉类”的问题和“补充谷物方面的不足”。

请看，法共领导人的民族沙文主义是何等狂热啊，在他们那里哪有一丝一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影子呢？哪有一丝一毫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影子呢？他们的这种民族沙文主义立场，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也背叛了法国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真正的法国民族利益。

驳“种族论”和“黄祸论”

苏共领导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一切法宝都用尽了，只好乞灵于帝国主义的最反动的种族论。他们把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确立场，说成是“建立种族和地理的藩篱”，“用种族观点来代替阶级观点”，说成是“利用亚洲和非洲人民的民族主义的、甚至种族主义的偏见”。

要是世界上还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说这种谎话，倒还能够骗一骗人。可惜，这种谎话的制造者们生不逢时，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深入人心了。斯大林说得好：列宁主义已经“拆毁了横在白种人和黑种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帝国主义的‘文明’奴隶和‘不文明’奴隶之间的墙壁”。（《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一百二十二页。）

苏共领导想要重建这道种族主义的墙壁，只能是枉费心机。

当代的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问题。现在，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反帝爱国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反帝爱国的开明人士，结成一条广泛的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这条统一战线，正在不断巩固和壮大。这里根本不是站在白色人种一边，还是站在有色人种一边的问题，而是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这一边，还是站在一小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那一边的问题。

被压迫民族必须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划清界限，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模糊这个界限，才是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服务的民族沙文主义的观点。

列宁说过，“在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中心问题应该是把民族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这种区分构成帝国主义的本质，而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却虚伪地避而不谈。”（《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百八十八页。）现在苏共领导诬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在反帝斗争中的团结，是什么“以地理和种族原则为基础”的团结，这分明把自己放在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的地位。

苏共领导贩运“种族论”，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说成是有色人种反对白种人的运动，显然是为了在欧洲和北美洲的白种人中煽起种族主义的仇恨心理，转移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目标，转移国际工人运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目标。

苏共领导到处大喊大叫，说什么“黄祸”呀，“成吉思汗的威胁又来了”呀，这实在不值得一驳。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不准评论成吉思汗的历史作用，也不准备评论蒙古、俄罗斯、中国等民族发展和国家形成的过程。我们只提醒苏共领导一下，当你们造这种谣言的时候，温习一下历史还是必要的。成吉思汗是当时蒙古的汗，中国和俄国，都是遭受侵略的。成吉思汗在一二一五年侵入中国的西北和北方的一部分，一二二三年侵入俄罗斯。成吉思汗死了以后，他的继承者在一二四〇年征服了俄罗斯，过了三十几年以后，一二七九年征服了全中国。

中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讲过一段关于成吉思汗的话，对你们可能有些用处。我们顺手抄下，供给你们参考。

他说：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汗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百零九页。）

稍微懂得一点世界近代史常识的人，就会发现，苏共领导喧嚷的一套“黄祸论”，不过是继承了德国皇帝威廉第二的衣钵。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威廉第二就宣布“朕

为黄祸论者”。

德国的威廉皇帝宣扬“黄祸论”，是为了进一步瓜分中国，侵略亚洲，镇压亚洲的革命，转移欧洲人民革命的视线，并且作为当时积极准备发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争夺世界霸权的烟幕。

威廉第二宣扬“黄祸论”的时候，正是欧洲资产阶级处于极端腐朽和极端反动的时候，正是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后，民主革命席卷中国、土耳其、波斯，并且波及印度的时候。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列宁提出了“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一名言。

当时的威廉第二是赫赫一世的大人物，但是，他不过是阳光下的雪人。没有过多久，这个反动头目连同他制造的反动理论，都一古脑儿冰消瓦解了。而伟大的列宁连同他的光辉的思想，却万古长青。

时间过去了五十年，西欧和北美的帝国主义，更加腐朽了，更加反动了，寿命更加不长了。同时，席卷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比列宁在世的时候，不知宏大多少倍。就在这个时候，想不到还有人要扮演威廉第二这个角色，这实在是对历史的嘲弄。

老修正主义的借尸还魂

苏共领导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所执行的政策，不是别的，正是破了产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政策。它们之间的不同点仅仅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是为帝国主义的老殖民主义服务的，而现代修正主义则是为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服务的。

老修正主义是跟着老殖民主义的调子歌唱，赫鲁晓夫是跟着新殖民主义的调子歌唱。

以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英雄好汉们，曾经是帝国主义的老的殖民统治的辩护士。他们公然说：殖民统治是进步的，它给殖民地“带来了高度的文明”，“发展了生产力”。他们甚至说，取消殖民地“意味着回到野蛮状态”。

在这一点上，赫鲁晓夫同老修正主义者有所不同，他是敢于咒骂老殖民主义制度的。

赫鲁晓夫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量呢？原来帝国主义的腔调已经改变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双重打击下，帝国主义被迫认识到“如果西方国家企图维持殖民主义的现状，必然招来不可避免的暴力革命和失败”。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形式，“反而很可能是个‘脓疮’，会使国家的生命失去经济上和道义上的活力”。因此，需要改变方式，实行新殖民主义。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赫鲁晓夫就同新殖民主义者一唱一和，一方面宣扬“殖民主义消失论”，掩饰新殖民主义；另一方面劝导被压迫民族接受新殖民主义。他十分卖力地宣扬被压迫民族同文明的帝国主义实行所谓“和平共处”，就会使“民族经济

迅速发展”，“生产力增长”，被压迫国家的“国内市场会无比地扩大”，“能够拨出更多的为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所需要的原料，各种产品和商品”。同时，还可以“大大提高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

赫鲁晓夫也没有忘记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武库中，去搜集那些破烂不堪的武器。

例如：

老修正主义反对民族解放战争，主张民族问题“只能通过国际协商的办法解决”，“和平的方式迈进”。赫鲁晓夫在这一方面，更是继承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衣钵，主张“平静地埋葬殖民主义制度”。

老修正主义者攻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诽谤“布尔什维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好战的社会主义”，诽谤“共产国际幻想凭借百战百胜的红军的刺刀就可以实现工人的解放，认为为了完成世界革命必须进行新的世界战争”，并且造谣说，这种局面，“产生了新的世界战争的极大危险”。赫鲁晓夫今天诽谤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使用的语言，正是当年老修正主义者诽谤布尔什维克使用的那些语言。人们很难找到二者之间的区别。

应当说，赫鲁晓夫在为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效劳方面，比老修正主义在为帝国主义老殖民主义效劳方面，做得并没有丝毫逊色。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政策，使国际工人运动分裂为两派，一派是革命派，一派是机会主义派。革命派站在被压迫民族这一边，反对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同革命派相反，机会主义派依靠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压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血汗，分得一杯残羹剩饭，喂肥了自己。他们站在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一边，反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革命。

列宁指出的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分野，现在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中出现了，而且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也出现了。

历史经验证明，民族解放运动要取得彻底胜利，必须同革命的工人运动结成巩固的同盟，也必须同那些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效劳的修正主义派划清界限，坚决肃清他们的影响。

历史经验证明，西欧和北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要取得彻底胜利，必须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成紧密的同盟，必须同修正主义派划清界限，坚决肃清他们的影响。

修正主义者是混在国际工人运动队伍中的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列宁说：“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百九十五页。）那么，今天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不能不同反对新殖民主义辩护士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

不管帝国主义怎样伪装，怎样挣扎，也不管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怎样粉饰，怎样帮忙，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是无论如何逃脱不了的。民族解放

革命的胜利是不可阻挡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是终究要彻底破产的。

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原载人民日报 1963-10-22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

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全世界都在谈论战争与和平问题。

万恶的帝国主义制度，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无数次战争，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祸。帝国主义的战争使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同时也教育了人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人民普遍地强烈地要求世界和平。越来越多的人懂得了，要保卫世界和平，就必须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

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任重视人民群众要求和平的情绪，站在保卫世界和平斗争的前列；有责任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斗争，揭穿他们的骗局，挫败他们的战争计划；有责任教育群众，提高群众觉悟，把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引导到正确的方向。

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相反，现代修正主义者却适应帝国主义政策的需要，帮助帝国主义用谎言欺骗群众，转移人民的视线，削弱和破坏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为帝国主义准备新战争的计划打掩护。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同修正主义的路线，是根本对立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是有利于争取世界和平的正确路线。这就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贯坚持的路线。

修正主义的路线，是助长新战争危险的错误路线。这就是苏共领导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路线。

苏共中央公开信，苏共领导的大量言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制造了很多谎言来诽谤中国共产党人，但是，这并不能掩饰这种分歧的实质。

下面，我们将分析一下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现代修正主义路线的主要分歧。

历史的教训

自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以后，战争与和平问题一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

修正主义斗争的一个重大问题。

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政策和战争政策是交替使用的。帝国主义常常用和平的谎言，来掩盖他们的侵略罪行和发动新战争的准备。

列宁和斯大林都不倦地号召各国人民要同帝国主义的和平骗局作斗争。

列宁说过，帝国主义政府“都是口头上高谈和平和正义，而实际上却在进行掠夺性的侵略性的战争”。（《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百三十页。）

斯大林说过，帝国主义奉行的和平主义，“只是追求一个目的：为了准备新的战争而用和平这种响亮的词句来欺骗群众”。（《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二百四十八页。）他还说，“许多人认为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和平的工具。这是根本不对的。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准备战争的工具，是用虚伪的和平词句来掩盖备战的工具。没有这种和平主义及其工具国际联盟，在目前情况下要准备战争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一百七十四页。）

同列宁和斯大林相反，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工人阶级的叛徒，却帮助帝国主义欺骗群众，成为帝国主义发动两次世界战争的帮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以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竭力用虚伪的和平言词，麻痹人民革命的斗志，掩饰帝国主义准备世界战争的计划。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老修正主义分子就纷纷扯下了“和平”的假面具，站在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一边，拥护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在国会中投票赞成军事拨款，虚伪地利用“保卫祖国”的口号，煽动本国的工人阶级投入残杀别国工人兄弟的战争。

当帝国主义者需要按照帝国主义的条件实行休战的时候，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又用什么“没有比建立在‘你活，让别人也活’的原则之上的谅解的和平更使我感到幸运了”^[71]之类的甜言蜜语，来蛊惑人心，反对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叛徒考茨基和他的继承者，更加明目张胆地充当帝国主义的和平骗局的吹鼓手。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散布了一大堆谎言：

第一，美化帝国主义，转移世界人民斗争的视线。考茨基说，“对于世界和平说来，帝国主义的危害仍旧不过是微小的。而东方的民族意图和各种独裁制的危害看起来还更大。”^[72]这是要人们相信，帝国主义不是战争的根源，而东方被压迫民族和伟大的和平堡垒苏维埃国家，倒是战争的根源。

第二，帮助帝国主义掩饰新战争的危险，麻痹群众的斗志。考茨基在一九二八年说，“如果人们在今天还大谈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那末所根据的是传统的陈词滥调，而不是对我们时代的考察。”^[73]这些老修正主义分子还说，那些认为帝国主义战

[71] 考茨基：《民族问题》。

[72] 考茨基：《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

[73] 同上

争是不可避免的人，是“迷恋宿命论的历史观”。^[74]

第三，用战争毁灭人类的论调来吓唬群众。考茨基说，“下一场战争不仅会带来贫穷和灾难，而且要彻底摧毁一切文明，而留下来的（至少在欧洲）仅仅是冒烟的废墟和腐烂的尸体。”^[75]这些老修正主义分子还说，“最近的一次战争使全世界遭受了极大的灾难，下一次战争就会把世界完全毁灭掉。单单准备新的战争这一件事就会把世界断送掉。”^[76]

第四，不区别正义战争和不义战争，不准革命。考茨基在一九一四年说，“在目前条件下，一般地对各民族来说，特别是对无产阶级来说，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一种不幸，我们讨论的是，我们用什么手段能够防止有爆发危险的战争，而不是哪些战争有益，哪些战争有害。”^[77]考茨基还说，“所有文明国家的广大人群越来越充满了对永恒的和平的要求。它暂时使我们时代本来的重大问题退居次要地位”。^[78]

第五，宣扬唯武器论，反对革命的武装斗争。考茨基说过，“未来革命斗争之所以将越来越少地取决于武力，其原因之一，正如已经一再指出的，是现代政府军的装备较之‘普通老百姓’所拥有的武器具有巨大的优势，这种优势通常使普通老百姓的任何反抗一上来就没有成功的希望。”^[79]

第六，散布通过裁军就可以保卫世界和平、达到民族平等的谬论。伯恩施坦说，“在地球上确立和平、给人们以欢乐！我们不能停下来休息，我们必须努力，以便使社会一帆风顺地向前发展，通过国际协议和裁军达到人人都幸福，达到各民族权利一律平等。”^[80]

第七，散布裁军节省下来的钱可以援助落后国家的谬论。考茨基说，“西欧的军备负担越少，就会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在中国、波斯、土耳其、南美等地建筑铁路，而这些工程同建造‘无畏舰’比较起来，是促进工业发展的一个更为有效得多的手段。”^[81]

第八，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战略”献策。考茨基说，“文明欧洲的各民族（美国人也一样）通过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的手段比通过军舰和飞机更能够维持近东和远东的和平。”^[82]

第九，对帝国主义操纵的国际联盟大加吹捧。考茨基说，“仅仅是国际联盟的存在就已经意味着和平事业的伟大成就。它是任何其他机构所不能提供的保卫和平的

[74] 哈阿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九一二年克姆尼兹代表大会上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发言，载于《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手册（一九一〇——一九一三）》第二卷。

[75] 考茨基：《战争与民主》导言。

[76] 《社会党国际一九一九年伯尔尼代表大会关于国际联盟的决议》。

[77] 考茨基：《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

[78] 考茨基：《战争与民主》导言。

[79] 考茨基：《社会民主党的教义问答》。

[80] 伯恩施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九一二年克姆尼兹代表大会上关于裁军问题的发言，载于《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手册（一九一〇——一九一三）》第二卷。

[81] 考茨基：《再论裁军》。

[82] 考茨基：《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

工具。”^[83]

第十，散布依靠美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幻想。考茨基说，“美国现在是世界最强的国家，一旦它在国际联盟中或者同国际联盟一起致力于防止战争，它就使国际联盟成为不可违抗的了。”^[84]

列宁无情地揭露了考茨基等人的丑恶面目。列宁指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和平主义“无非是对人民的一种安慰，无非是使各国政府便于在今后的帝国主义大战中驯服群众的一种手段！”（《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百三十七页。）

斯大林指出，“这里最重要的是：社会民主党是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传播者，也就是说，在准备新战争和干涉方面，它是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支柱。”（《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一百七十四页。）

人们只要读一下赫鲁晓夫同志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言论，只要把赫鲁晓夫的言论同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人的言论对照一下，就会发现，赫鲁晓夫的观点并没有什么新创造，而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翻版。

赫鲁晓夫在战争与和平这个关系人类命运的问题上，正在步伯恩施坦的后尘，步考茨基的后尘。历史经验证明，这是一条对世界和平十分危险的道路。

为了有效地保卫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不能不拒绝和反对赫鲁晓夫的错误路线。

最大的骗局

世界上最大的骗局，莫过于把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说成是爱好和平的天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企图在全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目标一直是：侵略和控制处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扑灭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并且进而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独霸全世界。

为了实现这种称霸世界的野心，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八年来，连续不断地在世界各地进行侵略战争和反革命武装干涉，并且积极准备新的世界战争。

事实很清楚，帝国主义仍然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当代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美帝国主义。这一点，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都做了明确的论断。

但是，苏共领导却认为美帝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爱好和平的。他们说，出现了能够清醒地估计局势的“明智”派。这种“明智”派的代表人物就是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

赫鲁晓夫曾经赞扬艾森豪威尔，说“他作为得到本国人民绝对信任的人”，“真

[83] 同上。

[84] 考茨基：《社会主义者和战争》。

诚希望和平”，“也像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

赫鲁晓夫现在又赞扬肯尼迪，是一个比艾森豪威尔更能够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的人，“表现出对维护和平的关怀”，可以期待他“来为地球上的和平生活和创造性劳动保证可靠的条件”。

在散布谎言，美化帝国主义方面，赫鲁晓夫正像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一样卖劲。

苏共中央公开信对不同意他们这种谎言的人提出质问说，难道“真的认为，一切资产阶级政府在所有事情上都丧失了任何明智吗？”

他们显然不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在阶级社会里，根本没有超阶级的明智。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明智，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明智。所谓明智，就是善于按照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制定政策，善于根据本阶级的根本立场行动。肯尼迪之流的明智，就是根据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行动，就是帝国主义的明智。

在国际阶级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情况下，在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不断遭到挫败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者不能不更多地用和平的外衣把自己伪装起来。

肯尼迪的确善于使用和平的词令，玩弄和平的手法。但是，肯尼迪的和平欺骗政策，同肯尼迪的战争政策一样，都是为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服务的。

肯尼迪的“和平战略”，就是要把整个的地球，全部统一到以帝国主义的“法律与正义为基础”的“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

肯尼迪的“和平战略”的主要点就是：

用和平手段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推广美国的新殖民主义。

用和平手段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渗透和控制。

用和平手段推动社会主义国家走南斯拉夫式的“和平演变”的道路。

用和平手段削弱和破坏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肯尼迪在最近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中，狂妄地宣称美苏和平的条件是：

一、要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到西德去；

二、不能容许社会主义的古巴存在；

三、要允许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自由选择”，也就是要在这些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四、不允许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如果可能的话，用“和平手段”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也是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一种惯伎。

反动阶级维持自己的统治和实行对外扩张，从来是依靠两手的。一手是牧师式的欺骗，一手是刽子手式的镇压。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政策和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从来是互相为用，互相补充的。作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代表的肯尼迪的明智，只能是更加奸险地玩弄这种两手政策。

反动的统治阶级倚仗的主要的一手，始终是暴力。牧师式的欺骗，是对暴力起

辅助作用的。帝国主义从来是依靠实力地位来划分势力范围的。肯尼迪对这一点讲得很明白。他说，“归根结蒂，维护和平的唯一方法，是准备最终为我国而战，并且说到做到。”肯尼迪执政以来，推行所谓“灵活反应战略”，要求加速建立一支“多样化的军事力量”，加强“全面的实力”，以便美国能够随心所欲地打一切战争，不管是全面的还是有限的，核的还是常规的，大的还是小的。肯尼迪的这个狂妄计划，把美国扩军备战活动推进到空前的高峰。请看美国官方公布的一些事实：

第一，美国政府的军费开支，从一九六〇财政年度的四百六十七亿美元，增加到一九六四财政年度预计的六百亿美元，达到了和平时期的最高水平，也超过了进行朝鲜战争时期的水平。

第二，肯尼迪最近宣称，两年多来，美国的“战略警备部队”的核武器的数目增加了百分之百，作好战斗准备的陆军师的数目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采购空运飞机的数量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五，“特种游击队”和“反暴乱部队”增加了将近五倍。

第三，美国的战略目标联合计划参谋部，已经制定了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核战争的计划。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今年年初宣称，“我们准备在整个时期建立能摧毁几乎苏联所有的‘软’的和‘半硬’的军事目标（即地面的和半地下的基地）以及他们许多极为坚固的导弹发射场的力量。此外，还要建立一支保护得很好的力量，用来进攻或者以备将来进攻他们的城市和工业区”。

美国进一步加强了矛头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导弹基地网，大大加强了在海外的携带导弹的核潜艇的部署。

同时，美国指挥下的北大西洋集团军队，今年以来向东推进，贴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的前沿。

第四，肯尼迪政府加强了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军事部署，并且大力扩充陆、空、海三军的“特种作战部队”，用来对付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运动。美国把越南南方作为它进行“特种战争”的试验场，美国在南越的部队已经增加到一万六千人以上。

第五，肯尼迪政府加强了战争指挥机构。它成立了“进击司令部”，统辖一支平时保持高度战斗准备的陆、空联合部队，以便能及时调动他们在世界各地挑起战争。它成立了地面的和地下的全国军事指挥中心，还组成了分别设立在飞机和军舰上的紧急空中指挥所和紧急海上指挥所。

这些事实说明，美帝国主义是当代最狂热的军国主义和新的世界战争的策划者，是世界和平的最凶恶的敌人。

可见，美帝国主义并不因为赫鲁晓夫向它念圣经、唱颂歌而变成美丽的天使，并不因为赫鲁晓夫对它焚香膜拜而变成善心的菩萨。在这方面，不管赫鲁晓夫怎样给美帝国主义帮忙，美帝国主义却丝毫不给赫鲁晓夫赏脸。它总是要不断地用新的大量侵略活动和战争活动，来自己揭露自己的和平伪装，也就是不断地打了赫鲁晓夫的耳光，宣告赫鲁晓夫美化帝国主义的种种谬论的破产。这对于甘心充当美帝国主义辩护士的人来说，实在是很可悲的。

关于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正在积极准备新的世界战争，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这是事实。我们应当把这个事实告诉人民群众。

但是，新的世界战争能不能防止呢？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的观点，从来是十分明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毛泽东同志对战后的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就提出新的世界战争可能防止的论点。

早在一九四六年，毛泽东同志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名的谈话中就说：

“在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时候，美国反动派如此大吹大擂地强调美苏战争，闹得乌烟瘴气，就使人不能不来看看他们的实际目的。原来他们是在反苏的口号下面，疯狂地进攻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我以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地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一百九十二页。）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是针对着当时对于国际形势的一种悲观估计说的。那时候，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日益加紧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鼓吹所谓“美苏必战”，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蒋介石反动派也大肆进行这种宣传，来吓唬中国人民。当时有一些同志，对于这种讹诈，产生畏惧的心理，在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反动派发动的武装进攻面前，表示软弱，不敢坚决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毛泽东同志则相反。他指出，只要对世界反动力量进行坚决的有效的斗争，新的世界大战就可以避免。

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论断，已经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所证实。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国际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九五〇年六月，毛泽东同志指出：

“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同志在各国兄弟党会议上，详细地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的变化，论证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他借用中国古典小说中一句成语“东风压倒西风”来形象地比喻这种形势。他说，“我

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第二十五页。）

毛泽东同志是从国际阶级关系的分析中得出这个结论的。他很明白地把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都放在“东风”的一边，而“西风”只限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战争势力。这个比喻的政治含义是异常清楚和确切的。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把这个比喻歪曲成为地理的、种族的或者气象的概念，只是暴露了他们硬要把自己挤进“西方”的行列，来讨好帝国主义，煽动欧洲和北美的民族沙文主义。

毛泽东同志提出“东风压倒西风”，主要地也是为了论证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增长了，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和平建设环境的可能性增长了。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断，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观点。

可见，说中国共产党“不相信有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是苏共领导蓄意制造的谣言。

可见，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有防止的可能性的论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老早就提出来了，并不是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首先提出来的，并不是赫鲁晓夫的什么“创造”。

可是，赫鲁晓夫真的一点儿创造也没有吗？不，创造倒是有的。可惜，这些所谓创造，绝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修正主义。

第一，赫鲁晓夫把新的世界战争有防止的可能性，随意地说成只有防止的一种可能，而不存在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在指出新的世界战争有防止的可能性的同时，必须指出还存在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性。只有同时指出这两种可能性，采取正确的政策，作两方面的准备，才有利于动员群众进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时，在帝国主义一旦把世界战争强加于世界人民头上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才不至于毫无准备，措手不及。

但是，赫鲁晓夫等人却反对揭露帝国主义策划新战争的危险。按照他们的论调，帝国主义实际上已经变成爱好和平的帝国主义。这是帮助帝国主义麻痹群众，涣散群众的斗争意志，使群众对帝国主义策划的新战争危险丧失警惕。

第二，赫鲁晓夫把新的世界战争有避免的可能性，随意地说成一切战争都可以避免，认为列宁主义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原理已经过时。

新的世界战争有避免的可能性，这是一回事；一切战争，包括革命战争，都可以避免，这是另一回事。把二者混淆起来，是完全错误的。

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只要人剥削人的制度还存在，就有产生战争的土壤。这是列宁经过大量的科学研究发现的客观规律。

一九五二年，斯大林在谈到新的世界战争可以防止的论点以后说，“要消灭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十七页。）

列宁和斯大林是正确的，赫鲁晓夫是错误的。

历史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发动的世界战争只有两次，而帝国主义发动的其他的各式各样的战争则有无数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连续不断地引起了各种类型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

事实很清楚，在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派出自己的军队，或者利用他们的走狗，对于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国家实行血腥镇压的情况下，民族解放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说，“否认在帝国主义时代有发生民族战争的一切可能，这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历史上显然是错误的，而在实践上则无异于欧洲沙文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七十四至七十五页。）

事实同样很清楚，在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武力来镇压本国人民的情况下，国内革命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说，“国内战争也是一种战争。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不能不承认国内战争，因为国内战争在任何阶级社会里都是阶级斗争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的自然表现，而且在一定情况下是它的必然表现。所有的大革命都证实了这一点。否认或忘记国内战争，就是陷入极端的机会主义和背弃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七十五页。）

历史上所有各国的大革命，几乎没有不经过革命战争的。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是一个例子。法国的革命，是一个例子。俄国的革命和中国的革命，当然又是一种例子。越南的革命，古巴的革命，阿尔及利亚的革命，等等，也都是大家知道的例子。

一八七一年，马克思在纪念第一国际成立七周年的讲话中，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时候，提出了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条件。他说，“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四百六十八页。）

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在谈到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的时候，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现在，这个论断，也成为苏共领导攻击的对象。他们说，这就是中国“好战”的论据。

可敬的朋友们，你们的这种诬蔑，毛泽东同志早在二十五年前就驳斥过了。毛泽东同志说，“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百三十五页。）

毛泽东同志说的这些话究竟有什么不对呢？只有否认几百年来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部历史经验的人，才会否认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论

点。

中国人民已经用枪杆子造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政权。除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外，谁都很容易懂得，这是一件好事，它是保卫世界和平、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因素。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不隐蔽自己的观点。我们衷心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战争。正如列宁所说，这种革命战争“是历史上所有一切战争中唯一合理的、正当的、正义的、真正伟大的战争”。（《列宁全集》第八卷，第八十五页。）如果因为这一点，就攻击我们好战，那只能证明我们是真正站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从来就是这样咒骂布尔塞维克“好战”，咒骂列宁和斯大林这样的革命领袖“好战”的。我们今天遭到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同样的咒骂，正好说明我们高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

赫鲁晓夫等人大肆宣扬在帝国主义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一切战争都可以避免，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这种论调就是早已破产了的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他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使各国人民相信在帝国主义制度下可以实现永久和平，从而取消革命，取消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并且在实际上帮助帝国主义准备新战争。

核迷信、核讹诈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南

苏共领导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理论的灵魂，是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一切，改变了阶级斗争的规律。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在本世纪中叶所制成的火箭—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究竟怎样改变的呢？

苏共领导认为，在核武器出现以后，已经没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了。他们说，“原子弹不遵循阶级原则”，“原子弹是不会辨别帝国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而劳动人民又在什么地方，它轰击成片的地方，所以消灭一个垄断资本家，就会消灭数以百万计的工人”。

苏共领导认为，在核武器出现以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必须放弃革命，必须放弃进行正义的人民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否则，人类就要毁灭。他们说，“任何一个小小的‘局部战争’都会成为引起世界大战的火灾的星星之火”；“现今，任何战争，即使由普通战争、非核战争开始，也会变成毁灭性的火箭—核战争。”这样，“我们将会毁灭自己的诺亚方舟——地球”。

苏共领导认为，在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战争威胁面前，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屈服，不能抵抗。赫鲁晓夫说过，“毫无疑问，一场世界热核战争，如果由帝国主义狂人挑起的话，必然会使产生战争的资本主义体系灭亡。但是，难道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

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事业会从世界热核灾难中得到胜利吗？只有故意闭眼不看事实的人才会这样想。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不能设想，在世界文化中心的废墟上、在荒无人迹的和被热核尘埃污染的土地上，建立共产主义的文明。我们尚且不谈，对许多人民来说，社会主义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了，因为他们的肉体已经从我们的地球上消失了”。

总起来说，在苏共领导看来，自从核武器出现以后，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都统统消失了。现在，世界上一切阶级矛盾都根本没有了。他们把当代世界的矛盾，看成只有一种矛盾，就是他们虚构的所谓帝国主义和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共同活命同全部毁灭的矛盾。

在苏共领导的脑海里，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宣言和声明，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古脑儿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请看《真理报》说得多么直爽：“要是丢了脑袋，原则还有什么好处呢？”

这就等于说，一切为俄国革命，为十月革命胜利而牺牲在反动派屠刀下的革命者，一切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士，一切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而流血的英雄，古往今来一切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烈士，统统都是傻瓜。他们何必为坚持原则而丢掉自己的脑袋呢？

这是道道地地的叛徒哲学。这是在叛徒的自首书中才可以看到的无耻言论。

正是在这种核迷信、核讹诈“理论”的指导下，苏共领导认为，保卫世界和平的道路，不是当代各种维护和平的力量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是美苏两个核大国合作解决世界问题。

赫鲁晓夫说，“我们（美苏两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为和平而联合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战争。那时，如果有某个疯子想挑起战争，我们只要用手指吓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静下来”。

从这里，谁都可以清楚地看出，苏共领导认敌为友已经到了何等地步。

苏共领导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惜采取造谣诽谤的办法，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他们硬说，中国共产党主张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就是要挑动世界核战争。

这是离奇的谣言。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包括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不这样作，就是背弃了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同时认为，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有依靠自己的坚决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解放，任何别人都不能代替。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不应当、也不需要使用核武器。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取得和保持核优势。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帝

国主义不敢发动核战争，才有利于彻底禁止核武器。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手中的核武器，永远只能是抵抗帝国主义核威胁的防御武器。社会主义国家绝不应当首先使用核武器，绝不应当玩弄核武器，进行核讹诈、核赌博。

我们反对苏共领导不支持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错误做法，也反对他们对核武器的错误态度。苏共领导不但不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指责我们要苏美“迎头相撞”，要把苏美推进核战争中去。

我们回答说，不，朋友们。收起你们的耸人听闻的造谣诬蔑手法吧。中国共产党岂但在言论上坚决反对苏美两大国“迎头相撞”，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力求避免苏美两大国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我们同朝鲜同志一道，在朝鲜的抗美战争中，我们在台湾海峡的反美斗争中，总是宁愿自己承担必要的牺牲重担，站在守卫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前线，而使苏联处于第二线。今天苏共领导竟然制造出这样的谣言，这那里还谈得上有什么无产阶级的道德呢？

事实上，不是我们，而是苏共领导，经常吹牛，说要使用核武器援助这个国家或者那个国家的反帝斗争。

谁都知道，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没有核武器，不可能也不需要核武器来进行革命。苏共领导自己也承认，在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战争中，常常没有隔开敌对双方的明显战线，因此，谈不上使用核武器的问题。那么，我们要质问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有什么需要使用核武器来支援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呢？

我们还要质问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怎样使用核武器来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呢？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的地方使用核武器，从而使各国革命人民同帝国主义者一起遭到核打击呢？还是在帝国主义使用常规武器进行侵略战争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就首先对帝国主义本国使用核武器呢？很明显，无论这两种情况中的那一种情况，社会主义国家使用核武器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实际上，苏共领导挥舞核武器，并不是真正为了支援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有的时候，他们只不过是发表一纸根本不准备兑现的声明，为的是猎取廉价的声誉。

有的时候，例如在加勒比海危机中，他们心存侥幸，投机取巧，不负责任地进行核赌博，以便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们的核讹诈一旦被对方识破，并且遭到对方的反讹诈，他们马上节节败退，从冒险主义滚到投降主义，在核赌博中输得精光。

我们愿意指出，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红军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力量。但是，建立在核迷信和核讹诈基础上的赫鲁晓夫的军事思想却是完全错误的。

赫鲁晓夫的眼睛里只有核武器。在他看来，“在现代军事技术发展的条件下，空

军和海军已经失去了它过去的意义。这类武器不是要削减而是要被代替。”

担负地面战斗任务的部队和士兵，当然更是无足轻重了。他说，“当前决定国防力量的不是我们有多少士兵肩荷枪支，有多少人身穿军大衣。”“国家的防御力量在决定性的程度上取决于火力如何，取决于这个国家掌握着什么样的发射工具。”

至于民兵和人民群众，那就更不在话下。赫鲁晓夫有一句著名的话：民兵，对于有现代化武器的我们来说，这不是军队，这是一堆肉。

赫鲁晓夫这一套军事理论，完全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军队的学说，照这种错误方针做去，只能瓦解军队，从精神上解除自己的武装。

很明显，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接受赫鲁晓夫的错误的军事战略思想，就只能把自己的国家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赫鲁晓夫尽可以给自己加上“伟大的和平战士”之类的称号，给自己颁发“和平奖金”，给自己戴上英雄的勋章，但是，不管他怎样自吹自擂，都不能掩盖他轻率卤莽地玩弄核武器的危险作法，都不能掩盖他在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卑躬屈节的形象。

是斗争还是投降

世界和平只能是各国人民争取得来的，而不能是向帝国主义乞求得来的。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有效地保卫和平。这是一条正确的方针。

针锋相对的斗争，是中国人民在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长期斗争中，得出来的一条重要经验。

毛泽东同志说：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

他还说：

“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一百二十六页。）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五年分析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的时候还说过：

“‘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一百五十八页。）

毛泽东同志总结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就在于：“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一百二十八

页。)

中国共产党人懂得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坚持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我们既反对投降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这个正确的方针，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保证了革命胜利以后，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取得的伟大成就。

一切革命的人民都赞成和欢迎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个正确的斗争方针。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害怕和痛恨这个方针。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针锋相对的方针，遭到苏共领导的恶毒攻击，这只能证明苏共领导根本不要反对帝国主义。他们攻击和污蔑针锋相对的方针，不过是为了掩饰他们迎合帝国主义，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的错误路线。

苏共领导说，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岂不是要导致紧张局势吗？这怎么得了呢？

按照这种逻辑，那就只能允许帝国主义侵略和威胁别人，而不许被侵略者进行斗争，只能允许帝国主义压迫别人，而不许被压迫者起来反抗。这是赤裸裸地为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开脱责任。这是十足的弱肉强食的哲学。

国际紧张局势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造成的。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面前，各国人民当然应当进行坚决的斗争。事实证明，只有经过斗争，才能够迫使帝国主义退却，才能够使国际局势得到真正的和缓。而对帝国主义一味退让，是不能得到真正的和缓的，相反，只会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

我们从来反对帝国主义制造国际紧张局势，主张争取和缓国际紧张局势。但是帝国主义一定要到处进行侵略，到处制造紧张局势，那也只会走向他们愿望的反面。

毛泽东同志说，“美帝国主义自以为紧张局势总是对它自己有利，但是事实是，美国制造的这些紧张局势走向了美国人愿望的反面，它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

他还说，“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如果坚持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势必有一天要被全世界人民处以绞刑。”（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人民日报》）

一九五七年宣言说得好，“这些反人民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所实行的政策使它们自取灭亡，自己造成埋葬自己的掘墓人。”

这是历史的辩证法。那些把帝国主义奉为神明的人，很难懂得这种真理。

苏共领导说，你们主张针锋相对的斗争，就是拒绝谈判。这也是乱说。

我们一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谈判，这绝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就曾经多次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在中国解放的前夕，中国共产党人仍然不拒绝谈判。

在一九四九年三月，毛泽东同志说，不论是全面的和平谈判，或者局部的和平谈判，我们都应当做准备。“我们不应当怕麻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也不应当糊里糊涂地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一千四百三十七页。)

在国际上，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同样地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谈判。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一年十月谈到朝鲜停战谈判的问题时说：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经过坚决的斗争，迫使美帝国主义在谈判中接受了朝鲜的停战协定。

我们积极参加了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作出了贡献。

我们对于侵占着我国领土台湾的美国，也主张同它坐下来谈判。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进行了八年多。

我们积极参加了一九六一年召开的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促成了关于尊重老挝独立和中立的日内瓦协议的签订。

是不是中国共产党人只许自己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谈判，而偏偏反对苏共领导人同帝国主义国家领导人谈判呢？

当然不是这样。

事实上，对于苏联政府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的每一个有利于保卫世界和平而不是不利于保卫世界和平的谈判，我们从来都是积极支持的。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四日，毛泽东同志说过：

“我们支持首脑会议的召开，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但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我们赞成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谈判。但是，绝对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地把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于谈判，散布对于谈判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麻痹各国人民斗争意志。

老实说，赫鲁晓夫这样一种对待谈判的错误态度，对于谈判本身也是不利的。赫鲁晓夫越是在帝国主义者面前步步退让，越是饥不择食，帝国主义的胃口就会越来越大。赫鲁晓夫以历史上最大的谈判迷的姿态出现，结果总是害单相思，屡次成为笑柄。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于投降主义者是从来不讲什么情面的。保卫和平的道路和导致战争的道路

综上所述，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我们同苏共领导的分歧，是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要不要支持革命斗争，要不要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同路线的分歧。

中国共产党，同其他一切真正革命的政党一样，一贯站在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最前线。我们认为，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不断地揭露帝国主义，

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就必须依靠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发展，依靠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依靠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依靠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斗争，依靠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我们所主张的这条路线，是符合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所规定的各国共产党的共同路线的。

按照这条路线，就可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使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按照这条路线，就能够不断地增强以社会主义阵营为核心的世界和平力量，不断地打击和削弱帝国主义战争势力。

按照这条路线，就能够使各国人民的革命不断发展壮大，牵制住帝国主义的手脚。

按照这条路线，就可以充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包括利用美帝国主义同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孤立美帝国主义。

按照这条路线，就可以粉碎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打败它的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计划。

这是各国人民既取得革命胜利，又赢得世界和平的路线。这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正确的、有效的道路。

苏共领导所执行的路线，同我们的路线，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的共同路线恰恰相反。

苏共领导不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世界和平的敌人，而是指向社会主义阵营，削弱和破坏保卫世界和平的核心力量。

苏共领导用核讹诈来吓唬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不许他们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以便于美帝国主义把社会主义阵营孤立起来，便于美帝国主义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

苏共领导用核讹诈来吓唬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不许革命，并且伙同美帝国主义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以便让美帝国主义在处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放手地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苏共领导还吓唬美国的同盟国，不许他们进行反对美国控制的斗争，以便于美帝国主义奴役这些国家，巩固它的阵地。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根本取消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根本取消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保卫世界和平的统一战线。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不是最大限度地孤立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而是最大限度地孤立世界和平力量。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实际上取消了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任务。

这是一条适应美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的路线。

这不是保卫世界和平的道路，而是助长战争危险导致战争的道路。

目前的世界，已经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世界了。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世界人民的觉悟已经大大提高。世界革命人民的力量已经大大增强。苏联人民、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世界各国人民，绝不能听凭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和他们的吹鼓手们支配自己的命运。

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侵略和战争行为，正在教育世界各国人民逐步觉悟起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些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上有错误观点的人，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面教育之下，我们相信，有很多人会改变过来。对此，我们寄予很大的希望。

我们相信，全世界共产党人，全世界人民，只要能够拆穿帝国主义的骗局，识破修正主义的谎言，把维护世界和平的担子担当起来，就一定能够粉碎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计划，保卫住世界和平。

原载人民日报 1963-11-19

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

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自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和平共处问题，要算是赫鲁晓夫等同志讲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了。

苏共领导口口声声说，他们忠实于并且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他们把世界各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都记在自己的“和平共处”的功劳簿上。

苏共领导大肆宣扬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赞成和平共处，大肆诬蔑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反对和平共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甚至胡说什么中国主张同帝国主义“进行发动战争的竞赛”。

苏共领导把自己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弃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背弃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事业的许多言行，说成是符合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

但是，“和平共处”这几个字果真能够成为苏共领导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护身符吗？不能，不能，绝对不能。

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

一种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这也就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包括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的和平共处政策；

另一种是反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这也就是赫鲁晓夫等人主张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怎么样的政策，而赫鲁晓夫等人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又是怎么样的货色。

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

社会主义国家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思想，是列宁提出来的。这个正确的政策，是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长期实行的政策。

在十月革命以前，世界上根本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就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问题。但是，早在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六年，根据对

帝国主义所作的科学分析，列宁就预见到：“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某些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七十五页。）这也就是说，在一个时期之内，世界上将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前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并存的情况。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列宁说过，“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在夺取政权以后，在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执行和平政策”。（列宁：《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决议草案》，《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百零九页。）可以说，列宁的这种观点，是和平共处政策的思想基础。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多次向全世界宣布苏维埃国家的和平外交政策。但是，帝国主义者却一心想把新生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他们对苏维埃国家发动了武装干涉。面对着这种情况，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不武装保卫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就不能存在”。（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一百二十八页。）

直到一九二〇年，伟大的苏维埃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在苏维埃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了一定的相对的均势。经过了几年的实际较量，苏维埃国家站住了脚。苏维埃国家开始由战争转入了和平建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提出了和平共处政策的思想。事实上，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帝国主义才被迫接受同苏维埃国家“共处”。

列宁在世的时候，这种均势一直是极不稳定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处在严重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列宁多次指出，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这种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和平相处的局面，能不能长久保持下去，是无法担保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列宁还不可能规定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政策的详细内容。但是，伟大的列宁已经为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定了正确的对外政策，也提出了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

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

第一，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是根本违反帝国主义意愿的。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但是，帝国主义总是不愿意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总是要利用一切可能，抓住一切机会，来反对以至消灭社会主义国家。

列宁说：“无论按国际帝国主义的客观地位来说或按它所体现的那个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来说，它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睦相处”。（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八十页。）

列宁还说过：“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一百二十八页）

至一百二十九页。)

因此,列宁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对帝国主义要经常提高警惕。他说,“所有工人和农民都应当记取的教训,就是要时刻戒备,要记住我们是被那些公开表示极端仇恨我们的人、阶级和政府包围着的。必须记住,我们随时都有遭受任何入侵的危险。”(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一百二十一页。)

第二,列宁指出,苏维埃国家之所以能够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是靠斗争得来的。这是苏维埃国家采取正确的政策,依靠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支持,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同帝国主义国家反复较量的结果。

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说过:“这是常有的事情,你打痛了敌人,他就会来讲和的。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向欧洲帝国主义者老爷们说我们同意和平,但是,他们却幻想奴役俄国。现在他们懂得他们的幻想是一定不能实现了。”(列宁:《在全俄党的农村工作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一百二十三页至一百二十四页。)

列宁在一九二一年指出,“各帝国主义强国虽然切齿痛恨苏维埃俄国并且企图进攻苏维埃俄国,但它们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分崩离析愈来愈厉害了,团结愈来愈削弱了,而拥有十亿以上人口、受尽压迫的殖民地各国人民的反抗却一年比一年、一月比一月、甚至一星期比一星期更加剧烈。”(列宁:《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的闭幕词》,《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四百二十七页。)

第三,列宁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时候,对资本主义世界不同类型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方针。

列宁特别重视同受帝国主义欺侮和压迫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他指出,“一切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也就促成了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接近、联盟和友好”。他说,苏维埃国家的和平政策可以“使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它周围愈来愈多的邻国的联系日益密切起来”。(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四百四十五页至四百四十六页。)

列宁还说:“现在我们提出的主要任务是:战胜剥削者并把动摇者争取过来,这是世界性的任务。许多资产阶级国家就是动摇的:作为资产阶级国家,它们仇恨我们;作为被压迫国家,它们又宁愿同我们讲和平。”(列宁:《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二百九十二页。)

对于帝国主义国家,例如美国,列宁说:同美国保持和平的基础是,“让美国资本家不要触犯我们”。“我们这方面没有任何障碍。像其他任何国家的资本家一样,美国资本家方面的帝国主义才是障碍”。(列宁:《答美国〈纽约晚报〉记者问》,《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三百三十三页至第三百三十四页。)

第四,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处理同不同社会制

度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他从来没有把和平共处政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全部内容。列宁一再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列宁说：“苏维埃俄国认为，能够帮助全世界的工人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艰苦斗争是最大的骄傲。”（列宁：《给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和彼得格勒工人、红军代表苏维埃》，《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三百七十五页至三百七十六页。）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发布的和平法令中，在向一切交战国建议立即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的同时，号召资本主义国家的觉悟的工人“以多方面无比坚决果敢的行动，帮助我们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列宁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百二十九页。）

列宁为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党纲草案中，明确规定，“支持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支持一切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主运动和革命运动”，是党的国际政策的重要内容。（《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一百四十四页。）

第五，列宁一向认为，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是不能和平共处的。

列宁在《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中指出，“即使是最开明最民主的资产阶级，也已经不惜采取任何欺骗和犯罪的手段了，不惜屠杀千百万工人和农民来挽救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厄运了”。列宁的结论是：“凡是以为可以用和平方式使资本家服从大多数被剥削者意志，可以通过和平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都不仅是极端的市侩的愚蠢行为，而且是对工人的公然的欺骗，对资本主义的雇佣奴役制的粉饰和对真理的隐瞒。”（《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一百六十三页。）

列宁多次指出帝国主义的所谓民族平等的虚伪性。他说：“国际联盟和协约国战后的全部政策到处加强了先进国无产阶级和殖民地附属国一切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加速了所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能够和平共居和一律平等的市侩的民族幻想的破产，从而更清楚更尖锐地揭示了这个真理。”（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一百二十六页。）

以上这些，就是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

斯大林坚持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斯大林在担任苏联领导的三十年中，一直实行这种和平共处政策。只是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苏联发动侵略战争或者武装挑衅的时候，苏联才不得不进行卫国战争和自卫反击。

斯大林指出，“我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的基础就在于两种对立的体系可以共处”。“同各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和平的关系，是我们必须负担的任务”。（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十卷，

第二百四十六页。)

斯大林还指出,“只要双方有合作的愿望,决心履行所承担的义务,遵守平等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资本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和平共处是完全可能的。”(斯大林:《答美国报界一些编辑提出的问题》,《真理报》一九五二年四月二日。)

在坚持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同时,斯大林坚决反对为了讨好帝国主义而放弃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他曾经尖锐地指出,存在着两条对立的对外政策,“二者必居其一”:

一条是,“我们今后仍将执行革命政策,把各国无产者和被压迫者团结在苏联工人阶级的周围,——那时国际资本将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前进”;

另一条是,“我们放弃自己的革命政策,对国际资本做一系列原则性的让步,——那时国际资本大概不会反对‘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善良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斯大林举例说,“美国要求我们从原则上放弃支持别国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政策,说什么如果我们能做这种让步,那末一切都好办了。……我们也许可以做这种让步吧?”

斯大林接着回答说,不,“我们不能做诸如此类的让步,不能背叛自己”。(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四十七页至四十八页。)

斯大林的这番话,直到现在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确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对外政策,的确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善于识别这两种不同的政策,坚持列宁和斯大林的政策,坚决反对被斯大林痛斥的那种背叛的、投降的、不支持革命的政策,坚决反对那种把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善良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策,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重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坚持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硬说中国共产党“不相信和平共处的可能性”,诬蔑中国共产党反对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

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不,当然不是这样。

任何尊重事实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始终不渝地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中取得了胜利,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运动空前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获得政治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大大削弱,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化。这种形势,为社会主义国家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政策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过程中，丰富了它的内容。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夜，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四百七十页。）

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这一方针，我们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中，以后，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都明确地规定了和平外交政策。

中国政府在一九五四年倡议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就是：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在一九五五年的万隆会议上，我国同亚非各国一起，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共同制定了十项原则。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在国际事务方面的实践经验，进一步阐述了我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他说：“为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兄弟国家的友好合作，并且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又说：

“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

“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它们的团结。”

“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十四年来，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对于同一类型国家的不同情况，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

第一，我们把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加以区别。对待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互相援助的原则。我们把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作为我们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

第二，我们把新获得政治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

民族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同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同帝国主义有着深刻的矛盾。它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同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同民族主义国家建立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关系，有着广泛的和现实的可能性。这种关系的建立，对于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的团结、促进各国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我们一贯坚持巩固和发展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方针。同时，对于那些违反和破坏五项原则的国家，例如印度，我们进行了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

第三，我们把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对于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是区别对待的。

在国际阶级力量对比越来越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力量日益削弱及其相互间矛盾日益尖锐化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依靠本身力量的壮大，依靠各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依靠同民族主义国家的团结，依靠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斗争，利用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有可能使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同意建立某种程度的和平共处关系。

在坚持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同时，我们坚定不移地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我们积极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积极支持西欧、北美和大洋洲各国的工人运动，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积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

所有这些，都是集中于一个目标，这就是，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无产阶级为核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十几年来，中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同许多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发展了经济、文化往来。中国先后同也门、缅甸、尼泊尔、阿富汗、几内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加纳等国，签订了友好条约、和平友好条约或者友好互助和互不侵犯条约；并且还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圆满地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

苏共领导制造中国反对和平共处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他们的目的，拆穿了说，就是要掩盖他们自己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勾结帝国主义的丑恶面目。

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

真正违反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不是我们，而是苏共领导。

苏共领导把他们的和平共处说得天花乱坠。他们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主要观点

是什么呢？

（一）苏共领导认为，和平共处是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凌驾一切的最高原则。他们说，和平共处是“现时代的至高无上的绝对命令”，是“时代的无条件的要求”。他们还说，“和平共处是解决社会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的最好的和唯一可行的道路”，和平共处原则应当成为“整个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

（二）苏共领导认为，帝国主义现在已经愿意接受和平共处，已经不是和平共处的障碍。他们说，“不少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现在主张和平与和平共处”，“越来越清楚地理解到和平共处的必要性”。他们特别宣扬，美国总统“承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的理智性和现实性”。

（三）苏共领导主张同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实行“全面的合作”。他们说，苏美两国“能够找到为了全人类幸福而协调一致地行动和努力的基础”，“能够为巩固和平和建立所有国家的真正国际合作而携手前进”。

（四）苏共领导认为，和平共处是“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五）苏共领导还认为，“和平共处原则正在决定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当前“共产主义的战略基础”，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都要“把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作为自己政策的总原则”。

（六）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看作是各国人民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前提。他们认为，各国人民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条件下取得的”。他们说，“恰恰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古巴实行了社会主义革命，阿尔及利亚人民获得了民族独立，四十多个国家取得了民族独立，各兄弟党成长壮大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增长了。”

（七）苏共领导认为，和平共处是“帮助国际革命工人运动达到其基本的阶级目标的最好方法”。他们说，在和平共处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增长了。他们并且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竞赛中的胜利，“将意味着对全部资本主义关系的毁灭性的打击”。

“当苏联人民享受到共产主义的幸福的时候，世界上又会有几亿人说：‘我们赞成共产主义！’”那时，就是资本家也会“转而加入共产党”。

请看，苏共领导的这些观点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究竟有什么共同之点呢？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而赫鲁晓夫却把和平共处说成是当代社会生活的最高原则。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的国际政策的一个方面，而赫鲁晓夫却把和平共处引伸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并且进而引伸为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的总路线。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则是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从国际阶级斗争观点出发的，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

则是在国际范围内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出发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同时，应当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则是用和平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背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政策变成了阶级投降政策。他利用和平共处的名义，背弃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阉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歪曲得不成样子，篡改得面目全非。

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明目张胆的背叛！

三个原则性的分歧

苏共领导同我们，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分歧，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分歧，而是究竟怎样正确对待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原则分歧。这些分歧，主要集中在下面的三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为了争取实现和平共处，要不要同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进行斗争？实现和平共处，能不能消除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和斗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从社会主义国家方面说来，没有任何困难。和平共处的障碍从来都是来自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提出的。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关系中，不容许侵犯别国的领土和主权，不容许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容许损害别国的利益和平等地位，不容许发动侵略战争。而侵略和奴役别的国家和民族，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这种本性是绝不会改变的。因此，就帝国主义的本性来说，它是绝不愿意接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只要有可能，帝国主义总是要破坏以至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总是要侵略和奴役别的国家和民族。

历史表明：只是由于种种不利的客观原因，帝国主义才不敢冒险发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或者被迫停战，接受某种程度的和平共处。

历史也表明：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始终存在着尖锐的复杂的斗争，有时甚至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和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即使在不发生热战的情况下，帝国主义仍然不断进行冷战，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处在冷战共处的状态中。帝国主义国家在积极扩军备战的同时，总是千方百计地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进行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冷战，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反对这种冷战的斗争，这是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表现。

帝国主义不但对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全世界到处推行它们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镇压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时紧时松，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赫鲁晓夫却不顾这些铁的事实，一味宣扬帝国主义已经承认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并且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看作是同和平共处政策不相容的。

在赫鲁晓夫看来，甚至当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军事威胁和武装进攻的时候，或者提出损害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和尊严的屈辱性要求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也还是只有退让再退让，迁就再迁就。

正是按照这种逻辑，赫鲁晓夫把他在加勒比海危机中步步退让，拿原则作交易，俯首贴耳地接受美帝国主义的屈辱性要求，叫做“和平共处的胜利”。

正是按照这种逻辑，赫鲁晓夫把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坚持正确的原则，把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印度反动派的武装进攻实行自卫反击，叫做“破坏和平共处”。

赫鲁晓夫有的时候也讲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但是，他是怎样看待这个斗争的呢？

赫鲁晓夫说：“必须努力使两种制度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变成只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

在这里，政治斗争不见了！

赫鲁晓夫还说，“列宁的不同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原则意味着不仅仅没有战争，意味着不是暂时的、不稳定的休战状态。它以这些国家之间保持友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为前提，规定建立和发展各种形式的和平国际合作。”

在这里，任何斗争都不见了！

赫鲁晓夫像魔术师一样，变来变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抹煞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对立，抹煞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抹煞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把两种制度和两个阵营之间的和平共处变成了“全面合作”。

第二个问题：和平共处能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必须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基本的内容。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是什么呢？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

列宁说过：“同先进国家的革命者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结成联盟，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者，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对外政策。”（列宁：《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七十二页。）列宁所提出的这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应当成为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指针。

在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以后，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要处理三个方面的关系，这就是：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

因此，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应当包括下列内容：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三项内容是互相联系的，缺一不可的。

苏共领导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我们要问，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怎样处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呢？难道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只是和平共处的关系吗？

当然，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必须相互遵守五项原则，绝不容许破坏兄弟国家的领土完整，绝不容许侵犯兄弟国家的独立主权，绝不容许干涉兄弟国家的内政，绝不容许在兄弟国家内部进行颠覆活动，绝不容许在兄弟国家关系中违反平等互利的原则。但是，仅仅实行这些原则，是远远不够的。一九五七年宣言指出，“这些原则是很重要的，但是还没有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的全部实质。兄弟般的互相援助，是它们的相互关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种互相援助有力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

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作为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实际上就是意味着取消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互助合作关系，把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当作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看待，这也就是意味着取消社会主义阵营。

苏共领导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我们要问，社会主义国家又应当怎样处理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呢？难道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同还没有获得解放的阶级兄弟，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不是相互支援的关系，而仅仅是和平共处的关系吗？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曾经一再指出，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推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根据地。斯大林也说过：“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革命，不当应当把自己看做是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做是用以加速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手段。”“它是世界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基地。”（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三百四十四页，第三百四十七页。）

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绝不能仅仅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还必须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还必须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作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

同列宁和斯大林相反，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也就是从对外政策中排除了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任务。这绝不是对和平共处政策的什么“创造性发展”，而是借口“和平共处”，背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第三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能不能作为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能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

我们认为，和平共处指的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指的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无产阶级只有在取得了革命胜利之后，才有可能和必要实行和平共处政策。对于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来说，他们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争取自己的解放，而不应该也不可能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实行和平共处。

因此，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引伸为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政策，或者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服从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都是错误的。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地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有利于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有利于团结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从而也有利于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同时，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直接打击和削弱侵略势力、战争势力和反动势力，有利于世界和平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从而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实现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地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利益是一致的。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同各国人民的革命，这毕竟是两类不同的问题。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指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这是一回事。和平共处根本不容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各国的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另一回事。这些斗争，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和平共处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任何一个国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只能经过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阶级社会中，把和平共处看作是“解决社会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的最好的和唯一可行的道路”，把和平共处看成为“整个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这是完全错误的否定阶级斗争的社会和平主义，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明显的背叛。

早在一九四六年，毛泽东同志就对这两类不同的问题加以区别，并且明确地指出：苏联同美国、英国、法国在若干问题上达成的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毛泽东：《关

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一百八十一页。)

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方针。正是在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正确方针的指导下，中国人民毅然决然地把革命进行到底，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同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相反，苏共领导把已经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处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同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的总路线混为一谈，企图用前者代替后者，要各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一律服从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他们自己不革命，也要别人不革命，他们自己不反对帝国主义，也要别人不反对帝国主义。

关于这一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和赫鲁晓夫最近的一些讲话力图加以否认。他们说，指责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是“骇人听闻的诽谤”。他们甚至装模作样地说，和平共处“不能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同资本进行的阶级斗争以及民族解放运动”。

但是，这种抵赖是没有用处的。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和平共处政策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方面，为什么你们直到最近还说和平共处政策是“在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的战略路线”呢？你们要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被压迫民族的共产党都把和平共处作为自己的总路线，这难道还不是要用你们的“和平共处”政策来代替各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把和平共处政策任意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各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只能主要地依靠自己的斗争，怎么能把这些胜利说成是以和平共处为前提，或者是和平共处的结果呢？你们的这种说法，难道还不是要把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从属于你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就和在经济竞赛中取得的胜利，无疑会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起着示范和鼓舞的作用。但是，怎么能够说，不是通过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是通过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呢？

苏共领导鼓吹什么依靠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就可以给全部资本主义关系以“毁灭性的打击”，就可以在全世界实现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这实际上就是认为，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根本用不着进行斗争，用不着起来革命，用不着推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只要安安静静地等待着，等到苏联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普天之下的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奴隶，就都可以同压迫者、剥削者一起，进入共产主义了。这难道不正是苏共领导要用所谓“和平共处”来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取消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吗？

从上面三个问题的分析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同苏共领导的分歧，是重大的原则性的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在于：我们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列宁主义的，是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是有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事

业的，是符合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的利益；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是反列宁主义的，是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是有害于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的，是违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利益。

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

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遭到了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各国革命人民的坚决拒绝，但是受到了帝国主义的热烈赞扬。

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毫不掩饰他们对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的欣赏。他们把赫鲁晓夫看作是“西方在莫斯科的最好的朋友”，说“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行动像个美国政治家”。他们说，“对自由世界来说，赫鲁晓夫同志被看作是俄国人最好的总理。他是真正相信和平共处的”。他们公开表示，“改善苏美关系的这种可能性，使美国国务院一些人士觉得，美国应当在某些限度内使赫鲁晓夫的任务得到方便”。

帝国主义一向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叫嚷“共处这个字眼是既可怕又可恶的”，“让我们把这种暂时的、不自然的共处观念抛进垃圾堆”。为什么他们现在却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总路线发生这么大的兴趣呢？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已经看到，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总路线对帝国主义是有利的。

美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它的消灭各国人民革命，消灭社会主义阵营，独霸全球的战略目标，历来都是采取战争的与和平的两手策略。在国际形势的发展对它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需要在继续扩军备战的同时，更多地玩弄和平阴谋。

杜勒斯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提出，美国要全力以赴地执行“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高尚战略”。

肯尼迪上台以后，继承和发展了杜勒斯这一“和平战略”，并且大讲“和平共处”。他说，“我们需要一种比氢弹好得多的武器，……这种更好的武器就是和平合作”。

这是不是说，美帝国主义真的愿意接受和平共处，或者用苏共领导的话来说，承认了“和平共处的明智性和现实性”了呢？当然不是这样。

人们只要认真地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出美帝国主义所说的“和平共处”的真正含义和目的。

它的真正含义和目的是什么呢？

第一，美帝国主义力图用所谓“和平共处”来束缚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手脚，不许它们支持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杜勒斯说过：“就苏联政府而论，如果它摆脱国际共产主义的规定方向，而主要谋求俄国国家和人民的福利的话，它是能够结束‘冷战’的。同样，如果国际共产主义放弃它在全世界的目标，……‘冷战’也能结束。”

肯尼迪说过：如果要改善美苏关系，苏联就必须放弃“使全世界共产主义化”的计划，就必须“只照管它的本国利益，并且只照管使它的人民在和平的条件下过美好的生活”。

腊斯克说得更加露骨。他说，“在共产党领导人放弃他们的世界革命目标之前，是不可能获得有保障的持久和平的”。他还说，一些迹象表明，苏联领导人“对于他们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承担的义务和加于他们的负担和风险抱有反感”。他甚至公开要求苏联领导人“撇开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幻想而从那里继续前进”。

这些话的意思是再清楚不过了。美帝国主义把资本主义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而进行的革命斗争，都说成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全世界共产主义化”的结果。他们向苏联领导人说：你们希望同美国和平共处吗？可以的！条件是你们绝对不能支持资本主义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并且要负责使这些国家的人民不起来革命。这样，按照美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就可以便于他们放手地扑灭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把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置于美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统治之下。

第二，美帝国主义在所谓“和平共处”的名义下，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力图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

杜勒斯说过：“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处于守势是不够的，自由必须成为能够渗透进去的积极力量”。“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

艾森豪威尔说过：美国将竭尽全力使用“和平手段”，“以便让那些处在独裁暴政束缚下的人民，能够最终享有自由表决权来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肯尼迪说过：“我们的任务是，尽我们的一切力量”，使“苏维埃帝国以及各大洲正在发生的变化，都能给更多的人带来更大的自由，并且带来世界和平”。肯尼迪还宣布对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奉行一种耐心地鼓励自由、谨慎地压制暴政的政策”，以便为这些国家的人民提供所谓“自由选择”。

这些话也是非常清楚的。美帝国主义把社会主义制度诬蔑为“独裁”和“暴政”，把资本主义复辟说成是“自由选择”。他们向苏联领导人说：你们希望同美国和平共处吗？可以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美国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相反地，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这也就是说，对于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美帝国主义绝不甘心，它总是妄想要消灭一切社会主义国家。

总之，美帝国主义的所谓“和平共处”的含义是：一切受帝国主义奴役和统治的人民不许争取解放，一切已经解放了的人民必须重新受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统治，全世界都要统一到美国的所谓“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

人们不难看到，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正好是投合了美帝国主义的口味。

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竭力讨好美帝国主义，不断地宣扬帝国主义的代
表人物“关怀和平”，这恰恰适应了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政策的需要。

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反对革命，取消革命，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不许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要求。

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在国际范围内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鼓吹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全面合作”，为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大开方便之门，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的要求。

帝国主义从来是最好的反面教员。在这里，我们不妨把杜勒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说过的两段话抄录在下边。

杜勒斯说：“有迹象表明，在苏联内部有要求较大的自由主义的力量”。“如果这种力量在苏联内部继续发展，而且声势日大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也有理由希望，像我曾经说过的，在十年或者一代期间里，我们可以达到我们政策的伟大目标，这就是出现这样一个俄国，它是由能够反映俄国人民的愿望、放弃了统治全世界的掠夺野心，并且遵循文明国家的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中所体现的原则行事的人们所统治的。”

杜勒斯还说：“长远的前景——说实在的，我要说，长远的必然性是，苏联统治者们目前的政策将要有所演变，从而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成分将要增加，而国际主义的成分将要减少。”

看来，杜勒斯的幽灵缠住了那些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人，以致他们简直对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着了迷，根本不愿意想一想，他们的所做所为是多么符合美帝国主义的希望。

苏美合作是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

苏共领导几年来开口“和平共处”，闭口“和平共处”，实际上他们对待中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不仅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而且也不符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苏共领导所以不断宣扬和平共处是他们对外政策总路线，说穿了，就是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要全世界所有共产党，都服从他们这些年来梦寐以求的苏美合作。

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这是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

请看他们的妙论：

“现代两个最伟大的强国——苏联和美国，把世界上任何一个其它的国家都远远地留在后面。”

“这两个国家中的每一个，率领着一大批国家——苏联率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美国——资本主义阵营。”

苏联和美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为和平而联合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战争。那时，如果有某个疯子想挑起战争，我们只要用手指吓唬他一下，就

足以使他安静下来”。

“在苏联政府首脑尼·谢·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约·肯尼迪之间达成协议，决定人类命运的国际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人民的最凶恶敌人，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这一点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上是写得清清楚楚的，你们怎么能够同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联合起来”保障和平呢？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三十多亿人口，难道都无权掌握自己的命运，都必须规规矩矩地听从苏美两个“巨人”、两个“最伟大的强国”的摆布吗？你们的这种狂妄的谬论，不是十足的大国沙文主义，十足的强权政治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你们当真以为，只要苏美两国达成协议，只要两个“大人物”达成协议，就可以决定全人类的命运，就可以解决一切国际问题吗？你们错了，完完全全错了！从古到今，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更不可能有这样的事。现在世界上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有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有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有帝国主义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难道苏美两国达成协议，这些矛盾就会消失了吗？

在苏共领导的心目中，只看得起一个美国。为了追求苏美合作，苏共领导不惜背弃苏联人民的真正盟友，不惜背弃至今还处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兄弟以及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苏共领导极力破坏社会主义阵营。他们用尽一切造谣诽谤的办法攻击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施加政治的和经济的压力。对于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他们要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同美帝国主义一道向革命的古巴施加压力，要古巴牺牲自己的主权和尊严。

苏共领导极力破坏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他们充当社会改良主义的传教士，瓦解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斗志。他们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破坏民族解放运动，越来越露骨地充当美国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苏共领导为了追求苏美合作，费了这样大的力气，付出了这样巨大的代价，他们究竟从美帝国主义那里捞到了什么呢？

从一九五九年以来，赫鲁晓夫就对苏美两国首脑会晤着了迷。他在这个问题上不知做了多少好梦，散布了多少幻想。他热烈赞颂艾森豪威尔是一个“懂得大政策”的“大人物”，热烈赞颂肯尼迪“理解到这两个强大国家的政府所负担的重大责任”。苏共领导大肆宣扬所谓“戴维营精神”，大肆宣扬维也纳会晤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苏联报刊鼓吹说，苏美两国首脑坐在一起，人类历史就进入了“新的转折点”；这两个

“大人物”一握手，国际关系就出现了“新纪元”。

但是，美帝国主义是怎样对待苏共领导的呢？戴维营会谈一个多月以后，艾森

豪威尔公开宣布：“我不知道有任何戴维营精神”。戴维营会谈七个多月以后，艾森豪威尔派遣 U—2 间谍飞机侵犯苏联，破坏了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维也纳会晤以后不久，肯尼迪公然提出苏美二十年和平的狂妄条件，那就是：苏联不得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维也纳会晤一年多以后，肯尼迪下令对古巴实行海盗式的军事封锁，制造了加勒比海危机。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喧嚷一时的“戴维营精神”、“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国际关系的新纪元”，如此等等，现在究竟在哪里呢？

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以后，苏共领导又大肆鼓吹所谓“莫斯科精神”。他们说什么要“趁热打铁”，并且说苏美达成进一步协议的“有利条件都具备了”，不应该采取“慢慢来”和“不着急”的态度。

究竟什么是“莫斯科精神”呢？我们不妨看一看最近发生的这样一些事情：

苏共领导为了进一步创造“苏美合作”的气氛，在莫斯科举行庆祝苏美建交三十周年的集会，同时又派了一个文化代表团到美国去进行纪念活动。可是，苏共领导的这种“热情”，得到了什么呢？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全体人员拒绝出席莫斯科的庆祝会，美国国务院发出特别备忘录，要求美国公众抵制苏联文化代表团，并且指责他们是“最危险而可疑的人物”。

在苏共领导鼓吹什么“苏美合作”的时候，美国却派出间谍巴洪到苏联去活动。苏联政府逮捕这个间谍，本来是完全正当的。可是，在肯尼迪叫嚷说，美苏小麦买卖“要靠两国合情合理的气氛”，“这种气氛因巴洪被捕而被大大破坏”之后，苏联政府就以“美国高级官员对巴洪命运的关怀”为理由，不加审判，急急忙忙把这个被宣布为“侦讯证实”“干了反苏间谍活动”的美国间谍释放了。

所有这些，难道就是“莫斯科精神”吗？如果这就叫做“莫斯科精神”的话，那实在是太可悲了。

莫斯科，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光辉名字，这个自从伟大的十月革命以来为全世界千百万人所景仰的光辉名字，今天竟然被苏共领导用来掩盖他们勾结美帝国主义的肮脏勾当而蒙受了奇耻大辱！

总之，为了向美帝国主义乞求“友谊”和“信任”，苏共领导向美帝国主义不知说了多少好话，求了多少人情，向兄弟国家和兄弟党不知发了多少脾气，施加了多少压力，向各国革命人民不知玩弄了多少花样，进行了多少欺骗。但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他们从美帝国主义那里得到的，只是屈辱，屈辱，还是屈辱。

劝告苏共领导几句话

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在抗击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严酷的日子里，在卫国战争的熊熊烈火中，什么时候在困难面前低过头？什么时候在敌人面前下过跪？今天，世界上是一片大好革命形势，社会主义从来没有这样强大，

帝国主义从来没有这样困难，可是，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被美帝国主义欺负到这步田地，社会主义阵营的荣誉竟然被苏共领导糟蹋成这个样子。我们同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怎么能不感到莫大的痛心呢！

在这里，我们愿意诚恳地劝告苏共领导几句话。

美国是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帝国主义的战略目标是妄想征服全世界。它疯狂地镇压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它公开宣称要东欧重新回到所谓“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你们怎么能够设想，按照美帝国主义征服全球的侵略计划，最沉重的打击只会落到别人头上，而不会落到苏联头上呢？

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你们怎么能够设想，这两个社会制度根本对立的国家，可以实现什么“全面合作”呢？

美国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之间，尚且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美国必欲把它们踩在自己脚下而后已，你们怎么能够设想，帝国主义的美国，会同社会主义的苏联融洽相处呢？

苏共领导同志们！请你们冷静地想一想吧，一旦世界上出现狂风暴雨，难道美帝国主义是靠得住的吗？不，美帝国主义是靠不住的，任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靠不住的。苏联的真正可靠的同盟者，只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只能是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和发展，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的发展，是任何人也扑灭不了，阻挡不住的。任何人背叛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背叛全世界人民，妄想同美帝国主义合伙来主宰世界，到头来是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苏共领导这样做，是极端错误和极端危险的。

悬崖勒马，为时未晚。现在是苏共领导抛弃你们那条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回到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道路上来，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的时候了。

原载人民日报 1963-12-12

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由于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从来没有受到像今天这样严重的威胁。在国际范围内，在一些党的内部，都存在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激烈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分裂危险。

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这是摆在全世界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面前的迫切任务。

中国共产党一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为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立场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

苏共领导自从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以后，一直表白他们也是致力于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最近期间，他们特别起劲地叫喊“团结”。这使人想起了九十年前恩格斯说过的话。恩格斯说，“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分裂的罪魁”。“最大的宗派主义者、争论成性者和恶徒，在一定的时机会比一切人都更高声地叫喊团结”。（《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百一十三页。）

苏共领导在标榜“团结”的同时，企图把“分裂主义”的帽子戴在中国共产党头上。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中国领导人不仅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而且破坏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践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粗暴地违反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在这以后，苏联报刊发表的许多文章，都一直谴责中国共产党人是“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

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究竟是谁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谁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谁践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是谁粗暴地违反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呢？一句话，究竟谁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分裂主义者呢？

只有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了，才能够找到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道路，才能够克服分裂的危险。

历史的回顾

为了弄清楚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裂主义的性质和正确地进行反对分裂主义的斗争，不妨回顾一下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

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中，贯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的斗争，贯穿着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的斗争。一国范围内是这样，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在长期的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理论上阐明了无产阶级团结的真谛，并且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树立了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光辉范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创立了最初的国际工人组织即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这个同盟所写的纲领《共产党宣言》中，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号召，并且系统地、透彻地阐明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学说，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为国际无产阶级在这个原则基础上的团结，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为了联合各国工人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六四年创立了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在第一国际存在的整个时期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同巴枯宁派、普鲁东派、布朗基派、拉萨尔派以及其他派别，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其中，同分裂主义者巴枯宁派的斗争特别激烈。

巴枯宁派从一开始就攻击马克思的学说，指责马克思“使自己特殊的纲领、自己个人的学说在国际中占统治地位”。实际上，正是他们企图强迫国际接受他们的宗派信条，以巴枯宁的机会主义纲领代替国际的纲领。他们施展一系列阴谋，不择手段地拼凑自己的“多数”，进行宗派活动和分裂活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维护国际无产阶级的真正团结，对于巴枯宁派分裂第一国际的公开挑战，采取了原则上毫不妥协的态度。一八七二年，在马克思亲自参加的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坚持分裂主义的巴枯宁派被开除出第一国际。

恩格斯曾经说过，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在海牙对巴枯宁派的分裂活动采取无原则的调和态度，那就必然在国际工人运动中造成严重的后果。恩格斯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确实就会灭亡，会因‘团结’而灭亡！”（《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百一十四页。）

第一国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反对了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

一八七六年第一国际宣布结束以后，许多国家相继成立了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视着这些政党的建立和发展，希望它们能够在科学的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当时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德国工人政党给以

特别的注意和关怀。他们曾经多次尖锐地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了谋求所谓“团结”而同机会主义妥协的腐败风气。

一八七五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放弃原则,同拉萨尔派合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哥达纲领》。马克思指出,合并是“用太高的代价换来的”,“这个纲领完全要不得,它会使党遭到瓦解”。(《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一十四页。)恩格斯指出,这是“整个德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拉萨尔派的投降”。他说:“我深信,在这种基础上的合并连一年也保持不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四十二页。)

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的时候,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者“决不会拿原则来做交易”的著名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一十四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又对德国党的领导人的容忍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内活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马克思说,这些机会主义分子“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唯物主义的基础”,这是“糟蹋党和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给德国党的领导人的《通告信》中说:“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百四十三、三百六十三、三百六十二页。)

一八八九年,在恩格斯的影响下,第二国际成立了。第二国际处在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共产党宣言》成为世界各国千百万工人的共同纲领;另一方面,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把利用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变为盲目崇拜这种合法性,变成合法主义,使得机会主义在各国党内泛滥起来。

因此,在第二国际的整个时期,国际工人运动分成了两大派: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和冒充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派。

恩格斯同机会主义者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他特别严厉地批判了他们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恩格斯说,对于冒充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一百八十二页。)

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以后,这些“跳蚤”们就出来公开地、系统地修正马克思主义,并且逐渐占据了第二国际的领导地位。

伟大的列宁,在恩格斯之后,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最卓越的革命家,肩负起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重担。

当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们叫喊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完备”和“过时了”的时候,列宁庄严地宣告:“我们完全站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因为只有这样一个理论,

才能把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列宁：《我们的纲领》，《列宁全集》第四卷，第一百八十六、一百八十七页。）

列宁首先为在俄国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而奋斗。为了建立这样一个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政党根本不同的新型政党，列宁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派别，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在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正如第二国际其他党一样，存在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革命派就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机会主义派就是孟什维克。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为了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和统一，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同孟什维克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最后在一九一二年把坚持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孟什维克清除出党。

所有反对列宁的机会主义派别，都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列宁。他们千方百计地企图把分裂主义的罪名加到列宁头上。当时，托洛茨基纠合所有反对列宁的派别，打着“非派别性”的旗号，放肆地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咒骂列宁是“篡夺者”和“分裂者”。列宁回答说：标榜“非派别性”的托洛茨基，恰恰是“最坏的派别活动残余的最坏的代表者”，恰恰是“最最恶毒的分裂派”。（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八月”联盟的瓦解》，《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三百二十六、一百五十四页。）

列宁明确地表示：“统一，这是伟大的事业和伟大的口号！但是，工人事业所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统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反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的统一。”（列宁：《统一》，《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二百二十六页。）

列宁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因为孟什维主义，就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在俄国的形式和变种，并且受到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领袖们的支持。

列宁在反对孟什维克的同时，也对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列宁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批判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并且出席了第二国际的斯图加特会议和哥本哈根会议，同他们进行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公开背叛无产阶级。他们为了帝国主义的利益驱使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残杀，造成国际无产阶级最严重的分裂。正像卢森堡所说：修正主义者把“从前的自豪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现在战场上变成了：‘全世界无产者，自相残杀！’”。（罗莎·卢森堡：《演讲论文选集》第二卷，一九五一年柏林版，第五百三十四页。）

那时，在第二国际中最有势力、最有影响的党，是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正是这个党，首先站在德国帝国主义方面，成为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的祸首。

在这个紧急的关头，列宁挺身而出，为捍卫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而坚决斗争。

列宁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发表的《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一文中，宣布第二国际的破产，并且严厉地谴责第二国际大多数领袖们，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直接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

针对着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由同资产阶级秘密联盟变成公开联盟，针对着他们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业已造成的不可挽回的分裂局势，列宁指出，“现在，不坚决同机会主义决裂，不向群众说明机会主义失败的必然性，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的任务，就不可能实现工人的真正国际主义的团结”。（列宁：《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十五页。）

正是因为这样，列宁坚决地支持欧洲许多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决裂，勇敢地号召建立第三国际，代替已经破产的第二国际，以便重建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团结。

一九一九年三月，第三国际成立了。第三国际继承了第二国际的工作成果，清除了它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脏东西，使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得到了广泛和深入的发展。

列宁的理论和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

经验和教训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说明了什么呢？

第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国际工人运动，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总是一分为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中来。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这种或那种机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发生机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裂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引起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国际工人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也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巩固和加强起来的。

恩格斯曾经说过，“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实际上到处都以彼此进行生死斗争的各种不同党派的形式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百一十五页。）

事实正是这样，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这些本来是统一的事物，都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一分为二，变为相互斗争的两部分。每一次国际范围内反对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都把国际工人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都使国际工人运动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更加巩固和扩大的团结。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三国际的成立，就是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斗争的最伟大的成果。

团结，经过斗争甚至分裂，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是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辩证法。

第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还表明，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的斗争，实质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同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斗争。

不论在国际范围内，或者在一个国家中，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会有无产阶级的真正团结。

不论在国际范围内，或者在一个国家中，哪里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盛行起来，那里的无产阶级队伍就必然产生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每一次分裂，总是由于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反对和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引起的。

什么是分裂主义呢？

分裂主义就是向马克思列宁主义闹分裂。谁要是反对和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破坏无产阶级团结的基础，谁就是分裂主义者。

分裂主义就是向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闹分裂。谁要是坚持修正主义路线，把无产阶级革命党改变为资产阶级改良党，谁就是分裂主义者。

分裂主义就是向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闹分裂。谁要是实行违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和根本利益的纲领和路线，谁就是分裂主义者。

列宁说过：“哪里大多数觉悟工人在明确的决议指导下团结起来了，那里就有统一的意见和行动”，而机会主义者“就其最无耻地违背大多数工人意志这一点来说，恰恰就是分裂主义”。（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三百三十三、三百三十五页。）

分裂主义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分裂无产阶级的团结，为资产阶级服务。资产阶级的一贯政策就是要分裂无产阶级。他们分裂无产阶级的最恶毒的手法，就是在无产阶级队伍内贿赂和培植自己的代理人。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正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追求的不是团结无产阶级去同资产阶级斗争，而是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第二国际时期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修正主义者，就是这样。他们在帝国主义最害怕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时候，出来分裂国际工人运动，鼓吹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

在共产主义队伍中，谁要是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向马克思列宁主义闹分裂，向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闹分裂，向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闹分裂，那么，即使他们处于暂时的多数地位，甚至占据了领导地位，他们也还是分裂主义者。

在第二国际时期，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处于多数地位，而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处于少数地位。但是分裂主义者显然是伯恩斯坦、考茨基等机会主义派，而不是列宁的革命派。

一九〇四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孟什维克虽然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仍然是分裂主义者。当时，列宁指出：“中央机构（中央机关报、中央委员会和总委员会）与党决裂”，“中央机构已自外于党。谁拥护中央机构，谁拥护党？中间立场是没有的”。（列宁：《给布尔什维克苏黎世小组的信》，《列宁全集》第八卷，第

四十五、四十六页。)

总之，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分裂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根源。分裂主义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在组织上的表现。可以说，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分裂主义，也就是宗派主义。修正主义者是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最可恶的分裂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

第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还表明，无产阶级的团结是在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坚持团结的斗争是同坚持原则的斗争不可分割的。

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团结，是阶级的团结，革命的团结，反对共同敌人的团结，为共产主义伟大目标而斗争的团结。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理论和政治基础。国际无产阶级有了理论上和政治上的一致，才会有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

只有坚持原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达到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革命团结。放弃原则，同机会主义者同流合污，这就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而是像列宁所说的，“意味着无产阶级同本国资产阶级的统一，意味着国际无产阶级的分裂，意味着走狗的统一和革命者的分裂”。(列宁：《法国社会党人的正直呼声》，《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百三十四页。)

列宁还指出，受资产阶级购买和扶植的机会主义流派，“在没有被‘消灭’即被推翻以前，在它对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影响没有被清除以前，它是不会死亡的”，“正像资产阶级在未被推翻以前不会死亡一样”。因此，“要同机会主义流派进行无情的斗争”。(同上)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挑战，绝不能作原则的让步，只有同他们的分裂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极其宝贵的遗训，也是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近年来的事实表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他们提出了一条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就是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硬要把这样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强加于各国兄弟党，代替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两次兄弟党会议制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抵抗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谁就受到苏共领导的打击。

正是苏共领导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推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破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一手制造了目前的严重的分裂危险。

苏共领导根本不是致力于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而是分裂和瓦解社会主义阵营，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阵营搞得个乱糟糟。

他们违反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政策，破坏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他们任意损害兄弟国家的主权，干涉兄弟国家的内政，进行颠覆活动，力图从各个方面控制兄弟国家。

他们假借所谓“国际分工”的名义，反对兄弟国家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反对兄弟国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经济，要把兄弟国家变成他们的经济附庸。他们力图强迫经济比较落后的兄弟国家放弃工业化，变成供应他们原料的基地和推销他们剩余产品的市场。

苏共领导推行他们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不择手段，动辄对兄弟国家施加政治的、经济的以至军事的压力。

苏共领导公开地号召推翻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领导，悍然地断绝了同阿尔巴尼亚的一切经济关系和外交关系，专横地剥夺了阿尔巴尼亚在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中作为成员国的正当权利。

苏共领导违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片面地决定撤走在中国帮助工作的一千三百九十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三百四十三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二百五十七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在贸易方面对中国实行限制和歧视的政策。他们挑起中苏边境事件，对中国新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覆活动。赫鲁晓夫甚至不止一次地对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表示，中国共产党内的反党分子是他的“好朋友”。他赞扬中国的反党分子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说什么这是“有足够的勇气”的行动。

所有这些恶化国家关系的严重步骤，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是极其罕见的。然而，苏共领导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采取了这种骇人听闻的极端手段。苏共领导居然还口口声声宣称自己“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试问：你们的这些行为，难道有一丝一毫国际主义的气味吗？

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同样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兄弟党的关系方面。

苏共领导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假借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力图按照他们的意志改变其他兄弟党的领导。直到最近，他们仍然坚持把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作为恢复团结的条件，作为“每个共产党必须遵守”的“原则”。

苏共领导违反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关系准则，无视兄弟党的独立和平等的地位，硬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确立封建家长制的统治，把兄弟党关系变成“父子党”关系。赫鲁晓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兄弟党比做“不懂事的小孩子”，把自己

封作“母亲”。他沉醉于这种封建主义的自大狂，简直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

苏共领导根本不把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原则放在眼里，从来就习惯于独断专行，发号施令。他们任意撕毁兄弟党的共同协议，擅自对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

苏共领导破坏兄弟党通过内部协商解决分歧的原则，首先利用自己的党代表大会，接着又利用兄弟党的代表大会，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发动大规模的公开攻击。

苏共领导把兄弟党当作他们的外交棋盘上的小卒。赫鲁晓夫反复无常，朝三暮四，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但硬要兄弟党跟着他的调子转来转去，不知所从，不知所向。

苏共领导在许多共产党内部煽风点火，支持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追随者，或者攻击党的领导，或者篡夺领导地位，打击以至非法开除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这些兄弟党内制造分裂。正是由于苏共领导的这种分裂主义政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出现了组织上的分裂。

苏共领导还把兄弟党的联合刊物《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变成为推行修正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工具，违反杂志创刊会议的协议，肆意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

苏共领导还把修正主义路线强加给国际民主组织，力图改变国际民主组织的正确路线，在这些组织中制造分裂。

苏共领导完全颠倒了敌我关系。他们把本来应当对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矛头，指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

苏共领导一心一意追求“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把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当作最可靠的朋友，而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当作敌人。他们勾结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叛徒铁托集团以及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合伙反对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兄弟党、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

当苏共领导自以为从艾森豪威尔、肯尼迪那里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抓到一根似乎是救命草的时候，自以为处境顺利的时候，他们就得意忘形，大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妄想拿兄弟党、兄弟国家当作他们同美帝国主义做政治买卖的牺牲品。

当苏共领导的错误政策碰壁的时候，当他们处境困难的时候，他们又恼羞成怒，大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拿别人当作自己的替罪羊。

从以上一系列的事实，可以看到，苏共领导违反苏联人民的利益，违反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违反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走上了彻底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路。

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苏共领导用自己的修正主义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抗，用自己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来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对抗，用自己的宗

派主义和分裂主义来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相对抗。这样，苏共领导就同历史上一切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一样，使自己成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制造者，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制造者，也成为许多兄弟党内部的分裂制造者。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比之历史上和当代的一切机会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具有更大的危害性。人们知道，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出现在列宁缔造的、世界上最有威望的苏联共产党，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伟大的苏联。多少年来，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都怀着崇敬的心情注视着苏联共产党，都把苏联看成是世界革命的基地和斗争的榜样。苏共领导正是利用这种情况，利用列宁的党的威望，利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威望，掩盖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本质，欺骗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们。同时，他们又惯于使用两面手法，实际上干的是分裂、分裂，口头上却叫喊“团结”、“团结”。这种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时期内，起着迷惑人们的作用。有不少人，就是由于对苏共的传统信任，由于不明事情的真相，没有能够及时识破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

正因为苏共领导掌握着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政权，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所造成的巨大损害，是历史上任何机会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所无法比拟的。

可以说，苏共领导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宗派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

人们已经看到，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大大地助长了修正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更加泛滥，给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帮了大忙。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也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和“和平演变”政策的产物。反过来，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又为国内泛滥起来的资本主义势力服务，也为帝国主义服务，起着麻痹世界人民革命意志、阻挠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作用。

事实上，苏共领导已经博得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热烈赞扬和喝采。

美帝国主义特别夸奖赫鲁晓夫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分裂。他们说，“看来很清楚，赫鲁晓夫要同西方求得和缓的愿望是很真诚的，以致他愿意冒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裂的危险来实现这一点。”他们说，“赫鲁晓夫已经无可挽回地摧毁了斯大林时代的统一集团。这也许是赫鲁晓夫作出的最大贡献——不是对共产主义的最大贡献，而是对西方世界的最大贡献。”“我们应当感谢他错误地处理他同中国人的关系。……我们也应当感谢他突然提出许多非常唐突的倡议，而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混乱。”

他们认定，赫鲁晓夫是“西方可以期望与之打交道的最好的苏联总理，西方目前一定要设法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削弱他的地位的任何行动”。“美国政府现在相信，在赫鲁晓夫同赤色中国的争端中，美国应当给赫鲁晓夫以最大限度的支持”。

在给苏共领导捧场的啦啦队中，还有在政治上早已破产了的托洛茨基分子。在对待斯大林、对待美帝国主义、对待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这些基本问题上，托洛茨基分子是积极支持苏共领导的。他们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尤其是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造成的形势，极有利于在各个工人国家内恢复我们的运动。”“我们对此已准备了二十五年以上，现在我们必须参与进去，大力地行动起来。”他们宣布，“对于赫鲁晓夫派实行非斯大林化、反对更保守的流派的斗争，我们要给予批判性的支持”。

看！所有革命的敌人都在热心地替苏共领导撑腰。这是因为，在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上，在对待世界革命的问题上，他们同苏共领导人找到了共同语言。这是因为，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适应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的需要。

正如列宁所说，资产阶级懂得，“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百零三页。）现在，帝国主义老爷们正是怀着满意的心情，让苏共领导来为他们破坏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鸣锣开道。

苏共领导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分裂危险，但是他们却企图嫁祸于人，诽谤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什么“分裂主义”、“宗派主义”，捏造了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

在这里，我们认为有必要把苏共领导对我们的一些主要的诽谤，逐一加以驳斥。

驳所谓“反苏”

苏共领导把一切抵抗和批评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人，都叫做“反苏”。这是一个很吓人的罪名。反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反对伟大列宁缔造的党，这还了得！

但是，我们劝苏共领导不要装腔作势，“反苏”的罪名无论如何也加不到我们身上。

我们还劝苏共领导不要自我陶醉，“反苏”的罪名无论如何也封不住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嘴。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同世界上所有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对伟大的苏联人民、苏维埃国家和苏联共产党，一直怀着衷心的尊敬和真诚的爱戴。这是因为苏联人民，在列宁的党的领导下，点燃了十月革命的胜利火炬，开创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并且在以后的年代中走在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的最前列。这是因为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内对外政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对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了国际主义的支援。

斯大林在他逝世前不久曾经说过，“兄弟党的代表对我们党的勇敢和成就表示敬佩，给予我们党以世界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突击队’的称号。他们以此表示，

希望这支‘突击队’的成就能改善在资本主义压迫下受折磨的各国人民的处境。我认为，我们党没有辜负这种希望”。（斯大林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斯大林说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没有辜负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希望，说得很正确。这个党赢得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世界兄弟党的敬佩和支持，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大反斯大林，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能不能说他们没有辜负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希望呢？这就不能这样说了。

中共中央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曾经指出，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有着共同的要求。这些共同的要求是：

第一，“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对内对外政策”；

第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第三，“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国防”；

第四，“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实行社会主义各国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相互支持”；

第五，“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第六，“反对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

第七，“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中共中央还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实现这些要求，是“对本国人民应尽的义务，也是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应尽的义务”。

但是，苏共领导恰恰背弃了这些要求，辜负了兄弟党的希望，实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这不但违反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而且也违反苏联共产党、苏维埃国家和苏联人民的利益。

真正反苏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

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描绘得那么黑暗，那么可怕，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宣布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改变苏共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为资本主义势力在苏联泛滥大开方便之门，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追求美苏合作，对美帝国主义那样百般奉承，那样卑躬屈膝，给伟大的苏联丢脸，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用对待附属国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败坏了苏维埃国家的声誉，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反对和阻挠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成为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辩护

士，玷污了列宁党的光荣的国际主义传统，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总之，正是苏共领导的所作所为，使伟大的苏联和苏共蒙受了奇耻大辱，使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遭受了严重的损害。这是货真价实、不折不扣的反苏。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了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自然不能不对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进行严正的批评。我们反对的仅仅是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错误。我们这样做，正是为了维护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正是为了维护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怎么谈得上是什么“反苏”呢？

维护苏联和反对苏联的分水岭，在于是否真正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在于是否真正维护苏共、苏联和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严肃批评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正是维护苏联；反之，苏共领导实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才是真正的反对苏联；追随和屈从这种错误路线，并不是真正维护苏联，而只能是帮助苏共领导损害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这里，我们不妨温习一下列宁在二十世纪初期对待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态度。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第二国际最强大最有影响的党。但是，当列宁一旦发现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机会主义的时候，他就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指出，不应当“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最不体面的东西作为仿效的榜样”。他还说，“如果我们还想忠于马克思的精神和帮助俄国社会主义者担负起现代工人运动的任务，我们就应当毫无顾虑地和坦率地批评德国领袖们的错误。”（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沃伊诺夫（安·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六十九、一百五十页。）

遵照列宁的精神，我们正告苏共领导，如果你们不纠正自己的修正主义的错误，那末，为了苏联共产党、苏维埃国家和苏联人民的利益，为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和团结，我们将继续“毫无顾虑地和坦率地”批评你们。

驳所谓“争夺领导权”

苏共领导把我们批评和反对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说成是要“争夺领导权”。

首先，我们要问一问苏共领导，你们说我们要“争夺领导权”，究竟是向谁争夺呢？领导权究竟在谁手里呢？难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一种凌驾所有兄弟党之上的领导权，而这个领导权就在你们手里吗？

看来，苏共领导确实是把自己当作凌驾全世界兄弟党之上的当然领导者。按照苏共领导的逻辑，他们的纲领、决议、声明，都是金科玉律。赫鲁晓夫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不管怎样错误百出，荒谬绝伦，都是圣旨。所有兄弟党只能俯首听命，

恪守不渝,而绝对不准许批评和反对。这是十足的霸道,十足的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

但是,我们必须告诉苏共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封建集团。所有兄弟党,不论大党小党,新党老党,掌握政权的党或者没有掌握政权的党,都是独立自主、一律平等的。没有任何一次兄弟党国际会议,也没有任何一个各国兄弟党一致通过的协议,规定兄弟党之间有上级党和下级党、领导党和被领导党、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区别,规定苏共领导是兄弟党的太上皇。

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来看,由于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个或者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曾经走在运动的前列。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英国的工联运动和法国的工人政治斗争,曾先后处于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前列。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恩格斯说过:“现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恩格斯还说,对于德国工人来说,“事变究竟容许他们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这是不能预先断言的”。“但是,首先必须维护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容许产生任何爱国沙文主义,并且欢迎无产阶级运动中任何民族的新进展”。(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一书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六百二十八、六百二十九页。)

二十世纪初,俄国工人处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前列,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在一九一九年说过:“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中的领导权暂时(自然是在一个短时期内)转到俄国人手中去了,正像它在十九世纪各个不同的时期中曾先后掌握在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手中一样。”(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二百七十七页。)

恩格斯所说的“前列”,列宁所说的“领导权”,决不意味着走在国际工人运动前列的这个党可以对其他兄弟党发号施令,决不意味着其他兄弟党必须服从于这个党。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运动前列的时候,恩格斯说过:“它没有权利代表欧洲无产阶级讲话,特别是没有权利讲错误的话”。(《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百二十二页。)当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处于运动前列的时候,列宁说过:“必须预计到其他国家发展的一切阶段,决不要从莫斯科发号施令”。(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党纲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一百四十九页。)

就是恩格斯和列宁所说的这种前列的地位,也不是长期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转移的。这种转移,不是由任何人和任何政党的主观愿望来决定,而是由历史形成的各种条件来决定的。如果条件变化了,另外的党就可能走在运动的前列。如果一个处于前列地位的党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尽管它是最大的、最有影响的,那就必然丧失前列的地位。过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对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实行集中领导的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于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历史性的伟大作用。但是,当各国共产党成长起来以后,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以后,共

产国际的集中领导，就成为不必要也不可能了。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指出，“既然各个国家的内部情况和国际形势已经变得更其复杂，那末，要由某个国际中心来解决每个个别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各种问题，是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的。”历史表明，这个决定是符合实际的、正确的。

目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根本不存在谁有权领导谁的问题。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同时又相互联合的关系。对于共同有关的问题，兄弟党应当通过协商途径达到一致的观点，协调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兄弟党相互关系的这些准则，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中都有明确的规定。

苏共领导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自居，把其他所有兄弟党都当作是被领导者，这是完全违反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的。

当然，由于历史形成的各种条件，每个兄弟党所处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已经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就不同于还没有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先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就不同于后取得革命胜利的党。但是，这种区别，仅仅是赋予已经胜利、特别是先取得胜利的党支援其他兄弟党的更大的国际主义义务，而绝不是赋予它支配其他兄弟党的权力。

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和斯大林缔造的党，也是第一个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党。按理，苏联共产党应当继承列宁和斯大林的革命传统，肩负起支援其他兄弟党、兄弟国家的更大的义务，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

正是考虑到历史形成的这些条件，中国共产党衷心地希望苏联共产党肩负起这种光荣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一九五七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上，曾经强调指出，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因为当时苏共领导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他们毕竟最后接受了各国兄弟党共同制定的莫斯科宣言。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意见，也写入这个宣言中了。

我们认为，这种为首的地位，同兄弟党一律平等的原则并不矛盾。这并不意味着苏共有权支配其他兄弟党，而仅仅意味着苏共负有更大的责任和义务。

但是，苏共领导对于这个“为首”的地位，并不满意。赫鲁晓夫本人曾经多次对这一点大发牢骚。他说：“‘为首’在物质上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既不能给我们牛奶和黄油，又不能给我们土豆、蔬菜和住宅。那末，它在道义上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东西呢？给不了什么！”他还说，“我们要这个‘为首’有什么用呢？让这个‘为首’见鬼去吧！”

苏共领导嘴里说不要“为首”的地位，但是实际上要求凌驾一切兄弟党之上的特权。他们不是要求自己在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方面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而是要求所有兄弟党服从他们的指挥棒，跟着他们走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

苏共领导走上了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以后，他们当然也就丧失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为首”的地位。对于目前的苏共领导，如果还说“为首”的话，那就是为修正主义之首，那就是为分裂主义之首了。

今天，在各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问题，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问题，不是究竟谁领导谁的问题，而是究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屈服于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问题。苏共领导诬蔑我们“争夺领导权”，实际上是他们坚持要我们和所有其他兄弟党服从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领导。

驳所谓“抗拒多数的意志”、“破坏国际纪律”

一九六〇年以来，苏共领导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最惯用的一个论据，就是所谓“抗拒多数的意志”、“破坏国际纪律”。在这里，不妨回顾一下我们同苏共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

一九六〇年六月，苏共领导在布加勒斯特会谈中，用突然袭击的手法，散发了一个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通知书，并且纠合多数企图压服中国共产党。他们的这个企图没有得逞。但是，在这次会谈以后，苏共领导就提出在兄弟党的关系中少数必须服从多数的论点，他们强调有几十个党的代表都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观点，要中国共产党“尊重”布加勒斯特会谈中“一致表示的意见和意志”。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中，驳斥了这个错误的论点。中共中央指出，“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问题，究竟谁对谁错，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根据多数或少数来判断的。真理终究是真理。一时的多数，终究不能把错误变成真理；一时的少数，也终究不会使真理变成错误。”

但是，苏共中央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五日的信件中又重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少数服从多数的谬论，并且引用列宁在《杜马七人团》一文中的一段话，指责中国共产党“不尊重大多数兄弟党的意见，实际上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

出席一九六〇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会议上进一步驳斥了苏共领导的这种谬论。中共代表团指出：在目前的具体条件下，即不存在也不应当存在共产国际式的集中领导的条件下，在兄弟党关系中引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完全不正确的。在一个党内应当遵守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但在各个兄弟党之间则不能实行这个原则。各个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是各自保持独立而又互相联合的关系，在这里既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关系，更没有下级服从上级的关系。对于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问题，只能根据协商的原则，经过讨论，达成一致的协议。

中共代表团指出，苏共中央的信件中提出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显然根本否定了协商一致的原则。中共代表团问道：“苏共中央究竟是根据什么一种超党的党章提出这样一种组织原则来的呢？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曾经通

过这样一种超党的党章呢？”

中共代表团接着揭露了苏共中央的信件在引用列宁《杜马七人团》一文中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问题的一段话的时候，竟然故意删去了原文中“俄国”一词，企图把一个党内部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搬到兄弟党关系方面。

中共代表团进一步指出，“即使在一个党的内部，虽然在组织上必须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也不能说，在思想认识问题上的正确和错误，在任何时候都能根据多数和少数来加以判断。正是在列宁的这篇《杜马七人团》的文章里，列宁严厉地抨击了当时杜马党团中的七个取消主义者利用一票的多数压制少数马克思主义者的卑劣行为。列宁指出，七个取消主义者虽然占多数，但是他们并不能代表俄国按照马克思主义精神组织起来的先进的觉悟的工人大多数的统一意志、统一决议、统一策略，因而他们一切有关统一的叫喊都不过是十足虚伪的。列宁说，‘七个无党性分子要吃掉六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还要把这叫做统一。’列宁还说，恰恰是杜马党团中的六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行为‘是符合无产阶级大多数人的意志的’，只有那七个代表‘放弃压制政策’，才能保持团结一致。”

中共代表团还说，列宁的话表明，“甚至在一个党的一个小组里面，多数也不永远都是正确的，相反，有时多数也必须‘放弃压制政策’，才能保持团结一致。何况是在兄弟党之间？苏共中央的同志这样连文义都没有弄清楚，就急急忙忙地引用列宁的话，并且特意删去了一个重要的字，可是仍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们详细地引用中共代表团一九六〇年在兄弟党莫斯科会议上的几段发言，为的是说明，苏共领导攻击我们“抗拒多数的意志”的谬论，早就被我们驳得体无完肤了。正是由于中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坚持反对苏共领导这种谬论，关于兄弟党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被写入一九六〇年声明中。

苏共领导直到现在仍然喋喋不休地叫嚷“少数服从多数”，这只能表明他们要否定各国兄弟党的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地位，取消兄弟党之间协商一致的原则。他们企图在“多数”的幌子下，挟持一些兄弟党顺从他们的意志，并且利用这种虚假的声势来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苏共领导这样做，本身就是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是违反宣言和声明的。

今天，在各国共产党之间，如果说国际纪律，那不是别的，只能是遵守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我们已经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不是别人，正是苏共领导，破坏了这种必须遵守的准则。

如果苏共领导一定要分什么“多数”、“少数”，那么，我们愿意坦率地告诉苏共领导，我们并不承认你们是多数。你们所依恃的“多数”是虚假的。真正的多数并不在你们那一边。难道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的党员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是少数吗？你们和你们的追随者严重地脱离群众，难道能够把不赞成你们的错误路线的广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算在你们的所谓“多数”之中吗？

根本的问题在于，谁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谁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谁反

映他们的革命意志。

列宁在一九一六年谈到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的时候说道：“虽然只是李卜克内西和吕勒两个人对一百零八个人，但是这两个人却代表千百万人，代表被剥削的群众、大多数的人民，代表人类的未来以及日益发展和成熟的革命。而那一百零八个人只是代表在无产阶级队伍中一小撮善于拍马的资产阶级走狗罢了。”（列宁：《给波利斯·苏瓦林的一封公开信》，《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百零二页。）

今天，占全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包括那些暂时还没有觉悟但终究会觉悟起来的人们，都是要革命的。真正居于多数的，是代表他们根本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背叛他们根本利益的一小撮修正主义者。

驳所谓“支持兄弟党的反党集团”

苏共领导在苏共中央公开信中诽谤我们说，“中共领导策划和支持美国、巴西、意大利、比利时、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共产党的各种变节者的反党集团去进行反党活动。”

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近年来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发生了分裂现象，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苏共领导强制推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结果。

一些共产党的领导，由于接受了苏共领导强加给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或者由于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受到苏共领导的鼓励，把本国革命运动引入歧途，使本国革命事业遭到损失。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斗争中，追随苏共领导之后，摇旗呐喊，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起着消极的作用。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他们自己党内的广泛不满，不能不引起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抵制和反对。

这些苏共领导的追随者，在他们自己党内，也依样画葫芦，实行分裂主义的政策。他们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对于党内的路线分歧，对于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不允许进行正常的讨论，而且采取非法手段，排斥、打击以至开除坚持原则的共产党人。这就不可避免地使这些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带有特别尖锐的形式。

从根本上说，这些共产党党内斗争的性质，是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选择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是要把共产党建设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无产阶级革命党同把共产党变为资产阶级仆从、社会民主党变种之间的斗争。

苏共领导在苏共中央公开信中，歪曲了美国、巴西、意大利、比利时、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共产党的党内斗争真相。他们使用了最恶毒的语言，咒骂那些受到这些国家的党的修正主义集团排斥和打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苏共领导这样颠倒黑白，难道能够掩饰和改变这些共产党党内斗争的真相吗？不能，不能，绝对不能。

就拿比利时共产党的党内斗争来说吧。

比利时共产党的内部分歧，由来已久。随着这个党原来的领导集团越来越深地陷入修正主义的泥坑，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党内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比利时共产党的修正主义集团，在匈牙利反革命叛乱事件期间，竟然发表声明，谴责苏联帮助匈牙利劳动人民平息叛乱。

这个修正主义集团，反对刚果人民武装反抗比利时殖民主义者的血腥镇压，赞成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干涉和镇压刚果民族独立运动。他们还不知羞耻地夸耀自己率先向联合国发出呼吁，“要求迅速地、全部地执行联合国的决议”。

这个修正主义集团，赞扬铁托集团的修正主义纲领“包含有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

这个修正主义集团，肆意诋毁一九六〇年声明，说这个声明的内容是混乱的，“每二十行字，就有一句违反这个声明总路线的句子”。

这个修正主义集团，还在一九六〇年底和一九六一年初比利时工人大罢工期间，指责工人反抗军警镇压是什么“轻率的、不负责任的行动”，瓦解工人的斗争意志。

对于这个修正主义集团一连串的反叛比利时工人阶级利益、背叛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的行为，以格里巴同志为首的比利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理所当然地要进行严肃的斗争。他们揭露和批判了党内修正主义集团的错误，坚决地抵制和反对它的修正主义路线。

由此可见，比利时共产党内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这两条路线的斗争。

比共修正主义集团是怎样对待党内斗争的呢？他们实行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政策，采取非法手段打击和排斥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的共产党人。在比利时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他们拒绝听取格里巴等同志的意见，并且不顾广大党员群众的反对，就非法地宣布，从党内开除格里巴等同志。

在这种情况下，以格里巴同志为首的比利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革命路线，坚决反对比共原来的领导集团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为重建比利时共产党而斗争，这难道不是完全正确的、无可非议的吗？

苏共领导公然支持和鼓励比共修正主义集团，打击和排斥比利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只能暴露他们自己正是兄弟党内分裂的制造者。

至于说到印度共产党，那里发生的事情，具有更加严重的性质。

我们在《人民日报》编辑部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发表的《修正主义者的一面镜子》的文章里，根据大量事实，指出以丹吉为首的叛徒集团，已经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叛印度无产阶级和印度人民的革命事业，走上了民族沙文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的道路。他们篡夺了印度共产党的领导权，正在按照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意志，把印度共产党改造成为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利益的尼赫鲁

政府的仆从。

从那时以来，印度共产党的情况又有了什么变化呢？

全世界都看到，丹吉集团继续走着叛徒的道路。他们继续鼓吹阶级合作，鼓吹通过尼赫鲁政府“实现”印度的“社会主义”。他们积极支持尼赫鲁政府的庞大的扩军备战预算和搜刮民脂民膏的措施。他们破坏一九六三年八月在孟买发生的有一百万人参加的反对尼赫鲁政府横征暴敛政策的大罢工。他们阻挠在加尔各答举行的有十万人参加的要求释放被捕共产党员的群众大会。他们继续进行猖狂的反华活动，支持尼赫鲁政府的扩张主义政策。他们追随尼赫鲁政府投靠美帝国主义的政策。

随着叛徒面目的暴露，丹吉之流越来越遭到印度共产党的广大党员群众的反对和抵制。越来越多的印度共产党人清楚地看到，丹吉之流是印度共产党和印度民族的祸害。他们正在为重振印度共产党的光荣的战斗的革命传统而斗争。他们是印度无产阶级和印度人民的真正代表和希望。

苏共领导大肆喧嚷中国共产党支持“变节者”和“叛徒”，但是，支持像丹吉之流这样货真价实的变节者和叛徒的，不是别人，正是苏共领导。

苏共领导把许多国家内敢于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作斗争的共产党人一律咒骂为什么“变节者”、“叛徒”、“反党分子”。但是，这些共产党人究竟做了什么事呢？他们无非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要有一个革命党和一条革命路线。难道苏共领导真的以为，咒骂就可以把这些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吓倒，就可以使他们放弃坚持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的斗争，不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吗？这种如意算盘，是绝对办不到的。

古往今来，真正的革命家，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是大无畏的，是不怕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咒骂的。因为他们知道，代表未来的，不是那些看起来好像很可怕的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这样的庞然大物，而是自己这样的小人物。一切大人物都是小人物变成的。起初看起来好像很渺小的人们，只要他们手里有真理，得到群众的拥护，他们最终总会胜利的。列宁和第三国际就是这样。而因为丧失真理，失掉群众的拥护，有名的大人物和大团体，势必会衰亡，会变小变臭。伯恩斯坦、考茨基和第二国际就是这样。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向它的反对方面转化的。

共产党人是干革命的，如果不革命，那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共产党人，坚持革命立场，反对修正主义，是天经地义。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坚决支持革命者，支持反对修正主义的共产党人，同样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共产党从来不隐蔽自己的立场。我们支持世界上所有的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同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我们同修正主义者还有来往，为什么偏偏不能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往呢？苏共领导把我们支持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成是搞分裂主义，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恰恰是我们应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

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畏强暴，不怕困难，坚持真理，敢于斗争，表现了共产主义战士的伟大革命气概。以格里巴等同志为代表的比利时共产党人，以阿马佐纳斯、格腊布伊斯等同志为代表的巴西共产党人，以希尔等同志为代表的澳大利亚共产党人，以库马拉西里、桑穆加塔桑等同志为代表的锡兰共产党人，以及印度、意大利、法国、美国等许多国家共产党党内和党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是这样的英勇的战士。他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坚持建设一个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革命党，坚持符合本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革命路线，对于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理应博得一切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而斗争的人们的尊敬、同情和支持。

总之，在全世界，不论什么国家，不论什么地方，哪里有压迫，那里必定有反抗；哪里有修正主义者，那里必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他们对抗；哪里用开除党籍等等分裂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里势必产生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产生强大的革命政党。出乎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意料之外的变化正在发生。他们正在造成自己的对立面，而最终势必会被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对立面所埋葬。这是一条必然的客观规律。

目前的公开论战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大论战，归根到底，就是要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要修正主义的论战，就是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要大国沙文主义的论战，就是要团结还是要分裂的论战。这种涉及根本原则问题的争论，早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就已经开始，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在兄弟党的内部会谈中进行，在两年多以前采取了公开的形式。

大家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是苏共领导首先挑起来的，并且是苏共领导要坚持进行的。

在一九六一年十月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苏共领导发动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公开攻击。当时，出席苏共这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在致词中反对苏共领导的这种做法，指出这绝不是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但是，苏共领导是怎样回答我们的呢？他们说，他们发动公开论战“作得完全正确”，是“唯一正确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

后来，一九六二年一月间，越南劳动党建议“各党应当停止在广播电台和报刊上互相攻击”。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及其他兄弟党的支持。但是，苏共领导实际上拒绝了对停止公开论战承担肯定的义务。苏共领导不但一直没有停止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公开攻击，而且在一九六二年底到一九六三年初接连举行的欧洲五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策动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攻击，发动了一场规模更大的公开论战。这就迫使我们不能不对攻击者作公开的答辞。

一九六三年三月间，尽管对于兄弟党的攻击我们还没有答复完，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宣布从三月九日起暂时停止在报刊上作公开的答辩，但保留公开答辩的权利，为的是给已经商定将要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创造良好的气氛。但是，苏共领导竟然在中苏两党会谈前夕，进一步采取发表声明和通过决议的方式，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

七月十四日，当中苏两党代表团正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的时候，苏共中央就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甚至采取了蛊惑人心的手法，使用了种种谩骂的语言，放肆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这样，苏共领导进一步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公开论战。

从七月十五日起，苏共领导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从政府声明、领导人讲话、各种集会到发表文章，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从中央报刊到地方报刊，从广播电台到电视节目，把中国当作头号敌人加以诽谤和攻击。根据对苏联中央一级二十六家报刊的统计，从七月十五日至十月底，一共发表了一千一百一十九篇编辑部文章、社论、短评、署名文章、读者来信、漫画等等，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至于苏联地方报刊，根据对加盟共和国十五种机关报刊的不完全统计，在同一期间，也发了七百二十八篇反华材料。

对于这些反华宣传材料，凡是比较重要的，我们都在报纸上发表了，其中苏共中央公开信则先后全文发表了两次，并且用十几种外国语言向全世界广播，供关心这场公开论战的人了解苏共领导的观点。只是由于苏方的反华文章数量极大，而且大都千篇一律，我们报纸的篇幅有限，不能全部发表。我们的出版机关已经把这些文章统统收集起来，编成专册，陆续出版。

苏联方面已经发表了近两千篇反华文章和材料，按照兄弟党一律平等的原则，中国方面有权利发表相当的答辩文章和材料。

由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牵涉的问题比较多，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理，也关系到七、八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重大事件，因此，我们《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编辑部，经过认真的研究之后，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起陆续发表评论。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评论，连本篇在内，才发表了七篇。

对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我们还没有评论完。至于苏联中央一级报刊和地方报刊发表的大量反华文章，我们还没有答辩。

赫鲁晓夫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回答新闻记者的时候，曾经提出停止公开论战。但是，在那一天以后，苏联报刊仍然继续发表攻击中国的文章。

最近，苏共领导又一次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并且说，公开论战“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重大的损害”。我们要问苏共领导，过去，你们说，公开论战是“为了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是“唯一正确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你们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究竟是要的什么花招呢？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你们发表了两千篇的反华文章和材料，我们才不过发表了不到十篇的答辩文章，而且连对苏共中央的一封公开信还没有答辩完，就被要求停止答辩，这难道是符合兄弟党关系的平等原则的吗？你们说了那么久，说了那么多，我们才开始说了一点，你们就不耐烦了，就受不住了，就不愿意听了，这难道是合乎民主讨论的原则的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你们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苏联政府声明中曾经说，如果中国人继续论战，“那么，他们应当非常清楚，他们在这条道路上将遭到苏共和全体苏联人民的最坚决的回击”。苏共领导说这样的大话，不是明目张胆的恫吓和威胁吗？难道你们真的相信，只要你们命令一下，别人就会俯首贴耳，只要你们大喝一声，别人就会浑身发抖吗？老实说，从九月二十一日起，我们一直在等待着，很想领教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最坚决的回击”。

同志们，朋友们，你们错了，完完全全的错了。

公开论战既然已经开始，就得按规矩进行。如果你们认为，你们已经说得够了，那末，你们应当也给对方足够的答辩机会。如果你们认为，你们还有许多话要说，那就请吧，请说个够吧。但是，同样的，你们说够了以后，仍然应当让对方也说够。一句话，应当机会均等嘛。你们不是也说兄弟党是平等的吗？为什么你们要什么时候攻击兄弟党，就发动公开论战，你们要什么时候停止论战，就剥夺被攻击的兄弟党公开答辩的权利呢？

苏共领导悍然挑起公开论战，扩大公开论战，坚持公开论战，现在又叫喊停止公开论战，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看来，事件的发展，出乎公开论战发动者的意料。苏共领导原先以为对自己有利的公开论战，正走向他们意愿的反面。苏共领导手里没有真理，他们在攻击别人的时候，只能依靠造谣污蔑，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一旦论战展开，要摆事实、讲道理的时候，他们站立的基础动摇了，他们害怕了。

列宁曾经说过，对于修正主义者来说，“最不愉快、最不乐意和最不能接受的，莫过于弄清理论上、纲领上、策略上和组织上的主要意见分歧了”。（列宁：《再论社会主义国际局和取消派》，《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三十八页。）

苏共领导目前的处境，正是这样。

中国共产党对于公开论战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一开始就认为，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应当通过内部协商来解决。公开论战，不是我们挑起的，也不是我们愿意的。

既然公开论战已经开始，而且苏共领导也说过，公开论战是“按列宁的方式行事”，那么，论战就应当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并且要进行到水落石出。

更重要的是，既然苏共领导公然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然撕毁宣言和声明，那么，他们就不能指望我们不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保卫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既然论战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

是大非问题，那么，就必须把这些大是大非问题彻底弄清楚。这也是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问题的实质在于：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分歧，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大国沙文主义的分歧。停止公开论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样重大的原则分歧。相反地，通过公开论战，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才有可能辩明真相，分清是非，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正在促使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各国的革命者和各国革命人民动脑筋，想问题，促使他们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认真地思索本国革命问题和世界革命问题。经过这场大论战，人们终将能够明辨是非，区别真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这场大论战，全世界一切革命因素将被调动起来，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将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受到锻炼，更加成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必将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维护和加强团结的道路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给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造成了空前严重的威胁。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也就是分裂主义的立场。不管苏共领导怎样大声叫喊“团结”，怎样咒骂别人是“分裂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只要他们坚持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么，他们实际上是搞假团结，真分裂。

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的这个立场，是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结的唯一正确的立场。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才能建立起来。离开这个基础，就根本谈不上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斗争，也就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坚持原则同坚持团结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苏共领导真要团结，而不是假要团结，那么，他们就必须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就必须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而绝不允许用阶级合作或者阶级投降代替阶级斗争，绝不允许用社会改良主义或者社会和平主义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绝不允许用这种或者那种借口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如果苏共领导真要团结，而不是假要团结，那么，他们就必须严格遵守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而绝不允许用自己一个党的纲领代替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共同纲领。

如果苏共领导真要团结，而不是假要团结，那么，他们就必须划清敌我界限，就必须联合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联合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所有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联合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士，反对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绝不允许颠倒敌我关系，认敌为友，以友为敌；绝不允许从美苏两大国主宰世界的幻想出发，联合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叛徒铁托集团，反对兄弟国家、兄弟党和各国革命人民。

如果苏共领导真要团结，而不是假要团结，那么，他们就必须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严格遵守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国家、兄弟党关系的准则，绝不允许用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政策，来代替这些准则。这就是说：

必须遵守相互联合的原则，绝不允许纠合一些兄弟党打击其他兄弟党，进行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活动；

必须遵守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绝不允许以援助为名，行控制之实，借口“国际分工”，损害兄弟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反对兄弟国家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

必须遵守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则，绝不允许把自己放在其他兄弟党之上，把自己一党的纲领、路线、决议强加给其他兄弟党，绝不允许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进行颠复活动，绝不允许把兄弟党当作自己的附属品，把兄弟国家当作自己的附属国；

必须遵守协商一致的原则，绝不允许挟持所谓“多数”，来强制推行自己一党的错误路线，绝不允许利用自己的或者别国的党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声明、领导人讲话等方式，公开指名攻击别的兄弟党，甚至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总之，苏共领导如果真的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那就必须彻底抛弃他们的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只有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现代教条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其他形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只有这样，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才能够得到维护和加强。这是维护和加强团结的唯一可行的道路。

当前的世界形势，整个说来是大好的形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根本改变了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逆流的袭击，这也是历史发展进程中合乎规律的现象。它虽然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某些兄弟党带来暂时的困难，但是，修正主义者暴露了自己的面目，引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这是一件好事。

毫无疑问，马克思列宁主义必将葆其美妙的青春，磅礴于全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强大，更加团结；国际无产阶级事业和

世界人民革命事业，必将获得更加辉煌的胜利。现代修正主义是一定要彻底破产的。

我们愿意奉劝苏共领导冷静地想一想，你们坚持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究竟会给你们自己带来什么结果。我们愿意再一次真诚地向苏共领导呼吁，希望你们能够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来，回到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基础上来，回到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准则的基础上来，以便在原则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加强中苏团结。

尽管我们同苏共领导存在着严重分歧，我们对于在列宁和斯大林教导下成长起来的苏联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苏联人民，满怀着信心。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始终不渝地维护中苏团结，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全世界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原载人民日报 1964-02-04

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本文想讨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问题，这就是所谓“和平过渡”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来，是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用纲领的形式加以系统化，以其修正主义的观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又重弹这个老调。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切修正主义者，他们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无产阶级，都集中表现在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也正是这样。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是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门徒，也是白劳德和铁托的门徒。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过白劳德修正主义，出现过铁托修正主义，出现过“结构改革”论。这些修正主义，都还是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的局部问题。到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出现，并且在苏共领导中占据统治地位以后，它就成为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带有全局性质的大问题，成为关系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败的大问题了。

为此原故，我们要写这篇文章，以比过去更加清楚的语言，回答修正主义者。

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门徒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赫鲁晓夫提出了同十月革命道路根本对立的所谓“和平过渡”道路，也就是“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

让我们看一看赫鲁晓夫等人贩卖的所谓“议会道路”究竟是一些什么货色吧。

赫鲁晓夫认为，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按照资产阶级的选举法，无产阶级可以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他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只要把劳动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并且给那些不肯放弃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的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的回击，就有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

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

赫鲁晓夫认为，无产阶级只要取得议会中的多数，就等于取得政权，就等于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他说，工人阶级“获得议会中的多数，在国内有强大革命运动的条件下，把议会变成为人民政权机关，就意味着粉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建立议会形式的、新的即无产阶级的人民国家体制”。

赫鲁晓夫认为，无产阶级只要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他说，争得了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就可以为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创造实现根本社会改造的条件”。他还说，“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在目前条件下已经有了现实的可能，把绝大多数人民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下并使基本生产资料转入人民手中。”

苏共纲领认为，“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以前，就能够迫使资产阶级实行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超出一般改良的范围”。这个纲领甚至认为，某些国家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就可能出现这样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对资产阶级来说，同意赎买他的基本生产资料将是有利的”。

赫鲁晓夫鼓吹的这一套货色，并非什么创造，不过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再版，是伯恩施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的复活。

伯恩施坦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标志，就是宣扬合法的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他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他说，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制度，“不应破坏它，而应促使它进一步发展”；“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在今天我们只要通过投票、游行示威以及诸如此类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了”。

他认为，合法的议会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他说，工人阶级只要有了“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作为解放的基本条件的社会原则就得到了”。

他认为，“总会到来这样的一天，那时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如此强大，对整个社会将起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致可以这样说，统治者的宫殿不再能抵挡工人阶级的压力，而且几乎就自然而然地崩溃了”。

列宁曾经说过，“伯恩施坦主义者过去和现在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直接革命的一面除外的。他们不是把议会斗争看作专门适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斗争手段，而是看作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斗争形式，因而也就不需要‘暴力’、‘夺取’、‘专政’了。”（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二百一十九页。）

当之无愧的伯恩施坦继承者，是考茨基先生。考茨基同伯恩施坦一样，竭力宣扬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说，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解决阶级冲突的武装斗争不再有存在的余地”，如果仍然主张“用暴力来推翻政府，就未免滑稽可笑了”。他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是“由于缺乏耐心而使用暴力手段的

产婆，迫使一个孕妇不是在第九个月而是在第五个月分娩”。

考茨基是一个十足的议会迷。他有一句名言：“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驾于政府之上的主宰。”

考茨基还说：“我认为，议会共和国（不论有没有英国式的君主制上层人物）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社会可以从其中成长起来的基础。这种共和国就是我们所应当努力争取的‘未来的国家’。”

列宁严厉地批判了考茨基的这类谬论。

列宁斥责考茨基说：“只有坏蛋或者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资产阶级压迫下和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方式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这是绝顶的愚蠢或绝顶的虚伪，这是用旧制度旧政权下的投票来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列宁：《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四十页。）

列宁尖锐地指出，考茨基的议会道路，“这就是最纯粹最卑鄙的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却背弃了革命”。（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百七十六页。）列宁说，考茨基在解释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是把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使用的革命暴力化为乌有，他也就是在用自由主义来曲解马克思主义这方面打破了世界纪录。”（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二十四页。）

我们在这篇文章中，不厌其详地引述赫鲁晓夫和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言论以及列宁批判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言论，为的是证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正是不折不扣的现代的伯恩施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同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一样，赫鲁晓夫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也正是最突出地表现在反对革命暴力，“把革命暴力化为乌有”。而且，在这方面，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现在显然没有保持世界纪录的资格了，因为赫鲁晓夫已经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赫鲁晓夫不愧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门徒，而且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了。

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

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承认不承认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承认不承认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承认不承认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同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分水岭，历来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一切无产阶级叛徒的分水岭。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阶级专政，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

马克思主义一向公开声明暴力革命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指出，暴力革命是社

会主义社会诞生的产婆，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必由之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国家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就是军队和警察。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是依靠暴力维持统治的。

无产阶级当然是愿意和平取得政权的。但是，无数历史经验表明，反动阶级从来不会自愿让出政权，他们总是首先使用暴力，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发动内战，把武装斗争提到日程上来。

列宁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并且也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不经过国内战争就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预言》，《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百六十四页。）

列宁所讲的历史上的大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推翻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尚且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这样的革命，不经过国内战争，更是不可能的。

关于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普遍规律的问题，列宁反复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一段很长的‘阵痛’时期，暴力永远是替旧社会接生的稳婆”。（列宁：《被旧事物的破产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百七十五页。）“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是不能经过‘自行消亡’来实现的，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实现。”“必须不断教育群众，使他们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而且只能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百八十七页、第三百八十八页。）

斯大林也说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切资本统治的国家转向社会主义的“必然的和必不可免的条件”。（斯大林：《“论我们党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二百七十七页。）

没有暴力革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对资产阶级的制度进行根本改造呢？斯大林回答说，“显然是不能的。如果以为可以在适合于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范围内，用和平方式来进行这样的革命，那不是精神错乱、神经失常，就是公然无耻地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二十四页。）

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新经验，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毛泽东同志说：“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第三百二十二页。）

毛泽东同志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

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第五百二十九页。）

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同上，第五百三十五页。）

总之，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理。赫鲁晓夫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

当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开始提出所谓“议会道路”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认为，这是一个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严重错误，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由于当时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还处于开始阶段，同时，苏共领导也还没有挑起公开论战，因此，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对于赫鲁晓夫的“议会道路”的错误，没有进行公开的揭露和批评。但是，我们针对赫鲁晓夫的错误论点，在我们的文件和文章中正面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同时，在兄弟党之间的内部会谈和会议中，我们也对赫鲁晓夫的错误论点进行了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

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共中央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我们通过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明确地提出：

“我们党在争取和平改革的时候并没有放弃警惕，没有放弃人民的武装”。

“同反动派相反，人民不是好战的。”“但是当人民被迫而不能不拿起武器的时候，人民拿起武器来是完全正确的。反对人民这样做，要求人民向进攻的敌人屈服，这就是机会主义的路线。在这里，究竟采取革命的路线，还是采取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关系到六亿人民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是否应当取得政权的大问题。我们党采取了革命的路线，因而有了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这个问题上，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修正主义观点，是针锋相对的。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们又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正面阐明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实际上批判了赫鲁晓夫提出的同十月革命道路相对立的所谓“议会道路”。

在同苏共领导人的多次内部会谈中，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严肃地批评了赫鲁晓夫的错误观点。我们满腔热忱地希望他能够改正错误。

在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中共代表团同苏共代表团进行了尖锐的争论。

在这次会议的准备过程中，苏共中央所提出的宣言的第一稿，只提和平过渡的

一种可能性，根本没有提到非和平过渡的另一种可能性；只提议会的道路，根本没有提到其他任何斗争方式，同时又把这种通过议会道路取得政权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配合行动上”。中共中央当然不能同意把这种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写进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纲领性文件中去。

在中共代表团提出批评意见以后，苏共中央拿出宣言第二稿。这个文件，虽然增加了非和平过渡可能性的词句，但是，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仍然反映了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那些修正主义观点。

中共代表团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些错误观点。十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系统地说明了我们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观点，并且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书面提纲。

我们的书面提纲的主要论点是：

从策略的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

议会斗争的形式必须充分运用，但是，它的作用是有限的，而最重要的，应该是进行艰苦的聚积革命力量的工作；不应该把和平过渡只解释成为通过议会的多数。主要的问题是有关国家机器的问题，即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的问题。

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它们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

我们的这些论点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苏共中央代表团的同志当时无法反对这些论点，但是他们一再要求我们照顾他们内部的需要，希望宣言草案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法能够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

中共代表团考虑到，我们已经批驳了苏共领导的错误的观点，又提出了一个书面意见提纲。为了共同对敌，我们照顾了苏共同志一再提出的愿望，同意以苏共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稿子为基础，只在个别地方作了一点修改。

我们本来希望，经过这场争论，苏共同志能够悔悟过来，改正他们的错误。但是，同我们的期望相反，在这以后，苏共领导并没有改正他们的错误。

在一九六〇年的兄弟党会议上，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中共代表团又反复地同苏共代表团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彻底地揭露和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在会议期间，中苏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能达成协议。最后，中共代表团考虑到各国兄弟党普遍要求在这次会议上能够产生一个共同文件的愿望，才在这个问题上又作了一次让步，再一次照顾苏共领导的需要。我们同意把

一九五七年宣言上关于这个问题的几段文字，照抄在一九六〇年声明上。同时，我们在这次会上，散发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并且表示，这是最后一次对苏共领导的照顾，以后再也不能照顾了。

现在，如果有的同志批评我们当时对苏共领导的这种照顾是错误的，我们乐于接受这种批评。

正因为宣言和声明中有关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是以苏共的稿子为基础的，若干地方保持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所以，虽然作了一些修修补补，但是，总的提法是有严重缺点和错误的。文件中虽然指出统治阶级不会自动让出政权，但又说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有可能不经过内战而取得国家政权；虽然指出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但又说有可能取得议会中的稳定多数，使议会变成劳动人民服务的工具；虽然也提出非和平过渡，但没有强调暴力革命是普遍规律。苏共领导正是利用了宣言和声明中的这些缺点和错误，作为推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借口。

必须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中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提法，一直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的。我们绝不隐蔽自己的观点。我们认为，为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利益，为了使各国兄弟党的纲领性文件不致被修正主义者所利用，宣言和声明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法，有必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通过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协商，重新加以修改。

为了使大家了解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全面观点，我们把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作为本文的附件，再一次全文发表。

八年来，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有了很大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识破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真面目。但是，苏共领导仍然在寻找各种遁辞进行狡辩，还在千方百计地推销他们的这套货色。

因此，我们还有必要把他们所谓“和平过渡”的谬论加以驳斥。

诡辩改变不了历史

苏共领导为了掩饰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为了替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辩解，公然歪曲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公然歪曲历史。

苏共领导辩解说，马克思不是“设想过英国和美国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吗？其实，这个论据正是从叛徒考茨基那里捡来的。当年的考茨基，就是用同样的手法，来歪曲马克思的观点，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

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确实曾经说过：像美国、英国这样的国家，“工人们可以采取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就是在当时，马克思强调指出，这是一种例外。他说：“即使如此，我们也应当承认，在大陆上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

我们革命的杠杆”。（马克思：《海牙代表大会闭幕后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还说过，“英国资产阶级在它还垄断着表决权时，总是表示准备接受多数的决议。但是，请您相信，一旦当它在自己认为是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上处于少数时，我们就会在这里遇到新的奴隶主的战争”。（《卡·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六百八十六页。）

列宁在批判叛徒考茨基的时候说过：“借口马克思在七十年代曾经认为英国和美国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诡辩，通俗一点说，这是用引证来骗人。第一，就在当时马克思也认为这种可能是一个例外。第二，当时还没有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第三，英国和美国当时没有（现在有了）军阀制度——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机构。”（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九十一页。）

列宁说，帝国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决定它“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最大限度地到处发展军国主义”。在谈论和平转变或者暴力转变问题的时候，“竟然‘不注意到’这一点，那就等于堕落为资产阶级最庸俗的奴仆了”。（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二十一页。）

今天，苏共领导竟然又重弹考茨基的老调，这不也是等于堕落为资产阶级最庸俗的奴仆，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又辩解说，列宁不是“在原则上允许和平革命的可能性”吗？这更是十足的诡辩。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曾经设想过，“在俄国，这个革命可能例外地成为和平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七页。）列宁把它叫做“例外”，这是因为当时有一个特殊的条件，那就是“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压制人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同上，第一百七十三页。）到了七月间，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府，武装镇压群众，使彼得格勒的街头洒遍了工人和士兵的鲜血。在这次事件以后，列宁就指出：“俄国革命和平发展的一切希望都彻底破灭了。”（同上，第一百六十七页。）一九一七年十月，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坚决领导工人和士兵举行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一九一八年一月，列宁指出，“现在阶级斗争已经变成了内战”。（《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四百零六页。）这样，苏维埃国家又经过了三年半的革命战争，付出了重大的牺牲，粉碎了国内反革命叛乱和外国武装干涉，才巩固了革命的胜利。一九一九年，列宁说：“在十月革命中，革命暴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十九页。）

现在苏共领导竟然宣扬说，十月革命是“所有革命中最不流血的革命”，“几乎是和平完成的”。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你们这样说，怎么能够对得起为缔造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呢？

当我们指出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的时候，苏共领导狡辩说“用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经验是有的”。他们闭着眼睛

说，“在一九一九年，匈牙利曾通过和平途径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

事情果真是如此吗？不，不是。让我们看一看当时匈牙利革命领导人贝拉·库恩是怎样记述事情经过的吧。

匈牙利共产党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建立的。这个年轻的党一建立就投入了革命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武装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贝拉·库恩：《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训》。）匈牙利共产党积极地进行各种武装起义的工作：武装工人，在政府军队中进行了争取工作，在复员军人中进行了组织工作，组织武装示威，组织工人驱逐厂长占领企业，组织农业工人占领大地产，解除反动军官、反动军队和警察的武装，把武装起义同罢工斗争结合起来，等等。

事实上，在匈牙利革命中，充满了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武装斗争。贝拉·库恩说：“从共产党建立之时起直到夺取政权，同资产阶级政权机关的武装冲突一直进行着，并且越来越频繁。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布达佩斯卫戍部队手执武器走上街头，举行示威以反对临时政府陆军部长的那个时候开始……大概没有一天报刊上没有报道革命士兵和工人同政府的武装部队特别是同警察之间发生的流血冲突。共产党人不仅在布达佩斯并且也在各省组织了许多次起义。”（贝拉·库恩：《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在匈牙利取得了胜利》。）苏共领导说匈牙利革命是和平过渡，这真是弥天大谎。

苏共报刊说，当时匈牙利资产阶级政府是“自愿地辞职”的，这大概就是苏共领导的唯一根据了。事实是怎样的呢？

当时的匈牙利资产阶级政府首脑卡罗伊说得很清楚。他说：“我签署了关于我辞去职务和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的宣言，事实上无产阶级早已夺去并公开宣布取得了政权。”“我不是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因为它早就由于有计划地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军队而夺得了政权。”所以，贝拉·库恩指出，认为资产阶级自动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是一种虚伪的“神话”。（贝拉·库恩：《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训》。）

一九一九年匈牙利革命是失败了。列宁曾经分析过匈牙利革命失败的最主要的教训是：年轻的匈牙利共产党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在对敌人实行专政方面不够坚决，在关键时刻表现了动摇。同时，没有采取正确措施满足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因而脱离了广大的农民群众。而匈牙利共产党同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实行了合并，也是使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共领导硬说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匈牙利革命是“和平过渡”的典型，这完全是伪造历史。

苏共领导还硬说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是“通过和平途径取得政权”的。这又是荒唐可笑地歪曲历史。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民主政权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的，而不是从资产阶级手里“和平”取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反法西斯的游击战争和武装起义，并且在苏军的援助下，消灭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德国法西斯军

队及其走狗政权，建立了民族阵线联合政府。这个政府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

一九四八年二月，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阴谋制造反革命政变，准备进行武装暴乱，颠覆人民政权。但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立即调动武装力量，同时组织了群众的武装示威游行，粉碎了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阴谋。事实非常清楚，二月事件并不是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和平”夺取政权，而是工人阶级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国家机器，主要是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镇压资产阶级反革命政变。

哥特瓦尔德在总结二月事件的时候说过：“还在二月事件以前，我们就已经说过：与战前情况相比较，基本的变化之一恰好在于，国家政权已经不是为以前的各统治阶级服务，而是为一些新的阶级服务。二月事件表明，国家政权在这个意义上起了卓越的作用。”（哥特瓦尔德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的发言。）

以上所说的这些事例，怎么能说成是“和平过渡”的先例呢？

列宁说过：“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辞、诡辩和捏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掩盖他转到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即资产阶级方面去的行为。”列宁说，“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二十一页。）

赫鲁晓夫为什么要这样无耻地歪曲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伪造历史，玩弄欺骗手段呢？问题的实质也正是在这里。

谎言掩盖不了现实

苏共领导为他们反对革命的“和平过渡”路线辩解的主要借口，就是所谓当代的历史条件变了。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历史条件的变化的估计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赫鲁晓夫是根本不同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条件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力量的极大增长和帝国主义力量的极大削弱。战后，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民族独立国家，出现了连绵不断的武装革命斗争，出现了资本主义国家群众运动的新高涨，出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大发展。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成为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

毛泽东同志早在战后初期就多次指出，世界力量对比的优势是在我们方面，不是在敌人方面，这种新的情况“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

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三百六十页。）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四百九十页至一千四百九十一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根据战后历史条件更加有利于革命的变化，根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本性不会改变的规律，得出革命的结论，认为必须充分利用革命的大好形势，按照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积极促进革命斗争的发展，准备夺取革命的胜利。

赫鲁晓夫则借口战后历史条件的变化，得出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结论，认为由于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本性改变了，阶级斗争的规律改变了，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过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原理过时了。

赫鲁晓夫等人散布一种天方夜谭式的神话。他们说，“现在，对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来说，正在形成以和平形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利的国际和国内条件。”

他们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一期间，欧洲许多国家的反动资产阶级不断地发展和改进自己的警察官僚机器，残酷地镇压劳动人民的群众运动，因此没有可能用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认为，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改变了。

他们说，现在“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变化”，“使国际反动派对于实行革命的国家的内政干涉趋于瘫痪”，“这就减少了资产阶级发动国内战争的潜在可能性”。

但是，赫鲁晓夫等人的谎言，掩盖不了现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两个突出的事实是：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普遍增强暴力机器，残酷镇压人民群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到处进行反革命武装干涉。

美国今天已经更加军国主义化，它的军队扩大到了二百七十多万人，比一九三四年增加了十倍，比一九三九年增加了八倍。它的警察特务机关之多，就连美国一些大资本家自己也承认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远远超过希特勒德国。

英国的常备军从一九三四年的二十五万多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四十二万多人，警察从一九三四年的六万七千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八万七千人。

法国的常备军从一九三四年的六十五万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七十四万多人，警察和保安部队从一九三四年的八万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十二万人。

在其他的帝国主义国家，以至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大量增强军队和警察力量的情形，也都没有什么例外。

赫鲁晓夫最热心用全面彻底裁军的口号来麻痹群众。这种咒语念了好几年了。

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全面彻底裁军的影子一点儿也没有。人们看到，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里，到处都是全面彻底扩军，到处都是扩大和加强暴力镇压的机器。

资产阶级在和平时期这样拼命地增强自己的军队和警察力量，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不是为了镇压本国劳动人民的群众运动，倒是为了保证劳动人民能够和平取得政权吗？战后十九年来，世界各国资产阶级使用军队和警察镇压罢工工人，镇压要求民主权利人民群众的暴行，难道发生的还嫌少吗？

十九年来，美帝国主义同四十多个国家组织了各种军事集团和签订了各种军事条约。它在海外设立了二千二百多处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遍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它派驻在海外的兵力，达一百多万人。它的“进击司令部”统辖着一支由陆、空军联合组成的机动部队，随时准备开赴各地镇压人民革命。

十九年来，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不但通过各种方式支持世界各国反动派，帮助他们镇压本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而且还直接策划和发动了多次的反革命的武装侵略和干涉，也就是输出反革命。拿美帝国主义来说，它曾经在中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直接出兵并且指挥进攻希腊人民解放区，在朝鲜进行侵略战争，派遣部队在黎巴嫩登陆威胁伊拉克革命，支持和援助老挝反动派扩大内战，组织和指挥所谓联合国部队镇压刚果的民族独立运动，对古巴进行反革命入侵。它现在仍然在镇压越南南方人民的解放斗争。它最近还武装镇压巴拿马人民维护主权的正义斗争，并且参加对塞浦路斯的武装干涉。

美帝国主义不但对一切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坚决进行镇压和干涉，而且对凡是稍微表现了一些民族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政权，也要想办法把他们搞掉。十九年来，美国政府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策划了多次反革命军事政变，甚至对于它自己扶植起来的走狗，例如吴庭艳之流，只要一旦不再合乎它的心意，马上卸磨杀驴，也采取暴力手段除掉。

事实说明：今天，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进行革命，要争取解放，不但必须对付本国反动统治阶级的暴力镇压，而且必须充分准备对付来自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没有这种准备，不坚决在必要的时候用革命的暴力回击反革命的暴力，就根本谈不上革命，更谈不到革命的胜利。

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如果不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不作好对付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和干涉的准备，不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方针，就不能维护民族独立，更不能保证革命事业的发展。

我们要质问苏共领导，你们口口声声大谈战后形势的新特点，为什么偏偏要抹煞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到处镇压革命这个极其重要的、极其明显的特点呢？你们开口和平过渡，闭口和平过渡，却绝口不谈怎样对付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庞大的暴力镇压机器，这是为什么呢？你们公然掩饰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残酷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的血淋淋的现实，散布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能够和

平取得胜利的幻想，这岂不明明在麻痹各国人民的警惕性，用空洞的美好前景来安抚怒气冲天的群众，反对他们革命，实际上充当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帮凶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让已经死去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再来充当一次反面教员，还是很有益处的。

杜勒斯在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发表的一次演说中说，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通过使用暴力”建立起来的。他接着说：“苏联统治者现在说，他们将放弃使用暴力。”杜勒斯表示：“我们欢迎并且将鼓励这些事态发展。”

显然，杜勒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维护者，深深懂得暴力在阶级斗争中的重要作用。杜勒斯一方面欢迎赫鲁晓夫放弃暴力革命的主张，一方面极力强调资产阶级必须加强反革命暴力，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他在另一次的演说中说，“在政府的所有任务中，最基本的一项是要保护它的公民〔应读作反动统治阶级〕免遭暴力。”“因此，在一切文明的社会中，社会成员都出力维持一支警察部队，作为法治的武器。”

杜勒斯在这里说的是老实话。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统治的政治基础，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是“一支警察部队”。只要不触动这个基础，其他都是无关紧要的，都是动摇不了他们的统治的。苏共领导越是掩盖资产阶级依靠暴力统治的事实，越是宣传他们那种受到杜勒斯欢迎的和平过渡的神话，就越是暴露出了他们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反对革命的真面目。

驳所谓“议会道路”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议会道路”的主张，早已为列宁所彻底批判，早已宣告破产了。但是，在赫鲁晓夫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谓“议会道路”似乎突然变得灵验起来了。

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事实进一步说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是武力，而不是议会。议会只是资产阶级统治的装饰品和屏风。资产阶级实行议会制还是取消议会制，赋予议会较大的权力还是赋予较小的权力，采取这种选举法还是采取那种选举法，总是按照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和利益来决定的。在资产阶级掌握军事官僚机器的条件下，无产阶级要通过选举取得“议会中的稳定多数”，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不可靠的。通过“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完全是不可能的，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谈。

在资本主义各国的共产党中，现在仍有半数左右处于非法地位。对于这些连合法地位都没有的党，当然谈不上什么取得议会中的多数。

例如，西班牙共产党就是一直处于白色恐怖中，连参加选举也不可能。可是，像伊巴露丽这样的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也跟着赫鲁晓夫鼓吹西班牙实行“和平过渡”。这是十分荒唐和可悲的。

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虽然取得合法地位，可以参加选举，但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在资产阶级选举制度的种种不公平的限制之下，共产党很难获得多数选票。就是获得多数的选票，资产阶级还可以利用修改选举法等等手段，使共产党人不能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

例如，战后以来，法国垄断资产阶级就曾经两次修改选举法，使法共在议会中的议席两次大量减少。在一九四六年议会选举中，法共曾经取得一百八十二席，但是在一九五一年议会选举时，垄断资产阶级修改了选举法，结果使法共的议席陡然减为一百零三席，即少了七十九席。在一九五六年议会选举中，法共曾经取得一百五十席，但是在一九五八年议会选举时，垄断资产阶级再次修改选举法，结果使法共的议席陡然减为十席，即少了一百四十席。

即使在某种情况下，共产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议席，或者通过选举的胜利参加了政府，这也绝不等于改变了议会和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更不等于摧毁了旧国家机器和建立了新国家机器。要依靠资产阶级议会和政府，来实行根本的社会改造，是绝对不可能的。掌握国家机器的反动资产阶级可以宣布选举无效，解散议会，可以把共产党人从政府中排挤出去，宣布共产党非法，采取野蛮的暴力手段镇压人民群众和进步力量。

例如，一九四六年，智利共产党曾经支持资产阶级的激进党取得选举的胜利，组织了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联合政府。当时，智共领导人竟然把这个资产阶级掌握的政府称为“人民民主政府”。但是，不到一年，资产阶级就迫使共产党人退出政府，大规模逮捕共产党人，并且在一九四八年宣布共产党非法。

当工人政党蜕化变质为资产阶级御用政党的时候，资产阶级可以允许这样的党在议会中占有多数的议席，也可以允许他们组织政府。例如，若干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但是，这只能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专政，丝毫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无产阶级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地位。这样的事实，只是进一步证实“议会道路”的破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事实进一步说明，共产党的领导人如果信奉所谓“议会道路”，害了“议会迷”的不治之症，那就不仅只会落得一场空，而且必然陷于修正主义泥坑，葬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在如何对待资产阶级议会的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历来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参加议会斗争，利用议会的讲坛，揭露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教育人民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在应当利用这种合法斗争手段的时候不去利用，是错误的。但是，无产阶级政党绝不能用议会斗争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绝不能幻想通过“议会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在任何时候，无产阶级政党都必须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群众斗争上。

列宁说：“为了通过选举和各种党派在议会中的斗争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参加

资产阶级的议会活动，对革命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把阶级斗争局限于议会斗争，或者认为议会斗争是最高的、决定性的、支配着其余一切斗争形式的斗争，那就是实际上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而反对无产阶级。”（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二百四十一页。）

列宁曾经斥责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热中于议会制度的幻想，抛弃了夺取政权的革命任务，把无产阶级政党变为选举党，变为议会党，变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变为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现在，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鼓吹“议会道路”，也只能重蹈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复辙。

驳所谓“反对左倾机会主义”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在讲到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时候，凭空捏造了一大堆谎言，说中国共产党主张没有革命形势也要“提出立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主张放弃“争取资本主义各国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切身利益的斗争”，把武装斗争“绝对化”，等等。他们经常给中国共产党乱扣什么“左倾机会主义”、“左倾冒险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大帽子。

其实，苏共领导这样叫嚷，不过是想给他们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打掩护。他们攻击的所谓“左倾机会主义”，不是别的，恰恰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

我们一向认为，革命是不能随意制造的，没有革命的客观形势，就不会有革命。但是，革命的发生和革命的胜利，不仅仅要有革命的客观形势，还必须有革命的主观力量的准备和行动。

如果不正确地估计革命的客观形势和主观因素，在革命形势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就轻率地发动革命，那就是“左”倾冒险主义。如果在革命形势没有到来的时候，不积极进行革命的准备工作的，或者在革命形势已经到来，革命条件已经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不敢去领导革命，不敢夺取政权，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

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的时机没有到来之前，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放在艰苦地积蓄革命力量方面。积极领导日常的斗争的中心目的，是为了积蓄革命力量，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夺取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政党应当通过日常的各种形式的斗争，来提高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觉悟，训练自己的阶级队伍，锻炼自己的战斗力，做好思想上的、政治上的、组织上的、军事上的革命准备。只有这样，才能在革命形势成熟的时候，不失时机地夺取革命的胜利。否则，即使有了革命的客观形势，也会白白地错过革命时机。

苏共领导避而不谈在革命形势没有到来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怎样进行日常的革命斗争，积蓄革命力量，而只是开口闭口都强调没有革命形势就不能革命。

他们实际上是借口没有革命形势根本取消积蓄革命力量、准备革命的任务。

列宁曾经很精彩地描绘了叛徒考茨基对待革命形势的态度。列宁指出，对考茨基来说，革命形势“如果来到了，那他也愿意做一个革命者！但是那时候，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混蛋都会宣布自己是革命者！”“如果没有到来，考茨基就要离开革命！”列宁指出，考茨基像一个典型的市侩，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市侩的地方，就在于他有本领“准备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去进行革命”。（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七十一页至第二百七十二页。）人们可以比较一下，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像不像列宁所斥责的考茨基式的市侩。

我们一向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积极领导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保卫民主权利的斗争，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并且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在一切受到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应当高举反美的民族旗帜，把群众斗争的主要打击针对美帝国主义，也针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垄断资本集团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组成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

近年来，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斗争，这不仅是对本国垄断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势力的打击，而且是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有力支持，也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有力支持。对此，我们从来是给以充分估计的。

共产党人在积极领导当前斗争的时候，应当把当前斗争同为长远的和全局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结合起来，应当用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教育群众，不断地提高群众的觉悟，积蓄革命力量，以便在革命时机成熟的时候，夺取革命的胜利。我们的观点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观点相反，苏共领导鼓吹“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民主的任务和社会主义的任务是交织得这样紧密，以致在这里很少有可能划定什么分界线”。这也就是用当前的斗争代替长远的斗争，用改良主义代替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说过，“任何改良如果没有群众斗争的革命方法的支持，都不可能是巩固的、真正的、认真的改良。”工人阶级的政党“如果不把这种争取改良的斗争同工人运动的革命方法结合起来，就可能变成一个宗派，就可能脱离群众，而这对于真正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功来说，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威胁”。（列宁：《给“社会主义宣传联盟”书记的信》，《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四百零五页。）

列宁还说过，“在觉悟的工人看来，任何民主要求都是服从社会主义的最高利益。”（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五十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引述恩格斯的话说：如果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目前而牺牲未来的运动，

那就是机会主义，而且是危险的机会主义。

正因为这样，列宁批评考茨基“赞扬改良主义，赞扬服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责备革命，背弃革命”。列宁说，“无产阶级是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考茨基“则是在服从帝国主义的条件下，用改良主义手段‘改善’帝国主义，适应帝国主义”。（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六十五页、第二百六十四页。）

列宁对考茨基的批评，正好是今天苏共领导的写照。

我们一向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为了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必须善于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善于把各种斗争形式结合起来，善于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迅速地用一种斗争形式代替另一种斗争形式。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和平的与武装的，公开的与秘密的，合法的与非法的，议会的与群众的，国内的与国际的，等等，才能在任何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吸取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熟练地全面地掌握了各种斗争形式的结果。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但是，如果没有各种形式的斗争的配合，中国革命也不能取得胜利。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反对了右倾合法主义，又反对了“左”倾非法主义，把合法斗争同非法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我们在全中国范围内把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又把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正确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合法可能，同时严格执行党的秘密工作的各项规定。中国革命创造了一套适合于自己的具体情况的、极其复杂而丰富的斗争形式。

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长期的实践经验，十分懂得，拒绝一切合法斗争，把党的工作限制在狭小的范围之内，使党脱离群众，这是错误的。但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容忍修正主义者推销的合法主义。修正主义者拒绝武装斗争和一切非法斗争，只进行合法斗争和合法活动，把党的活动和群众的斗争限制在统治阶级所允许的范围以内。他们降低甚至放弃党的基本纲领，放弃革命，迁就反动派的法律。

正如列宁所批评的，考茨基之流的修正主义者被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弄得腐败不堪和神智不清。“他们为了保存现行治安法所允许的组织，为了占这点小便宜，而出卖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权利”。（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百二十八页。）

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口头上讲要利用各种斗争形式，实际上主张合法主义，并且借口斗争形式的改变而抛弃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这又是用考茨基主义来代替列宁主义。

苏共领导还常常利用列宁的伟大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为他们的错误路线辩护，作为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根据”。

这当然是徒劳的。列宁的这本书，同他的其他著作一样，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用以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武器，而绝不能成为修正主义者为自己辩护的工具。

当时，列宁批评“左派”幼稚病，是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决裂，建立了第三国际之后，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善于巧妙地运用革命的策略，更好地准备革命。

就在这本书里，列宁指出，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主要敌人是考茨基式的机会主义。列宁反复地说过，必须首先同修正主义一刀两断，然后才谈得上怎样学会掌握革命的策略。

列宁所批评的那些犯“左派”幼稚病的同志还是要革命的，而今天的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则是反对革命的，他只能归入考茨基一类，根本没有资格谈论反对“左派”幼稚病的问题。

苏共领导给中国共产党扣了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帽子，这更是荒谬绝伦。事实上，继承托洛茨基主义衣钵，同今天的托洛茨基分子站在一起的，不是别人，恰巧是赫鲁晓夫。

托洛茨基主义在各种问题上表现不一，而且经常戴上“极端左倾”的假面具，但是它的本质是：反对革命，取消革命。

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托洛茨基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实质上是一丘之貉。所以斯大林曾经一再指出，托洛茨基主义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是考茨基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

今天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实质，也是反对革命，取消革命。因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不仅同考茨基主义如出一辙，而且同托洛茨基主义殊途同归。“托洛茨基主义”这顶帽子，还是赫鲁晓夫自己戴起来吧。

两条路线，两种结果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战后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各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需要从这些历史经验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战后以来，东欧、亚洲和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都是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取得的。现在，除了有十月革命的经验，还有中国革命的经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的经验，朝鲜革命的经验，越南革命的经验，古巴革命的经验，等等。这些国家的革命胜利，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丰富和发展了十月革命的经验。

从中国到古巴，毫无例外地都是经过武装斗争，经过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干涉，才取得革命胜利的。

中国人民经过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在最后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彻底打败了得到美帝国主义全力支援的蒋介石反动派，才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朝鲜人民从三十年代开始,进行了十五年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武装斗争,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革命武装力量,终于在苏军的援助下,取得了胜利。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经历了三年的反抗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战争,才巩固了革命的胜利。

越南人民经过一九四五年八月的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接着又进行了八年的反抗法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并且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才在越南北方取得了胜利。现在,越南南方人民还正在同美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进行英勇的斗争。

古巴人民在一九五三年开始武装起义,后来又经过两年多的人民革命战争,推翻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巴蒂斯塔在古巴的统治。在革命胜利以后,古巴人民又粉碎了美帝国主义雇佣军的武装入侵,保卫了革命的果实。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也都是经过武装斗争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中国到古巴一系列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得到成功的最主要的经验是什么呢?

第一,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无产阶级必须经过武装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二,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必须紧紧依靠农民,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坚持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

第三,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必须高举反美的民族旗帜,敢于同美帝国主义及其在本国的走狗,进行坚决的斗争。

第四,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可缺少的同盟军。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同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必须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力量联合起来,组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第五,要革命,就必须有一个革命党。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一个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采取毫不调和的态度、对反动统治阶级及其国家政权采取革命态度的党,是不可能的。

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不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是头等重要的,而且对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也是头等重要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范例。

战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历史告诉人们,凡是实行革命路线,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积极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就会把革命事业一步一步地引向胜利,并且使党的力量得到生气勃勃的发展。反之,凡采取不革命的机会主义路线,接受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路线的,就都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损害,并且使自己的党变成一个毫无生气的改良主义的党,甚至完全蜕化变质,成为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工具。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

曾经充满着革命朝气的伊拉克共产党的同志们,由于外来的压力,强使他们接

受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丧失了对反革命的警惕。在反革命武装政变中，一部分党的领导同志英勇牺牲，成千上万的伊共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强大的伊拉克共产党被打散，伊拉克的革命事业遭受严重的挫败。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的惨痛的血的教训。

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领导，完全跟着赫鲁晓夫和法共领导的指挥棒打转，全盘接受反对武装斗争的修正主义路线。但是，阿尔及利亚人民不听这一套，他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经历了七年多的民族解放战争，终于迫使法国政府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而追随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中丧失了信任，在阿尔及利亚的政治生活中丧失了自己的地位。

在古巴革命中，当时的古巴人民社会党的一些领导人，不是主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不是主张革命的武装斗争的正确路线，而是追随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主张“和平过渡”，反对暴力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以卡斯特罗同志为代表的古巴党外的和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理所当然地把那些反对暴力革命的领导人撇在一边，同革命的古巴人民站在一起，走向革命，进行革命，终于取得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以多列士为代表的某些法共领导人，长期以来实行修正主义路线，跟着赫鲁晓夫的指挥棒鼓吹“议会道路”，把共产党实际上降为社会民主党。他们不积极支持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抛弃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民族旗帜。他们实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的结果，使一个曾经在人民群众中有很大影响的共产党，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衰落下去。

以丹吉为代表的某些印共领导人，长期以来就实行修正主义路线，放弃了革命的旗帜，不去领导人民群众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丹吉集团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一步一步滑下去，堕落成为民族沙文主义者，成为印度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政策的工具，成为无产阶级的叛徒。

事实很清楚，两条根本不同的路线，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这些经验教训，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从白劳德、铁托到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带着时代的特点。正如列宁所说，“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疏忽和叛变的产物，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百二十四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在它的内部产生了自己的对立物，即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修正主义的逆流。这股逆流的集中代表者，首先是白劳德，其后是铁托，现

在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不是别的，正是白劳德修正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的继续和发展。

早在一九三五年前后，白劳德的修正主义就开始暴露。他崇拜资产阶级民主，放弃对资产阶级政府的必要的批判，把资产阶级专政看作是共产主义的天堂，他的口号是：“共产主义是二十世纪的美国主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和国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更使他对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进步”、“明智”着了迷，从而完全拜倒在资产阶级的脚下，堕落为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者。

白劳德散布了一整套的美化资产阶级、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修正主义言论：

他宣扬《苏美英三国德黑兰宣言》使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长期的信任和合作”的时代，能够保证“世世代代的持久和平”。

他宣扬苏美英达成的国际协议，“毫无例外地代表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每一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国内发生混乱局面的前景同国际秩序的前景是不相容的”。因此，必须反对“国内爆发阶级冲突”，“尽量减少”和“明确限制”国内的阶级斗争。

他散布新的战争将使“世界大部分地区真正毁灭”，“投入野蛮时代五十年至一百年”的论调，宣扬要消除战争灾难，就得“强调超于一切阶级分野的一致”。

他宣扬“完全依靠民主说服和信念”来实现社会主义，鼓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一些国家中，“已经得到了使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的条件”。

他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说什么共产主义者所“怀抱的实际政治目的，在一个长时期内，在所有一切主要之点上，将和人数要多得多的非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一致”。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解散了美国共产党。

白劳德的修正主义，一度把美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引到一个危险的边缘，并且使其他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感染了取消主义的毒素。

白劳德的修正主义路线，受到了以福斯特同志为首的许多美国共产党人的反对，并且为很多兄弟党所抵制和批判。但是，就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对于以白劳德主义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没有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清算。在战后新的形势下，在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的队伍中，修正主义思潮有了新的发展。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首先表现在某些共产党的领导人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而宣布采取所谓“和平过渡”的路线。这条路线的突出代表，就是陶里亚蒂的“结构改革”论，也就是主张通过资产阶级民主合法途径，实现无产阶级对国家的领导，通过为垄断资本服务的“国有化”、“计划化”等等，实现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说，不必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就能够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实际上使共产主义蜕化成为社会民主主义。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修正主义思潮首先在南斯拉夫出现。铁托修正主义的一个

重要特点，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投降主义。铁托集团完全投靠了美帝国主义，他们不仅使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而且使自己成了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工具，扮演着美帝国主义破坏世界革命的别动队的角色。

为了替美帝国主义效劳，取消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铁托集团直截了当地说：暴力革命“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手段”，“愈益变成多余的了”；通过资产阶级的议会“实现向社会主义的演变”，“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成为现实的事实了”。他们甚至把资本主义简直就看作是社会主义，说什么现今的世界“总的说来已经深深地‘长入’社会主义，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了”。又说：“今天，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解决了”。

白劳德修正主义，“结构改革”论，铁托修正主义，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修正主义思潮的主要表现。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到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所谓“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修正主义路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把这套货色当作自己的“新创造”到处兜售。可是，这些东西一点也不新鲜，只不过是集白劳德修正主义、“结构改革”论、铁托修正主义之大成，加以改头换面，修饰装扮一下而已。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在国际上对美帝国主义实行投降主义，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里对反动的统治阶级实行投降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鼓励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

如果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曾经是一脉相承，一家兄弟；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白劳德、铁托、赫鲁晓夫，也是一脉相承，一家兄弟。

白劳德早就说出了这一点。他在一九六〇年写道：“赫鲁晓夫现在采纳了我在一九四五年为之而被踢出共产党的那个‘异端’。”他说，赫鲁晓夫的新政策，“同我十五年前所倡导的路线几乎是逐字逐句地相同。因此，至少在目前，我的罪恶已变成新的正统了”。

赫鲁晓夫自己也承认，他同铁托集团“属于同一个思想，以同一个理论为指南”。

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比起伯恩斯坦、考茨基、白劳德和铁托的修正主义来，不能不具有更大的危害性。为什么呢？因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大国，是列宁主义的故乡，苏共是列宁缔造的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历史形成的威望。赫鲁晓夫正是利用作为这样的党、这样的国家的领导人的地位，来坚持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他把自己的修正主义路线，说成是“列宁主义”的路线，用伟大列宁和伟大布尔什维克党的威信来迷惑人和欺骗人。

他利用苏共的历史威望，利用大党大国的地位，挥舞指挥棒，采取各种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手段，强制别人接受修正主义路线。

他配合帝国主义收买工人贵族的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收买资产阶级

化了了的、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共产党人，为苏共领导反对革命的路线摇旗呐喊，尽忠效劳。

正因为这样，历史上的和当代的一切修正主义者，比起赫鲁晓夫来，都成了小巫见大巫了。

现代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正如一九五七年宣言所说，对外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的，对内是接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影响。

现代修正主义者，同老修正主义者一样，都是像列宁所说的，“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百二十三页。）

现代修正主义产生的经济基础，也同老修正主义一样，都是列宁所说的“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这一小得可怜的阶层”。（列宁：《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四百二十二页。）

现代修正主义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政策的产物。现代修正主义者被核讹诈政策吓破了胆，又被收买政策迷了窍，充当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对革命的马前卒。

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也正是被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歇斯底里的喧嚣吓得丧魂落魄，以为地球这个“诺亚方舟”时时刻刻有毁灭的危险，对人类的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他首先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生怕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会给自己惹麻烦，因而千方百计地反对一切革命，甚至像在刚果那样，不惜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行动，去扑灭人民革命。他以为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不担任何风险，一方面可以同美帝国主义一起，进行在世界上划分势力范围的勾当，这样岂不是一箭双雕。其实，这只能表明，赫鲁晓夫是历史上最大的投降主义者。实行赫鲁晓夫的这种害人政策，结果必然给伟大的苏联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害。

为什么在苏联这样一个已经有几十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还会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呢？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都需要很长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势力，还存在着阶级，那就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土壤。

赫鲁晓夫说，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已经没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已经建设共产主义了。这些都是骗人的。

事实上，由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统治，由于公开宣布改变苏维埃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由于实行一系列的对内的和对外的错误政策，苏联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正在政治领域内，在经济领域内，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在其他领域内，猖狂地泛滥起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正是这种在苏联日益泛滥起来的资本主义势力。

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就是代表这种资本主义势力的利益，并且为它服务的。因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绝不会给苏联人民带来什么共产主义，而是连社会主义的成

果也受到严重威胁，它正在为资本主义的复辟大开方便之门。这也就是美帝国主义所追求的“和平演变”的道路。

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是不可能的。而从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则已经有了南斯拉夫的先例。现在，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也正在把苏联引向这条道路。

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最严重的经验教训。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以至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千万不能忘记这个大教训。

我们的希望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现在，时光才过去八年。在这个短短的历史的瞬间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给苏联，给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害，却是够大的了，够严重的了。

是时候了，是批判和清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时候了！

在这里，我们愿意奉劝苏共领导同志，过去有多少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被丢进历史垃圾堆，你们何必一定要跟着他们的脚印走呢？

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其他犯修正主义错误的兄弟党的领导同志们认真地思索一下，跟着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走，究竟得到了什么结果？我们知道，除了那些深深陷入修正主义泥坑的人以外，不少同志是受迷惑的，被欺骗的，或者是被强制走上错误道路的。我们相信，只要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终将选择革命的路线，拒绝反对革命的路线，终将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拒绝修正主义。对于这一点，我们抱着很大的期望。

修正主义绝不能阻挡革命的历史车轮的前进。修正主义的领袖们自己不革命，绝对阻挡不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人民起来革命。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曾经写道，当考茨基已经变成叛徒的时候，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只能这样地来表达自己对工人阶级的号召：“推开这些领袖，摆脱他们那种使人愚钝、使人庸俗的说教，不管他们，不理睬他们，越过他们，而走向革命，进行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七十三页。）

当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在欧洲许多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列宁十分重视法国的一个共产主义者保尔·果雷的意见。

果雷说，“我们的敌人大叫社会主义已经完蛋。他们太性急了。但是，谁能够说他们完全不对呢？现在死亡的不是一般社会主义，而是一种社会主义，这是带有甜味、没有理想、没有热情、有官僚架子和家长威风的社会主义，这是没有勇敢精神、没有大胆行动、爱好统计、一心一意要同资本主义达成极友好的协议的社会主义，这是只知道改良的、为一点油水而出让自己的长子继承权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是人民愤慨情绪的摧残者，是无产阶级的勇敢行动的自动制动

机。”（《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百二十八页至第三百二十九页。）

这真是一段绝妙的描述！列宁说这是法国共产主义者的正直呼声。现在，人们会发现，现代修正主义不也正是一种“死亡了的社会主义”吗？人们也会发现，在那些修正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党内，无数的正直的共产党人的呼声是多么响亮啊。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冒牌的社会主义是死亡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却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它正在以更加宽阔的步伐向前迈进。有生命力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一定会克服一切困难和阻挠，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一直到赢得整个世界。

让我们用《共产党宣言》的结语来做本文的结束吧！

“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原载人民日报 1964-03-31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坚持革命还是反对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历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一切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现在也是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斗争的焦点。

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不但把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反对革命的理论系统化，而且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必要，提出所谓“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谬论，从而完成了他们的修正主义体系。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苏共纲领，是一个假共产主义的纲领，是一个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修正主义纲领。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所谓“全民国家”的幌子下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在所谓“全民党”的幌子下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在所谓“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幌子下为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指出，用“全民国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用“全民党”代替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在理论上是十分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这是历史大倒退，根本谈不上向共产主义过渡，而只能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

苏共中央公开信和苏联报刊强词夺理地为自己辩解，并且指责我们对“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批评是什么“远离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是什么“脱离苏联人民的现实生活”，是什么要他们“向后倒退”。

好吧，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究竟是谁远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究竟苏联的现实生活是怎样的，究竟是谁要苏联向后倒退的吧。

社会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专政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究竟是应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对于这些问题，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给以正确的回答。

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史上的大飞跃。社会主义社会是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重要的历史时期。经过社会主义社会，人类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比较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具有无比巨大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资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无产阶级由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实行资本主义社会所不可能有的最广泛的民主，只是对于少数剥削者实行专政。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为社会生产力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途，保证了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不能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

但是，不能不看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出的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它还不是在经济以及其他方面完全成熟了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马克思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说：“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列宁也指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中，“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还存在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资产阶级法权还没有完全取消，还“不能立即消灭‘按工作’（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这一仍然存在的不公平现象”，因而还存在着富裕程度的差别。要使上述这些差别和现象归于消失，要使资产阶级法权归于消失，只能是逐步的，而且必然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这些差别已经消失，只有资产阶级法权完全消失，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完全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也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贯穿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

说：

“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不同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

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多次指出：

1，被推翻的剥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

2，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分子。

3，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职员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4，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

实际生活证实了列宁以上的论断。”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反动阶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有力量，并且在某些方面还相当强大。他们同国际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还要顽强地同无产阶级继续较量。他们在各方面同无产阶级进行隐蔽的或者公开的斗争。他们常常打着拥护社会主义、苏维埃、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的招牌，进行破坏社会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在政治方面，他们作为对抗无产阶级的力量长期存在着，时时刻刻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钻进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经济和文化教育等部门，抗拒和篡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经济方面，他们用各种方式破坏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势力。在思想和文化教育方面，他们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抗无产阶级世界观，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

农业集体化的实现，使个体农民变为集体农民，为彻底改造农民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在集体所有制还没有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时候，在私有经济的残余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农民还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原来小生产者的某些固有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存在着产生新富农的土壤，还会发生农民的两极分化。

由于上述资产阶级的活动和它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腐蚀作用，由于城乡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存在，由于还没有完全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和旧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在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和党政机关中还会不断产生蜕化变质分子，在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中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在文化教育部门和知识界中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同那些已经被推翻、但是还没有被彻底消灭的旧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分子结合起来，向社会主义进攻。尤其是那些窃据领导机关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支持和庇护基层单位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危害性特别大。

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不仅要同国内的资产阶

级进行斗争，而且要同国际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帝国主义总是寻找机会，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武装干涉和进行和平瓦解。他们力图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或者使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国际间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来。

列宁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列宁又说：“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

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教育各个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停息的。这个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曲折的、复杂的。这个斗争象波浪的起伏一样，高一阵，低一阵，有时候比较缓和，有时候十分尖锐。这是决定社会主义社会命运的斗争。这个长期的斗争，将决定社会主义社会是走向共产主义，还是复辟为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共产党内部来。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懂得，要使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要使共产党蜕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新的和旧的资产阶级分子，新的和旧的富农，以及形形色色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都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他们千方百计从共产党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内，不可避免地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各种机会主义、主要是修正主义的斗争。这种修正主义的特点，就是在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名义下，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向无产阶级进攻，把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根据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根据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指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必须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别的道路是没有的。

马克思说：“阶级斗争必然要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他又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马克思在解释革命社会主义的时候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

列宁在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创造性地阐明并且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无

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已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绝迹、没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他又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有名的著作以及其他著作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全面地、系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毛泽东同志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出发，考察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他指出，矛盾的统一和斗争这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阶级矛盾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贯穿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思想和文化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可以解决的，而是要经过五代十代，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完全解决。

毛泽东同志还特别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矛盾分为两类，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的。只有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不同的办法加以正确处理，才能够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战胜那些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保证，是无产阶级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战胜资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基本保证。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包括两个方面，即国内方面和国际方面。国内方面的任务，主要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高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消除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根绝产生阶级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任何可能性，为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准备条件。国际方面的任务，主要是防止国际帝国主义的侵袭（包括武装干涉与和平瓦解），支援世界革命，直到各国人民最后结束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在这两个方面的任务完成以前，在进入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以前，无产阶级专政是绝对必要的。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远远没有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无例外地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都还存在着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存在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离开消除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

的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离开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离开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都还很远很远。因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背叛。

苏联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宣布在苏联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根据，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苏联已经消灭了敌对阶级，已经没有阶级斗争。

苏联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究竟还有没有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呢？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苏联，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经过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摧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且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伟大成就。这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所取得的不可磨灭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但是，在苏联，在完成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已被推翻、但还没有被彻底消灭的旧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仍然存在着。在城市和乡村中，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仍然存在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富农分子还在不断地产生。长时期以来，在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继续着。

由于苏联是第一个而且当时也是唯一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没有任何别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也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规律的认识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斯大林在苏联基本上完成农业集体化以后，就过早地宣布苏联“已经不存在彼此对抗的阶级”，“没有阶级冲突”，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一致性而忽视它的矛盾，不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问题仅仅看成是同国际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相联系的问题。这无论在理论上或者在实践上都是不正确的。虽然如此，斯大林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领导苏联党和国家的时期，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方向，实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保证了苏联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

赫鲁晓夫掌握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以后，推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的政策，变本加厉地助长了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苏联重新尖锐起来。

仅仅翻看近年来苏联报刊的报道，人们就看到许多事例，说明在苏联社会上，不仅有許多旧的剥削阶级分子，而且大量地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分化正在加剧。

让我们先看一看,在苏联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活动。

一些工厂领导人和他们的一伙,利用职权,动用国营工厂的设备和材料,设立“地下车间”,进行私人生产,私卖私分,大发横财。例如:

列宁格勒一个军用品工厂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工厂“所有关键性职位”上,“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他们私自进行非军用品生产,三年内,仅出售自来水笔一项就贪污了一百二十万旧卢布。在这些人中,还有“一生都在盗窃”的“二十年代”的“投机商人”。

乌兹别克一个丝织厂的厂长,同总工程师、总会计、供销科长、车间主任等人结成一伙,成了“新的企业家”。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套购了十几吨人造丝和纯丝原料,“生产不入帐的产品”。他们私自招收工人,“实行了十二小时工作制”。

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织车间”,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好几个老婆,好几辆汽车,好几所房子,一百七十六条领带,近一百件衬衫,几十套西服”,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

这些人的活动,并不是孤立的。他们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和庇护。例如:

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个附属工厂的厂长及其一伙,建立了“地下企业”,通过贿赂,“获得了五十八部针织机”和大量原料,并且同“五十三个工厂、手工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搭上关系,几年中赚了三百万卢布。他们收买了社会保安机关工作人员、监察员、稽查员、巡视员等。

俄罗斯联邦一个机器制造厂的厂长,伙同另一个机器制造厂的副厂长和其他人员,一共四十三人,把九百多台织布机盗卖给中亚细亚、哈萨克、高加索等地的工厂,供这些工厂的领导人进行地下生产。

吉尔吉斯一个四、五十人的贪污盗窃集团,在他们把持的两个工厂中进行地下生产,盗窃国家财产达三千多万卢布。这个集团的成员,包括共和国计划委员会主席,商业部副部长,共和国部长会议、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等部门的七个局长和处长,还有“从流放中逃回的大富农”。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这些蜕化变质分子所把持的工厂,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企业,实际上已经变成他们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企业。他们同工人的关系,变成了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象这样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占有和支配着部分生产资料,剥削别人的劳动,难道不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他们在国家机关中任职的同伙,与他们串通一气,营私舞弊,收受贿赂,坐地分赃,参与了各种各样的剥削活动,难道不也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

显而易见,所有这些人,都是属于同无产阶级相敌对的阶级,属于资产阶级。他们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正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阶级斗争。

让我们再看一看集体农庄中形形色色的富农分子的活动。

有些集体农庄的领导人和他们的一伙，为所欲为地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肆意挥霍，剥削庄员。例如：

乌兹别克一个集体农庄的主席，“使全村都处于恐怖之中”。农庄的一切重要职务，“全被他的许多姐夫、妹夫、小舅子、亲家以及其他亲友所窃据”。他“挥霍了农庄十三万二千卢布，以满足私人的需要”。他有一辆轿车，两辆摩托，三个妻子，“她们各有一套单独的住宅”。

库尔斯克州一个集体农庄主席把农庄看成是自己的“领地”。他勾结会计、出纳、仓库主任、农艺师、商店主任等，互相包庇，“盘剥农庄庄员”，在几年内贪污盗窃了十几万卢布。

乌克兰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伙同会计伪造证件和帐目，盗窃了农庄五万多卢布。这个会计还被宣传为“模范会计”，在莫斯科举办的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会上展出了她的事迹。

阿拉木图州的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专门从事商业投机活动。他“从乌克兰或乌兹别克买来酿酒果汁，从江布尔买来糖和酒精”，进行加工，然后到处高价出售。这个农庄拥有一座年产一百万公升的酿酒厂，它的商业投机网布满哈萨克共和国，商业投机成了农庄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

白俄罗斯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俨然以一个有封邑的小公爵自居”，“什么事都独断专行”。他根本不住在农庄里，而是住在城里或者自己的“华丽的别墅”里，经常“忙于各种商业钻营”，“搞投机活动”。他从别处购买牲畜，冒充自己农庄的产品，虚报生产成绩，但他却成了“经常受到赞扬”的“模范领导者”。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这些农庄领导人所把持的农庄，实际上变成了他们的私产。他们把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变成为新的富农经济。他们在上级领导机关中往往有着自己的保护人。他们同庄员的关系，同样变成了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象这样的压在农民头上的新的剥削者，难道不是货真价实的新富农分子吗？

显而易见，所有这些人，都是属于同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相敌对的阶级，属于富农阶级也就是农村资产阶级。他们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正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进攻的阶级斗争。

在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以外，苏联的城市和乡村中都还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

他们有的开设私人企业，私产私销；有的组织私人包工队，公开承包国营或合作社企业的建筑工程；有的开设私营旅馆。列宁格勒有一位“苏联女资本家”，雇用工人，生产和销售尼龙女上衣，“每天收入七百新卢布”。库尔斯克州一个作坊主，制造毡靴，高价出售。这个作坊主，拥有五百四十双毡靴，八公斤金币，三千米衣料，二十条地毯，一千二百公斤羊毛等大量物资。戈米尔州一个私营业主，“招雇工人和匠师”，在两年内以高价承包了十二个工厂的焙烧炉的建造工程或大修工程。奥伦堡州有“数以百计的私人旅店和私人货栈”，“集体农庄和国家的钱源源不断流入旅店经营者的腰包”。

他们有的进行商业投机活动，低价收购，高价卖出，长途贩运，牟取暴利。在莫斯科，就有大批投机者贩卖农产品。他们把“成吨的柑桔、苹果和各种蔬菜运到莫斯科，用黑市价格卖出”。“有人给这种唯利是图的人创造了一切便利条件：备有市场客棧和保管室等其他设备供他们使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个投机商，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公司”，“雇用了十二名售货员和两名搬运夫”，“把上千头的猪，几百公担粮食，几百吨水果”，从农村运往顿巴斯，“把成千上万盗窃来的矿渣砖、成车厢的玻璃”和其他建筑材料，从城市运往农村，在倒卖中大发横财。

他们有的专门充当掮客和经纪人，这些人交游广阔，只要给他们贿赂，什么东西都可以弄到。列宁格勒有这样一个掮客，“虽然他不是贸易部长，可是全部货物都掌握在他手里，虽然没有铁路官衔，可是支配着车辆”。他可以把“严格调拨的东西，通过调拨以外的途径弄来”。“列宁格勒所有的仓库都为他效劳”。他从经手商品中，获得大量“酬金”，仅一九六〇年就从一个林业公司获得了七十万卢布。这样的掮客，在列宁格勒有“一大批”。

这一批私人企业主和投机倒把分子，干的是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勾当。他们属于同无产阶级相敌对的资产阶级，这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东西吗？

事实上，苏联报刊自己也把上面所说的那些人叫做“苏联资本家”，“新企业家”，“私人企业主”，“新富农”，“投机商”，“剥削者”，等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硬说苏联不存在敌对阶级，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我们在上面所引用的材料，仅仅是苏联报刊自己披露的一部分事例。这些事实已经够触目惊心的了，而苏联报刊没有披露的事实，被隐蔽和保护的更大、更严重的事实还多得很。我们引用这些材料，是为了回答苏联究竟有没有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样一个问题。这些材料，是很多人都容易看得到的，而且也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自己无法否认的。

仅仅这些材料就足以说明，在苏联，从城市到农村，从工业到农业，从生产领域到流通领域，从经济部门到党和国家机构，从基层到高级领导机关，都大量地出现了同无产阶级敌对的资产阶级的猖狂活动。这些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新旧资产阶级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这本来是不奇怪的。只要党和国家领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是不可怕的。但是，在今天的苏联，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

我们在下面就来论述这个问题。

苏联的特权阶层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

目前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

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是同苏联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相对立的。

早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初期，列宁就指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他们的习惯势力，从各方面包围和侵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的个别阶层。这种情况，不仅使苏维埃机关职员中产生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分子，而且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列宁还指出，对苏维埃政权留用的资产阶级技术专家实行的高额薪金制，虽然是必要的，但有着腐化的作用，影响到苏维埃政权。

因此，列宁当时非常强调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非常强调发动广大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工作，不断揭发和清除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分子和新资产阶级分子，并且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列宁曾经尖锐地提出：“如果不进行有系统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国家机关，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

同时，列宁还非常强调，在工资政策中必须坚持巴黎公社的原则，即一切公务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只对资产阶级专家付给高额的薪金。在十月革命后直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苏联基本上是实行列宁的指示，党政机关的负责人，企业负责人和专家中的共产党员，他们的薪金大体上同工人的工资相当。

当时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政治上、思想上以及分配制度上防止在各部门中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利用职权，腐化堕落，蜕化变质。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斯大林当时同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等的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些斗争的胜利，粉碎了资产阶级妄想苏联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

不可否认，斯大林逝世以前，在苏联，已经对一部分人实行高薪制度，已经有一些干部蜕化为资产阶级分子。在一九五二年十月举行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在一些党的组织中，出现了堕落和腐化现象。有些党组织的领导人，把党组织变成由自己人组成的小家庭，“把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有些工业企业的领导人，“忘记委托他们管理和领导的企业是国营企业，竟然企图把这些企业变为他们的世袭领地”。有些党组织、苏维埃机关和农业机关中的工作人员，“不但不保护集体农庄公有经济的利益，反而自己盗窃集体农庄财产”。在文化艺术和科学等部门中，也出现了攻击和诬蔑社会主义制度的作品，出现了科学家集团的“学阀式”的垄断现象。

赫鲁晓夫篡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以后，苏联的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赫鲁晓夫实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使苏联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

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实际上是为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他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斯大林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打开了闸门。

赫鲁晓夫用所谓“物质刺激”，来偷换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不是缩小而是扩大极小部分人同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之间的收入差距，扶植那些占据领导地位的蜕化变质分子，使他们更放肆地利用职权，侵占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加剧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

赫鲁晓夫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赫鲁晓夫攻击社会主义的农业计划制度，说它是“官僚主义的”、是“不必要的”。他热衷于向美国农场主学习，提倡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扶植富农经济，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赫鲁晓夫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论，向苏联人民灌输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及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反动思想，败坏社会主义的道德风气。腐朽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成了时髦，社会主义文化受到排斥和打击。

赫鲁晓夫在所谓“和平共处”的幌子下，勾结美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一小撮人的既得利益，把他们的利益放在苏联人民、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上。

赫鲁晓夫所实行的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种路线下，不仅旧的资产阶级分子猖狂地活动起来，而且在苏联党、政领导干部中，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的负责人中，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部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产生出大批的新资产阶级分子。

目前在苏联，新资产阶级分子不仅在数量上空前地增长了，而且在社会地位上也有了根本的变化。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前，他们在苏联社会中并不占统治地位，他们的活动受到种种限制和打击。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随着赫鲁晓夫逐步地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就在党、政、经济、文化等部门占据了统治的地位，形成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

这个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主要的社会基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全国范围内，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领导机关到经济、文化教育部门，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清洗，撤换一批又一批的干部，把他们所不信任的人打下去，把他们的亲信安插到领导岗位上。

就拿苏共中央委员会来说,据统计,经过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一九六一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五二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苏共中央委员,有近百分之七十被清洗了。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苏共中央委员,在一九六一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时也被清洗了近百分之五十。

再拿地方各级组织来说,据不完全的统计,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借口所谓“干部更新”,把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党委和州委的成员撤换了百分之四十五,市委和区委的成员撤换了百分之四十。一九六三年,赫鲁晓夫集团又借口划分所谓“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把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和州党委会成员撤换了一半以上。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赫鲁晓夫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之后,正在把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正在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变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专政的国家,并且正在逐步地把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变为特权阶层的所有制。

人们看到,在南斯拉夫,铁托集团虽然还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但是,自从他们走上修正主义道路以后,逐步地形成了一个与南斯拉夫人民对立的官僚资产阶级,使南斯拉夫从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使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变成国家资本主义。现在,人们又看到,赫鲁晓夫集团正在走上铁托集团已经走过的道路。赫鲁晓夫向贝尔格莱德朝圣,一再说要学习铁托集团的经验,并且宣布,他同铁托集团“属于同一个思想,以同一个理论为指导”,这是毫不奇怪的。

由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伟大的苏联人民用血汗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赫鲁晓夫集团宣扬“苏联已经没有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为了掩饰他们对苏联人民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的真相。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所代表的苏联特权阶层,只占苏联人口的百分之几。他

们在苏联干部队伍中,也只占极少数。他们同占苏联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苏联人民,同苏联的广大干部和共产党员,是根本对立的。苏联人民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目前苏联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

列宁缔造的光荣的苏联共产党,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表现了开天辟地的革命首创精神,在战胜白卫军和十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中表现了艰苦奋斗的英雄气概,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斗争中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光辉成就,在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中赢得了拯救人类的伟大胜利。甚至在赫鲁晓夫集团的统治下,苏联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苏联人民也继承着列宁和斯大林培养起来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坚持社会主义和向往共产主义。

广大的苏联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对于特权阶层的压迫和剥削是十分不满的。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赫鲁晓夫集团背叛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真面目。在苏联的干部队伍中,有许多人仍然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坚决反对的。苏联广大的人民群众、共产党员和干部,正在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抵制和反抗赫鲁晓夫集团的修正主义路线,迫使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不能随心所欲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伟大的苏联人民,正在为保卫伟大十月革命的光荣传统,为保卫社会主义的伟大成果,为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而斗争。

驳所谓“全民国家”

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公开打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他宣布用所谓“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共纲领说:“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上已变为全民的国家”。

稍微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国家是一个阶级的概念。列宁指出,“国家的特征就是存在着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特殊阶级”。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任何国家都是一定阶级专政的国家。只要国家还存在,就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就不可能是全民的。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从来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并且明确地宣布,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坚持不懈地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使国家归于消亡。只有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才竭力掩盖国家政权的阶级本质,千方百计地把他们掌握的国家机器说成是“全民的”、“超阶级的”,企图欺骗人民群众。

赫鲁晓夫宣布取消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提出所谓“全民国家”,正是表明他用资产阶级的谎言,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他们的谬论遭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批评以后,急急忙

忙出来作辩解，竭力为“全民国家”制造“理论”根据。他们说，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只是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不是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他们还说：“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家消亡之前就不再是必要的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结束以后，还有一个“全民国家”的阶段。

这是彻头彻尾的诡辩。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国家这个著名原理。对于马克思的这个原理，列宁曾经有过明确的解释。

列宁说：“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时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是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直到现在，这个真理对社会主义者说来，还是无可争辩的，这个真理承认，国家将一直生存到胜利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

列宁还说：“一个阶级专政，不仅一般阶级社会需要，不仅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而且，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

很清楚，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存在的历史时期，并不是象苏共领导所说的仅仅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是指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过渡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实现“无阶级社会”的时候，也就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的时候。

同样很清楚，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任何别的什么东西。无产阶级专政，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时期的国家形式，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后的国家形式。无产阶级专政的消亡，也就是国家的消亡。列宁说：“马克思从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全部历史中得出结论：国家一定会消逝；国家消逝的过渡形式（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将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国家和那个国家，在这个阶段和那个阶段，可能有不同的形式，但本质上是一样的。列宁说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可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先于国家消亡而结束，在无产阶级专政结束以后，还有一个“全民国家”的阶段，根本不是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而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捏造。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为了替他们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辩护，还费尽心机地找出马克思的一句话，斩头去尾，加以歪曲。他们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硬说成“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组织’”。他们颇为得意地说，中国人是不敢援引马克思这句话的。

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看来，马克思的这一句话，似乎真的能对他们有什么帮助。

列宁仿佛早就预见到修正主义者将会怎样利用马克思的这一句话来歪曲马克思主义。他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一书中，对马克思的这句话作了精辟的说明。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但是，马克思接着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就是说，甚至在‘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国家制度！！这不是矛盾吗？”列宁回答说，“不矛盾”。他接着用列表的方式，说明了从资产阶级国家到国家消亡的发展的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需要国家，这个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

第二个时期，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无产阶级需要国家，这个国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第三个时期，在共产主义社会，不需要国家，国家消亡。

列宁说：“完全合乎逻辑，并且十分清楚！！”

在列宁的表式里，只有资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国家消亡。列宁正是用表式说明，到了共产主义，国家消亡了，也就没有什么国家制度了。

可笑的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为自己的错误辩解的时候，竟然也引用了列宁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这本书中的这一段话。他们在引用了列宁的话之后，就莫名其妙地说：“在我国，列宁在这个判断中指出的以前两个时期已经成为历史。在苏联，产生了全民国家——共产主义的国家制度，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国家制度，并正在不断发展。”

如果列宁所说的前两个时期在苏联已经成为历史，那么，在他们那里，国家就应当消亡了，又何来一个“全民国家”呢？如果国家还没有消亡，那么，这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而绝不能是什么“全民国家”。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为了给自己的“全民国家”辩解，还竭力诋毁无产阶级专政不民主。他们宣扬，只有用“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才能使民主进一步发展，才能使民主变为“真正的全民民主”。赫鲁晓夫甚至煞有介事地说，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反映了“竭力发展民主的路线”，“无产阶级民主正在变成全民的社会主义民主”。

这些话，只能说明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一窍不通，并且加以恶意的歪曲。

稍微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作为一种国家形式，民主同专政一样，都是阶级的概念。只有阶级的民主，没有什么“全民主”。

列宁说：“绝大多数人享受民主，对那些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分子实行强力镇压，即不允许他们参加民主生活，——这就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民主制。”无产阶级专政，对剥削阶级实行专政，在劳动人民中实行民主，这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够把劳动群众的民主发展和扩大到空前未有的地步。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劳动人民的民主。

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一个灭掉另一个，只能如此，不能妥协。更多地更彻底地灭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就会大为扩张。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看来，就叫做这个国家没有民主。实际上这是兴无产阶级民主，灭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兴起来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被灭掉了。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根本观点。他们实际上认为，只要对敌人实行专政，就不能算是民主，要发扬民主，只有取消对敌人的专政和镇压，实行什么“全民的民主”。

这种观点，同叛徒考茨基“纯粹民主”的观点，是从一个模子里铸造出来的。

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时候说：“‘纯粹民主’不仅是既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了解国家实质的蠢话，而且是十足的空谈，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将变成习惯，消亡下去，但永远也不会是‘纯粹的’民主”。

列宁还指出：“发展的辩证法（过程）是这样的：从专制制度到资产阶级民主；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从无产阶级民主到没有任何民主。”这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阶级消灭了，无产阶级专政消亡了，无产阶级民主也就随着消亡了。

拆穿了说，赫鲁晓夫大事吹嘘的所谓“全民民主”，同所谓“全民国家”一样，不过是一堆骗人的鬼话。赫鲁晓夫拣起资产阶级和老修正主义者的破烂，修修补补，加上他自己的印记，无非是用来作为欺骗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幌子，掩盖他的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和反对社会主义的勾当。

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赫鲁晓夫取消了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的专政，也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专政。他的所谓“全民国家”，的确确实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一小撮人对苏联广大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实行专政的国家。在赫鲁晓夫集团的统治下，根本没有苏联劳动人民的民主，而只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一小撮人的民主，特权阶层的民主，新旧资产阶级的民主。赫鲁晓夫的所谓“全民民主”，正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民主，也就是赫鲁晓夫集团对苏联人民的专制独裁。

现在，在苏联，谁要是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敢于说话，敢于反抗，敢于斗争，谁就会被监视、钉梢、传讯、以至逮捕和监禁，或者硬被说成是“精神病患者”，而被送进“疯人院”。最近，苏联报纸公然宣称要对那些稍微流露一点不满情绪的人“进行斗争”，即使仅仅对赫鲁晓夫的农业政策说了几句“俏皮话”，也要当作“败类”，给予“无情打击”。尤其骇人听闻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竟然不止一次地对工人罢工和群众反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

“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保留全民国家”这个公式，道破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内心的秘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是坚决反对的；国家政权，他们是死也不肯放弃的。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懂得掌握国家政权的极端重要性。他们需要利用国家机器来压迫苏联劳动人民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需要利用国家机器为在苏联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这就是赫鲁晓夫打起“全民国家”、“全民民主”的旗号的真正目的。

驳所谓“全民党”

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还公开打出了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旗号。他宣布用所谓“全民党”来代替无产阶级政党。苏共纲领说：“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维埃社会的一致的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苏共中央公开信说，苏共已经“成为全民政治组织”。

这是何等的荒唐可笑！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政党和国家一样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切政党，都是具有阶级性的。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从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政党，从来就不存在什么不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所谓“全民党”。

无产阶级政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党，是由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具有无限忠心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意志的集中者。

无产阶级政党，也是唯一能够代表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是因为它能够根据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根据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现在和将来的利益，根据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来考虑问题。这是因为它能够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行正确的领导。

无产阶级政党，除了工人阶级出身的党员以外，还包括其他阶级出身的党员。这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并不是作为其他阶级的代表来参加党的。他们从入党的第一天起，就必须抛弃他们原来的阶级立场，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如果其他阶级中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

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但是，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看来，这些都是“死板的公式”，而他们那个“全民党”，却符合“党的发展的现实的辩证法”。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煞费苦心地想出了几条为“全民党”辩护的理由。他们在一九六三年七月的中苏两党会谈中和苏联报刊上说，把苏联共产党改变成为所谓“全民党”，是由于：

第一，苏联共产党代表着全民的利益。

第二，全体人民接受了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工人阶级的目标——建成共产主义——已经成为全民的目标。

第三，苏共的队伍是由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组成的，苏共在自己的队伍里联合着全国一百多个民族和部族的代表。

第四，党的活动的民主方法也符合党的全民性质。

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想出的这些理由，没有一条表明他们是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严肃的问题的。

列宁在同那些东拉西扯的机会主义者作斗争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能不能同显然不善于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严肃的问题的人严肃地谈话呢？同志们，难，很难！然而某些人不善于严肃地谈论的问题本身是非常严肃的，所以也不妨分析一下对这种问题的显然不严肃的回答。”

现在，我们也不妨分析一下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所作的显然极不严肃的回答。

按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说法，由于共产党表达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就应当成为“全民党”。那么，共产党岂不是本来就不应当是无产阶级政党，而应当是“全民党”吗？

按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说法，由于全体人民接受了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所以，共产党就应当成为“全民党”。但是，在目前正发生着激烈的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的苏联社会里，怎么能够说，所有的人都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呢？难道你们那里成千上万的新旧资产阶级分子，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吗？如果照你们的说法，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的成了全体人民的世界观，那么，社会上岂不是没有党和非党的区别了，党也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哪里还有什么“全民党”不“全民党”呢？

按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说法，由于共产党的成员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包括各个民族和部族，因而就应当成为“全民党”，那么，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全民党”以前，苏联共产党难道就只有工人而没有其他阶级出身的党员吗？难道就只有一个民族而不包括其他民族和部族的党员吗？如果按照党员的社会成分来确定党的性质，那么，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政党，它们的党员成分也包括各种不同阶级出身的人，也包括各种不同民族和部族的人，它们岂不是都成为“全民党”了吗？

按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说法，由于党的活动方法的民主性质，所以是“全民党”。那么，共产党一开始就是根据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党在人民群众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从来就应当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这样，共产党岂不是从它建立的头一天起，就成为“全民党”了吗？

总之，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所列举的这种种“理由”，没有一条是站得住脚的。

赫鲁晓夫不但大肆叫嚷什么“全民党”，并且借口“按生产原则建立党的机构”，把党分割成了什么“工业党”、“农业党”。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重于政治”，是为了“使共产主义建设整个进程所提到首要地位的经济问题和生产问题居于党组织活动的中心，居于党组织整个工作的首位”。赫鲁晓夫说：“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党机关工作中主要的东西就是生产。”他们还把这种观点强加给列宁，说什么这是按照列宁的原则办事。

但是，稍微了解苏共历史的人，就知道这根本不是列宁的观点，而恰恰是反列宁主义的观点，是托洛茨基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也不愧是托洛茨基的门徒。

列宁在批评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时候曾经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又说：“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

事实很清楚，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提出所谓“全民党”，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根本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改造成为修正主义的党。

伟大的苏联共产党，面临着从无产阶级政党蜕化成为资产阶级政党，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蜕化成为修正主义政党的严重危险。

列宁说过：“一个想存在下去的政党，在它存亡的问题上是不能容许有丝毫动摇的，是不能容许同那些可能把它埋葬掉的人作任何妥协的。”

现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正是把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重新提到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广大党员面前。

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说，苏联已经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他又说，“在二十年之内我们将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完全是骗人的。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正把苏联引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苏联人民面临着丧失社会主义成果的严重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建设共产主义呢？

赫鲁晓夫挂起“建设共产主义”的招牌，他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他的修正主义的真面目。可是，这种骗人的把戏是不难拆穿的。明珠不容许鱼目来混杂，共产主义不容许修正主义来冒充。

科学共产主义有它确切的涵义。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彻底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

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具有高度的劳动积极性和自觉性的社会，是具有极其丰富的社会产品的社会，是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的社会，是国家消亡了的社会。

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在社会主义社会时期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正是为了向共产主义发展。列宁说，“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既然在苏联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是向前发展，而是向后倒退，不是向共产主义发展，而是向资本主义倒退。

向共产主义发展，是向着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的方向发展。绝不能设想有一个保存阶级甚至保存剥削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赫鲁晓夫却在苏联培植新的资产阶级，恢复和发展剥削制度，加剧阶级分化。一个同苏联人民对立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已经占据党、政、经济、文化等部门的统治地位。这哪里有一点共产主义的影子呢？

向共产主义发展，是向着单一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方向发展。绝不能设想有一个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并存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赫鲁晓夫却正在把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逐步蜕化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把集体所有制的集体农庄逐步蜕化成为富农经济。这又哪里有一点共产主义的影子呢？

向共产主义发展，是向着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方向发展。绝不能设想把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在一小撮人富裕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贫困的基础上。伟大的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但是，由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祸害，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赫鲁晓夫经常在重重矛盾中挣扎，他的经济政策经常是朝令夕改，出尔反尔，使得苏联的国民经济陷于严重的混乱。赫鲁晓夫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败家子。他花光了斯大林时期的粮食储备，给苏联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他歪曲和破坏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使一小撮人侵吞了广大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从这一方面来说，赫鲁晓夫所走的路，也是背向共产主义的。

向共产主义发展，是向着提高人民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方向发展。绝不能设想有一个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赫鲁晓夫却热心于在苏联复兴资产阶级思想，并且充当美国腐朽文化的传道士。他鼓吹物质刺激，把一切人与人的关系变成金钱的关系，发展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思想。他使体力劳动重新被看做是低贱的事情，而建筑在侵占别人劳动果实基础上的享乐重新被看做是光荣的事情。赫鲁晓夫所提倡的这种社会道德和风气，离开共产主义何止十万八千里。

向共产主义发展，是向着国家消亡的方向发展。绝不能设想有一个存在着压迫人民的国家机器的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本来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它已经不是少数剥削者压迫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机器，而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享有民主，只对极少数剥削者实行专政的机器。赫鲁晓夫改变苏联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正在使国家重新成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对苏联广大的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实行专政的工具。现在，赫鲁晓夫正在继续加强他的独裁专制的国家机器，加强对苏联人民的镇压。在这种情况下，还谈论什么共产主义，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只要拿科学共产主义的原理对照一下，就不难发现，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正在使苏联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走上资本主义的轨道，因而距离“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目标，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

赫鲁晓夫打起共产主义的招牌，包藏着不可告人的祸心。他利用这块招牌，欺骗苏联人民，掩盖资本主义复辟。他还利用这块招牌，欺骗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这块招牌的掩盖下，赫鲁晓夫集团不仅自己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追求同美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而且还要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服从它的私利，不许反对帝国主义，不许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听从它的摆布，实际上变成它的附属国和殖民地。赫鲁晓夫集团又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服从它的私利，放弃革命斗争，不去打扰它同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的清梦，听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奴役和宰割。

总之，赫鲁晓夫提出的在苏联“二十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的口号，不但是虚伪的，而且是反动的。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说：中国人“竟然怀疑我们党、我国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的权利”。这种欺骗苏联人民、挑拨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手法，是十分拙劣的。我们从不怀疑，伟大的苏联人民总有一天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但是，现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正在破坏苏联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剥夺苏联人民向共产主义前进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摆在苏联人民面前的问题，不是怎样建设共产主义的问题，而是怎样反对和抵制赫鲁晓夫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还说：“中共领导人针对我们党宣布为人民争取美好生活是自己的任务，暗示苏联社会的某种‘资产阶级化’和‘蜕化’。”这种转移苏联人民对他们不满的手法，是愚蠢的，可悲的。我们衷心祝愿苏联人民的生活能够一天比一天过得好。但是，赫鲁晓夫鼓吹的“关心人民福利”，“让每个人都过美好的生活”，完全是假的，骗人的。广大苏联人民的生活被赫鲁晓夫折磨得已经够苦了。赫鲁晓夫集团所追求的，只是苏联特权阶层分子、新旧资产阶级分子的“美好生活”。这些人侵吞了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过着资产阶级老爷的生活。他们确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化了。

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种变种。他不是把共

产主义看作是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而是把它说成是什么“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的、盛满了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产品的一盘餐”。他不是把工人阶级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看作是争取自身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的斗争，而是把它说成是什么为“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而斗争。在赫鲁晓夫的心目中，科学共产主义连影子都没有了，有的只是资产阶级的庸人社会。

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是以美国为蓝本的。他把学习美国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提高到国策的地位。他说，他对美国的成就“十分尊重”。他“为这些成就高兴，有时候也有一些羡慕”。他大肆吹捧美国大农场主加斯特宣扬资本主义制度的信件，实际上把这封信作为自己农业方面的纲领。他不仅要在农业方面学习美国，而且要在工业方面学习美国，特别要学习美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原则。他很羡慕美国的生活方式，硬说在垄断资本统治和奴役下的美国人民“生活得不坏”。他还指望用美帝国主义的贷款来建设共产主义。赫鲁晓夫在访问美国和匈牙利的时候，还一再表示愿意“从魔鬼那里获得贷款”。

由此可见，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就是“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就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共产主义”，就是“向魔鬼要贷款的共产主义”。难怪赫鲁晓夫常常对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说，一旦实现了这种“共产主义”，“不用我来号召，你们就会走向共产主义”。

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稀奇。这样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这样的“共产主义”，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商标、招牌和广告。列宁在嘲笑老修正主义政党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的时候说过：“这种‘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在马克思主义受到工人欢迎的一切地方，都会拿马克思的名字来赌咒发誓。要禁止他们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正如不能禁止一个商号使用任何一种商标、招牌和广告一样”。

这就很容易了解，为什么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受到帝国主义和垄断资产阶级的赏识。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说：“随着‘土豆烧牛肉’和第二条裤子以及这一类问题在苏联变得更加重要，我认为在目前的舞台上已经出现了一种起温和作用的势力。”英国首相霍姆也说：“赫鲁晓夫先生还说过，俄国牌的共产主义是把教育和土豆烧牛肉放在第一位的。这很好。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比战争共产主义好，而且我高兴的是，这证实了我们的观点：肥胖和舒适的共产党人比瘦弱和饥饿的共产党人要好。”

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完全适应美帝国主义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需要。杜勒斯说：“有迹象表明，在苏联内部有要求较大的自由主义的力量，如果这些力量坚持下去，就有可能使苏联内部发生基本的变化”。杜勒斯所说的自由主义力量，就是资本主义力量。杜勒斯所希望的基本变化，就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蜕化。赫鲁晓夫正在实现着杜勒斯曾经梦寐以求的“基本变化”。

可见，对于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抱着多么大的希望哟！他们是多么兴高采烈哟！

我们奉劝帝国主义老爷们且慢高兴。尽管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为你们服务，

但是，决计挽救不了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和帝国主义统治集团犯着同样的病症，那就是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因而同样是十分虚弱无力的，同样是纸老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如同泥菩萨过江，自身尚且难保，又怎么能够保佑帝国主义长寿呢？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同时，也从反面教育了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

如果说，伟大的十月革命，向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供了最重要的正面经验，打开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那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却是提供了最重要的反面经验，使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以从中吸取防止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的教训。

世界各国历史上的革命，都曾经发生过反复和曲折。列宁说过，“如果从实质上来观察问题，难道历史上有一种新生产方式是不经过许许多多的失败和反复的错误而一下子就发展起来的吗？”

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如果从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英勇的尝试算起，还不到一个世纪；而从十月革命到现在，还不到半个世纪。无产阶级革命是以社会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是以公有制来代替私有制，从根本上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这样翻天覆地的革命，当然更要经历严重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经历长期的、反复的和曲折的过程。

在历史上，无产阶级政权由于遭受资产阶级的武装镇压而失败，已经有过巴黎公社的例子，有过一九一九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例子。在当代，也发生过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无产阶级政权几乎遭到覆没。人们对于这样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复辟是容易看得到的，是比较注意的，是比较警惕的。

对于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复辟，人们往往不容易看得到，往往不注意，往往不警惕，因而它的危险性也就更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由于党和国家的领导蜕化变质，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走上所谓“和平演变”的道路。铁托修正主义集团使南斯拉夫从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早已提供了这样的教训。但是，仅仅有南斯拉夫的教训，还不足以引起人们充分的重视。人们会说，这也许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吧。

可是，现在，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故乡，在具有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历史的苏联，也发生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的事件，也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它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起了警钟。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极大的注意，不能不引起

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认真思考和严重警惕。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出现，是坏事，又是好事。只要认真研究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实行“和平演变”的教训，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已经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将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将不仅能够打败敌人的武装进攻，而且能够防止“和平演变”。这样，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胜利就更加有把握了。

我们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四十多年的历史。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既反对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又反对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政策上、组织上和具体工作上，都告诉我们应当怎样坚持不懈地进行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中国人民经历过长期的革命武装斗争，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的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干部经过历次整风运动和尖锐的阶级斗争，受到了教育和锻炼。所有这些条件，使得资本主义要在我国复辟是很困难的。

但是，我们应当看一看，在目前我们的社会里，是不是干干净净的呢？不，并不那么干净。这里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被推翻了的反动阶级阴谋复辟的活动，存在着新旧资产阶级的投机倒把活动，存在着贪污盗窃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猖狂进攻。一小部分基层单位也发生了蜕化变质的现象，而且那些蜕化变质分子还极力向上级领导机关寻找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对于这些现象，我们决不当有丝毫的麻痹大意，而必须引起充分的警惕。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资本主义势力企图复辟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绝不能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我们有正确的领导，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并且采取正确的措施，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就能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可以成为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

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呢？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也研究了国际的主要是苏联的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政策，从而丰富了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提出的理论和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事物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

两类社会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社会矛盾性质完全不同，处理方法也应当不同。正确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将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将使社会主义社会日益巩固和发展。许多人承认对立统一的规律，但是不能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他们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不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仅有敌我矛盾，而且有人民内部矛盾，不懂得正确地区别和正确地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这样也就不能正确地处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对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这种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

第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必须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反对命令主义和恩赐观点。我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大鸣、大放、大辩论，是依靠人民群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一种重要的革命斗争形式。

第五，不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必须对社会主义社会做阶级分析，依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可靠的力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在农村中，在农业集体化以后，也必须依靠贫农、下中农，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击败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不断地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阵地。

第六，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个不断地教育人的运动中，要善于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这个运动中，要向那些敌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向那些贪污盗窃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进行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打败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进攻，把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

第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导下，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第八，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两种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集体所有制本身也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国人民创造的人民公社，就是解决这个过渡问题的一种适宜的组织形式。

第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在科学、文化、艺术、教育队伍中，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也是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要经过文化革命，经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

第十，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第十一，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第十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同时，普遍组织和训练民兵，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第十三，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和人民利益的斗争中，要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第十四，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社会主义阵营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斗争的产物。社会主义阵营不仅属于社会主义各国人民，而且属于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必须真正实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

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建立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的基础上。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主要地应当依靠自力更生。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实行民族利己主义，甚至热中于同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那就是蜕化变质，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第十五，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在一切部门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制度。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和发展它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持和发扬它的生气勃勃的革命风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斗争。

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同志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毛泽东同志提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象赫鲁

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上面所说的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系列原则，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增添了新的武器，这种武器对于我们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只要按照这些原则办事，就能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援助世界各国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运动，并且保证在将来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 × × ×

对于苏联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

尽管我们不愿意，尽管我们反对，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既然已经出现了，这也没有什么可怕，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球还是要照常转动，历史还是要向前发展，全世界人民总是要革命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总是要灭亡的。

伟大的苏联人民的历史功勋照耀千秋万代，绝不会因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背叛而失掉光彩。苏联广大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广大的苏联共产党人，终将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而走向共产主义。

苏联人民，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全世界革命人民，必将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背叛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已经变得并且将继续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大。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前途，从来抱着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我们坚决相信，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辉，社会主义的光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

必将普照苏维埃的大地。无产阶级必将赢得整个世界，共产主义必将在地球上获得完全的彻底的最后的胜利。

原载人民日报 1964-07-14

